

目 录

- 辛亥革命回忆.....朱 德 (1)
- 我的回忆.....何香凝 (12)
- 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黄炎培 (60)
- 辛亥革命前后回忆片断.....程 澄 (70)
- 武昌起义前后到二次革命.....吴玉章 (94)
- 广州起义亲历记.....熊克武 (130)
- 辛亥革命杂忆.....沈钧儒 (138)
- 回忆辛亥革命.....张奚若 (143)
- 我在辛亥这一年.....马叙伦 (170)
- 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李书城 (180)
- 疏《黄帝魂》.....章士钊 (217)
- 文学社与武昌起义纪略.....李六如 (305)
- 黄花岗起义与炸毙凤山亲历记.....陈其尤 (315)
- 辛亥前后十年杂忆.....李根源 (322)
- 关于黄兴、华兴会和辛亥革命后的
 孙黄关系.....周震麟 (330)
- 戏剧界参加辛亥革命的几件事.....梅兰芳遗稿 (342)
- 辛亥革命前后保定革命运动回忆录.....刘仙洲 (374)

辛亥前后彭泽民先生和吉隆坡华侨

- 的革命活动.....陈其璜 (392)
- 辛亥革命时期政党活动的点滴回忆.....王紹鏊 (398)
- 記南京临时政府及其他.....任鴻隽 (410)
- 武昌起义后粤軍北伐始末.....姚雨平 (419)
- 我参加辛亥革命的经过.....林 虎遺稿 (429)
- 辛亥革命前后杂忆.....仇 驚 (437)
- 辛亥革命亲历纪实.....何 遜 (456)
- 共进会从成立到武昌起义前夕的活动.....李白貞 (497)
- 辛亥广州之役前党人在日本购运軍火
的经过.....王子壽 (528)
- 癸丑討袁回忆录.....耿 毅遺稿 (536)
- 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馬 湘 (559)
- 回忆先君克強先生.....黃一吹 (608)
- 忆声洞.....王 穎 (619)
- 光复会見聞杂忆.....周亚卫 (624)

辛亥革命回忆

朱 德

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紀念日到来了。

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从一八四〇年反对英国侵略的鸦片战争开始的,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为止,达一百零九年。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多次说过的,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一百零九年,又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为止的前八十年,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一九四九年为止的后三十年,是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老一輩的中国人,是亲自经历了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这两个时期的,并且接着又亲自经历了从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

辛亥革命同以前的各次革命比起来,是更完全的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新的发展。这次革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辛亥革命的结果,推翻了延續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最后一个王朝,宣布成立了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中华民国。这次革命引起了全国的民主革命精神的高涨,为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打开了道路。但这次革命远远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所謂“中华民国”很快就成了有名无实的東西,代替清朝封建統治而起的,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以及后来的国民党反動統治。回忆辛亥革命的历史，繼承和發揚这次革命的光荣传统，吸取它的宝贵的历史教訓，在今天还是有重大意义的。

辛亥革命是經過了长期酝酿而发生的一次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說的：“自从一八四〇年鴉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經過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辛亥革命的公认的領袖就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十九世紀末，在向西方学习的中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中間，出现了两个派別，这就是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一八九八年“戊戌政变”的失败，使幻想清朝政府可以实行某些改良的維新派破产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和影响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一九〇五年，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在同盟会成立宣言中提出了包括“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綱領。这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这个方案是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学来的。他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清朝的統治来“建立民国”，这在当时，是符合全国广大人民的愿望和需要的。

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以后，会员們很快地就分头回国到各地去組織革命团体，联合爱国人士，准备起义。全国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就我当时在那里上学的云南省來說，法国那时在云南修建的滇越铁路已达到昆明，并且掠夺了七个府的矿产开采权。英国也伺机侵掠我国边疆的片馬等地。法、英帝国主义对云南省的加紧侵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云南人民更感到“內亂國基，外御強敌”的迫切，于是积极起来反抗。一九〇七年，云南同盟会会员

创办了《云南杂志》，在发刊词中号召云南人民“同心同德，羣策羣力，万死不懈，以抗强敌。”一时以昆明、腾越的同盟会支部为中心，联络爱国革命人士，组织了許多革命团体，这样，云南就成为策动革命运动的重要省份之一。

孙中山先生当时很重视军队工作，注意在敌人军队中开展工作，这对辛亥革命起了重大的作用。一九〇八年，孙中山派黄兴到云南河口发动起义，不幸失败。接着同盟会员杨秋帆等又在永昌举行起义，结果也没有成功。这两次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是革命的影响却在云南日益扩展起来。我就是在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于一九〇九年在云南讲武堂参加同盟会的。

云南讲武堂，原来是一九〇九年护理云贵总督沈秉堃为了培养清朝政府的军事人材办起来的。同年冬，云贵总督李经羲到昆明上任，把新军第十九镇的随营学堂也并入了讲武堂。当时讲武堂的总办是李根源，教官有方声涛、赵康时、李烈鈞、罗佩金、唐繼尧、刘祖武、顧品珍等人。他们大都是同盟会员，其他一些教官或者是同盟会员，或者是受到了同盟会革命宣传的影响的。讲武堂的学生有五百多人，其中許多是不满于现状的青年。不久，就在讲武堂中建立起同盟会的组织，秘密传阅同盟会宣传革命的书刊。大家经常谈论的和考虑的，就是怎样发动革命起义。这样，云南讲武堂就成为云南革命力量的重要据点。那时，蔡锷经李根源和罗佩金向李经羲推荐，担任了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的协统。蔡锷虽然不是同盟会员，也从来不和讲武堂来往，可是他却是一个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人，暗中和同盟会保持着联系。当时清朝政府对革命力量的压迫是极端残酷的。蔡锷当时对讲武堂的革命活动，作了很好的掩护。

一九一一年，旃武堂第一批學生一百人提前畢業，其中有十八人被派到蔡鈞部下當軍官，他們就在士兵中進行革命的宣傳活動。我當時被調到七十四標第二營左隊當排長，標統是羅佩金，管帶是劉存厚。新軍士兵都是從鄉村征調來的農民，他們對於清政府的專橫腐敗的統治和地主階級的苛重的剝削，以及舊軍隊的打罵制度和舊軍官克扣軍餉的行為，本來就存在着激烈的不滿情緒。我們就深入到士兵羣眾中，進行革命的宣傳，革命的種子漸漸地在士兵中撒播開來。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爆發，這給了雲南人民以很大的鼓舞。革命黨人也在士兵中間加緊了活動。清朝統治者驚慌萬分，雲貴總督李經羲在總督衙門內外修築防禦工事，並下令捕捉革命黨人，第七十四標的標統羅佩金，也被撤換。李經羲還調集了衛隊營、輜重營和兩個機關槍連，擔任總督衙門的守衛，但是就在擔任守衛的隊伍中，也潛伏着革命力量。李經羲準備屠殺革命黨人的罪惡計劃被機關槍營營長李鳳樓秘密通知了革命黨人。這時，革命起義的時機已經成熟了。

十月三十日（舊曆九月九日），在昆明的革命黨人舉行起義，當夜由李根源率領新軍七十三標在城外北校場發動；蔡鈞率領新軍七十四標在城外南校場巫家壩發動。旃武堂、陸軍小學的學生以及李經羲的衛隊，也都響應起義。我所在的那個標（團），就是第七十四標。還在舉行起義以前，清朝的文武大員因為害怕新軍暴動，就停止給士兵發子彈。我們是借用演習打靶的機會，每人暗地里準備了四五發子彈的。原來預定夜間十一點鐘發動，可是還不到九點，北校場的槍聲就響了。大家正在忙亂的時候，蔡鈞將軍在南校場出現了。部队的秩序很快恢复了。这时，李經羲也听到了

起义的枪声，他象在梦中一样，还打电话向蔡锷求救。蔡锷将军放下电话筒，就立刻走到待命出发的部队前面，严肃地宣布云南起义了。

雄壮的起义队伍，在蔡锷的指挥下，很快出发攻打城門。我当时被指定为連长。住在我們附近的炮兵团也受了革命宣传的影响，全团参加了起义。当我们向昆明城进攻时，李經羲調来把守城門的騎兵团不但沒有阻挡我們，大部分騎兵反而加入了我們的队伍。駐在城內的耕武堂学生们打开了城門。十二时，我們全部入城，天将黎明的时候，起义部队已經占领所有的城門。接着，我就参加了攻打总督衙門的战斗。在攻打总督衙門的时候，因为卫队营和我們有秘密联系，我自己过去也曾經率命在卫队营中間作过一些革命活动，因此，当起义軍攻打总督衙門的时候，这些卫队很快就缴了械。李經羲仓皇逃走。城内敌軍最后两个据点——五华山和軍械庫，也在初十日的晚上被先后攻克，第十九鎮統制鍾麟阁也被击毙。不久，大理、临安两地的新軍同时宣布起义。昆明以外各地的巡防軍相繼被肃清，云南全省宣告光复。十一月一日，成立了云南軍政府。

云南起义以后，清朝政府正布置向革命反扑，在清軍进攻武汉以前，端方率領的清軍就进入了四川。四川总督赵尔丰也还拥有相当大的反革命軍事力量。于是云南革命党人决定派兵援助四川起义軍。蔡锷派出两个梯团(等于旅)共八个营入川。旧历十月間，援川部队从云南出发，这时我仍在援川軍中担任左队队官(連长)。援川軍分为两路，一路經昭通，向叙府前进；一路經貴州、毕节，向泸州前进。我們这一路沿途击败清朝的巡防营，受到羣众的热烈欢迎。在占领叙府以后，就轉向自流井进击，自流井駐有川

督赵尔丰的一个巡防营，貴州駐有端方的一个团。赵尔丰的军队一与我們接触，就潰不成軍，狼狽逃窜。正当我們攻下自流井的时候，传来了端方在貴州被起义軍杀死的消息。不久，四川軍政府成立，我們也就回到云南。

当时云南是很穷困的一个省份，由于封建统治者长期的压榨和帝国主义的瘋狂掠夺，人民生活已經到了无法維持的境地，从前方轉战回来的軍隊，沒有錢發餉。当时，就連比較彻底的資產階級革命家，也还没有觉悟到：要彻底根絕帝制，废除封建統治，必須彻底废除封建的經濟制度及实行土地改革。蔡鐸更不例外，那时他是从政权內部进行若干改革，他撤換了一批只想升官发财的具知事，任用克己奉公的青年知識分子代替他們，在軍隊中也任用一批青年的軍官来代替旧軍官，从而在政府机关和軍隊中注入了新的民主血液。在財政上他极力提倡节省，并且以身作則，营长以上的軍官，每月只領月薪六十元。由于蔡鐸的这些新的建樹，当时的云南已呈現出一种新的面貌。

辛亥革命是在孙中山先生号召和領導之下发动的。以同盟会为中心，联合了一切反清的力量，这种革命力量的联合，促成了革命的胜利。但是，中国人民很快就发现，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一轉眼之間已經落到了反革命的手中。得到外国侵略者全力支持的北洋軍閥首脑袁世凱，一面从清朝政府接管政府权力，一面伪称他自己贊成共和，同时派遺軍隊南下，要求在南京成立的临时革命政府把权力让給他，以便实现所謂南北之間的“和平”。所謂的“南北議和”按照袁世凱的条件完成了，辛亥革命也就失敗了。辛亥革命所以失敗，在客观方面固然是由于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反动势力的力量还很强大；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在主观方面，即在資產階級

领导的革命力量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也可以说是不可克服的弱点。领导辛亥革命的同盟会，实际上是各种不同倾向的分子的联盟。以孙中山为首的一部分人是代表了资产阶级的革命倾向的，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派。但即使是他们，也没有力量领导中国革命达到真正的胜利，并没有明确地认识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没有采取明确的反帝路线，没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与封建军阀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同盟会内的资产阶级妥协派，以及依附于同盟会的“反满”的汉族地主分子，很快就接受了反革命方面的议和条件，迫使孙中山先生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结果是，宋教仁遭到了袁世凯的杀害，大批国民党的议员遭到迫害，国民党遭到禁止，议会遭到解散。在这以后，以英美日等帝国主义为靠山的袁世凯，干脆宣布恢复帝制，把“民国”这个招牌扔掉了。

在这以后就是孙中山所领导的企图挽救革命失败的讨袁战争、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一九一三年袁世凯解散议会以后，孙中山号召革命党人起来讨伐袁世凯。李烈钧在江西湖口起兵讨袁，黄兴在南京响应，其他一些省份也有响应的表示。但是，由于革命力量缺乏坚强的团结，又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特别是没有掌握足够的武装力量，结果讨袁战争陷于失败了。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承袭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二十一条”，接着又于同年十二月宣布做皇帝。在袁世凯称帝以前，蔡锷由北京秘密逃回云南，他凭借着以前在云南蓄积的革命力量和他本人的政治威望，在云南发动护国讨袁起义。这时，唐继尧迫于形势，也宣布云南独立，并由蔡锷、罗佩金、李烈钧、何国钧等领导组成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是蔡锷，参谋长是罗佩金。当时确定的任务是

北出四川，然后进攻武汉。第二軍总司令是李烈鈞，參謀长是何国鈞，任务是出两广，然后相机进取湘贛，得手以后与第一軍会师武汉。第一軍共有三个梯团，六个支队，我担任第三支队司令，随护国軍进入四川。由于护国軍紀律严明，深受人民的拥护，战斗力也比较强。第一軍入川不过六千人，与北洋軍閥曹錕的十几万“征滇”軍相持于叙府、泸州之間。护国軍凭着人民的拥护，巧妙地利用山地作战，結果能以少胜多，打了許多胜仗。

由于蔡鍔將軍的首义，和各省的相繼响应，袁世凱終于在全国人民反对之下，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接着就病死了。但是在打倒袁世凱以后，反袁的联合战綫也就分裂了，不但革命党与进步党分裂，而且革命党內部也呈現了分裂状态，許多所謂革命党人自己就变成了新軍閥，只顧扩充自己的势力，把孙中山先生說过的“各派协同进行，以收羣策羣力之效……以期早日除国賊而奠国基”这些话，根本丢到脑后。因此，护国战争虽然打倒了袁世凱，但是并没有能够挽救革命。結果是北洋軍閥中另外一些人代替了袁世凱，在中国繼續实行卖国反人民的統治。

繼袁世凱而起的北洋軍閥段祺瑞，繼承袁世凱的衣鉢，繼續卖国独裁，破坏临时約法。孙中山先生于一九一七年号召护法，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會議，組織护法政府。这时云南、四川的队伍，是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但是由于唐繼尧等人排斥孙中山先生和进行分裂活动，以致护法运动沒有成功。后来又因为唐繼尧想当“云南王”，并且企图控制川、黔，引起川、黔方面的不滿。于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力量，就更进一步地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而最根本的失敗原因，則是当时的革命运动，沒有发动人民羣众，依靠人民羣众作支柱。

辛亥革命的最后失败，完全证明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其所以行不通，就因为当时已经是帝国主义时代，而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就是强大的国际帝国主义。辛亥革命及其后的几次企图挽救革命的斗争，主要是被帝国主义全力支持的军阀们打败的。正如列宁所教导的，在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要取得真正的自由，没有一系列的革命就不能实现。很明显，要战胜帝国主义，就非深刻地广泛地发动人民群众、进行持久的革命斗争不可。这样的领导责任，是资产阶级所决然担负不起来的。这个领导责任，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负。毛泽东同志说：除了工人阶级，“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又说：“孙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在帝国主义时代，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原因就在此。”

由于辛亥革命及其以后的讨袁战争、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的失败，孙中山先生和一切仍然忠于中国革命事业的人们，包括我自己在内，都陷入了一种怀疑和苦闷的状态，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

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长期的革命斗争经验所作的一个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完全证明了这个结论的正确性。

我自己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走上了新的革命道路的。我当时担任云南军队的旅长驻防在四川。如同前面所说，当时由于四川军队和云南军队之间的矛盾，我已亲身体验到用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加上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我深深感到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兼从速进行革命。到了一九二一年滇军回滇时，我就在这年的八月离开了军队；第二年，罗佩金被唐继尧杀害，我就从四川到了上海，准备到俄国或者德国去学习。就在上海，我会见了景仰已久的孙中山先生，不久，我就动身到德国去了。我在德国研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走上了新的革命旅程，并且这时又在党的指示下重新参加了中国国民党的活动。

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的孙中山先生，后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之下也吸取了辛亥革命的失败教训，勇敢地走上了同共产党、同工农、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合作的道路。孙中山先生真不愧为一个卓越的不屈不挠的不断进步的革命家。在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许多仍然忠于革命事业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的人们，采取了同共产党和人民合作的正确立场，并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为人民的可贵的朋友。

辛亥革命英雄们的事业，已经由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我们不但已经彻底完成孙中山先生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而且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

新中国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飞跃前进。我们今后应当进一步加强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道进行保卫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的斗争。让我们用新的胜利，来纪念为人民革命事业而牺牲的英雄们吧！

我的回忆

何香凝

我生长在香港。父亲是农民出身，他在澳門創了商业，在香港成了相当大的资产家、地产家。我自小生活优裕，社会接触少，二十岁与廖仲愷結婚。我們家里有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的人，我自小即常常听到别人談到反清的事。結婚之后，我又听仲愷常常談及时事，逐渐加深了我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認識。当时清政府腐敗无能，干下了許多丧权辱国的事，我們和全国人民一样，对此甚为憤激。戊戌政变之后，有志青年赴日留学，一时成为风尚。仲愷也很想去日本留学。原来仲愷一家都是华侨出身，仲愷生在美国，仲愷的父亲死在美国，仲愷的亲兄亦在美国长大。仲愷的亲兄懂得一些英文，当上了清政府的外交官員，但是他不答应給仲愷到日本留学的学費。仲愷自己要筹一笔赴日旅費，錢也不够，为此常常对我叹息。为了成全他这个志愿，我就把結婚时娘家給我陪嫁的珠玉首飾卖掉，抛弃我一向过慣了的优裕悠閑的生活，同到日本留学。在仲愷到了日本之后两个多月（即一九〇二年的冬天），我也东渡日本，开始了去国离家、独立学习的另外一种新生活。

一九〇三年初，我入东京目白女子大学。入学之后，我觉得日文程度不够，听課有困难。当时的日本女子大学校长成瀬寅藏，就請学校的舍监及舍监夫人帮助我学日本語文。成瀬寅藏对我的学

习問題十分关心，多方帮助，是我至今仍然感谢的。这个时候，我除了每日在寄宿舍加紧学习日本语文之外，有时也和仲愷一起参加中国留学生的各项活动。

当时，孙中山先生宣传推翻清朝、号召革命的名声，在日本留学生中早已传播开了。我们也十分仰慕，可惜的是还没有会面的机会。就在一九〇三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和仲愷到神田神保町的中国留学生会馆参加留学生的聚会，在会场上初次看见了知名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真是喜出望外。但是，当时留日学生的思想十分分歧，参加那次会议的有革命青年，有保皇党，也有清政府的暗探和忠实走狗，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孙先生在那次聚会上谈得并不多，只泛泛地谈到了中国积弱太甚了，应该发愤图强，彻底革命。我们都听得入了神，不知不觉就到了散会的时候。我们抓住这个偶然的会，打听到孙先生寓所的地址，预备以后再去拜访，听他多谈些革命道理。

几天以后，我、仲愷和另一个留日青年学生黎仲实，一起按地址到小石川的一间“下宿屋”拜访孙先生。在一个面积不大、陈设简朴的小房间里，孙先生亲切地接见了我们。正象一般年青人之间的会面一样，我们没有客套，话题马上从中国政治问题上开始了。这一次孙先生谈得很多，从鸦片战争谈到太平天国，谈到戊戌政变，谈到义和团，谈到清政府腐败无能，所以一定要进行反清革命。我们听他说到推翻清廷、建立民国的道理，很是佩服，十分同情。后来，我和仲愷又再到那“下宿屋”去见孙先生两次，对他表示我们也想参加革命工作，愿效微力。孙先生指示我们先在日本留学生中物色有志之士，广为结交。此后，我们积极参加“革命同盟”的各项活动，在留日同学中展开广泛接触，进行联络宣传工作。

一九〇三年夏秋之間，孫中山先生由日本經檀香山赴美洲宣傳革命。孫先生一向都是十分重視武裝鬥爭的，他接受了在興中會、華興會時期歷次起義失敗的教訓，十分注意訓練軍事人材。他在離開日本之前交給我們的任務，就是在留學生中組織學習手槍、步槍射擊等等初步的軍事知識，為將來發動武裝鬥爭作準備。那時我已由寄宿舍遷出，在牛込區租賃房子居住。廖仲愷、黎仲奕和蘇曼殊等人便組織了住在牛込區的留日青年學生，成立義勇隊。為了避免外人知道，義勇隊員每天清早秘密聚會到大森練習射擊。黃興懂得軍事知識，由他給義勇隊教授槍法。與我們居住在同一个寓所裏的義勇隊員約有二十多人，我每天都先行起床，照料燒水煮飯的事情，為他們管理家務。清政府駐日公使館一向對我們的聚會極為注意，並且勾結了日本警察，經常偵查我們的行動。義勇隊的青年都很熱心學習軍事，練習射擊的事也很秘密，本來我們是可以繼續練習下去的，但是由於其中一個隊員僅僅為了談戀愛，結果出了問題，被敵人找到了破壞的機會。一個和我們同住的青年義勇隊員和日本女子鬧戀愛，日本警察指使那個日本“女中”假裝懷孕，到我們寓所來吵鬧。我們只好變賣家私雜物，籌錢賠給那個“女中”，並且搬了一次家，搬到小石川居住。在牛込區好不容易組織起來的義勇隊練習射擊的事，因此無形中等於停止了。

一九〇四年初，孫先生作環球旅行，由美洲經日本前赴歐洲考察。他到日本之時，我正懷着身孕，預備回香港分娩。孫先生特意叫我帶一封信給在香港的陳少白，我因此在香港第一次與陳少白認識。我由東京先到橫濱候船回國，知道孫先生當時在橫濱山下町已設有秘密的通信聯絡的地点。我在香港生下了夢醒，恐怕在日本一面讀書、一面做些革命宣傳工作，生活流動無定而又緊張，

照顧小孩很不方便，于是独自返回日本。夢醒虽然是我初生的第一个女儿，但是我也只好将她留在我娘家托人抚养。而她那冠在千里海外、正在早稻田大学预科学习、同时从事联络革命青年工作的父亲——仲愷，则直到一年多以后回到香港筹款，才第一次与他自己的女儿梦醒会面。

本来，在兴中会和同盟会时期，很多日本朋友都曾热心帮助孙先生进行革命工作。山田良政在第一次惠州之役就被清政府逮捕后牺牲。此外，宫崎寅藏兄弟、犬养毅、菊池、萱野长知、寺尾亨和山田純三郎等人也曾尽力帮助过孙先生。我们至今仍纪念着他们。原来日本政府的对外方针是根据日英同盟的政策办事，而英国是大力支持清朝的，因而日本政府当局与清政府互相勾结，对于中国革命党人在日本进行的活动，多方设法制止和阻挠。所以不少日本朋友帮助我们一个时期，另一个时期又不赞同我们多所来往，就是受了日本政府的限制。在这样情况之下，我们在日本进行留学生中的工作，也不是容易的。

一九〇五年孙先生由欧洲回到日本，积极筹备组织同盟会的工作。他的活动范围更广泛了，方式更多样了。他这次在东京一间名叫“高阳馆”的旅店居住。那些一贯与清政府相勾结、向来对于孙先生的行动深为注意的日本警察，又常常看见孙先生收发很多书信，会见很多客人，聚众宣传，高谈阔论，当然把孙先生的革命活动完全报告上去。孙先生的行动因此时常受到干涉。孙先生为了以后能够继续顺利地多做些革命工作，想找一个可靠的人，借他的寓所作为开会及收信地点，以便掩护。因为我和仲愷参加“革命同盟”的活动已经不少日子，而我们夫妇又是自己租赁房子居住，孙先生觉得在我家开会及收信极为合适，就叫黎仲实来找我谈。

黎仲实转达了孙先生这个意思，我十分赞成，孙先生还特别提到严守秘密的重要，希望我不要雇用日本女中。我都一一答应了。为了保守秘密，我还特意去找一间合适的房子。几天以后，搬了一次家，由本乡搬到神田，连女中也没有雇，每天下课以后亲自操持家务。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学会自己洗米、生火、烧饭等等家务劳动的。自此以后，我家就成为通讯联络站和聚会场所。

那时，酝酿正式成立同盟会的工作已经相当就绪。而这时候仲愷返回香港筹措留学费用，不在日本。就在孙先生叫黎仲实来和我谈借房子开会的第二天晚上，我在我的寓所里办了加盟手续，那时我还住在本乡。我清楚地记得我举着右手在孙先生的领导下读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有始有终，如或渝此，任众处刑”的誓言。我虽然早已参加了“革命同盟”的活动，并且早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口号作为我革命奋斗的目标，但是现在我又正式办理加盟手续了，再想到我们献身的革命事业有了越来越多的人拥护，势必越来越加快发展，我当晚兴奋激动得彻夜难眠。和我同时办理入盟手续的还有黎仲实、马君武以及日后刺杀仲愷的真凶胡毅生等人，这就是孙先生在日本发展的第一批同盟会会员。我们这几个人和稍后入盟的廖仲愷、朱执信，后来都成为中国同盟会的骨干。

我搬到神田居住以后，孙先生每星期召集同志在我家里开会两三次，经常在我家计议和筹划各种革命工作。按照日本规矩，进门就要脱鞋，人如果来得多了，都脱下鞋子，很多鞋子就会堆在门口，是会引起日本警察和清政府的走狗侦探怀疑的。因此，当孙先生每次开会的时候，我除了做好看门开门、照料茶水的工作以外，还专门做收藏鞋子的工作。孙先生收发信件也很多，有时还用假

名。寄来邮件中有写“中山”、“高野”、“逸仙”、“孙宅”收的书信，我都收妥，交给孙先生。由于孙先生的正确领导和同志们的积极努力，一九〇五年八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决定将来成立的新国家称“中华民国”。当时加盟者已有数百人，盟员籍贯遍及中国十七省。只有甘肃因为还没有留学生到日本，所以还没有甘肃省籍的盟员。及后不到年余，加盟的已过万人，国内各省都成立支部，从此革命风潮，日甚一日。

在我入盟以后大约两个多月，仲愷方才回到东京。同船抵达的还有胡汉民夫妇，胡汉民夫妇寄寓在我的家里。仲愷有志革命很早，当晚孙先生来到我家，仲愷在晚饭后即行宣誓加盟。但是，胡汉民为了“平均地权”四个字与孙中先生辩驳了差不多一个通宵。胡汉民认为不宜于在那个时候提出“平均地权”的口号，孙先生向他解释说：“你参加反清朝帝制，这很好，但是解决民生问题，也是我们革命目的之一，而要解决民生问题，首先就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我记得那天夜里我在床上醒了又睡，睡了又醒，还听见他们在隔壁房间争论不休，一直辩论到深夜三时以后，胡汉民方才勉强加盟。可见胡汉民后来反对改组中国国民党，反对实行三大政策，是早有原因的。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是孙先生当年组织同盟会提出的口号，它初步概括地体现了孙先生当时的革命理想。这四句口号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也不应该分割。那个时候虽是革命浪潮汹涌，有志青年纷纷趋向革命，同盟会发展迅速，固然出人意料，但是每一个加入同盟会人，在加盟时都要宣读这四句誓言，把这四句话作为服膺奋斗的南针。可惜的是在全体同盟会员之中，只有一部分的同盟会员对这四句口号是真心拥护到底的，

有一部分同盟會員仅仅在表面上接受，实际上心里面是不接受，或者并不是完全接受的。所以后来革命陣綫内部一再发生分歧，其实在这个时候就已经預伏诱因了。

自从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以后，清朝政府发觉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活跃非常，便加紧勾結日本当局，設法制止日本留学生中革命思想的蔓延。一九〇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发布《取締清韓留日学生規則》，清廷駐日公使汪大燮是从中做过相当工夫的。取締規則中规定取締中国留学生的政治活动，剥夺言論自由，禁止集会結社，检查书信，強迫青年遵守清朝法令，以鎮压革命思想。当时留日学生分为两派：一派胆小怕事，主张妥协；一派主张坚决反抗。这次“反抗取締規則”的斗争，也无例外地考驗了我們留学日本的每一个同盟会會員。我和仲愷，还有很大一部分同盟會員都坚决主张同盟罢課，以示抵抗。我們在斗争中团結了广大青年学生，激发他們的爱国热情。很多青年学生就在这次斗争中受到启发和教育，由靠攏我們进而直接参加到同盟会的組織中来。中国同盟会的活动，不但沒有因此而受到打击，反而更加活跃发展。但是，也有一部分同盟会會員在这次斗争中暴露了他們的本性。即如汪精卫、胡汉民等人当时都还没有考入正規大学，只是混在政法学校的速成班里学习，恐怕罢課对他們不利，恐怕拿不了清朝的膏費，恐怕会被学校开除，为自身計，他們是主张妥协不罢課的。汪精卫还在当时的所謂“維持会”上签过名。当然，要說全体留日中国学生都罢学回国，不特实行起来頗有困难，而且大批同盟會員回国之后也有被清政府一网打尽的危險。孙先生不贊成留日学生全体回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那时的斗争中，革命党人主要的是应该和大家团結一致，共同行动，坚持斗争，爭取胜利，而汪精卫与胡汉民恰

恰就是根本没有这样的信心和决心的。

一九〇五年十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投稿的多为同盟会会员，他们所写宣传革命的文字很受读者欢迎。但是，当时发表在《民报》上的文章和一般参加同盟会的人思想状况，也明显地反映了同盟会会员内部存在的思想分歧。这些文章上表达出来的和一般的思想动态，可以分为三类。其中第一类人仅有推翻清朝的单纯民族主义思想，至于推翻清朝以后中国往何处去，思想上还是完全模糊的，甚至还可以说根本就没有接触到这个问题。这一类的代表人物是章炳麟等。第二类人则在推翻清朝以后，要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也就是欧洲或日本式资产阶级民主的道路。代表人物就是胡汉民、汪精卫，后来成为西山会议派的邹鲁、居正也是属于这一类人物。第三类人则接受了当时已经在日本青年学生中开始流行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并试着把那种尽管还是处于萌芽状态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到中国来。他们在翻译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时候，把资产阶级译作“豪富”，把无产阶级译作“细民”，他们在《民报》上宣传“细民”与“豪富”的斗争，也就是反映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一类的代表人物就是朱拱信和廖仲恺。仲恺在《民报》上用的笔名，叫做“屠富”。我记得仲恺那时候曾同我开玩笑，说：“你的爸爸是个大资本家，也是将来要在打倒之列的，你不怕么？”

当时中国同盟会参加者存在的这三类思想，都在《民报》的文章上反映出来。中国究竟往何处去？问题是提出来了，也有过争论，可是在那种情况下不可能得到解决，而彼此的见解也极不一致。辛亥十月武昌起义成功，清朝皇帝就退位了。辛亥革命是没有明确的思想准备作为基础的。当时武装斗争是抓得紧，而思想

建設就比較松了。后来的历史可以充分証明：第一类人和第二类人中的一部分在刚刚推翻清朝、袁世凱上台的时候，就完全倒过去了。第二类人在改組中国国民党的时候，也完全暴露了他們的反动本質。而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又不幸在一九二五年因病去世。朱执信又牺牲在先。自始至終一心一意跟随孙先生，忠心耿耿地想把中国建設成为比較进步的，自由、平等、独立、富強的国家的国民党人，便只剩了廖仲愷等少数人，仲愷后来又被往日的老朋友、国民党中的反革命分子暗杀牺牲。政权落到蔣介石、汪精卫等投降帝国主义的反动派手中，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因而被推迟了二十多年。

同盟会正式成立大約一年之后，我們遵照孙先生的指示，宣传反对保皇党，并与当时的改良主义者及君主立宪派展开激烈的斗争。当时，保皇党害怕革命，他們提出“革命会招致列強瓜分中国”的論調。孙先生对此极为憤慨，就口述意思，叫人写了一篇文章，指出“中国除彻底推翻封建帝制以外，别无出路。革命絕不会招致列強瓜分中国”，严詞駁斥了保皇党的反动論調，得到当时有志青年的拥护。孙先生还叫廖仲愷、朱执信和我联名写信給海外美洲等地華侨，向他們宣传推翻清朝帝制的必要，深得海外華侨同情。不久也有華侨加入同盟会，并寄了款来，贊助革命。在这期間，我虽然只会讲广东方言，还不会說普通話，但是通过笔談，也在留日同学中交接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們都是从事革命的好青年。同盟会的著名女盟員秋瑾和后来在黃花崗之役牺牲的千叶医学科学校留學生方声洞，就是我在这个时候結識的。

一九〇六年秋天，我結束了女子师范預科的学习，再考入目白女子大学博物科攻讀。半年之后，因患胃病停学，在家休养。那时

我們住在大久保。病好不久，又怀身孕。一九〇八年生下了承志之后，改入本乡女子美术学校高等科学繪画，端管紫川先生就是教我繪画的老师。我同时也是日本帝室画师田中賴章的学生。我每星期到他家里学两次画，我学画老虎、獅子就是跟田中賴章先生学的。那个时候，日本文化界也很重視中日文化交流，教画的老师知道我是中国留学生，又見我是个女的，都很重視，都很热心教导我。这一段时期，我一面学习美术，一面一直都为孙先生照料秘密集会和通訊联络机关。为了筹划革命党人的起义事宜，很多准备工作都是在我家里部署的。起义部队所用的旗帜符号，有一些就是我在孙先生的指导下描繪和刺綉縫制的。

我在留学日本而又进行革命工作的整个期間，生活都比較俭朴清苦，娘家給我的錢統統都給我花用在这上面了。为了准备起义，孙先生要派同志回香港购运軍火，我們大家都帮忙筹措旅費。我这样做，还完全不敢告訴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及亲戚，因为当时革命叫做“造反”，被清政府知道，是会株連九族的。

为了使中国革命取得国际正义人士的同情和贊助，孙先生曾派仲愷到天津与法国社会党人联络。当时，仲愷正在早稻田大学学經濟，还没有毕业，但是仲愷为了革命需要，立即停止学习，奉命回国，完成任务以后再回日本，轉入中央大学三年級繼續学政治經濟。那已經是一九〇八年的事了。由于国内起义几經失败，孙先生注意到，如果要起义成功，除了筹募足够的經費以外，还要做好敌人内部的策反工作。当时，中国南方起义已經失败了几次，孙先生想改在北方筹划起义。一九〇九年，他再派仲愷到营口及吉林秘密做策反的地下工作。那时仲愷已在中央大学毕业，他經由天津轉到东北进行秘密工作，并以在吉林巡撫陈昭常幕下做翻譯作

为公开职业来掩护。仲愷与林伯渠同志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吉林时常过从的。

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一年間，国内几次武装起义失败，革命转入低潮。为了积极筹划再行发动武装起义，孙先生一方面派人到香港，另一方面又亲到南洋各地筹款支持革命。一九一一年春，我已在本乡女子美术学校毕业，也回到香港娘家居住。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之前，香港就是革命党人的联络接头地点。我虽然没有亲身参与这次战役，但是这次起义的准备事宜，我都有些预闻。这次起义是孙先生指示黄兴领导进行的，朱执信也参与了此役。牺牲的七十二烈士都是我们同盟会的优秀同志，都是当时革命的中坚分子，方声洞、林时爽等就是留学日本的有为青年，还有一些南洋华侨。这次震动中外的黄花岗之役虽然失败了，却激励了全国人民的革命热情，动摇了清朝统治的基础。

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孙中山先生正在海外宣传革命，募集革命基金，其他革命党人也很分散，革命缺乏一个统一的领导。军阀、官僚、政客、立宪党人乘机夺取革命果实，许多宣布独立省份的军政大权都落入他们的手中，政权由封建帝王转入地主、军阀、买办资产阶级的手里。孙中山先生十二月从海外回到上海，当选为临时大总统。而同盟会自根据宋教仁的提议改组为国民党后，军阀、官僚、买办、地主、土豪劣绅都参加进来，其中有不少人根本就反对孙先生的革命主张，甚至有的手上还沾满了革命烈士的鲜血。这些人加入国民党完全是一种政治投机，目的不外想钻进来升官发财，根本谈不上实现同盟会的革命思想，更谈不上采取各项革命措施了。这样，国民党就渐渐失去了他的革命性。当时有国民党中的极右派分子劝孙先生：“中国弱，不宜于过激地反对列强，中国

劣，也不宜于过激地反对资本家。”孙先生听了这些谬论很愤慨，在一次演说中驳斥他们说：“如果我不反对列强，我就不用这样辛苦革命了。”又感慨叹息说：“现在国民党人，多已丧失革命锐气，一味只知贪图富贵荣华，今后恐难有大作为。”这时候，袁世凯凭借他的地位和武力，已经做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进攻革命的新工具，并且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向革命发动了进攻。袁世凯一面指挥军队攻击革命军，另一面试探议和，甚至伪装他也同情革命。袁世凯的这种反革命的两手，对当时革命内部的许多人发生了很大的威胁和欺骗作用。甚至不少人被袁世凯所收买，成为他在革命内部的坐探和代理人。孙先生是十分反对和议的，他认为“革命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孙先生提到的所谓反对列强就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意思，平均地权就是削弱封建主义的基础，节制资本就是想避免使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这些爱国而又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当然不是当时国民党内外的封建买办分子所能接受的，而一些对帝国主义还存在敬畏心理和抱有幻想的分子，当然也不会真正赞成这些激进主张。封建、买办势力特意制造出一种“非袁莫属”的论调来打击孙先生；帝国主义者更以实际行动来支持袁世凯。在国民党内占优势的右派分子都一致主张把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而往日同盟会员中也出现了为袁世凯说话的人，汪精卫就是其中的一个。真正信仰孙先生的革命主张的，真正拥护他的领导的只有极少数的人，而且广大的人民群众又没有充分发动和组织起来。在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之下，孙先生在当选三个月之后就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表明他革命的目的决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的权位。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至此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互相勾结之下迅速落入窃国大盗袁世凯手中。

但是，孙先生以及忠实于他的革命理想的同志并没有向反革命势力屈服，而继续组织革命力量同袁世凯进行斗争。我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因胃病加重，遵照医生建议完全停止工作。

为了争取当时的议员反对袁世凯，仲愷奉孙先生之命来到北京做运动议员反袁的工作。可惜后来仲愷的活动都被袁世凯密探知道了，在他们预备捕人的黑名单上就写有廖仲愷的姓名。就在袁世凯发动对革命党人大搜捕的前夜，仲愷得到友人密告消息。虽然形势已经极为危急，他幸而能够只身离开北京去天津，平安回到广州。而当时与仲愷时相过从的议员伍汉池，则在这次大搜捕中被捕，惨遭杀害。一九二二年四月，胡汉民回广州复任广东都督，仲愷掌理财政，朱执信任核计院院长。这时候革命派只直接掌握了很少数的武装力量，以前一时投机依附革命的军阀都同袁世凯勾结起来，反戈进攻革命政权，广州革命政府就是在内无群众基础、外受军阀龙济光的威胁的形势下而垮台的。广州革命政府瓦解之后，我和仲愷分头仓卒离开广州去香港。英国当局视我们为政治犯，不许入境，限我们四十八小时离开。老牌的英帝国主义，一向就是这样敌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我们迫得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亡命日本，在东京千駄谷安下家来。

孙先生深知国民党人革命精神混然无存，反袁定难成就，痛心之余，决定到日本另行组织中华革命党，重新号召进行反袁工作。那时，我们已先在日本。孙先生积极革命，早已深为袁世凯所忌。袁世凯通过当时中国驻日大使馆，想组织暗杀团在孙先生抵达日本时加以暗害。幸得犬养毅、宫崎寅藏、头山满等告诉了我们的消息，除此之外，他们还临时组织了“刺客击退团”，及早进行防范。当天，犬养毅、头山满等亲自同我一起赶到火车站迎接孙先生，孙先

生安全下了火車。我們就在孫先生的直接領導下，在日本積極籌備反袁工作。

一九一四年中華革命黨成立，我和仲愷、鄧仲元、陳其美都參加了，仲愷兼任中華革命黨的財政部次長。黃興、汪精衛都始終沒有參加中華革命黨。宋教仁確實是稍後參加的。我記起來了，是孫先生示意叫他勸汪精衛做些工作，因此故意延緩一下。當時，我們居住在澀谷附近的青山七丁目，孫先生與孫夫人則住在青山四丁目。一九一五年參加中華革命黨的已有百餘人，黨內各項事務開展，又專門在青山六丁目設立了中華革命黨的事務所。在組織中華革命黨的時期，有幾個日本朋友也直接參加了一些中華革命黨的活動，從現在還保存在中國人民革命博物館的照片中，還可以看到那個時候經常和我們在一起的幾個日本朋友。

中日人民之間的友誼是深厚的。但是，日本帝國主義執政當局卻完全無視中日兩國人民友好和睦相處的善良願望，不斷侵略中國。當完全喪失民族氣節的、出賣國家權益的賣國政府與日本帝國主義當局簽訂二十一條喪權辱國條約的消息傳到日本東京的時候，我們都一致表示堅決反對。我過去一向在日本留學生中做宣傳聯絡的工作，這些年我自己雖然已經結束了留學生的生活，但是為了反對賣國政府和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我在東京的中國留學生集會上還演講過幾次。有一次當我激動地講到反對日本侵略中國的時候，我忍不住流下淚來，座中留學生蘇君，曾為此勸我不要太激烈，因為在日本居住，不宜過於激烈地反對日本政府。但是，我覺得我即使住在日本，也應該以祖國利益、民族大義為重，堅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

一九一六年一月，袁世凱僭稱皇帝，蔡鍔為首在雲南起義，宣

布反对袁世凱，要求袁世凱退出皇帝位，成立了护国軍，朱德同志也就是护国軍的一个少壮軍官。西南各省，紛紛响应。袁世凱皇帝沒有做成，六月死在“新华宮”。这时，我們都还在日本。孙先生本来希望推翻袁世凱之后，中国能够真正出現統一共和的局面，不料各省軍閥不听調度，各自勾結帝国主义势力，盘据一方，大好中国被軍閥割据，連年混战，人民生活十分痛苦。孙先生由于自己沒有軍事力量，不得不利用軍閥的軍隊，以保护民主主义的旧約法为名，进行革命斗爭，是以有护法之举。可是，这些軍閥官僚却利用孙先生的名义专去扩大自己的势力，发展到一定时期，又排斥孙先生。在这个期間，孙先生已經深深感到如果沒有比較进步的武装来支持革命力量，是沒有办法可以順利进行革命的。所以孙先生一面不断和軍閥进行斗爭，一面不断研究摸索中国革命在下一步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孙先生后来改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愿想，恰恰就是在他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和軍閥作斗爭当中，一次又一次地得以不断加深和巩固起来的。

袁世凱倒台了，可是革命依然沒有成功。段祺瑞企图操縱国会，依然繼續北洋軍閥統治的局面，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当中，根据美国、日本帝国主义的意旨，表示要对德宣战，实际上是将德国在中国的影响排出去，而代之以美国、日本的势力。为这样做，段祺瑞組成督軍团，后来終于引出张勳出台，演出了一幕复辟的丑剧。

当时，孙先生对是否对德宣战，是另有明确主张的。朱携信在广州就曾經根据孙先生的愿想，写了一本小册子，严格主张中立，說明世界大战参战双方，都是列強爭夺世界霸权，既无什么正义可言，又沒有中国必須参与一方的义务。这本小册子在当时是发生

了很大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孙先生再次提出了“护法”的口号，反对北洋军阀，因而再次回到上海主持工作。

孙先生深深觉得没有武装力量，不足以与北洋军阀对抗斗争，无由贯彻救国救民的宗旨。所以他几次与当时在上海的海军总长程璧光磋商，希望海军也参加护法的行列。仲愷协助孙先生运动北洋海军军官彭春源等南下护法，我则被分配做北洋海军的妇女家属工作。我在哈同路的寓所里接待一些海军家属，对她们讲解护法的必要，配合做些说服动员工作。七月中，孙先生亲率肇和、永丰两艘炮舰南下护法，我们也相随到了广州。孙先生在到达广州黄埔之时，曾在欢迎大会上说到“中国共和已有六年，国民未有享过些共和幸福，这不是共和这个制度不好，而是共和国的执政人，用假共和的面孔来行真专制之手段的原故。”自孙先生率海军南下，伍廷芳、章炳麟、唐绍仪等人和一些国会议员亦响应护法号召，到达广州。八月，到达广州的议员已差不多有一百多人。这虽然未滿议会法定人数，但在非常事变发生期间，可以开国会非常会议，通过军政府组织大纲，成立军政府。标榜护法、目的在打倒北洋军阀的军政府在广州成立了。军政府组织大纲明文规定，在临时约法的效力未完全恢复之前，中华民国的行政权，由军政府大元帅行之。又规定了军政府组织大纲，至临时约法的效力完全恢复，国会及大总统的职权完全行使时才宣告废止。九月，孙先生被选为大元帅并就任大元帅职。财政部长为唐绍仪，外交部长为伍廷芳，内务部长为孙洪伊，陆军部长为张开儒，海军部长为程璧光，交通部长为胡汉民。仲愷协助管理财政。

但是，在广州的议员们、部长们却未能洞察美日帝国主义的阴

謀，終于表示對德宣戰。唐紹儀毫無問題是親美親日的。這樣，對德宣戰的布告，是經過軍政府及非常國會決定後發出來的。這就形成非常奇怪的局麵：北洋軍閥對德宣戰，而反對北洋軍閥的廣州軍政府也對德宣戰。段祺瑞就利用對德宣戰的口實，預備趁機對護法各省用兵力解決。馮國璋為了扼制段祺瑞不使段的勢力再擴大，一度高唱和議。但是，孫先生為了維護共和體制的尊嚴，堅決表示除恢復國會和約法之外，無磋商余地。和議不成，又打起來。湖南、湖北都有激戰。孫先生在當時一度發表文告，堅決表示對北洋軍閥作戰到底。孫先生這回出兵，却是他自己軍政府內部勾通北洋軍閥的、頑惡成性的桂系軍閥陸榮廷等人所絕對不會贊成，或者是說絕不願意贊成的。當時陸榮廷、唐繼堯等人雖然在軍政府中被選為元帥，但他們始終不肯就職。他們雖然口頭反對段祺瑞，却奉馮國璋為大總統。他們本來就是因為個人要求不遂，才與段祺瑞對抗的，並非真心來參加護法，並非真心為打倒北洋軍閥而鬥爭。孫先生堅決與倪嗣沖、曹錕、吳佩孚、張敬堯等南犯的北洋軍閥一再對抗作戰，陸榮廷等都是很不滿的。

孫先生南下護法，組織軍政府，比較可靠的力量是海軍和國會中的一部分人。一九一七年廣東省長朱慶瀾想交二十營兵給陳炯明，以便將來編練改為護法北伐的武裝。那時廣東兵權操在桂系之手，桂系軍閥當然不希望軍政府除了擁有一些海軍之外，又有直屬的陸軍部隊，因而一再從中阻撓。最後幾經曲折，才勉強同意將二十營兵交與陳炯明。孫先生就以陳炯明為總司令，鄧仲元、許崇智為副司令，二十營兵全體奉命開赴福建。部隊內部有很多革命青年，如鄧演達、李章達等，士氣充沛，不久隊伍開到漳州。不過，這批軍隊一向受桂系軍閥歧視，餉械給養，均受桂系軍閥控制。仲

愷曾經幾次遵照孫先生的意思，多方設法籌款接濟他們。孫先生在上海的房子就因此由仲愷經手抵押過兩次，一次得款二萬元，一次得款二萬五千元，都由仲愷親自帶到漳州交給這批駐閩粵軍了。孫先生滿希望這批軍隊將來可以成為比較進步的革命武裝力量。可是，這批粵軍回粵以後，其中鄧仲元固然成為孫先生在軍事方面很得力的助手，而陳炯明却在一九二二年利用孫先生苦心幫助他建立起來的武裝力量，背叛了孫先生。

桂系軍閥在軍政府內部製造紛爭，當時還曾經一度集中在所謂省長問題之上，但這只是表面現象而已。當時，廣東人不滿任用桂系人物為省長，想叫胡漢民當省長。桂系軍閥又表面上叫當時的海軍總長程璧光做廣東省長及督軍，程起初也是不願就任的。程璧光是北洋政府閣員之中南下護法的唯一始終擁護軍政府的人。他後來被陸榮廷派凶手暗殺了，凶手是在程璧光乘艇橫過珠江、剛抵海珠對岸碼頭之時向他開槍的。程璧光死後，擁護軍政府的人，又少了一個。

由於孫先生的提倡號召，非常國會已着手準備制定憲法。當非常國會召集憲法會議起草的憲法稿已到第二讀將告完成之時，桂系軍閥與政學會的人恐怕有了憲法，與北方調和更無希望，因而陰謀運動與他們相接近的職員阻止憲法完成。陸榮廷與唐繼堯等，曾經屢次想犧牲護法以求議和，只是礙於軍政府在孫先生領導之下堅持護法，不得遂願。他們要想另行組織各省聯合來對抗軍政府，卻又苦無根據，於是變通作法，以非常國會改組軍政府，把元帥制改為總裁制。

一九一八年七月，軍政府改設總裁制，非常國會舉出孫先生及伍廷芳、唐紹儀、唐繼堯、陸榮廷、林葆懌、岑春煊等七人為總裁，以

岑春煊为主席。孙先生知道他们改组的宗旨，完全为了和北洋军阀妥协，不是为了护法，当然不肯参加。七总裁之间意见也各不相同，他们既不愿反对列强侵略，也不喜欢用国民党的人，连伍廷芳也在被排斥之列。孙先生的革命主张不能实行，立即放弃总裁职，再赴日本。

反袁护法二次革命的结果，中国仍然又落到军阀盘据的混乱局面。那时我们已先到日本，住在东京九段。我与朱执信得知孙先生抵日，曾同赴神户迎孙先生到东京。从“革命同盟”的时候起始终与孙先生忧患与共的廖仲愷、朱执信，至此仍然追随在孙先生的左右。这时候孙先生备受了几次惨痛教训，于是一转而着手宣传革命主张的工作，同时在最穷困的情况下接济在福建的革命部队，准备夺取一块适合地盘，再向北洋军阀进行斗争。

一九一九年孙先生又回上海，在环龙路四十四号建立事务所，从事《建国方略》的著作，创办《建设杂志》，继续作反对军阀的工作。我们亦回到上海。那时韩伯渠同志在环龙路四十四号事务所帮孙先生工作，我们时常见面。俄国十月革命成功，正如警钟一样，唤醒了世界上被压迫人民。孙先生感到利用军阀，终非长久之计，因而逐渐认识到“中国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下决心仿效苏联。那时孙先生与列宁之间，开始有函电来往，起草来往稿件的工作，多由孙夫人及廖仲愷、朱执信等帮忙。孙先生还想派人到苏联学习，特意叫仲愷、朱执信、李章达先学俄文，请了一位俄文教师每日到长浜路民厚里我们的寓所来教俄文。这时学习俄文变成很时髦的事了，甚至连陈璧君这样的人，也加进来一起学俄文。孙先生觉得那时中国正处在军阀各自割据的时期，要推行革命措施，

势必受到很大阻力；而进行革命，就非要根据地不可。那时北京是北洋军阀窝子，打不进去。上海是帝国主义的堡垒。武汉更是吴佩孚的地盘，等闲取不得。这样，唯一的理想根据地仍只能是军阀统治最薄弱的环节广州了。要取得广州，配合在福建的武装力量的反攻，就必须布置广州的内应工作。孙先生决定先派朱执信到广东去策动民军和农民起义，做反对桂系军阀的工作。可是，桂系军阀却在虎门布置了陷阱，以虎门要塞部队可能起义的假消息诱骗了朱执信，朱执信因此在虎门要塞附近被暗杀牺牲。朱执信的牺牲，是中国革命的一大损失，也是国民党左派的一大损失。如果他还健在，他很可能是坚决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孙先生在这期间又多次派仲愷到福建漳州驻军那里做动员联络的工作。一九二〇年冬，原驻漳州的邓仲元、陈炯明、许崇智等广东部队打到广东，收复了广州之后，不久孙先生和我们也回到广州去了。第二次收复广州，在北京的国会議員又南下集中到广州。广州成了革命根据地了。一九二一年，孙先生在广州经过国会一致通过，就任临时大总统职。陈炯明为陆军部长，邓仲元为参谋长，陈绍宽为海军部长，伍廷芳为外交部长，伍朝枢为外交部次长，唐绍仪为财政部长，廖仲愷为财政部次长，胡汉民为广东省长。同年，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又有很多人参加进来。

一九二一年桂系军阀残余陆荣廷等盘据广西反对革命，很多广东军队都出发广西，征讨桂系军阀。孙夫人和我集合广东妇女界組織“出征軍人慰劳会”，孙夫人任会长，我任总干事，会址设在总统府，办理慰劳讨桂军队事項。我并且和慰劳队工作人员一起到过广西，慰劳讨伐桂系军阀的部队。这就是中国妇女界为了慰劳义师第一次办起来的慰劳会組織。

一九二二年，孙先生决心彻底扫除軍閥势力，决意北伐。苏联已經先派馬林前来与孙先生联系，鮑罗廷也曾先来过广州一次，初步談判，略有进展，联俄計劃正預备逐步实行。但是，早有阴謀野心的陈炯明看到政府履行革命政策对他自身不利，更增加了他的叛心。虽然孙先生对他优容寬大，情感理喻，同志們对他解释劝告，希望他心回意轉，但是他总是不听，繼續密謀反革命，并和北洋軍閥有所勾搭。孙先生北伐的时候，參謀长邓仲元留守后方，仲愷管財政，筹措軍餉，不遺余力。陆炯明的人先下手为強，使人在广九車站暗杀了邓仲元。

在邓仲元被刺后不久，有一天邓仲元夫人来找我，他說：“陈炯明現在又想反对孙先生了，不要鬧出事来才好。”我說：“陈炯明不贊成孙先生的主张，这样下去，我也很担心。”邓仲元夫人即時对我透露：“我听说陈炯明不敢来参加邓仲元的追悼会，意思是怕孙先生会不利于他。”我立即表示：“孙先生不会这样的，我可带子女作人質，如果孙先生不利于他，可以由他杀我一家。”我还預备約邓仲元夫人一起去石龙，劝陈炯明回心轉意。岂料就在六月十四日，陈炯明給仲愷打来一封电报，假意說請仲愷去惠州領款，并說“有事相商”。仲愷也想見見陈炯明一并做些挽救工作，就在那天到惠州去，甫抵石龙，即被陈囚于石井兵工厂。陈炯明还說：“这一次就把‘孙大炮’的荷包給鎖住了。”陈炯明自以为这样就可以将邓仲元、廖仲愷两根“眼中釘”拔去，于是在两天之后（六月十六日）炮轰观音山总统府，公然背叛孙先生。

当晚，有人秘密来向孙先生报告，孙先生当时悲憤得竟欲以身殉职。一直延至十一时，孙先生左右的人見形勢实在危急，都力劝孙先生先行离开总统府。在孙先生的意思，本来想和孙夫人一同

离开。但是孙夫人以为孙先生责任重大，避难宜急，她若同行，不惟要慢些，还容易被认出，故仍请孙先生先行，勿以她为念。孙先生于是才离开总统府。午夜一时，火烧观音山，孙夫人在馬湘副官的护卫下，也冲出了总统府。当时从孙先生住宅到总统府，是要经过一个天桥的，那里有几千陈炯明的军队包围着，又放了火。驻在总统府的守军陈可钰、李章达部队已向陈炯明部队开火，孙夫人当时冲出来的危险情形，可想而知。她这种为顾全大局，不顾个人危险，勇于牺牲个人的精神，真令人感动。

我怕陈炯明加害于小孩子，先把梦醒、承志打发去香港。我一个人留在广州奔走，找孙先生和仲愷的下落。

我终于在陈炯明开会的地方找到陈炯明的部下，要他们让我去找孙先生孙夫人，他们推三阻四。我起先向他们取通行证，他们不答应。我就向他们说：“孙先生就任大总统的时候，你们不都是去庆贺过的吗？为什么现在又来反对他呢？”他们还是不答应。我接着又说：“你们应该追念孙先生是推翻清朝、手创中华民国的人。你们不都是由于孙先生倡导革命，以及黄花岗等各次战役烈士们流血牺牲，激发起全国同胞共图存亡，推倒清朝，成立了中华民国，才有中华民国的官做的吗？你们今天饮水思源，不应该这样对待孙先生。”他们仍然不答应。我看提起孙先生说不动他们，便又换了一种理由和他们说：“你们纵不让我去找孙先生，也必须让我去找孙夫人才行。你们应该还记得，孙夫人是我们慰劳会的会长，当去年你们讨伐莫荣新、沈鸿英等的时候，她不是和我发起出征军人慰劳会，募了十几万款慰劳你们吗？你们总该容我去找她呀！”他们还不答应，并以危险来吓我。我说我不怕。后来，洪兆麟来说：“你这样忠心”，就派给我两个卫兵（其实是监视我），叶举又

藉我車子，另一个軍官楊某又派一个副官帶口令跟我一起去，这样我們才出来。这些人，我都慰勞过他們的，他們对我尚有好感。

我們一行出发，但是沿途实在太危險了，派来的卫兵曾經对我說：“停車吧，那边又开枪、开炮了。”我說：“如果你怕危險，就請你回去吧，我是不需要人来警卫的。”他們当然不敢回去。我們又繼續到处找，直到后来司机看实在太危險了，就停下来。

我們在树蔭之下，停了两个鐘头。卫兵問我口渴不渴？我說有点口渴，他就去拍老百姓的門，要去取茶。我立即对他說：“这样搶老百姓的茶，搶来我也不吃的，要人家情感給我，我才能吃。”卫兵后来就拿出两分錢銅币，給那家老百姓，叫老百姓泡一壺茶来喝，并亲手递了一杯給我。所以兵是好的。

这天找不到，要第二天再找，我回家之前，告訴那个副官，請他給我口令，我好帶了口令第二天再找。最后才打听到孙夫人在她同学的家里暫住，我在岭南大学一所小房子里找到他，孙夫人在途中小产了。我們談到陈炯明这次叛变，都很伤心。

后来知道孙先生在永丰觀，我馬上去找他。因为天热，孙先生已經晒得很黑了。孙先生在船上住了这几天，也很辛苦。孙先生問起外边情形怎么样？我說：“我已找到孙夫人。仲愷則被陈炯明扣留，不明生死。現在人人都跑了，只剩下我一个了。”孙先生也很痛心。我見孙先生的衣服被汗污了，也沒有替換的，回来之后，想到古勤勤身材与孙先生相同，就去古家找古太太（古本人亦已离开），借一件古勤勤的衣服，送去給孙先生。我这样先后来往送信息送衣物与孙先生，共去永丰觀上三次，每次都是以大义責屬守卫的士兵，他們才让我通过的。士兵們对我也是很好的。

在仲愷被囚后的第十天，我找到陈炯明部下一个軍官熊略，說

动了他，他借给我电汽船到兵工厂去看仲愷。我到了兵工厂，戒备极为森严，在一个楼上，我见到了仲愷，但是被禁止说话。他身上被三道铁链锁起来——手上一道，腰间一道，脚上一道，都系着很长的铁链子，锁在一张铁床上。我走到他近前一看，才知道他身上还是十天前冒雨到石龙去的时候穿的夹衣，已经汗污得不成样子了。他住的房间又是朝西的，天那么热，再穿下去怎么得了？可是他全身锁着，脱也没有法子脱。我第二次去见他，带了一件衣服给他，也只好用剪刀把脏衣服从背后替他剪下来，才换上另一件衣服。我后来又打电话给陈炯明部下的熊略、钟寿南等人，要他们设法替仲愷开锁。过了几天，他们得到叶举的允许，才替仲愷开了锁。

我在这一段日子四处奔走，真是心力交瘁，适巧又患痢疾，医生说要天天打针，迫得进医院医治，和伍廷芳同一个医院。火烧观音山之时，外交部长伍廷芳也住在总统府，他因晚上火警，惊慌过度，病在医院。伍廷芳死，我也是亲见的。

就在这个时候，陈炯明的同宗兄弟陈达生在香港被人暗杀。据说布置行刺的人透露出口风，说是因为陈炯明囚禁了仲愷，所以一定要杀陈炯明的人云云。陈炯明和他的部下因此决定再过几天就要枪毙仲愷。我本来正在医院治疗痢疾，但一听到传闻陈炯明想加害于仲愷的消息，我也顾不得等病好，又再出来奔跑。

那时我拖着痢疾的病体，天天要去医院看病，又天天要出外奔跑，精神、肉体均痛苦不堪。这两个月，我是很痛苦的，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我不尽力做，谁去做呢？就是苦也没有法子，一定要去做的。

我第三次去看仲愷的时候，陈炯明要杀害他的这个消息，仲愷本人也知道了，他作了一首诀别的诗给我。那首诗是这样的：

后事凭君独任劳， 莫教辜負女中豪，
我身虽去灵明在， 胜似屠門握杀刀。

又：

生无足羨死奚悲， 宇宙循环活杀机，
四十五年尘劫苦， 好从解脱悟前非。

还有一首是給孩子們的：《訣醒女、承儿》

女勿悲，儿勿啼，阿爹去矣不言归。欲要阿爹喜，阿女、阿儿惜身体！欲要阿爹乐，阿女、阿儿勤苦学。阿爹苦乐与前同，只欠从前一躯壳，躯壳本是臭皮囊，百岁会当委沟壑。人生最重是精神，精神日新德日新。尚有一言須記取：留汝哀思事母亲。

我这次去看他，有五个卫兵看守，不許我近前与他談話，并用枪拦住我。我与仲愷相隔一两丈，但見他示意有一张紙要遞給我，我要去拿，被卫兵用枪拦住。我气极要用手去搶那支枪，并且大声說：“你們放枪吧！放枪吧！我是不怕的。”他們被我吓住了，就松了手。我馬上赶紧去伸手把詩接过来。卫兵也許是看到我那个样子，有点良心发现，也說不定。所以我說兵是好的。

也就在这个我为孙先生和仲愷到处奔跑的时候，一天夜里，一个陈炯明手下頗为得力的师长洪兆麟来对我說：“现在永丰艦天天向我們打炮。我們知道你几次来往永丰艦都沒有事，是否你肯再去永丰艦一次，我們派两三个人跟你去，叫孙先生今天晚上不要打炮。如果你都能做得到，我們明天就放廖仲愷。”本来放仲愷是好的，但派两三个人跟我去永丰艦，假如他們加害孙先生，又怎么办呢？我不能为了仲愷而加害孙先生。我就对他說：“你們叫我这样，我会对不住人民，对不住孙先生的。我是不会离开广州的，你

們想什麼時候派人來抓我，我也不怕。”我明白那時我已經是半俘虜了。但我看陳炯明也不敢真的來抓我。如果他真的抓我，我大不了拼卻一死，他反而成全了我的志願；而他自己叛徒的臭名，却一定傳揚得更遠，所以我是怕的。洪兆麟很掃興地走了。

當時，據說陳璧君、伍朝樞、古勤勤等人在香港，預備籌措收買綠林人物去劫獄。起初，托人帶密信來給我，我不贊成。因我去探視仲愷三次，見警衛森嚴，重重把守，足有一營兵力，仲愷個子矮小，眉毛有痣，人家很容易臥出來，藏在哪裏呢？他們叫朱執信夫人來和我談，我也照樣向她解釋，拒絕了。

後來陳璧君自動自香港回到廣州，住在廣州市沙面維多利亞酒店（解放後改名為勝利大廈）。她叫朱執信夫人來告訴我：“我們已經決定今晚劫獄，不管你贊成不贊成，我們也決定這樣做；現在留在廣州的只有你一個人，事成之後，怕陳炯明再危害於你，所以盼你今日到旅館來談談，商量一切。”我就去了。我還是堅持我的主張，極力反對劫獄。

當天我就留在这个旅館。這是一間專門租給外國人居住的旅館，我們住進去都是很秘密的。來往維多利亞旅館的人多是海員，海員對我和仲愷都很好。在旅館我看到報紙登載以前鄧仲元的部下梁鴻楷第一師發生兵變，有一部分人加進了陳炯明派。我看了報，嘆氣說：“糟糕，北伐軍要失敗了。”我本來是希望北伐軍勝利，孫先生就可以得救的。但陳璧君卻說：“北伐軍一定不會失敗。”我說：“現在會失敗的。”她跳起來說：“你想北伐軍失敗，仲愷可以由來罷了。”我說：“我怎樣苦心，也不會希望孫先生死而仲愷能夠出來呀。”我真氣極了，一巴掌打到她臉上。陳璧君胆小，但是為人狡狡。她也不氣，也不吵，却連聲陪不是。過了兩三個鐘頭，她就跑

回香港去了，我也不留她。我早知道她靠不住的。我想不如回家吧，但又怕陈璧君把我的踪迹说与外人知道，当晚就先不敢外出，仍然留在旅馆里。

当天晚上，叩门声响了。我警惕地去开门，一看进门的是一个日本人，我竟一下子认不出是谁，心里十分诧异。只听见那个人开口说：“我就是日本山田良政之弟山田纯三郎，我是化了装来见你的。你现在也很危急，如果你想离开广州，我们日本朋友有船就在这里珠江附近，我可以帮助你找船去香港。”我答他：“现在孙先生还在永丰舰，仲愷又被囚禁，我除非等到他们都安全脱险之后，我是不离开广州的。我一个人留在这里，还可以替孙先生送信送衣物，我现在其实已经是个半俘虏了。在孙先生和仲愷还是生死未定的时候，我是决心不离开广州的。”谈到孙先生和仲愷的情形，我伤心流泪，山田纯三郎也流下泪来。日本朋友在危难当中对我们这样真诚相助，对比军阀陈炯明对孙先生忘恩负义、以怨报德的行为，真使我感慨万分。

所谓劫狱也是假的，这已经在我意料之中了。第二天，我就回家去。

对待在危难中的孙先生和仲愷，三种人有三种不同的态度。生活常常就在这样的关键问题上严峻地考验了每一个人。

在军舰上被困五十多天之后，孙先生因为北伐军南下的计划由于梁鸿楷所属部队投降陈炯明而归于失败，永丰舰孤立作战已无意义，所以他就回到上海去了。

八月里，有一个以前在日本留学的龙荣轩来看我。他从小在日本认识我们，他在日本学军事，当过武官。他说：“明天陈炯明总司令在白云山开会，我要去参加，廖先生现在怎么样呀？”我说：“我

只听说要枪毙，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他说：“我明天见陈炯明，去给他说说吧！”我说：“说也无效，倒不如你去的时候，我坐你的汽车一起去吧！”这本来是犯法的，但他也答应了。

八月十八日，我去白云山是乘龙荣轩的汽车去的。到了山下，天色阴沉沉地，也叫不到轿子，我就走上山去。正走在山道上，忽然天下起大雨来，我又没有带雨伞，淋着雨爬山，心里更是着急，不意一脚不穩，滑到山沟里，弄得满身是黄泥，头发衣服全湿得不成样子。正巧碰着洪兆麟上山开军事会议，他就领了我上去。

这时陈炯明正在开军事会议，军官很多，桌上还摆了茶点。我站在门口没有进去，陈炯明拿了一张藤椅给我坐，递了一杯白兰地酒给我喝，并说：“廖夫人，你身湿了，喝点酒吧，不然要受寒。”我喝了酒，但还不进去。后来陈第三次来见我，说：“叶举有家眷在此，你换一件干衣服吧。”我说：“雨湿有什么要紧，我今天来，还打算血湿呢。我问你，仲愷有什么对你不起？你们说仲愷帮孙先生筹款，要把孙先生的荷包锁起来，就囚禁了仲愷。但仲愷何尝不在民国九年之时帮助你们呢？你们在漳州两年多，把孙先生在上海真和璞路的房子抵押了三次来帮助你的不也是仲愷吗？难道只有帮助你才难，帮助孙先生就不对了吗？同一样都要帮助，帮助孙先生更要紧，我们没有对你不起。这些远的事不说，就拿眼前的一件事来说吧，不久以前，邓仲元夫人到我家里来说：为仲元开追悼会，想请你到广州参加，怕孙先生会不利于你，问我的意见。我听了她的话，我就大拍胸脯地对她说：‘我相信孙先生绝不会对他不利的，你尽管请他出来好了，我可以带子女到惠州去作人质，来担保他的安全。’这件事你可以打电话问问邓仲元夫人的。我今天来，我也不打算回家，你把我砍成肉酱我也不怕。仲愷是系是就，你今天一

定要回答我。雨湿有什么要紧？”

陈炯明就拿了一封电报给我看，表明“这都是部下做出来的，详情我不知道”。他又假意写了一个条子叫我和龙荣轩去兵工厂，把仲愷押到白云山。

我拿起条子看了一眼，觉得他是意在敷衍我，并无即刻释放仲愷的意思，我把条子掷还他。我就又厉声地对他們說：“我今天来，是沒有打算回去的。人死有重于泰山，有輕于鴻毛，你們就把我斬成肉酱，我也不怕。今天我死虽然輕于鴻毛，但我相信将来会有价值的。对于廖先生，我也不一定要你們放他，但是，我一定要你們今天給我一个决断的答复，就是放他或者杀他。”边上的人都說我脾气太大，然而我那个时候的心情，的确又是激憤又是悲伤，也实在忍不住了。

在这时候，陈炯明一个部下馬玉航走来劝我說：“把廖先生放到白云山来就是放他的了，你为何对总司令还发这么大的脾气？”我就对他說：“这是明放暗杀，要放他就让他跟我回家去，要杀他就留他在白云山上。”他把我的話对陈炯明說了，陈又来問我的意思要怎样办，我就直截了当和他說：“你作事要磊磊落落，要杀仲愷就隨你的便，要放他就叫他和我一同回家，不要解到白云山来，摆上白云山是明放暗杀。”陈炯明也自知理屈，而且他觉得那时孙中山先生已离广东，原在韶关的北伐軍亦已离开粵北，革命势力对他的威胁已經暂时解除；他又觉得以前留駐漳州的那批粵軍干部对仲愷还有好感，也不敢遽尔杀害仲愷。躊躇再四之后，便下令释放了仲愷，并派龙荣轩、繆培南两人送廖仲愷回家。龙、繆二人便陪我到兵工厂接仲愷。

仲愷回家时天色已經很晚了。我們談起这次事件，我的主张

是立刻离开广州，因我觉得今天陈炯明之所以这样放仲愷回家，只是一时良心冲动，明天又不知会不会变卦了。但仲愷还是愿意留下，总说要处理执信学校的事（因传闻执信学校有女生在陈炯明火烧观音山之时，被兵强奸）。我对他说：“只要留有生命，回来可以再办学校的。”争论之后，我们就在半夜三时乘船离广州到香港，然后由香港再转到上海去。那时孙先生早已抵达上海了。果然，在我们离开广州后，第二天早上十时，陈炯明又派军队来我们家里重新逮捕仲愷。可见那夜立即离开的主意，是没有错的。

这次仲愷被囚，虽能幸免于死，也不过多活了三年零两个月，但是总算多做了一件事，即多做了帮助孙先生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联俄、确定三大政策这一件大事，多一个贡献，也是好的。

孙先生脱险到达上海之后，更坚定了他联俄的决心，更坚定了他反帝反封建的志向。快到九月重阳的时候，苏联派来的代表越飞已经来到中国，正要开始与孙先生谈判，就被上海英租界特务跟踪，只好改去日本。适巧孙先生因事需要留在上海，只得改派仲愷到日本与越飞接谈。仲愷的哥哥是北洋政府派往日本的公使，我们虽然利用了公使馆的有利条件来掩护，可是和越飞的谈判还是被日本东京的“特高课”发觉了，又只好各找借口到热海温泉会合。越飞先以治疗足疾为名，先行到达热海，那时我因奔父丧已由日本回香港，梦醒身体较弱，仲愷便借口携带女儿梦醒养病，也来到热海。仲愷与越飞就这样在热海共同研究中苏联合、反抗帝国主义的初步意见，为后来发表的《孙文、越飞宣言》先行研究了细节，做好技术性的准备工作，准备了双方交换意见的基础。为了保证苏联代表的绝对安全，为了谈判进行顺利成功，我们在日本的行动极端秘密，连很熟的日本朋友也避开没有会面。历史上第一次正式

的中苏友好会谈，就是这样曲折艰险地穿插着与英、日帝国主义走狗特务的斗争而进行的。

但是实现这些理想，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孙先生直接掌握下的武装力量又非常微弱，一九二二年底，孙先生只好利用广西、云南的军阀刘震寰、杨希閔的军队打败了陈炯明，我们才算又回到了广州。一九二三年，孙先生抵达广州，开始商谈改组国民党。

当孙先生一提出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主张时，马上遭到那些早在同盟会时期就想把中国引上资产阶级民主道路的胡汉民、胡毅生、邹鲁、居正之类以及稍后参加进来而又抱有同样类型思想的冯自由、张继、邓泽如等各式各样右派人物的激烈反对。因为冯自由反对改组，我亲耳听见孙先生驳他：“你们怕共产党，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呀？”孙先生又说：“你们不赞成改组，那就解散国民党，我个人可以加入共产党。”张继反对改组最为激烈，孙先生当时甚至想开除张继的党籍。有一天晚上开会，张继无理取闹，孙先生叫卫士长马湘把张继带出会场，软禁了一晚。在正式公布改组的时候，邓泽如和林直勉二人联名上书孙先生，极力对改组表示不满。孙先生以为邓、林二人仅是思想糊涂，所以在信头上——批示解释，希望能使他们明白。但是邓、林二人是另有意图的。他们非但不听孙先生的解释，反而趁国民党海外代表齐集广州开会的机会，发起所谓“组党一会，为救党准备”，甚至连章程也指定由邓泽如、谢良牧、林直勉等人起草。在章程已经写好，他们那个组织也将要成立的时候，有人把这件事报告孙先生，孙先生立即命令邓泽如召集海外代表到他家里，严加责备。这件事才停止进行。不过右派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们决定在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中争夺代表席位，希望把持大会。当时右派

之中，运动爭夺代表席位的，除了邓泽如、林直勉等人外，还有古融勤也在其他方面秘密进行。他们双方还彼此照应，认为“殊途同归，将来必要之时，可以互相联络”。当时中共办的刊物《响导》很受欢迎，宣传力量很大。右派也预备办一种报纸来宣传他们的主张，以示和中共所办的《响导》相对抗。他们预备在必须与共产党决裂之时，就利用这个报纸来攻击共产党，攻击国民党革命派，这个报纸就是后来在孙先生死后出版的、经常刊登反苏反共言论的《国民新闻》。

当时公开反对孙先生改组国民党的固然大有人在，但也有些表面随和而实际对孙先生抱阳奉阴违态度的人，比如邹鲁、胡汉民、许崇智、吴铁城、伍朝枢等人。他们本来也是不赞成改组国民党，不赞成三大政策的，但是他们在当时革命形势节节向前推进的情况下，只有在暗中反对，消极怠工，却不敢公开说反对的话。这批右派当时虽然还不敢明目张胆地进行公开活动，但他们的罪恶阴谋，却在孙先生逝世以后，在企图推倒廖仲恺的右派反革命大联合的多次集会中，全部暴露无遗，全部明朗化了。

斗争激烈尖锐地展开了。孙先生和他领导下的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一方面和公开反对他们的国民党中最反动的一派，一方面又和只在暗中反对他们的国民党新右派不断斗争，排除万难，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

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孙先生的支持下召开了。会上发表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正式决定改组中国国民党，将总理制改为委员制，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这些革命措施，仲恺和我都极赞同。仲恺并且自始至终积

极参加了筹备策划工作。国民党改组之后，仲愷被选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农工部长。

黄埔军校创立，仲愷任党代表。为了办好黄埔军校，仲愷也不断和当时把持广东财政的军阀杨希閔等作斗争。他常常夜里要到杨希閔吸食鸦片烟的烟床旁边去等杨希閔签字，然后才能领到款来，送去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几百学生的学费、宿费、伙食费，甚至连服装费、书籍文具费用，都是政府供给，而这些钱就是这样子辛苦筹来的。孙先生和仲愷之所这样苦心孤诣地创办黄埔，就是深知军阀终不可靠，一定要成立一支进步的、与民众相结合的革命武装力量，才足以反抗帝国主义，并最后消灭封建军阀的反动武装。这就是为什么军阀杨希閔把持了广东财政，始终百般阻梗一切革命措施，特别是对筹措黄埔军校的经费处处留难；同时也是为什么孙先生和仲愷无论在怎样艰难困苦的情形下，也坚持一定要把黄埔军校办下去的原因。

当时在广东或到过广东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有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李大剑、彭湃、苏兆征、杨匏安、周恩来、董必武、蔡畅、邓颖超、林伯渠、李富春、吴玉章、聂荣臻、萧楚女、熊雄、熊锐、谭代英、邓中夏、杨殷、刘尔崧、阮啸仙等，仲愷始终和他们真诚合作。谭平山当时也是中共的负责人之一，他和仲愷关系是很密切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对开展农工部的工作，是给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的。

我当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兼管广东妇运工作。在孙先生领导下，又得蔡畅同志、邓颖超同志协助，妇女部出版《妇女之声》月刊，举办妇女运动讲习所，筹款设立女工学校、贫民医院等文教福利事业，开展妇女群众运动，加强反帝反封建宣传，联络争取有志革命的青年女学生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与法西斯派的妇

女組織展开斗争。

当时广大的工农群众和革命分子都齐心一意的投身到革命风暴中来。广东到处都洋溢着蓬勃的革命气息。但是在国民党中，也有一些企图在孙先生已经改组国民党，已经公布实行三大政策之后，仍然想把中国革命扭向右转的人。戴季陶就是这类人中的典型。汪精卫当时是自行标榜为“左派”的，但那是假左派。所以没有多久，他就公开坏了。

戴季陶本来在日本参加同盟会活动的时候，曾经接受过当时流行于日本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他在《民报》上发表的文章，本来与朱执信、廖仲愷同时，同是属于介绍传播早期社会主义思想那一类型的。他曾经加入过共产党，后来变节退出了。他也不赞成改组国民党。本来当戴季陶背叛共产党的时候，他曾向孙先生提出过改组国民党的事，但他所以提出这个主张，有他个人的野心和目的，纯然不是为国家为人民着想。孙先生看穿了这一点，当时就没有答应他。一九二三年要决定改组国民党的时候，戴季陶不忘前事，别有用心，对改组国民党极力反对，百般中伤，态度恶劣，至为无耻。在改组的初期，戴季陶迟迟不肯前来广州，一直蹲在上海。他还竟然提出“为什么以前说要改组国民党，孙先生不肯采纳，而现在要联俄、联共才实行改组国民党呢？”这样荒谬绝伦的问题。他在上海还写了一封信给仲愷，特别提到联合共产党的事。他在信中写道：“叫共产党参加起来，只能把他们作为酱油或醋，不能作为正菜。”就因为戴季陶早有这样的思想，所以在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以后，北伐那一年，我们到了庐山，戴季陶还和我说过这样的话：“你看外面正下大雪，国民党要亡了，大雪正象给国民党戴孝。蒋先生待我这样好，我只好殉友了。”虽然我当即以“为什么要殉友

呀？我要就殉国，不能殉友”这样的话来警告他，他还是不知改过。戴季陶就这样在以后一直到他死之日，还跟着蒋介石走背叛人民、背叛革命的道路。

在国民党改组完成之后，孙先生为明晰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曾先后对党员发表多次演讲，反复阐述唤起民众的必要，指出中国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我也按时每天前去听讲。

孙先生在百忙之中，亲自来抓党员的思想建设工作，就是希望党内全体同志都有正确的革命思想目标，希望党内的右派人物会认识错误，回心转意，赞成三大政策。很多同志都在这个时期接受了孙先生的教导，如柳亚子、彭泽民等，后来成为国民党左派的骨干。可是头脑顽固、思想反骨透顶的右派人物，虽经孙先生反复理喻，却转变不多，或则表面随和，实际阳奉阴违，甚至有的死硬反对到底，终于变成革命事业的敌人。

国民党改组完成，广州革命政府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立即迅速展开。由截留关税余款，抗议英帝国主义派遣炮舰进行威胁，直到消灭了帝国主义直接支持下的商团武装，经过了一系列斗争，广州革命政府的影响日益扩大了。

一九二四年冬，孙先生北上，以“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向朝野上下宣传。他绕道经过日本、天津，然后抵达北京。

北洋军阀政府深怕孙先生一系列的宣传活动，会恼怒了东交民巷的“洋大人”，得罪了帝国主义，所以都认为孙先生过激。

孙先生在广州尚未北上之前，就不很健康。在不利于航行的冬天，又经过日本、天津，然后到达北京，身体更觉不支。到了十二月，他的病已经很重，医生都劝告他，假如再不摒除一切，切实休息，怕是很难治的。可是，孙先生是巴望我们中国人民快快得到

解放、革命早早达到成功的人，怎么能够片刻把他的工作放开呢？于是他的病只有一天天的沉重下去了。

我记得是一九二五年一月三日那天，仲愷对我说：“孙先生的病恐怕难治了，孙夫人很忙，我现在因党务、政事、军需又都不得脱身，第一次东征的军事行动，都要我亲自参与策划，不如你到北京去帮忙一下吧。”我对于孙先生的病本也着急得很，仲愷这么一说，我就匆匆整装于四日北上了。到了上海，又接着电报，说是医生认为孙先生的病已经十分严重了。我到达北京，即住进铁狮子胡同，先到那里侍病的，已有几十人。

北洋军阀段祺瑞那时正在北京，我们从广东来的这一些人到了北京，都是由他们接待的。一方面对我们接待得很好，多方联络，希望我们同情他的“不要过激地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另一方面又先派许世英见过孙先生，劝孙先生说话要和平一些，不要太过激烈，免得引起“列强交涉”。孙先生听了很气愤地说：“假如不倒帝国主义，我就不革命了。”

那时孙先生的病更沉重了。我看孙夫人日夜地侍病，从没有正常睡过，真使我感动。

我初到北京的时候，孙先生尚在协和医院里医治，孙夫人也是住院陪伴着的，因为病总不见起色，后来张静江、李石曾等主张请中医诊治，大约在一月二十日左右便迁回铁狮子胡同。可是服了中药，也并无多大效果。

当时大家因为孙先生病得很沉重，整日环侍左右，时时商谈医治的办法，大家都很巴望孙先生能够多活几年，继续领导我们建设这个他亲手所建立的国家。

不过那时候孙先生的病总是一天天加重，服用药物很少有效。

大家眼看着孙先生的病势，想念着革命的前途，人人心里都感觉惶急，生怕他的病万一治不好了，将来怎么办呢？因此，迫不得已才和孙先生婉言请示以后的事。他本是学医的人，也知道自己的病势厉害，他点头答应了。记得是一月二十二日，我们和孙先生谈立遗嘱的事，到二十四日，遗嘱已经全写好了。预备的遗嘱共有三个，一个是国民党开会常念的那个，由孙先生口说，汪精卫在旁笔记的；还有一个是写给苏联政府的，由孙先生用英文说出，由鲍罗廷、陈友仁、宋子文、孙科笔记的。

本来孙先生口述的遗嘱是：“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汪精卫因知道许世英曾经来说过不要得罪列强，就改为“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样写好之后，张耀、邵元冲、胡汉民等还是反对，甚至连汪精卫和陈友仁所改写的比较模糊的语调，也认为“过左”，所以对汪、陈二人也不满。

这三个遗嘱，在一月二十四日都已写好，本来当天下午孙先生就要签字，但是将要签字的时候，孙先生听见孙夫人在隔壁房间很伤心，他为了安慰孙夫人和周围一同伤心难过的人们，便表示暂不签字。那时我们也就安慰孙先生说：“你是一下不会离开我们的！”可是，孙先生因为立遗嘱伤感得很厉害，当夜就睡不着，病又加重了许多。

后来，大家怕添了孙先生的病，再也没人敢提这件事了，只是每天每夜想法子怎样可以医治好孙先生的病。而他的病状，也有时好，有时坏，没有根本好转。

记得是三月十一日早晨八点钟，我到孙先生的房间去看他，一見他的情形，我心理就很难过，原来孙先生的眼睛已开始散光了。我就赶紧出来，对汪精卫说：“孙先生的眼睛已开始散光了。”并叫汪

精卫拿遗嘱去签。陈璧君听见了，十分不满。她还骂我：“还说签？就是因为汪先生写了遗嘱，人人都骂汪先生，现在又叫汪先生叫他签遗嘱，将来不是别人更骂汪先生吗？”我只得又对朱子文、朱鹤龄他们说，他们赶忙入内细看，也都觉得应该签了。于是大家一起走到孙先生床前，请孙先生在遗嘱上签字。在动手签字时，孙夫人流泪如雨，大家也不禁哭起来。那时正是中午快要吃午饭的时候。

为什么我那天那么着急呢？因为孙先生联俄、联共的政策，即使在孙先生未死之时，也有很多人公开反对，假若再不签了致苏联的遗嘱，以后国民党右派的人一定会更明目张胆来反对了。

三月十一日的下午，孙先生情形更不对了，他说话的能力渐渐退减。但他看着我们，还很感慨地说：“我死了，四面都是敌人，你们是很危险的，希望你们不要为敌软化。”汪精卫答他：“要怕敌人，我就不革命了。”汪精卫后来投降帝国主义，就是恰恰为敌人软化了。孙先生这一段话专门对汪精卫说，可见不是偶然的。

后来孙先生又喊我：“廖仲愷夫人……”，喊了两声，便咽喉舌僵，不能作声，但又象还要说什么。本来在平时，孙先生都是用日本话喊我“巴桑的”（“巴桑”是日本话，即老太婆的意思，是日本人呼叫年纪稍大的女服务员时用的），当时我一听到他那样郑重地沉痛地叫我“廖仲愷夫人”，我就很伤心地掩泪和孙夫人一起走到孙先生的床前说：“我虽然没有什么能力，但先生改组国民党的苦心，我是知道，此后我誓必拥护孙先生改组国民党的精神。孙先生的一切主张，我也誓必遵守的。至于孙夫人，我也当然尽我的力量来爱护。”当时孙先生一听我的话，就潸然握住我的手说：“廖仲愷夫人，我感谢你……”，他握住我的手，有十分钟才放开。弥留的时候，孙先生又支撑着精神挣扎地喊出“和平……奋斗……救中国”。

在第二天早晨九点十分，这位革命领袖，便永远离开我们而长逝了。这里我还要追记的是：孙先生当时对于他的遗体和葬仪，他也明白吩咐过。关于遗体，他叫送给协和医院作医学解剖研究。至于葬仪和棺材式样等等，他也吩咐都仿照苏联的殓葬办法，也要任民众瞻仰遗容。孙先生灵柩移到善云寺那天，民众参加的，多至二三十万人。

由于广大群众对孙先生不幸逝世的沉痛哀悼，我有一个预感，我觉得民众已经跟着我们起来了，中国革命一定会成功的。

自孙先生逝世以后，经过殓葬、移灵，丧事算是大定，我们准备动身南下时，光阴已过了一个多月。我陪着孙夫人先到南京勘察一下墓地，然后再去上海。当我们南下到浦口时，南京的同志约有一二百人结队到江边迎接我们，里边青年同志占多数，也有不少女同志。

后来南京举行孙先生的追悼会，我和孙夫人、孙科又都去参加。追悼会会场在秀山公园（后来改名为“中山公园”），是南京学生联合会和我们的同志主办的，规模很大，追悼刊物和其他宣传品很多，凡到会的都分发一份。会场内的挽联、标语，触目皆是。当我们进会场时，南京的大学、中学、小学的学生们，也正一队一队的来祭。记得那天午后，正下着大雨，我以为到会人数不会太多，岂知出我意外，到会的人多得很。我那天穿着布鞋，踏着泥水，被引进会场，那里已挤得满满的，站了几百青年男女。

轮到我登台讲演的时候，我说的广东官话，许多人听不懂，会场的主席又用国语替我扼要地翻译一遍。我说完之后走下讲台，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慰，我发现我们革命的思想，在南京很多青年男女的心里生根滋长了。

参加南京追悼大会之后，回到上海停留了不多几天，我便回到广州。我一踏到广州的地面，觉得气氛比我离开的时候不同得多了。在到处张贴的标语里，在市民的眉宇间，在黄埔学生和士兵的气概上，处处都可以看得出我们革命的精神又发扬光大了。可是到家里见了仲愷，他在这几个月里又憔悴多了。自从孙先生逝世，仲愷更领导着同志群众，加倍努力工作，弄得眠食失常，真可以说是拼着命干。我一方面对于当时蓬蓬勃勃的气象高兴，另一方面又为仲愷的健康担心了。

一九二五年六月初旬广州革命政府决定以迅速行动，解决了云南广西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反动武装。六月二十三日，继上海五卅惨案之后，广州沙基惨案爆发。接着爆发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广州的革命气氛更高涨了。

当时仲愷与国民党右派之间的激烈斗争，已经面对面地展开。如果说，在孙先生未死之前，国民党右派的矛头，是指向坚持改组国民党、坚决执行三大政策的孙中山先生的话，那么，在孙中山先生死后，右派的矛头，就转而指向遵照孙先生的遗志、贯彻孙先生主张的廖仲愷等人的身上。

七月初，右派在胡汉民家里开会。参加的人有孙科、邹鲁、伍朝枢、邓泽如、傅秉常、吴铁城、林直勉、胡毅生、林拯民、余和涛等人。在这次会议上，右派集中攻击仲愷。他们污蔑仲愷“被人利用，祸害国民党”，又说“仲愷挑拨各方恶感”，又说“为防止仲愷为共产党利用，一定要把持全国代表大会，一定要在大会中做一些工夫”。所以他们运动把他们那一派的人选入执行委员会做秘书长，把持会务，并且制造口实，诬蔑海陆丰共产党“刑人掠产”，广事宣传。同时还决定向苏联代表鲍罗廷表明态度，甚至还具体指定专人去和

鮑羅廷代表談。他們為着更便於實現他們的野心，對於把總理制改為委員制一點，也是不贊成的。孫科也參加這些會議。不過孫科卻說了這樣的話：“倒廖仲愷的台是要的，但是萬萬不能採用暗殺手段。”由此可見當時這些會議討論的是什麼內容了。當時仲愷正是各種工作都又參加，自然成為右派的眾矢之的。右派密謀反對廖仲愷的會議，接連開了十一次之多，每隔數日即開一次，參加的都是這十幾個人，商量的事，大多與第一次集會時所談者相同。

右派除了開秘密會議，陰謀傷害仲愷，阻撓革命事業之外，還經營了一間類似俱樂部性質的“文華”，專門做聚會的地方，大事聚賭吃喝的勾當。右派常常在那裡糾合隨從，公然大放厥詞，辱罵仲愷和他的執政主張，其中罵得最厲害的，有胡毅生等人。

他們的目的，不單是要暗殺仲愷，不單是要把仲愷這樣一個人除掉。他們顯然已經形成了一個由國民黨全體右派人物聯合起來，企圖使廖仲愷倒台從而企圖全盤推翻三大政策的反革命軍事政變陰謀了。

在右派這樣猖獗的進攻中，仲愷絲毫不為所動，仍然毅然決然、孜孜不倦地做他認為應該做的工作。

當時真心擁護孫先生遺志、擁護仲愷堅守孫先生改組國民黨、實行三大政策的主張的人，還有徐謙、彭澤民、柳亞子、經亨頤等人，此外還有以省港罷工委員會為組織的廣大工人羣眾，在農民方面的有農民協會，學生方面的新學生社和黃埔軍校中的青年軍人聯合會。這些革命的羣眾組織，都是仲愷在執行孫先生遺志的一系列工作中的堅強有力的支持者。

但是反革命右派也在羣眾組織中展開了他們的拉攏拼湊活動，他們在黃埔軍校中組織“孫文主義學會”，在學生中也發展法西

斯派的組織，就是当时所謂“士的党”。这些組織，都是反对三大政策的。我們革命的羣众組織就和他們对抗斗争。

当时的国民党右派也是依附資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他們以国内資產阶级、买办阶级的利益为利益，以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益为利益。右派不独反对我們发动省港大罢工，而且对于孙中山先生截留关税余款，平定商团之乱，都是不贊同的。他們生怕开罪了外国帝国主义，生怕开罪了資產阶级、买办阶级。仲愷极力支持和协助这次規模宏大、影响深远的省港大罢工，遭到右派和外国帝国主义的联合反对，更是勢所必然的了。

正如仲愷生前所說：“凡是为占人口中絕大多数的工农大众造福的，就是革命派。”仲愷是一个革命派，他当然不会做有利于右派、有利于外国帝国主义而不利于工农大众的事。所以仲愷是絕對不合右派的胃口的，也絕對不合外国帝国主义的胃口的。

在出事前几天，我們本来也曾經接到过密报，据說搜到一个法西斯派的学生有一封信，里面写着“黑衣領袖有奖励”。我們当时还莫名其妙，不知道黑衣領袖指的是誰，后来我們才知道是指法西斯党的領袖莫索里尼。

就这样，大概在仲愷未遇害之前一个星期的光景，我們就曉得有人暗算他；而且想要加以謀害的还不止他一个人。反革命这样宣传他們的行刺的計劃，无非是希望仲愷听到这些，就会退却。可是，他們的威胁宣传，一点也沒有用处。当这个消息传到我們那里的时候，我便和仲愷商量着說：“既然有人阴谋行刺，你也該多加两个卫兵防备一下才是。”他听了很不以为然。他回答：“增加卫兵，只好捉拿刺客，并不能阻挡他們行凶。我是天天到工会、农会、学生会等团体去开会或演說的，而且一天到晚要跑几个地方，他們想

要謀杀我，很可以装扮着工人、农民或学生模样，混入羣众中下手的。我生平为人作事，凭良心，自問沒有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众的地方。中国如果不联俄联共，就沒有出路。他們如果安心想来暗杀，防备也是沒有用处的。总之，生死由他去，革命我总是不能松懈一步的。”他說的自然很有道理，但我心里总觉得还是防备一下好些，到底又派了一个便衣卫士随从他，并知会当时的公安局长吳鉄城。誰知，吳鉄城也是参加反对仲愷那一伙的。

八月十九日夜晚，仲愷又忙于替黄埔軍校筹款，到家已經很晚了。第二天八月二十日的早晨，刚过八点，又有人来向他請示公事，等他把公事交代完毕，已經是八点多鐘差不多快九点了，仲愷还没有吃早餐。因为我們預先接到通知說是九点开党中央的常务会议，我催他說：“快点吧！开会的时间到了。”仲愷于是匆匆忙忙地只吃了几口白稀飯，就和我一起上車出門。唉！現在想起来，也真象催他去死一样。

車子向着惠州会馆(当时的中央党部)开去，在路上遇着陈秋霖同志，他正要上我們家里商量事情。仲愷一看见就招呼他說：“你是找我嗎？”陈同志說“是的。”仲愷說：“那就請上車一同到中央党部去吧！”陈同志便登上車了。

汽車开到中央党部門前停下，我們先后下車。我刚一下車，抬头看見一位女同志，就止住脚步向她說：“停二十分钟我就到妇女部，我有事情和你們商量，請等着我。”正在这說話的时候，我就听见“拍拍、拍拍、拍拍拍”地好象放爆竹的声音，我心里还以为誰在放爆竹呢。可是，一轉过脸来，看見仲愷已倒在地上。陈秋霖同志痛楚地挨着两步，也倒下去。在我身边的卫兵，也已受伤躺着了。四人同行，三个男的都中枪了。我这才意識到有人行刺。一面大喊捉

人，一面俯身撫着仲愷，当时仲愷已不能回答。当我刚刚低下头去撫仲愷的时候，又是一陣枪声。头上嗖嗖地有枪弹飞过，我头皮还感觉到热气。那时我若不是弯身去撫仲愷，一定也是完了。在我大喊“快些捉人呀”的时候，就有五六个凶手从中央党部門前“騎樓”底下的石柱后面窜出来，原来凶手是預先躲在中央党部門前的。平时中央党部总有警察站崗，但那时却迟迟不見有警察来捉人。只有一个在妇女部工作的女同志刘家桐从里面跑出来帮助我。邓泽如那天早已到了中央党部，他就始終躲在楼上，沒有下来。

把仲愷架了起来，只見滿地殷紅。他衣服上的鮮血，还点点往下滴。那时我的心里，說不清是悲痛还是憤恨，但沒有惧怕。到了医院，仲愷已是不救了。大概是在路上就斷了气。陈秋霖同志也在負伤后几天牺牲了。

事發之后，有凶手陈順因头部被我們的卫士打伤，眼睛也打坏，当场被我們逮捕。在他身上搜出一些单据，按日期順序，早几天的是当衣物的当票（証明这个人本来很穷），后几天的是分錢的單（証明那个人后来收到人家分給他的錢）。那个陈順在临死之前，还供出：“香港有两百万元打共产党。”

陈順又供出：“有几十万元打‘猛人’”（猛人是广东方言，意即有名声、有权势的人）。問他：“猛人是誰呢？汪精卫算‘猛’嗎？”陈順答：“不。猛人是廖仲愷、譚平山。”可見当时是有人主謀打击国民党革命派，打击共产党。从这些零星的細节看来，我們不难看出誰是杀害仲愷的幕后真正的凶手了。

仲愷被暗杀之后，苏联顧問鮑罗廷立即提出非常正确的主張，要把胡汉民、胡毅生等有嫌疑的人逮捕起来，但是立刻遭到右派嚷

囂的反对。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就坚决不赞成，甚至以辞职相威胁。这就是后来出现了所谓胡汉民出国游俄的这样一幕戏，以及许崇智、梁鸿楷全部武装之所以被缴械的由来。当时和帝国主义勾结的国民党右派集团，不止办有报纸，把持了武装，还有公开的政治活动，居然召开密谋反革命的会，可见他们是有组织、有行动的。当时广州的公安部门掌握在吴铁城的手里，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那天中央党部开会，而门岗并没有一个守卫的警卫人员。仲愷当时身中四枪，三枪伤口较大，查明是口径大的枪打的。但有一枪伤口小，应该是口径小的左轮手枪打的，而当天被捕的凶手却没有带左轮手枪的。可见当时除了在中央党部门口的凶手开枪打仲愷之外，一定还有一枪是从党部里面打出来。那天本来是九点钟开会，一贯公开反共的邓泽如却很早就来到中央党部，预先蹲在楼上。所以这一枪，我很怀疑就是“邓泽如的卫士”打的。

还有一件事也足以充分说明这个反革命政变是多么的阴险毒辣。所有参与这个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的人，都是仲愷的十多二十年的老朋友，在暗杀仲愷的事件没有发生之前，他们还是朝夕见面的。而这个阴谋已经进行了这么久，布置得这么机密，以致我们当时并没有发觉。这件事，直到现在想起来，也还是值得我们深为警惕的。

被捕的凶手供出，这次行刺事件，是朱卓文一手布置的。据说朱卓文以前做县长曾因办事不力，被仲愷免职，所以结怨于仲愷。由此我们又查明主谋暗杀仲愷的，还有胡毅生、魏邦平、梁鸿楷、林直勉、赵公璧（胡毅生的妻舅）等人。然而就在对这些人的通缉令发出之前，胡毅生、魏邦平、朱卓文三个人便偷偷离开了广州，逃到香港去了。梁鸿楷在他的部队缴械之后也逃到香港，被捕的就只

有林直勉一个人。

中共党员楊匏安，他是很积极认真地追查廖案凶手的。直接审讯凶手的还有周恩来总理。

廖案发生之后，虽然捉了凶手，我还是觉得很怀疑，因我听说吳铁城很优待凶手。

有一天，蔣介石来看我，我說：“廖案吳铁城是有责任的。因我在廖案发生之前，到公安局找过吳铁城，我說过‘有人要暗杀廖先生，請你注意。中央党部本来应有警察守卫的，但是那天却恰恰没有。而且这次朱卓文漏网没有捉到，显然是有人放走了朱卓文。放走朱卓文，吳铁城是有份的。”我又問蔣介石，“吳铁城那么优待凶手，你又为什么这样优待吳铁城呀？”蔣問我：“吳铁城不好，李章达好吗？”后来蔣委任李章达做公安局长。李章达扣留过吳铁城，不久，吳铁城又被蔣介石的人放走了。后来李章达又被蔣介石免职了。

从仲愷遇害的那一天起，我哀悼死者，并忧伤将来，精神体力都有些支持不了，几天沒有出家門。等我到外面一看，虽然仍然忍不住我的眼泪，可是一切气象，都使我感奋极了。在每个追悼会上，在每一个人的脸上，总都是充满着悲愤之情与坚毅果敢之气。“我們要替廖党代表报仇！”（国民党改组之后，仲愷任黄埔軍校的党代表）这些呼喊的声音，到处洋溢，充滿人人的耳鼓。仲愷出殡的那一天，参加的同志有黄埔軍校的学生、农民、工人、学生、妇女和市民羣众共有二十多万人，行列之大，阶层之广泛，情緒之热烈、严肃、悲壮，在广州來說，都是空前的。我这才深深感觉到：仲愷所流的赤血，已变作了革命的火花。我何曾孤单？我們有了这么伟大的队伍，——广州已經都是我們的革命力量了呀！我流着感奋

的热泪，望见了革命胜利的前途。

周恩来同志当时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在仲愷任黄埔军校的党代表期间，他们二人一起合作共事，亲密相处，真诚无间。仲愷不幸去世，周恩来同志特别为仲愷写了篇以《勿忘党仇！》为题的纪念文字。文中大意指出：“廖先生一生为党为国，现在又在秉承孙中山先生遗志，努力图谋统一广东军政财政，以便进一步发展国民革命的时候不幸牺牲。可以说，廖先生是为承继孙中山先生的遗志而牺牲的。自国民党改组以后，最显著的革命势力，便是革命军的组织和工农群众之参加国民革命。这两件伟大事业的做成，大部分的功绩要属于廖先生。廖先生因此而愈加见忌见恨于反革命分子。而且，最近几次反帝国主义运动，廖先生更是唯一的急先锋，当然会招致帝国主义之忌，尤其是招致香港政府之忌。廖先生一向为反革命分子所忌视，为帝国主义者所忌视，现在又终于为反对帝国主义、为推动革命运动、为推动工农运动而被暗杀牺牲，我们一定要为廖先生报仇。”

— 仲愷的去世，使当时的革命事业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使当时刚刚开始于南方蓬勃发展的工农群众运动和反帝运动也受到了一些波折。由于仲愷生前爱护工农群众，致力民族解放运动，所以仲愷出殓的时候，各地工会、农会送来了挽联，简朴的言词，表达了革命群众对仲愷的深切爱戴。

仲愷死后，我为纪念仲愷一生爱护农工、扶助农工的意志，特出国到南洋募捐款项，于广州市河南建立仲愷农工学校，内分农艺、蚕桑两科，不徒务高深学理，而注重实验，以训练中级技术人材。

我还写了一首悼亡诗怀念他：

輾轉兰床独抱衾， 起来重讀柏舟吟，
月明霜冷人何处， 影薄灯殘夜自深，
入梦相逢知不易， 返魂无术恨难禁，
哀思惟奋酬君愿， 报国何时尽此心。

我决心把悲痛化为力量，在蒋介石等反动派統治中国的二十多年里，始終繼承孙中山先生和廖仲愷的未竟遺志，坚持反帝、反軍閥，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国民党右派、法西斯分子斗争到底。

伟大的辛亥革命过去五十年了，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先生逝世也有了三十六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极其艰巨、复杂、曲折的斗争，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了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和成就，我国的国际地位蒸蒸日上，我們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居于重要地位，为世界的和平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們清楚地看到，我們革命先賢为之流血牺牲、艰苦奋斗的理想，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已經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而且远远超过了。现在，我們要繼承和发揚革命先烈那种不怕流血牺牲、艰苦奋斗的精神，来更好地建設我們的伟大祖国。

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

黄炎培

我正在写《八十年来》，用笔记体裁，批判记录我生八十年来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和亲身参加的国际国内重要活动，这是我《八十年来》的写法。

辛亥革命，是我生八十年中间重点之一。我写法是和《八十年来》一致的。为了要求表达真实，所采取的资料，都是和我实际生活有关的种种活动。辛亥是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我生三十四年。

要了解某一时期，必先了解这一时期的背景。一九〇八年，清那拉太后死。载灃帝（光绪）在不明不白中先死了。年幼的溥仪（宣统）继承了帝位，张之洞死了，袁世凯被罢免了，载灃为摄政王，政权全入满人之手，虽然宣布实行立宪，颁行地方自治章程，而人心大去，腐朽的清朝反动统治，很显明地已成末日。

辛亥以前十年中间，一九〇〇年唐才常起义湖北不成；一九〇四年黄兴（克强）谋起义长沙不成；一九〇五年吴榭（孟侠）谋刺出国考察宪政之载泽等不成，吴自身被炸死。一九〇六年江西萍乡党人起义不成；一九〇七年徐锡麟（他和我还是壬寅乡试中举人同年）因刺杀了安徽巡抚恩铭而被杀。同年，孙文（中山）、黄兴等攻镇南关（今睦南关）不克；一九〇八年云南河口黄兴等起义不成；一

九一〇年汪精卫謀刺載灃不成被捕。在此以外，一九〇三年沈蕙被清廷惨杀，章太炎、邹容被捕，一九〇七年秋瑾被杀，大大小小事件，在这里不完全列举了。这些事实，给全国人心以很大很大的愤激，觉得再不能忍耐了。

那时一般激进青年的作品，如：

秋瑾感时律诗（节录两联）：

瓜分惨祸临眉睫，呼告徒劳费齿牙。

祖国陆沉人有责，天涯飘泊我无家。

赵声（伯先）从天津寄赠吴榭绝诗（四首节录两首）：

一腔热血千行泪，慷慨淋漓我有言。

大好头颅拼一掷，太空追逐国民魂。

* * *

临歧握手莫咨嗟，小别千年一刹那。

再见却知何处是，茫茫血海怒翻花。

这些足够代表那时激进青年们思想的了。写到这里，同志们这样慷慨就义，我起敬，我还在流泪。

有不少爱国志士，看到无法救国，竟至自杀。我有一亲密的同志湖南人姚宏业（定生），他是日本回来创建中国公学者之一，某天给我一信，说了几句隐语，第二天从黄浦江里找出了他的死尸。

吴榭和赵声别后，就去北京前门火车站行刺了。我是中国革命同盟会会员（我因演说揭发清朝腐朽，被捕判处死刑，脱险，亡命日本，是一九〇三年事。那时清政府说我是革命党，实际上同盟会还没有成立哩），入会后，我负责联络各地同志。赵、吴都是我秘密收藏着的同志名单中的人。每人都有一商店式的别号：赵声同志是“震康”，吴榭同志是“祖茂”，这名单我至今收藏着，单上共四十

九人，还有秘密电碼。

辛亥年三月，黃興、趙聲等起義廣州，攻督署不成，死難七十二人。黃興倖免。趙聲病不及參加，旋即病死。

清廷宣布鐵道國有，四川人民抗議，被川督趙爾豐大屠殺。

這些都是辛亥革命的導火綫。

× × ×

辛亥革命，那時我是什么身份呢？我在这中間怎樣參加工作的呢？

那時我任江蘇省附屬局常駐議員、上海工巡捐局議員、江蘇省教育總會（設上海）常任幹事、蘇州江蘇地方自治籌辦處參議。這工巡捐局是上海縣地方自治組織的前身，實際上已成為上海地方性的權力總機關，李鍾珏（平書）是總董。

我在上海有一羣政治意識不完全相同而一致傾向於推翻清廷、創立民國的戰友。其中教育界為主力，包括新聞界、進步的工商界和地方老輩如馬良（相伯）、張謇（季直）、趙鳳昌（竹君）、姚文枬（子壯）等。我們在上海很自然地成立起幾個據點來，經常集會。教育總會是一處，工巡捐局是一處，望平街時報館上層息樓是一處——《時報》是當時最進步的報紙，負責者狄葆賢（楚青）。又一處是趙竹君的家惜陰堂，張謇來上海，時時會集在那裏。而奔走聯絡這幾個據點的是我。

馬相伯老人還時時招去徐家匯問大局情況。

那時的江蘇巡撫程德全，是清朝的大官而很得到人民擁護的，為的是他做過一件突出的事。

程德全是四川雲陽縣秀才，黑龍江省候補知縣。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一九〇〇年），帝俄大舉侵略東北，程德全請赴前敵，將軍

寿山命程德全和俄交涉,无效。俄国隔江发炮轰城,寿山自杀。程德全当时以身当炮口,俄人大感动,中止发炮。黑龙江人民认为以程德全一人的牺牲精神,使全城保全生命,请求清廷命程德全为将军。适清太后招待外宾,俄公使夫人盛称中国有好官程德全。那时黑龙江改省,清廷就破格以程德全为黑龙江省巡撫(根据多祿所写《庚子交涉隅录》),到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年)三月調任程德全为江苏省巡撫。

× × ×

辛亥革命开始了。一九一一年八月十九日革命軍起义武昌,总督瑞澂逃。推黎元洪为都督。接着黄州于二十四日、沔阳于二十六日、宜昌于二十七日先后起义。各省紛紛响应。

二十四日,上海赵竹霞电话招我去惜阴堂商时局前途应付方法,定了一些策划。

二十五日,我和沈恩孚(信孺)、雷杏(兼兴)、楊廷栋(翼之),还邀到了张春同去苏州闔門外惟盈旅館。张春受程德全委托,代草劝清帝后退位奏章。这事保留着一幅“秋夜事竣图”做纪念,我曾題詩一首,收入我的詩刊《苞桑集》。

那时,民軍和清軍战于武汉一带,互有胜败,忽进忽退。

九月十三日下午,上海民軍和商团巡警联络成熟,在闸北突然起义,上海全市挂白旗。当夜会攻清軍惟一的武装集中地制造局,不得手,陈其美被捕。李鍾珪那时兼任該局提調,早把是非利害向局总办张士珩反复劝导参加起义,张不允。陈其美被捕后,李又去劝张释陈,仅得不杀。繼而民軍和商团巡警陸續进攻,十四日上午八时终于胜利地攻破制造局,张士珩逃。

陈其美被推为沪軍都督,李鍾珪为民政长,上海道、县的官印

都接收下来了。

十五日下午，江苏苏、松、常、鎮、太五属人民在省教育总会举行会议，公推代表去苏州劝程德全起义。我被推为代表之一，立即上车，到苏州则程已宣布独立。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十四日民军五十余人由上海专车到苏州，会同枫桥新军营代表见巡撫程德全。那天，上海起义的消息已到，苏州人民纷纷推代表见巡撫劝响应，程德全慷慨地说：“此举我亦赞成，但务必秋毫无犯，勿扰百姓。”

我在五属代表中先到苏州，但我到时已滿街悬白旗了。

江苏宣布独立，公推程德全为江苏都督，我就被留下办公。

程德全就都督职，首先表现一特点，不杀伤一个满人——他省有大杀满族平民的。都督府发出六言告示：“照得民兵起义，同胞万众一心。……旗幟視同一体，……大家共享太平”。通电全省各属，即日反正，别伤害满族平民。

我留都督府办公，首先做两件事：(1)参与起草新的官制；(2)和同事分向所属各衙門收取印信。在这里又表现一特点：我被命收取提学使樊恭煦印信，那时樊十分战栗。我受程都督谆嘱，十分亲切地向樊说：“此举出于全民公意。你如愿留苏，就留下，给生活费。愿回原籍(樊浙江人)，当送回籍川资。”樊愿回籍。所属各卸职人员包括撤换的各知县，一律这样待遇。大家感觉民国比清朝大大不同。

都督府任张一麀(仲仁)为民政司司长，未到任前沈恩孚代。我任民政司总务科长兼教育科长。

又一特点：都督每月工资五十元，司长三十元，科长和各县县知事(民国不称知县，称县知事)二十元。大家低工资，大家精神奋发。一片新气象。

南京江苏諮議局无形解散，設临时省議會于苏州，十月一日行开幕式。

我的任务比較广泛，有奔走各方的必要，为的是商量問題，大家认为有一同盟会會員在座較好。我就推荐张志鶴（伯初）入都督府（伯初一九〇三年和我同因演說被捕，亡命日本），而我往来苏州、上海間。不久，陈陶遺从南洋归来，我們这一羣中又添了一个同盟会會員。

上海息樓所在的望平街每晚人山人海，发生了大影响。望平街左右相望的报館，家家大玻璃窗外，張貼各地消息。街上日日夜夜羣众挤得滿滿地在探听，一个捷报到来，鼓掌狂欢；一个报告失败，认为这家报館受清廷指使，颯胜为敗，羣众极度憤恨地把大玻璃窗碎裏碎裏地立刻打得粉碎。从此报館不但不敢在門首披露失败消息，特別不敢在报上披露。报上一披露，整个报館那里还站得住？这样一片独立声、胜利声，震动全国，腐朽的清廷狂駭了。

在这里我保存摄影两幅：一是在民軍占領上海以前从各报館集中的望平街南望；二是在民軍占領上海以后从各报館集中的望平街北望。

但那时南京还被清廷的走狗张勳盘踞着，他正在极端殘害人民。各地民軍公推江苏都督程德全統率联軍进攻南京。程都督慷慨就道，发表了一篇誓师文。这篇誓师文，曲折反映程都督思想，写得激昂恳切，当时很博人們传誦。中有警句：“……欲求政本之廓清，端賴国体之改革。无汉无滿，一視同仁。为国为民，鞠躬尽瘁。将混貴賤高下为一大平等，須合行省民族为一大共和。……仗諸君热力，再造河山。是民国义师，咸遵紀律。……”此文是省議會秘书长孟森（蕓孙）起草的。十月十二日，联軍攻下南京。

那时各地民軍大大小小不等，但从它們旗号計算起来，不下十七、八个单位。各推代表集合起来，程德全亦到，黃兴亦到，十月十四在上海江苏教育总会开共和联合会大会，公电孙中山回国主持大政，公举黃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国名定为中华民国。黃兴等建議規定国旗式样。經過反复研討，取五族共和的意义，决以五色为国旗。紅、黃、藍、白、黑，象征汉、滿、蒙、回、藏。我还保存着两幅摄影：一是中华民国共和联合会大会在上海江苏教育总会举行时門前之景；二是会场之景。（以上四幅摄影，都是青年沈云葆贈給我的。他的老輩沈綬云創設上海信成銀行，在辛亥革命时，以資財贊助革命。）

自从武昌起義，清廷起用袁世凱，任命为湖广总督，統兵駐京津。袁立即电召張一麀去北京。上文所說“惜阴堂策划”从此开始。

惜阴堂趙竹君等认为：全国人心是一致要求独立的；革命軍热情、勇敢、牺牲精神都是有餘的，可惜实力太不足。腐朽的清廷看到各地紛紛起義，已很惊駭；各省督撫紛紛劝清帝让位。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利用拥有实力的袁世凱去劝清廷，可能生效。誰能說袁世凱呢？只有久在袁世凱幕下的張一麀能說世凱。經過多次函电往返，只見世凱部下馮國璋兵忽而猛击民軍，忽又按兵不动，忽进忽退，感觉无从捉摸。最后电張一麀面詢袁世凱真意，袁答：“諸位懂拔树方法么？几百年大树，专用猛力，虽折断，无法去根。只有左右‘晃’的一法。‘晃’，‘晃’，晃之不已，根土松动，全根一拔即起。我的軍隊忽进忽退，就是‘晃’的一法。”

沒有几时，汪精卫被释放了。袁世凱委任唐紹仪为代表，民軍公举伍廷芳为代表，双方在上海进行和談。这是表面文章。实际上袁世凱和清廷間商定：(1)清帝让位，(2)汪精卫释放，(3)提出清

廷滿意的优待条件。而袁世凱和民軍間商定：(1)清廷註位，(2)改建民国，(3)总统职位給与袁世凱。

十一月六日，孙中山先生从海外归来了。十日，直、奉、魯、豫、鄂、湘、粵、桂、閩、晉、陝、漢、贛、皖、蜀、苏、浙十七省代表集中南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孙文以十六票当选。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十三日，孙文由上海专车去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确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改用阳历，那天就是中华民国元年一月一日。

二月十二日，清帝宣布退位。公布优待清室条件。孙文辞职，袁世凱繼任临时大总统。周旋其間的是汪精卫和副議長陈天华。

辛亥革命写完了么？还有一件事，我不能不附录在这里。辛亥十一月二十五日夜，革命大領袖之一陶成章(号焕卿)在上海广慈医院被人刺死。刺客为谁？怎样刺杀？很有人說是陈其美命蔣介石刺死的。各种記載，大都推給他人，脱卸自己。无论如何，从整个革命說来，总是一件很大不幸的事。我是臥真写日記的。根据我的日記：一九二七年六月三日上海澄衷中学校长浙江人曹慕管和我漫談。曹說：“我民元病臥广慈医院，一日傍晚，蔣介石來談，臨行說：我們今晚將做一件大事。夜半，忽聞枪声，別室陶煥卿中枪死了。”有深知其中秘密的告我：“陈其美騙蔣介石行刺陶煥卿，蔣偃光复会叛徒王竹卿执行。煥卿以为竹卿是自己的人，請他入室，就被刺死。光复会終于又刺杀了王竹卿。”我所收錄同盟会會員名单上，陶煥卿別号济世。

× × ×

辛亥革命，从广州起义写起来，接下去是宋教仁被刺、袁世凱叛变、二次革命。“抽刀断水水更流”，是无法划断的。辛亥年結束了，写辛亥革命，也就此結束。

辛亥革命还在十月革命之前六年。馬克思經典學說沒有傳布到中國。我們完全沒有階級認識，有的只是愛國主義、民主主義、人道主義、反封建主義。許多同志為了實現這些理想，不惜犧牲生命，是大大可敬的。太可惜的，發見了若干事實，有些人槍口不對外而對內。這些從革命全局說來，到底是很大很大的損失。

犧牲了不少不少愛國志士，政治上收穫些什麼？很難說。但封建帝制被推倒了。社會風俗人心，從某些部分看來，辛亥以後和以前大大改變了。所有卑賤、頹廢、放蕩行為，有些減少，有些完全消失了。讓我具體來說：辛亥以後，(1)很少見口頭上、書面上被稱或稱人“大老爺”、“老爺”、“少爺”；(2)“磕頭”、“三跪九叩”、“打請安”沒有了；(3)男子一律剪辮了(有突出的一點，我們參加革命工作的，必須到最後關頭才剪辮，辮子是最好的掩護物)，女子裹腳從此解放了，已裹的放掉，已經裹小的也放大，社會上很自然地一致認定，民國紀元以後生下的女兒，一概不裹腳；(4)鴉片風沒有一時消滅，但較辛亥以前漸減，大家認為這不是一件體面事(辛亥以前一般認為鴉片癮越大，越體面)；(5)滿族倡始而漸及漢族的男妓，辛亥後逐步地消滅。總之，辛亥革命無數頭顱所換得來的，除推翻封建帝制以外，廣大民眾的體格、品格相當提高了。

我有一位朋友楊亞嵩在辛亥紀元以後，很激奮地告我，還告他的許多朋友：“中國革命成功了，我要做一個新中國的新人，從今以後我做三件事：(一)決不再抽鴉片；(二)決不再賭博；(三)決不再逛妓院。如違犯，盡你們責罰。只是酒我還沒有能戒絕，今後少喝些吧！”這位朋友可惜沒有多久就死了。楊亞嵩是誰？是以水泥工人積財毀家創辦浦東中學和小學的楊斯盛的儿子，他是够代表那時大部分進步青年的。

从进步青年看来,从某些部分风俗人心的变化看来,从广大民众的要求看来,那时人民是很愿意接受革命号召而跟着进步的,可惜我们没有能提高认识,特别缺乏阶级认识,以致没有能依着世界先觉者所指出的道路而在中国抢先一步领导进行。到一九二五年因中山接受廖仲愷建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为三大国策。中山手下胡汉民竟暗杀了仲愷,仲愷同志也是同盟会会员。马克思经典著作那时早经陆续出版;《共产党宣言》是一八四八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是一八六七年出版的。我们没有及早译读。再隔十年,中国共产党产生,又经过千锤百炼,终于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一九四九年中国才得解放,一步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对辛亥革命,社历史学家正确地写着:“这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历史学家还原地写着:“这是历史发展条件的限制。”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辛亥革命前后回忆片断

程 潜

我于一九〇四年十月到日本东京，在振武学校肄业。是年十二月，我和湖南留日学生黄兴、宋教仁、程子楷、赵恒惕、欧阳振声、曾继梧、陈强、仇亮，云南留日学生杨振鸿、罗佩金、殷承徽、郑开文、唐继尧，直隶姜登选，江苏章梓、伍崇实，河南曾昭文等共百余人，组织革命同志会，从事民族革命。翌年八月，同盟会成立，我因仇亮介绍，加入了同盟会。

我加入同盟会不到几天，仇亮引导我到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人金弥宅，遇见孙中山先生。先生态度和藹可亲，与同志谈，谆谆不倦。我请面示革命方略，先生指示三点：

一、首先打倒自己脑海中的敌人，抛弃富贵利禄的观念，树立爱国家爱人民的思想，服膺主义，不与敌人妥协。

二、革命军占领地区，必须立即成立政府，以为号召，即使占领地区小至一州一县，亦应如此。

三、慎选革命基地，以发展革命力量。

孙先生言尚未竟，我插问一句：

“中国如此广大，选释革命基地，究以何处为宜？”

他忖议在胸，不假思索地说：

“革命必须依敌我形势的变化来决定，如形势于我有利，而于

敌不利，則随处可以起义。至于选择革命基地，則北京、武汉、南京、广州四地，或为政治中心，或为经济中心，或为交通枢纽，各有特点，而皆为战略所必争。北京为中国首都，如能攻占，那么，登高一呼，万方响应，是为上策。武汉辖轂南北，控制长江上下游，如能攻占，也可据以号召全国，不难次第扫蕩逆氛。南京虎踞东南，形势所在，但必須上下游同时起义，才有成功希望。至于广州，則远在岭外，僻处边徼，只因其地得风气之先，人心倾向革命，攻占較易；并且港澳密邇，于我更为有利。以上四处，各有千秋，只看哪里条件成熟，即可在哪里下手；不过从現時情况看来，仍以攻取广州，較易为力。”

此外，他还讲了許多有关革命的道理与经过，我都能有所领会。自从我亲聆这次教誨以后，一时思想大为开朗，从此衷心服膺三民主义，并心悦誠服地敬佩先生。此情此景，印象最深，至今不能忘怀。

不久，我到姬路野炮兵联队入伍一年，隨即轉入陆军士官学校，至一九〇八年十二月毕业。适川督赵尔巽調我和姜登逸、舒和鈞、王凱成四人入川訓練新军，于是受同盟会委派，我担任了长江上游联络員。

我們到达四川后，赵尔巽派我充任陆军第三十三混成协参谋，姜登逸充任工兵营管带官。就职一个月后，我同同盟会少数同志詳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研究了四川的情况，认为要在四川进行革命，就应立个行动綱要，以为守則。当时拟定的行动綱要，大致有如下四点：一、服膺三民主义，始終不渝；二、稳步发展組織；三、切实把握军事实力，应付事变；四、联络一切力量，共策进行。我們当时认为，只要这个綱要能够切实做到，那么，他方一有动作，我們可以

立即响应；他方未有动作，我們也可以掌握时机，随时发难。我們商妥后，即邀集林修梅、楊瑾、季雨霖、舒和鈞、梁达沅等同志开秘密會議，討論行动綱要，得到一致同意，當場并推我主持其事。这是一九〇九年二月的事。

那时协統是旗人鍾穎，我們对他很为警惕。到三月間，川督譚他带兵入藏，协統一职另調东三省道員朱庆瀾接充。在朱未到差前，鍾穎把混成协的事务交我代办，他专筹划入藏事务，有时也同我商量調动军队与安排人員的問題。入藏军队約二千余人，編为三营。第一营由防营改編，管带官陈庆；二、三两营均由陆军合編，二营管带官为张葆初，三营管带官为林修梅。五月間，鍾穎所部从成都开拔入藏。鍾走后一个月，朱庆瀾才到成都接事。

朱庆瀾素有廉洁勤敏之名，有虛心好善之意，同我相处，亦頗融洽。赵督打算扩編新軍为一鎮，交朱筹划。朱問計于我，我說：“由协扩編为鎮，要解决五个問題。其一为总方略。其二为迅速設立講武堂以訓練干部。其三为购买枪炮器材服装。其四为加紧建造营房。其五为增购馬匹。除第一項属于国防，須經我們拟定后呈請軍府核定外，其他四項，应有一年半的准备，才能成鎮。”朱以为是，屬我草拟計劃，交赵督批准。朱推荐我担任购买枪炮器材服装的任务，并得督辦公所总參議黃忠浩的同意，于是赵尔巽委我为主任，派兵各处楊瑾、曾广开为隨員。我本不乐意担任这个工作，經姜登选力言，到长江中下游走一趟，多多联系同志，对革命大有好处，我才决意担負起来。

这年十一月，我們一行三人从成都出发。到了武昌，见到了統制张彪、协統黎元洪。我們在武汉三鎮，參觀了兵工厂、紡紗厂和陆军三十二标。三十二标訓練甚好，士兵体操技术也很高明，为各

地所少見。協統王得勝、劉韞玉，統帶曾廣大、李襄鄰，將湖北建立陸軍的經過情況，向我們作了詳細說明。與這些高級軍官接觸，給我一個印象：我以為他們都是循規蹈矩、怕惹是非的人，一旦軍隊有事，他們是不會從中作梗的。

在武漢逗留期間，我特別着重對下層情況的了解。經過考察，得知黨人在兩湖一帶活動最力，革命空氣十分濃厚，許多青年學生都投入新軍，以展其救國的懷抱。上年冬，湖北陸軍中，即有蔣翊武等組織羣治學社（文學社的前身），社員如李六如、楊王鵬、廖湘芸等，都是思想進步、才能出眾的人物。楊瑾與蔣翊武是舊交，我這次到武漢，因楊之介，得與蔣見面。我們兩人談話的內容，多為有關革命運動的進行問題。翊武說：“在湖北一餒與一混成協的新軍中，有許多革命志士；不過因為禁網嚴密，偵探密布，我們文學社未便在他們之中大事發展，只能穩步前進。兵方面已有聯繫，所以我們的活動得以安然無事。”我當即告以四川方面的情況，并謂只要軍隊訓練成熟而又為我們所掌握，只要切實執行我們的行動綱要，我想四川雖暫時落后於兩湖，不久也可以迎頭趕上的。翊武又說：“孫武、居正等領導的共進會，與文學社合作得還好。聽說譚人鳳、焦達峯在湖南也有共進會的組織，今後亦應聯合一致，共策進行。”我對他的意見極表贊同。接着他又問我：“你看革命何時可以成功？”我說：“三年五載不為多，不過不能專就湖北一省的情形來下判斷。因為在湖北，革命力量的發展是很快的。且主義已滲透到了軍隊下層，只要人心不死，成功是會很快的。”翊武深以為然。我們相約各自努力而別。

我們一行三人離開武漢到達上海的時候，正是一九一〇年的新年。聽說同盟會正竭全力策動廣州新軍起義，倪映典率領新軍

进攻省城，已战败阵亡。消息本不好，但这一次究竟是军队革命起义的开端，所以闻之也很兴奋。我这次到沪，虽为购械而来，不过更重要的还在留心物色革命人才，其中尤以物色联络员为最。有一天，我在马路上散步，得遇上年同船入川的但懋辛。此人精悍明敏，最适宜做联络工作。他这时正在中国公学教体操，彼此来往颇密，因将我的打算同他商量，他同意回川。我当即电请朱庆澜转请赵督优予录用，复电照准。至于购械，经过调查，决定向上海制造局定购七生五管过山炮，向泰来洋行定购马克沁机关枪，向日本太平洋行定购工兵器材，其他马鞍、皮带、服装等军用品，也同有关洋行签定了合同，定期交货。

我在沪任务完成之后，又抽空到南京一遭。南京陆军第九镇成立在湖北第八镇之后。第九镇的高级长官，多半是日本留学生，个个赫赫有名，在训练军队方面，形式上模仿日本的一套，实际上用处并不大。不过从前赵声等人对革命宣传工作还做得不坏，所以革命思想已深入到中下级军官的头脑中。但自一九〇七年端方屠杀了革命党杨卓林等人，逐走了军队将领赵声、柏文蔚、冷超以来，禁网森严，致使军队中一般官长对革命工作多采取过于稳健的态度，惟革命潜伏力量仍然不小。好在南京离上海很近，将来南京一旦有事，是可以得到上海方面的支援的。这就是我在南京期间经过与各方接触所得到的印象。不两天，我回到了上海。

四月间，在沪购械事务已告结束，便命杨蕴、曾广开先行返川，我个人告假一个月，回湘省亲。路过长沙，与文襄见面，交换了彼此所知道的情况。其时长沙抢米风潮刚好结束，巡抚岑春煊、藩台庄庚良受到撤职处分，劣绅王先谦、叶德辉、杨巩、孔宪教也受到严

厉处分。我听到不少奇闻和新诗，都是描绘统治者的腐朽无能与老百姓挺身而出反抗政府的情形的，写得有声有色，奇趣横生。我认为，这次抢米风潮，乃是群众自发的暴动，事前既无组织又无训练，但仍然收到了同革命不相上下的效果，不能说不是一件十分可喜的现象。“万里云程初发轫”，革命前途，大可乐观。

我在醴陵老家住了半个月，于六月间回到成都，仍供原职。四川陆军扩大为镇的准备工作已完毕，估计十二月可以成立为镇。因再与姜登选分析国内外形势和四川情况，认为形势于革命十分有利，问题在于加强我们的工作。谈话中，我把这次出川考察的情形告姜，大意是：长江中游革命力量在日益发展，长沙抢米风潮尽管是群众自发的暴动，但足以说明革命条件业已成熟。长江下游各省也有进展，上海为下游各省的中心，同盟会已派人入沪主持。今年广州起义虽告失败，但影响甚大，并且尚在再接再厉的奋斗中。四川居长江上游，应与滇、黔联络一气。留日云南同学大多参加了同盟会，这是一股很大的革命力量。两湖对军队宣传主义、组织力量的工作做得好，特别着重中下级官长，尤其是士兵，比四川侧重军队中上级要好得多，我们应该向两湖学习。我这次在沪遇见但懋辛，四川会党最多，已约但回川联络会党。姜登选听了我的汇报，觉得分析恰当，因而增加了大家对革命的信心与勇气。

一九一〇年冬，四川陆军第十七镇正式成立，统制为朱庆澜，我任正参谋官，两位步兵协统由五十五、五十六两标统带施承志、陈德邻升任。步兵中有一位统带叫叶荃，是同盟会会员，与炮兵统带、工兵管带一起，均同我们有联系，一旦有事，可以运用自如。惟姜登选没有升任为步兵统带，是一缺点。过了年，即一九一一年正月间，接但懋辛来信，大意是，“近得异人传授法术，要往广州学道，

无法分身回川，有負盛意”等語。这是暗語，不久果有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但懋辛是亲自参加这次起义的。但既不能回川，我們只好另外找人来代替他做联络工作。

四月間，川督赵尔巽調任东三省总督，川边大臣赵尔丰接充川督。此时全国人民正受着黄花崗烈士死难的刺激，义憤填膺；复有铁路国有风潮，川、粵、湘、鄂四省人民紛紛成立保路同志会，各派代表赴京吁請清政府收回成命。閏六月中，接家电，得知父亲病故，只好請假回籍奔喪，把我担負的同盟会的工作交給姜登选接办。我于閏六月二十三日动身，取东大路返湘。朱庆瀾送我至成都东郊，以时局演变甚剧、究应如何应付相詢。我因簡略进言，大意是：“老百姓与士紳反对铁路国有的风潮越来越扩大，十七鎮新軍是为捍卫国家而設的，以不介入这次风潮为好。我聞新督性情急躁，統制似应多方进言，总以不激起大变为妥。去年长沙搶米暴动，岑春冀、庄廣良受到撤职处分，連新軍協統楊晉也牽連受累，可为前車之鉴。此次风潮远远超过长沙搶米暴动，希望統制相机行动。如有緊急，姜登选沉着勇毅，胜我十倍，遇事請与他商量。”朱頗首肯，互道珍重而別。

我从成都急行七天，到了重庆，其时川南、川东各大城市已紛紛罢市。从渝坐船东下，七月二十日抵达长沙。在长沙，見到了文斐。他說：“自广州起义失敗后，黃兴、胡汉民已不能在沪露面。但宋教仁、陈其美等已奉命从港到沪，組織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联络长江各省同志，指导各地工作。”我說：“这个組織极为重要。我們近年来，各省工作都是各自为政，既无联系，又无統一計劃 徒然使工作受到損失。现在有了这个組織，今后工作定会大有进展。”此外，又談了一些有关湖南反对铁路国有的情形，彼此預感到革命

时机行将成熟，遂互相勸勉努力革命工作而别。

七月底，我回到醴陵，安葬好父亲，已是八月上旬了。其时，接朱庆澜来电，大意是：四川省派我为永平观操员，须于二十日赶到北京报到。我因于十四日从家动身来长沙，又会见了文斐。他说：“浏阳人焦达峯在湖南组织了共进会，对新军士兵有联系，对会党也进行了不少工作。”我说：“四川会党极盛，我竟对之束手无策。我认为，会党流品很杂，运用这种力量，如不能操纵自如，以后必致发生流弊。我是着重在军队方面进行工作的，对会党，我不甚重视。我现欲借观操机会到北方看看，你以为如何？”文斐很赞成我北上一趟。恰好在长沙碰到程子楷由广西省派赴北京观操，正好同行。

八月十六日，我与程子楷到了汉口，到武昌寻找蔣翊武，沒有碰到。十八日乘車赴京。十九日車抵彰德，得知武昌起义。是日午后到京，始知秋操停止举行。因与程子楷商量，最好立即南下，参加革命，以遂平生之愿。时京汉路已停止客运，只有赴津航海南下一条路。其間因子楷得病，稽留至二十七日才到天津，候至三十日搭商輪南行。沿途在各港起貨上貨，直到九月七日始抵上海。从京至沪，沿途所見，截然不同。京津两地，熙来攘往，仍然一片昏昏沉沉。上海則革命空气十分浓厚，尤以工、学、商三界表现最为热烈，令人兴奋。計自武昌首义，至九月十三日上海独立，不出一月，全国即有七处起义，声势之壮，为前所未有。

在沪得知黄兴已于月初从港經沪轉赴武汉。我与程子楷商量，决定同赴武汉。同路还有邓希禹、黄子伟二人，他二人均系清廷文官，愿意弃职从軍，真是难能可贵。我們一行四人，于十三日从沪乘輪赴武昌，輪船准期到达汉口附近，停泊洪山江心。我們偃

了民船登陸，面見洪山防守司令，說明我們是隨黃興來武漢助戰的。防守司令立即寫了介紹信，許我們進城。這天下午，下了一場秋雨，泥濘載道，我們冒雨步行三十里，到了武昌，城門緊閉，守城士兵驗看介紹信，才放我們進城。城內人人精神煥發，志氣軒昂，確有一番革命新氣象。又見市上間有青年，身着青緞武士袍，頭戴青緞武士巾，巾左插上一朵紅絨花，足穿一雙青緞薄底靴，同舞台上武松、石秀一樣打扮，大搖大擺，往來市上。我想，這大概是“還我漢家衣冠”的意思吧！

黃興得悉我們到了武昌，即于当晚派唐桂良前來，把我們招待到客棧住宿，并表示歡迎我們參加漢陽戰事。第二天，即十八日，唐桂良帶路，由鮎魚套過江，到了漢陽昭忠祠總司令部。克強見我們來了，十分高興。我們談論了當時兩軍對峙的情形，得知湖北陸軍自起義後，破壞了原有建制，原有管帶以上官長，由于士兵不服，多已離開軍隊；因此，漢陽軍隊雖有三協和一標步兵，但由于統兵官不夠，或者統兵官軍事水平不高，所以力量顯得有些單薄。不過士兵為革命精神所鼓舞，士氣尚好。至于敵方，此時業已起用袁世凱，并派馮國璋率軍兩鎮南下，與我作戰；惟山西、陝西先後獨立，清廷在在需要設防，所以除馮部兩鎮外，要再派兵南下，也很困難。又自十三日上海宣布獨立，十五日蘇、浙宣布獨立後，為張勳所翹蹶的南京已成一座孤城，只要蘇、浙、滬合軍進攻，南京即可攻下。可見漢陽戰役，關係至鉅，如果一戰而勝，則革命形勢即可穩定。

以上就是當時的基本情況，是這次見到克強同大家談話後所總結出來的。克強并說：“湖南已派王隆中率新軍四十九標和巡防營數營援鄂，我們革命聲威益振。”言下對戰局殊為樂觀。當時談話在座的，我記得有譚人鳳、參謀長李书城、副參謀長吳兆麟和簡

學會雜糧等。譚白髮嬌嬌，語言耿直，給人印象最深。總司令部組織異常簡單。克強留我們吃便飯，飯後繼續談話。克強說：“湖南關係甚大，在焦、陳（作新）遭人暗算之後，問題頗多，最好我們有同志前往聯絡，共策進行。漢陽戰事，我已派會雜糧指揮炮兵團，願云來得及時，就請你幫助夙崗（雜糧字）。”我說：“不論什麼工作，只要對革命有利，我們都是應該做的。夙崗是我們的同志，我們一定會合作得很好。”談至此，即辭出。

從總司令部出來，我與雜糧隨即親至龜山下選一古廟作為指揮部，並委派鄧希禹、黃子偉任秘書。接着又上龜山察看炮兵陣地，見有日本三十年式七生五野炮六門、漢陽仿造克魯森五生七山炮十八尊，炮位布置合法，還構築了臨時掩護工事。詢問炮兵，得知是第八鎮炮兵團的老兵，是訓練有素的。惟山炮口徑小、射程短，不能發揮多大作用；所幸野炮雖已陳舊，尚屬可用。我在龜山瞭望漢口，得見租界外的房屋，大都為清軍焚燬，情狀異常淒慘。平日萬船雲集的襄河，也空無一船。一幅戰時景象，呈現在眼前。我認為，既有這樣的陣地，而清軍却縱火焚燬人民房屋，甘與人民作對，可以說，我們既得地利，又得人和，器械甚窳朽，只要發揚革命精神，是可以取勝的。

二十二日，湘軍統領王隆中率軍到了漢陽，這是武昌起義後首先得到的援軍，人心為之大振。王隆中與我，是日本士官同學。湘軍將領卿衡、魯滌平、胡兆麟等都是湖南武備或陸軍速成學生，尚能團結一致。只是湘軍五十標自杀害焦、陳，擁護譚延闓後，勢力有所擴展，而四十九標奉命援鄂，反而不免向隅，所以四十九標官兵咸感不平。不過自從開來漢陽後，由於大敵當前，大義所在，大家也就沒有什麼議論了，軍心仍很堅固。二十二日夜晚匯報，我把

此事报告克强，克强答应格外加以慰勉。汇报时，在座的除新添王
鏊中一人外，仍旧是谭人凤、李书城、程子楷、吴兆麟、曾继梧和我
几个人。这晚集中讨论进攻问题，谭人凤首先说：

“湘军已到，正好从速进攻，不能拖延。”

克强接着说：

“许多同志都与谭石老所见相同，这是个重要问题，请大家多
多讨论。”

我对此有不同的意见，即说：

“我军士气昂扬，胜敌百倍，这是不待言的。但就现时情况论，
我军兵力单薄，建制已破，新旧兵参差不齐，这也是事实。我认为，
最好是利用长江天堑和各省响应独立的声威，作防御中的攻势准
备，使敌人不敢越襄河一步。再派得力部队渡过襄河扰乱敌人侧
背，牵制敌人，使之力量分散，不敢一意向我进攻，这也是用兵的通
常办法。只要再坚持一月，援军日多，北方定有变化。”

克强不同意我的意见，他说：

“你这办法十分稳妥。不过以今日情形论，即使扼守汉阳不
动，也嫌兵力单薄。”

程子楷插一句：

“防守汉阳，必须巩固蔡甸。蔡甸巩固，汉阳万全。”

李书城立即接上一句：

“蔡甸已派得力部队防守，且与此地相距很近，亦可随时策
应。”

谭石老迫不及待地大声说：

“现在我军士气旺盛，正好进攻，无须迟疑，还是趁热打铁，不
必‘刻舟求剑’的好。”

我看譚石屏的議論，跟我針鋒相對，因而我說：

“石老的話必有所本，能够代表多數同志的意見。我意力主速攻的同志，因为受压迫太久，怀恨甚深；屈蟻求伸，自是热血瀆頂的表現。但这个敵軍，非有堅強的實力或革命的內應，是不可能一擊即破的。事關重大，值得再三思考。”

王隆中初到漢陽，勇氣百倍，也力主速攻。我看主速攻者太多，孤掌難鳴，最后只好說：

“必須就敵我情勢、兵力多寡、訓練優劣，作通盤打算，最好請總司令作出最后決定。”

至此，討論中止。是日各方傳來消息，如桂、閩、粵三省的獨立，海軍的起義，都足以振奮人心。尤其是海軍起義關係特別重大，因为有了海軍巡弋江面，首義的武昌便可解除許多顧慮。

二十四日匯報，同志們莫不意氣昂揚，興高采烈。有的說：“在這樣有利形勢下，即使進攻不利，但因海軍在我們這一邊，敵人也无法飛渡長江；更何況各省都在陸續響應，宣布獨立，聲威之大，足以寒敵之胆。”我對進攻雖持不同意見，然大勢所趨，我也不能執己見。克強因作最后決定，準備進攻。當時總司令所轄各軍兵力如下：

鄂軍：

步兵第一協	協統	蔣肇經
步兵第四協	協統	張廷輔
步兵第五協	協統	熊秉坤
步兵第四標	統帶	胡效騫
炮兵團	司令	曾繼樞
工程第一營	管帶	李占魁

湘軍：

步兵第一協 協統 王隆中(四十九標全部)

湖南巡防營四營 統領 甘興典(約千二百人)

總司令部兵站司令 王安瀾

為了過河進攻，總司令下令工兵營在翠斷口附近架設便橋。總司令於二十六日下令，定於二十七日拂曉進攻漢口大智門之敵，企圖一舉突破，收復漢口。關於攻擊目標、各軍攻擊部署和任務以及各部隊渡河時刻，命令中均有詳細規定。總司令親率幕僚，於二十六日夜隨同各軍前進。我指揮龜山陣地炮兵，準備射擊，以掩護各軍前進。各軍遵照命令渡過襄河。湘軍為先頭部隊，渡河後即向博愛書院堤岸前進，與敵前哨發生了衝突，惟槍聲不密。我在龜山上看得大智門一清二楚。我想，我們這樣堂堂正正的進攻，敵人當然早有準備。我自到漢陽後，每夜聽到敵人機關槍聲通宵達旦不停，而今晚却萬籟俱寂。由是我才悟到：敵軍官長平日為了睡得安穩，不惜犧牲子彈，亂放一陣，表示有備；今夜不同，官長不睡了，各自站在火線上，是準備要跟我們拼一下的。

當前哨戰開始時，離拂曉還有兩小時。我命令向大智門發炮十餘分鐘後，敵炮才對我回擊。在昏天暗地中，敵人的炮彈全落在龜山後面。我們的炮更處於劣勢，也沒有命中目標。經過前哨戰一小時左右以後，遙望博愛書院堤岸一帶，始而大火熊熊，繼而步槍聲拍拍作響，又繼而機關槍聲砰砰齊鳴，最後則炮聲轰轰震動。不到一個小時，這些聲浪漸來漸稀，知道敵人前哨已撤回本陣地了。於是我又下令大小炮位，向大智門猛轟。敵炮不稍示弱，也向我陣地反擊。正在炮戰激烈中，東方漸漸發白。在龜山上，我看到兩軍的動作，历历在目：劇戰經過三個多小時，敵軍總在原陣地膠

着不动，这就说明我进攻部队遇到了顽强抵抗。敌人能够顽强抵抗，必有工事与地形地物的障碍，阻滞我军不得进展。因忆数日前，我谍报报称：大智门一带，地形复杂，障碍甚多，敌火焚汉口市后，又利用残垣破壁，做了许多工事。我想这些工事，如无重炮对直摧毁，是不易攻破的。如今战斗呈胶着状态，我军不得进展，势必受到挫折。果然未到正午，忽见我军有一部分队伍，从博爱书院堤岸后退，未几影响全军，各部队都争先恐后地纷乱溃退。这场暴风骤雨的战斗不终朝而风消云散。从军语上说，我军在这场战斗中，叫做攻击不奏效。不过敌军始终居于被动地位，当我军退却时，并未跟踪追击。对我来说，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实战的经验，也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一次经验。

这天午后四时，克强回到昭忠祠。他跟平日一样，仍然态度雍容，意志坚定，真不愧是个革命领袖。他从来就不以失败归罪于人、成功引为己有，而是遇事引咎自责，所以能够博得同志们的敬仰。这次进攻受挫，他的态度还是如此。有人说：“这次进攻，功败垂成，是因为湖南防营要吃中饭，一部分后退，才牵动全局的。这虽于总司令声名有损，但作战命令对动用辮带口粮已有明确规定，防营不照命令办事，岂能归罪于最高长官？”也有人說：“军队整肃，未经整理，即上陣作战，受此挫折，也是情有可原的。”平心而论，克强抵鄂不过十余日，湘军到汉阳亦不过数日，各军官兵都急于要迅速进攻，革命意志高昂，气氛紧张，也是不能让克强从容加以整理的。总之，在这样情急势迫中，能够指挥进攻，取得主动，即是一种胜利。人们不察其时实情，事后论长道短，不是历史家应有的观点。何况此一战，影响所及，实际上结束了清廷二百六十九年的君主专制统治，自有其一定的价值，事实俱在，岂容抹煞！

克強因進攻漢口失敗，某日找我談話。克強認為，我軍進攻失利，漢陽岌岌可危，要我迅速返湘，聯絡湘省當局，準備一種持久力量。我接受了這個任務，並建議克強，在中山先生未回國以前，負起領導全國革命的責任，及早擺脫漢陽前線指揮任務，馳赴上海，設法攻下南京，作為革命根據地。克強深以為然。越數日，我即回湘；克強旋亦離鄂赴滬。

我回到長沙不久，南京即告光復，從此轉入停戰議和階段，因此我回湘後的活動，就沒有在漢陽作戰時的那麼緊張了。此時間譚延闓的接觸則很頻繁。

辛亥革命後，譚延闓（組庵）以一諮議局議長一躍而為湖南都督，應該是心滿意足、笑逐顏開的。但他終日坐困愁城，眼紅臉黑，感到很苦惱，這是什麼原因呢？其中有這麼四點：一、他好用權術，聯甲制乙，用丙控丁，使之互相牽制，彼此猜疑，而皆傾心于一己，不過以此却使內部意見分歧，不能團結一致。二、革命後，人事安排最不合理，投機者捷足取得高位，有功者依然屈居下僚，以此咸感不平。三、湖南六個師，系由焦達峯、陳作新執政時縮編而成，其中許多幹部為革命元勳，動輒恃功集會要挾，以致紀律蕩然。四、各師有名無實，兵多械少，虛糜國帑，經費異常支絀。組庵面對這個局面，一籌莫展，所以煩惱起來了。一九一二年五月間，他聽到黃興在南京大刀闊斧地一次解散了十幾萬軍隊，風平浪靜，安然無事，使他景慕不置。有一天，他找我密談。他說：

“克公在南京，僅僅兩個月時間，遣散了十幾萬軍隊，沒有發生事故，不知他採用什麼方法，而收功如此神速？”

我針對組庵的弱點，對他說：

“克公公忠休國，解散南京十幾萬軍隊，不是靠留守地位，而是

靠他平日革命的声望取得成功的。”

他紧接着我的口气说：

“湖南經費支絀，养不起許多军队，你看，能否假克公的威望，来一个大裁兵？”

談至此，我对湖南军队情况作了点分析，便说：

“凡是爱国的人，都认为湖南应该裁兵。比如第三师，程子楷和我，便心同理同，具此愿望。第一、二两师，实力較薄，裁兵亦較易为力。应当注重的，反而是四、五两师，如能得到这两师同意，問題可迎刃而解。”

祖庵高兴地說：

“第五师，我可与梅馨商量；但一、四两师則非你去說服不可。”

同时，他并請我到上海走一趟，向克強請求援助。我即說：

“此事一旦洩漏，誠恐发生意外，还是請你另派委員办理的好。我能力办得到的，无不尽力帮助。”

他认为妥善，乃于六月中派机要秘书吕蕊燊赴沪謁見克強，請求克強对湖南裁兵事作出主张。克強不贊成裁尽，主张留两师或三师以应緩急。吕用电报将克強主张告知祖庵，祖庵回电，大意是：裁汰改編，必致发生爭議，不如一律退伍，另建一支新軍，較为妥善。但祖庵手无寸铁，要实行这个方案，甚感棘手。适当时第八师赵恆惕一旅，原系从广西带来的新軍，器械精良，因赵与第八师将领不甚融洽，从南京返桂，路过湖南，如祖庵截留调用，則湖南裁兵得有監視的部队。而第八师也可以新招一旅补充，以解除上述不融洽的矛盾。广西陆荣廷平素厌恶新軍，赵不回桂，亦足以解除陆之顾虑；而于赵旅則得到安身之所。一举四得，皆大欢喜。经过与有关方面的协商，祖庵的裁兵方案就决定了。八月中，赵恆惕率

旅回桂，道經长沙，借炎暑为名，假长沙休养。至是赵旅为組庵截留調用，即开始裁兵运动。組庵求我对第四师作說服工作。我和王隆中是同学，交誼很好，前后与王商談两次，結果他竭诚贊成裁兵。王隆中耿介忠厚，深明大义，殊令我欽佩无已。我把这个消息告知組庵，組庵聞之大快，并亲自与王商談一次。經過以上的酝酿与协商，才正式組織裁兵委员会。委员会开过几次会，我主张每师留二营，加以訓練，作为今后成立新軍的干部，但結果却作出了一律裁撤的决定。决定对各师所有官兵，分別年資与革命功勋，一律优給退伍年金。計共裁撤官兵四万几千人，跟南京遣散軍队一样，沒有遇到阻碍。只有各师学生出身的軍官，事后嘖有煩言，惟因兵心安穩，也鼓不起什么风波。到十月三十一日克強回到长沙时，裁兵已將办理完竣。

克強回到长沙，全省各大中城市居民欢喜若狂，长沙举行了空前盛大的欢迎会。組庵对他推崇备至，事事都听他指示。克強主张：革命党人應該团结一致，政治上展开民权运动，经济上振兴实业，教育上培养人才，多派学生赴欧美留学，軍事上訓練一支新軍，并推荐张孝準任軍事厅厅长。张曾在德、日学习軍事，学識很好；担任过留守府軍务厅厅长，經驗丰富。如张出任厅长，湖南可望建立一支新軍，以为全国楷模。其时，組庵心广体胖，安心做个文治都督，把所有师长，如余欽翼、赵春霖、王隆中、梅馨、蔣国經、向瑞霖一起送赴北京授官給錄。从表面看，湖南局面一时好象海晏河清，于是专心致志筹办第一屆議員选举。至于訓練軍队工作，同盟会的同志都屬望于我；不过我有志兴办实业，在岳阳已筹办一所制革厂，所以对于募兵的事不感兴趣。那时，湖南原武备、兵目、速成各学堂及两湖学兵出身的軍事人才很多，裁兵后他們失业了，而政

府却以为发给了退伍年金，即可安然无事，詎知事实正相反。到一九一三年新年，渐渐舆论纷纭，局面开始出现动荡状态。张孝準建立新军的计划，在四个月中并无若何进展：一则由于祖庵优柔寡断，拖延时日；二则由于孝準人缘不熟，无法推动。而大多数失业军官，则已由口头议论，进而结党成军，企图推翻张孝準。至于政治方面，議員选举结果，国民党虽取得多数，实则全无根基，许多人不仅不知三民主义为何物，并且醉心利禄的官僚分子亦多摇身一变，混入国民党内。幸因宋教仁回湘，一番欢迎伟人的热闹气氛，暂时掩盖了上述的矛盾。

宋于二月十七日回湘，到处演说，力倡责任内阁制，企图以议会为武器来制服袁世凯的专横独裁。我和宋在欢迎会和宴会上，几乎每日见面，可惜无法深谈。因私人款宴招待他，我得閒向他提出三点：一、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内部复杂，即令将主义与政纲降低水平，意志亦不能统一；二、起义各省，其属于同盟会者，有名无实，同志间精神涣散，并无中心力量作为国民党核心；三、袁世凯依靠武力，专横独裁，目无法律，安问政党。有此三点，而欲实行责任内阁制，不能无疑。宋答以实行责任内阁制正所以制服袁之专横，如政治不能上轨道，再作道理。我又劝他，工作应以训练党员为中心。他以为有此必要，并说湖南应从速训练军队。谈话并不投机，草草收场，此后便没再谈了。

宋高湘后，省内骚动即日趋紧张。到三月十三日，退伍军官以兵目学生易堂龄为首，假反对张孝準为名，运动少数巡防部队，围攻都督府，当经卫队击退。翌日查出主使人犯，祖庵大起恐慌，请我到府会商处理办法。我建议：将主谋拘禁，其余从宽，只要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就可迅速解决。祖庵深以为然，即将易堂龄

拘禁，其余从宽一概不究，一场风波，归于平息。

风波平息后，孝準辞职，组庵要我兼任。我早看到国民党与袁世凯的斗争必将尖锐化，湖南关系甚大，即令此时迅速募兵，亦势难挽救危局，我若陷入军事机关，实在用非其才。但组庵坚持要我担任，并谓：“这回风潮虽已平息，但人心浮动，非你出来不足以镇定人心。”至是我乃推荐陈强、程子楷以自代，组庵均认为不可；组庵反挽程子楷与赵恆惕劝解，再三催悉，我始应允。我于三月十五日就职，打算首先成立两团，严格挑选干部，加强训练，作为模范。詎知二十日即有宋案的发生。

宋案发生后，国民党中央一面坚持由法律解决，一面准备实力以应付事变。四月底，由李烈钧发起赣、皖、粤、湘四督秘密联盟，并以黄克强为中心，进行反袁斗争。四省反袁的实力和情况，大致如下：

克强上年在南京解散军队后，又另外编成了四个师，以陈之骥（第八师）、章梓、章翼时、冷遯分任师长。四师靠苏、皖两省财力支持，不虞匮乏，器械也比较精良。假使从建军起，克强能慎选将领，严加训练，则到宋案发生时已有一年之久，南京四师应该业已成为劲旅，足以应付任何事变。无如一年以来，领导无人，致使军队有名无实。例如陈之骥系馮国璋女婿，官僚气味浓厚，旅长黄愷元为湖北富商之子，两人虽具有爱国反满的热忱，却少推倒袁氏的本领。王孝楨（第八师另一旅长）算是耿介之士，但亦非济变之才。章梓虽富于革命性，却为一纯粹文人。其他自部以下，不足深论。这些军队以领导不得其人，所以训练并无成绩，组织亦甚复杂，正如一盘散沙，实无作战能力。南京之外的四省，如皖省军事力量，即包括在南京四师之内，此外别无军队；而在政治上，又意见分歧，尔

虞我詐，在在堪虞。江西軍隊号称兩師，實則只有留守府撥給林虎一團可以作戰，其他皆蹈言過其實之病。廣東僻處嶺外，亦無訓練有素的軍隊，而胡漢民與陳炯明同床異夢，更是致命之傷。至于湖南，已如前述，一兵一卒未練，僅恃趙恆惕一旅，倚為長城。由上所述，可見四督聯盟，軍力異常脆弱，內部團結亦有問題，只不過在政治上提出反袁的号召而已，而四督聯盟之不足以抵抗袁氏的進攻，却早在意料中。加之，黎元洪傾向袁氏，論地利與政治影響，均對四督聯盟十分不利。原來宋案發生後，黎元洪即力主和平，甘為反袁路障。不僅如此，他並利用祖庵依違兩可、反袁不堅決的弱點，先後派金永炎、程守箴來湘作說客，企圖破壞反袁聯盟。金、程以同學之誼，首先以我為游說對象，經我嚴詞拒絕，曉以大義，黎的陰謀遂不得逞。祖庵在湘，也因反袁派勢力占了優勢，只好跟著走反袁的道路，而未為黎氏游說所動；但只要局面不好，祖庵還很有可能發生動搖的。

當時形勢對反袁聯盟不利的因素，還有一點應當提一下。那就是以梁啟超為首的進步黨，已被袁利用為反對國民党的政治工具。正是由於這個緣故，所以蔡鐸才以同鄉同學的關係打電報給我，對我們表示格外關懷，並勸告我們勿走極端。經我復電辯明是非，力言湖南只有與国民党同進退、共始終，不能另作主張，事勢如此，只有各行其是。

在袁世凱一方面，自他就任臨時大總統以來，即着手準備武力統一全國、消滅國民党的計劃，宋案只是這個計劃的一部分。及見宋案發生後，国民党四督有不穩之勢，於是不顧一切，投靠帝國主義，竟向五國銀行團貸款二千多萬鎊，作為消滅異己的費用。袁以段芝貴為第一軍軍長，率第二、第六兩師及毅軍屯駐豫、鄂邊境；以

馮國璋為第二軍軍長，率第四、第五兩師及張勳、雷震春、倪嗣冲各部，分由津浦路與河南兩路向寧、皖推進。軍事布置既妥，才轉而從政治上向國民黨採取攻勢，其步驟有四。第一步，非法殺害《民主報》主筆仇亮，并于五月六日下所謂“除暴安良令”。第二步，暗使北洋將領聯名通電，痛責國民黨利用多數搗亂議會、反對大借款。第三步，惡毒毀謗黃克強，捏造去年季雨霖的“叛變”為黃所指使，張勳、張作霖均指控黃運動軍隊并爭為大總統候選人。第四步，授意北洋各將領呈請“枕戈待命，討伐有罪”。然後，第一軍由豫入鄂，黎元洪敞開大門，任北洋軍隊通行無阻。六月九日，袁下令免李烈鈞贛督職，以黎元洪兼贛督。十四日袁調胡漢民為西藏宣慰使，派陳炯明為粵督。三十日袁下令調柏文蔚為陝甘邊使，派孫多森為統督。四省都督，獨對湘督譚延闓未加處理，僅下令緝拿湖南“叛亂”首犯程潛及附逆程子楷、陳強、唐蟒等人歸案懲辦，同時陰使向瑞琮、唐乾一、楊宏圖等于七月七日火燒湖南軍械局，湘省所儲軍火付之一炬。

當李烈鈞被袁免職的時候，我曾電李力主抗不交代，聯合四省尙可一戰。乃李因受內外壓迫，竟于六月十日遵命免官，交卸赴滬。他至滬後，大受國民黨急進派的譴責，而李又不敢明言江西實力有限，無力抗拒北軍。他迫不得已，乃于七月十二日返回湖口，起兵討袁。袁亦于同日任李純為九江鎮守使，率第六師入贛，戰事由是爆發。時林虎一團已擴編成旅，惟戰鬥力已大減。所以當李純部隊從東北向南昌進攻、敵海軍進入鄱陽湖以後，李烈鈞、林虎就被迫率部退至贛西。

當時南京各師見湖口起兵討袁，亦跃跃欲動，尤以八師下級軍官與士兵又憤填膺，鼓噪特甚。王孝績、黃凱元兩旅長見時機緊迫，乃于十四日赴滬，向克強請示。克強即于十五日偕同兩旅長馳

赴南京，被推为討袁軍总司令，宣布起义。而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反于此时逃往上海。战事开始时，第一师与第八师一部，在徐州附近与张勋部队交锋，迭见胜利。嗣以苏皖战线过长，乃于七月二十二日放弃徐州。克强命前线各军在临淮关构筑工事，令第八师刘建藩团增援前綫，以柏文蔚为临淮关防守司令。柏文蔚因安庆内部不稳，不能赴临淮关执行任务，于是主帅无人，再加以江西战事失利的消息影响士气，于是軍心涣散，各师相率自由撤退。二十九日，克强得悉江北岸军队潰乱情况，在前綫既无可战之兵，在后方又因苏督程德全等不与合作，致无可靠之餉，迫不得已，只好乘日本軍艦而去。

柏文蔚在安庆，因内部受到袁世凱的策动，胡万泰、洪承点等从中捣乱，安庆一夕数惊。柏无力应付，终于八月六日一逃了局。倪嗣冲不折一兵，安然进入安庆。从此长江北岸国民党势力丧失殆尽，仅剩南京孤城一座，坐待北軍攻陷。

湖南方面，我接任军事厅厅长刚刚五天，宋案就发生了。我默察当时局势，认为終必出于一战，所以我的唯一任务，便是抓紧时间，训练军队。計在四、五、六三个月間，成立了三个步兵团与一个炮兵营。进一步拟从巡防营改编三个团，合赵恆惕所部桂軍一旅，共为两个师。假使战事能延緩三个月爆发，我在軍事上就有相当把握。但时不我与，战事終于在我尚无准备之时就发生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袁世凱其时也无兵力进攻湖南，但他收买湖南败类向瑞琮、唐乾一等火焚荷花池湖南軍械局，却使湖南军队断絕了軍火来源。湖南当时有以上两方面的困难，但国民党人反袁的斗争并未因此稍衰。例如譚人凤、蔣翊武等由沪由汉速袂来湘，领导反袁运动。又如刘崧衡、邹代藩、周名甫等，組織公民联合会，公

开揭露袁世凯的罪恶，集会反袁，对湖南讨袁运动发生了很大的作用。只因突遭军械局的大变，必须等到粤、赣两省接济的军火运到，湖南才能发动，所以迟至七月二十五日才宣布讨袁。讨袁军成立，以程子楷为第一军司令，赵恆惕为副司令。湖南作战，主要是集中力量援赣；至于湖北方面，袁氏既利用黎元洪为盾牌，我亦可利用黎元洪为缓冲，以此只派一部分部队防守边境。这时，江西方面因湖口已被攻陷，赣军苦战兼旬，已到精疲力竭的地步。至敌海军驶入鄱阳湖以后，南昌告急。我因派唐蟒率军从萍乡进入新喻，掩护赣军主力集中。无如赣军节节败退，渐成瓦解之势。最后李烈钧、林虎仅率残部千余人，于八月八日退保赣西，幸得我军支援，并收容其逃散士兵，李、林二人才得从容入湘，并由我军保护他们离湘赴日。赣军战败，已使谭延闿心神不定，至八月八日得到陈炯明弃职潜逃的消息，他更感不安。他此时又眼红面黑，大起恐慌了。于是跟我密商，他说：

“湖南在上月二十五日宣布独立，从当时环境看，可以说水到渠成，除独立外别无第二条路可走。现在我们处于四面楚歌之中，孤立无援，取消独立，也可以说是瓜熟蒂落。我想取消独立，依靠黎元洪担保，可免生灵涂炭，还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你以为如何？”

我深知祖庵的意思，因说：

“我很谅解你的苦衷。黎元洪的代表金永炎来长沙时，我对金说过，湖南宁为玉碎，不愿瓦全。今日事势如此，玉碎不能，瓦全亦难。但黎元洪倒在袁氏怀中，他无实力，其本身已是‘皮之不存’，湖南以他为护符，真所谓‘毛将焉附’。你的办法，只不过暂时避免危险而已，将来演变，仍然未可乐观。我决意马上辞职，把一切责任都推在我个人身上，这样做，你对袁氏也有话说。”

組庵甚是高兴，但仍装出一付共患难的样子，說道：

“不能把一切責任都推在你身上，所有罪惡皆归于我。”

談至此，再也沒有什麼文章可做了。于是組庵于八月十二日通電取消獨立，待罪查辦。我呢，一面設法保護同志高湘，一面辦理移交。當時如譚人鳳、蔣翊武、程子楷、陳強、周震鱗、唐蟒等，都是由我設法，使他們潛往上海轉赴日本的；其中只有蔣翊武一人，不願經過漢口，改走桂林轉香港，竟為陸榮廷所害，迄今回憶往事，仍感痛恨。組庵宣布取消獨立後數日，公民聯合會劉崧衡等，因痛恨譚氏二三其德，遂組織一部分黨員進攻都督府，遭到失敗，劉亦為譚所殺害。我掩護同志高湘的任務完成以後，办好移交，也就于八月底長途赴滬，一路改作商人打扮，得以混過密探耳目，安全抵滬。在滬流離月餘，十月底便到東京作亡命客了。後兩月，譚延闓由黎元洪、熊希齡担保入京待罪，黎亦被迫離鄂入京，過其“瀛台生活”。

廣東方面，胡漢民與陳炯明不能合作，前面已經提到。再加上內部情形複雜，派系門戶之見很深，更難以團結一致，全力討袁。如新軍有陸軍、海軍，舊軍有防營、綠營，各自為政，不相統攝，東江潮汕，南路瓊崖，可稱軍隊如林，土匪亦如林。上年姚雨平率一軍開赴南京，實際上只有一混成旅，調回廣東後也未加整理訓練，使之成為可以統攝各種雜牌軍隊的中心力量。所以坐令地方雜牌軍隊為袁世凱所收買，到七月十八日陳炯明為勢所迫宣布獨立之時，汕頭莫擎宇、南路陳德春、惠州鍾鼎基等部，從暗中反對，根本也就動搖了。到八月六日，陳炯明見大勢已去，只好一逃了局。

癸丑討袁之役，就我所知，已如上述；至于上海戰事、福建孫道仁、許崇智和重慶熊克武的宣布獨立，因我未親歷其境，不敢深談。

武昌起义前后到二次革命*

吳 玉 章

榮 县 独 立

一九一一年四月的广州起义失败后,我和洪承点、熊克武等又匆匆地到了日本。因为洪承点刺死了叛徒陈鏡波,在香港不能久待,所以我们走得很急。到日本不久,我看见铁路风潮兴起,估计革命运动会继续发展起来,便决心回国参加。六月,我回到上海。这时,以宋教仁为首的一些同盟会员正在上海搞了一个同盟会的中部总部(中部同盟会)。这个组织虽号称同盟会的分支机构,实际上是在那里闹独立性。不过,它主张以长江流域为中心、在中国的中部发动革命,而反对在边疆继续搞武装起义,这个意见在当时却是正确的。当时,全国各处都曾不断地发生饥民暴动和抗捐抗税的斗争,其中尤以长江流域和山东一带最为普遍。一九一〇年春,长沙发生了规模巨大的饥民抢米暴动,参加者二万余人,把巡撫衙門和外国教堂都给烧了。同年夏,山东莱阳又爆发了几万人的抗捐起义。一九一一年,长江流域大水成灾,饥民暴动和抗捐斗争更为发展。例如湖南浏阳一带和浙江杭州、宁波等地饥民的

* 本文是吳玉章同志为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而作的《从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一文的最后一部分,标题是编者加的。

搶米斗爭，規模都是很大的；同時，上海、漢口等城市的工人斗爭也日趨活躍；再加以鐵路風潮的發生，就使得革命潮流更為高漲起來。中部同盟會雖然沒有自覺地看到這種革命運動發展的趨勢，但它所規定的活動方針在客觀上卻是符合於實際情況的。我在上海並未停留多久，也沒有見着宋教仁。但宋教仁他們卻給我安上了主持四川同盟會工作的名義；這大概是他們覺得張懋騷資望不夠，因而故意把我的名字放在他的前面，其實，我並未與聞過這件事。隨後，我從上海到了宜昌。一路上看到人們都对清朝政府十分不滿，而對革命極表同情；到宜昌又看到那裏的川漢鐵路職工正在為保路而斗爭；這一切使我預感到有什麼非常的事件即將發生。在宜昌，我們換乘專門行駛川江的蜀通輪船。這輪船雖說十分簡陋，由一只機器船牽帶着一只拖駁船並行前進，但比我們當年出川時所乘的帆船說來，已經安穩而又迅速多了。就是這樣一只簡陋的蜀通輪船，也竟然要請外國人來管理。不僅技術人員是外國人，連船長也是外國人。這位外國船長擺着帝國主義者的架子，對中國人十分凶狠。因為船上人多很擠，天氣又熱，所以到晚上有很多旅客到划子上去睡覺，而把划子系在那只載人的拖駁船上。到第二天清早，輪船的服務人員並不等旅客全部登輪，只是由機器船上的洋人鳴笛一聲，就立刻開船，並且用刀砍掉系繩，將划子上的旅客棄置不顧。這些旅客，剛從夢中惊醒，即見輪船開走，無不倉皇失措。而且輪船急駛，風浪很大，幾乎要把划子淹沒。於是這些旅客便大聲怒號，高呼求救。看見這種情景，我心中實在難以忍受，復用言語激勸輪上旅客，一齊到飯廳裏開會。全船旅客對這件事情都很忿恨，因此便喧嚷起來，痛罵洋人不顧中國人的性命，太不講理。那位洋船長在機器船上聽到人們叫罵，非常生氣，竟把他的手槍取出

示威。但是，人們毫不畏懼，由於更加憤怒，罵聲反而更高。這時，船上的買辦見眾怒難犯，便將那洋船長勸回房裏去，並把那些被棄的旅客接上船來。一會，只聽得那買辦對船長說道：“這幫人都是留學生，誰也惹他們不起。”呵！原來你們只怕留學生，我要你們看看中國老百姓的厲害。我於是繼起向旅眾演說團結救國的道理，一時人們的情緒又復高漲，紛紛議論不休，吓得那幫洋人和買辦低頭無語，再也不敢導舛了。

我經過重慶的時候，見到了謝持、楊庶堪等同盟會員。這時四川的鐵路風潮已經鬧得很大了，但重慶的革命黨人卻沒有大舉起事的圖謀。他們只派了朱之洪為鐵路股東代表，到成都去作些合法的鬥爭。朱到成都後，也參與了成都革命黨人的一些革命活動。我在重慶住了一日即繼續趕路回家。路過永川時，我看見滿街都掛着黃布，到處都扎起“皇位台”。台上供着光緒帝的牌位，兩旁寫着一副對聯：一邊是“鐵路准其民有”，一邊是“庶政歸諸輿論”。這是從光緒帝的“上諭”中摘出來的兩句話，用以作為爭路的根據的。市場兩頭的口子上，還有“文官下轎、武官下馬”的牌子。一切全和皇帝死了辦“皇會”一樣。這種情形，乍看起來覺得非常可笑，但仔細一想，確是一種很高明的鬥爭方法。它既適合於當時人民羣眾的覺悟程度，又剝奪了統治階級任何反對的借口，而且無論什麼官員打從這裡經過，都得下來步行，完全喪失了他們平日的威風。這種鬥爭方法雖是由立憲黨人倡議的，但毫無疑問也是得到革命黨人同意的。立憲黨人取其溫和而無犯上之嫌，而革命黨人則利用它來廣泛地吸引羣眾參加革命鬥爭。立憲黨人用光緒帝的“上諭”來為自己服務，而革命黨人又用立憲黨人的方法來為革命服務，這段歷史的發展是多麼的有趣啊！

在“孟兰会”(七月十五)^①以前,我回到了家乡。一天,我往荣县城里去。走到南门外,看见一个人带着队伍,远远地走在我的前面,等进城后走到跟前一看,原来这个人就是龙鸣剑。他自从在成都用“水电报”发出起义的号召以后,马上赶回荣县,参加了王天杰等人发动的起义,组成了一支武装,现在正要率领这支起义队伍,前去攻打成都。他一见我,非常高兴,对我说道:“你回来就好了。同志会由蒲、罗等立宪党人领导,作不出什么好事。我们必须组织同志军,领导人民起来斗争,才有出路。我马上要到前线去,一切大计划你细心筹划吧!”这样议定之后,他便和王天杰领着一千多人的起义军直赴成都去了。当出城的时候,龙鸣剑异常激愤,他拔剑起誓道:“不杀赵尔丰,决不再入此门。”同行的军士们都很感动。

龙鸣剑、王天杰没有到达成都,在仁寿附近即和清军遭遇,发生战斗。随后他们又与秦载赓率领的起义军会师,组成东路民军总部,由秦载赓、王天杰任正副统领,龙鸣剑任参谋长。东路同志军与清军转战于仁寿和成都附近一带,因装备悬殊,补充缺乏,在秦皇寺作战失利。于是龙鸣剑、王天杰乃分兵改道攻取嘉定。接着他们又进兵叙府。在行军途中,龙鸣剑以积劳成病,更兼作战不利,病况愈恶,后来竟在宜宾乡下含恨而死。龙鸣剑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奋斗一生,特别是在四川的保路运动中,他起了重大的作用。他运用正确的策略推动着革命运动的发展,而当时机成熟时,他又毫不迟疑地立即发动武装斗争。^②在辛亥这年最紧张的夏天,他冒着盛暑,往返于成都、荣县的途中达六七次,这种为革命事业而不辞劳瘁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佩。正因为这样辛勤的工作,

^① 本文夹注内的月日,凡未标明阴历或阳历的,都是指阴历。

——编者

才損害了他的健康，喪失了他的生命。他臨死之前，仍念念不忘革命工作，並對王天杰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意見。他雖死在異鄉，但入葬的時候，羣眾自動前往送葬的竟達一萬二三千人，可見他是多么受著羣眾的愛戴。象龍鳴劍這樣的人，才是辛亥革命真正的英雄，但過去的一些資產階級“歷史家”却不怎樣提到他，這是極不公平的！但是，只有人民羣眾才是歷史的創造者和歷史的裁判者，既然羣眾是那樣地擁護他，“歷史家”縱然不肯秉筆直書，他最後也是不會被埋沒的。

自龍鳴劍、王天杰率領起義軍離開柴縣以後，我便承擔起後方的全部責任。就是龍鳴劍起程的那天，柴縣城裏的大地主張子和請客，我也被請去了。席上有人持大地主、大當舖老板郭愼之上縣官一稟，說什麼“三費局”（征收局）被匪（接指龍鳴劍、王天杰）劫去了八百兩銀子，要張子和簽署。我一看即問張子和道：“龍鳴劍和王天杰領著同志軍去打趙爾丰，是替我們大家爭鐵路、爭人格，他們是為國爭權、為民除害，做的是正大光明的事情，怎么能說他們是土匪呢？”被我這麼一問，滿座的士紳們都啞口無言。我於是繼續說道：“同志軍到前綫去為我們打仗，我們在後方應該繼起支援。我提議全縣按租捐款，替他們籌軍餉。”對於我的提議，他們心里雖然不贊成，但卻沒有人敢出來反對。席散，我即召集各方人士商議，通過了按租捐款的辦法，就這樣為同志軍解決了餉糈問題。有了經費以後，我更加緊訓練各鄉民團，並且還開了一個軍事訓練班，準備不斷擴大隊伍，支援前綫。

當龍鳴劍病重離開部隊以後，王天杰感到孤單，便率領部隊回到柴縣。清朝政府的柴縣知縣和郭愼之等土豪劣紳一聽到消息就都逃走了。王天杰等來找我商量辦法。我提出應立即宣布獨立，

自理县政,大家都很赞成。这时,广安县的同盟会员蒲洵因来与我联系工作,正住在我的家里。我考虑到本县人出来管理县政,容易惹起纠纷,于是便想请他来主持荣县民政。我征得他本人同意后,便提出来请大家讨论,大家一致拥护。九月二十五日(八月初四),我和王天杰等在城内召集各界开会,由我发表演说,宣布荣县独立,并提议蒲洵主持县政。大家都知道我是刚从东京同盟会总部回来的人,自己不图官职,却把蒲洵推了出来;而蒲洵也是同盟会员,并且又是外县人,与各方面全无矛盾;因此都很满意。于是,在一致欢呼声中建立了荣县的革命政权,从此,东路民军也有了一块根据地作依托了。

荣县起义,发源于八月初,比武昌起义要早两个月。荣县宣布独立是九月二十五日,比武昌起义也早半个月。因此,它的影响很大,成为成都东南民军反清武装斗争的中心。在荣县独立的前后,起义军还曾经占领过彭山、眉州、青神、井研、名山、洪雅、夹江等十数州县,但都旋得旋失,没有得到巩固。只有荣县建立了革命政权,并且一直坚持下去。辛亥革命胜利以后,蒲洵还在荣县作知县,他的政声很好,受到群众拥护,替当时的革命党人保持了荣誉。

我们虽然在荣县站住了脚,但小小一县的革命政权,是难于单独存在的,因此必须向外发展。我们首先去攻威远,马上就攻下了。再攻自流井,却遭到大队巡防军的抵抗,相持不下。这时武昌起义已经爆发了。我们由于被敌人严密封锁,并不知道外边的情况,只是从各种风传中听说湖北革命党造反,有一个姓黎的当了都督。这又引起了我们的疑问:既是革命党人起义,就应该打出孙中山先生的旗号,怎么会钻出一个姓黎的人来呢?我们局限在一个地方斗争而不了解整个局势的发展,真是苦闷极了。我们必须和

外面取得联系！

武 昌 起 义

当时的传闻倒也不是假的。传闻中所說的湖北造反就是革命党人于十月十日发动的武昌起义，那个姓黎的都督便是黎元洪。

武昌起义的爆发并不是偶然的。它一方面是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结果，而四川沸腾的铁路风潮和全民性的武装起义更是促使武昌起义爆发的最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它又是两湖革命党人长期艰苦工作的结果，而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有效活动又是武昌起义能够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原因。

早在一九〇四年，武汉就出现了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等革命团体。日知会的会员分布在湘、鄂两省，同盟会成立后，他们纷纷加入，因此，后来日知会差不多成了同盟会的分支机构。萍、浏、醴起义时，日知会曾经图谋响应。一九〇六年，日知会遭到破坏，刘静庵（敬安）、胡瑛、季雨霖、李亚东、张难先等被捕入狱。一九〇八年七月，革命党人在武昌拟组织军队同盟会未成。七月，杨王鹏等人发起在新军中组织军治学社，并刊行《商务报》，积极鼓吹革命。一九一〇年，军治学社拟乘长沙的抢米风潮举行起义，引起了湖广总督瑞澂的注意，遂改名为振武学社，表面上宣称讲求武学，暗地里从事革命活动，扩大革命组织。一九一一年初，因遭受挫折，又改名为文学社，以研究文学作掩护，而积极地在新军士兵中发展革命组织。同时发行《大江报》，从事革命宣传。文学社的主要分子为蒋翊武、詹大悲、杨王鹏、刘复基、李六如等，社员至一九一一年七月，已有五千多人。当时湖北的新军共计不过一万六千人左右，而文学社员却占了这么大的数量，可见作为清朝反动政府支柱的新军，

已經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由于革命党人的工作,而一步步地革命化了。此外,共进会在两湖地区也拥有一定的力量,这时湖北的孙武和湖南的焦达峯等,正在共进会的名义下,积极从事联络会党的工作。一九一一年夏,中部同盟会在上海成立后,极力策动共进会和文学社合作。经过多次协商,这两个群众基础较好的革命团体终于联合成功。八月,他们鉴于四川的铁路风潮已开始发展为武装起义,感到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共同组织了一个领导机构,准备大举起义。起义的临时总司令部设在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由蒋翊武任总指挥,孙武任参谋长。

九月初,清朝反动政府被四川人民的革命斗争吓坏了,连忙派端方从湖北调一部分新军入川镇压,湖广总督瑞澂知道新军中潜伏着大批革命党人,所以新军调走,他非常高兴。但革命党人却恐新军分散,于革命不利,因而急谋迅速举事。九月二十四日,革命党人举行会议,决定在中秋节(阳历十月六日)发动起义。此后,武汉的街头巷尾,到处都传遍了中秋节杀鞑子的故事,风声越来越紧。这时,瑞澂才感到军队调走,防务空虚,恰好给革命党人造成了良好的机会,给自己带来了无穷的困难,不仅从前的高兴化为乌有,而且吓得心神不安,坐卧不宁,竟自把行轅设在兵舰上,每天偷偷地到那里去睡觉。

72 由于准备工作没有做好,原定的起义日期被推迟了十天。谁知十月九日(八月十八)的上午,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制造炸弹的时候,不慎失事,孙武头部受伤,机关遭到破坏,所有起义的旗帜、符号、文告、印信均被搜去。因为起义计划暴露,怕迟延遭到损失,蒋翊武便以总司令的名义发出紧急命令,决定当天午夜起义。这一命令还没有完全传达下去,武昌小朝街的起义总部和其

他許多机关，都又遭到破坏，起义的領導人員大批被捕，蔣翊武乘机逃走。这天晚上，瑞澂一方面殘酷地杀害了被捕的的起义領袖彭楚藩、刘复基、楊宏胜三人，一方面禁閉城門，封鎖營門，根据所获名册到处搜索起义分子，弄得滿城风雨，空气十分紧张。一时人心惶惶，謠言四起，不但革命分子人人自危，就是与革命党人稍熟接近的人，也都惴惴不安，大家都感到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斗争。

十月十日(八月十九)，瑞澂根据名册繼續大索革命党人，并揚言要把革命党人斬草除根。这样一来，武汉三鎮完全陷入恐怖的气氛中。至此，新軍中的一些革命分子便决心起来反抗，以图死里求生。当晚七时，住在武昌城内的新軍第八鎮工程第八营后队，其中的革命党人熊秉坤、金兆龙等正欲行动，被排长陶启胜发觉。陶命左右綁金，金大呼“同志动手”，全队士兵齐声响应。反动軍官或被击毙，或闻风逃走。起义士兵四十余人，在熊秉坤的率領下，一直向楚望台軍械局进攻。当夜在楚望台防守的工程营左队士兵，也紛紛起来响应起义，于是軍械局遂被起义軍占領。这时武昌城各处革命党人听见枪声，也紛紛起义，并不断奔赴楚望台。经过大家計議，决定进攻督署，捕杀瑞澂。但因部队紛乱，缺乏指揮，进攻不克。这时，起义的士兵越来越多，起义的范围越来越大，熊秉坤感到指揮困难。恰好这时有一个士兵把工程营左队队官吳兆麟找到了。吳是在楚望台士兵响应起义时乘隙逃跑的。由于他平日在士兵中还有一些信譽，所以現在被大家推为临时总指揮。吳当即根据情况，提出作战方針，同时又申明紀律，重新发动对督署的进攻。瑞澂在猛烈的进攻下，破墙而出，逃上兵艦。其余清朝官員，也都在起义的枪声中逃得干干净净。至十一日上午，武昌遂为起义軍

完全占領。

起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由誰来負責領導呢？当时在起义軍方面，从前的領導人員或則被捕，或則逃亡，正是羣龙无首。他們在吳兆麟等人的建議下，把从前的新軍協統黎元洪找出来做了都督，把从前的諮議局議長湯化龙找出来做了民政总长。湯化龙是一个著名的立宪党人，根本就不贊成革命。至于黎元洪，不但从前殘杀过許多革命党人，就在起义那天晚上，他还手刃了一个送信的革命士兵，后来見起义勢盛，才逃匿在他手下的一个幕友家里。当吳兆麟派人去請他的时候，他吓得渾身发抖。他見了吳兆麟，不但肯擁護起义，反而責問吳为什么造反。以后大家把他擢为都督，他还是不敢在安民布告上签字。后来別人強迫把他的辮子剪了，他还为那条奴隶的标志哭了一場。等到起义的第三天汉阳光复，第四天汉口光复，一直等到十月十七日，駐汉口的各国領事都宣告“中立”以后，黎元洪才宣布就任都督的职务。武昌起义的結果既然是由黎元洪、湯化龙这样的人物出来当权，那末，它以后逐步走上和反动势力妥协的道路，就絲毫也不奇怪了。

随着武昌起义的胜利，各省也紛紛响应，宣告独立。清朝政府二百余年的反动統治，很快就陷于土崩瓦解的状态中。但是，各省的情况也和武汉相差不多，革命的果实沒有落在人民的手中，而是被一些軍閥官僚和立宪党人篡夺去了。

內 江 起 义

端方自从九月初奉到清朝政府“入川查办”的命令以后，即率領大队鄂軍，“浩浩蕩蕩”地杀往四川。但是，他的队伍还没有到达成都，武昌起义就爆发了。在端方的鄂軍中，有很多的革命党人，他

們一進入四川，便極力想和四川的革命黨人取得聯繫。鄂軍後隊中有一個名叫田智亮的革命黨人，在萬縣遇着了四川的革命黨人張頤。經過他們的密商，決定派人到資州一帶聯絡前隊士兵，發動起義，捕殺端方。端方剛入川的時候，雖然其勢洶洶，但愈往前走，愈發感覺自己陷入了人民羣眾層層的包圍之中；加以武昌起義的消息傳來，更吓破了他的肝膽；所以到了資州，他便躊躇起來，再也不敢貿然前進了。他雖然派了一支隊伍，去援救在自流井被民軍所困的巡防軍，但也只走到內江和威遠交界的界牌地方就停下了。這時，我們民軍方面，對整個大局並不了解，只見久攻自流井不克，巡防軍愈聚愈多，而端方又派兵前來，便感到形勢十分嚴重，因此人心不免有些驚慌。同志們都要我趕快想辦法。我於是和大家約定：由他們堅守陣地，我到外面去搬救兵。我說：“只要你們能堅決死守，一星期以後必有救兵來到。”我早先就從孫武那裏知道新軍中潛有許多革命黨人，現在端方領兵來到，我相信孫武他們是一定會派人來找我的，所以我才敢這樣大膽地說。同志們因我從來不說假話，對我很有信仰，所以听了我的話以後，情緒十分高漲，都願意死守待援。我看見這種情況，也就比較放心了。十一月二十一日（十月初一），我同吳庶成二人偷偷地越過敵人防線，走到貢井一個同盟會員家裏住了一夜。這位同志潛伏在敵人的警察署裏工作，成天地盼望民軍打來，他好率部響應。我們把他那裏的工作部署好了之後，又連夜輕騎趕赴內江。內江的革命黨人很多，在廣州起義時犧牲的烈士喻雲紀的家也在那裏，極便于我們藏身和進行工作。我們於二十三日（十月初三）到達內江，住在喻烈士的家裏。這時恰好有端方的隊伍經過，我們很快就和其中的革命黨人接上了頭，決定由他們到資州殺掉端方，我們在內江發動起義。

十一月二十五日(十月初五),端方的队伍果然在資州起义了。平日驕橫不可一世的端方,这时竟在起义的士兵面前哀求免死,胡说什么他祖先原本汉人,隶入旗籍还不滿四世……,想以此騙取一条活命。但是,对于这个作恶多端的无耻家伙,起义的士兵們毫无怜惜地把他杀死了。士兵們公推革命党人陈鎮藩为入川鄂軍的統領,而陈也就馬上派人到內江来与我联络。

十一月二十六日(十月初六),內江的县知事听到了端方在資州被杀的消息,便立即逃走了。巡防軍接着也逃跑一空。有人到喻云紀家来找革命党人。我們于是决定立刻行动,并且馬上到了团練局。这时有些革命同志正在那里同团練局长謝仲輝談判。謝说什么土匪来了他可派兵去打,同志軍来了他可派人交涉,如果鄂軍来到,治安問題他就无法負責了。我当即回答說:“治安問題完全可以保証,但你必須首先将团練局交出。”謝不肯答应,聚集在外面的羣众便大声怒吼:“非交不可,一定要交!”謝不得已才允許交出。我們于是立即将团練局接收。接着,喻云紀的父亲和当地同志便去召集羣众,在天后宫的大戏台前开会。一时前来参加的有好几千人,情緒空前热烈。当由我上台宣布革命宗旨,主张建立革命政权,羣众听說,欢呼万岁,声震屋瓦。當場通过成立內江軍政府,并一致举我为行政部长,吳庶成为軍政部长。当成千的羣众把我們拥到县署去办公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到羣众力量的伟大,真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絲毫不爽。

成都的革命党人,知道我曾經組織过共进会,而共进会与新軍素有联系,因此,当端方的队伍逼近成都的时候,他們特派康宝忠和董修武两人赶到我家,邀我到成都去策划起义。他們到我家扑了个空,又跟踪追到內江,正赶上內江起义成功。他們到县署一見

我就說：“省城的同志都准备好了，专等你去，好发劲起义，我們立刻一起动身吧！”我說：“这里今天才組織起来，不能馬上离开，你們請先回去，告訴同志們努力奋斗，我一星期后就到。”就这样，他們便赶回成都去了。

陈鎮藩派人和我們取得联系之后，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十月初七）率軍来到內江，我們特开大会表示欢迎。內江人民看見这么多装备精良的軍隊和人民站在一起，情緒更为兴奋；起义軍隊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也非常感动。在欢迎会后，我要陈鎮藩把軍隊留在四川，共图大举。他說：“現在軍心思归，而且武汉方面战争还很激烈，我要赶快率队回鄂，替革命効力，但求你們沿途替我疏通，我就万分感謝了。至于四川的事情，还望四川同志好自为之。”随后，他送了我們快枪四十余枝，我們也送了他一千五百两銀子，并且告訴了他沿途联系的方法。就这样我們便匆匆地分別了。

我們在內江举行起义的时候，还不知道重庆已經在十一月二十二日（十月初二）宣布独立。原来十一月五日，夏之时就在成都附近的龙泉驛率部起义。夏是四川合江人，曾經留学日本的东斌学校，并在那里加入了同盟会。他毕业回川后，在清軍中担任排长，驻扎成都。当四川保路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他看到革命的时机已到，便准备发动起义。是月，他奉命率領步兵一队駐守龙泉驛。他趁此时机，踴地向士兵們进行革命宣传，士兵們都很感动，愿意随着他参加革命。这时駐在龙泉驛的还有騎兵和輜重兵各一队，夏又派人去进行宣传，結果这两队的士兵也愿意和夏部一致行动。到了十一月五日的晚上，夏之时集合三队的官兵二百余人，在驻地附近的一所庙里宣布起义，當場將駐龙泉驛指揮的东路卫戍司令魏楚藩处死。这天晚上，恰有新軍教練官林畏生奉赵尔

丰的命令，前去迎接端方，正好住宿龙泉驛。他听到庙内欢声大起，赶忙前去察看。有一个士兵臥譏他，馬上举枪对他射击。夏之时立刻起来保护他，因此他虽然受伤，幸免于死，并且还参加了起义队伍。起义成功后，士兵們一致推举夏之时为革命軍总指揮，当夜整装东行，直奔重庆。由于当时端方的部队駐在霽州，所以他們繞道取小川北路綫东下。他們沿途受到羣众的欢迎，并不断地扩大了革命队伍。十一月二十一日(十月初一)夏軍到达重庆近郊。当夏軍接近重庆的时候，重庆的革命党人競派人前去与他取得了联系。十一月二十二日(十月初二)夏軍在城内革命党人的协助下，胜利地开入了重庆城。由于夏軍的到来，清朝反动政府在重庆的官吏見大势已去，除个别逃跑者外，其余的都被迫向革命党人投降。当天，重庆各界羣众在朝天观举行大会，成立了蜀軍政府，推举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并通电全国宣布独立。

重庆蜀軍政府成立后，一再函电催我前往。这时我已知道武昌起义成功，全国紛紛响应，我把整个大局仔細考虑之后，觉得必須与领导全国革命的总机关取得联系，才好进行工作。因此，我把内江的工作安頓就緒之后，便于十二月二日(十月十二日)起程，連夜赶往重庆去了。

重庆軍政府的軍事裁判会

重庆蜀軍政府成立后，立即組織军队，准备西上討伐成都。这时，在全国和全省革命潮流的袭击下，成都发生了一系列的政变。

自从端方在霽州被杀，内江起义成功，进攻自流井的民軍，因此也取得了胜利。于是，成都四周的民軍，势力大振。这时被民軍围困了几个月的赵尔丰，眼看救兵已經絕望，成都早晚要被打开，

他便作这样的考虑：与其被革命党推翻，不如将政权交给立宪派，便于保存实力。就这样，十一月二十七日，在立宪党人和赵尔丰的勾结下，成都扮演了一出“独立”的滑稽戏，成立了所谓“大汉四川军政府”，由立宪派头子蒲殿俊担任都督，赵尔丰的心腹新军统制朱庆澜担任副都督。至于赵尔丰，仍被委以办理边防的重任，实际上操纵着军政大权。对于这样的“独立”，人民当然不会满意。各地民军都以“索赵”为号召，继续向成都进攻。这时，赵尔丰已确知清朝中央政权尚未垮台，于是又阴谋复辟。十二月八日，蒲殿俊到校场点兵，巡防军在赵尔丰的唆使下，发生哗变。蒲殿俊从此躲藏起来，连都督也不敢当了。四郊民军看到这种情形，非常愤慨，便相率入城，将赵尔丰围困在督署里面。赵尔丰的复辟阴谋终未得逞。经过这一场事变，成都军政府为了欺骗人民和敷衍民军，不得不实行一番改组。于是，曾经留学日本的前陆军学堂总办尹昌衡当上了都督，与哥老会有联系的罗纶当上了副都督，同时还拉了几个革命党人来当部长，以资点缀。但是，人民对赵尔丰的仇恨，始终不能平息下来。立宪党人看到不杀赵尔丰，不足以平民愤，将会引起深刻的革命，因此，才不得不借赵尔丰的头来缓和群众情绪。十二月二十二日，尹昌衡和立宪党人依靠着民军的力量，解决了督署的武装，捕杀了赵尔丰。立宪党人在捕杀赵尔丰之后，便马上回过头来对付民军。在他们软硬兼施的进攻下，缺乏正确思想领导的民军首领，有的被腐化收买，有的被残酷杀害。于是，轰轰烈烈的起义运动，竟被瓦解，人民艰苦斗争的果实，竟被立宪党人夺去了。

从这一系列的事变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赵尔丰是清朝反动统治在四川最顽固的代表者，他曾经用尽一切办法，来挽救清朝反动政府在四川所遭遇的危机，他自始至终没有动摇过对清朝政府的

忠心，以至最后和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同归于尽。以蒲殿俊、罗纶等为首的立宪党人，则代表着四川地主阶级和上层资产阶级的利益，虽然他们也曾假借革命群众的力量，向清朝反动统治者作过一定程度的斗争，但是，他们最害怕的是群众真的革起命来，动摇了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所以，他们对赵尔丰等清朝反动统治的代表者总是特别“宽大”，而对起义群众却格外的残忍无情。至于起义的民军，它基本上是由自发参加斗争的广大下层群众所组成的，其领导成员多半为会党首领，只有少数是革命党人，他们当中有不少的优秀分子（如龙鸣剑等）大多在残酷的斗争中牺牲了，而留下来的人后来却上了立宪党人的圈套，无形中成了替他们争夺江山的工具。但是，无论是争路运动和推翻清朝的功劳，都应该归之于这般的下层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身上。赵尔丰是屠户，立宪党人大部分都是騙子，起义民军大部分都是好人，这并不是什么高论，而是广大人民群众早已作出的历史定评。但是，周善培却不同意这种论断，为此，他特地写了一本《辛亥四川争路亲历记》，把赵尔丰描写成实行禅让的尧舜，把立宪党人视为彬彬有礼之士，而把革命党人和起义群众则看作大逆不道的匪徒。但是，事实毕竟是事实，周善培的无耻妄说，有谁能相信呢？其实，周善培在这次运动中，担负了一个颇不光彩的角色，他曾经以提法使的地位参与了赵尔丰镇压和破坏人民革命斗争的一切残暴行为和阴谋活动。当然，平心而论，他和赵尔丰还是有所不同的，他虽然坐在他的主帅（赵尔丰）的那只船上，但他一看风头不对，就把一只脚踏到立宪党人的那只船上去。因此，他比他的主帅总算要开明些。不过若与他的采帅（王人文）比较起来，他就未免有些逊色了。因为他的这位采帅，曾经为庇护立宪党人而丢掉了官职，也就是说，当他看到清朝政府这只破

船快要沉沒的时候，就从船上跳了下来，而不象周善培那样犹豫不决地踏在两只船上。因此，周善培根本就没有资格写什么《辛亥四川爭路亲历記》，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亲历过四川人民的爭路斗争。他如果为人老实，肯把他們那帮人如何反对四川人民爭路的亲身經歷写出来，倒一定会有許多非常精彩的内容。但他不肯如此，却硬着头皮把他反对爭路的亲历写作爭路的亲历，因此就不免要大鬧笑話了。讀者只要翻开他的书一看，滿紙都是大帅、采佛之类的称呼，他的反动立場就怎么也掩盖不住了。

当重庆蜀軍政府正在組織軍隊准备討伐成都的时候，它的内部曾經发生过一次严重的危机。这次軍事行动，原定由夏之时以副都督的身分亲自領兵出征，而以总司令林長生兼任北路支队长。林对此发生誤会，以为摘掉了他的总司令职权，大为不满。本来林的参加革命就是出于被迫，根本没有什么觉悟，及至当了蜀軍总司令，他自以为过去在新軍中的地位比夏要高，因此，对夏常出不逊之言，态度非常傲慢。现在又誤認夏在故意压抑他，一怒之下，即將支队长的委任文书和一切印信当众撕毀，并且破口大罵，持枪握拳，闖进军政府，声言要找夏之时拼命。而且称手下有一两个团长，更橫行不法，飄容着士兵四出扰民。我到重庆的时候，正碰到这种情形，当时重庆到处街談巷議，人心惶惶不安。而張培爵和夏之时对此却毫无办法。剛剛成立不久的蜀軍政府，差不多陷入了无政府的状态中。張培爵見我来到，非常高兴，連忙要我想个办法。我严正地說：

“只有严明紀律，才能維護革命政教，現在必須召开一个緊急會議来討論这件事情，并准备实行軍事裁判，整頓軍紀。”

張培爵很同意我的意見。这时虽已深夜，但他仍立刻下令召

集全体負責軍政人員开会，不許攜帶武器，并令守卫妥为戒备。一会，人們到齐，會議开始。夏之时首先報告事情發生的經過，請全体討論解决。这时林畏生毫不在意地越來大声說道：“我林畏生罪多得很！砍官防，其罪一也；肅委任狀，其罪二也；辱罵都督，其罪三也；鬧軍政府，其罪四也。看你們敢把我林畏生怎么样！”他氣勢汹汹，說完就坐下。过了許久，沒有一個人敢起來發言。

我看見这种情形，非常气憤，心想既为革命党人，对清朝反动政府都敢起來革命，为什么对这样一員悍将就不敢斗争了呢？于是抑制着憤怒，从容地起來說道：

“我們革命的宗旨是推翻清朝专制政府，实行民主政治，解除人民痛苦，并不是以暴易暴。我們革命党人是不悔嫌寡，不畏強暴的。扶正义，打抱不平，正是我們革命党人的本色。如果我們今天刚一胜利，就橫行霸道，和清朝官吏一样，实在违反革命初衷。”

我沉痛地讲了两个小时，最后主张执行革命紀律，把这个會議变为軍事裁判。全場热烈鼓掌，表示同意。这时林畏生才不时地看我，对我这样一个陌生人的講話，感到惊异。

接着夏之时說：“我是当事人，不便主持裁判。我提議請最近由同盟会总部派来的、孙中山先生亲密的朋友吳玉章同志作裁判长。”大家表示贊成。这完全出于我的意料。我想：由于我的提議才召开这次會議，現在要我来主持裁判，岂不是故意把杀人的事情推給我作嗎？但接着又想：如果推辭，旁人也是一定不干的，事情又怎么解决呢？于是，便毅然接受了大家的推举，并且向大家說道：

“第一，我說明犯罪的行为时必须得众人的同意；第二，我判决的处罰也必须得众人的同意；第三，判决后犯罪人得申訴或声明不

服，并說明不服的理由；第四，判決后一定要遵照執行。必須大家贊成這四個條件，我才能就職。”

大家都說：“這是最公平的裁判法，我們贊成。”

于是，軍事裁判就立即嚴肅地開始了。我詳細地說明林畏生的犯罪行為違背了革命宗旨，危害了人民利益，無異企圖推翻革命軍政府，應照軍政府規定的軍法處以死刑。問大家同不同意，大家表示贊成。于是又問林是否服罪，限他二分鐘以內講話。林却沉默着。又延長五分鐘，他仍不講話。經再四催促，他才說：“說我想推翻軍政府，我沒有這個心思。”

我說：“我不能知道你有沒有這個心思。但判斷犯罪以客觀行動為標準，你的行動是危害軍政府的。”

他再也沒有話講了。于是我就請夏之時執行判決。夏却猶豫起來了。他結結巴巴地說了几句應該特設什麼什麼的話。他的意思是說，裁判既是特設的，執行也應該特設。因為他說得不清楚，有些人就以為是“特赦”。于是他們又反過來為林畏生辯護，說林也是參加了起義的人，應該從寬處理，赦免他。

我堅決反對，認為大家剛才約定的條件，不應該馬上就自己推翻。辯論了一小時，還是沒有結果。有一個激烈的革命黨人憤慨地說：“象你們這樣懦弱畏縮，我就拿炸彈來把大家炸死算了。”大家又紛紛反對他。我說：“不必性急；我試問林畏生這樣蠻不講理的人，誰能保他以後再不作亂事呢？”

這時有一位姓舒的團長起來說：“我保他，我們四團人保他。”

他話猶未了，衛隊中幾個士兵就齊聲說：“就是這個家伙最壞！”因為士兵們說話時過於激動，擠得刀槍碰擊作響，那位舒團長恐怕有人打他，急忙把頭低下去躲藏，猛地一下碰到桌子角上，流

出血来。大家以为士兵开了枪，都赶快逃避。石青阳尤为可笑，竟把茶几顶在头上，跑了出去。这时会场上就只剩下我和张培爵、夏之时、林畏生四个人。林也和张、夏两人一同劝士兵们归于安静。卫兵说：“就是那舒团长劝林司令做坏事。”我说：“现在暂把舒团长扣下，另案办理。今晚还是要把这个案子结束。”

接着又把大家都请了回来。好在军政府戒备很严，没有一个人逃得出去。大家坐定后，我看林畏生并未趁这次扰乱逃走或者有什么不好的表现，也就有从轻处罚的意思了。因此我就和大家商量：“有人说要特赦他，但是谁能替他保证呢？”谢持、朱之洪说他们愿意担保。最后决定立刻解除他的职务，并且派人送他回湖北原籍。

这件事情充分地表现了当时蜀军政府的软弱无力，也表现了当时这些革命党人的畏缩、妥协。然而，经过了这一次严重的斗争，蜀军政府总算得到了暂时的巩固，更重要的是重庆人民都高兴为他们除去了一个祸害。

这时已是一九一一年的十二月了，南京已被民军攻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酝酿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先生也已经从国外回来，首途前往南京。因此，我也准备到南京去。于是，重庆蜀军政府就让我 and 杨庶堪作为它的代表到南京去参加临时政府的工作。

南京临时政府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朝政府非常惊慌，连忙派陆军大臣蔣昌率領北洋军两镇前往扑灭。但北洋军的将领，都是袁世凯的爪牙，蔣昌指挥不动。当时一切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的许多有力人物都认为袁世凯是个“人才”，只有他才能挽救中国反

反动势力的灭亡。清朝政府不得已，只好再度起用袁世凯。袁自从一九〇八年被清朝政府解除职务以后，即在彰德“养病”，而实际上仍然控制着他自己所培植起来的北洋军队。现在，革命兴起，清朝垂危，正是她玩弄权术的绝好机会。清朝政府发表他作湖广总督，他故意坚辞不就。一直等到清朝政府答应了他的全部条件，付予了他以全部权力，并且任命他为内閣总理大臣以后，他才出来组织力量，对革命展开进攻。

有一个名叫朱芾焯的川籍同盟会员，在武昌起义以后，估计到袁世凯一定会得势，便跑到袁世凯那里去进行投机。他去到彰德，看见袁世凯布衣草帽，成天在那里钓鱼，装作不闻国事的样子。朱于是劝袁趁机把清朝政府的军政权力夺取过来，然后投效革命，那么革命方面一定会推袁出来统一中国；并表示他愿意为袁在革命方面进行疏通。袁听了以后，表面上虽然没有什么表示，暗地里却非常喜欢。因此，他把朱芾焯留作策士，待以上宾之礼。不过，袁从清朝政府那里取得大权以后，并不是去投效革命，而是要革命投效他，由他来作中国的独裁者。在袁世凯还未北上组閣之前，清朝政府迫于形势，已经把汪精卫、黄复生等革命党人释放出来了。汪出獄以后，便和北方大官僚、大地主、大买办的代表李石曾等结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京津同盟会。在京津同盟会里面，虽然也有不少真诚的革命分子（如彭家珍等）；但它的主要成员如汪精卫、李石曾等，则专门为袁世凯捧场。他们和中外许多反动分子一样，认为只有袁世凯才能收拾当时中国的时局。汪精卫为了巴结袁世凯，还与他的长子袁克定结为兄弟。

袁世凯既从反革命方面取得了权力，又与革命方面的不肖分子有了勾结，他就可以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操纵自如，而对革命也

既可以打又可以拉了。袁世凱奉命組閣以後，看到革命正在迅速發展，便決定對革命實行進攻。他一方面用計刺殺了準備在石家莊起義的革命黨人清軍第六鎮統制吳祿貞，使反革命的中心直隸和北京得到鞏固；一方面集中兵力，從革命軍手中奪去了漢口和漢陽，並隔江炮擊武昌，使武昌的軍政府受到嚴重的威脅。但是，他並沒有乘虛渡江進擊武昌，因為他需要養敵自重。他於展開軍事進攻的同時，又對革命方面展開了和平攻勢。於是，十二月中旬，在帝國主義的干涉和壓迫下，民軍代表伍廷芳與清朝政府（實際上是袁世凱）的代表唐紹儀達成了臨時性的停戰協定。自此以後，雙方就沒有再發生什麼大的戰事。

本來，武昌起義爆發以後，全國人民的革命情緒空前高漲。在革命黨人的領導和影響下，各省的新軍和會黨紛紛發動起義。到十一月下旬，全國二十四個省區，就已經有十五個省宣布獨立。若把邊遠地區除外，這時清朝反動政府能直接控制的地方已經很少。就是這些地區，也在醞釀着革命。甚至它肘腋之下的直隸省，也曾經爆發過起義。而且，廣大農民還掀起了反封建的鬥爭。例如江蘇、廣東和湖南等省，即有很多農民自動武裝起來，懲辦土豪劣紳，反對封建壓迫。其他各省也都發生過大小不同的農民起義。至於四川的農民鬥爭，其規模之大，除了太平天國運動以外，近代史上再沒有可以和它比擬的。為了保衛武昌起義，起義各省特別是湖北人民曾經作了英勇的鬥爭。無數工人、農民乃至一些知識分子，都紛紛參加起義軍隊，並且在戰鬥中表現非常勇敢。當民軍和清軍作戰的時候，廣大人民更是極力支援民軍，打擊清軍。這說明革命思想已經深入人心，清朝政府的反動統治，再也無法繼續維持下去了。但是，這樣高漲的革命鬥爭，卻沒有一個堅強的政黨來領

导。同盟会自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即已趋于涣散；而至武昌起义以后，几乎陷于瓦解的状态。章太炎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两句话虽是极端错误的，但用来形容当时的情况，倒很合乎事实。而立宪党人这时却很活跃。他们摇身一变，钻入革命阵营，并把革命的领导权窃取而去。昨天还在拥护君主，今天忽然“赞成共和”，许多立宪党人就这样成了“开国元勋”。由于他们的混迹革命，革命方面的矛盾和纠纷更为增加了。因此，武昌起义后，各省虽然纷纷响应，但好久也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领导机关来。当时，武汉和上海之间为了建立中央政权就发生过很大的争执。后来，上海方面让步了，起义各省代表才由上海转赴汉口开会。就在这个时候，袁世凯的反革命军队占领了汉口、汉阳。于是这批代表就跑到汉口的外国租界里去开会。他们不敢讨论如何组织力量，打退袁世凯的进攻；如何推进革命，争取全国的胜利；却在那里咬文嚼字地讨论什么临时政府组织法，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猎取官位的上面。更奇怪的是，他们竟在袁世凯的炮火下通过了一个“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大总统”的决议，充分地暴露了他们在革命初起的时候，就早已作好妥协投降的准备了。

十二月二日，江浙方面的革命军队攻克了南京，于是各省代表决定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在南京临时政府的筹备过程中，各派势力之间又因为争夺权势，闹得不可开交。直到孙中山先生于十二月末回到上海，才打开了僵局。接着，孙中山先生被推为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一九一二年元旦正式宣告成立。但是，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规定，临时政府只设立五个部，粥少僧多，怎能容纳这么多要作官的人呢？这时，有一个叫李肇甫的同盟会员，在总统府秘书处工作，他出身于官僚家庭，懂得旧式官府的

那一套組織，于是由他提出一个扩大政府組織的办法来，把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安置下来了，因此大家都很滿意。这个临时政府，既有立宪黨人，也有官僚軍閥，但革命黨人还是占着主要的地位。它是一个以資產階級为主体的政权。因此，它极力想在中国实现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但是，由于中国的資產階級的軟弱性，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在中国是没有实现的条件的。而且，当时南京临时政府本身就处在风雨飘搖中。孙中山先生当选后，根据事前的規定，立即致电袁世凱，表示和議成功，即当避席。孙中山先生这个总统，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主持和議的总统罢了。

一九一二年初，我到达南京。这时，南京临时政府和參議院都已經組織起来了。当我们还在途中的时候，重庆蜀軍政府即已和成都大汉軍政府达成協議：由双方共同派遣黃复生、李肇甫、熊成章三人为四川省的參議員。因此我們到南京后，即沒有再作蜀軍政府代表的必要了。內务部次长居正和秘书长田桐看見我没有作官，感到非常抱歉，忙对我說：“你来晚了一步，若早来点，怎么也有一個次长当的。現在部长、次长都安置完了，內务部的司长、局长或是參事，你任便选一个吧！”我說：“我們革命不是为了作官，你們且不談这些吧。”但随后他們就給我送来了一张疆理局（即土地局）局长的委任状，我馬上退了回去；接着，他們又換来了參事的委任状，我还是給退回去了。后来，孙中山先生要我在总统府秘书处工作，他对我說：“你来得好，現在正要收拾殘局，很需要你來帮忙。”我于是接受了他的邀請。这时，原来在总统府秘书处負責总务工作的李肇甫已經当參議員去了，我于是接替了他的工作。当时南北和議已成定局。很明显，和議一成，总统府秘书处就要取消。因此，开始很紅的秘书处，現在变成了冷門。从前有很多人到秘书处站营，

現在却誰也不愿来这里工作了。甚至秘书处也有人另作打算，有的干脆到袁世凱那里去找官做。有个叫程明超的，他本来是个旧官僚，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秘书处弄到了一个高位，这时即抱着五日京兆的心理，根本不来办事了。还有一个叫秦毓璽的，他像着自己填写了一张委任状，准备回到他的家乡无锡去做县知事，一时传为笑谈。从这些事情当中可以看出：在南京临时政府中，不仅原来的官僚政客，毫无生气；并且有些革命党人也在他們的影响下，开始蜕化，逐渐地丧失革命意志，而一味追求个人的官职和利禄去了。

袁世凱窃国成功

辛亥革命所激起的广大农民的反封建斗争，由于缺乏领导，并没有深入地展开下去。中国资产阶级本身既很软弱，又不敢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因此，它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强大压力面前，除了退却和妥协之外，再没有别的出路了。孙中山先生刚回国的時候，願不以和議为然。大家推他为临时大总统，他也很失望。因为他在英国的時候，曾經和英国政府議定一笔小小的借款；现在总统既然是临时的，这笔借款当然也就无效了。因此，他对当时的和議条件很不滿意。但是，当时各方面的“輿論”（当然只是上层阶级的輿論）几乎没有不贊成和議的。而一切帝国主义又都极力支持袁世凱，把他視為它們的新的代理人。尤其是英帝国主义，它的驻华公使朱尔典就是支持袁世凱鎮杀革命的主謀者。英帝国主义虽然也和孙中山先生拉点关系，但这就更显得奸詐。正因为中外反动派勾結成功，一致压迫要替和，所以孙中山先生反对和議的主张，遭到当时南京临时政府絕大多数有力人物的非难。汪精卫甚至对孙中山先生說：“你不贊成和議，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嗎？”在各方面

的包围下，孙中山先生后来也就不再坚持己见了。

临时政府成立后，和議繼續进行。南京方面向袁世凱提出：和議成功后，保証举他为大总统；但必須以清帝退位和他贊助共和为条件。于是袁世凱开始逼宮，企图強迫清帝退位。但却遭到滿洲贵族中的頑固分子宗社党人良弼等的坚决反抗。这时，京津同盟会中的川籍會員彭家珍，认为杀了良弼，便可导致共和，使人民安居乐业，因此决定拚死以除良弼。他怎么能够知道他的英勇牺牲，并没有发生多大的作用，只不过是帮助了袁世凱登上总统的宝座呢？彭家珍为了刺杀良弼，曾經用尽心机。他把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之后，特地装扮成一个威武的軍官，穿着整齐的軍服，挂着明亮的軍刀，于一月二十六日，装着良弼的一个好友前去謁見。但那天良弼刚好不在。当晚他又去，良弼又不在。当他刚往回走的时候，在不远的途中恰好良弼回来了。在路上一来一去的两輛馬車相遇，彭就高声叫“寶臣（良弼的号）……”，良弼未应，彭即調轉馬車，跟着良弼的馬車追去。到了良弼的公館，良弼一下車就走近門前，彭也急下車，趁良弼升阶正要入門之时，急投一彈，彭在阶下当即被炸死，而良弼也負重伤，于两天以后就死了。宗社党人因此吓破了胆，同时又看到大势已去，便不敢再坚持帝制了。清朝皇室終于接受了退位的条件。袁世凱的逼宮竟因彭家珍的刺杀良弼而获成功。我們从当时和議双方达成的优待清朝皇族的条件，可以看到南京临时政府是多么的軟弱！

清帝退位之后，和議很快成功。孙中山先生为了保障共和，想出了两个自以为非常高明的办法：一个是頒布約法，想用法律来限制袁世凱；一个是建都南京，想把袁世凱調离北京这个当时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老窠。从二月初开始，經過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南

京的參議院根据資產階級國家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的原則，制定了一部中國憲政史上著名的臨時約法。袁世凱對於這個臨時約法並不怎麼理會，因為他知道這些紙上的東西是可以隨時撕毀的。他特別注意的是遷都北京的問題。二月十三日，袁世凱在給南京的電文中，于通知清帝退位的同时，就表示他不愿南下。二月十四日，南京參議院开会的时候，竟然通过了迁都北京的決議。本來在參議院中，革命黨人占多數，是完全可以根據孫中山先生的意見通過建都南京，反對遷都北京的。但十四日开会的时候，革命黨人李肇甫，却到台上大放厥詞，說了一通遷都北京的必要；參議員中原來就有不少人对袁的不愿南下表示同情，而李又善辭令，他这么一說，贊成遷都北京的人便成了多數。孫中山先生和黃興知道这件事情以后，非常生气，当天晚上把李肇甫叫来大罵了一頓，并限次日中午十二时以前，必須復議改正过来。十五日晨，秘書處把總統提請復議的咨文作好后，需要總統蓋印，而这时總統已動身祭明孝陵去了。我急着去找黃興，他也正在穿軍裝，准备起身到明孝陵去。我請他延緩時間，他說：“過了十二點如果還沒有把決議改正过来，我就派兵来！”說完就走了。這怎麼辦呢？只好找胡漢民去。好不容易才把他找到，拿來了鑰匙，開了總統的抽屜，取出他的圖章蓋了印，把咨文發了出去。同時，并通知所有的革命黨人，必須按照孫中山先生的意見投票。經過我們一天緊張的努力，当天召开的參議院會議終於把十四日的決議糾正過來了。但是，袁世凱并不根據參議院的決議辦事，他表面上不堅持遷都，却故意地提出去就問題來要挾。于是孫中山先生又派蔡元培、宋教仁、汪精衛等为專使，于二月末到北京去迎接袁世凱南下。袁世凱在破格歡迎的伪装下，暗地發動兵變，把蔡元培等人吓了一跳，使得这几个迎

袁专使也觉得对袁的是否南下“尽可迁就”了。至此，南京参议院不得不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孙中山先生的计划完全失败了。

眼看着南京临时政府即将结束，不少的革命党人感到革命的理想并没有实现，内心非常痛苦。当时在南京的川籍党人很多，经大家商榷，决定召开一个四川革命烈士追悼会，对先烈们表示崇敬和悼念，同时借此排遣自己的悲伤。开会的时候，孙中山先生也到了。章太炎则送来一幅挽联，写道：“羣盜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龙蟠虎踞，古人之虚言。”大家看了，不但很觉扫兴，而且感到愤慨。章太炎在同盟会里一贯闹派别纠纷；武昌起义后，又说什么“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主张解散同盟会；随后不久，他便正式宣布脱离同盟会，并和一些立宪党人搞在一起，专门和孙中山先生作对。他骂南京鼠窃狗偷，但当时鼠窃狗偷的大半还是立宪党人，而章太炎不正是和他们沆瀣一气吗？他反对建都南京，认为南京并非龙蟠虎踞；难道北京果真就是龙蟠虎踞的地方吗？很明显，章太炎为了反对孙中山先生，已经实际上站到袁世凯那方面去了。追悼会开完以后，我们又为死难烈士请求追赠。根据我们的建议，孙中山先生以总统的名义立即签署了一道命令，追赠邹容、喻云纪、彭家珍为大将军，谢奉琦为中将。其他各省也有继起仿效的。死者已经安置完了，活着的人怎么办呢？我们秘书处的人，决计不到袁世凯那里去作官。邓家彦因对和议非常不满，一定要出去办个报纸，反对袁世凯。又有人提议继续出洋留学，完成以前未竟的学业，大家都很赞成。当时蔡元培在作教育部长，经过他的批准，大批革命党人获得了公费留学的资格，接着便纷纷放洋而去。其中有不少好心的人，以为民国既经成立，自己就应该学点真实的本事，将来好从事建国的工作。他们当时并不了解：辛亥革命虽然推

翻了清朝反动政府，但繼起的袁世凱仍然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工具。他們更沒有料到：民国成立以后，中国不但沒有兴盛起来；相反，民族的危机和人民的灾难却更加深重了。当时，我也获得官費留学的資格；但是，因为还有許多善后工作要做，所以沒有立刻出洋。

四 川 之 行

辛亥革命以孙中山先生的解职和袁世凱的登台而結束，实际上是失败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並沒有改变，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仍然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但是，当时的革命党人对此并无認識，他們当中有不少的人对帝国主义和袁世凱还存在着幻想。一九一二年八月，孙中山先生应袁世凱的邀請去到北京。袁故意隆重地接待他，并百般地曲意相从，終于使孙中山先生入其彀中。孙中山先生从袁那里出来就对人說：“今日之中国，惟有交項城治理。”因此，他便接受了全国鐵路总办的任命，想在中国經營二十万里的鐵路；实现他的实业救国的美梦。为了这个目的，他随后还到日本去了一趟。但是不久，他的梦想便被现实粉碎了。

南北和議成功之后，我也到了北京。一天，友人从一家报纸上看到了袁世凱要任命我作四川宣慰使的消息，赶快来告訴我。我感到很奇怪，估計是朱芾煊搞的鬼，便立刻去問他。他說：“总统正要找你，請你和我一同回四川去調解成渝双方的糾紛，并要給我們宣慰使的名义。”我說：“四川是我們的家乡，对于家乡的父老何能用这种名义？而且我在南京临时政府秘书处的时候，即已和大家有約，此后絕不任什么官职。”在此以前，李石曾和蔡元培、汪精卫等

专使人員在从北京回南京的輪船上曾有“六不会”的組織，以不作官、不作議員、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吸鴉片相標榜，有人甚至加上不喝酒、不吃肉兩條，稱為“八不主義”。我雖然沒有加入“六不会”，並且知道他們是唱高調騙人的；但我却認為一個人如果違背了自己的初衷，總是闕心有愧的，且將失信于人，為人所棄。就是由於這種原因，我堅決地拒絕袁世凱給我任何的官職。袁不得已，後來才同意不給我任何名義，只要我同朱霽焯一起回川一行，去“慰問”四川人民，並促成四川的統一。我當時並不了解袁是因朱的資望不夠，不足以替他完成統一四川的重任，因而想利用我為他服務。我只覺得促成四川統一，避免人民塗炭，為桑梓父老做點事情，是一種不可推辭的義務，因此便答應了。袁給了朱一筆錢，朱問我怎麼開銷，我說：“我們每人一月六十元就夠了，同行的人，還可酌量少一些。”朱同意了。說也奇怪，朱居然跟我一樣，既沒有爭着作官，又沒有爭着要錢。我本來對朱的投靠袁氏，內心不取；現在見他這樣，又覺得他之投袁，原是要去爭取袁氏贊助共和的，似乎也可以原諒。其實，我那時對朱的本質還是沒有認識清楚。後來事實證明：他是一個野心並不太大的道地的投機分子。他投到袁的門下，知道袁也只不过是利用他與革命黨拉拉關係而已，因此對袁也不存奢望，只趁機會討了一個夔關監督來當，弄了一筆錢，然後便由官而紳，到北京城裏買了一大片空地，修了許多房子，作起房東來了。

一九一二年的夏天，我和朱霽焯回到了四川，這時，成渝雙方已經妥協了。成渝的妥協也象南北的和議一樣，是重慶投降了成都，革命勢力投降了反動勢力。其時楊維任軍事巡警總監。楊是成都起義被捕的六君子之一，我覺得他似乎尚有可為，便推動朱霽

煊用我們两人的名义电袁世凱建議，任命他为成都卫戍司令。袁当即下令委任，并升楊为中将。袁之出此一着，原不过想借以籠絡革命党人。但此事却立即引起反动分子的不安。他們馬上向袁的亲信四川人曾彝进、顧鰲等进行活动，要袁收回成命。袁虽然没有明白地收回成命，但因他不再支持，楊維終于无法就职。而且，袁見我的心事仍在革命，便急电我們回北京。这时，我正抽空回樂县家里。接到袁的急电后，我又匆匆地离开故乡，和朱蒂煊一起赶回北京。

在四川的时候，我順便地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以留法俭学会的名义动员了一批青年到法国去留学。例如何魯等人就是这次出国的。留法俭学会是由李石曾等无政府主义分子倡办的，这批无政府主义分子这时已墮落为袁世凱的帮凶，是完全反动的；但留法俭学会却送了一些人到法国去学科学，对社会多少总算有点益处。当然，李石曾之流搞这个俭学会的目的，并不存什么好意，純粹是为了盗取“教育家”的虛名。这个留法俭学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及其以后，更发展成为留法勤工俭学会，送了更多的人到法国去留学。其中一些先进分子后来成了著名的共产党人，如周恩来、邓小平、陈毅、李富春、聶荣臻等同志和党的先烈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等同志，都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

我回到北京的时候，宋教仁等已經組成了国民党，正在为实现他的政党政治的幻想而日夜地忙碌着。他以为国民党只要在議會中取得多数，就可以組織責任內閣，中华民国即可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而得到“长治久安”，袁世凱的大总统就只剩下一个元首的空名了。他为了在选举中取得多数，不惜把大批的政客和封建余孽拉入党内。他为了使这些人能够接受，又不願許多同盟會員的

反对，把同盟会綱領中的革命內容尽行删除。“平均地权”被改为“注重于民生政策”，“力謀国际平等”被改为“維持国际和平”，这就是說，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精神完全被抛弃了。甚至連“男女平权”的主张也被取消，因此更遭到女同志們的反对。有个叫唐羣英的女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刚打下南京的时候曾經作过女子北伐队的队长，这时即因反对宋教仁取消“男女平权”的綱領而要打他，以致鬧了一場风波。

一九一二年底，国会选举开始，宋教仁到处演說，儼然象西方“民主国家”的竞选一样。后来选举“胜利”了，宋教仁更得意忘形，到处发表他的政見。正当宋教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时候，袁世凱已經为他挖好了陷阱。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宋教仁在上海車站被刺。他临死仍希望总统“开誠布公”，竟然还不明白就是这位总统要了他的性命。

宋教仁被刺后，革命党人的幻想破灭了，他們被迫于仓皇中起来和袁世凱斗争。

二次革命失敗，繼續追求真理

宋教仁的被刺，無論什么人都知道它的政治背景如何。袁世凱为掩盖天下耳目，故意装模作样地說要“穷究”和“严办”。很快真象就大白了。原来指使行凶的是国务院官員洪述祖，而指使洪的又是国务院总理赵秉鈞。誰都知道，赵是袁世凱手下的特务头子，因此毫無疑問，指使赵的就是袁世凱自己。袁世凱的阴谋被揭露出来了。于是他一不作、二不休，干脆不經参議院通过就违法向帝国主义大举借款，扩充軍队，准备用武力来彻底消灭南方各省的革命力量。

一九一三年四月，袁世凱与英、法、德、日、俄五个帝国主义国家所組成的銀行团签订了二千五百万鎊的“善后”大借款。同时，他命令段芝貴、馮国璋率师南下，准备以段芝貴所率李純等部进攻江西，以馮国璋、张勳两部进攻南京，此外，并以郑汝成、湯壽潜率领海軍协助作战。他于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便在六月間借口江西都督李烈鈞、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反对借款，抗拒中央，下令免掉这三个国民党人的都督职务。随后至七月間，他又发布“討伐令”，向国民党人所率领的军队大举进攻。

孙中山先生于三月自日本回國的时候，恰好袁世凱暗杀宋教仁的事件发生了。他回到上海，非常气愤，决計兴兵討袁，发动二次革命。这时，我为了反袁，也到了上海。当善后借款成立，风传袁世凱要撤消国民党粵、贛、皖、浙四督之际，我即向孙中山先生建議，主张四督联合通电，反对袁世凱违法，并声明在合法政府成立以前，不接受违法政府的命令，以此先发制人。孙中山先生很同意我的意見，但黃兴不贊成。黃兴說这样一来，就暴露了他反袁的軍事准备。其实，这时国民党反袁，正如袁世凱反国民党一样，彼此都明白，还有什么秘密呢？結果袁世凱搶先宣布了免除国民党都督的职务，使我們的反袁在政治上陷于被动的地位。

七月十二日，李烈鈞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組織討袁軍。接着，十五日，黃兴在南京強迫苏督程德全宣布独立，响应江西討袁。程德全是个首鼠兩端的家伙，他于宣布独立后即托故离开南京，潜赴上海。我赶到南京去参加起事，見程不在，便責問黃兴。黃兴說他自己要走，誰也无法。我于是又趕去追程。而程到上海后即通电要黃兴取消独立，真是可恨极了！由于事前既不坚决，临事又不协调，这次所謂贛宁之役，很快就归于失敗。接着，安徽、广东和四川的

反袁斗争也失败了。但是，我对这些失败并不灰心，仍在上海继续奔走，企图挽救革命。当时我想如果能炸毁曾经归向革命后来又被郑汝成收买过去的肇和军舰，或者把它抢过来，上海就可能支持一个时期，革命也许能以上海为基点，重新发动起来。于是向孙中山先生建议拿出二万元由我去布置这件事，虽然张静江反对，但孙中山先生同意了。我在法租界组织了一批人，准备好了炸弹、炸药和小船。一切就绪后，在一个晚上，我便带着这队人乘汽车出发，结果因过法租界时被阻，不得不返回，最后一次希望又落空了。至此，孙中山先生的二次革命于瞬息之间即告烟消云散。二次革命之所以如此迅速地失败，根本的原因在于辛亥革命以后，国民党就已经放弃了革命纲领，逐渐地脱离了群众，因此，它发动的反袁斗争，再不象同盟会时代那样能够激起群众的热情了。

四川的反袁斗争发动得比赣宁为晚，但失败得一样的快。八月初，熊克武、杨庶堪于重庆举兵讨袁；接着，张百祥在绵阳响应；王天杰在荣县响应；其他川东、川北、川西也有响应的；但不出九月，全部失败了。这次反袁失败，四川的国民党人性命很大。王天杰于四川永川被俘牺牲；张百祥逃至上海后被捕，解到北京被杀。

袁世凯认为四川的反袁斗争是我策动的，因而对我下令通缉。我在国内待不住了，只好再度出国。好在公费留学的资格早已取得，北京教育部又有朋友为我办理一切手续，因此我便于一九一三年末起程赴法国留学去了。

在此之前，大约是六月间的光景，我的一位朋友任鸿年在杭州烟霞洞投井自杀。他是同盟会员，曾在蜀军中任书记，后因意见不合离去；这时看见袁世凯祸国殃民，与清朝政府无异，觉得过去的革命落空了，因而愤不欲生。接着袁世凯对我下令通缉，那时我的

二哥已經双目失明，而又貧病交加，他在成都一听到消息，觉得国家和家庭的前途都无希望了，竟悬梁自縊而死！辛亥革命給长期黑暗无际的中国带来了一线光明，当时人們是多么的欢欣鼓舞呵！但是，轉瞬之間，袁世凱奪去国柄，把中国重新投入黑暗的深渊，人們的痛苦和失望，真是达于极点，因此有的便走上了自杀的道路。但是，我却是一向反对自杀的，我认为自杀最不值得，既然敢于牺牲，何不去和敌人斗争呢？而且，我对于祖国的前途总是抱着无限的希望。我相信我們伟大的祖国既有着几千年悠久而光荣的历史，又有着数百万勤勞而勇敢的同胞，她一定会冲破重重的黑暗而走上光輝灿烂的前程。但是，对于国家的危难、同志的牺牲和兄友的自杀，我毕竟也不能无动于怀。当我踏上出国的征途以后，有时一个人站在輪船的甲板上，看着无边无际的海洋，波涛汹涌，我胸中的热血，也不禁翻騰起来。啊！亲爱的祖国，你何时才能从沉重的枷鎖中解放出来呀！

說也凑巧，我这次出国，偏偏坐的是日本輪船，又在船上碰上过一九一四年的元旦，而且这輪船上挂的万国旗中依然沒有中国的国旗！我气愤极了，立刻鼓动全船的中国同胞起来向船长斗争。但是，除了耻船长道歉之外，又能有什么別的结果呢？記得十年以前，也是在庆祝元旦的时候，我們在成城学校，为了爭挂国旗曾經鬧过一場斗争。誰知十年之后，我們的国家在世界上仍然毫无地位呢？我們十年来辛勤地从事革命工作，結果竟然如此！难道我們的道路錯了嗎？还是沒有正确的方法呢？我必須研究明白。我迫切地追求着新的救国救民的真理。

真正能够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后来果然找到了，那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劳动人民自求解放的真理——馬克思列宁主义。

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全世界人民开辟了光明的道路。在十月革命的光芒照耀下，一九一九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中国革命即在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我自己也跟着毛泽东同志走到胜利，分享了胜利的喜悦。

广州起义亲历記

熊克武

辛亥(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到今年已經五十周年了。这次起义,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中規模最大、牺牲最大的一次。这次失败也是最后一次的失败,不过半年,武昌起义就成功了。

自乙未到庚戌(一九〇五——一九一〇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已失败九次,而各省单独策动的地方举义,不下数十次之多,也被殘酷地镇压下去。从这些不断的血的教訓中,同志们逐渐意識到:这种彼起此伏、各不相謀的軍事行动,力量分散,不能給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反而牺牲了不少的优秀同志,消耗了革命的實力,实非善策。东京同盟会总部和各省支部更进而主张,集中全党力量,发动一次大規模的武装革命,一举而顛复清朝政府。于是孙中山先生电約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各地代表,會議于南洋檳榔嶼,决定在广州大举。而主要的是錢的問題,因为必須筹得数十万元的鉅款,才能购买大批軍械,召集多数同志,組織大規模的起义;这个向华侨募款的重任,只有由孙中山先生自己担負起来。当年筹款的方式,一般是到华侨多的地方举行讲演会,爱国侨胞总是尽其所有地把身上的銅元、毫洋、銀元和粟子掏出来捐獻。这常常給革命党人以很大的鼓励。

起义的軍事計劃：(一)从日本、南洋及內地黨員中，征选骨干(后称“选鋒”)八百人，分为八路，首先发难，作为领导先鋒，并配合新軍占領广州；(二)联络番禺、南海、順德、惠州等地民軍，同时起义；(三)派員分赴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广西等省，运动軍隊反正，及时响应；(四)占領广州后，即由黃兴統一軍出湖南攻湖北，趙声統一軍出江西攻南京。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說：“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孙文学說》第八章《有志竟成》)

一九一〇年——辛亥前一年的秋天，吳玉章、但懋辛、井勿幕和我由上海同伴到香港，与港、粵同志共同策划广州起义問題。我們得知一切都在积极准备，正等待海外筹款的最後結果，以便具体规划购械多少和召集骨干的确实人数，就可决定起义規模的大小。以各有新任务，吳玉章、但懋辛、井勿幕和我分別先后回东京或上海。临行前，黃兴問我們，四川可以出多少人。我們計算了之后說：四川几次起义失敗，不少同志逃往云南，交通又不便，如果時間长的話，两百人沒有問題；時間若短，大約可以湊四五十人。我到上海后，即函告川、滇同志积极准备，款到就动身来沪集中；要是能够自筹路費先来，那就更好。事务安排妥当，我和但懋辛又由上海来到香港，負責联络各地往来香港同志的工作。我們和黃兴住跑馬地三十五号，后来主持起义的总机关——統筹部就設在这里。辛亥革命成功后，广东省政府曾与香港政府交涉，保留这所有革命历史的房子以为紀念，結果如何，我就不清楚了。

那时候的革命，主要是靠炸彈作武器，因为枪彈只能向国外购买，困难甚多，运输危險，价錢又貴；而炸彈杀伤力大，运帶方便，造价也便宜。喻培伦(云紀)是日本千叶医学校的学生，对于制造炸彈已有相当經驗，总部就将这个艰險的重任交給他。喻培伦不幸

在广州起义中英勇地牺牲了，他是七十二烈士之一。关于喻烈士在广州起义前的革命活动，吴玉章同志的《从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中已有较详细的记载，并称誉他为民族英雄。在广州起义中，我和喻烈士始终在一起工作，应该补述他这一段的革命事迹，以尽战友的责任。尤其是当他因身受重伤、弹尽力竭而被俘后，在清吏严讯口供时，他声色俱厉地说：“要杀就杀，科学是杀不绝的，革命党是杀不尽的！”这是何等壮烈的英雄气概！

由于在东京不可能进行爆炸试验，喻培伦特地来到香港，在当时还没有开发的九龙海边的荒滩上，找到个试验的地点。喻这次试验的成绩很好，特别值得介绍的，就是他想出了用安全火柴做炸弹导火绳头子的办法，克服了过去不易燃着的大缺点。因此，在这次广州的武装斗争中，几乎个个炸弹都发挥了作用，给怕死的清军以很大的威胁。

统筹部于辛亥一月成立于香港，推黄兴为部长，赵声为副部长，总揽全局，下设八课，分工负责办事。一月底，黄兴派李文甫、林直勉、喻培伦、但懋辛和我上广州，调查城内外地形、交通路线和重要机关地址，画成一个简图。李、林是广东人，道路熟悉，但和我学过军事，喻则因广州房顶有可通行的走道，要勘定狙击清军的投弹地点，所以我们四人便被派去担任这个临时任务。广东水师提督李準是个极顽固凶恶的家伙，他是四川人，他的部下四川人很多。我们就抓住这一线索，通过同志同乡李天鈞（广州东一区警察局巡官）、邹有章（河南警察局巡官）的关系，认识了水师营同乡王书记，探听了一些水师布防的情形。王书记又告诉我们，观音山炮台是旗人把守的，他们唯利是图，在炮台里卖茶，聚赌抽头。他便邀我们去喝茶，看看广州市的风景。我们就利用游览的时机，分

別檢查了幾門炮，發現炮虽然是旧式的，倒还可以射击。假使后来不改变作战计划，象这样腐败的守卫旗兵，实不堪一击，而我们如果能迅速把炮台夺取过来，那将有多大的用处！

我們回香港报告情况後，我和喻培伦又来到广州，由于邹有章的帮忙，选租了一幢合用的民房，掛起但公館的牌子，作为交通站和制造炸彈的地方；我們另外住在市內蓮塘街吳公館。喻开始日夜辛勞地制造炸彈，我有空就帮助碾炸药。个把月工夫，总计做了半磅、一磅、两磅重的炸彈三百多个，分批偷运至吳公館儲藏。

三月十日开“发难會議”，議决三月十五日举事，旋以款械不能如期到达，改为三月二十九日。黃兴于三月二十五日到省，設立指揮部，进行作战布置。二十七日，兩广总督張鳴岐調回巡防二營駐扎城外，胡毅生（負責購買和运送槍械的儲備課課長）、陈炯明认为敌有戒备，應該慎重从事，堅主緩期。黃兴无可如何，下令除負責的骨干外，其余“选鋒”約三百人全部撤回港九。同志們聞訊，均甚憤慨。喻培伦、林时爽即往見黃兴，痛陈利害說：“花了海外华侨这么多的錢，南洋、日本、內地同志不远千里而來，于今中途緩期，万一不能再举，岂不成了个大騙局，堵塞了今后革命的道路？巡警就要搜查戶口，人槍怎么办？难道束手待擒？革命总是要冒險的，何况还有成功的希望？即使失敗，也可以我們的犧牲作宣传，振奮人心。現在形勢緊急，有进无退，万无緩期之理！”喻培伦且堅决表示：“就是大家都走了，剩下我一个人，也要丢完了炸彈再說，生死成敗，在所不計！”黃兴听了大为激动，决定集合同志數十人，杀張鳴岐以謝国人。二十八日，姚雨平（調度課長，負責运动新旧軍）、陈炯明报告，新調来的順德三營，哨官中十之八系同志。于是决乘机起事，黃兴又最后确定二十九日下午五時半发难，并电报通知香

港。香港方面，以時間來不及，留港的三百餘同志實難於二十九日的早班船全部趕到，電請推遲一天。這樣一再改期，一切部署都打亂了，更重要的是人數大減，不得不放棄八路進兵的計劃，改為集中力量專打總督署，由黃興親率百餘人攻督署前門，蓮塘街的十八人襲擊督署後門。這也是擒賊先擒王之計。

二十九日早，黃興因為還沒有得到香港同志晚來一天的消息，派我和方聲洞、林時爽去接船，把他們分批帶進城內安頓。可是船到了，人卻沒有來，我就要方、林先進城報告情況。我懷着萬一的希望，一直等到下午四時，才失望地趕回指揮部。進南門時，碰着林直勉戴黑眼鏡坐着轎子出城，我想他這個時候這種打扮去干什么？接着又遇見陳炯明，因時間緊迫，要他帶我走捷徑去指揮部，他給我指點方向後又匆匆地出城了。當時我還以為林、陳二人另有特別任務，後來知道他們都做了逃兵。指揮部的同志看見我，幾乎衆口齊聲地問：“到了沒有？”我看見同志們已全副武裝，正在吃麵包，候令出發，不能潑冷水，便簡單地回答：“我剛進城。”黃興心里明白，便催我趕緊回吳公館，準時出動。本來所有認識喻培倫的人，都反對他參加戰鬥，認為他應該留下來，把製造炸彈的本領教給別人，這對革命大有好處。但是無論誰勸他，他總是這几句话：“哈子話！我為革命才學制炸彈，現在自己做了炸彈，大家都去，我倒不去，那不行。”有的同志還說：“不少你一個人啊！”他却回答：“我一個人比你們幾個都強。”的確，論拋炸彈技術的熟練和準確，他比誰都高一着。既然大家怎樣也說服不了他，只好依他了。

我們正在準備時，忽然聽到槍聲響了。同志們一手拿短槍，一手拿大刀，炸彈裝滿了口袋，有的人脖子上還掛一筐子，飛步前進。喻培倫只用了兩顆炸彈，就把督署後牆炸開一個大洞口。但懋辛

首先冲进去，右臂中了一枪，但还是随着大家蜂拥而入。枪子与炸弹齐飞，杀得警卫清兵四散逃命。我们一直打到前门，黄兴的大队不见了，我们就和还没有走的广东同志数十人合为一队，直奔督练公所。

当我们一队行进到莲塘街北口，即与水师发生遭遇战。我们即分散于东西两边的店铺中，利用走廊的墙壁作掩护，阻击敌人。负伤的和不会开枪的就搬送炸弹，或代装子弹。喻培伦一个人攀登屋簷，等清军冲过来时，就猛投炸弹，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几次冲锋，敌死伤不少，再也不敢凶了。就这样在原障地上彼此相持至半夜。因为众寡悬殊，看形势是不能再蛮打下去了，我们就商定分批退却，且战且走。原来约定用小喇叭通消息的暗号，因怕被敌人发现目标，不敢随便使用，因此同志间失却了联络，只有张梅生、饒国梁、秦炳、但懋辛、罗允、莫纪彭和我七人还在一起。我们一度商量，决计越城。在半路上遇着巡警队，打了一小仗。待到城墙边芦苇丛中摸索前进时，我们七个人又分散了。最后，只剩下我和但，发现城上也有兵防守，不时打冷枪，看来越城也不行了。我们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又值深更半夜，只有坐待天明，再想办法。天快亮时，我们二人躲进个公共厕所里商量。我要但在厕所里等候，由我一个人出去看看情形，再打主意。不料我一走出去，就被往来不绝的巡警队隔断，回不去了，因此又与但拆开了。我在极度疲劳与饥饿中，走进一老百姓家。老乡当然看得出我是干什么的，他幸好能说普通话，让我坐下休息，叫我刷去满身的泥土，还弄些东西给我吃，至今我没有忘记他对我的热情。后来知道，黄兴等不少人都是在老百姓掩护下脱险的。

当天，我找到了李天钧巡官，请他派人送我到河南，邹有章巡

官代我买好船票，我才回到香港。

此外，尚有可記的：黃興曾報告說，廣州起義共用銀十七萬餘元；其實這只是統籌部直接開支的數字，而其他方面直接間接用于起義的款項，也大有可觀。據我所知，福建同志數十人的公私費用完全是自己籌措的，四川同志的一部分用款是上海同志資助的，其他各省的情形亦大抵如此。又在東京購買的軍火，留日學生出錢不少；尤其難得的是，東京同志有人拿官費摺子去押款，有人向一個日本老太婆借高利貸，幾年之後才還清。這些都表現了同志們對革命的高度熱情。

在起義的準備期中，沒有任務的同志多在家里下棋，練大刀。大家還想出了一個玩法，就是在牆上掛個小竹囊，用銅板投入，借此來練習投擲炸彈的準確，誰一次不中，就給他臉上畫一筆，以資笑樂。儘管武裝鬥爭是要冒生命危險的，可是誰也不把死當回事，泰然自得，生活很愉快，這種革命的樂觀精神是值得敬仰的。

我還想起了一件事：前清把革命說成是“造反”，把革命黨人叫做“土匪”。張鳴岐除將全部刪改過的烈士供詞和照片報清廷討賞外，又精印成冊，分送各國駐廣州的領事館，以夸耀他的“剿匪”之功。而外國人卻從這些烈士的履歷中，發現多數是留日學生和顯貴世族的子弟，日本早稻田大學還為該校死難的中國留學生下半旗志哀。這樣，外國人才認識到中國是在鬧革命，從而揭穿了清廷的欺騙宣傳。

辛亥革命成功後，又經過了三十餘年的黑暗時期，中國人民終於獲得了真正的完全的獨立、自由和民主，革命先烈可以安息于地下了。我——一個參加過廣州起義和辛亥革命的老人，得親眼看見中國人民在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主席領導下，得到了徹底

的解放，我的欣慰和感奋的心情，真是非言語所能形容。

辛亥革命杂忆

沈 鈞 儒

我是浙江人。談到辛亥革命在浙江的情况，还得从我在日本的时期說起。

清光緒末年，我留学日本，就跟在日本的革命党人有所接触，特别是和光复会往来較多。光复会著名人物如章炳麟、蔡元培、陶成章、徐錫麟等，都是浙江人，其中也有参加同盟会的。我虽然没有参加光复会和同盟会，但由于我倾向革命，跟光复会领导人章炳麟过从甚密，所以他們的活动我是知道一些的。当时許多革命党人在日本学軍事，准备回国后参加到军队里去，有計劃地进行武装革命。后来就发生了徐錫麟在安庆起义和秋瑾在绍兴被害的事件。这些事件在当时是震动全国的。

我回国到了浙江的时候，由于革命遭受挫折，表面空气沉闷，但实际上光复会中的重要人物都在秘密分头活动。他們跟浙东的台州、处州、金华各属的秘密会党有联络，在新軍里面进行革命工作(当时浙江編練新軍两标)，新軍中有不少官兵参加革命。那时候，我担任浙江两級师范学堂监督，教員中頗多富有革命思想的人，其中就有周树人即魯迅先生。

宣統元年(一九〇九)阴历二月間，清廷下詔书表示决心要实行宪政。十月間，各省成立諮議局。浙江諮議局議長是陈黻宸，

陈时夏和我当了副議長。清廷的所謂筹备立宪，給了立宪派一种幻想。于是江苏諮議局議長张謇，发起联合各省的諮議局，在上海成立了国会請愿同志会，派代表向清廷請愿召开国会。宣統二年（一九一〇）正月間，各省請愿代表到了北京。我那时也到了北京。当时革命和立宪两派对国是爭論不休，大家要我到北京去看看形势。我在北京呆了一个时期，跟各方面接触的結果，看出了清廷的所謂預备立宪，只是一种欺騙，清政权已不能維持多久了。回来就把我的看法向大家讲了。

辛亥阴历四月間，清廷下詔书要把全国铁路收归国有，实际上是把路权送給帝国主义者。沪杭甬铁路原是从英国人手里夺回来，由江浙人民集股筑成的。一听到要收归国有，羣情激昂。那时候各省紛紛成立保路同志会，向清廷力爭，四川保路运动最为激烈。这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綫。不久，武昌起义了。

武昌起义后，各地紛紛响应，革命情緒高涨。当时杭州駐有满人旗营，有相当实力。新軍中参加革命的官兵跃跃欲試。革命党人从外地紛紛来杭州，秘密設立机关，日夜会商，着手准备。到了九月初十左右，一切布置都已就緒，决定十五日（阳历十一月六月）拂晓开始发难。大家分配工作，我和陈时夏担任政治組織方面的設計准备工作，草拟浙江光复的通电和布告等。十四日夜半，新軍八十一标和八十二标，配合了革命党人所組織的敢死队，先向撫署和軍械局的駐軍进攻。巡撫增韜由后門逃走，当被擒获。攻軍械局亦已得手。两标部队在城站会合后，各拨一部包围駐防旗营。十五日上午，出安民布告，通电全国，宣告浙江独立。

革命軍順利地推翻旧政权以后，接着就是建立新政权，首先是誰来当都督的問題。革命軍发动进攻时，只推定原宪兵司令部的

軍官童保暉为临时司令官，后来就由他用临时都督的名义出安民布告。至于正式都督，当时我們考虑到湯寿潜。湯寿潜是沪杭甬鐵路局总理，住在上海。他在爭回沪杭甬鐵路的时候，在羣众中建立了一定威信，但是他并没有参加革命，后来我們知道了他跟旗营的协領滿人貴林(貴翰香)有深厚的交情，象这样一个人，原是不适宜领导革命的。可是当时我們——主要是諮議局方面的人，竟认为非湯不可，在光复前两天(阴历九月十三日)，我們就派陈时夏赴上海欢迎湯来杭州。十五日早上，我們又打电报給他，由陈黻宸、褚輔成、馬叙伦和我四个人具名，报告浙江光复情况，催他赶快来杭州。下一天，火車通了，湯寿潜于下午偕陈时夏等乘火車到达杭州，直赴諮議局，跟大家商議一切。

那时候围攻旗营的战役还没有完全結束。滿人將軍德济虽然主张投降，但是实际掌握軍权的协領貴林仍然主张頑抗到底。这里有一件动人的事：有一个参加洪門会的工人张子廉(一說姓王，名不詳)，把旗营大炮的炮門偷偷地拆了下来，使大炮不能施放，因此杭州城内避免了炮战的破坏。到十五日下午，貴林等又探得巡撫增韞已被活捉，革命軍声势浩大，眼看无法頑抗了，才在营門小坡上竖起白旗，貴林带了兩名随从，向我軍接洽投降。他要求我們納降后不杀一个旗人，革命軍首領在諮議局討論結果，准如所請，約定十六日中午正式呈交軍械清單。本来這個問題已經解决了。可是到了十六日，貴林听說湯寿潜回到杭州，就說投降条款中不杀一个旗人的那一条須得到湯先生的保証，才肯呈繳軍械清單。原来那个貴林同当地豪紳有勾結，跟湯寿潜、陈黻宸都有交情，所以他有恃无恐，居然坐在諮議局里等湯寿潜到来。湯寿潜一到，他就对湯說了許多話，湯从他手里取过那张写滿条款的紙来草草看

了一遍，就答应了他。

十七日上午，才正式集会讨论推举都督。褚辅成提議推湯寿潜为都督，多数赞成，王金发（他是光复会会员，带领敢死队，配合陆军八十一标攻军械局驻军的）等少数人反对，以为湯寿潜过去德惠浙撫张曾戢捕杀秋瑾，不应该推他作都督。最后仍然通过以湯寿潜为都督。湯于当天正式就任，以旧劝业道衙署为都督府。当天发布四个文告，其中最重要的是自本年九月起，蠲免全省錢糧厘金一足年。现在看起来，蠲免全省錢糧厘金，只对地主豪商有利，貧农佃戶得不到什么好处。

浙江光复的头几天里，一切都是乱烘烘的，社会秩序还没恢复过来。貴林表面上投降，仍住旗营里，想乘机叛变。經人告发，浙軍司令部立派部队馳赴旗营，起出私藏枪枝二千余支，子弹无数，还有好多箱炸药。貴林和他的儿子量海当场被捕，解送司令部，受軍法会审。当时我担任临时警察局长，参加了会审。我們問貴林：“投降条款中不是写的明白不得私藏一枪一弹，日后如发现所报不实或私藏枪械的，应处极刑嗎？现在人証物証俱全，你还有什么說？”当即判决貴林父子死刑，就在諮議局的广场上执行枪决。当时人心大快，社会秩序也渐趋安定，过去携眷避往外地的，都紛紛搬回来了。

枪毙貴林父子的时候，湯寿潜适因事去上海，他一得到消息，下一天就回杭州，質問当时担任总司令的周承蔭和我，何以不向他請示。我們回答他說：此案人証物証俱全，用軍法緊急处分，是我們的責任。湯听了，也就无話可說了。

我还想起另一件事。当时在杭州开设广济医学堂和广济医院的英国人梅藤根，借口保护英国侨民，要求在西湖保俶塔一带圈地作为英侨民住区，象租界一样。我們一面向他警告，不許他乱来，一面派警察在保俶塔一带巡查。有一天，梅藤根邀我到 he 家里，用茶

点款待，还請我听他的女儿弹钢琴，喜笑颜开地說了许多恭維話，意思是要拉攏我，叫我同意他在保俶塔附近圈地。我严詞拒絕了。

十月十二日(阳历十二月二日)，苏浙联軍攻下南京。十一月初六日(阳历十二月二十五日)，孙中山先生自海外归国，到达上海。十一月十三日即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那时候，湯寿潜已經辞职，繼任的是蔣尊簋。一月間，浙江成立了临时省議會，临时省議會制定了浙江省临时約法，議决了軍政府官制及本省預算。我在那时候担任了教育司司长。蔣尊簋是浙江人，在广东做新軍标統，广东光复的时候，他以新軍标統暫任临时都督，后来粵省軍民正式举出都督，他就退职高粵。湯退蔣繼，时在辛亥十月中旬，即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上旬。但其时朱瑞(他是光复会會員，原任八十一标代理标統)攻克南京天保城有功，凱旋归来，受到热烈欢迎。他那时候已經做了浙軍軍长，跟蔣有矛盾。以后形成的軍閥割据局面，那时候在浙江已經可以看出苗头来了。

我記得起来的就是这一些事实。我虽然参加了辛亥革命，但是当时对于革命的認識是模糊的。今天想起来，浙江光复所以那么快地取得胜利，主要是由于人民羣众对于革命的迫切要求和热烈支持。但是，当革命形势高涨的时候，如果没有坚强的领导，又不依靠广大羣众，把革命进行到底，那末，人民胜利的果实仍然会被夺去，革命势必逐渐变质，以至于完全失败。这是我們所应当接受的历史教訓。今天紀念辛亥革命五十年，回想我們在过去所走过的这一段迂迴曲折的道路，看看当前在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之下新中国所取得的輝煌胜利，真是既兴奋，又高兴。

回忆辛亥革命*

張 奚 若

(一)

辛亥革命前，同盟会陕西支部长是井勿幕，一个了不起的人。井勿幕是井岳秀（民国初年直到民国二十几年在榆林做陕北镇守使）的弟弟，幼时在家中读过不少旧书，光绪末年曾到日本留过学，在日本结识了不少从事革命运动的人物。宣统元年回国，宣统二年我在上海遇到他，当时他不过二十二三岁。陕西人中运动革命出力最大的，一个是在上海办报的于右任，一个是他。他在陕西运动革命，活动的范围很广。他固然能和青年人在一起讲“新学”，也能和中年的秀才举人们做诗谈旧学，而且因为他的哥哥从小习武艺（井岳秀是武秀才），他也在一起学过，对于所谓“十八般武艺”也都会耍，所以更能与江湖上的人结交。

陕西的江湖人物大抵有两种：一种是哥老会，当时在新军里颇有势力；还有一种是所谓“刀客”。“刀客”是一种侠盗，崇尚侠义，

* 编者注：本文原采作者所述，丕强记录并整理，最早发表于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六日至五月五日的上海《文汇报》；同年十一月由生活书店印为单行本出版，改题《辛亥革命回忆录》。本文收入本书时经作者作了一些修改。

劫富济贫。清朝末年，有一个大刀客头儿，叫王振乾，外号王狮子，朝邑人，是山西陕西甘肃三省刀客的领袖，在辛亥前就死了。他的党羽遍布各县，尤以陕西东部的十几县为多。井勿幕是同州蒲城县人，与他们很容易发生关系。那时有名的刀客头儿，一个是閻孝全（朝邑人），一个是严纪鹏，外号叫白翎子（渭南人），后来均在革命军中出过力。閻孝全阵亡于辛亥攻打醴泉之役。刀客和土匪当然是不同的。杨虎城是刀客出身，后来有人说他原是土匪，实是错的。那时的哥老会人物和刀客们，看见井勿幕这样一个张子房式的白面书生，居然也会各种武艺，而且有时比他们还好，所以对他很钦佩，情愿听从他的意见。

辛亥四月间，我从上海回到西安才两个月左右，正在养病；井勿幕在北山（陕西人称同官以北为北山）养马，预备养好了将来革命时编马队的。同盟会另一个重要的人是当时的陕西諮議局議長郭希仁，此时也不在西安。我住在藩台衙門（后来的民政厅）里土地祠中养病，有一天忽然有一个同盟会会员李仲三来找我，惊惊慌慌地说有一件大事要找我出主意。我问他什么事，他说哥老会的人决定就要起义了，怎么办？李仲三是潼关厅（现在潼关县）的秀才，外貌粗陋，面孔很黑，绰号叫做李遮，是遇事不易有主张的一个人。我想，我在此对一切都不熟悉，就问李仲三已经去找井勿幕没有？他说已经去找了，但不一定找得到，而哥老会想这两天就起义，找到也来不及了。我此时感觉责任非常重大，也无别人可以商量，沉思之后，乃告诉他：目前第一要劝哥老会暂勿举事，因为我们没有充分准备，领袖又不在，起义之后也无法组织政府；我们的军火也不够，当地有新军，还有旗人的驻防，万一起义不成，我们就要被消灭，以后就再难有革命的机会了。我叫李仲三劝他们忍

耐，我們對外省也沒有聯絡，就是在陝西革命成功了，也太孤單，隨時有被圍歼的可能。第二，要趕快去找井勿幕回來。

第二天，李仲三又來了，一進門很高興地說：“伙計，你的辦法真靈，他們听了。”這一次起義計劃因此並沒有發動。不久井勿幕回來，一方面對哥老會重新又說了一遍需要忍耐的話，一方面就加緊準備，派我到日本去買炸藥和手槍。

(二)

我病還沒有全好，可是必須就動身。買軍火的錢，由井勿幕籌措。井勿幕父母已經不在了，只有他和他哥哥兩個人。他把家中好的字畫挑出兩箱，託我帶出去賣了來買軍火，我還記得其中有王石谷、鄭板橋的畫，劉石庵的字等珍品。當時大家為了革命，是不顧一切的。我又拿了井的介紹信，到漢口去找一個陝西涇陽的財主柏筱漁（柏在漢口有大生意），預備找他捐錢。柏筱漁原是我在三原宏道高等學堂時的老同學，不過在此以前沒有革命的關係罷了。這又可見井勿幕運動革命範圍之廣。

我坐了八九天的驢車到洛陽，換火車到鄭州，再轉車到漢口，找到柏筱漁拿到一些錢（我記得數目不大）後，就乘船到了上海。

井勿幕叫我到上海所找的人裏面，有劉亞休。劉是四川人，同盟會會員，同井在日本認識的，我和他本來也相識。他為我介紹了到日本後的四川同鄉，并談到過運軍火的計劃。

又到民立報館找宋遜初（敦仁），因為陝西哥老會如一定要首先發難，則陝西就要設立革命政府，可是陝西那時候沒有法政人材，所以要和宋商量派一個法政方面的人到陝西去。當時

有两个人可能去，一个是吕天民（志伊），云南人，一个是居觉生（正）。

因为宋的关系，认识了谭石屏（人凤），湖南人，哥老会的大头儿。那时常常开会，地点也没有一定，有时在北四川路谭家开，参加的人有谈宅暘（四川人）、吕天民、朱遯初等。结论是吕天民不能离开上海，东南方面需要他，居觉生可以去。

陈英士（其美）也是这时认识的。那时候陈英士当然是官方注意的人物，我和他初次是在堂子里见面的。浙江路清和坊的怡情别墅是他最喜欢的姑娘。第一次彼此就躺在姑娘屋里的床上交头接耳地说话。姑娘当然避开了，老妈子总不时进来倒茶拿瓜子。这是我第一次进堂子，此后还在那里吃过几次花酒，也是陈英士请的。可是那个时候最熟的还是朱遯初。

不久我就去日本买军火，刘亚休介绍的四川人，就是任叔永（鴻雋），后来又在他那里认识了吴玉章。此外又认识一个怪人洪承点。洪是江苏北部人，喜欢讲究慷慨悲歌的英雄派头，爱喝酒。有一次聚会时，他已喝了五瓶啤酒，走来叫我喝。我说我一点也不会喝，他认为我不行，要我一杯茶对他一瓶酒地乾杯。我觉到这还可以，欣然奉陪。不料他又喝了五瓶啤酒，还要再喝。我喝了五杯茶，已经胀得不能再喝了，只得认输，当然被他认为不够英雄了。他又喝了三瓶，前后共喝了十三瓶始罢。洪后来在二次革命时一度任革命军南京卫戍司令。

我把我来日本的目的告诉任叔永等之后，他们都说要买手枪、炸药没有问题，就是运输回国困难，在上海检查时不易逃过。他们问我曾否注意上海近来检查偏重那方面，不注重那方面，因为这些情形是常常变化的，如能得知，就较易隐藏这些武器了。我在上海不

知这些事情，没有注意，于是大家商定由我再去上海看一次情形，调查明白之后再回日本运武器。

从日本回上海之后，常常和陈英士商量运武器的事，来往比较多。陈住馬霍路，答应帮我将东西由上海运到内地。陈英士有一个听差，穿得很好，人很强壮，管包装装运军火。我有一次看见他装运军火，办法是拆开一套新的洋式沙发（当时上海还没有汽车，沙发也极少见），将手枪塞在弹簧中间，然后将沙发仔细缝好，看起来天衣无缝，决不会知道其中有武器。运起来虽然分量不轻，好在沙发本身已很重，当时人也不大知道沙发到底该有多么重，所以更不会看出来。这个听差的姓名我记不起了，而他的相貌如今想来还历历如绘。后来我曾打听过的下落，也没有人知道。

当时黄克强（兴）不在上海。有一次他从广州来信，大家在民立报馆传观，他的字写得很好。

（三）

正想回日本，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了。上海紧张起来，大家一天到晚在开会，都认为武汉是四通八达的地方，可能遭到清军围攻，必须发动各地响应，以分散清廷兵力。大家推我赶快回陕西策动起义。当时汉口不能走，京汉路南段已经因运兵完全不通，所以我决定绕天津、北京、郑州到西安，虽然知道京汉路北段未必通客车，但是总希望这一段比南面一段好，能够通行。

我在光绪三十四年由陕西到上海时已经剪掉了辫子，这次又是在风声鹤唳中经过北京，当然相当危险，然而装了假辫子又容易看出来，所以还是没有装。北京我是初次去，所以请人写了信介绍

給当时《民意报》的赵鉄桥(同盟会员)。我帶了两箱子沒有卖出去的字画,匆匆地在八月二十二日离上海北上。

我記得到北京的那一天已經将近晚間八点,因为沒有辮子,在前門車站就被仔細检查了一番。我住在前門外西河沿的中西旅館,从晚間八点钟到第二天早晨八点钟,我一共被检查了八次。检查者包括內城外城各种軍警机关。还有一次是一个斯斯文文、戴眼鏡的便衣密探,詢問我許多話之后,居然还要我的字画看。幸而这个密探不大高明,否則那时我一点也不懂字畫,恐怕就要露馬脚了。

第二天上午到民意报館去找赵鉄桥,沒有見着,回旅館后,下午就有人來問我今天到民意报館是去找誰的。我于是明白出入有人釘着了,只得随机应付,說是間接輾轉找別人的,总算支吾过去。后来看到赵鉄桥,也是約在簋子里見面的。在旅館中住了两星期,忽然铁路通了,我就离北京南下,經過郑州到洛阳。

(四)

这次从北京到西安,一路所見全是革命时期的变乱現象。当时由北京同回陝西的人約有四五十个,有的是由日本归国的,有的是在北京讀書的。从北京坐敞車(本来是运馬的,这次的确有馬与我們为伴)走了两天到郑州,从郑州換車到洛阳以西的一个小站鉄門。当时隴海路还只修到这里,向西就要換驢車。鉄門在平日总有驢車來兜問是否到西省(当地人习惯称西安为西省)去的,这时因为“天下大乱了”,沒有人肯出門,僱不到驢車了,我們四十多个人就擱淺在鉄門。后来我总算僱到了一輛驢車。平常从洛阳到西安車資只要十来两銀子,这次却要二十多两,比平时貴了一倍多。平

常僱車是先付兩三成車資為車夫安家費，其餘一部作為車夫路上各種用途，大約還有一半到西安再付清。這一次車夫卻堅持先付全部，否則不肯走，無奈只得全部付給他。同伴們僱到了從陝西馱貨到鐵門來的四十來匹驢子（叫做馱驢），這些驢子是從陝西運貨來，本來要回陝西去的。車子和馱驢一起出發，走了一天，到英壕鎮歇夜。在店中，車夫忽然說不走了。問他原因，他說呀到西面來的人說那邊已經亂了，殺人並且殺牲口。我去打聽時，才知這些消息是從陝西來的河南人說的（陝西東部比較富饒而豫西貧瘠，所以豫西的人有移居陝東的，也有每年農忙時到陝東去作工，秋收後再回河南的）。但是這些人只說陝西已經亂了，卻說不出所以然來。

我同車夫商量，在這一個小鎮上是僱不到車的，能不能明天一天趕到陝州（陝州高英壕鎮一百三十里，高潼關一百八十里），陝州是一個大地方，我可以在那裡再僱別的車子西行。車夫起初不肯，後來再三商量，他才答應了。

第二天起了一個大早，天還沒有亮，就趁月光出發了。走了二三里路，向西走的驢車突然又掉過頭來，轉向東方，飛快地跑回英壕去。我原在車中打盹，這時被顛醒了，問車夫什麼事，車夫只說：“殺人啦，殺人啦。”我從車後望出去，果然看見西面一大堆人，有哭叫之聲。回到英壕之後，我說這是搶劫，天亮後行人多，就不要再有，但車夫一定要說是殺人，再也不肯走了。我只得騎了同伴的馱驢隊扯出來的一匹馱驢，帶了兩箱很重的字圖西行。

（五）

走了幾天，經過陝州，到了距離潼關只十幾里的地方，得知前

面走不通了。問人時，說是袁世凱的第六師和陝西革命黨在潼關打仗，這才確實知道陝西已革命了。西去不成，大家計劃北行渡黃河，經山西入陝西。但這時因為天下已經亂了，各地都紛紛圖自保，河南、山西雖都沒有革命，可是山西已不准河南的人過河去，把黃河渡船都控制在北岸，我們找不到船隻。

這時我忽然想起以前在宏道讀書時有一個同學，住在潼關東十幾里的小鎮上；這小鎮屬潼關，所以他仍是陝西人，但因為到底是在潼關外了，我們常常笑他陝西人住在河南地方。這時正好去找他，居然找到了；他也答應設法找船隻，居然也找到了，我們才能過河。

我們好幾個船同時由河南向山西出發，將近北岸時看見岸上聚了一大堆人。船漸漸靠近岸時，岸上有一个人朝天放了一槍，以手作勢，不許我們登岸。我們商量了一下，派一只船，上面只坐了三個人，上前去解釋，告訴他們，我們是預備經過蒲州轉往陝西去的，总算說好了。上岸時見一個老頭子，提着一把手槍，方才放槍的就是他。我們這四五十人連馱驢和這些監視我們的民團，一起到芮城縣去，預備由芮城去蒲州（現在的永濟縣）。

將到芮城時，看見芮城又在嚴陣以待了。城門樓上及城牆上擠滿了人。靠近時有人大叫：“騎馬的下來！”我們就从我們的“馬”——馱驢上下來。他們又叫：“不准進城，到東關去！”我們乃到東關（東門外）的一個小店中。一會兒，城裏來了一個人，說守城的武官叫我們舉幾個代表去接頭。我們一共舉了四個人，我也是其中之一。跟着那人到了城門口，看見城門開了尺把寬的一條縫，只能容一個人走，城門里面，上面一把刺刀，下面一個槍口地排滿了。我們問他們說：“這是做什么？到底要不要我們進去？我們四個人又不

帶武器，何必如此對待？我們這樣走進去，若是刺傷了人怎樣辦？”經辯說後，他們总算把刺刀和槍都退後一步，讓我們走進去。

守城的武官站在他的桌子後面，穿着一件紫紅袍子，右面的袍角提起來別在腰帶里，右手提一把手槍。他凶狠狠地問我們的姓名，問我們從哪裏來，干什么的。等到問明白了，他放下了袍角，把手槍丟在桌上，長出了一口氣，說：“弄了半天，什麼革命黨？原來是些念書人。”我們才知道我們是被當作革命黨看待了。回到東關客店，店裏的掌櫃的才告訴我們說，方才傳說我們這些革命黨的“馬隊”來了，縣官吓得溜之大吉。城上安好了“大將軍”（一種土炮），里面已裝好了火藥、釘子、鐵片等等。一個年青的民團看見我們走近，已經點着了火香預備去引燃“大將軍”，幸而被一位老年人止住了，說這些人載了這許多東西，人在馬上東倒西歪，不象是馬隊，不要打錯了人。於是才叫我們下“馬”來，幸而我們順從了，沒有開炮，否則，不打死人，也要重傷幾個人。縣官到此時還未找到。

(六)

次日，從芮城走了一天，到了蒲州城東南十五里的韓陽鎮。在客店裏我剛打完塵土、正要洗臉的時候，一位同行者面無人色地跑進來，急得只能說“達達，達達，達達”（陝西話稱“爸爸”為“達達”，說“不得了了”為“好達達呀”）。我們問他什麼事不得了，他說店中掌櫃的告訴他今晚這裏要鬧事，叫我們大家小心。我們聽了他的話，不知是什麼事。我想所謂鬧事只有兩個可能：一個是附近鹽灘中有土匪，土匪聽說我們這樣四五十個人帶了箱籠物件路過，可能前來搶劫；另一個可能是革命。不久店裏掌櫃的來了，也只說要鬧

事，却說不清要鬧的是什麼事，叫我們頂好不要睡覺。他的嚴重語調使我們有些人听了毛發聳然。

晚間我支持不住，就和衣而睡，并告訴同伴們有事時務必叫我醒來。睡得正好，被人搖醒了。起來走到一間大屋子里，全客店的人除了幾個人爬到房頂上去以外，都聚集在這裡，大家站着等候有人進來。等了半响，并無人進來，只聽見街上有許多聲音，腳步聲很多而比較整齊，象過軍隊一樣。我們到院子里，從大門縫隙向外看去時，看到過路的人兩個一排，由東往西去，每隔几排有一個騎馬的。我們聽見他們敲一個染坊的門要白布（當時革命軍以白色為標志，打的是白旗，兵士臂上也圍白布條），才知道他們是去革命的。他們向西去，一定是去蒲州府。大家計議，我們原定第二天去蒲州，如今蒲州革命，不能再去了。有人主張在韓陽鎮等着，有人說蒲州清兵和革命軍打，若是清兵敗了，退下來經過韓陽鎮時恐要搶，不如退回東面去。我說即使敗兵要搶，我們也不能轉向東面去，芮城的經驗告訴我們退回去也不一定就平安；況且我們的目的地在西面，哪有向東走與目的地背道而馳的道理？終于決定在韓陽鎮等一天。這一天上午沒有敗兵來，得以平安過去。我們料想蒲州革命已成功，就計議此後的行程。蒲州既已由革命軍占領，必不能再通行。蒲州以南到風陵渡有三十里河岸，由此過河是朝邑縣的南鄉。第二天我們就這樣走，渡河到朝邑縣的時候，已經天黑了。

(七)

朝邑是我的故鄉，這時我父親就住在縣城里。然而我卻不想回去，因為恐怕我父親看見我回來，在這天下大亂的時候，不肯再放

我出去；而我則是負了同盟會的使命，非到西安去不可。所以我預備悄悄地在店里住一夜，第二天一早就走。可是，店主東又說夜間要鬧事。問他是不是革命軍要起事，他說不知道，但確有人說因為知縣那天下午殺了一個刀客，刀客的弟兄們今夜要報仇。同伴們因為我是朝邑人，公推我出去打听一下到底是鬧什麼事。

我走出了店門，當然沒有想去向父親或父親的朋友處去打听。可是出門沒有走幾步，忽然迎面遇到了父親。父親晚間出門，常叫人提一把燈籠走在前面，街上的燈籠很多，我也不能都注意到，父親却先瞧見我了。他叫我的小名，問我什麼時候回來的。我聽到父親的聲音，知道過門不入是不成的了。

我參加革命的事，過去父親也許有些聽得，但不知真相。這一次我完全對他說了，並且說明第二天就要往西安去。我對老人家解釋，如今各地雖然亂，然而都是革命黨，我自己就是革命黨，總不會自己人殺自己人。父親聽了默然，沒有對我第二天去西安的事表示反對。我又問到今晚鬧事的傳說，父親說也不知道是什麼事。我說，同伴們叫我出來打听，今夜就要回到店里去告訴他們，住在店里，明早一齊走。這次父親卻表示不贊成了，他說：“你明天早晨走可以，但今天却望你住在这里。”我只得到店中告訴同伴們說，鬧事傳說的真象沒有打听出來，便又回來。

半夜里，果然鬧事了。有人打我們的大門，也打街對面舖子的門。我們的房子在城外，靠城門很近，為了怕變亂，不久前特地在後屋屋頂上開了一個天窗，下面放了一架梯子，這時大家都爬上了屋頂。忽然城樓那面來的子彈從我們頭上飛過。陝西較好一點的房子，屋脊是相當高的，我們蹲在屋脊後面躲著，聽見城樓上的兵士問下面的人：“城下是人還是鬼？”如答“是鬼”，就不開槍；如答“是

人”，就开枪射击。“鬼”，大概就是当夜革命军的口令了。我们还看见域内有火光（后来知道是知县衙门被烧了）。过了一阵，下起雨来了，我们大家只得都下来，幸而以后再没有什么事。

翌晨，天亮了许久，还没有人敢开门。大亮之后好些时候，街上才有人走，城门楼上已经挂了一面大白旗。邻居们也逐渐出来张望，大家才知道知县衙门昨夜被烧了，县官也被捉住了。我这时也无暇去打听本县革命的消息，赶快去找了同伴们，即日同去西安。四天之后，到了西安。这时已经是九月二十四五，离开上海已经一个多月了。到西安后，过些日子，才知道那晚在朝邑起义的是我私塾时代的一个名徐召南的老同学，才知道知县李焕燮（湖南人）虽被捉而并未被杀，后且为一“刀客”出身之某小军官做秘书，得全性命。

(八)

到了西安，才知道陕西的革命九月初一就发动了，那时我还在北京等火车。又知道因起义时井勿幕不在西安，是由张翔初（凤翮）领导的。当时清朝的新军在陕西有一混成协（相当于后来的旅），协统（旅长）是旗人，张是协统下面的一等参谋官。革命后陕西的首领没有称作都督，而叫做大统领（后来为与各省划一，改称都督）。在大统领张凤翮之下另设四个都督，象后来的厅长一样。

到了西安之后，最感意外的是除了张凤翮之外，所有要位都在不识字的老会人手中。四个都督好象全是老会的人——至少有三个是；张凤翮没有实权，财政和兵权都在老会手中。郭希仁在张凤翮下面做个秘书长之类的事，终日忙得不亦乐乎，我们戏称

他为“郭丞相”。此外又設了四个参議，我到西安后也补我做参議。参議們每天批公事，什么实际的事也不管，例如有人来告状了，就順着状子上的語气批一下，也不問事实真相如何，整天紙上談兵。李子仅(元鼎)、茹卓亭(欲立)終日在做批公事的参議。

过了两三个月，我实在待不下去，想走。井勿幕膺了陝北招討使的名义駐节三原，这时也回到西安，他也觉得不滿。同同盟会的人談，大家都認为革命失敗了。我預备到汉口，井勿幕希望我見到黃克強(黃当时是大元帅)和黎元洪(黎是湖北都督)时，請他們派一支革命軍来陝西驅除哥老会势力(这时已是民国元年春天，清廷大势已去，袁世凱已出来要求媾和)。井勿幕写了两封信給黃克強和黎元洪，張凤翥也以陝西都督的名义备了一封正式公事給湖北都督黎元洪，都由我帶去。張凤翥給我一张离开西安的护照，以为可以凭此出城。不料到城門口时，大統領的护照和参議的身份都沒有用，兵士不許出城，說一定要有“大哥”的护照。这位哥老会的“大哥”叫張云山，是当时四都督之一。我又去找張凤翥，对他发了些牢騷。他叫秘书去請“張大哥”另发了一张护照，我才离开西安。

(九)

当时河南还在清廷手中，从郑州到汉口的一条路是不能走的。我預备由西安翻过秦岭到龙驹寨，听說龙驹寨到汉口水路仍通，而且当时龙驹寨电报局局长楊叔吉是我的老同学，預备到龙驹寨去找他。这一次到汉口去，井勿幕叫我請黃克強接济軍火，我当时因为自己不內行，另找了一个同伴，陝西陸軍中學毕业的，四川人，叫湯万宇，一起出发，作为我的軍火顧問。

到龙驹寨，找到电报局局长楊叔吉。楊說去汉口不成問題，因为电报局有一位师爷賈东垣去年冬天曾到老河口买过电綫（当革命的时候，农民間因传说电綫杆子破坏了风水，以致收成不好，于是把大部分电綫杆子全砍断了，电綫也拿走了，所以必須补添），过几天还要再去，可以搭他的船同行。由龙驹寨到老河口这一段中，经过河南，或有危险，但陕豫交界的荆紫关的清軍长官姓任的与賈师爷認識，可以請他关照；至于老河口到汉口，则在湖北境内，換坐大船，毫无問題了。为了小心起見，我又去找賈师爷，問在河南境内一段究竟有无危险。賈說“任大人”（我忘了他的名字和职位，当时确是如此称呼的）绝对可靠，不但从前見过，吃过他的飯，过年的时候他还派人送乳来。因此，我也不再疑惑，乃同賈东垣、湯万字，带了四个卫兵启程东下。

两天以后，到了荆紫关。上午十点左右就到的，賈师爷上岸去拜訪任大人，請他派兵护送我們出河南境。但一去四五个钟头不見回来。湯万字說：“不要是出了什么事吧？”我經他一說，也担忧起来，但推測也許賈在城里抽鴉片（賈是一个秀才，喜欢抽鴉片烟）或是打牌，所以沒有回来。到下午四五点钟，任大人派人来，請我和湯万字进城去吃晚飯。我們此时才比較放心，但因为和任不認識，託故辭謝了。天快黑的时候賈师爷才回来，說在任大人那里打了几圈牌，任已答应派兵护送我們出河南境。果然不久就有二十个兵到来，他們另外准备了一条船护送我們。第二天清早，就一齐出发了。

又过了两天，到了浙川厅（現在的浙川县）。船还没有靠岸，远远看見岸上黑压压一大羣人。我还以为有庙会，但這些人都望着我們的船，向我們的船指指点点。这时我們还未細想，忽然对面划过来一条船，把我們的船撞停了，跳上来三个人——后来我們知道这三

个人是代表政軍学三方面的，政方是知事衙門的师爷，軍方是团練方面的武官，学方則是士紳之流。他們問我們从哪里来，几个人，做什么的。賈师爷实告是去老河口买电綫的。我說是因为有个弟弟在汉口病重，到汉口去看弟弟的。湯万宇說是回四川去的。武官問他，由陝西回四川怎么走到这条路上来了？他說，因汉中广元这条路上有土匪，所以繞道汉口。武官于是說：“我們接到了荆紫关任大人的电报，說你們是革命党，叫我們来捉拿你們。”我們当然不承認是革命党。那个办学的士紳就把我拉到一边，輕輕地对我說，叫我告知实情，以便代为設法解脱。我怕他騙我，矢口不認。三个人見沒有結果，就走了，派了两个兵在船艙两头口上把着看守我們。

他們走了，我想这回可糟了。但若沒有証据的話，我們可以堅不承認，或可倖免。而我身边所有的証据是两封給黃克強和黎元洪的信和一份陝西都督給湖北都督的公事，必須立即毀去。我想着毀去的办法：若是丢进河去，恐怕他們特意派了人在下游等着，如被他們撿了去的話，是我們送証据給他們；若是吃下去，这样厚的长信和桑皮紙制的大馬封，如何吃得下去；若是用火燒的話，有烟，也有紙灰，况且还有两个兵眼睜睜地看着。想了一会，最后决定还是燒。幸亏那时天气还冷，艙里生着炭盆，我就佯說太冷，叫添炭，又故意挑了几块沒有燒熟的炭加进炭盆里，燒得滿艙是烟。我們还故意罵拿炭的人太笨，为甚么拿这样的炭。“烟幕”布置好了，为減少两个兵的疑心起見，我乃走到两边艙口，請那两个兵进来烤火。两个人看見这样的“先生”請他們烤火，有些不习惯，同时大概也是因为怕进艙后我們若逃掉一个人，他們会犯嫌疑，所以不肯进来。我一再請他們，他們推辭着更走远了一点。这当然是正中下怀，于是我們三个人便围着炭盆，把信和公事撕成一片一片放进炭盆去。又因沒

有火苗，紙燃不起来，我們就一面嚷火不行，一面拿一把扇子扇火。紙灰飞起来了，我們就說，誰这样糊涂，拿炭的时候連紙也夹在里面了。两个老实的兵士就被我們这样騙了过去。总算把信烧完了。

証据消灭了还不到十分钟，检查的人就来了。把我們所有的行李都查了一遍，一无所获，只有賈师爷所带的二千两和我們的几百两銀子。他們又說，厅知事請我們到衙門去住一夜，可是我們离船时他們又叫我們將全部东西都帶着，連四个龙駒寨电报局的卫兵也帶着。我們知道这次事情将很麻煩了。可是因为証据已全燬了，所以也不太怕。

(一〇)

我們三个人进了厅知事的衙門，从大堂到二堂，从二堂到花厅，两旁密密地排了武装的兵士，背对背地站着(所以实际上是有四排了)，情形看起来很严重。走到花厅門口，厅官走到屋外来迎接，他把我們打量一番之后，举手許我們进去。賈师爷年紀大，被許到上面平床上，湯坐在东面，我坐在西面，厅官也坐在西面我下首的椅子上。他是个小个子，八字白鬚鬚，浙江湖州人，說起話来滑头得很。照例的官派的寒暄过了，問了我們的来历，我們的回答和船上所說的一样。他又說到荆紫关姓任的軍官的电报，我們說根本无此事，希望他小事化无，放我們走。他不肯，說：“这事兄弟不敢担肩(負責任)，要送三位到南阳，由軍門大人发落。”他說的軍門大人是指南阳府的鎮台，姓謝，因为是道士出身，百姓叫他作“謝老道”，素以杀革命党出名。我們想，一送到南阳便凶多吉少，但是和厅官爭执也难有效果，就許了出来。

出了会客厅,我們馬上从客人降为囚犯,进了监牢。第二天,我們从监牢里被提出来,点名后在頸上拴上鉄鍊,向南阳出发。路虽是山路,但允許自己花錢坐轎子。所謂轎子,是用一只椅子和两根槓子組成的,比四川滑竿还不如,我們每人都僱了一乘。頸上的鉄鍊始終有一个“解差”牵着,每到一個村鎮似乎是招搖过市,引得大家都来围着看。后来我总算同解差講好,把鉄鍊子交給我,藏到皮袍子里面去,拖下去的一段放在皮袍子底下的西装衣袋中,虽然很重,到底不会处处被人围观了。解送我們的卫队一共有二十个人,队长特別同我拉攏,称我为同志。我怕他有花样,不愿答理。后来他說,謝老道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知府知县都是族人,叫我們特別小心,最好到南阳以前先写好几封信和柬帖,到后分送政学各方面,叙說自己实是冤枉,这样或可得到开脫。我想倒也有理,后来是照办了的。后来想,他也可能真是個同志。

到內乡县,浙川来的人算有一个交代,把我們送到县衙門大堂上点名換鉄鍊(他們給換鉄鍊取了一个很雅的名詞,叫作“換綫”)。在內乡我們是住在待审所(比監獄好得多),知县还派人送了一桌酒席来。我們生死不可測,心緒很坏,誰也吃不下,就送给待审所的人們吃了。大家对这县官是什么用意,也猜想不出(現在想起来,也許是“一脚踩两只船”,投机一下而已;那时年青,还以为可能他是在酒席中放了砒霜要毒死我們呢)。县官又派人來說,晚飯后有空的話想見一見我們。后来因为我們同来的龙驹寨电报局四个卫兵,突然逃走了一个,县官大概怕我們也逃走,那么他如會見我們,岂不有了嫌疑,所以又取消了這個约会。

次日,由內乡到鎮平,也是住在待审所中,也是在大堂上点名“換綫”,遊解的差人也換了。第三天到了南阳府,並沒有直接送到

鐵台衙門，而是送到南阳县衙門。由这时起我們三个人就被分开了，进了南阳县三个不同的監獄。

(一一)

我住在一間非常骯脏的小屋中，挤滿了十来个人，沒有床或炕，也无法在地上把鋪盖打开。夜里睡醒时，常发现别的犯人拿我的腿和脚做枕头。空气当然是非常污浊。到后第二天早晨，我拿出几两銀子託獄卒換一点錢。那时一两銀子可以換兩吊錢，但獄卒換来的行市是一两合一吊二百錢。他問我要吃点什么，我說不想吃什么。他安慰我說：“事有事在，飯总要吃啦”，并且建議我吃“糊辣湯”（是一种河南街头食品，或者是因为吃起来胡拉有声，故名）和餅。我同意要一碗湯、一张餅，但他叫出去时却說“要二十张餅，二十碗糊辣湯”。我告訴他我只要一碗湯、一张餅，他回答說：“先生，这些人也要吃啦。”我才明白新囚犯应当請旧囚犯的道理：旧囚犯穷了，等新囚犯来，大家吃他的；新囚犯吃光了，他也就变成旧囚犯，再吃后来的新囚犯。

我在鎮平的时候，就把給各方面的信和稟帖都写好了，此时託獄卒找人送一下。我想特別多給点錢，付他二百錢作送力，可是他竟要兩吊，只好照付。

这里又有一件奇事出現。那天早晨，忽然外面叫問有张先生沒有，某師爷（我忘了他姓名，后来知道他是知县的亲信师爷）来看他。接着就有一个三四十岁的人走进来。我站了起来，他却客气得很，一下子就坐在地上，攀談起来。他說：“听说諸位来了，敝上司派兄弟来看看，敝上司深恐諸位是冤枉的”，等等。我于是又說了一

逼弟弟在汉口生病的話。他滿口答应：“等軍門大人回來，敝上司一定代各位說說各位冤枉的情形”；並且說：“現在兄弟先回去回敝上司一下，一兩天敝上司有空時還想見見各位。”又問我有什麼事，他可幫忙。我說要換銀子，他連稱不必，“回頭兄弟叫人送錢來。”果然走后不一會就送来四吊錢。後來我才得知他看過我之后還去看過賈、湯二人。這個人到底是什麼用意，我到現在還不明白，總之，他很幫我們的忙。獄卒從此對我當然也客氣得多了。

不料這位師爺一去十幾天沒有下文。一天夜間我已經睡了，忽然被叫醒，說：“請張先生出去。”我以為夜里提人大概是要行刑了，可是出門后看見賈、湯二人也从外面（他們的監獄在外面）向里走進來，又似乎不象是解往刑場的樣子。緊接着我們三個人的鋪蓋也搬進來了，而且直帶我們向里面走。走過大堂后，在一間屋子里見了上次那位師爺。他說，因為知縣事忙，所以到今天才能接見我們，很對不起。我問是怎樣見法，他含含糊糊，不願給一個具體回答。我直截了當地問他，見時是不是應當跪下。他吞吐許久，最後說：“還是跪下好。”我又問他是不是應當稱“大人”，他吞吐之后也說：“還是稱大人好。”知縣是在二堂“接見”我們的，賈東垣第一個進去，第二個是我，走進去時才知道根本就是坐堂審問。臬大老爺頂戴馬褂高坐上邊，堂下兩邊站着十幾個衙役，其中有的手執刑具。當我走近階下時，十幾個衙役同聲喝“跪！”這時才恍然方才問那位師爺關於跪不跪的話真是多餘。

審問的情形是官樣文章，他完全照我稟帖上敘述事實的次序問了一遍，毫無挑剔。最後知縣說，他也覺得我們象是冤枉，等軍門大人回來，他可以替我們解釋，並且叫我們住到外面一個比較好一點的地方去，不住在這又小又脏的監牢了。臨退堂前，他還囑咐

我們在那里安心住，意思自然是叫我們不要跑。

我們当晚搬到一个优待的监狱里，一个小院，只有三間房子，据說是“告上状”（各县到府来上告）者或有功名的人住的监狱。从此以后，我們三个人又住在一起了。搬过来之后，那位师爷最初来看过我們几次，还送一些他自己家中烧的紅燉牛肉等食品，但是后来又不来了。我們一住两个月，愈过愈焦灼不安。

这两个月的日子真不好受。隔墙就是重犯监狱，铁鍊的声音时常可以听见。鐵台处的下文听不到，我們以为不免一死了。半夜里灯光如豆，听到門外馬蹄声或是刀枪的磨擦声就不由感到心惊。日子就随着恐怖的黑夜蠕动着过去。这两个月中，白天还可以拿看书来排遣，就是夜里睡不着时特别焦躁。賈东垣有他的烟灯作伴，还好，我和湯万宇最觉烦闷。

我在上海念书时有一个同学是南阳府人，叫周起孟，当时并不太熟，别后亦未通信。我这次到南阳后与学界人的信中有一封便是給他的。信去后多日沒有消息，我以为或者是信未送到，或者是他不愿来。不料有一天有一个身穿粗布小棉襖，系着腰帶，完全农民模样的中年人来看我。他說他是周起孟的哥哥，特来告訴我說起孟到湖北参加革命去了，所以不能来。此事給我一很深的印象，因为周起孟在我看来似乎是一个心气和平、与世无爭的人，而現在居然也参加革命，可見当时革命思想传播之速之广。后来他回南阳后，也来獄中看过我一次。

（一二）

看守我們的有四个兵，三个年老的很謹慎，一个年小的才十四

五岁,常偷偷告訴我們一点消息。南阳与湖北襄阳接壤,襄阳的革命軍由季雨霖率領,准备攻打南阳,因此謝老道常在南阳、襄阳边境部署軍队并构筑防御工事,偶然回南阳府也很忙。有一次那个小兵說謝老道打败仗了,我們一喜一惧,因为固然希望革命軍来,可是又怕謝老道放弃南阳时临走把我們这些革命党全杀了。有一次那个小兵又来告訴我們說,季雨霖快要来了,城内住戶的灯笼都已拿到官家去准备作守城之用。可是那天夜間革命軍并没有来攻城。

南阳光复的前两天,情形越来越严重。我們全靠那小兵报告消息。有一天,他說季雨霖离南阳只有五十里了,次日上午还说有三十里,到下午又说只有十几里了。謝老道在南阳以倔强嗜杀著称。因为他倔强,我們总以为他到退无可退时一定要背城一战;因为他嗜杀,我們恐怕他在弃城逃走前或者要杀我們以洩憤。因此,我們对于季雨霖越来越近的消息是有相当矛盾的反应的。不过因为只有季雨霖来了我們才能出去,而謝老道的临时决意却是或然的,所以还是希望季来的心切。何况在公約方面讲,当然也是盼望革命軍从早光复此地呢。

最后一天的演变几乎是戏剧性的。清早起来不久,一个老兵說:“昨天知县下乡去查乡,沒有回来。”小兵在一边插嘴說:“哪里是查乡?我看他是跑了。”又过了一会,忽然另外一个老兵叫我們到院子里去看,說鎮台衙門起火了,謝老道已經跑了^①。再过几十

^① 我当时在南阳听說他带了亲信卫队逃了出去,在路上他的卫队把他搶了,他憤而自杀。杀人不眨眼的鎮台或“妖道”下場如此。然而后来有人却不愿让他这样平凡地死,甚至也可說不大光荣地死,又造出些神話来。抗战前有一本叫做《辛亥殉难諸臣記》(金梁著)的书,却說他死得非常壮烈,是于兵败后,衣冠頂戴,北向三跪九叩謝恩而后“尽节”的。

分钟，听见街上有人放枪。小兵从街上回来，背了半个小猪，说这是他抢来的。又过了些时候，看大门的老头子跑进来笑脸相迎地对我们说：“张爷，汤爷，你们的人来了，现在你们可以出去了。”

我们到门外去看，有些老百姓，包括男女老幼，在抢一个当铺，大家抱了很多衣服出来。季雨霖的部队这时只有四个骑兵进城，告诉大家不许抢，果然大家都不敢抢了，把已经抱出来的东西都放在十字路口堆起来，预备退还当铺。过一会，家家门上都插白旗，表示欢迎革命军。我们因为外面太乱，而且流弹也很多，所以决定暂时在狱里再住一两天。由那时起，狱中一切便由我们支配了。

第二天，我们正预备搬到旅店去住，季雨霖的参谋部有人来找我们了。原来我们在浙川南阳途中在内乡逃掉的那个卫兵，回龙驹寨报告我们被捕的消息后，张凤翥也就知道了，早打电报通知湖北方面，叫季雨霖到南阳后立刻释放我们。出来之后，季雨霖的参谋部还请我们帮忙。我们因急于赴汉沪，自然谢绝了。离开南阳前，逛了一次臥龙岗，看见岳武穆所书出师表石刻，是此行唯一值得纪念的事。经过襄阳到武汉，看见湖北的革命也是一团糟。由汉口到达上海，已是四五月间了。

(一三)

在上海住了半年多，曾到南京去看过临时政府的情形，也感觉很失望。在陕西，我感到是一些无知的人代替了另一些无知的人；由武昌到上海，沿路所见，也很难令人满意。当时我颇感觉革命党人固然是富于热情、勇气和牺牲精神，但革命成功后对于治理国

家、建設國家，在計劃及實行方面，就一籌莫展。因此除了推翻清室，把君主政體換成所謂共和政體之外，革命是徒有其表的。皇帝換了總統，巡撫改稱都督，而中國並沒有更現代化一點。某些人所說的“破壞容易建設難”一句話，不幸完全証實。在這種失望情形下，我便決定到外國去讀書，預備學些實在的學問，回來幫助建設革命後的新國家。

在未出洋前，也就是在上海的後一段時期中，有兩件事或者值得談談。一件是與孫中山有關的，一件是與選舉國會議員有關的。

孫中山當時已經赴袁世凱做臨時總統，他自己決心辦實業，並且以修築二十萬里鐵路為號召，組織了一個鐵道協會，會員多半是同盟會會員和後來的國民黨黨員，我也是會員之一。當時袁世凱為了排擠孫中山，乃叫他的交通部路政司司長葉恭綽在北京又組織了一個鐵路協會，包括一批北洋官僚（即後來所謂交通系），以與南方的鐵道協會對抗。後來再進一步，鐵路協會竟要求取消鐵道協會，不久又調換槍花，要與鐵道協會合併（實際上就是要吞併鐵道協會）。當時我們聽了都很生氣，覺得袁世凱不但在政治上容不了孫中山，連實業，甚至連一個空洞的鐵道協會，都不許他辦。大家生氣得很，談起來都堅決反對合併。

過了幾天，鐵道協會要開會了。我們紛紛議論，以為這一次開會一定要決定反對合併。果然，開會之後，孫中山請我們發表意見，發言者大概都反對合併，大罵袁世凱。不料孫中山自己在最後發言，卻主張合併。他舉了許多理由，分析得很清楚，大家聽了覺得也很合理，到表決時竟然大多數都贊成合併了！這固然表示大家當時對他的信任和擁護，但同時他的口才的確也真令人佩服。那時的革命黨人每個都是自負不凡，他居然能列舉各種理由（不管在

現在眼光中看起來是否正確)，完全依邏輯方式推論，毫不煽動地折服了人心。這確是他的一種過人之處。

後來章行嚴（士釗）有一次曾同我談起孫中山的說話本領，他也很佩服孫中山的辯才。他說：“我每次去看孫中山，未進他的門以前，覺得他是不對的；可是見了面聽他講話時，又覺得他頭頭是道，確有道理；等到走出來之後，又覺得他还是錯的。”從章氏此話也可見孫中山的口才的一斑。

另一個與孫中山有關的事，是他有一次應當時的中國社會黨黨魁江亢虎之邀，在丹桂茶園講社會主義，一天講兩小時，連講了三天，我也曾去聽講。他的講題是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那時我还是第一次聽到他的公開講演，也覺得他的完全邏輯式的陳述中有一種特別的力量。他講到馬克思學說中共產主義實行後社會沒有階級，人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時候說：“那時候人生的物質需要就象我們的蘇東坡先生所講的兩句話，就如山間明月，江上清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了。”這幾句話留給我的印象相當深刻，到現在相隔三十多年，猶如聞其聲。

（一四）

我在上海準備出洋的時期中曾回陝西去過一次，這一次回鄉很有意思，是選舉國會議員去的。這是民國成立後第一次選舉，有些情形或者值得記述。

當時選舉國會議員是採複選制。每個縣分為幾個區，每區選出幾個代表，這些代表稱為初選當選人。再將全省分為幾個區，由每區所轄各縣的初選當選人投票，選出來的才是國會議員。我在

上海,忽然接到家中来信,說我已在初选中当选为代表。我当时很奇怪,感到我在十一岁即离开乡間(我是朝邑南乡人),十八岁即到外县去念书,知道我的人很少,誰会来投我的票?同时我更感到奇怪的,是乡下人不識字,如何会投票。我当时对于是否回陕西去在复选时投票,也考虑很久,不能决定。回去吧,这一次实在太远,路费也不少,回去了,还要出来准备出洋,未免太不經濟。不回去吧,我們在当时讀的讲民主政治的书上都說投票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若是公民都不尽这种义务,政治就要被少数人把持操縱。考虑的结果,认为既然参加过革命,对选举也应当尽公民的责任。因此就自掏腰包,路迢迢地回陕西去投票。

到家之后,才明白我何以能当选及乡下人如何会投票的道理。原来自从要“办选举”,朝邑就設了一个选举事务所,并由事务所請了各乡紳士,商量选举的办法。依照法律規定,朝邑县按人口比例应当有二十一个初选当选人,又規定大約有若干选民。选举事务所請下的各位帮忙的紳士的实际任务有二:第一,他們要决定各乡应当当选的人名单。第二,他們要僱些書記为这些“应当”当选的人按法定票数(拿二十一除全县选民的总数的得数)抄写若干票(譬如說每人二百张或三百张)。抄写好了,还要把这些票封在一个框子里,再把这框子送到县里,定期开框数票。数票后当然是人人当选,因为不能当选的人的票,書記根本一张也沒有写。也可以說,因为要当选才写的,不当选何必写呢。当年“办选举”就等于“办差”。別县的办法或技术如何,我不晓得,我們朝邑的确是这样“办”的。我的故乡属于朝邑南区,选举事务所的紳士們有許多知道我和革命有关系,就把我的名字列在里面,我也就因書記先生一番抄写之劳而当选了。

朝邑县在复选时属于陕西东区，在潼关投票。前一两天，同区十几县的人都陆续来了。我到了潼关，认识我的人见我从我上海回来，都以为我是来竞选的。我告诉他们，我已决定出洋，这次是来投票的。他们之中除了和我很熟的人以外，都不相信，认为决无从上海不远千里赶回来投这一票的道理。

可是无独有偶，第二天又来了一个我的同志，这人就是在抗战第一年作古的全国闻名的水利专家李宜之（仪祉）。他是从南京赶回来投票的。李宜之是蒲城人，他的伯父李仲特是数学家，在陕西高等学堂教过数学；父亲李桐轩，是文学家（后来陕西从事改良戏剧的易俗社初期所用的剧本，多出于桐轩先生之手），两人都赞成革命，和井勿幕是小同乡。有一个时期，李宜之的伯母和母亲都已去世，他和他的哥哥尚未结婚，所以朋友说他们是“一家人四口，革命党两双”。他是京师大学堂预科毕业后去德国留学，回来后在南京河海工程学校做教务长。他虽未积极奔走革命，但对革命始终极同情，所以这一次也赶回来尽公民义务。他是有名的书呆子，我和他又根本没有从事竞选活动，所以大家终于相信我们并不是为了想做国会议员而来的了，终于相信天下竟然有为尽公民义务，不远数千里而回来投票的傻子。

这一次选举，可以说中华民国成立以来所有的选举中最清白的一次，大家根本不懂行贿赂，连请客的事也没有，完全是靠情面拉票子，真有点“古风”。到二次选举，大家晓得票子可以卖钱，就一塌糊涂了。

我们东区选举出来的众议院议员共有五个，其中后来为人所知的现时大概只有两个：一个是马彦祥（驥），抗战初起时张自忠做天津市长，他是秘书长；一个是寇胜浮（選），在段祺瑞执政府时代

曾因国民二軍关系做过农商总长,是一个出名的书家。

从陝西回到上海,我就加紧准备出洋。革命朋友們当时对我“遊洋”(那时不叫留学)之举頗有表示反对的,认为是不負責,把革命事业让給进步党和北洋軍閥官僚就不管了,而我則深感到沒有現代知識或技术一切都办不到,于是就不顧朋友的批評,决心出国赴美。我在出国前,本来是預备学土木工程的,这自然与上面所說的鐵道协会会员一事有关。不幸到美(民国二年七月)后,因教学不好,对画图又乏兴趣,未入学即改变計劃。当时陝西派的留美学生共四人,除我外,其他三人是严庄、刘楚材、林济青。林济青是山东人,革命后因在陝西外交司做事,又因当时革命党人頗富大同思想,沒有省界观念,所以就派到了他,以后可就不容易了。

我在辛亥这一年

馬叙倫

(一)

辛亥年夏天，我随着我的老同学湯尔和到日本东京去玩了一趟。他是为筹办浙江医药专门学校的事情去的；我此行目的则是去找章太炎先生。論亲、論年，章先生都是我的长辈；不过我在上海办报的时候，和章先生是时常碰头的，所以我们是誼在师友之間。那时章先生和他的大女儿章效、女婿龔宝銓一同住在东京乡間，房子很小，里外不过十多张蓆子的大小。章先生和我算是有凳子坐的，龔宝銓就只好席地而坐了。他和我談起国事，談得很热烈，定要留我吃午飯。米飯是白得不能再白了，但是配飯的菜只有一碗大蒜煎豆腐，是我們杭州极普通的家常小菜。他的生活竟然如此俭朴，我真沒有想到。談話时，我請他介紹入同盟会，他答应了。但是他却想回国。我也答应他，等我回国后和我的老师陈獻宸先生商量，替他想想办法。因为陈老师和他好朋友，他第一次逃亡台湾，就是由陈老师事先得到了清朝要逮捕他的消息，通知他逃走的。这时陈老师正在做浙江諮議局議長，或者可以想点法子。我回来以后，自然也同陈老师談过这件事。恰巧这年浙江大水，浙东很鬧了些乱子，章先生的故乡余杭县也有水災，而且也鬧了事。

我怕他在这个时候回来，于他不便，就去信说明这种情形，请他等一等再说。

(二)

这年，清朝政府要把商办铁路收归国有。沪杭甬铁路的路权原是由江、浙两省人从外国资本家手里争取回来，由江、浙人自己筹款办的，而且办得也相当不错。铁路局总理是一位在浙省负有盛名的人士汤寿潜先生。他是翰林出身，老虎班（翰林散馆放知县，照例马上得缺，俗称老虎班）安徽某县知县。他善于在八股文里议论时事，文章也做得出色，另外还写了一部《危言》，大谈国计民生，对于盐务问题，所论尤多。那时他和写中国古代史的夏曾佑先生被称为浙江双璧（夏先生也是老虎班安徽知县）。他们又都是辞官不做，所以名气更高。

当时江、浙两省人为了反对沪杭甬铁路收归国有，闹得不亦乐乎。清朝政府耍了个调虎离山之计，把汤老放出去当某处盐运使。江浙人却留他不放，汤老也不肯去，清廷就把他革职了。这样一来，正是火上加油。争路的代表由京回杭之后，铁路局开股东大会，我和汤尔和、楼守光（诸暨人，路局议员）想把事态扩大，借此来送清朝的终。我和汤尔和都是穷光蛋，守光也不是富裕的人，都想在大会里去发生作用，引起革命。便由守光想法借得几个股权，一同参加了大会。这次会场果然被我们控制住了，大家一致主张挽留汤寿潜，反对浙路收归国有。那些早预备好了替盛宣怀捧场的人，都不敢吐一吐舌头。那时有人这样说：“这次股东会是三个小老头儿开的。”因为我和尔和都蓄了长鬚，守光也有鬚髭，其实

論年紀，我還不到三十。

沒多久，武昌起義了，我們三個人就借這個因頭，和陳老師商量在省城辦民團，表面上說是為了加強防衛，實際上是預備響應。陳老師自然贊成，就聯合了地方紳商共同發起。民團局籌備就緒後，在諮議局開成立會，公推湯老做總理，陳老師為副，並請巡撫下照會。我們三個人分任城里上中下三段的重要職務，並預備要一匹馬，做巡夜的代步。爾和生長在江北，江湖上武藝很來得幾手，自然要託他做領導了。民團雖然按照我們的意圖辦起來了，可是必須要有槍械才有作用。我們便一面正式向巡撫去要，一面和督憲公所總參議袁思永去商量，請他盡量把新式的槍械撥給民團。袁思永本是湯老的門生，而陳老師又是諮議局議長，他自然一口承擔。但是，這件事不曉得怎樣走漏了風聲，巡撫增租把照會攔了起來，杭州的駐防守軍也把新式槍械都提走了。這麼一來，我們原來的打算就落了空。

我們又想找別的路子。上海光復以後，我們由杭去滬，到民立報館找于右任。他告訴我們說，浙江的革命機關在振華旅館。我們要找褚輔成，沒有找着。那時上海附近各地的富家都紛紛逃難到上海來，我們往來常住的漢口路上海旅館，擠得一個鋪位也沒有，而我們袋子里也“空空如也”，只得仍回杭州。我把外祖母、母親和我的妻小都送到鄉下，一個人單獨守着一所住宅。我的一個出裸弟兄（杭州人管鄰舍從小在一起的叫做“出裸弟兄”）程途，武備學堂畢業，這時在標統朱瑞部下當排長。九月十三日晚上，他趕來告訴我說，他得到標部里的消息，一兩日內杭州也要動了。可是沒想到當夜就起義了。

(三)

第二日大早，我急忙赶到諮議局，副議長沈鈞儒已先到，正在陈老师臥室里談昨夜起事的情形。沈鈞儒因为起義时在布告上署名的都督“董伯吹”是什么人大家都不知道，主张赶快把湯螯老（湯寿潜的別号叫螯仙）从上海找回来。当即由我起了个简单的电稿，除了由陈老师、沈先生和我具名之外，沈鈞儒还加上了褚輔成的名字。电稿拟妥后由我送請铁路局代发。

当天就有一部分军队方面的人到諮議局来办公，可是一顆印信都沒有。我便去刻好了一颗“浙軍都督府都督之印”，取回后立刻应用起来。我还带着封条，去把大清銀行和布政司、盐运司等衙門都次第封了。

这日下午，我到車站去接湯老，从駐守車站的起義軍官顧乃斌（八十二标标統周承莢部下）处打听到，周承莢已經担任了都督。一会儿，火車打着白旗进入車站。湯老随带了张竹生和另外两个人一同下車，直到諮議局。到一間普通接应室里，只見人头攢动，劈头就听见駐防協領貴林說話的声音。我引着湯老一行，排开众人向里走，迎面看見周承莢巍然端坐中央，两脚排成八字，两膝之間立着一把佩刀，两手握住刀柄，凜然是个大将气概。陈老师和貴林在两旁相向而坐，湯尔和坐在周承莢右侧，担任临时書記，記錄紙上已經一条一条地写下了不少条款。原来貴林是代表駐防旗营來議降的，他也全身“命服”，最惹人注目的是两根雪白的忠孝带。他侃侃而談，似乎还在爭某些条件。他一見湯老到来，立刻就說：“螯老来了。螯老怎样說，我无不依从。”这时，周承莢却不作声，起身迎詎

湯老就座。湯老也儼然以都督的身份，毫不謙社，草草看了一遍條款，就說：“便这样，我签字吧。”隨即提起筆來簽上他的大名。这样一來，大家都無話說，一場議降會議，就此告終。但是算起來，湯老已經是第三任都督了。

我記不清楚那天為什麼事離開了諮議局。直到晚飯以後，我再到諮議局，看見湯老一個人踽踽涼涼很無聊的樣子。這時，褚輔成在機關部，沈鈞儒臨時擔任警察局長，都沒有和湯老見面。一會兒，張竹生來了，請湯老着手組織都督府。湯老開了一張名單：民政司長陳黻宸，財政司長張竹生（他的大名我忘記了，竹生是他的別字），教育司長沈鈞儒，褚輔成是什麼“長”，我記不清了。我和樓守光都是秘書。但是，這個名單怎樣發表呢？因為這時外邊槍聲常常掠耳而過，旗營還被圍着，駐防也不肯降，據說下午的會議上所商定的條件不能算數。湯老叫我和樓守光出去打聽打聽。我從回回新橋走出大街，落北向官巷口走，一路上十個五個的兵把旗營包圍着。我剛走到官巷口，在一盞路燈底下被一位排長叫住了，他說：“先生，前去不得了，迎紫門上有守軍，不時放槍呢。”我聽他說話的聲音，知道他是我在養正書塾做師範生時教過的学生傅孟（他在書塾的原名，我記不得了，這是他進武備學堂改的名字，他和黃郛是拜把的）。我問他怎樣了，他說：“還不肯降。”我也就折回來了。湯老叫我起兩個草稿，一個是給湖北都督黎元洪的電報，一個是豁免全省錢糧的文告，後來用的是不是我的草稿，我就不曉得了。豁免錢糧這件事，使浙省財政遭到困難，曾因此舉了三百萬的省債。

(四)

杭州光复后的第二日早晨,我因为要去安慰一下母亲,就到乡下去了。在乡下多耽擱了一夜,再回城里,局面已全然不同了。湯老固然正式做了都督,但是沒有实权。褚輔成做了民政长,而他这个民政长和湖北、江苏等省的不同,是和都督平行的。貴林和他的儿子都被枪毙了。原来,駐防不肯投降,駐扎在瓶道山上的革命軍,用大炮对着旗营南門,要发炮攻击,他們也居然还想发炮抵抗。幸而他們炮上的門子早被革命軍方面叫帮里的朋友张子廉想法卸去了,那門炮就沒用了。因此,他們終于只好把許多枪杆丢到河里,向革命軍投降了。

貴林被枪毙的罪名是图謀反抗革命,但据我所知,他并无意为他的主子尽忠。他在滿籍官員里面还算是比較开明的,喜欢結交知名之士,对宋平子^①几乎是师事的,并由宋平子介绍,又結交于陈黻宸老师。武昌起义后他曾向陈老师請教。陈老师劝他不可拘执君臣之义,应该看在老百姓的份上;并且老实告訴他說,清朝政治太腐敗,已經沒有希望了。貴林又邀陈老师去見了他的母亲。陈老师向他的母亲恳切劝說了一番,并且說:“将来如果有事,只要你們不抵抗,总可以保証你們的生命安全的。”他的母亲就对貴林說:“陈先生是至誠君子,你得听他的話。”貴林在旗营里素有“孝子”之称,自然也沒話說。旗营被圍的第二日,貴林出来議降,就是

^① 宋超別字燕生,又号平子,是俞樾的學生,为人清慎自守。李鴻章是他妻父的門生,想叫他做官,但不敢出口。他写了一本书,名叫《卓識》,李鴻章說:“这叫‘卓識’?我看来太高了。”

由陈老师和楼守光商議，由守光設法进入旗营联系，把貴林找出来的。

(五)

貴林的前任是金梁的哥哥(已忘其名)，他們弟兄两人和杭州的排滿运动发生过如下一段接触：

浙江大学的前身是求是书院(后改称浙江大学堂，又改为浙江高等学堂)。当我在养正书塾讀書的时候，陈老师一面启发了我們同学的革命思想，又介紹了朱平子先生到求是书院当总教习。朱先生平常談話是万分謹慎的，但是，他和陈老师一样，能在古书里发出新义，叫人們自然会走上这条路上去。那时求是书院还有一位教員叫孙江东，也有革命思想，他偶然在暑假里出了一个題目，叫《罪辯文》，教学生做。学生里有史久光(江苏溧阳人，辛亥革命后在參謀本部任第四局局长)、李斐然(辛亥革命前任周承葵标部的參謀)，都大发議論，斥責清朝。孙江东还嫌他們文章里“本朝”两个字不行，給他們改成“賊清”。不想被院里的旗籍学生們晓得了，报告了金梁。金梁通过他的哥哥告到將軍那里，將軍就請巡撫任道鎔查办。这位巡撫是江苏宜兴人，是个正途出身。他对于这件“大逆不道”的事情怎敢怠慢；但是，他究竟是老于仕途的，曉得一經查办出来，除了几个活該的以外，从他起直到芝麻綠豆大的官，都要担着处分，不是鬧着玩的。所以他很謹慎，先把这件事秘密起来。一日，他只帶了一个当差，青衣小帽，坐了一乘普通轎子(巡撫照例是坐紅呢大轎，四抬四插)一直来到了求是书院。他也不待通报，先看了各处书院的布告和斋舍壁上黏貼的学生文課作品，然后

再請“監院”把學生平日作文檢來帶走，說是要考察他們的成績。當時，大家並不以為有什麼大事。

過了幾日，這位巡撫率領着兩司（布政司、按察司）、二道（杭嘉湖道、督糧道）、一府（杭州府）、兩縣（錢塘、仁和），都是全副執事，來到書院。大家都感到驚奇，因為向例書院沒有大典祀，他們是不會一齊來的。巡撫召集了書院的當局以下，用非常嚴肅的態度，鄭重宣布他來院的目的。他說，因為有本院旗籍學生告發本院學生有悖逆文字，所以上次親身來院查訪，並將書院的布告和學生的作文帶去，一一仔細過目，其中確實並無一點悖逆文字，可見這是誣告。接着他又說，在這個時候，還有人挑撥滿漢意見，希望“大興文字之獄”，實在不是國家之福，本當嚴辦誣告，姑念這些旗籍學生年輕無知，命仁、錢兩縣立即勒歸營里，又命杭州府去稟告將軍，請他懲辦。他發落完畢，才從袋里取出那束作文卷子，叫司道以下看完，還給監院而去。

這場大事，竟化做無事，不能不說這位巡撫心地厚道。不過寫《罪辯文》這件事可是實在有的，只是真凭實據沒有落在旗籍官員們手里，所以也只好訛錯息事，可是心里當然很不痛快。後來孫江東被人告了風化案子，貴林就在後面支持原告，終於鬧得孫江東在杭州不能立足。

（六）

浙江光復後，緊接着江蘇巡撫程德全也宣告獨立，自稱都督。程德全的宣告獨立，是我的一位世交長輩應德閔先生和江蘇督練公所里的幾位湖南人張通典、章駕時、羅偕子和我的同學杜士珍策

划的。应先生的父亲曾做过江苏布政使，后来应先生也去江苏候补知府。辛亥那年，他新过了道班，在程德全幕里，很被程所赏识。布政使陆鍾琦升了山西巡撫以后，程德全就派应先生署理布政使，着实使当时的按察使和一班老的候补道难堪。程德全竟因此事被御史参了一本，说他不应以未引見道員径署布政使（清例，道員未曾引見，不能正式任官，引見就是由吏部或軍机处帶領去見皇帝）。这样，既把应先生的前途丢了，程德全也碰了一鼻子灰。加上上海都督陈其美要移师北伐了。所以在章駕时等敦促之下，程德全就在苏州宣布独立了。应先生做了都督府的秘书长，杜士珍也在都督府任职，他們邀我去苏州一走。我到苏州，他們要我在上海办一份日报。我就担負了这个任务，在上海福州路找了一所房子，筹备起来。

不久，章太炎先生由日本回到上海，住在爱儂园（即哈同花园），我每日都去和章先生商談。这时，汉阳被清軍馮国璋攻陷，但上海各报不敢发表，因为那时民意激昂，热烈拥护革命，不愿意听到革命軍失败的消息，报纸如果貿然把这个消息发表出来，就会激怒民众，报館有被捣毁的危险，《申报》就曾因为这样而被打过的。章先生却得到了黎元洪的电报，知道了这个消息。他非常生气，在給我的信上竟把黃兴称做“逃帅”。我办的那份报纸取名《大共和日报》，請章先生做社长，杜傑风任經理，我担任了总編輯，章駕时、汪东（字旭初，章先生的学生）都是編輯（章駕时因軍事关系，始終未到）。

湯老在浙江因为环境不好，都督做不下去了。樓守光的哥哥樓守愚和蔣尊簋的父亲既是同乡，又是好友，蔣父和湯老也是朋友，樓家两弟兄就替湯老去找蔣尊簋来做替身。湯老和孙中山先

生說了，自然沒有不妥的。一日，樓守光來向我說，本晚蔣尊簋專車回杭，叫我約應德閔先生同去，要應先生去做秘書長，我任秘書。當夜，蔣尊簋就偕同應先生、樓家弟兄和我，還有蔣的學生夏超，一同回杭。蔣尊簋走馬到任，接了都督印。他是做過浙江標統的，和周承蒞是同學，自然一無問題。可是，應先生因為程德全不放他走，並沒有回浙就秘書長職。我起先在秘書處混了幾個月，後來樓守光由都督府印鑄局局長出任衢縣知事，我又補了他的缺。印鑄局的公報總纂杭辛齋先生、編輯部邵飄萍和我鬧了一點意見，印鑄局改了公報處，我改任經理。我却就此“還我初服”，仍回浙江第一師範學校教書去了。這時是一九一二年，我二十八歲。

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

李书城

(一) 武昌起义以前

一九〇二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从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选派学生三十多人，赴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学速成师范，定期八个月毕业，学成回国后充任学堂的师资。黄克强先生和我分别从两湖书院和经心书院被派出国。在武昌出发时，我才认识黄先生。从三书院派出的同学，还有李熙、卢弼、金华祝、李步青、周维楨、张继煦、馮开藩、余德元、万声扬、王式玉等。到东京后，同班上课的还有浙江学生周树人（鲁迅）、湯穎（尔和）、許寿裳、寿昌田等十余人。弘文学院院长由日本高等师范学院院长嘉納兼任，教师都是日人，梁启超的弟子范源濂任翻译。那时，梁启超正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主张君主立宪，留学生中附和者不少，弘文学院学生亦多对梁启超表示崇敬。不久，我们与湖北早先派出的学生戴翼章、刘成禺、程家桢等接触以后，知道他们曾在孙中山先生居住日本时，同孙先生见过面，听过孙先生讲述排满革命的道理。他们并介绍我们阅读一些书籍，如《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及黄梨洲、顾亭林、王夫之等明末清初诸大儒的著作，遂激发起我们的民族感情。我们回溯中国从鸦片战争到庚子事变以来，遭受外国人的侵侮日

甚一日，将有亡国灭种的惨祸，这都是由于清廷的腐败无能、抑压汉族民气所致的。我们觉得清廷是中国复兴的障碍，爱国志士要救亡图存，必须首先推倒清廷，因而都认为孙先生主张排满革命是对的。弘文学院同学每晚都在自习室讨论立宪和革命的问题，最初颇多争论，以后主张排满革命的占了多数。

黄克强先生在同学中一向是篤实厚重、不多发言的，但他把问题看清楚了，决定自己应走的道路以后，意志即异常坚决。他曾说，他的远祖在清初曾写过遗书，要黄氏子孙永不出仕清朝。有一晚，他与一些同学争论得很激烈，气急得说不出话来，竟将手中的小茶壶掷地摔碎，表示他已下定决心从事排满革命，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动摇的。他与湖南学生陈天华、杨篤生等共同创办了《游学译编》。这个刊物同留日的浙江学生出版的《浙江潮》、江苏学生出版的《江苏》、湖北学生出版的《湖北学生界》，都是宣揭革命理论的刊物。同时，邹容所著《革命军》、陈天华所著《猛回头》、《警世钟》、杨篤生所著《新湖南》以及各省留学生所著宣传革命的其他各种小册子，风起云涌，大量输入国内，唤醒了国人，也震动了清廷官吏，因而曾引起查禁报刊、停止留学生官费的一场风波。黄先生与万声扬、李步青、金华祝和我毕业回鄂时，大为梁鼎芬所不满（梁在当时是张之洞所最宠信的红人，执掌湖北教育大权）。他对我们五人大加申斥，不派职务。于是李步青、金华祝分别赴天津、江西从事教学，暗中宣传革命。万声扬赴上海开办昌明公司，表面上是经营普通书店业务，暗中发售革命书籍，并为国内外革命同志的联络机关。黄先生回湖南，同教育家胡子靖办明德学堂，培养革命青年，同时创办华兴会，准备起义。我在武昌闲住数月后，得东京同学资助，再赴日本，作自费生留学。当日俄战事爆发，东京留学生

組織义勇軍时，我曾参加，受过軍事訓練。我深感革命須靠武力，希望进日本陸軍学校，但陸軍学校不收自費生，須由清廷駐日公使保送，而駐日公使保送須由清政府或各省督撫造送名册。恰巧浙江撫台保送名册中，有一永嘉县“丁人俊”的名額是預填的一个假名，准备留給革命同志頂替入校的。我就頂替了“丁人俊”名入振武学校，升入陸軍士官学校为中国第五期士官生。

一九〇五年，黃先生在湖南起义失敗，潛赴上海，再到东京。适孙中山先生也來东京，他們会面之后，认为各方革命团体須統一組織起来，才能步調一致，力量雄厚，遂結合留日学生中的进步分子，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举孙中山先生为总理。孙先生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党綱。当时入党的人对于排滿革命的理論是深信不疑的，并且正是因为具有这种革命决心，才宣誓入党的。先一年章太炎、蔡元培、陶成章等在上海成立光复会时，他們的党綱上只有“恢复汉族、还我河山”两句話。同盟会會員对孙先生所提“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意义还不大明白，以为是将来革命成功以后的事，現在不必推求。孙先生对宣誓入党的同志讲解“建立民国”时，是举法国和美国为例；讲解“平均地权”时，是举德国在青島所訂地价稅和按价收买土地办法为例（“耕者有其田”系在辛亥革命以后提出的）。因此，同盟会會員在国内宣传革命、运动革命时，只強調“驅除韃虜、恢复中华”这两句話，而对“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意义多不提及。湖北共进会的誓詞与同盟会的誓詞相同，但把“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意謂滿人压迫汉人，人权不平等，所以要革命。辛亥武昌起义以及全国各地响应起义所用的共同口号，只是“排滿革命”。在南北議和时，南方提出的条件，只是要清帝退位，以为清帝退位即算是革命

成功了。以后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也以为只要袁世凯宣誓赞成共和，就算是开始“建立民国”了。当时许多革命党人都抱着这种看法。

孙中山先生不常在日本，自日政府禁止孙先生入境以后，同盟会总理职务即由黄先生代理。黄先生是留日学生，又长住日本，因此，国内外同盟会会员多与他直接商讨问题或通信联络，他和同志间的感情也就深厚起来。特别是黄先生与军人的关系，由于有一段特殊原因而更加密切。黄先生在日本代理同盟会总理时，中国陆军留学生的人数特别多。第四期陆军士官生有七十五人，第五期陆军士官生有五十七人，第六期陆军士官生有一百九十八人。其中加入同盟会的陆军士官生不下百余人，我所能记忆的：第四期有张世膺、周承葵、张承胤、蒋作宾、吴鍾鎔、金永炎、覃师范、王家驹、高佐国、吴经明、何澄、刘一清、刘毅、翁之谷、成祺、史久光、周斌、刘维燾、曾继梧、刘绳武、邓质仪等；第五期有王孝祺、黄愷元、何成潜、陈乾、李浚、陈之曠、姜登选、李书城、袁华选、全恕、石陶钧、王凯成、吴和宜、殷承琳、杨源潜、朱先志、齐琳、高霁等；第六期有尹扶一、李兆群、王兆群、刘祖武、孙荣、吴藻华、陈强、欧阳武、张华辅、赵复祥、李根源、林爽、尹昌衡、胡万泰、刘存厚、卢启泰、刘宗纪、胡学伸、官其彬、黄国樑、刘汝贄、罗佩金、閻錫山、孔庚、李鸿祥、叶荃、楊曾蔚、李敏、高声震、仇亮、朱树藩、姚以价、程子楷、张开儒、纪堪頤、李乾瑛、耿觀文、张凤翥、黄毓成、顧品珍、朱毅光、温寿泉、唐蟒、唐继尧、董錫梁、孙方瑜、赵恆惕、田遇东、李烈鈞、程潜、刘洪基、华世中等；此外还有陆军测量学校的黄郛、曾昭文等。其余的人记忆不起了。

黄先生以为陆军学生须在回国后掌握兵权，不可暴露革命的真面目。因此，他囑陆军学生中的同盟会会员不到同盟会总部往

来，陆军学生的入党证件也由黄先生一人独自保管。并商議由陆军同学在同盟会会员中选择一批坚贞可靠的同志另組織一个团体名曰“丈夫团”，以孟子所說的“富贵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作为团员应具的品德。据我了解，当时加入这个組織的有李根源、李烈鈞、程潜、李书城、赵恆惕、黄郛、尹昌衡、黄愷元、叶荃、温寿泉、曾继梧、华世中、刘洪基、程子楷、孙方瑜、曾昭文、耿觀文、李乾瑛、仇亮、楊曾蔚、陈强、孙榮、高霽、楊源濬、殷承霖、袁华选、陈之曠、姜登选、李浚、王孝縝、何澄、王家駒等。黄先生还鼓励家有資財的同志出資捐官，俾将来获得兵权可更大更快些。团员中黄愷元用銀一方两捐得道台，陈之曠用銀六千两捐得郎中。辛亥武昌起义后，在南北各省举兵响应、充任都督及軍、师、旅、团长的人，多属丈夫团的同志，都是黄先生所熟知的人。因此革命軍人与黄先生有特別深厚的感情，他在革命軍人中具有极高的威信。

黄先生在日本同孙中山先生組織了同盟会，又将同盟会中的陆军学生組織成更严密的丈夫团以后，乃秘密回內地，亲率革命同志，在广西的欽、廉、鎮南关（今睦南关）和云南的河口等处发动武装起义，均遭失敗。最后，他在广州集合各省最坚贞勇敢的同盟会会员八百多人，組織敢死队，于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旧曆三月二十九日）攻打督署，結果又失敗了。这次起义虽未成功，但壮烈牺牲的精神震动了全国。

（二）在武汉前綫

黄克强先生在黄花崗之役失敗后，曾經考虑过全国的形势，在起义地点方面，他主张“以武昌为中樞，湘、粵为后劲，宁、皖、陕、蜀

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见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載《辛亥八月十四日黃致馮函》）

是年，宋教仁、譚人鳳（石屏）等在上海成立同盟會中部總會，加強長江各省的革命運動。譚人鳳與湖北新軍革命團體文學社、共進會早有聯繫。黃先生曾寄給譚人鳳一首詩，極力主張在長江上下游特別是在武漢起義。詩云：

懷錐不遇粵途窮，露布飛傳蜀道通。
吳楚英雄戈指日，江湖俠氣劍如虹。
能爭漢上為先著，此復神州第一功。
愧我年年頻敗北，馬前趨拜敢稱雄。

一九一一年舊曆七月，湖北新軍革命團體文學社、共進會召開會議，策劃武裝起義，並派居正、楊玉如赴上海迎黃先生來鄂主持。黃先生從香港復電說，須俟九月初（舊曆）約十一省同時起義。不意孫武在漢口因炸彈失慎爆炸，武昌革命秘密機關被抄，彭楚藩、劉復基、楊洪勝三烈士被捕就義。各營士兵為破釜沉舟之計，決定提前起義，於十月十日（舊曆八月十九日）晚九時在總指揮蔣翊武被捕逃走之後，按照蔣翊武預草的命令分別發動進攻。當時預定的領導人黃先生未來，臨時總指揮蔣翊武又不能親臨指揮，全靠各營士兵各自為戰。一夜之間，起義軍即把總督瑞澂、統制張彪趕走，占領武昌，樹起十八星旗，創造了革命史上的奇蹟。

革命之所以在武昌爆發，又能支持戰爭達數月之久，是因為當時武昌具有特殊的優越條件。湖廣總督張之洞在鄂二十多年，提倡新政，改良教育，設漢陽兵工、鋼藥兩廠及武昌紗、藤四局，並設銀元、銅元局。他又成立新軍一鎮、一混成協，所招士兵必須識字，後且命題考試，衡文以定去取。兵士入伍以後，還有機會考入

陸軍特別學堂、將弁學堂，提升為官佐，或派赴日本學陸軍。如藍天蔚、賈秉鈞、石星川、成炳榮、蔡紹忠、杜錫鈞等都是從士兵中提拔出來派送出洋的。再則當時還有一批思想進步的愛國青年志士如張難先、李六如、蔣翊武、劉靜菴、江炳靈等，為了便於聯結兵士，運動革命，都投身行伍，在新軍中散布革命種子，他們成為組織革命團體的中堅人物。從一九〇二、一九〇三兩年以後，湖北廢除科舉，興辦了不少學堂。如陸軍測繪學堂，陸軍中學堂，陸軍小學堂，普通中學堂，工業、農業、商業、礦業、鐵路、方言、理化、省師範、道師範等學堂，武昌五路小學堂，以及教會所辦的博文、文學兩中學和文華大學等，總計武漢三鎮的學生約有一、二萬人；從這些學生中派往東西洋留學的先後也不下數百人，自費到日本留學的人數更多。他們出洋後，見到外國的強盛和中國的積弱不振，兩相對照，更感到目怵心驚。其中接受孫中山先生政治主張的人，知道中國要發憤圖強，必先推倒清室，因而紛紛加入了同盟會。在日本留學的湖北學生除將《猛回頭》、《警世鐘》、《革命軍》等書秘密輸入湖北之外，並且在東京出版《湖北學生界》，枝江張繼煦、漢川李熙、潛江李书城等復在東京撰印《致湖北同學書》，皆用激烈的言辭鼓動革命。湖北的學界、軍界受到這些革命書刊的影響，大為振奮。湖北留日學生並捐購幻燈機片運至武漢放映，觀者甚眾。留日歸國學生如吳祿貞、劉伯剛、金華祝、余德元等常於放映幻燈時，講演國內外形勢，宣傳世界各民族反抗壓迫進行革命的情形，對於激發愛國思想，亦收效不小。由於以上種種原因，武昌革命的潛力甚大；經過數年的醞釀，在文學社、共進會聯合組織統一革命機構以後，革命勢力在軍隊中更加強大起來，遇到機會成熟，便即爆發。起義以後，武昌、漢陽兩處存儲的槍枝、彈藥，足供几万

兵士之用。武昌藩庫存銀及銀元局、銅元局、官錢局所存硬幣及台票，合計約有四千多萬元。兵械充足，物力丰盈，由此可見一斑。而團結一致、有紀律有訓練的士兵，亦不下五千人。武昌起義就是在這樣人力、物力各種條件具備的情況下發動起來和取得初步勝利的。

武昌起義半個月後，黃先生於十月二十五日在上海紅十字隊隊長張竹君女士的掩護下，扮作醫療隊隊員，偕同夫人徐宗漢及日人萱野長知等從上海乘江輪上駛，於二十八日到達漢口。黎元洪都督派兵一隊從武昌江岸迎至都督府。黃先生聽說漢口戰事緊急，立即赴漢口擔任總司令，設司令部於歆生路滿春茶園。各軍士見黃先生親來指揮作戰，士氣大振。

先是，漢口民軍總指揮何錫藩受傷，以張景良繼任。旋張景良因通敵正法，又以姜明經繼任。姜明經又因戰事失利，避匿不出（張、姜兩人均系起義前的中級軍官，未參加革命團體），戰綫上無人指揮，士兵各自為戰，僅能守住現有陣地。作戰十餘日來，軍民死傷已有數千人，大智門、劉家花園、外沿鐵路、華洋街、水塔、礮口等處均先後失守。黃先生重新部署以後，連日反攻，奪回了几處陣地，但每到夜間輒不能固守。士兵依靠市街房屋作掩蔽，射擊來攻敵兵，敵亦不敢進逼。因此，敵人乃縱火焚燒市街房屋，使我軍無藏身之所。到十一月二日全市大火，我軍難以立足，遂全部向武昌撤退。黃先生回到武昌，在都督府開軍事會議。他在報告中分析漢口戰事失利原因有五：一、各隊新兵太多，未受過訓練，難以指揮。二、軍官多從弁目提升，指揮能力太差。三、各隊戰鬥日久，傷亡過多，官兵均甚疲勞，一聞敵方機關槍聲，即紛紛後退。四、兵士是在武漢附近招募來的，夜間多私自回家，戰鬥員減少了很多，軍官亦無法查

实。五、我軍只有步槍而无机关槍，且只有山炮，亦不能抵禦敵方的管退炮，因此較敵人的損失为重。但黃先生又指出，我軍有一優點為敵人所不及，即我軍冲鋒時異常勇猛，敵人員系北洋久經訓練的軍隊，每遇我軍喊殺時即后退；我軍所恃者全靠這一點猛勁。

這時接到漢口報告說，在漢口作戰的第三協協統林翼支已于十一月一日晚間離漢潛逃（初逃襄陽，又匿隨州，后被槍決）。以後又接漢陽報告，負責防守漢陽的第一協協統宋錫全擅率所部向湖南撤走（宋退至湖南，由黎元洪電請湘督譚延闓逮捕正法）。會議當即一致決定：先在漢陽防守，俟湖南援軍開到后再反攻漢口。

我是從北京經上海乘江輪于十一月二日到漢口的。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北京后，我即隨同陸軍第六鎮統制吳祿貞到保定，計劃舉兵響應。忽接軍諮府大臣載濤的電令，命我即日回京。我原是軍諮府的科員兼官報局副局長，即遵令回京。載濤命我同科員黃郛赴南方與革命黨人商議兵言和辦法。我與黃郛即日携眷出京，從天津乘海輪赴滬。到滬后，黃郛留滬幫助陳其美攻取上海，我則乘江輪赴漢。十一月二日船抵漢口時，我見全市火光熊熊，煙霧彌天，槍聲已息。即換渡輪到武昌江岸，岸上有一隊學生軍來迎。到都督府后，會見黎元洪、黃先生及首義各同志，並參加當日舉行的軍事會議。會議決定黃先生為中華民國軍政府戰時總司令，我為參謀長。

十一月三日晨，黎元洪命各部隊派代表到閱馬廠廣場舉行登壇拜將的隆重儀式，借以鼓勵士氣。授印時，黎元洪、黃先生都有演說，士氣大振。是日，即將總司令部人員組織完成。以吳兆麟為副參謀長（吳原系第八鎮工程第八營左隊隊官，未參加革命團體，八月十九日夜間起義士兵攻占楚望台軍械庫時，推他為臨時總指揮，

由他下令攻打督署。他曾向张之洞所聘请的日本练方大佐学过参谋学,以富有军事学識著称),姚金鏞、金光龙、高尚志、甘熙績、耿丹、辜仁发、吳兆鯉、余鴻勛等为参谋,田桐为秘书长,王安瀾为兵站司令。以后王孝績从北方来鄂,任为副官长。原在武昌起义的湖北及外省学生共同組織的学生軍,由刘勳武为标統,田化龙、赵士龙、余子祥为管带,共約三百余人,調归总司令部直接指揮。是晚,黃先生率总司令部人員同赴汉阳,在伯牙台設总司令部;嗣因敌方枪弹能射至院中,次晨移住昭忠祠。

四日晨,黃先生率总司令部人員登龟山頂观測汉口敌方陣地。敌方大炮向龟山射击,炮弹都落入龟山后方的江中,无人受伤。寻沿河边防綫視察一周,决定利用汉阳兵工厂、鋼药厂的鉄板、木材,沿汉水南岸构筑防御工事。因部队都系新兵,須受訓練,不令担任此項任务,另由各部队招募民工,按日付給工資,由官长督修。当汉口大火以后,火烬多日未熄,敌人亦不能踏过火場来攻汉阳。因此,两岸枪声沉寂,我方沿河岸每日虽有数百人修筑工事,敌军亦未来扰,工事得以順利修成。工事修成后,我方即向敌方进行宣傳,夸說防御工事如何堅固,形容得好似銅墙鉄壁一样,借以使敌人有所畏惧,以延緩其进攻企图,并掩飾我方援軍未到、汉阳守軍空虛的弱点。

黃先生初到汉阳时,只有蔣肇鑑协統的步兵第一协守在兵工厂附近。第一协协統原是宋錫全,他把部队带赴湖南后,黎都督派蔣肇鑑繼任第一协协統,其时只剩一营兵士,蔣接任协統后才陸續补充。其他調到汉阳的部队,有张廷輔所率的步兵第四协、熊秉坤所率的步兵第五协、胡效騫所率的步兵第四标。十一月六日,湘軍第一协协統王隆中(与我在日本士官学校同学,未加入同盟会)率

所部开到汉阳。九日，湘軍第二协協統甘兴典率所部徒手兵开至武昌，領取枪支后也开到汉阳。湘軍两协士兵开到汉阳后，在汉阳防守的士兵都大为兴奋，以为轉敗为胜的时机到了。

从各方来汉阳参加作战的，有留日陸軍同学曾繼梧、程潜、程子楷、唐蟒、曾昭文、王孝縝等，他們曾在汉阳前綫或后方分別担任各項临时的或固定的工作。有从南京陸軍中、小学来鄂的学生蔣光鼐、李章达、陈銘枢、陈果夫等数十人，由队长张我权、副队长徐源泉带到汉阳，作为总司令部的督队员。有一日本軍人大原大尉亲来汉阳向总司令部投効。他每日在汉口探訪敌情来汉阳向我軍报告，但十一月十七日以后即未見其再来，后来听說，他于是日我軍进攻汉口时牺牲了。

上海光复以后，当地名流如张謇、湯寿潜、赵凤昌等推庄蘊寬来鄂，为組織統一革命机构事向黃先生和黎元洪征詢意見。我以前在广西作陸軍干部学堂監督兼陸軍小学堂監督时，庄蘊寬是广西督練公所督办，我在广西的一切革命活动他都知道，也是暗中維護我的。他是一个同情革命的开明官吏，因邀約了一羣革命同志到广西作革命活动，被广西巡撫張鳴岐胁迫而离开广西的。他告訴我来鄂的真意，是請黃先生到上海去。他說，上海方面的人认为黎元洪是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所拥戴出来的，不是真正的革命党領袖，而孙中山先生还在海外未回，現在只有黃先生是国内唯一的革命領袖，應該負起領導全国革命的责任，到上海去統率江、浙軍隊攻克南京，在南京組織全国軍政統一机构，繼續北伐，完成革命事业。他敦促黃先生早赴上海。但是黃先生对他說：“全国軍政統一机构是愈早組織愈好，但不必要我担任領導人。我現在还担任武汉方面的作战任务，不能离开武汉。看以后情形如何再說。”

袁世凱曾派鄂人刘承恩来見黎元洪与黃先生，表示愿意停战言和。黎元洪和黃先生曾分別函复袁世凱。黃先生函中略云：“明公之才，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崙、华盛頓之資格出而建拿破崙、华盛頓之事功，直擒黃龍，灭此虜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崙、华盛頓，即南北各省当局亦无不有拱手听命者。蒼生霖雨，羣仰明公。千載一时，祈毋坐失。”黎元洪复函中的措詞亦大致相同。是时，汪精卫亦派人来汉密告南方同志，說袁世凱不是効忠清室的人，如南方革命党肯举他为第一任共和国总统，他是愿意同我們一致行动的。汪囑南方同志从速表示态度，以促袁早下决心。武汉革命同志都贊同汪精卫的意見，并囑汪在北方对袁世凱多做工夫，促成其事。

吳祿貞于十一月六日夜在石家庄被暗杀的消息传到武汉后，革命同志对清廷更加憤恨，发誓出师北伐，以雪此恨。甘兴典率所部湘軍开到汉阳后，几乎每日到总司令部来催促下令反攻汉口，并說他的部队都愿意上前线杀敌，不愿縮在壕沟内消磨銳气。当时又探得汉口敵軍日益增多，与其待敵軍兵力充实后向我来攻，不如我乘其兵力尙未充实时先发劲进攻。总司令部提出这个意見后，得到都督府的同意，遂作进攻汉口的准备。从武昌运来的枪弹每个士兵都領到四百发左右，可供几天战斗之用。架桥材料也运到渡河地点。一切进攻准备就绪后，黃先生于十一月十六日下令分三路向汉口进攻。第一路由步兵第三协协統成炳荣率所部从武昌青山渡江，在汉口湛家磯登陆，进攻刘家庙。第二路由步兵第六标标統楊选青率所部乘装甲小火輪及民船由汉阳东北岸出发，向汉口龙王庙强行登陆，占据障地后相机进攻。第三路由駐在汉阳的各部队組成，归黃先生直接指揮，是此次进攻汉口的主力軍。这一路以湘軍

第一协协统王隆中所部为右翼，湘军第二协协统甘兴典所部为左翼，鄂军步兵第五协协统熊秉坤所部为总预备队。其余砲兵第一标及工程第一营均随同前进。黄先生命令第三路各部队在十六日黄昏后开始行动，从琴断口渡过浮桥，向指定地点集合，进入阵地，准备次晨拂晓向汉口玉带门及礮口一带之敌进攻。黄先生率总司令部人员于是晚十时许渡过琴断口浮桥。时正遇大雨，天黑不辨路径。先渡桥的部队把桥头一间草屋点火燃烧，作为照明之用。黄先生知道后，立即找到房主，给予房屋赔偿费。再往前进时，不见甘兴典部队的踪迹，甚为惊讶。不久，发现该部都藏在民房内避雨，或蹲或卧，拥作一团，每个士兵的背上都负着一捆稻草当作雨衣，状似一羣难民。我看见这种情形，实出意料之外。我对黄先生说：“我们的作战命令只是纸上谈兵，没有考虑到兵士的素质。这些士兵遇雨即如此狼狈，对战线上打来的弹雨怎能抵挡得住呢？现在还未接到第一路、第二路出发的报告，是不是同这里情形一样，深为可虑。预料敌人现在还未发觉我军的动作，可否改变计划，先把部队整理一番后再行进攻？”时陆军同学唐麟在侧说：“革命军人有进无退，退则沮丧士气。”黄先生叫我们先把藏在民房的兵士喊出来，再看情况。于是总司令部的参谋、副官及督战员都到各民房把兵士一一叫了出来，要他们赶快到指定的阵地上去。将近天晓时，这些士兵都被喊出来走上阵地了。学生军最勇敢，首先向前开了火。随着，左右两翼部队都向前推进，形势似很有利。不料中午以后，敌人运到了机关枪和大炮，向我军猛烈发射。甘兴典的士兵有几个受了伤，向后退却。甘兴典也骑着马向后奔跑，以至引起他的部队全部溃退。黄先生率总司令部人员及督战队持刀拦阻兵士后退，并砍伤了几个后退的士兵。但溃兵洶涌而至，竟要向拦阻后退

的人开枪射击。不得已，只好让他们后退。他们在后退途中，有些士兵被敌军打到我阵地后方的炮弹炸伤了，于是又惊慌起来，拼命抢渡浮桥。因人多桥断，溺水死者达数百人。幸王隆中所部湘军是从新军扩编成协的，受过训练的兵士较多，他们在阵地坚守至日暮，才撤回汉阳。熊秉坤所部鄂军虽被敌包围，尚能且战且退，全部渡河，回到防地。我军退却时，敌人并未追击。他们探知我军已全部撤退后，才开至河岸，与我军隔河相持。我与黄先生在将到日暮时，踏着泥濘道路后退。黄先生身体肥硕，行路很吃力，由人扶持步行。我由广西干部学堂湖南学生首途沿路搀扶，一步一滑，直到天黑我们才回到汉阳。是晚，下令汉阳各部队彻夜警戒，作战斗准备。

次晨，知甘兴典并未退回原防，竟率所部向湖南逃走。同时得知第一路军亦未按照原定命令从青山渡江向刘家庙进攻，原因是协统成炳荣是日酒醉，下错命令，竟命军队向与青山相反的方向开动，及至发现错误，再叫士兵向青山开进时，兵士因行军半夜已极疲劳，又值天雨路滑，都不肯遵令行动，故第一路军未能按照命令执行进攻任务。第二路军因标统杨选青适于是晚在家结婚，未亲往指挥，故亦未遵令从汉阳东北岸向汉口龙王庙进攻。黄先生将以上情形报告黎元洪后，黎即将成炳荣撤职，改以竇秉鈞继任步兵第三协协统；将杨选青正法；并电请湖南都督谭延闿于甘兴典到达长沙时立予正法，将其部队缴械遣散。

这次进攻汉口失败，不仅暴露了我军的弱点，也使敌人轻视我军，加强了敌军进攻汉阳的企图。这是因为我在战略战术上都犯了极大的错误所致。从战略上说，我军若不进攻汉口，敌人是不敢轻于进攻汉阳的。因为汉阳的防御工事相当坚固，并且作了些夸

大的宣传，使敌军望而生畏。且敌我两军隔河对峙，船只都靠在我方河岸，敌若渡河攻坚，地势于我有利，于敌不利。我若坚守汉阳，可争取时间，得到更多省份的响应和所派援军的支援。如果这样，汉阳是儘可不失的。从战术上说，我不懂得兵士是作战的基础，未查明军官和兵士的训练程度，只照书本上的作战公式下命令，结果三路进攻的负责军官一个被撤职，两个被处死。士兵不仅在战场上死伤了很多，而且在退却途中并无敌军追击，落水而死的亦竟达数百人之多。敌军是素有训练的北洋军，我以初成之师与之作阵地战，真是既不知彼也不知己，犯了军事上的大忌。进攻汉口的失败，又引起了汉阳的失守。我对这两次战役的失败，是应该负重大责任的。因我的作战计划错误，使黄先生受“常败将军”之谥，使革命形势受到挫折，我至今犹引为遗憾。

十一月十七日进攻汉口既未获得胜利，兵员、武器、弹药却损失不少。甘兴典既率部逃回湖南，他原来守的防线不免薄弱，从而不得不加重了王隆中部队的负担。这支部队能战能守，但经多日的拉锯战，兵员损失也不少。特别是连日继续作战，不能休息，兵士疲劳过度也是事实。王隆中竟于十一月二十三日率领他的部队擅离汉阳，退到武昌两湖书院，说要在武昌休息几日再赴汉阳作战。我奉黄先生命，到武昌劝他开回汉阳。但他对我说，兵士实在太疲劳，不休息几日不能作战。我商请黎元洪允给该部五十万元犒金，只要该部开回汉阳。他还是执意不肯开回，竟至向我下跪。我未能说服他，只得回去报告黄先生。黄先生也无法可想，只是和我共同叹息而已。

十一月二十五日，湘军协统刘玉堂率所部千余人来汉阳增援。刘系山东人，身干魁梧，性情豪爽，旧式巡防营出身。他初见黄先

生时，即問前綫情形如何，并表示愿率所部到紧急的前綫去作战。黄先生命他到花园前綫抵御从仙女山来攻的敌軍。他率所部到达陣地后，数次向前冲锋，因敌軍用机关枪扫射，未能得手。当日下午，刘不幸中弹陣亡，所部兵士紛紛后退。在花园山、扁担山防守的鄂軍均在黄昏后全部退却，日間所守陣地都被敌人占领。总司令发出的当晚作战命令都已无人接受，传令兵只好带回，交还总司令部。我們发现总司令部所在地已成为最前綫了，乃将驻在后方的輜重营調到前綫来作总司令部卫队，并在学生軍中征集敢死队员百余人在总司令部前方布防。

在这种情况下，汉阳已危在且夕，实难再守。我与黄先生商議，将战况报告黎元洪，請早将兵工厂机器、存儲汉阳的弹药、粮秣以及一切軍用物資搬回武昌，以免資敌。

十一月二十六日，我到武昌向都督府报告以上軍情，当即在都督府开軍事會議。大家都贊成作有准备的撤退。惟都督府副參謀长楊翼章慷慨陈辞，主张坚守汉阳，虽至一兵一卒亦不放弃。于是楊翼章自告奋勇，組織參謀部同志十余人赴汉阳助战。我因連日疲劳已甚，向黎元洪請假休息一天，当晚宿在都督府秘书万声揚家中，睡至次日午后才醒。醒后，惊聞楊翼章已于是日午前在汉阳陣亡，汉阳守兵正在向武昌撤退，退兵在渡江时伤亡不少。晚間，黄先生退到武昌，向黎元洪报告失利情形后，即率一部学生軍同徐宗汉夫人、张竹君女士及日人萱野长知等乘江輪赴沪。

黄先生离汉时，我未赶上，次日（十一月二十八日）始偕同湯化龙、万声揚、胡瑞霖、陈登山、黄中澄等乘江輪赴沪。我在这四天的航行途中，除飲食外总是沉沉酣睡，因在汉阳二十多天的紧张繁忙的生活使我疲劳已极，这时得到休息，真觉睡眠是人生最舒适的

享受了。

我們到上海后，在昌明公司开会。湯化龙和万声揚提議：我們离开武昌时未向都督府請假，應該发一电报到武昌表示歉忱。胡瑞霖是一个爭強好辯的人，他道：“电文措辞不要表示道歉，應該指摘武昌首义諸人对我們有种种歧視，所以我們才离鄂来沪。”黄中壘也贊成胡瑞霖的意見，說这是說真話。电文由胡瑞霖起草发出。以后武昌方面对湯化龙竭力排斥，其原因即在于此。

(三) 南京临时政府和留守府时期

十二月二日，苏、浙、沪联军攻克南京，各省在沪代表議决临时政府設在南京。四日，公举黄先生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黄先生以黎元洪为首义元勋，抑居副职，恐武昌方面有意見，于革命内部的团结不利，乃坚辞大元帅不就。各省代表复于十二月十七日在南京开会，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先生为副元帅，并以副元帅暂行大元帅职务。黄先生本拟早日起程赴南京就职，并已商請张謇向上海日商三井洋行借款三十万元作到南京后軍政費的开支。但在預定起程赴南京的先一天晚上，黄先生忽向我說，他明天不去南京了。我問何故不去。黄先生說：“頃接孙中山先生来电，他已起程回国，不久可到上海。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代表同盟会；現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待他到沪，搶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发展很快，但因几个領袖們互爭权利，終至失敗。我們要引为鉴戒。肯自我牺牲的人才能从事革命。革命同志最要紧的是团结一致，才有力量打击敌人。要团结一致，就必须不計較

个人的权利，互相推让。”我听了黄先生这一番话，感到他的人格伟大，感到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纯洁，深为佩服。这一晚的谈话，使我深深印在脑海，永不磨灭。我看他以后处理一切事、对待一切人，都是从这种精神出发的。

十二月二十五日，孙中山先生到达上海。同月二十九日，各省代表在南京选举孙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议决中华民国纪年改用阳历，以旧历十一月十三日为阳历一月一日。孙先生即在中华民国元年一月一日在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最初，各省代表曾欲仿法国制度，设总理一职，并拟举黄先生为总理。后因孙先生主张采用美国制度，不设总理，此议始作罢。孙先生向参议院提出黄先生为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得同意后，黄先生即赴南京组织陆、参两部。黄先生本预定以我为陆军次长。当我正在上海南海会馆陆军招待所同北京陆军部、军政府南来的同学商量南京陆军部各司局人选的时候，湖北陆军革命小团体中最年长的同志陈裕时要把陆军次长让给北京陆军部的科长蒋作宾，因为蒋为人一团和气，又曾当过科长，在南来的陆军同学中他的官阶最高，他当了次长，则部内的各司局人选由他安排就比较容易，免得我作次长时引起同学的地位争执，不好处理。我接受了陈裕时的建议，即请黄先生任蒋作宾为陆军部次长（蒋以后从南京陆军部转到北京陆军部，受到段祺瑞、徐树錚的种种轻侮，他都能忍受；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他入总统府作黎的幕僚，又经常与专横的段、徐二人打交道，他确是很有耐性的）。参谋部次长是钮永建，他在江、浙军界中是相当有威信的。陆军部秘书长和秘书由汤化龙和林长民分别担任。汤、林两人在上海当过黄先生的私人秘书，黄先生对外的文电都是他两人草拟的。后来湖北方面因衔恨汤化龙曾在上海

電責武昌首義人士，特電致南京反對他任陸軍部秘書長。湯乃高寧赴滬。林長民在南京街頭上曾受到老同盟會會員的當面譏刺，說他從前反對革命，現在又混進革命隊伍來了。他因此也辭職赴滬。他們兩人後來成立民主黨，與國民黨為敵。

某日，安徽軍軍長柏文蔚來陸軍部領開拔費，說奉孫大總統手令，要他的軍隊即日開赴江北布防。黃先生因陸、參兩部都不知道有此命令，遂與我商議，由我到總統府任軍事秘書，以便與陸、參兩部聯繫。我到總統府後；又請孫總統加派耿觀文為軍事秘書。以後總統府發出的有關軍事文件，都是由我二人草擬的。

那時總統府的秘書長是胡漢民。秘書中有吳玉章、任鴻雋、王夏、張通典、譚熙鴻及宋靄齡等。

當時黃先生所擔心的是軍費開支浩大，並且需用甚急。某晚，黃先生約我同見孫先生，詢問向英、美借款事有無頭緒。孫先生當時正在看外國報紙。他放下報紙，回答說：“外國人曾向我說過，只要中國革命黨得到政權，組織了政府，他們就可同中國革命黨的政府商談借款。我就職以後，曾向他們要求借款，並已電催過幾次，昨日還曾發電催問，請他們實踐諾言。但今日是星期六，明日是星期日，外國人在休假日是照例不辦公的，明日不會有復電，後天可能有復電來，我再告訴你。”黃先生出來後，默默無言，心中似乎很著急的樣子。以後他即未再向孫先生詢問借款事，只是求助於上海的資本家張謇等暫時應付急需。以後又過了幾個星期，一直到總統府取消時，外國借款還是杳無回音。在向外國借款的問題上，孫先生比較樂觀，而黃先生則認為外國政府如果攫取不到中國的特權，是不肯借款給我們的。當時在上海和南京方面的同志對於獲得外國政府的承認和借款本抱有極大的希望，但結果都成泡影，

因而他們对孙先生多不諒解，說孙先生只是“放大炮”。但黃先生向他們作了如下一番解釋，大意是說：孙先生在海外的友人大率都是在野的政治家，还未取得政权。他們可能与执政的人有些联系，可以向执政者建議給中国革命党人以帮助。但欧美的当权派要借款給中国，首先考慮的是在借款条件上能否在中国攫取特殊的利益，他們的目的并不是帮助中国进步党派，促使中国走上进步道路。例如我們曾向日本要求借款，它就要我們把汉冶萍公司同它合办；我們不应允，它就不借款給我們。孙先生当然不会拿我們国家主权去換取外国借款的。我們对孙先生應該有此認識，不要抱怨孙先生向外国借款不成功。經過黃先生这番說服，同志們对孙先生的責难也就平息了。

孙先生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时，扫除了中国旧官僚排場、摆架子的恶习，也減除了一些官僚式的繁文縟节，无论官阶大小都着同样制服，这种制服以后称为中山服，流行至今。孙先生的生活非常簡單朴素，很平民化。他常书写“自由”、“平等”、“博爱”的橫幅贈給同志。孙先生以亲身的行动，在南京开創了一种新时代的风气。黃先生对孙先生这种作风极为欽佩，常常向人稱贊不已。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南北繼續停战，两方和議代表仍在上海开会。袁世凱所希望于南方的，是要南方选他为第一任大总统。南方所希望于袁世凱的，是要他促使清帝退位，改专制为共和。两方代表对此都早有默契。談判中間曾有过几次波折：一是南方已許举袁为大总统，而又选出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在南京就职，致引起袁之怀疑，认为南方无誠意，會議曾因而一度停頓，經解释后仍繼續开議。一是清廷有些頑固派阻撓清帝退位，袁乃故意使和議停頓一下，同时授意段祺瑞等四十二个将领联名拍电威胁清

廷，迫其就范。清帝终于在民国元年二月十三日下詔退位。和議告成后，孙先生即向參議院辞去总统职。

在議和期間，同盟会內部在社位給袁世凱的問題上是大有分歧的。孙先生和一部分同志，认为袁世凱是一个巨奸大慝，把建立民国的重任付託給他是靠不住的；我們革命党人应该有勇气、有决心率領南方起义将士繼續战斗，趁此全国人心傾向革命的时候，必然胜利可期，此时多費些气力扫除障碍，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家，将是事半功倍的。而黃先生和另一部分同志的看法則不同。他們說，袁世凱是一个奸黠狡詐、敢作敢为的人，如能满足其欲望，他对清室是无所顧惜的；否則，他也可以象曾國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一样来搞垮革命。只要他肯推翻清室，把尚未光复的半壁河山奉还汉族，我們給他一个民选的总统，任期不过数年，可使战争早停，人民早过太平日子，岂不甚好。如果不然，他会是我們的敌人，如不能战胜他，我們不仅得不到整个中国，連現在光复的土地还会失去也未可知。

这时，在北京出獄不久、在同盟会中素負盛名的汪精卫已到上海。汪早已同袁世凱及其子克定密商决定袁在北方推倒清室，他劝南方推戴袁为大总统。他曾派人到武汉告知黎元洪、黃先生和武汉首义同志，他們均表贊同。这时汪既任南方議和代表，仍坚持他的主张，甚至不惜恶意攻击孙中山先生本人有权利思想。他并邀約当时負社会重望的吳稚暉、李石曾等发表宣言提出“五不”主义（不做官，不做議員，不納妾，不吸烟，不飲酒），他自己也故意力辞广东都督不就，以表示他个人的“清高”和“言行一致”。此外，光复会的領袖章太炎、陶成章等对孙先生因早有誤会，也曾对孙先生大肆攻击。攻克南京有功的浙軍司令朱瑞系保定軍校学生，与段祺瑞、

有师生关系，这时已向段密通消息，表示拥袁上台。黎元洪当汉阳失守后，因情势危急，曾一度退出武昌城外。袁世凯抓住机会，通过汉口英领事提出双方停战，黎始悄悄回城。因此，黎认为袁世凯对他有意维护，对袁感激不尽。其他各省都督如谭延闿、程德全、庄蘊宽、湯寿潜、陆荣廷、孙道仁等，各省统兵大将如沈秉堃、王芝祥等，本系清廷大官僚和地方大绅士，在他们看来，拥戴气味相投的袁世凯自然比拥戴那些素不相识的革命党人要好一些。当时如和议破裂，要他们听革命党人的命令对袁世凯作战，他们很可能是反戈相向的。以张謇为首的上海名流们曾替袁世凯划策，怂恿他推翻清室，并在上海起草清帝退位诏书，送交袁世凯用隆裕太后名义颁布。他们当然对袁有好感，也是不肯反袁的。同时，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温宗尧等既已切实允诺举袁为大总统，并且因此才换得一纸清帝退位诏书，他们当然也要实践诺言，不肯失信。还有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革命军的实力。当时南方除少数从正规军扩编的军队尚有作战能力外，大部分新编入伍的士兵多是城乡失业民众，尚未受过军事训练。各部队形式上虽具备军、师、旅、团、营、连、排的编制，实系乌合之众。从汉口、汉阳失败的經驗看来，想依仗这种军队去冲锋陷阵，一直打到北京，是靠不住的。在国际方面，那时袁世凯已同英政府暗中勾结，英政府随时可给他援助。其他各国也大都希望中国形成分裂的局面，以便于他们任意要挟宰割；他们自然绝不会愿意中国有一个新兴的、由进步的势力组成的统一政府，来抵抗他们的侵略。因此，凡是考虑过以上各种情势的人，都主张对袁让步，举袁为总统。曾在日本、欧美学过法政的同志如朱教仁、王宠惠等，主张用约法限制总统的权力。当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后，随即修改约法，把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

以为这样就可以限制袁世凱的行动了。此外，参議院还通过了建都南京、要总统在南京就职的两个决議。但是这些紙上的决議都被袁世凱种种設辞和阴謀手段(如南方迎袁代表到京后嚇使兵变)所撕碎了。袁世凱终于实现了他在北京就职、窃取政权的野心。我們当时主张让袁世凱做第一任总统，当时的背景約如上述。关于这个历史問題的是非得失，从今天看来，应该怎样判断，应该如何吸取經驗教訓，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問題。

南京临时政府撤銷以后，設立南京留守府，办理政府机关的結束事項和接收管理駐宁的軍队。黃先生被任命为留守府的留守，我为总参議。府內設政务、軍务两厅，以馬良(相伯)为政务厅厅长，张孝準为軍务厅厅长，陈嘉会为秘书长，何成濬为总务处处长，耿毅文为参謀处处长，曾昭文为軍需处处长，陈登山为軍法处处长，赵正平为軍学处处长，林虎为警卫团团長。黃先生經常在上海同各方面会商国事，他的留守职务由我代行。当时最感困难的問題是南京拥有十余万人的軍队，軍費沒有来源。熊希齡在上海时曾允俟到北京就財政总长职以后，即拨汇軍費到南京来，但他就职以后分文不給，虽經多次函电催促，仍置不理。我曾用南京留守府总参議名义，公开指摘他的失信，他还是不理。我不得已，只得把南京軍队的伙食从干飯改为稀粥。以后連稀粥也不能維持了，乃将南京城的小火車向上海日商抵借二十万元，暫維現狀。某夜，江西軍俞应麓所部突然嘩变，在南京城內肆行搶劫。經請广西軍王芝祥軍长派队彈压，到天曉才平定。除由軍法处将罪据确凿的犯兵予以懲处外，其余均遣送回籍。經過这次兵变，我才認識到有兵无餉的危險。我当时曾想到，在兵多而无餉的情形下，黃先生与其担任南京留守府的留守，不如作一个江苏省的都督，可以有丰富

的財源，來訓練几師精兵保衛國家。我正擬將此意寫信到上海向黃先生建議，不料上海方面已推定程德全為江蘇都督。我感覺到出路已窮，南京留守府多存在一天，即多負一天危險的責任。袁世凱一面迭次挽留黃先生，請黃先生不要辭職，一面又總不撥給軍餉。這明明是袁世凱的毒計，要使黃先生墮入陷阱，身敗名裂。我遂商請黃先生從速結束留守府。

在結束留守府以前，在南京駐紮的軍隊除江蘇軍隊劃歸江蘇都督管轄外，其餘浙江、廣東、湖南的軍隊分別調回原省，剩餘的軍隊一律在南京遣散。但為保存革命實力計，將所有遣散部队的優秀軍官及精良武器組成一師，定名為第八師。這個師從師長以下至營連長，都是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和保定軍官學校畢業的同盟會會員。師的槍支有兩套，一套分發士兵，一套存儲倉庫備戰時擴軍之用。餉項歸中央陸軍部直接發給。師長陳之驥是直隸（今河北）省人，日本陸軍士官第五期學生，同盟會內的丈夫團團員，為人忠實耿直，尚義氣，重然諾，曾經捐過郎中，又是北洋軍閥馮國璋的女婿。他被推為第八師師長，是陳裕時首先提出來的。陳裕時是一個多計謀、喜用策略的人。他那時從廣西帶來一支軍隊，編入第八師為一旅，他也被推為第八師的一個旅長。他認為陳之驥是馮國璋的女婿，在北方有靠山，不會受袁世凱的抑壓，將來還可大有發展。大家都贊成他的意見，推舉陳之驥為師長。同時，推定兩個旅長，除陳裕時之外，另一個旅長是從廣西桂林帶來一支軍隊的司令趙恆惕。王孝縝、黃愷元、何遜、陶德瑤、劉建藩、張華輔、張厚瓌等先後為團長，吳和宣為工兵營營長，袁華選為參謀長。其後，陳裕時辭職，趙恆惕也調到湖南，由王孝縝、黃愷元兩人兼任旅長。我們當時只想用全力把第八師組織得堅實健全，作為革命軍隊的

一个中心堡垒。对其余应裁的军队就设法促其迅速裁遣，以便早日结束留守府。我看到有些师、旅长对裁遣军队进行不力，就订出一个限期裁遣、餉項包干的办法，即：先发一个月的全餉交师旅长掌握，过期不再发餉；从早遣散了士兵，所剩余的餉項也不上繳。这样，各师就不待催促，都尽先裁遣士兵，以便留有余款作官长回家的旅費。正当各师大力裁兵的时候，第八师的同志就急忙从他师被裁的士兵中，挑选精锐来补充自己的队伍。此事被各师发觉后，他们纷纷来留守府控告，指明第八师的团长何遂招收了遣散而尚未出城的士兵，要求处理。留守府知道裁遣各师而只保留一个第八师，这件事早为各师所不满，现在各师又把第八师违令招兵的事实来府控告，若处理不善，恐有碍裁兵的顺利进行。我遂忍痛将何遂同志撤职，以暂平各师的攻击，准备事后再令何复职。第八师不同意，要我收回成命。我坚持不肯，王孝縝同志还气冲冲地到留守府来要打我。我还是照原令执行了。裁兵完竣以后，留守府即取消了。

(四) 宋案前后和癸丑討袁

南京留守府取消以后，袁世凱即派同盟会会员张昉来沪邀请黄先生赴京。是时孙中山先生已在京多日，与袁世凱商谈国事，尚称融洽。黄先生到京后亦参加会谈。袁世凱对孙、黄两先生不仅招待极为隆重，而且态度也表现得很谦恭，表示他一定要遵照孙、黄两先生的政見次第付诸实施。孙、黄两先生对袁世凱也表示信任。孙先生在袁世凱召宴的筵席上说：“社袁总统作总统十年，练兵百万，我经营铁路建设，把铁路线延长至二万里，民国即可富强”

云云。袁又发表了八大政綱，謂系他与孙、黄、黎共同协商决定的。袁請孙先生担任全国铁路督办，在上海設立办公室；請黄先生担任粤汉铁路督办。黄先生想早日建成南北交通干綫，促进南方的建設事业，亦允担任。但黄先生离京后，派我同当时的交通总长朱启鈴商量职权問題时，朱坚持督办应受交通部管轄，一切用人行政事項均須向部請示批准。黄先生认为与原議不符，知袁世凱实无誠意，遂决定辞职，在上海閑居。湖南革命同志拟請黄先生回湘为都督，但黄先生因不肯取代譚延闓的职位，亦不同意。

黄先生离京时，曾与袁世凱商議，留我在北京作总统府軍事处次长，以便联系。軍事处总长是蔭昌，我与他都无事可办，負实际責任的是參議唐在礼。所有关于軍事机密事宜都是由段芝貴与參謀部次长代理总长的陈宦直接同袁世凱密商办理，連陸軍总长段祺瑞也不令参与。袁世凱那时对待南方革命軍人表面上极为优渥，凡来府謁見的，他都亲自接見，褒奖备至，离京时贈送珍貴礼物，并随时賞給文虎章或嘉禾章，以資籠絡。袁对肯受收买的人更給以高官厚祿，使其甘心作他的爪牙，經常在各省內部搗乱，并把各省內情密报北京。

袁世凱偵知宋教仁联系南方各省，在国会議員中能获得多数选票，可能被选为內閣总理，乃与赵秉鈞密謀，嗾使奸人于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在上海車站向宋行刺。宋遇刺后于二十二日四时身死。宋案发生后，很快便发现这是袁世凱的阴謀。袁世凱本来照例每星期中总有一天約我同段芝貴、陈宦与他共餐，会談南北两方情况的，但自宋案发生后有两星期沒有約我聚餐。我心中怀疑他对我有所疑忌。恰巧一个素有神經病的同乡名叫刘端吾的来找我，向我說：“你不要怕，我今天已写信給袁大总统，說你是个好人，

不要怀疑你有什么举动。”我听了他这番话，怕他这封信反而提醒了袁世凯对我有所行动。我为了免被袁世凯暗中监视或者暗害，即于是晚借送客上车为名，跳上京沪通车一直回到上海。未出京的军人同志仇亮和林述庆，以后都被袁杀害。我却因这个神经病者的一番话，得以倖免。

我到上海后，同孙、黄两先生及在沪同志会商处理宋案的办法。大家都异常悲愤，主张从速宣布袁世凯谋杀宋教仁的罪状，举兵讨伐。当即商定由孙先生密电广东陈炯明，黄先生密电湖南谭延闿作出兵的准备，并派我同李根源、张孝准赴南京发动第八师准备出兵讨袁。但陈炯明、谭延闿都回电声述出兵困难，说他们内部不一致，实力还薄弱，不能在此时出兵。南京第八师的陈之骥、陈裕时、王孝楨、黄愷元等都說第八师兵士缺额尚多，以前归第八师指挥的林虎一个团已调往江西，湖南都督谭延闿因湘省防务空虚，又把该师陶德珩的一个团由赵恆惕率领调回长沙。他们还责备我在留守府主持裁兵时禁止第八师招兵，又撤了一个团长，以致他们不得不把招兵计划延缓下来。因此，他们的结论也是：现在还不能出兵。我们回上海向孙、黄两先生报告南京情形后，黄先生鉴于掌握兵权的人既不肯在此时出兵讨袁，仅仅我们在上海几个赤手空拳的人空喊讨袁，是不济事的。他遂主张暂时不谈武力解决，只好采取法律解决的办法，要求赵秉鈞到案受审。黄先生这种用法律解决的主张也是有一种用意的。他认为当时国人还未认清袁世凯的凶恶面目，还以为反袁是国民党人的偏见；我们如果通过法律解决的办法把袁世凯谋杀宋教仁的真相暴露出来，使国人共见共闻，即可转变国人对袁世凯的看法，激起国人的公愤，使他们转而同情国民党。是时，上海法庭曾根据所得证据禀传赵秉鈞到案，赵拒不到

庭。同时北京方面亦借口在京破获了国民党的暗杀机关，通知上海法庭轉传黄先生到案。黄先生为了揭穿这个阴谋，便按时向上海法庭报到。袁阴谋終不得逞。

是时，袁世凱到处派人收买革命軍人，广东駐沪代表覃肇欽已被袁世凱收买，态度曖昧，行蹤詭秘，上海同志都对他特別警惕。袁世凱并派北京平政院院长庄蘊寬来沪探听我的意見。庄对我一向关怀，且知道我的性格，他不直接找我而託他的秘书問我愿不愿离开上海。他的秘书对我說：“袁总统托庄院长告訴你，如你愿意回京，不必再入总统府，可出任綏远都統。如你愿出洋，袁总统愿送你旅費八万元。这是袁总统的意思，托庄院长回沪之便向你轉达的。”我說：“黄先生在沪一天，我絕不会离开此地。如朱案得到合法解决，我与黄先生也都不会长留在上海的。”

孙先生在那时还是主张出兵討袁。他一面派人赴各省联络軍人，一面还派陈其美、戴天仇(后改名戴传賢)来与黄先生辯論。黄先生仍然坚持不能用武力解决的意見，往往爭論激烈，不欢而散。孙中山先生这时想亲自到日本寻求日政府的援助，但黄先生和在沪同志多不贊同此举。黄先生认为依靠外援来反袁，是不容易得到国人諒解的，而且袁世凱反可以此为借口向欧美各国求援。

袁世凱在对南方的軍事部署就绪、大借款成功以后，就下令把广东、江西、安徽三省的都督免职。此时大家都感到保全实力、隱忍待时已不可能了。江西都督李烈鈞高职赴沪后，又返湖口，于七月十二日宣布独立，树起討袁旗帜。

南京第八师的两个旅长王孝縝、黄愷元于七月十三日午后仓皇来沪，向黄先生密报說：朱卓文从上海携款二万元到南京运动第八师的几个营、連长，叫他們杀了师长、旅长后宣布独立，并請孙先

生蒞臨南京主持討袁軍事。但未受運動的營、連長向王、黃兩人報告了這個消息，並主張先發制人，除掉這幾個營、連長。他們兩人認為第八師主張慎重，不輕於發動討袁，是為了替本黨保存實力，留在將來起更大的作用；現在若內部自相殘殺，必至兩敗俱傷，第八師實力勢將完全消滅。他們兩人感到，與其自己消滅自己，不如一致對付敵人，雖實力不能保存，也算作了光榮的犧牲。因此，他們兩人囑咐告密的人把這個消息極端保密，不要告訴別人，也不要報告陳之驥師長，因陳是个性情耿直、胸無城府的人，恐怕他聽了這個消息，暴跳起來，反誤大事。他們兩人在向黃先生報告了如上經過以後，就對黃先生說，現在事已至此，雖準備未充分，也得樹起討袁的旗幟，請黃先生赴南京作討袁軍總司令，他們一致服從，但千萬請孫先生不要在此混亂時期赴南京，須俟南京獨立穩固後，再請孫先生去組織政府。

在商討總司令部組織時，他們建議總司令部的參謀長人選可俟黃先生到南京後再行公推，只是聲明不要鈕永建、李书城兩人擔任。因為他們認為鈕在廣西督練公所作幫辦時，遇事遲疑不決，顧慮太多，往往對重大問題不能及時解決；而李在留守府主持裁兵過激，曾撤過第八師一個團長的職，致使該師兵員至今還不足額，官兵對他有意見。黃先生見勢已至此，遂應允他們的要求，決定次晨赴寧。他隨即往見孫中山先生，說他自己願赴南京舉兵討袁，請孫先生在初舉義旗時暫勿赴南京，俟創立一個局面後再請孫先生前往主持；並謂南京獨立後，須有上海方面的兵力、財力的支援，請孫先生在滬督促陳其美趕快占領上海。孫先生同意後，黃先生乃囑王孝縝、黃愷元兩人當夜趕回南京，布置起義。

七月十四日晨，黃先生裝作赴南京遊覽的姿態偕同眷屬乘滬

宁火車到达南京。是晚即在李相府陈之驥住宅开軍事會議，与会者有南京第一师师长章梓、第七师师长洪承点、第九师师长冷遹、第八师师长陈之驥等。会上决定出兵計劃，各部分担任务如下：原駐江北的冷遹第九师，加上从第八师編成的一个混成团（团长刘建藩），共同配备在蚌埠鐵路沿綫，抵御馮国璋南下的軍隊；章梓、洪承点两师布置在淮揚一带，防守长江要塞，阻止张勋部前进。黄先生于次晨（七月十五日）赴江苏都督府会晤程德全，請程通电各省宣布独立。程德全被迫应允，并推黄先生为討袁軍总司令。

当黄先生在江苏都督府会客厅候晤程德全、程尚未出見时，江苏都督府參謀长兼江苏第一师师长章梓突然宣布前第一师师长陈懋修、讲武堂副堂长蒲鑑、要塞掩护第二团教練官程凤章、南京要塞司令吳紹麟等通敌，均予枪毙；尚有张一爵、张斯廉两人聞风先逃，未被捕获。据陈之驥告我說：被章所杀的那几个人，多是留日陸軍学生，曾在徐紹楨統制下作过軍官，因与章梓素积嫌怨，遂为所杀，并不是由黄先生或程德全的命令执行的，也不是由南京几个师长会商决定的。

程德全虽被迫宣布独立，但于七月十七日托故离宁，設办事处于上海，飭南京取消独立。南京宣布独立后，第八师組織一混成团，由刘建藩指揮向江北进攻。在該团尚未到达前綫与第九师会合时，第九师的前綫指揮官迫不及待，首先单独发动进攻，与敵軍交鋒未久，即被击退，潰不成軍，紛紛后退。刘建藩率所部进入陣地后，因人數不多，只能采取防御战术，堅守待援。与此同时，陈其美、鈕永建攻取上海，亦告失敗，敵軍将从上海进逼南京，而湖口方面失利的消息又传到南京，南京将有三面受攻的危險。討袁軍參謀长黃愷元見南京形勢危迫，深恐黄先生悲憤自杀，日夜守在黄

先生左右，并极力劝請黃先生离宁赴沪。黃先生离宁时，师长陈之驥赶来送行，知黃先生身无一文，临时找卫队长湊集了銀币七十元送交黃先生作旅費。黃先生坐日本停在下关的运煤船，与黃愷元同赴上海。据陈之驥說，黃先生临行时会囑咐他要維持南京秩序，不要讓殘留在南京的兵士扰害商民。

南京取消独立以后，第八师将开往江北的部队繞道瓜洲調回南京，并将蚌埠桥梁炸毀，以阻止敵軍南进。接着，何海鳴运动守卫都督府的第一师殘部，又在南京宣布独立，自称討袁軍总司令，旋为第八师的部队逼令取消。第八师兵士受何海鳴部下的煽动，向官长索餉，鼓噪不已。代理团长李浚召集士兵訓話，严加譴責。士兵即将他打死，紛紛四散。第八师的軍官亦全部离宁，各自逃亡。南京第八师的实际領導权一向为旅长陈裕时所掌握。上海方面的革命党人认为第八师初則反对出兵討袁，繼則一遇战事失利，就在南京取消独立，这些都是陈裕时在暗中主持的，因而对陈銜恨甚深。他們已組織几个暗杀人員，拟俟陈由沪赴宁进入城門时将他杀死。此消息为他的妹夫何遂所探知，乃急电陈中途返沪，陈始倖免于难。又陈裕时为使第八师获得保障与发展，曾与袁世凱的亲信陈宦暗中有联系。在袁称帝时，陈裕时为表明自己的立場，曾約請黃愷元赴长沙劝說湯薌銘，他自己也亲赴成都劝說陈宦，敦促湯、陈通电反袁。后黃愷元出家为僧，在杭州一小庵內修閉关法，因病圓寂。陈裕时亦在家学佛，參訪汉、蒙、藏佛学大师，頗为虔誠，在抗日战争时期因病死于重庆。

上海、南京討袁軍既相繼失敗，广东、江西、福建、湖南、四川的討袁軍亦先后崩潰。国民党内有人认为此次討袁失敗原因在于未先发制人，坐失时机。但当时各省將領起初所以不肯举兵，都是

因为各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及早发动，举兵討袁，也不一定就能取胜，因为成敗关键并不是这样简单的。

(五) 亡命日本以后

黃先生离宁所乘日本輪船未在沪停留，径直开往日本。他曾在船上写一密信告我說，他在吳淞口不能上岸，只得去日本。我还記得他信中有“这次上了当”一句話(大意如此)，不知意何所指，以后見面也未再詢問究竟，至今还不明白。

南京、上海討袁战事失利后，我还未打算离沪。有一天，我在上海电車上看見上海护軍使的悬赏布告，写明緝拿黃兴、陈其美，各悬赏五万元，李书城、黃郛各二万元，且不論生死，一律給賞。我觉得不可再留在上海，遂同何成濬离沪赴日。

我們在神戶上岸，在所住旅館的旅客簿上填上假名，并向來訪的警察打听黃先生的住址。警察未肯相告。我們忽接到一个自称是“同情”我們的日本人来信，說他有一件极机密的事要当面告知我們，請我們于某日某时乘某路电車到某站下来，他穿某种衣服在站迎接云云。我同何成濬照信所述時間、地点前去。果然有人在站迎接，把我們請到他家中。这个人向我們說，他愿意为中国政府效劳，刺杀黃兴，只要我們在中国駐日使館取得一支手枪給他，他却实行。我們才知道原来这个人看錯了人，把我們当成袁世凱的爪牙了。我們同他敷衍几句，即回到旅館，把当地警察找来，告知他这件事。警察听說，并不惊讶，謂可一笑置之。这时，他才把黃先生的住址告知我們，并陪同我們到黃先生那里去。

我們不久即同黃先生移住东京，国内参加討袁失败的同志也

陸續來到日本，大家交換意見，籌謀善后辦法。這時，孫先生提出了改組國民黨為中華革命黨的意見。他把本黨失敗的原因歸咎於黨員不聽他的話，並且認為黃先生應負更大的責任。孫先生說，在南北議和時期，他憤袁氏狡詐，曾主張寧可開戰，不可讓步，但黃先生不贊成；以後他主張建都南京，要袁世凱南來就職，黃先生也不表示堅決支持；宋案發生後，他主張用武力解決，黃先生也不肯聽；他欲再赴日本求援，黃先生又力阻其行；最後他本擬親赴南京出師討袁，黃先生忽自告奮勇，阻其前往，致招挫敗，全局瓦解。孫先生既把一切失敗的原因，都歸之於黨員不聽話，尤其是黃先生不聽話，所以他主張改弦更張，把國民黨改組為中華革命黨，並且規定黨員入黨時要寫誓約，打指印，以表明願意犧牲一切，服從孫先生的命令。陳其美、戴天仇、楊滄白首先贊成，並邀約在日亡命的同志都一致參加。但一般首義有功的同志，尤其是在首義時作過高級將領的同志，都認為這種寫誓約、打指印的做法有失身份，不肯附和。孫先生仍然堅持一定要這樣做。陳其美復到處奔走，要大家贊成，凡不贊成加入的同志他就大肆攻擊。黃先生曾約請胡漢民、汪精衛兩人設法婉勸孫先生改變這種做法。胡、汪兩人說，他們最初曾盡力勸阻過，但後來鑒於孫先生的意見異常堅決，為暫時照顧孫先生的情緒，他們兩人都勉強按照孫先生規定的辦法履行了入黨手續，等候時機再設法進勸。黃先生以為長此在東京相持下去，恐同志之間意見日深，將自行削弱革命力量，給敵人挑撥離間的機會，故決定離開日本，遠適歐美，以便使孫先生得以行其所是，各不相妨。黃先生遂於一九一四年夏由日本乘輪先赴美國，並準備遇有機會再到歐洲游歷。

同黃先生赴美的有其夫人徐宗漢、幼子一美、翻譯徐申伯、秘

书石陶鈞和我。翻譯唐月池則先期前去辦理入境手續。我們到達美國舊金山時，唐月池與先在美國留學的黃先生長子一歐、女振華以及舊金山的許多僑胞都前來迎接。因時臨夏季，在舊金山未住幾日，即在舊金山北面的一個海岸避暑地住了一個多月，隨即赴紐約小住。不久就在費城郊區租賃一所住宅定居下來。

從美國西部到東部，凡有華僑聚居的地方，黃先生都被邀去作了訪問。各地華僑同胞除開會歡迎外，並擬籌集款項送給黃先生作革命活動的經費。黃先生每到一處，除了說明旅外僑胞歷來幫助革命，貢獻很大，向他們表示感謝之外，並詳述袁世凱背叛民國的事實，鼓勵華僑繼續奮鬥，共同打倒袁世凱。他並囑華僑同胞將籌集的款項直接匯寄東京交孫先生支配，聲明他自己這次是來美暫居，不需要僑胞資助。他每與僑胞談及孫先生時，都表示很尊敬孫先生，從未講及他自己與孫先生在黨的改組問題上的意見分歧，因為他唯恐因此使僑胞熱愛祖國的情緒受到影響。

黃先生旅美期間，歐戰已發生，日本也接着對德宣戰。聚集在東京的一部分未加入中華革命黨的同盟會會員認為時局嚴重，相約組織“歐事研究會”，經常商討當前時局及應付的方針，並函告黃先生，征求黃先生的意見。

黃先生到美國後曾商請章士釗在日本創辦《甲寅雜誌》。這個刊物在當時對革命起了推動的作用。當時有些同志在東京創辦了大森浩然廬和東京法政學校，專收亡命日本的同志學習軍事和政治。殷汝驥主辦浩然廬，彭允彝主辦法政學校。兩校的經費是由黃先生和李烈鈞負擔的。

黃先生在美聽到日本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時，立即向國人表示，為了舉國一致反對日本無理要求起見，即時停止反袁活

动，以便袁世凯专心对外，维护国权。国内外同志多响应黄先生的号召，作了同样的声明。后来袁世凯阴谋推翻共和、僭称帝号时，黄先生听到孙毓筠、胡瑛、李燮和加入筹安会，洪承点等签名赞成帝制的消息时，极为愤恨，骂他们是革命党中的败类，认为这是革命党人的耻辱。

黄先生在费城郊区住下以后，正拟从事美国国情的研究，并计划参观访问一些地方，以广见闻，不意在某晨起床以后吐血数升，经医生诊断为胃溃疡病，须妥速治疗，并作长期休养。为使黄先生能静心养病，我与石陶钧迁出黄先生住宅，另在附近各寄寓一家庭旅舍，一面学习英文，一面了解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石陶钧不久移居旧金山，寻又先行回国。我学到几句英语后，即坐火车从费城到旧金山，又从旧金山经美国南部绕道华盛顿回到费城，计往返时间约一月有余。

我在这一个多月的旅行期间，结识了一些美国友人，增长了不少知识，特别是对于美国的种族歧视政策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感触甚深。当我旅行归来，向黄先生谈到这些问题时，黄先生说，我们回国后，一定要用政治力量来尽量防止这些不合理现象的产生；同时他也谈到了他对于将来建设中国新社会的理想。他说，将来中国要由政府开办养老院、慈幼院、卫生院、残废院，经费全由国家供给，不收费用。所有大、中、小学校也都由国家设立，免费供给学生膳宿，学生只要考试及格，即可入校读书，使穷苦人家的子弟也能受到教育，不让有钱的子弟占有特权。黄先生还时常谈到男女平等的問題。他认为中国社会受孔教的影响，对女子抑压太甚，要矫正这个积习，应先让女子能与男子受到同等的教育，享有与男子同等的财产权、选举权、劳动权，只有

这样，所有买卖婚姻、包办婚姻、童养媳、孀妇不能改嫁等恶习才会自然消除。他还說，中国人口本多，如果占一半人口的妇女从沉睡中觉醒起来，同男子一样把力量贡献給国家，中国的富强就可以赶上欧美。他认为这是我們在回国后应该大家努力去做的一件事情。

袁世凱在打败国民党的討袁军队后，更加肆无忌惮，公然帝制自为。黄先生在这时期，加紧与国内同志联系，鼓励同志各就力之所及，分別活动，不論各党派政見如何不同，不論他們以前与国民党有何种嫌怨，只要他們現在反对帝制，肯出力打倒袁世凱的，都要与他們合作。当全国討袁声势重新高涨的时候，国内同志及一些日本朋友都电催黄先生早日回国。黄先生遂于一九一六年五月由美国乘輪回到日本。輪船甫进入神戶港內，尙未靠岸，头山滿、宮崎寅藏、萱野长知等即乘小輪迎接黄先生先行上岸，寻赴东京。日政府先已借給岑春煊^①二百万日元，以半数作軍費，半数在日本购买軍火；这时又提出借給黄先生五百万日元作为招集旧部編練军队之用，并无任何条件。黄先生囑我到上海筹备。我到上海不几天，袁世凱就死了。于是黄先生回到上海，各地同志都来上海会商。当时的主要問題，是在国会恢复后国民党的国會議員如何在国会內进行斗争的策略問題。在此期間，黄先生与孙先生互相过从，商談国事，一如往昔，并无絲毫芥蒂。

黄先生回国以后，病体并未恢复，又因应接繁忙，生活习惯驟然改变，以致胃潰瘍旧病复发，又未能及时轉地疗养，照常会客談

① 一九一六年五月一日，两广反袁部队組織都司令部，举岑春煊为都司令。八日，組織軍务院于肇庆，推唐繼尧为撫軍长，岑春煊为副撫軍长兼撫軍长事。

話，病情因而日趨嚴重。十月十日，黃先生因胃血管破裂，吐血數盃，暈絕經時，延至三十一日午後竟溘然長逝，享年四十三歲。

黃先生的死耗傳出後，國民黨同志固然感到十分悲痛，即素與國民黨敵對的政黨或個人亦多函電致唁或在報章上著文表示悼念，並對黃先生一生待人誠懇、篤實厚重、効忠革命、勇于犧牲的精神稱道不已。

黃先生臨終以前，李根源向他辭行時，他曾對李根源說：黎元洪太懦弱，段祺瑞、徐樹錚專為北洋派打算，恐怕全國統一无希望；對內搞不好，更談不上對外了。並對李根源囑咐幾件事：一、胡瑛無志節，可恨可憐，聞他很窮，望念舊交，維持其生活；二、譚人鳳修宋教仁墓尚未完工，應有人負責；三、李烈鈞隊伍快到餓飯地步，須請黎元洪妥籌辦法；四、國會要注意立法，法立而後政治始有依據，只問政治則政治愈紛亂不可收拾。

黃先生死後，孫先生繼續奮鬥，經過一再遭受失敗之後，終于一九二四年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實行聯俄、聯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使他所領導的國民黨走上了新的道路。我常常這樣想：黃先生如不早死，能活到俄國十月革命成功以後，他也可能同孫先生一樣以俄為師，走俄國革命的道路，將成為幫助孫先生實行三大政策的——個好助手，對中國革命事業將會作出更大的貢獻。

疏《黃帝魂》

章士釗

疏《黃帝魂》序

辛亥以前之革命形勢，可分作兩期言之。一、從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五年，為理論鼓吹期；二、從一九〇六至一九一〇年，為分途實行期。分途實行云者，謂一部分人從事暴動，一部分人投身暗殺，一部分人埋頭苦學，如在日本習陸軍，在歐洲習政治理論等等，各相所能，戮力併命。其所以後期得如是行之者，蓋認為前期鼓吹演成，堪期績效。當時各校學生、新軍士兵、大都會工人同志等，已對革命理論毫無捍格，機緣湊泊，必且屢及劍及而從事也。尋太平天國，起義至十二年之久，占領國家三分之二以上之土地，而全部知識分子，幾乎無人跨入革命範疇以內。此洪楊諸公未始注意到理論一面，不能使農民領袖與知識分子結成堅牢陣營，以致徹底失敗，可以概見。今吾儕反其道而行之，先將理論集中在排滿革命上，深入顯出，解說明白，使全國之人視同飲食男女，怡然理順。然後武昌一呼，天下響應，脈絡分明，迹象犁然。今革命成功五十年矣，征女寫遠，征獻零落，感時撫事，慨嘆頻聞。語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后死者急起直追，將已往理論重要著作，加以疏証，誠為懲前毖後必不可少之迫切工能。《黃帝魂》者，一九〇三年鼓吹高潮中

典型著述之一。劉鼫矣，久久不近筆硯，驚墮日甚。猶幸當年奔走疏附，略有見聞，謹就篇章，隨事箋記。味雖同嗜，不自諱于馬肝；心有所知，輒未遺于雞肋。國家廣征名彥，勤討墜聞，劉也依附末光，稍得別白于貪常嗜瑣一流，斯為幸耳；謂其有裨史冊，則吾豈敢。是為序。

辛亥以前之革命思潮，就上海而言，應以光緒癸卯夏至翌年甲辰秋此一時期為最高點。何以故？以蘇報案開端，萬福華案結尾，其他宣傳誘導，內外質劑，與當時震蕩奔放之人心適相應合故。即小冊子一項，若而《革命軍》，若而《駁康有為書》，若而《孫逸仙》，若而《沈蕙》，若而《攘書》，若而《猛回頭》，若而綜合輿論畫龍點睛之《黃帝魂》，皆集中于此一時期發行，都無慮數以萬計，除應付門市以外，能郵寄者郵寄，需密送者密送。湖北曹亞伯即擔任此項工作。張難先亦分送《猛回頭》、《孫逸仙》、《黃帝魂》等于八鎮工程營。見《辛亥革命》第一冊第五百五十三頁。舉凡東南一帶之知識階層、新軍部曲，甚至粗識之無略解誦讀之町童里婦，如《革命軍》、《猛回頭》等書，即為便于此輩而作，几無不人手一編，心領而神會焉故。

《黃帝魂》者何？曰：光緒末造，湖南有畸士曰黃藻，字菊人，善化縣人。歲庚子，唐才常倡義于漢上，藻與畢永年、林錫珪為友，以諸生與聞其事。事敗，名在刊章而不甚著，遂避而之滬，用鬻文自晦者久之。時上海革命論鼎盛，八面論師，乃至三家村學究，相與造名義，互標榜者無算。願菊人不樂為此。好飲酒，無人至，則獨飲。好狎邪游，無人偕，則不出。能寫北碑，作小詩歌，無人唱和，往往高臥終日。喜談革命，談不能自休，時而罵人，時而流涕；無可與談，輒寂寞自寫論文，或抉擇同時輩流之論文，以湘音諷之。吾之率江

南陆师退学生莅盟而抵沪也，有同舍生黄桂棻，以世父事菊人，为吾介绍，与行士相见礼。菊人行九，长吾四五岁。桂棻为人鲁莽，而颇好义，且兄事吾甚恭。吾以桂棻故，尊菊人九先生。所居衡宇相对，几无日不覿面，彼此旨趣，亦八九从同。盖菊人主绝对排满，而不甚反对帝国民族主义，曰：吾憐汉族，行为亚洲大陆之主人翁也。久之，吾为宣揚主义，将从事于印刷，且謀設一局于所寓里街之内。菊人喜曰：善，是宜以东大陆名之。吾不得不聳然应之曰諾。又久之，菊人来告曰：名从主人，是則然矣，然人而无魂，不啻行尸走肉也，将何以为人？吾曰：何謂魂？則出一高达寸許之厚重稿本見示，曰：子視此，且以布达于众，使全国人人皆有魂，使全国人人皆有其肇祖元胎繼繼繩繩之魂。吾仍不得不聳然应之曰諾。此东大陆图书印刷局印行之《黄帝魂》所由始，此菊人以北碑大书特书于面頁之上之《黄帝魂》所由始。

《黄帝魂》之編輯者，号为“黄帝子孙之一个人”，此一个人証明为湖南黄藻，既如上述。則撰述者所謂黄帝之子孙之多数人，此多数人之为某为某，亦自非不可能次第疏証。此物此志，姑試为之。

《黄帝魂》所收論述文字，計四十五篇。第一篇开宗明义曰《黄帝紀年說》。此刘申叔执笔为之，曾在《国民日日报》来文栏内发表，署名无畏。文由揚州寄来，久之申叔方到沪。余初見此文，写在小小赫蹏之上，字細碎如秋蚓，类未成年学童所书，絕不似出自积学之士之手。願此說露布，不啻为輿論矗立一指明方向之界牌，使天下之士分途奔集而无歧誤。盖当时革命立宪两党，文字相伐，互立职志。一則曰君主，一則曰共和。一則曰保教，一則曰保种。由此发軔，两方所用年号，于焉不同。前者为康梁一派，用孔子紀年；后者孙黄一派，用黄帝紀年。此清朝末期之趨勢如此，非

《黄帝魂》編輯者一家之創論也。黃帝紀年，以及所編大同小異之大事表等，見于當時各種公私著述，尤非《黃帝魂》編輯人獨擅之技也。查秋瑾檔案中，即有此相類似者一表，自署編者許則華。其為真實姓名與否，無俟深考。獨其編著年月，在《國民日日報》或《黃帝魂》之後，則為沿襲前人所標界牌，走入正確革命方向，了無可疑。字句間偶有出入，亦不足細論。此文收在《左重外集》第十四卷。

用孔子紀年之代表作，莫如梁啟超《新史學懸談》一文。文見壬寅十月《新民叢報》，適先于《國民日日報》本文半年耳。說大略如下：

昔上海強學會初開，用孔子卒後二千四百七十三年，此實太史之例也。《史記·老子列傳》書孔子卒後二百七十五年，此史公開萬世紀元之定法。因此為紀，厥有四善。符號簡，記憶易，一也。不必依附民賊，紛爭正閏，二也。孔子我國至聖，使人起尊崇教主之念，愛國思想，亦油然而生，三也。國史繁密可紀，皆在孔子以後；在孔子前，逆而數之，事不多，不足為病，四也。

上說幾于立憲派人之公意，四善惟教主一點獨異，余又亦适用于黃帝紀年。

革命黨以黃帝紀元，辛亥武昌起義後，滬軍都督陳其美張貼布告，稱黃帝紀元四千六百九年，最為顯例。《辛亥革命》第七冊《剪髮文告》攝影。但太炎並不以為然。彼之文字，輒署孔子卒後若干年，不與立憲派人渾殺。看本編第四十一篇所引《沈肇序》。或謂此關同盟光復兩會之不一致，然毋寧曰太炎湛深六藝，不能完全擺脫孔子。觀于獄中自記，隱以道統傳人自任，而足見此人与一般革命黨分際不同。雖曰單辭孤証，亦須認作革命黨史中之矛盾性。

第二篇曰《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紀念会叙》。此章炳麟在日本东京所为文，破題即曰：“自永历建元，穷于辛丑，……中国之亡，既二百四十二年矣。”辛丑者，即西历一九〇一年，而前清光緒二十七年，本文之时代性，灿然明白。吾聞之秦力山：时当庚子之第三年，即光緒二十八年壬寅 中国革命党人，包括彼与太炎及馮自由輩，无过十余人，自哀无国，聚而橫議。上野公园内，有西式茶館曰精养軒，顧名思义，以美饌馳名一时。若輩輒蜂拥而往，开会其名，裹飲其实，嬉笑怒罵，无所不至。席間人人手持太炎預草叙文一通，以志焚巢余痛。而力山复作宝塔歌一首，其結尾十字句曰：“甚么亡国会？精养軒一頓”。余一字至九字，吾悉亡之。癸卯秋，吾在上海与力山見面，力山犹出示当年东京露布之初印单頁，摘尤諷誦，歎歎不已，比于荆高酣歌燕市，旁若无人云。按《太炎文集》存此文，字句微有不同。

上記依据秦力山之口語为之。旋閱馮自由亡国会記事一則，《辛亥革命》第一册第四百九十七頁 情节微有差池，茲杂取而补充之如下：

（一）此会发起共十人，即章炳麟，秦鼎彝 力山，馮自由，朱菱芸 菱溪，馬和君武，王家駒 伟人，陈犹龙 桃癡，周宏业 伯助，李穆 寅四，王思誠。此十人我徧識之。章秦馮馬無論已。朱菱溪，湖南时务学堂头班生，鎮算人，为人鹵莽灭裂，要挾同学，使派己充代表，回上海組織民权社，經營出版事业。迷于狎邪，所事不終。陈独秀在《惨社会》小說中露骨攻之，菱溪大怒，必狙击独秀然后快。时独秀与吾同居，經調停始无事。王伟人，浙江人，与赵伯先、王勇公相契，先盛談革命，娶伯先二妹为繼室，旋轉向法界，趋于和平，充北京法律专门学校校长。陈桃癡，湘西老輩，自詭左仲远，避庚子汉口之难也。与朱遜初友善，遜初被刺，桃癡逃东京，以至病歿。遜初遺著《我之历史》六册，由桃癡保存。周伯助，亦时务学堂高材生，专研經濟

学，为熊秉三之得力助手。李宾四，长沙人，与李篁仙同族，其人有干才，多预留学生事故，惟攘夺陈梦坡之妾，为人指摘。王思诚，浏阳人，与唐才常家有连，为人不修边幅，动惹谤议。亡国会十发起人中，六人湘籍。

(二) 此会约定在精养轩召集，但为日政府干涉。先期牛込区警察署，呼十人往谈话。太炎长衣大袖，手摇羽扇而行，路人注目。警长问：清国何省人？太炎答曰：非清国人，支那人也。警长大訝，又问：何阶级？答曰：遗民，无阶级。警长摇头者再。接汪穉痴笔记卷三，记上海苏报案，亦首被拘者中一人，西冠而服道士服，德领事甚怪谥，此亦指太炎而言。太炎到处以服色惊人如此。

(三) 据馮所记，精养轩开会未成，惟是日孙总理自横滨来，获在该轩聚餐。或者章秦等异日补宴，亦未可定。力山描写会食情况，諒非誣語。

(四) 梁启超曾託充贊成人，寻函知太炎，謂此事只可心照，不必具名。宣言书寄横滨《清議报》者，亦无法代派当地华侨。

(五) 馮记秦力山、朱菱溪、陈桃癡三人，皆汉口自立軍将领，避地来日。太炎因列名上海张园国会，被清吏悬赏通緝，初託庇苏州东吴大学，继亡命东京。周伯勋在牛込区榎木町赁屋，二王 仲人、思誠馮、朱、陈皆附居。力山与王宠惠亮時同寓。

(六) 周寓为会所。壬寅三月初旬，太炎提議，鼓吹种族革命，非先振起世人之历史观念不可。今距三月十九日崇禎殉国忌日未远，应于是日举行大规模之紀念会，众贊成。

(七) 清公使蔡鈞持此会宣言书，訪日外部求禁开会。

(八) 程家棧、汪荣宝曾赴会被阻。

《太炎文集》有两板，一康宝忠兄弟有关之右文社板，一太炎女

夫龔未生主持之浙江圖書館板，兩板所收文字，皆太炎手定。《亡國紀念會》一文，右文板削去，而浙江板收存。標題亡國上無冠詞，如本編；浙江板冠中夏字，朱邊先手鈔本又作支那。本編“自永曆建元，窮于辛丑”，上僅著“處今世而懼亡國，非狂則嚙哉”兩語。浙江板易為：

夫建官命世，帝者所以類族，因不失親，天室由其無遠。故玄黃于野者，戰之疑也，異物來萃者，去之占也。維我皇祖，分北三苗，仍世四千，九有九截。雖窮發異族，或時干紀，而孝慈幹蠱，未墜厥宗。

一大段帽子，《辛亥革命》板所引同。又文中“念延平之所生長”句，延平浙江板改作大木，大木者鄭成功之小名也，知者絕少，又反晦。浙江板“願吾楚人無忘何騰蛟”句，本編何騰蛟作蒙正發，人鮮知，經改例較明。總之此文太炎再三斟酌，期于至善，愈增鴻文重量。

本文題目，支那字改作中夏，既如上述，而文中“支那之亡，既二百四十二年矣”，浙江本却因仍未改，本編易言“中國之亡”。實則支那為外人藻飾我國之名，原不含惡意，太炎並不諱言。劉申叔《漢書·華夏篇》云：

華夏舊名，起于花國，花國之稱，即大夏一音之轉。而諸夏之名，當由大夏轉被。由諸夏轉為諸華，致支那震旦之稱，皆由此起，皆西方所傳入也。按宋云《編譯名義集》，以支那為光華之稱。由此可見：大夏轉諸夏，諸夏之中為中夏，中夏又轉為中華，支那與光華有連，上因高名，豁然貫通。

本篇收筆：“每念及此，彌以腐心流涕者也，君子。”此類文調之由來，劉禹生號稱無意中獲得，見《世載堂雜憶》二九二頁。

太炎有手鈔秘本數十冊，蠅頭小楷，極精善，皆漢魏以前

最好文調，故其作文，淵雅古茂，有本原也。在北京為予等發見，几至用武。一日，太炎為人作文，末有“是真命也夫，君子”。予等曰：先生雖套用四書“吾知免矣夫，小子”，究從先生秘本中得來。太炎怒目而視。

文人癖習，往往而有，然謂太炎有文調秘本，吾滋未信，何況蠅頭小楷至數十冊之多乎？太炎一生流離轉徙，身無長物，爛散漫藏，通國皆知，几于每日不離著述，為問此數十冊秘本，置於何所，而可使密友無從窺見乎？平心論之：太炎文高，誠亦不能無所胎息，然太炎之胎息，乃由踐履功深，熟極而流，因之落筆即雅，讀者看不出有何勳袞。倘彼文思遲鈍，必如考生之倚賴夾袋，始能成文，則太炎文中，必有多少生吞活剝跡象，使人不快。此凡癩祭者類如是，而太炎顧無有也。嘗論太炎記性絕強，古籍極熟，獄中為文，典贖一如平日，此朋儕共見之事，豈入獄亦許攜帶秘本數十冊乎？假其有之，太炎所輯文例，可成後生文學寶典，生前秘藏，身後寧有不被人發見并謀流布之理？今湯國梨夫人健在，一問不難明白。禹生游談之雄，好為捕風捉影之說，譏訕前輩，自是一病。即以君子二字言之，此無他，即禹生多音“悠家”之古字也。蓋湖北人與人對話，結尾好用“悠家”二字。太炎喜治方言，每以今音通古音，推而廣之，即不難以今語射古語。於是“悠家”一變，化為君子，順理成章，極形自然。與其謂之仿古，毋寧謂之通今。此並不須套用《論語》中之小子，更何賴有秘本為哉？惜禹生往矣，吾無從為彼搔着癢處，使之哆口大笑。

第三篇曰《君禍》，此從譚嗣同《仁學》中摘錄而來。夫嗣同以“仁學”名其書，固自矢曰：此推之四海而皆准，俟之百世而不惑者，宜莫此書若也。顧嗣同論任俠有曰：“華人慎無言華盛頓、拿破侖

矣，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楊玄感，以供圣人之驅除，死无憾焉。”吾于嗣同之为文，所感亦然。盖嗣同发議，往往以当时积弊为的的，不免流于偏激。以时分言，不仅說不上百世，即轉眼間，嗣同能保持原議与否，即未可定。又以地域論，嗣同一眼横扫世界各国，視他国所为，几无不至高无上，我应毫无保留余地，傾心学步。轉而談到本国，則又百无一是，当拉杂摧烧，絕其本根。由是四海皆准云云，乃絕對以人准我，而全然不含以我准人意味。嗣同持論之偏宕，一至于此。因之《仁学》一书之价值，謂止于学术界之陈涉、楊玄感徒供后来圣人之驅除，良非过言。嗣同攻击湘軍，及謂牛庄一役，不战而潰，为喚醒中国迷梦之最大棒喝，吾民之智，此其猛进，乃《黄帝魂》編者愜心貴当之論点，殊堪注目。

文中引法人改民主之言曰：“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滿地球，以洩万民之恨。”此語未注明何人所言，嗣同果何所本，不得而知。要之反映嗣同心影，可以断言。查《甲寅周刊》登載曹孟其筆記，有一段云：“組安語孟其：甲午湖南乡試，嗣同寓居其家。揭曉之夕，彼期望急切，繞室迴环，至于达旦。是科不售，乃納粟易官，越四年，遂及于难。是科題为‘湯有天下，逃于女’四句。譚君小誥有曰：以生人者杀人，不謂之功名，而謂之學問。主考批云：奇思偉論，石破天惊。”后孙雄撰《詩史關筆記》，轉录此段，加評于下：“譚君因家庭齟齬，不得于繼母，遂失欢于乃翁，亟思得一科名，以博椿庭之莞尔也。所著《莽蒼蒼齋詩》，有极盡篇，微露家庭隱事。至《仁学》一书，全系憤激之談，非其本意。”《仁学》本意，师郑何足知之？該筆記并未发刊，稿本在余处。惟組安跋龙莫溪师友絨札两小段，殊有趣：“汪精卫系獄时，聞老卒言：戊戌下獄諸人，惟复生神采揚揚，繞室无停趾，以香燭书壁殆遍，不知何辭也。獄卒以香为更代，故地下皆燭

余，后壁已垂，竟无知者。”又云：“复生慷慨善谈论，意气发舒，见人一长，称之不去口，自谓学佛有得。余于戊戌七月初四过天津，与林瞰谷饮酒楼。闻隔座叹息声曰：有君无臣，奈何？窥之，复生也。亟呼入，与瞰谷不相识，余为之介。高睨大谈，一座尽倾，明日别去，遂及于难。临刑神采扬扬，刃颈不殊，就地上翻之三戮，头始落，其不恐怖，真也。”綜上数事观之，嗣同不怕杀人，亦不怕被人杀，臥天下惟杀人可了事，应是嗣同思想癡結。

吾初見《仁学》，乃东京国民报社所印，而《国民报》又根据横滨《清议报》板本，此是光緒壬寅年事。梁启超称：譚氏丙申、丁酉間，在金陵著此书，仅示一二同志，秘未出世。及为民流血，功成身死，同人乃謀弘布之，此登在壬寅《新民丛报》第一号，言朴实可信。在此以前，殆无人见过《仁学》一书。查《仁学》理論极杂，界域絕远，且明反滿洲，痛罵湘軍，大超越維新派思想范围。譚氏生前，曷不可能以此漫眎于人，甚至公布。願吾閱近人所著《貴州革命散記》，有如下記載：

当光緒二十三四年間，譚嗣同《仁学》一书，在国内起了很大影响。吳嘉瑞，字雁舟，湖南湘潭人，翰林，以知府分發貴州。爱好《仁学》，津津乐道。戊戌年，吳被任为貴州百层河董金局总办，局址設貞丰城内。幕友楊虛紹，亦湖南人，与吳信仰相同。吳楊二人，組織仁学会，以文昌宮为会址，大事宜撰。会众三十余人，維新思想，弥漫全城。見科学出版社《云南貴州辛亥革命資料》百七十四頁。

此戊戌政变前之紀事，有四点可疑。一、政变前，全国无人看到《仁学》，上海且如是，何論貴州？二、譚吳虽同是湘人，而行輩不接，宦游各別，思想亦距离甚远，吳何从得此书？吳之于譚，不可能在一

二密交之列。三、吳雁舟与寒家有連，知其人甚悉，一比較篤厚之老翰林而已，何能与譚氏同一思想領域？如真知道譚氏說些甚么，必且咋舌不已。四、《仁學》理論，入乎人人，出乎天天，无法与維新派并为一談。此点尤重要，梁任公曾大略說到。綜上四疑，可見近来所出历史資料，翔实可貴者固多，然亦往往意在誇張，难于信据。

上文繕就，忽于无意中在狄平子《平等閣筆記》发見一条，与吾說适反。該条首云：“湘中南学会，聚一时之俊杰，任公忽病，复生来視疾，說法竟日，次日，复生与任公书。”书詞甚长，无取备录，其与本件有关數語如下：“吳雁舟先生說心法于上海，公惟恐蹈空，惊惧不敢受，嗣同深以为怪，盖公之病已萌芽于此矣。”据此，有两点甚为明白。一、吳氏佛学湛深，为譚氏所心服。二、譚氏在金陵著书之年，譚吳交接甚密，譚以《仁學》示吳，吳录副而去，大有可能。由此二点观之，吾曩所疑四項，全然失去根据，凡記載不实之咎，反在己而不在人。吾为暴露自己弱点，且戒同人遇可疑处勿急武断，輒于原文一字不改，而附加說明于左。狄平子名葆賢，字楚青，溧阳人。庚子之役，任后路糧台。筆記所称譚与梁任公书，当在丁酉年尾，或戊戌年初，时任公讲学于长沙时务学堂也。

吾云：雁舟与寒家有連，乃吳为吾舅氏刘舜伯之儿女姻亲，特吾知吳公时，吾不过十余龄童子耳，名为姻旧，实于吳一无所知。回溯曩誤，不胜股栗。

狄之《平等閣詩話》又云：“长沙吳雁舟太史文藻膽逸，才足幹时。出守黔之思州，投迹南荒，百端咸理。乙巳冬，作扶桑遊，道出护壩，傾盖歧途，塵談竟日。君湛深內典，玄风弥暢。”乙巳者，千九百〇五年，即光緒三十一年，去戊戌已七載矣。

第四篇曰《客帝》，乃章炳麟早年遭难，与梁启超輩游，因沾染

其論越而为是文，列于初板之《燹书》中。既而悔之，《燹书》再板，显然刊落。核其文义，首引《春秋》以元統天，春王为文王。文王孰謂？王愆期謂是仲尼。于是欧洲紀年以耶穌，卫藏紀年以釋迦，教皇与达賴喇嘛，皆尝为其共主，中国之共主，非仲尼之世胄則誰？如此說来，炳麟斯时主张，完全与康梁尊崇孔教一致。彼后来自劬，謂是“弃本崇教，迫于形势”，以視同时輿論推本黄帝，以及黃蕪本編之所标旨趣，恰恰相反。客帝云者，以自古用异国之材充客卿为例，滿洲入主关内，应无可，此与黃梨洲天下为主君为客之說异撰。炳麟并引《唐书·陆贄传》，向德宗建言，时屯当有变革，不者削去帝号，引咎降名以贖天戒。为今之計，可将国家尊号，奉之孔氏，使以素王尸空帝之名，而实际执政仍不妨委之滿人。惟滿蒙駐防八旗，无置馬甲，除其名粮，一切受治于郡县而已。誠如是也，此其压抑革命，护卫滿族，視康有为之虛君共和論，犹进一阶。所为弛空名而增实惠之处，当使滿人更觉躊躇滿志，置汉族于万劫不复之域。誠不料以炳麟尸祝排滿，坚不可拔，曾謂“逆胡羶虏，非我族类，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默中答《新聞报》語，文載本編。忽乃有此适相刺謬之异論并行于世，其不渾殺正义，迷誤后进者几希。蕪視章先，高逾山斗，郑重著录，未废此篇，亦見君子之过，食同日月，大师少作，不免差池而已，岂有他哉。

第五篇曰《論发辯原由》，此論之时代性异常浓厚，至今日視之，了无价值。諒是上海《苏报》、香港《中国日报》或东京留学生当时发行之《国民报》，載有此类論文，編者因录存之。观其引用英文 Chinaman 作“差拿文”，文者粵語重浊，m音成“文”，本篇乃由粵人执笔，似无疑义。又“文”在粵語可能与他重唇音同讀，参看下第二十篇欧文例。

嘗論辮髮之事，光緒末期，去留紛紛不一。有本有而翦焉去之者，有本无而忽焉植之者，有已去而翻髻焉者，有断然自髡者，有強髡他人者，形形色色，樊然殺乱，要之无不寄深警大恨于滿人以为之归。吾聞之太炎矣，其言曰：

余年三十三矣，是時滿洲政府不道，戕虐朝士，橫挑強鄰，黷使略賈，四維交闕，憤東胡之无狀，汉族之不得取，隕涕潸潸曰：余年已立，而猶被戎狄之服，不违咫尺，弗能剪除，余之罪也。將薦紳束髮，以復近古，日既不給，衣又不可得。于是曰：昔祁班孫釋隱玄、皆以明氏遺老，断髮以歿。《春秋·穀梁傳》曰：吳祝髮。《漢書·嚴助傳》曰：越剪髮。余故吳越間民，去之，亦猶行古之道也。《太炎文集》·《解辮髮》。

此本有而翦焉去之者也。若夫左輔义民，东邻俠士，久易武灵之服，感安索虜之形，行軍不疑，采入其阻，則本无而忽焉植之，如宮崎寅藏、末永节之流是也。至于負笈海外，服习安便，驟尔归朝，头重自駭。于斯时也，五步之內，髻也紛披，伊誰呕起？头发无气，湘蔭有囉起几根头发气之語，楊篤生《新湖南》中引之。吳祿貞、楊守仁之徒，褻然居首，似又滑稽可笑，強附仇孟衣冠。其在他一面，姚昱一风尘下吏，偶轄一省海外學務，时光湖北留學生監督，无端摟留學生之道鱗，由張繼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揮翦，稍稍發抒割髮代首之恨。馴致釀成交涉大故，三人被遣返國，邹容則乘机刊布《革命軍》，激起排滿浪潮，不足十年，而清帝退位。區區一辮髮去留，而关系种族存亡之大如此。查当年輿論，以女子纏足及男子辮髮為两大弊习，貽笑四鄰，同号困恥。顧《黃帝魂》編者置纏足于不論不議之列，而且暗示女子毀伤肢体，是表示男降女不降之唯一指标，如湖南等省此类保守性特強，情有可原。《新湖南》即持此論。独对辮髮一

宗，大張捷伐，視作九世深讐，不共戴天，其故安在？炯如上述。

第六篇曰《正仇滿論》，此為太炎駁梁啟超之《仇滿論》而作。庚子之後，東京有一部分老留學生，囊括曹汝霖、金邦平等在內，設有一會，頗曰“勵志”。初時論頗激昂，漸次變質，陳乾生即陳独秀未改之名、張溥即張繼未改之名等，後參加而先脫會，即可見會之本质不妙。會員中不乏能文之士，時有一月刊雜誌曰《國民報》者，持論多與《清議報》交綏，務勝之以為快，聞由此會中人主編。法理文字，恆請益于王亮疇，政論往往由沈虬齋翊云執筆。《正仇滿論》或疑出虬齋手，以虬齋與太炎至稔，筆鋒輒亦模仿太炎也。今此論有一大段，從“今者北京之破，民則愿為外國之順民”起，至“亦終為歐美之奴隸而已矣”止，本文全段，在後第三十篇《駁康有為書》條下引之。持校太炎自撰《客帝匡謬》跋尾云：

故聯軍之陷宛平，民稱順民，朝士以分主五城，食其廩祿，伏節而死義者無一人。汝種非人人闖茸也，同異無所擇，孰甘其死？由是言之，滿洲勿逐，欲士之愛國，民之敵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終為歐美之陪隸已矣。

兩相比擬，一詳一略，不覺吾經解中傳與疏之比例，由是虬齋勦襲章作之傳說益盛。殊不知太炎《駁康有為書》固言《正仇滿論》為其旧著，順民一段，重復申引，尙何疑問之有？後輩為名作評價之難如此。《太炎文集》兩板皆不錄此文，斯亦導致疑誤之點。

太炎文《客帝》、《正仇滿論》及《駁康有為書》，節節連鎖，相映成趣。細讀一過，得知作者數年間思想變化進程。編者三文全錄，會心不遠。

太炎屢稱錢謙益仕清，特為冠貂蟬，襲青紫，未嘗建白一言云云，此似略有誤會。張鴻作謙益年譜序云：

当甲申之变，先生已六十三岁。明年，宏光亡。又明年正月，为清吏部侍郎，至五月引疾归，其仕新朝仅五月耳。如果热心富贵，亦当如洪承畴辈，握大权，猎高位，何至默默自甘，为二十年白发老书生乎？况郑成功为先生门下士，海外消息，时通往来。时白茆江口，交通便捷，先生以外家顾氏之产，置红豆山庄，託迹啸咏，人不措意。实则密使往来，传达消息，招募志士，调达军情，东南海上，特为樞轴，續集中时有流露。否则吕用晦、黄太冲、归玄恭、邓起西、吴孟举及松江嘉定諸遗老，志节贞介，若稍异趣，必至割席。何肯往来亲昵，如家人兄弟然乎？至六十六岁，先生寓书桂林，上陈三局。瞿忠宣以此书上奏，謂先生身在虏中，不忘本朝，忠驅义感，溢于楮墨。然則先生志节，历久不渝，虏廷疑其携贰，草野諒其忠贞，羣流奉手，推尊坛坫。非特文章冠冕詞林，抑亦志事之卓犖殷墟，有以感召而致之者歟！迨至乾隆朝，深宫枢廷，必有以窺先生之心事者。乃相与污辱之，使其耿耿孤忠，不传于后，以消灭复国之机。故乾隆文字之獄最密，皆此志也。

此論似頗詳核，不問論发自何人，宜可与太炎之說參看。张鴻字隱南，常熟人，官清外部，与孙雄交善。翁同龢日記中亦載此人，称张映南。序見胡先驥所办《国学論衡》三期。

第七篇《释仇滿》，此文吾所草也，揭于上海《苏报》。吾粗閱一过，几不能確認为己作，后見王船山《史說申义》第一条，言“种性之辨，不外风习血液二者”，以証本文首段“凡种族之別，一曰血液，二曰风习”，此恰是尔日吾所慣用之术语。又分仇滿为种族之爭与政略之爭，及后幅詮釋阴谋一节，如“聞敌之治焉而忧，聞其乱焉而喜”等語，当年吾所持論調，確乎如是。夫吾时年二十二耳，識解单

純，文笔稚弱，命意无物，遣辞全不中律令。晚岁偶見昔年撰述，为人录存，往往閱未終篇，愧汗难禁，可見古作者删汰少作，誠非无故。

第八篇曰《說汉种》，此文可能是张繼所为，其取材多从日籍中来，尔时繼尙未及通晓法文也。

第九篇《汉奸辨》，此为吾在《苏报》所撰之文，为汉奸翻案，为汉奸寻覓出路。称“三年之内，胡虏朝廷，必亡于汉奸之手”，正是当日幼稚豪情。

第十篇《王船山史說申义》，此吾在《国民日日报》所撰文，越四十余年，曾酿成一滑稽故事，至为可笑。千九百四十六年，抗战胜利之后，吾于役南京，訪江西汪辟疆国垣，在客室談話間，見案上陈列刘申叔《左盦全集》，卷叶繁重，累数十册。余久聞山右南桂馨将申叔全部遺稿付之剗削，嘉其义侠，不胜讚叹。因喜而抽取一本，随手繙閱，不意发现吾所撰《史說》，赫然在卷，为之怪詫不已。窃念吾讀申叔时，彼年不足二十，向后殫力革命，鬪迹入官，距病歿十余年中，殆无一日能安心伏案，从事著述。乃遺集广涉四部，卷帙夥頤，达到可惊阶段。吾意仅征刘氏，祖孙父子，伯叔兄弟，都治学有声于时，著录并未全行刊出。申叔承受遺產，左右逢源，殊不难择其精华，据为己有。以是申叔集中，号称少作，而精湛遽能压服太炎者，吾誠窃疑，未必悉由己出。然亦未料謬陋不足齿教如鄙文，竟得如独孤至之之文攙入柳子厚集之例，质本燕石，而欺同郑璞如此。吾笑謂辟疆，吾草此文时，不过求为附会排滿，取船山讀《通鑑論》中形迹相类之作，字櫛句比而为之，生吞活剝，一无可取。何以申叔高弟如黃季刚、錢玄同輩，負編輯之責，而漫不經心，濫行甄录乃尔？辟疆无詞可答，同声一粲而罢。

太炎于前明遺老，推服船山至上，其所为推服之故，則在船山

入山惟恐不深，志与“羣胡”断絕关系。其說曰：

季明遺老，惟王而农为最清。宁人居华阴，以关中为天府，其险可守，虽著书，不忘兵革之事。其志不就，則推迹百王之制以待后圣，其材高矣。征辟虽不行，羣盜为之动容，使虏得假借其名以誑耀天下。欲为至高，孰与船山榛莽之地，与羣胡隔絕者？要有規画，則不得不处都市。王之与願，未可以相軒輊也。《說材上》。

說虽謂而农隱处榛莽，与亭林志存用世，出入华阴，未可以相軒輊，而微意所在，似仍右而农而左宁人。曾国藩呈身清廷，奔湊至死，功成之后，又大刻《船山遺书》。于书中关涉“胡虏”之明文显目，故意剔去，听其空白，留待后人补葺。此是否有难言之隱存乎其間？倘国藩生前得見太炎此文，未知所感何如？

吾藏有太炎早年殘稿，彼甄录船山《讀通鑑論》一条如下：

宋之篡晉，义熙以后，以甲子紀，而不奉宋之元朔，千古推陶公之高节。而武都王楊盛，于晉之亡，不改义熙年号。盛，仇池之酋长耳，与无亮頡頏于华夷，晉氏衣冠之族，聞栗里之风而不愧者，又何以对偏方之渠帅也？盛临卒，謂其世子玄曰：“吾老矣，終当为晉臣，汝善事宋。”子之从违，可与己而为变計哉？盛过矣。虽然，此非可以訾盛也。盛远在荒裔，虽受晉爵，而不純乎其为臣，进則不必为晉爭存亡，退自有其不可亡之世守，則孤立而撻宋之怒，力不能敌，且以覆先人之宗社，固不可也。是以告其子以事宋，而无貽危亡于后世，是亦一道也。若夫戴高天，履厚土，世依日月之光，有君父之深仇，无社稷人民之世守，洁其身于山之椒、水之涯，耕讀以終身，无凶危之見逮，如溧阳史氏者。屢世不干仕进，而抑可不墜其宗，处此而曰：

終吾身而已，子孫固當去事他人，以希榮利，雙收名利以為壑斷，豈可援盛以自解哉？民之多辟，不可如何者也。自立辟焉，以兩全于義利，又將誰欺？

太炎錄此文訖，自跋教語：“右王氏《讀通鑑論》。辛弃疾生于金而事宋，其事成事可據也。曾靜者與船山同里居，其聞風興起者乎？”推太炎之意，似謂種族之仇，不應受時空限制。其引辛稼軒例，即以破地域之局限。若楊盛與溧陽史氏，將己身與身後打成兩截，是將國仇之時分隨意割裂，大可視同殷鑑，故鄭重錄之。夫楊盛無論已，至溧陽史氏，史稱“先世壯侯，崇封于溧陽，遷家焉，世為江南舊望”。語本李元度《先正事略》。此律之船山所稱“戴高天，履厚土，世依日月之光，有君父之深仇”者，雅相符合。顧史氏入清，第一代鶴齡，官編修，第二代夔，官詹事，第三代貽直，出為總督，入拜大學士，門族盛大，冠冕清初。噫！何其速也！昔邴曼容晉為官不過六百石，兩相比擬，已深可鄙恥，況有君父之仇者乎？此其先人所遺訓誡，有愧顧寧人母多矣。寧人母王太夫人，戒子毋仕清，實已包括子孫言之，此其義自為太炎所深喻。故太炎排滿于滿族入關二百數十年之後，一面祖述船山，仍一面兜章崑山，太炎違難易名，自署曰絳，殆非無故。顧炎武一名顧絳，太炎亦曾改名章絳。溧陽顧顏仕清，門風鼎盛，船山當時曾目擊焉，因殷殷舉以為誡。

吾為船山申義，前署教語曰：“張李時代，為他人驅除難，以致其國，天下迄定，而船山方殫精著書。洪楊時代，天下一轉捩，其所以驅除焉者，仍不異疇昔，天下亦迄定，而船山之書，一于是時切深著明。”果也，辛亥革命以前，船山之說大張，不數年而清室以亡。今其亡也，已五十年矣，從而重理舊說，應另有一種看法。吾首引船山一條：“自拓拔氏之興，假中國之禮樂文章，而冒其族姓，隋唐以

降，胥为中国之民”云云。船山认为天地之纪，乱而不可复理，为乾坤将圯之兆。此在爱新觉罗氏入关以后，侈号龙兴，船山志在鼓励本族，从事光复，自不得不如是立说。且其时满汉之别甚严，婚姻有禁，官职区分，以满洲言，尚无冒吾族姓之迹，而吾自亦不似元时无耻，以汉人而窜易其名为不骨都拔古台见赵翼《廿二史劄记》等等。不过满洲入关二百余年之久，势浸微浸弱，逮光緒末造，满人自危。如溧阳端方，自詭姓陶，祖乃汉氏，友朋中如吉林刘哲，原名德馨，为满人，而遽于汉姓中搜寻谱系。至光复后五十年来，满人虽仍自认满族，而满之族姓，几于不复可见，此船山太息于拓拔氏兴时，今乃广行于清室亡后，迹象相同，而情势大异。中国本是多民族国家，汉满并肩生存，汉人并无何项异议。当年革命，亦求推翻满族之统治而已。今新形势如此，《船山遗书》，吾亦当于字里行间求之，不应泥而不化也。

第十一篇《亡国篇》。此辟康梁所倡保国之说，论锋强悍无匹。有曰：“今日之汉种，无所谓国也，彼白人之视我也，则曰支那。支那之国何在矣？而彼之所谓支那国者，则清国也。”当时清与支那之辩，甚嚣尘上。太炎在东京创亡国会，日本警察询之。曰：“尔清国何省人？”答曰：“我非清国人，支那人也。”事见本篇第二篇。是革命党人不承与清室有连甚显。此义扩充，影响到康梁一派。康为保国会于北京，先下一义曰：保中国不保大清，是康梁一派，亦欲别清于国也甚显。然则所谓国者安在乎？太炎自承支那人，为离支那国安在乎？如实考之，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国非支那，无所谓国，支那非清，复无所谓支那，然则国与支那，支那与清，走于一环，无能自脱，是直巧词而已。太炎所称支那人，特从权为之辞耳，支那固非其所愿依託也。于是持排满论者，谓欲亡满清，必亡支那，

欲亡支那，必先亡國，理有固然，无可遮拔，此《亡國篇》之所為作也。

雖然，亡又何說？國將亡乎？抑曾亡乎？吾欲亡之乎？抑不待吾亡而早自亡乎？說曰：“已亡之人，而以亡恫之，奚怪其扞格也？”此較之老子“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猶有時間已未之別，而詞性適同。法家之論，通于黃老，由此可悟老子與韓非同傳之理。

其直指康梁之警語曰：“國其可保也哉？吾不欲保之，惟欲亡之，其亡也勃焉，其興也勃焉。”又曰：“國之盛也，則衰之源也，今之衰也，其將興之機乎，然而欲興種，必先亡國。”此代表當時最流行之偏激論調，此視孟子所云“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直洩猶瞽瞍所為已。

又曰：“名者真動人之術哉！刀鋸水火生死所不能動者，惟名足以動之，是故破生死界則英雄也。破生死則或不能破名矣，則尋常之英雄也。至名界而破也，則真英雄之英雄矣。英雄人知之，英雄之英雄人不知之。夫惟有不知之英雄，而英雄之名乃賴以顯，則英雄者英雄之英雄之奴隸也。”此一論旨，對本編輯人黃藻而言，正搔着癢處。彼平生以無名英雄自居，而天之報施，亦適恰如其分。蓋彼窮年矻矻，強話不舍諸論，殘膏剩馥，沾丐至遠，而六十年後，天下几不知有黃藻其人，此應是能破名界之真英雄，余循誦斯文，不禁心嚮往之。

此篇見于東京《國民報》，如此廉悍不羈之作，吾意非秦力山不能為。

第十二篇《中國滅亡論》，其文甚長，保皇革命兩黨，一齊罵倒。其言曰：“彼所謂君恩未報者，亦既讀書万卷，儼為一代經師。而又深鑒夫中國同胞，各具家奴走狗之腐朽性質。于是對病下葯，求便于我，所行所為，不過書生之見，如梁山泊白衣秀士王倫而已。一

經挫折，遂至平日君恩友仇，所視為身心性命，一擲而不復顧。天姬侍宴，稚子候門，吾不知拿破仑流于愛爾巴海島時，其境遇與彼若何？至若以顛復政府自命者，其人蓋老于世故者流，逆知世界文明之動機，或將航太平洋而達于中國大陸，除非由各強國瓜分，終古為等于印度之奴隸，萬無有以一人自民間而能為漢高、明太者。于是開創君主之念遂絕，乃陽襲民權革命之名號，以自便其私圖。然吾何故而得其証據哉？蓋見夫華盛頓倡美國之獨立，不聞以一身而逃至他邦；阿圭拿度與美國開兵端，不聞以一身而匿絕異國。彼其心與專制無異，而籠絡人才，假仁假義，只足為梁山宋江之替人而已。天為中國生黨，並不為中國黨人生首領。”此段文字，前半罵康有為，後半罵孫文，雙管齊下，鄰于嬉笑。又綜括言之：“吾居東，習聞僑寓經商于南洋、日本，有所謂革命黨者，有所謂保皇黨者，蚊集蜂屯，紛紛嘖嘖。而性猶濫水，宗旨無定，朝秦暮楚，反復無常。”噫，此人何忧患之深，而持論何其偏宕，與吾友孔黃素力山別號之聲口恰相似也！吾嘗編《孫逸仙》一書，鼓吹革命，奉孫君為共主，求孔黃為作一序，此當然無直截罵題之可能。然劈頭即曰：“四年前，吾人意中之孫文，不過廣州灣一海賊也，吾東洋人最好標榜，彼得毋又蹈此病？”又曰：“訪我國之遺臣于東南羣島，復求草澤無名之英雄于南部各省，龔璣人曰：烏覩所謂奇虬巨鯨、大珠空青者耶？我行仆仆，亦若是則已矣。”遺臣指康有為，草澤英雄明明指孫文而言。孔黃將兩人視同一路之貉，跃跃紙上。后幅復曰：“熱心家初出門任事時，其進誠銳，至一旦失敗，則又徜徉歧路，朝秦暮楚。”中含朝秦暮楚字，并與死亡論所用適同，特死亡論雙指，此則單指孫言之耳。孔黃此文，刊在《辛亥革命》第一冊第九十一頁。孔黃猶急好動，多欲難通，身為革命黨，而嘆革命黨無首領，又絕對不能犯反革命之錯著，

抑塞磊落，四顧無門，遂乃竄入越南，坐致摧折以死，傷哉傷哉！此
死亡論，分期揭載于當日流布之《國民報》，吾敢斷定功黃所草。雖
當時能文之士如沈翔云，此文亦優為之，然峻削鋒利，打穿後壁說
話，恐翔云猶不敢放恣如此。釋阿圭拿度，參看下《歐康有為書》條。

第十三篇《義和團與中國之關係》。此《黃帝魂》一書中之突出
重點，為黃藻與吾獨違眾而唱導者。蓋推崇太平，痛罵曾胡，自譚
嗣同登高一呼以來，几成為革命黨人之口頭禪。楊度《新湖南歌》
有曰：“于今世界翻前案，湘鄉將相遭非謗”，似憲政黨亦不得不隨
聲附和。至于推挹義和團，謂中國之強根在是者，太炎且口將言而
囁嚅，鄒容之《革命軍》亦不能認識此輩反帝之有正義性，其他更
何足論。即吾與菊人間，就此點而論，還是彼唱而我和，我之深信
不疑之度，遠遠瞠乎其後。今試引其中一段曰：

義和團之崛起也，唱滅洋之議，率無學之徒，視死如歸，搖
動世界。屠外使，火教堂，毀公署，拆鐵道，劫天下之兵，塞列
強之胆。雖巨炮如雨，堅船如雲，而猶苦戰經時，前仆後起。直
至滿會走，政府傾，北京破，然亦雅不欲罷，出死力以持之。夫
義和團豈不知寡不可敵眾，弱不可敵強哉？然出于愛國之心，
忍無可忍，故悍然冒萬死，出萬難，以一敵八，冀國民之有排
外自立之一日耳。而謂二三民賊，假神託鬼，所能使之履險如
夷，置生死于不顧乎？乃今日執成敗論人之輩，劫曰：團匪蹂
躪北部，傾倒政府，啟畔鄰邦，請盟城下，是貽國家百代之羞
也。噫嘻！是何言哉？夫使義和團一戰而勝，有志者復乘其
機，而導之以國民之義務，曉之以天賦之民權，掃專制之頹風，
開共和之善政，則此際之排英、排俄、排德、排法、排美、排地球
各國者為義和團，安知不旋踵而排除滿族、大唱改革者，非又

和团耶？不过时机失败，弃甲曳兵，引狼入室，致貽人口实耳。虽然，义和团纵一败涂地，而其为中国种无教强根，播无教国民之独立种子，吾中国人其亦知之否耶？

尝论癸甲年间，革命党中有极端矛盾之两说存在。一曰：吾徒一意排满，而排外不须考虑，如吴稚晖即此派之代表人物。吾曾引稚所著之《暗杀时代》，中有言曰：“我同胞苟欲即去奴隶之籍，则必先事排满，而排外非所计也。”《辛亥革命》第一册第三七五页。以是稚不赞成万福华仅以王之春联俄，遽起狙击。彼之理论根据，在反俄定须联日，日俄狼虎同槽，并无轩輊也。即以章太炎詿误于苏报案，託庇租界，得保首領，并暗示英帝国犹足暂时遮蔽革命，毋急排击，此一说也。其又一说，则谓列强之祸害迫在眼前，裹击刻不容缓。此虽康孙两党首邀避列强之间，而革命党之实际行动，殆无不以租界为发踪指使之地，曾少杀此说之迫切形势。然偏激党人如秦力山，即深以孙之朝秦暮楚为不然，而黄藻暨之向以排满为职志者，竟或不惜赞扬义和团之排外，其同时揭橥扶清二字，亦付之熟视无睹而不与芥蒂。斯诚革命党人心理上之矛盾杂糅，澎湃洋溢而靡所底止，《黄帝魂》论义和团一文，不过片鳞隻爪而已。

第十四篇《代满政府筹御汉人之策》，此亦《苏报》撰述文字。时极力为排满作号召，论幅分上下两层为之。上层谓满人滥杀汉人，如到处搜索革命党，当亡；满人噢咻汉人，如假立宪名义欺骗，亦当亡。即太炎所谓“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是也。二论慎重虽异，而主旨则一，本篇即属于下一层，冀做到诱敌深入，扫数歼灭者也。《苏报》以此类文字过多，使满人刺心惶目，不数月以封报了事。本报东主衡山陈范，为实行主张起见，自始预料及此，无所于悔。

第十五篇《俄据满洲后之汉人》，此亦《苏报》鼓吹文字。时俄最强横，日俄已开仗，俄占领东三省。本篇呼籲中国人大团结以御外侮，似近陈辞滥调，无足注意。惟所谓中国人者，从而剖分满汉，轻满人为冥顽无知之游牧部落，轩汉人为文明膨胀之皇汉人种。满人自审势力不足以敌俄，又虑汉人日渐开通，变生肘腋，宁牺牲发祥本土之权利，为借刀杀人之计。于是俄患虽在萧墙，而满洲君臣仍优游宴乐而无动于中。作者为之断曰：满洲亡，中国亡。中国无意于亡满洲，指党人主张满洲本土，仍听其自生自灭，满洲乃先有以亡中国。满洲之亡，自亡之也；中国之亡，则既亡于满洲，又由满洲而转亡于他族，汉人胡乃顛預若是云云。此革命党人之本来面目，仅重言以声明之如上。邹容《革命军》第二章有一段曰：“山海关外之一片地曰满洲，非贼满人所谓发祥之地，游牧之乡，所当竭力保存者乎？今乃再拜稽首以奉献于俄罗斯。有人焉，已不自保，而犹望其能保人焉，其可得乎？不爱惜己物，而犹望其能爱惜人物焉，其又可得乎？”此当时万口同声之论，可资参证。后《取康有为书》条下，杨度答日人语可参看。

第十六篇《满学生与汉学生》，此《苏报》时事论文。缘东京留学生会馆元旦演说，有汉学生主张排满，满学生闻而大惧，三日不食，迫留学生监督汪大燮，不得送排满某生入成城学校。又某生陆军初级既毕业，以登载论说于某杂志，迹近排满，满学生胁大燮，不得送某生入联队。两案齐发，汉学生大譁，各开同乡会以谋应付，因而酿成小小满汉冲突于异域，使日本人从旁齿笑。

检《苏报案纪事》，此文与《苏报》所登者微有出入。题目《苏报》作《异哉满学生异哉汉学生》，本篇两异哉字皆抹去。满人留学者某某两生，《苏报》都指明是良弼与长福；登载论说之某杂志，《苏

報》亦明言是《湖北學生界》，而本編皆諱之，不知編者用意安在。至元旦演說排滿之學生，是劉成禺。見《辛亥革命》第一冊第十頁。

文中責備漢學生，有如下教語：“然則取一二革命排滿之言，騰諸口說，遂可以恢復中國乎？吾見其輕薄浮僂，器根淺劣，而斷乎非可以當大任之人也。傳不云乎？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者，拙也；有報人之志而令人知者，危也；事未發而先聞者，殆也。今漢學生坐此三失，而猶嘖嘖然曰：革命排滿，嗚乎，自有此輩口頭禪之革命排滿，而革命排滿之實際乃無望矣。”又云：“慎到有言：不知而言，知而不行者，不可以為知也。故陽明之學，即知即行，其意以知而不行，與不知等也。”寫排滿文字，而“掉書袋”如此，定屬初次下山之毛賊，應遜秦力山一籌。

前云使日本人從旁齒笑，亦非無病呻吟。《蘇報案紀事》載：“是日按是年五月十六日章炳麟得日本佐藤武次郎函云：貴國留學生設軍國民教育會，名為拒俄，實則革命。公等謂是漢人主動乎？噫嘻！愚矣。滿洲良弼實為此計，而不料公等皆入其彀中也。良弼創此議，恐漢人不附，於是發書三百餘函，上之政府，謂學生無非亂黨，以此絕其歸路。及軍國民教育會興，良弼詭居事外，而運籌帷幄，實系一人主持。彼為此計，蓋知革命之必不可免，而欲易漢人革命為滿人革命。故嘗對眾學生曰：公等言革命流血可也，何必言及民族？可以窺其微矣。”今于六十年後追討史迹，電乃仿託。良弼并非如彼強狠，亦無滿洲革命陰謀。此外《蘇報》登載清廷嚴拿留學生密諭，清廷知之，曾譴責《蘇報》捏造上諭，《蘇報》却堅稱密諭是真，從江督署借鈔得來。要之當時凡可以挑撥滿漢感情，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此一迹象，可從《蘇報案紀事》字里行間看出。

第十七篇《祝北京大學堂學生》，此張博泉 張原名溥，號博泉，改名

后，号亦易溥泉为溥泉矣，其时尚未改名。继在《苏报》所为文，主张中央革命甚力，非薄孙文唐林之徒在南方屡起之革命军。溥泉当时口讲指画，兴高采烈，情景历历。

甚矣溥泉之迷信中央革命也。彼以走马下兰台为中央革命之代表语，至地方革命，则譬之平地上高山，崎岖难行。并谓欧洲革命，由地方而起者，惟英伦三岛一例，其他则革命之主动力量，无不集于京城。以其取高屋建瓴之势，一奔千里而不可遏也，其说甚辩。久之，吾国辛亥革命，武昌振臂一呼，天下响应，旬月之间，清社以屋。此犹不足以破溥泉之执念，意谓革命仅供袁世凯驱除，党人谬以天下社之国贼，国贼居高临下，而天下莫之御也。当民元世凯僭窃已成，反形呈露，溥泉密陈孙黄，非扑杀此獠，吾党无中兴之日；倘吾以北人而膺参议院议长之职，世凯以便于诱惑，或者喜与吾接，即不然，议长入府计事，无见拒理，吾不难手搥其胸，为吾党了此残贼，从而四督举兵，天下指挥可定。孙黄壮其言，如计而行。不谓溥泉获居高位，而世凯木然不加礼接，溥泉亦无法强近其身。癸丑一役之后，一切付之泡影，卒之溥泉中央革命之迷梦，毕世无成，即降一阶，而明年祖龙死之语讖，亦不应于其手。吾诵斯文，不禁感慨系之。溥泉少余一岁，草此文时，最为纯白无疵，忠勇奋发，敢为非常可喜之论，为同人仰望。其他不信儒言，鄙薄纲常，亦当行出色之能事。时余设东大陆译印局，溥泉与吾同居楼上。尊君化南先生，莲池书院都讲，恶其子之言革命也，盛气南下，将猝之北返。溥泉微闻之，则以大字榜于楼门：“无论何人，非主人延请，不得登楼”。化南先生见之，逡巡退去。此属当时人乐于称道之一事。

溥泉自署自然生，盖彼高唱无政府主义，主一切听其自然，不加干涉，几与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老子学说一致。或问之曰：子强

制姚昱，割其辮髮，此在子唱導之自然高論，應居何等？溥泉向不善詞令，為之語塞。

第十八篇《孫逸仙與白浪庵滔天之革命談》，此從吾所編《孫逸仙》一書採摘而來。書見《辛亥革命》第一冊第九十頁。吾之此書，原以宮崎寅藏之《三十三年落花夢》為張本。黃藻標為《孫與白浪庵之革命談》，名從主人，甚為愜當。惟此中有一軼事，未甚為人所知，不妨先為點染，用博諸趣。時海內革命論已風起雲湧，但絕少人將此論聯系於孫先生。吾之所知於先生，較之秦力山所謂海賊孫汝，不多幾許。一日，吾在湖北王侃叔處，見先生所作手札，長至數百言，用日本美濃捲紙寫，字迹雄偉，吾甚駭異。由此不敢僅以草澤英雄視先生，而起心悅誠服之意。時先生名在刊章，旅行不便，因易姓名為中山樵，中山姓，樵名。人或驟遇先生於逆旅抑通衢，必須見呼中山、而諱言孫姓，始與易姓避人耳目之本旨相符。願吾貿貿然以中山綴於孫下，而牽連讀之曰孫中山。始也廣眾話言，既而連章記載，大抵如此稱謂，自信不疑。頃之一呼百諾，習慣自然，孫中山孫中山云云，遂成先生之姓氏定型，終無與易。侃叔申知此一情形而大怒，曾見詬曰：“子何不通乃爾？昔者范雎入秦，化名張祿，只聞人稱張祿先生，不聞妄呼范張先生。姓氏重疊，冠履倒錯，子何不通乃爾？”吾遜謝，然亦無法變易。久而久之，從不見有人提出問題，先生似亦聞而默然。本非“約定”，卒乃“俗成”，荀子學說無形運用之妙如此，約定俗成，語出荀子，姑不具論。吾既因王侃叔而知先生之抱負與方略，復求得滔天先一年壬寅所發行之新著作，本其一知半解之日文知識，吾曾在江南陸師學堂習日文，擇要彙錄，成此短書。一時風行天下，人人爭看，竟成鼓吹革命之有力著述，大出意外。有江南名士金松岑，以工為古文辭擅名，聞風興起，復取滔天

原著，全部精譯，踵行于世。願不如吾短書之入人深而推行遠，曾國藩“不信書、信運氣”之扯淡胡言，曾國藩自撰墓誌銘云：不信書，信運氣，公之言，告萬世，共十二字。扯淡，湘謠胡言 其收效于宣傳事業又如此。

吾書告成，太炎閱之甚喜，為題二十八字于前頁云：“索虜昌狂混禹績，有赤帝子斷其噓，揜迹鄭洪為民辟，四百兆人視此冊。”太炎好寫古字，第十四字作藜，後見翻印本已為改正，仍之。查前清未造，革命之論初起，中山曾受警噓，太炎題字，今日視之，平平無奇。而在當年啟蒙時代，謂官文書中之“海賊”，將魏鄭成功、洪秀全而上之，為中國共主，力何雷獅子吼！

第十九篇《革命之原因》，此即鄒容《革命軍》之第二章，全部一字未動。鄒容寫此書時，年才十九歲，自日本因與湖北留學生監督姚昱閔，被遣返國。到滬後，入愛國學社，適與吾同舍。容性高亢，而治學頗謙下，因出藁求點定，吾認為主義無可商，文字亦條暢足用，只為簽題“革命軍”三字歸之。吾少年惡札，惟《革命軍》、《孫逸仙》簽題，共六字存在耳。容更持呈太炎，太炎曰：“此求喻恆良耳，何必故作？”由是容之創造此書，少陸機作賦之一年，無敬孔定文之半字，情文獨特，凌轍千古，豈不懿歎！或病此書攻擊種族，過於偏激，不知此時代性使然。以吾國解放後之眼光，泥視此作，則所見之差別，何止千里？古之知人，必先論世，其理由在此。至以流寇罵倒李自成，則二百餘年來之傳統謬見，一時難于蕩盡，吾人于尊崇前烈之餘，亦當優予理解。

《黃帝魂》之印行，略后于《革命軍》，編者恐鄒著銷行不廣，因剽取其革命理論獨多，予以見編者之用心云。

排滿文字，類揭藥揚州十日、嘉定屠城二事，以聲討滿洲之罪。鄒容尤過甚其詞，以張捷伐，至謂滿人鉄騎所至，屠殺擄掠，且十倍

于二地，有一有名之揚州、嘉定，有千百无名之揚州、嘉定云云。从无有于此致疑者，立宪党人虽反对革命，然亦不敢触及二記，为滿洲作辯护。独太炎手录日本永野确所著《讀揚州十日記》一文，自为商榷，此誠革命史中之意外插曲。今日重理此案，应为史家之所乐聞。原文如下：

孟子曰，不嗜杀人者能一天下，宋苏轼亦历举汉高祖、光武、唐太宗及宋太祖以証之。余讀清三朝实录，亦益信孟子之言之不虛也。夫辯髮北虜，奚曾知有仁义之道哉？然已受生于天地間，以为人类，虽夷虜乎，岂无仁义之心哉？况天之所授，能开數百年太平之基，非深仁大义、出类拔萃者，恶能足受其命而当其任哉？是其为理，考之千古，質之天地而弗疑者，非独孟子之言为可据而已。余頃将明末王秀楚所著《揚州十日記》，讀而疑之。滿兵四出，酷虐嗜杀，魚肉民人，不啻虎狼，自生民以来，冤痛慘毒，未聞有至此极也。而清祖能一天下，以至今八世，历二百余年，重熙累洽，戴白之老不見兵革，何其兴之暴而其治之美也！此記而可信焉，則子孟子之言不足据，而天道不足征矣。实录所謂清祖除苛施仁、胜殘去杀諸美政，皆誕妄虛伪，悉出于当时史臣阿諛之笔歟？彼此背戾牴牾，何其如此甚也！昔宋太祖遣王全斌平蜀，太祖反复戒勿多杀，而全斌不用，肆杀以馮凶虐，太祖大怒，深悔用全斌。当时倘有如王秀楚之徒，詳記其屠蜀之状，則安知其异于此記哉？由是观之，将帅不得其人，盖一时之謬举，非人主之本意也。然則讀十日之記者，未可遽疑三朝之录也。但須知一是朱明遺臣之笔，亡国之痛，憤激之言，不保无溢恶也。一是創業維新之史臣遭时得意之言，不保无溢美也。屠蜀已非宋祖之意，乃知屠

揚將帥，亦是全斌一輩人，恐非清祖之本意矣。則孟子之言果可據焉，而天道豈容疑哉？《嘉定屠城紀略》，不知何人所撰，亦与此說一类之書。要之他年有正史出，然後定論可觀焉，今姑斷以理，未知其當否也。

太炎錄此文畢，有簽注兩點。一、永野確字孟確，世稱丰山先生，伊豫人。二、屠揚本出豫王愷，非受朝旨也。親藩肺腑，異于王全斌，使朝廷果以愛人為心，豫王其遂恣肆至是耶？是篇故作疑辭，頗有含蓄，耐人咀嚼不盡。愚按太炎謂屠揚出豫王愷，不知何本？愷者豫王曾與史可法書札往來，有誘降不成一段經過，因此豫王迂怒于揚人而屠之。太炎凭邏輯推測，有此論斷，良未可料。須知當時順治幼主，豫王挾母凌子，專制內外，謂豫王須受朝旨行事，恐于清初形勢不合。且此一形勢，太炎見之甚瑩，知之而故詭其辭，又云：有含蓄，耐咀嚼，畢竟真意胡指，難于斷定。文稱清祖至今八世，八世云者，自順治數至同治，適符其數，日人應在同治朝草此文。太炎遂錄，則距鄒容著《革命軍》適前一歲，明年，吾輩沪上討論《革命軍》時，不聞太炎持此論。以排滿前鋒如太炎其人，而下意識中藏有此一理論委曲，比于牛之反芻，而加以咀嚼，不欲踵武日人，豈曾王秀楚之所記容有盜惡，直為前後論師之所不及料。吾珍視太炎手稿，輒發覆于此，與天下論壇共之。

第二十篇《革命必剖清人種》，此亦為鄒容《革命軍》第四章之全部。此書偏重種族立說，乃其本色促之使然，前已論及，不更贅。

容《革命軍自序》，中有教語。曰：“吾但信盧騷、華盛頓、威曼諸大哲、地下有靈，必哂曰：吾道其東。”夫盧騷、華盛頓兩人，人咸知之，至威曼胡指，六十年来，讀者大抵囿圖過去，未求甚解。最近有外國人從而指點，曰：“此是美國著政府論（The study of Govern-

ment) 之作家威曼也。”至威曼原文如何写法，亦未記明。吾意不然。蓋作者年不滿二十，出蜀不足兩年，不可能廣讀西書，而《革命軍》求喻恆民，更不可能引用恆民不曉之外國人物，何況泰西論政作家，指不勝屈，容雖幼稚失檢，亦難于崇獎過分，遽號大哲。實則華蓋頓是革命家，亦不得謂之大哲。吾意容草此書時，張繼主張無政府主義，太炎以玉卮無當斥之。爾見所著《排滿平議》。容則別揚社會主義以相抗，太炎與吾都認為容知言也。就中英倫之 Robert Owen 最為社會主義先登，行之有效，當時及後世皆稱頌，容心折焉。查斯人吾文通譯作歐文，而文在粵語轉讀為曼。于是歐文二音，如吾說文一聲之轉，有時訛稱威曼。容從俗而為之辭，故立斯名云。參看一九六一年第十號《古籍出版情況簡報》。

上海中華書局重版之《革命軍》，印有鄒容遺影兩幅，第二幅直立象，下署一九〇六年攝于東京。此年份有誤。蓋容在一九〇三年刊布此書，旋入獄，又二年，即一九〇五年，瘐斃。無一九〇六年攝影東京理，借此訂正。

頃閱劉禹生《世載堂雜憶》，記《革命軍》著書緣起如下：

鄒容字幼丹，當吾等入成城學校習陸軍預備時，幼丹每日必來談。予携新會臘腸多斤，課畢圍爐，大談排滿。每人各談一條，幼丹書之，書畢，幼丹則烘臘腸為壽。月余，所書寸余，臘腸亦盡。胡景伊、蔡鐸、蔣百里，皆當時圍爐立談人也。松坡簽其稿面，曰臘腸書。見原書一四九頁。

禹生以小說家姿態，描畫先烈成書次第，故實隨意出入，責其裝點，余殊不取。查當時留學生談革命者，顯分兩派。一派出言無擇，嬉笑怒罵，摹仿柳敬亭一流人之說書，泊有為革命實事求是者，輒遮阻不使闖入，免致債事，禹生殆此派人之眉目也。禹生面麻，

号刘麻子，尊之者或曰麻哥，若取与柳麻子比蹤合迹，彼甚欢喜。参看《杂忆》二九七页，巾箱留珍本柳下说书条。又一派则适得其反。彼等志存顺复，而迹求隐晦，平日谨言词，慎交游，常恐以意外之疏忽，而招来本事之损害，如杨篤生、蔡松坡皆其流亚也。加以松坡习陆军，规久远，以攫取清廷兵权为第一步，不可使满族俊才如良弼等嫉妬陷害，故行动尤其矜慎。以吾揣之，松坡与禹生虽同居东京，号称同学，实不可能联为密友，肆言无忌，如禹生所记。何况松坡梁門子弟也，《新民丛报》上有《军国民篇》一文，署名奋翻生，《新民丛报》第一号以下连载。人知奋翻生即松坡，而松坡辄矢口不认。禹生翻谓松坡签书腊腸，以戏弄邹容，抑何形势相背乃尔？吾忆一九〇四年即光緒三十年春，楊篤生与吾在上海創設爱国协会，此会即华兴会之外围，篤生为会长，吾为副会长。松坡正由日本毕业返国，道出沪濱，应吾輩之要約，参加期会。彼戎服莅盟，佩剑鏘然，其持态严肃，为吾六十年来永矢勿諼之印象。此比勘禹生所忆猎食放言、毫无拘检諸迹，又何乖戾而不相容也？以时考之，容著《革命軍》，松坡应在联队实习，不能居东任意遊衍，如禹生言。且邹容字蔚丹，亦非如沈葆楨字幼丹。

太炎作《革命軍序》，涉及呂留良、曾靜、齐周华三人。此呂一、曾一、齐一，原文本甚明白。因齐周华名不經見，别本齐誤作斋，属上，与曾靜合为一人，而曾靜是否号靜斋，亦无可考。此名姓紛糾，由来已久，請乘便一疏証之。呂留良，浙江石門人，字用晦，号晚村。与张履祥同讲程朱之学，明亡，誓不仕清。郡守用隱逸荐，乃削发为僧，至于沒世。雍正时，以曾靜獄牽連，留良到尸，閩門被禍。曾靜，湖南郴州人。雍正間，遣其徒张熙，詭名投书岳鍾琪，劝以同謀举义，鍾琪拘訊之，并拘靜。靜供見呂留良評选时文，論及

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古制，因有是謀。雍正十下严旨，刊成《大义觉迷录》，頒行天下。緣靜乡曲陋儒，冥頑被惑，与留良同罪异罰，竟邀特赦。齐周华，浙江天台人，字巨山，雍正諸生，好遊覽，足迹遍天下，乾隆中，被呂留良案牽涉，磔于市。周华与齐召南同族，乾隆十四年，召南由礼部侍郎乞归，无何，以族人周华为书訕上，逮詣京师，吏議坐隱匿，当流，特旨夺职放还。又見《革命軍》別本，将齐周华之齐字抹去，此殆緣不知齐周华命名之所由来也。按山东历城有山，曰华不注。春秋时，晉師伐齐，逐齐師，三周华不注是也。齐周华，字巨山，名字与姓相印合，蓋本乎此。呂、曾、齐三人略历如上。

陆敬安《冷庐杂識》云：“齐召南从兄周华，性怪誕，为呂留良訟冤，錮刑部獄數年，乾隆元年，恩赦出，至湖北为道士。子某，迹至武当山，迎之归。年踰六十，乖僻如故。自作詩文，署地輿字，隱以配呂之天盖樓。会熊中丞至台，周华突出献书，有狂悖語，劾奏，置周华极典，召南坐是落职。”陆敬安名以藩，桐乡人，道光进士，官杭州教授。又云南《騰越州志》云：“周东华，不知何許人，本姓崔，传为甲申闖門罹难崔探花之弟。自燕京避至騰越，变姓名为周东华，居宝峯寺，尝辟谷數月。口不談释老之旨，与耕儒理，則娓娓不倦。曾題毘卢寺一联云：殿古含烟冷，樓空得月多。后竟不知所往。”所紀行径，頗似周华。崔与齐一声之轉，易于訛传，探花容影射召南。周华狂遊，既至湖北武当山，亦可到騰越宝峯寺，確否待考。

据《东华录》：曾靜遣张熙至浙江呂留良家，訪求书籍，留良之子毅中，授以乃父遺著，皆憤激激烈之詞。又往訪留良之徒严鴻逵，与鴻逵之徒沈在寬等，往来投契。雍正因重視此案，謂浙江风俗浇漓，人怀不逞，如汪景祺、查嗣庭之流，謗訕悖逆，自伏其罪，皆留良之貽害。又雍正四年，有海宁平湖闖城屠戮之謠，亦留良一人

倡導于前，舉鄉從風而靡。甚至地方官吏，忱其聲勢囂陵，黨徒眾盛，皆須僣禮矜式，以沽重儒之譽。此其陷溺人心，洵亂世俗，為害何可勝言？呂留良之子葆中，應舉成名，拔置鼎甲，而前此一念和尙謀叛，詞連葆中，此因留良以逆亂為其家傳，故世惡相承如此。查留良著述及所寫日記，竟謂八十餘年以來，天昏地暗，日月無光，此無非嫉妬本朝以滿洲之君，入主中國，遂生此訕謗詆譏之說云云。可見雍正將種種罪惡，歸獄于留良一人，誠非無故。

第二十一篇《駁革命駁義》，此吾在《蘇報》所撰論文。吾見三聯書店出版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選有此文，下署“漢種之中一漢種”。吾憶《蘇報》，吾為惟一撰稿人，通常社論不署名，此何以署？或者當時特恐外人見之，而吾包辦，亦偶有故意簽署之作，如本文即其一也。漢種之中一漢種云者，與吾別署“黃中黃”，如出一轍。旋查《蘇報案紀事》，中錄此文，並無署名之迹，不知張枬、王忍之兩君，是否見到《蘇報》原刊？此文主旨，在攻擊立憲黨，一望而知。惟所攻擊者為何人所著之文？及見于何報？吾實无从回溯。選集附注：一九〇三年六月八日九日《中外日報》連載之《革命駁義》，實為反駁對象，此亦《蘇報案紀事》著明之點。又查得《紀事》彙有香港《中國日報》批評如下：

風潮誠急矣，民賊誠怒矣，拿捕嚴矣，吾不知當時與議諸人，至今日而有變節，有恐懼否？第一變節恐懼之速者，則莫如某報。初、上海熱力之發達也，該報何等熱誠，何等踴躍。乃曾幾何時，而嚴拿黨人之說一出，彼即怒焉以忱，栗然以懼，而出其《革命駁義》之謊言。篇中所書，無非如康有為辨革命書之口吻，言不成立，持之無故。其何為而出于此耶？非以為聚會之時，彼與其議，而查拿之日，則彼將不得脫乎？又非以

为所查拿者乃革命党，而有《革命駁义》，即可以洗身乎？闻戊戌时，某曾与康有为因《时务报》事，大受压制。今乃拾其唾余，仿其口吻，而借以为避祸之計也，亦可赧矣。

此明明指汪康年而言，所谓变节恐惧，乃指康年曾参加上海开国会事，此評笔鋒犀利，定出陈少白之手。康年字穰卿，微有时名，浸成报蠹，钻营取巧，无所不为，其人原无足論。楊篤生与之习，一九〇七年吾由沪赴英，篤生約吾同訪康年，适彼外出，曾未一遇，尔时亦忘却与彼著論对駁事。总之事隔六十年，印象茫洋，艰于捉搦，望文长想，憮然久之。窃吾自少治学，未获师承，弱冠出乡，放言革命，文既不中律令，論只追逐时流。中岁学驚旁門，旧殖益形荒落。八十之年，忽焉已过，枉受国家培养，終于一事无成。循覽少作，焉禁汗下？

往者徒聞汪康年与梁启超因《时务报》而大闕，其詳不得而知，陈少白提到此事，不过道逢麴車而已。胡思敬撰《政变月紀》，談此事，頗可徵。

康有为領上海《官报》，时主时务报館者为浙人汪康年，与有为积不相能。聞《官报》既領公帑，私改《时务报》为《昌言报》，梁启超不悅，发康年阴私，著說一千余言。祖康年者，讓启超一旦得志，遂挾天子以令饒塘一布衣。两家文字往来，互相攻訐。康年抗言：受人牛羊，敢忘芻牧？譏者謂：新党之議論盛行，始于《时务报》，新党之人心解体，亦始于《时务报》。而启超专恃笔舌之妙，以义始者以利終，侮人为太甚矣。見三联书店《中国近代史資料选輯》。

此論重点，在以义始、以利終一語。虽然，康年在維新时期，是一孰敲圓滑、重利輕义之典型人物。凭著一身蝙蝠形象，欲禽禽

来，欲兽兽至，务达到不失去奸利自便之地步以为期。斯人之行为，自行证明两点：第一、难于与人合作，第二、一生最怕革命。万一革命形势到来，彼且奔禽场而以四足见疑，奔兽场而以两翼见逐，必至进退失据，投止无门，孤立寡助，况卒以死然后已。由此看来，康年之反对革命，主旨全归于惟利是图之不便。若而外国干涉，若而民智未开，若而帮会不足恃，无非掩人耳目之门面语，处心积虑，雅不在是。凡食古不化，锐意复辟如胡瘦唐之流，遽以先义后利许之，亦徒见君子可欺，有此一方而已。康年托为吴光耀之言曰：“保革两党，若循名核实，誓不并立于人间，固也。而不知凡为之党人者，大抵视所得俸值为如何。今日得保党之俸值不多，明日去而之革党，所得俸值略厚，则由保而变为革矣。逃革归保，逃保归革，数载之内，可以数易位置。”见汪精卫笔记三十六页此真齐东野人之语也。革党贼未必不好利，然谓人以革党俸值高而求入党，斯尽人而知其语妄。康年躬自好利，而以利诱人并经革党如此。

《时务报》以捐款开办，张之洞所捐最多。张以论说太新，频加干涉，视主笔若雇佣。梁启超不能耐，舍而之他，报事遂由汪康年一人主持。光绪二十四年夏，清廷允御史宋伯鲁之请，改《时务报》为《官报》，命康有为督办。康年于是改《时务报》为《昌言报》，延梁鼎芬主笔，另行出版。《时务报》因而发生移交问题，大开笔战。未几政变，《昌言报》亦旋停。当时康年启事如下：“康年由丙申 光緒二十二年 秋，创办《时务报》，延新会梁卓如孝廉主笔。今既奉旨改为《官报》，自非草野所敢擅用刻印。即从七月初一日起，谨遵六月初八日据实昌言之谕，改为《昌言报》，另延番禺梁节菴先生为总董，一切体例，均与从前《时务报》一律。”夫《时务报》奉谕改《官报》，汪康年遽于康有为未到之先，改作私报，将来有为到时，将何所据而改之

乎？康年理由如此牽強，顯是趁火打劫。卒之康梁逃亡，无从涉訟，康年亦因註誤政變，无法支持，新旧兩報，一時俱滅。所謂千算萬算，不如老天爺一算者已。詳見戈公振《中國報學史》。

凡人持論，都未免受時代性之拘束。蓋當時論家好以將來之未知數翻作前提，以折服人。此在邏輯，直犯倒果為因之謬。而論者不顧也。卒之此類論點，往往助長少年人之朝氣，于革命里程有益。如太炎《獄中答新聞報》，公然以五十年後之銅象為搏藩大注，其著例也。吾作《漢奸辨》，亦言：“三年之後，胡虜朝廷，必亡于漢奸之手。”見本編第九篇。而本文論及菲律賓戰事，又昌言：“十年以後，太平洋中，無復美利堅之殖民政略。”雖三年十年之數，計算未甚準確，畢竟清廷亡矣，菲律賓獨立矣，執筆人猶得及身目驗，使史實與預見相符。由此可見：劉秀憑仗讖緯，恢復大漢，近今公羊家頌言三統，懸想太平，凡此都是革命餽糧，可得長養革命體質。吾于思古懷舊之余，所為不禁對鏡一笑者已。

本文提及菲律賓之阿圭拿度，足見阿圭拿度一名，在吾國知識界中，早已家喻戶曉。參閱本編《駁康有為書》後題。

此外，文中研究實學一點，比較突出。夫人不學，不如物，五尺童子，即已皆知，焉有人不學之理？願當時革命黨人，確如此說。太炎都講愛國學社，即謂此輩學生，只須日習體操已足，凡考生洋奴所謂學問，了無用處，反而擾亂社會。吾雖表面附和其說，且不鄙頌言于眾，而實則陰持異議。此為吾向後數年之異勁張本，暫不顯樓。又義和團不可與革命黨同日語，此完全著重扶清二字，于滅洋之正義性並不抹煞。文稱拳民，不稱拳匪，此與一般謾罵義和團者不相同。楊篤生著《新湖南》，極端排滿，文彩斐然，無愧划時代之著作，獨于優視拳民一關，未獲通過。

第二十二篇《論復仇主義》，此當是香港《中國日報》論時事文字。首載英屬域多利電，言去歲廣東黨人舉事，該出首害事之人，得黃金千圓。不數日，即為黨人刺殺，割去兩耳，肢體糜爛，天下最痛快得意之事，無過于此。后幅牽連紀實，有不甚為人所知者，特用錄存，以資考鏡。漢陽事起，富有山堂領袖朱楚香，湘人也，避難至粵。武員楊某，渾號大霸道，賄錢獲之，卒就戮。越日，楊過粵城華寧里，遇四人，手槍而環之，楊遂死，四肢解焉。而粵之領賞捕黨人諸奸惡，皆為寒心，則復仇之功云。

第二十三篇《黃河》，此殆自東京留學生分別發行之雜誌中采綴而來。查黃河流域之省份不一，難于確定此文屬于何省定期刊物，惟其結論有曰：

嗟乎，黃河所貫之諸流域，曰甘肅、陝西、山西、河南、山東，孰非我黃帝子孫所移殖之地乎？甘肅僻在荒遠，無與交通之大勢者無論矣。此四省者，就今日已成之現象觀之，其在礦山，則陝西河南為英意二國所承攬，山西北部為俄公司所采掘，英意亦握有開采之權。其在鐵道，則在黃河以北者，有自正定至太原之綫，俄所經營也。有自館陶至澤州之綫，英意所經營也。其貫黃河而南者，有比承修之芦漢鐵路，英意敷設之礦山鐵路，英德合辦之津鎮鐵路。而山東一省，且全轄于德，載諸不准許與他國之條約內。茫茫北部，不數年間，將舉不便交通之地，悉進于文明，第不知所經營而建設之者，其有一為我黃帝之子孫否也？

光緒末叶，中國形勢險惡，瓜分之圖，懸諸歐洲市朝。全國幾無一寸土、一尺水，不別有所屬。作為一個國家而論，亦飄盡皮存，虛有其表而已。試看此件描畫中原四省之分割綫條，不難了知一

切。誰意五十年后，适得其反，竟將盤踞神州根深蒂固之外來惡魔，一舉而擯諸大門之外，從而廓清本土，從事建設，天下事用力既久，一旦豁然貫通，其機之不可測也如此。語云：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循覽舊疆，憬然有悟，吾黃帝子孫，其毋忘在莒。

第二十四篇《揚子江》，此亦與前文相若，為《湖北學生界》等雜誌所發表之文字。

第二十五篇《舊浙江》，此浙江留學生所刊布之《浙江潮》數典傳檄之文。

第二十六篇《新湖南》。查湖南留學生之月刊雜誌曰《遊學譯編》。至別刊之單行冊子曰《新湖南》者，為楊守仁一手所寫。前者論調稍覺平和，后者刻意排滿，極破口大罵之能事，且有“野蠻政府”及“忘八官場”等語。本文不過摘取其較為蘊藉而專言湖南人之性質及責任者一段。

篇中敘述清兵入關后殘賊湖南之狀曰：“哀我子遺，自兵事休息以后，乃十室而失其九。故我湖南戶產，至今尙多標業，出郭門不十里，墓田葬地，往往有所謂標業者，外府州縣，標業之占版籍，十居八九。蓋兵鋒所至，几于刮地而一赤之矣。”此與《過金陵》之旨趣相合。《過金陵》之言曰：“方城七十里，遼闊無垠。試登鐘鼓樓而望之，依約兩行楊柳，青青而著地者，新開之馬路也。以外茫如渺如，凹者為禿坳，凸者為培塿，大都遊牧不到之墟耳。”自注：“城中隙土，不曰官地，即曰某人標業。”此篇生記清兵入關剗平湖南后之衰清，菊人述太平天國撤出金陵后之荒落，二百年間，遙遙相望，皆舉標業為之職志，而問集矢于滿人之殘暴，《黃帝魂》有取于《新湖南》此一段落，顯非無意。

時排外排滿，孰為輕重先后之爭，甚為激烈。篇生比勘分明，

当机立断，其警語曰：“今日欲拔出于欧洲之坎窞，則不得拔出于胡族之坎窞，”一語破的，障翳立清。

篤生夙沉浸于詞章旧学，精神亦向与維新諸子逶迤，驟尔冲出藩籬，放言极論，因而书生本色犹在，旧染汚俗，亦难摧陷廓清。观于称許“胡左二公，固非无度外思想”，及詰責那拉氏“縱拳匪以要大祸”，按拳匪二字，**《黄帝魂》**改作民字，即見楊黃二人之思想不同似犹有蓬之心在，此論世者不可不知。

第二十七篇**《福建之現勢》**，此福建之留学生为之，其杂志何名，吾适忘却。

《黄帝魂》选稿，范围取其广，議論取其刻，而本旨不离乎排滿者为合格。因于东京留学界中选四省杂志之代表作如上。

第二十八篇**《过金陵》**，此黃藻自执笔为之，以凭弔太平天国之英魂故垒，而认为惊心动魄之作者也。“江山半壁，本历劫之紅羊；金粉六朝，尽呕心之碧血。”瞻怀故人，如聞其声。

譚嗣同之**《仁学》**，可引用之部分多有，而藻曩者独取**《君祸》**一段，見前第三篇。意者如下教語，乃其长言詠叹而不能自己者乎？

奈何湘軍乃戮民为义耶？虽洪楊所至，頗纵杀，然于既据之城邑，亦未尝尽戮之也。乃一經湘軍之所克复，借搜緝捕匪为名，无良莠皆膏之于鋒刃。乘势淫擄焚掠，无所不至，捲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入于湘軍，或至逾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元气，若金陵其尤凋慘者也。

《黄帝魂》一书之内，嗣同刻責湘軍，与藻自吟自唱之**《过金陵》**，如常山之蛇，首尾相应，大书深刻，昭示天下。此較之王闓运**《湘軍志》**，窮斂曾九好利，招来怨毒，人虽逃罪，而书乃燬板者为如何？今昔异情，可胜浩叹！

第二十九篇《燕京遊記》，亦黃藻自為之文，意義如前《過金陵》。文中嗟嘆燕趙今無壯士。當其時大刀王五以俠聞，戊戌政變，康有為曾提議，要約王五上寶月樓，入瀛台搶救光緒帝，而未果。獨五行事無人知之。汪穉卿筆記一則云：

大刀王五，近之俠者。有故人子，王盡心教養之，長為捐一官，分發某省。顧子無人理，到省後，絕不與王一信，費用乏絕，則連書告貸。王之友曰：君可已矣。王曰：君言大誤。凡待彼周至，此我事也，我惟知盡我之心而已。知恩與否，為彼之事，我何必問？噫！此等語聖賢何以加茲！

作者弔田光荐荆卿圖秦王不成，歸之天命。不知對南海之荐剗，穉卿之讚嘆，所感想何如？

第三十篇《駁康有為書》，此太炎一時絕作，風行天下，無用為之介紹。獨以書中使用“載湉小醜”字樣，英工部局認為有犯尊君大義，捕致書者系獄。殊不知王之名，在歐洲以百姓仿效為美，與大清律適相背。英麻向視本國無上，顧此獄特依清廷之旨衡之，太炎所謂“清政府與布衣訟，兩造爭漢虜曲直于上海知縣前”見《贈大將軍鄒君嘉來》者也。訟程之不中律令如此，識者寃之。夫君之書本高文雄辯，康有為不能答，加以三年苦作，市天下之同情，書之聲價因益高。菊人錄此篇時，曾為吾誦李商隱句“願書萬本誦萬遍，口角流沫右手胝”，以為笑樂，回念前生，曷勝腹痛！

嘗論太炎駁康一書，為其排滿思想最後確定標記，良非偶然。距此以前，太炎對中國前途之看法，往往搖擺不定。戊戌春，與南海梁鼎芬、吳王仁俊、侯官陳衍、秀水朱克柔輩，在武昌相見，為膠州灣之割棄，曾擬同發起一《正學報》，而自為主干。事雖未就，太炎及官僚間虛與委蛇之迹甚明。吾收有太炎自草《正學報緣起》。庚子以後，

太炎遭難江戶，復與梁啟超文字相輻輳。壬寅年之《新民叢報》所登太炎文字，屢見不一見。此太炎自作《客帝匡謬》，嘗自懺甚猛，並將原稿刊削。即啟超所作廣詩中八賢，太炎亦居一席。康有為《辨革命書》，聲稱“談革命者開口必攻滿洲，此為大怪不可解之事。”啟超認作《師友論學牋》，與太炎所作《社會學序》及《文學說例》，駢列一報，同事張大，而斯報又恰在銷行最廣登峯造極之時。不寧惟是，太炎與同時其他文人連綿接軫，態度茫洋之處，尤未易一二數。蓋太炎與宋平子翹友善，兩人在杭州共營一定期刊，曰《經世報》。又與王仁俊至稔，除彙述《正學報》外，兩人在上海復共營一定期刊，曰《實學報》。太炎時年三十，光氣正濃，文彩照耀，惹人搏擗。至上海強學會之設，明明以南海為主盟，而太炎呈身款接，公言不諱，朱希祖筆錄，見一九三六年《桐君》更不待論。諸凡此種猶豫痕迹，與夫康梁表裏唱和，敢為大言，將未必無人錯認形勢，從而變易方向。由是太炎一面自身廓清思想本原，一面向外巩固鼓吹壁壘，非得有此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鴻篇鉅制如本篇者，以截斷眾流，趨于一轡，万万不可。太炎表示宗旨文字，當時估價之大，關係之切如此。

端方致魏光燾電有云：“此書指《革命軍》逆亂，自古所無，直書唐諱，聳動天下之造反。”方又致張之洞電云：“章炳麟直書列聖唐諱，悖逆為臣子所不忍聞。”吳稚暉《蘇報案紀事》云：“當時南京控告之詞，因章炳麟文中‘載濛小醜’一語，罵倒皇帝，所以照例要拘，并非着重革命，英國人算是看重革命黨，我等皆不知。”凡此因唐諱問題而起之余波，至堪發噱。

書中引有舊著《正仇滿論》一段，而《正仇滿論》、《黃帝魂》亦并采錄，所關論點諒是太炎當時認言而不願放失。茲就駁康書所載，

与浙江本全同者，引述如次：

人虽不尽以逐满为职志，或有其志而不敢言于时人，然其轻视鞵靴，以为异种贱族者，此其种性，根于二百年之遗传，是固至今未去者也。往者陈名夏、錢謙益輩，以北面降虏，貴至閣部，而未尝建白一言，有所补助，如魏徵之于太宗，范质之于艺論作宋祖者，彼固曰异种贱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为立于其朝者，特曰冠貂蟬、裘青紫而已。其存听之，其亡听之，若曰为馳驅效用，而有所补助于一姓之永存者，非吾之志也。理学諸儒，如熊賜履、魏象枢、陆隴其、朱軾輩，时有献替，而其所因革，未有关于至計者。虽曾胡左李之所为，亦曰建殊勋、博高爵耳，功成而后，于其政治之盛衰，宗論作社稷之安危，未尝有所筹画焉，是并此处論有梁子所謂四字拥护一姓者，而亦非其志也。其他朝士，入則弹劾权貴，出則搏击豪強，为难能可贵矣。次即束身自好，优游卒岁，以自处于朝隱。而下至貪墨无艺，怯懦忘恥者，所在皆是。三者虽殊科，要其大者不知會計之盈絀，小者不知斷獄之多寡，苟得廉祿以全吾室家妻子，是其普通之术矣。无他，本陈名夏、錢謙益之心以为心者，論无者字固二百年而不變也。明之末世，五遭傾复，論作革命一命之士，文學之儒，无不建义旗以抗仇敌者。下至販夫乞子，儿董走卒，执論作兀志不屈，而仰薪割刃以死者，不胜計論作条也。今者北京之破，民則愿为外国之順民，官則愿为外国之总办，食其俸祿，資其保护，尽順天論多一字城中，无不牵羊論作牛把矛，甘为二臣者，若其不事异姓，躬自引决，縉紳之士，殆无一人焉。无他，亦曰异种贱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为立于其朝者，特曰冠貂蟬、裘青紫而已。其为滿洲之主則听

之，其为欧美之主則听之，本陈名夏、錢謙益之心以为心者，亦二百年而不變也。然則滿洲勿逐，而欲士之爭自濯磨，民之敵儼效死，以期至乎獨立不羈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浸微浸衰，亦終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非种不去，良种不滋，敗羣不除，善羣不殖。自非躬執大桴，以扫除其故家汚俗，而望禹域之自完也，豈可得乎？

聞之船山：“情之动也无端，偶見为然而然之，偶見为不然而不然之，因而智計生焉，因而事之机，物之变，古人之言，皆可以为其附会之資，而說益长，情益流。”見《讀通鑑論》卷十五。竊叹太炎之論錢謙益、陈名夏之不肯建言，似介乎然与不然之間，作者只假借为附会之資，以益其机变而已。何以言之？吾見太炎曾录梁章鉅《归田瑣記》一通，其劈头一段云：

国初于前明臣工之归款者，率仍还以显职，保其初終。如錢謙益之有才无行，为朝廷所深恶痛絕之人，至今天下銷燬其所著《初学集》、《有学集》，而明諭中犹称止欲斥禁其书，并非查究其事。同时之大学士陈名夏，輾轉矫詐，屢次从寬免死，乃犹与同僚宁完我言：若要天下太平，除非依我两事。宁問何事，名夏推帽摩其首曰：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宁以其語上聞。而其时但治名夏以抹別諭旨、作奸犯科諸款，于前两語亦置之不問。蓋定鼎之初，人心未能齐一，故朝廷每以寬大处之。

由梁記可得論定两点。一，錢、陈为清廷所輕賤，得不到建言信任，并非若輩鄙清廷为异种，而故守緘默。观于陈名夏在如此逆势之下，犹放言留发复冠，可致天下太平，可見其忠于滿族，指出将来革命之癥結所在。吾少时喜看京剧，古衣古貌，入眼成悅，洎到上

海，一見小連生之鉄公鷄，以滿洲翎頂上場，立時髮指而無能自制。此真革命思想，二百年來，潛藏于累代國民之腦海中，無人自覺者也。名夏當年進言及此，可謂為一姓效忠，獨見其大，何謂其輕視“錢祖”，不敢認言乎？又錢、陳勝國余孽，勉充貳臣，太炎挾與魏徵、范質比烈，亦屬儼不于倫。二、前明專征大將如洪承疇輩，為清朝力征經營，將江山捧獻清室不計外，其他與錢陳同為文臣，行輩相埒，如龔鼎孳之流，當邦成功堅不臥降之時，獨建議顯戮其父芝龍以示儆，此其叛明媚清，迥出情理之外，尤指不勝屈。孰謂漢人不肯爭附滿人，以圖自保者？古語云：漢人學得胡兒語，爭向城頭罵漢人，此自元朝入關，中經朱明而達清朝，此種情形，比比皆是。太炎胡執言其反，以自怡悅為！至謂曾胡左李，徒建殊勳，博高爵，不願擁護一姓宗稷安危，有所籌畫，此其謬為區區，不中事實，為漢人塗抹脂粉尤顯。要之鼓吹革命之言，多使史迹強附宗旨，偶見為然則然之，見為不然則不然之，如船山所言，事務所趨，所在多有。夫太炎且往往所言“前後不相蒙，還以自攻而不恤”，此亦船山語他人更何足論？今于六十年後追討舊事，固不妨坦率自承如上。語云：“言非一端，夫各有所當也。”凡《黃帝魂》所持各節，在當時仍自有當，亦吾人必須了解之一義。

復次，太炎駁康書中，于康熙以下之各文字獄，務以摧折漢人，使之噤不發語者，僅臚舉其名，而未及申叙其實。就中胡中藻一獄，最為太炎所深切注意，請得本其手錄之乾隆二十年“上諭”按此亦從《歸田瑣記》錄出實之。

胡中藻所刻詩，題曰《堅磨生詩鈔》。堅磨出自魯論，孔子所稱磨涅，乃指佛肸而言，胡中藻以此自号，是誠何心？從前查嗣庭、汪景祺、呂留良等詩文日記，謗訕譁張，大逆不道，蒙皇考

申明大義，嚴加懲創，以正倫紀而維世道。數十年來，意謂中外臣民，咸知警惕，而不意尙有此等鴟張猖吠之胡中藻。即檢閱查嗣庭等舊案，其悖逆之詞，亦未有累族連篇，至于如此之甚者。如其集內所云：一世无日月。又曰：又降一世夏秋冬。三代而下，享國之久，无如漢唐宋明、皆一再傳而多故。本朝定鼎以來，承平熙皞，蓋遠過之，乃曰又降一世，是尙有人心者乎？又曰：一把心腸論濁清，加濁字于國号之上，是何肺腑？至謁羅池廟詩，則曰：天非開清泰。又曰：斯文欲被蠻。滿洲俗稱漢人曰蠻子，漢人亦俗稱滿人曰達子，此不過指鄉籍而言，即孟子所謂東夷西夷是也。如以稱蠻為斯文之辱，則漢人之稱滿人曰達子者，亦將有罪乎？又曰：相見請看都盡背，誰知生色屬裘人，此非謂旂裘之人而何？又曰：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間，不能一黍隔。又曰：再泛瀟湘朝北海，細看來歷是如何？又曰：北風雖然好，難用可如何？又曰：撥雲揭北斗，怒穿生南風。又曰：暫歇南風競。兩兩以南北分提，重言反復，意何所指？其滄溪照景石詩中，用周時穆天子車駕走不停，及武王為失傾城色兩典故，此與照景石有何關涉，特欲借題以寓譏刺訕謗耳。至若老佛如今无痲病，朝門開說不開之句，尤為奇誕。朕每日听政，召見臣工，何乃有朝門不開之語？又曰：人間豈是无中氣，此是何等語乎？他如自桂調回京師則曰：得免吾冠是出頭。伊由翰林游擢京堂，督學陝西，復調廣西，屢司文柄，其調取回京，并非迂譎，乃以挂冠為出頭，有是理乎？伊在鄂爾泰門下，依草附木，而詩中乃有記出西林第一門之句，攀援門戶，恬不知恥。至其所出試題內，考經義，有乾三爻不象龍說。乾卦六爻，皆取象于龍，故象傳首時乘六

龙以御天，如伊所言，岂三爻不在六龙之内耶？乾为当今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詆毁之意可见。又如鸟兽不可与同羣，狗彘食人食，牝鸡无晨等语，若谓出题必避熟，经书不乏闲冷题目，乃必检此等语句，意何所指？……

窃观清论咬文嚼字，极周内之能事，而其牵强可笑之处，弥复不少。如谓汉人称满人鞑子不为罪，如何汉人自称蛮子反有罪？夫曰斯文欲被蛮，不过如柳州刺永，自称居蛮夷中，而州人受其教化相等，此罪于何有？如此而有罪，则指满人鞑子，不将罪通于天乎？此等逻辑，不知如何通法。实则“论”中所引中藻诸诗，了无佳句，料中藻不过俸得甲科，妄弄文墨，枉遭罗织，作孽由己，良不足惜。太炎珍重录此，亦视为满人挫辱汉人之适例，持与戊戌之变，长索去死，间不容发，遂相比况云尔。

《驳康有为书》，是驳保皇党之本师；《正仇满论》，是驳其弟子梁启超。两文公布，凡保皇党之理论根据，扫地无余。

太炎草《正仇满论》之同年，即壬寅年 湖南杨度东渡日本，以教育问题，求解答于高等师范校长嘉纳治五郎。嘉纳曰：“英人有言，满州支那两人种，显分优劣。一富有居高临下之气概，一尚文守雌，善于服从。故满州人宜握一国之政权，而支那人必应为之臣仆。性分所启，事势已成，数百年之定局，今日别无更张之道。”杨度愤然作答曰：“先生知英人此言之意乎？支那人今日服从满州人，明日即可服从英国人；今日以爱满州者爱日本，嘉纳所教如是 明日即可以爱日本者爱英伦。盖臣仆之性，自天而生，将无人不可以为之主，亦无人不可以奴隶之，正不必有所择也，先生以为天地间有如此贱种乎？”嘉纳语塞。此一问答，梁启超表露于是年第二十四号《新民丛报》上。可见立宪党人之持论，与革命党人仍有其不

可畔越之共同点。此适为太炎之《正仇滿論》設定基础，其味深长，最宜潜玩。

吾疏駁康书时，无意中获一插曲，殊堪发噱。书中有曰：

虽华圣頓、拿破仑之微时，天下亦岂知有华圣頓、拿破仑者？而长素徒以阿圭拿度一蹶不振相較。……中国亦望有尧舜之主，出而革命，使本种不亡已耳，何必望其极点如华圣頓、拿破仑者乎？

此其为說，乃针对有为《辨革命书》为之，并非无的放矢。书见壬寅八月《新民丛报》。有为曰：

方当同舟共济之日，若为内訌，则兄弟鬩墙，外御其侮，恐为阿圭拿度原作阿坤鴉度之能脱于西班牙，而适利美国之漁人，至时则永为奴隶，永无自立，求如今者不可得也。

两方論点，均集中于阿圭拿度一人。查阿为菲律宾与美国联盟共同抵抗西班牙之領袖人物。一八九八年，美国宣布并吞菲律宾，并从西班牙买收羣島，阿美同盟，于焉破裂，且美从而攻击阿，迫之投降。一千九百〇一年三月二十八日，阿被捕，四月二十一日，誓矢忠于美。此一幕菲律宾之失败史，当太炎与有为駁辯时，正是世界新聞材料，无人不晓，中国报刊自亦大登特登。章、康引用此一外国偶象，只迁就眼前故实，彼此耳熟能詳尔。又同时文人評量天下豪杰，俯拾即是，如本編甄录秦力山之《中国灭亡論》，即取阿圭拿度護虜孙、康，吾撰《駁革命駁义》，亦用斯名为例。此与作者学問无关，絕不是何人莽史独得之秘。今事隔六十年矣，史迹如烟，望而不見，繙譯名义，驟遇难通，事所恆有，毫不为怪。此知之說不上精深，不知亦不可能是浅薄，吾为研究章书作为哲学資料諸君进一解如此。参看一九六一年第十号《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簡报》。特吾就太炎此文本

質，微有異見。蓋清末文士，好持抹煞之論，刻責本國，無端壓之，崇拜外人。諺所謂中國月亮小，外國月亮大，習俗移人，賢如太炎，亦所難免。試思壓抑堯舜，而仰望華拿如在天上，號之曰“極點”，此既非老一輩人所能通解，亦非今日之思想水平所能默喻。今且不論，論李鴻章。鴻章適美，美人邀登開國大總統之陵墓，用意甚盛，而鴻章遽書于壁曰：“華聖頓，特中國陳涉、吳廣之流亞耳。”此一豪情勝概，太炎視之為何如？由是僅持此一段文字而定章康優劣，殊難執著。

駁康書除單行小冊子外，《蘇報》為之鄭重介紹，並以康有為標題，顯言于眾曰：

新水非故水，前瀾續后瀾，戊戌之保皇，不能行于庚子之勤王，庚子之勤王，不能行于今后之革命。中國宣告革命，殆為全國公認，如鐵案不可移。今日之新社會，已少有為立錐之地。必欲悍然不顧，一旦滿政府誑而屠之，則有為搖尾乞憐于宰夫之前，殊不值通人一笑。時有起用康黨風說。不僅此也，有為堅持與革命為難，則當今蚩蚩之輩，何所增減于一有為，誠恐天下壯士，不惜援引先生之春秋大義，割刃先生之腹而甘心焉，斯亦無可奈何之事。

刻骨露言，毫無諱飾，《蘇報》當時宗旨，第一排滿，第二排康，以此助長民憤，為力不小。

太炎好談呂留良、曾靜。夫呂、曾之獄，起于清雍正朝，雍正自著《大義覺迷錄》，長篇大論，以帝王而執行作家任務。篇中所著，與康有為如出一轍，試略征之：

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于聖德乎？詩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慝者，以

其僭王猾夏，不知君臣大義，故聲其罪而懲艾之，非以其為戎狄而外之也。若以戎狄而言，則孔子周游，不當至楚應昭王之聘，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刪定之時，不應以其誓列于《周書》之後矣。蓋從來華夷之說，乃在晉宋六朝偏安之年，彼此地隴德齊，莫能相尚，是北人既南為島夷，南人指北為索虜。今天下一統，華夷一家，豈得妄判中外，謬生忿戾？

自古中國一統之世，幅員不能廣遠，其中有不向化者，則斥之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蠻獠，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為夷狄可乎？至于漢唐宋全盛之時，北狄西戎，世為邊患，從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并蒙古極邊諸部落，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开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中外華夷之紛論哉？

上列論點，有為學舌為之，惟妙惟肖。突則雍正號稱覺迷，等于面諾，其詞雖辯，其情可哀。如云華夷一家，又云南人指北人為索虜，語浪未終，即自承為“夷”與“索虜”而不自覺。漢人讀之，徒激增其憤慨，不可能寄予同情。願雍正必欲天下人咸與聞知，飭將該錄貯于各府州縣之學宮，如經查出後學新進未見此書，定將該省學政從嚴治罪。雖然，二百年來，學官視為具文，浸微浸削，以至無人顧問。吾少時出入黌門，即不聞學宮以藏有《覺迷錄》見稱。獨雍乾間文字獄殘酷，士人惟緘口結舌是務，無有為呂曾之續，昌言排滿者耳。洎光緒末造，有為謬拾雍正唾余，辨論革命，太炎迎頭痛擊，恰中要害，不獨掃除一時浮議，而且解決二百年未決懸題。太炎之功，不在禹下。時論謂太炎平生，往往一言定天下安危，惟馭康亦然。

第三十一篇《復張之洞書》，此諒是沈虬齋之筆。庚子之後，國

論渾殺，張之洞慨然以衛道救國自任，邀集徒黨如黃紹箕、梁鼎芬輩，遠仿《校邠廬抗議》，近配自撰之《輜軒語》，分別忠君愛國行己志學諸項目，名之曰《勸學篇》，欲抗顏而為人師，戊戌六月，紹箕進呈此書，奉諭飭下各省，廣為刊行。仍復縮為短章，單刊遍布，頗聳動海內外之耳目。當日聞有意復書痛駁之者，首推章太炎，其次余外舅吳北山，又次沈虬齋。北山不長於文詞，又以之洞與其父交好，不便露骨顯責，因迂延未曾動筆。太炎曾赴之洞之招，一言不合，拂袖而逸，致之洞旋以名捕洩憤。太炎與虬齋，都先後受北山之遮護，隱其寓齋，互為橫議。三人者，大抵同以之洞為的，欲有所發抒。吾嘗詳繹此書，覺其迴護公羊，為康梁張目，恰與太炎主張相反，太炎弟子中有與吾談及此書者，亦謂其行文絕不似乃師筆調。以勢推之，文出虬齋手筆無疑。時虬齋正擬避難南洋羣島，行囊蕭瑟，名妓金小宝厚其贖儀，致為士林稱頌，書中因有海島飄蓬之語。

偶閱劉禹生《世載堂雜憶》有如下記載：

元丞、力山同返日本，按此指庚子漢口之役失敗後，創《國民報》，密與中山先生議，發布推倒滿清大革命之宣言，是為第一次堂堂正正革命之文字。《國民報》勢力遂能支配長江內地，清廷無法禁售。戢元丞、秦力山、沈翔雲、雷春、楊廷棟等，皆有撰著。報中文有“妖姬侍宴，眾仙同日詠霓裳；稚子候門，同是天涯淪落客”一聯，為張之洞所圈點。又與沈翔雲為留學生告張之洞書，責其殘殺士類，勸其改革政治，致使張之洞召集名流，駁復此書，張皇數月。

據此，可以証實《復張之洞書》為沈翔雲筆，而披露於《國民報》以致之張。妖姬一聯，見秦力山所草《中國死亡論》，乃罵康有為囊括華僑血汗之資，遨遊歐洲之間，荒淫取樂，並不以祖國危亡為念。之

洞酷恨康梁，无可如何，忽看到“贼杀贼”，不免破颜一笑，非必赏其文辞之美也。元丞者，房县戢翼章字，元丞诚妙解日语，而文墨却不通，报上有撰著文字，大抵倩人捉刀为之。禹生称其与沈翔云共草告之洞书，此左祖同乡，羌无故实，未免可笑。

禹生文中，一语最堪注意，即《国民报》撰述人内有雷奋、杨廷栋是也。夫《国民报》为堂堂正正之革命机关刊物，孙先生亦言之，见《辛亥革命》第一册第十页而雷、杨皆著名宪政党人，胡乃与秦、沈诸子戮力共命乎？吾曩言之，东京留学初期、有励志会之设，会员包容甚广，表现革命大团结之气象。非微雷、杨，即曹汝霖、金邦平等，亦无例外。此会卒至迸裂，伊谁负责，殊未易言。时余未抵东京，而禹生却在。

第三十二篇《狱中答新闻报》，此太炎之笔，一望而知。尝论太炎一生功绩，当以革命与国学，各占半部。康心如宝恕，为心乎之弟来言：师门中曾有人持是说，争论颇烈。太炎则谓：吾直以医学为第一，革命算不上学问。坐是革命时期文字，太炎定稿，往往自行刊削。吾查浙江右文所刊两集，都不见此文，于是太炎軼稿之有关史迹、血泪淋漓者，犹未易一二数，此后学不可不知。

太炎之狱，隐受英人庇护，不令陷入内地，因为保皇派人指责，谓革命党漠视民死。太炎张大其词，谓：“今日狱事，起于满洲政府，以满洲政府与汉种四万万入构此大讼。……满汉争讼，则裁判权自非满洲官吏所能有，以英美诸国中立而判此狱，于法则宜。宁能听其拦出租界，使裁判之权悉归于诉讼人之手？”虽能自圆其说，但駁之烧炭、山嶽诸党故事，终有一二分忸怩之处。又此文结尾云：“请看五十年后，铜象巍巍，立于云表者，为我为汝？”亦未免过于夸张，此殆其不欲保存此文之微意也乎？

太炎此文送出監門時，是閏五月十一日，《蘇報》猶作垂死掙扎，未被封禁。吾親將該文揭之首欄，與《新聞報》對壘，恍惚為革命黨消炎解毒，彌形得意。五十九年前舊事，歷歷如在目前。蘇報案清方檔案，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三日，端方致張之洞電：“接金守指湖北知府金鼎彝十七日電云：章逆《獄中答新聞報書》，有十六七歲時，已懷排滿革命之念。邇逆在日本，早倡言革命。章逆井有不變法當革，變法亦當革，不救民當革，救民亦當革等語。”可見《蘇報》于閏五月十三日被封以前，此文先一日在報上顯露光氣，滿人裂眦流血、驚相告語情景。

第三十三篇《閱湖南官報》，此秦力山之筆，亦一望而知。其劈頭云：“著者以己亥之秋，東走日本，尋游大洋洲羣島，還復至日本，居一年有半，始倦游歸，此身殆自忘其為湘人也。”始倦游歸者，謂歸至上海也。此力山自行寫照，甚顯明。

文中“湖南自近五十年来，常以英雄之資，而為奴隸之役，昔以奴隸而博公侯，今以奴隸而異身首”等語，活現力山拔劍斫地、抑塞磊落氣概。所謂以奴隸而異身首，殆不滿于漢口唐、林之役之不澈底，而又引以自悲。

癸卯年之《蘇報》，自當年被封後，凡吾自撰，及代朋友揭發之諸種文字，譬如行云過雁，去而不返。此種革命黨之流產殘骸，公私圖書館之所毀棄，吾即憶李少君與鴻都道士之雙料伎術，亦無法進攝遺影，重與流連。幸也，黃九《黃帝魂》一書，保存一二，使吾于章太炎佚稿，及秦力山之單文中，猶得窺見當時鬥爭形象，不可謂非平生一大快事。吾初識力山，在戊戌長沙學院之考坪中。力山籍隸善化，是歲該縣入學第一名為劉肅和，即後來在北京以新聞記者得名之劉少少；第二名為秦鼎彝，即力山之原名。此文謂己亥之

秋，东走日本，可见力山戊戌入学后，不久即去长沙，吾与在上海重复相见，则为六年后之癸卯。尔时“瞻望乡关，白云一片”，六十年来，不禁唱作黄鹤一去，千载悠悠，曷胜感慨系之！

力山生性伉爽，言词嫵媚，为吾少年交游声应气求之第一流人物。吾是年出狱，力山亲来慰劳，语次，忽低声向余：“子为新闻记者，复担任革命党之后方重任，奈何将假洋角子漫藏家中，以致捕者将去，作为刑事罪证？”余闻言震詫，不知所答。查假洋角子，乃吾与黄克强同访泰兴时，龙大先生硯仙谓：办盗案所收脏物，似革命时期不妨利用。吾与克强以意听之，未尝实事求是，因而假洋角子不期由泰兴运来洋涇滨。革命初期之全班人马，一例缺乏经验，不肯虚心核实如此，以致山雨忽来，一败涂地，可为浩叹。夫政治犯之不应受刑事罪责，经力山一语道破，吾从来视作革命党之座右铭，未敢或忘。今记此事，犹觉力山立在面前。

甲辰秋，吾亡命日本，力山亦留沪不久，驰赴安南。以后即踪迹不明，闻其死，死状亦不悉。吾偶阅吕志伊《同盟会瑣录》，有如下数语：“楊秋帆、居党生得閩人庄銀安、陈仲赫之力，在仰光开办《光华日报》，党人在西徼革命之基始立。仲赫、秦力山弟子，力山与王养石死于干崖，最苦。”见科学出版社发行之《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三十六页。王养石何人？干崖何地？均不了了，陈仲赫行谊亦未明，伤哉伤哉！太炎许为力山立传，一时未就，諒亦行状难得之故。李根源似云：力山为土司一刁姓所害，計其时当在一九〇七年，适吾经紅海赴英之岁。

上文付剗剗后，忽于李根源所编《永昌府文徵》发见太炎所草《秦力山传》，亟补录于此，志余疏忽之过。传云：

秦力山初名鼎彝，字力山，故江苏吳人。父文丙，客食湖

南，遂寄籍为长沙人。力山少慧，为文数千言立就。尝师浏阳谭嗣同，入南学会。未弱冠，补县学生，督学徐仁铸奇其才，遣游学日本。八国联军陷京师之岁，唐才常謀起兵汉上，力山与同学林圭、蔡鍾浩、毕永年归，赴之。被推安徽后軍統領，将緝私、水师、巡防諸营，据大通盐局，与蕪湖防軍相持七昼夜。兵敗，走免，督部营务处陶森甲独保持之，得返日本，而才常与圭等皆死武昌。力山日歌血教升，虽病，志未尝挫。才常者，本与梁启超合謀，启超时在日橫濱，軍兴饋餉，皆关其手。力山亡命貧困，求假貸不与，力山亦以才常起兵，用勤王号，名义不順，欲力振刷之，遂与启超絕。自作《少年日报》，道汉族自主主义。时香山孙公方客橫濱，中外多識其名者。而游学生疑孙公驍桀难近，不与通，力山独先往謁之，余亦至。孙公十日率一至东京，陈义新新。相与語，欢甚，知其非才常輩人也。諸生聞孙公无他曠状，亦渐与亲，种族大义，始震播橫舍間。余与力山起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紀念会，和者虽不广，亦不怪也。滄州张溥，时年二十，游学，与力山同舍。力山独伟視溥，为余言状，余因得与溥交，溥即今张繼云。自是力山或在日本，或微行入皖南，謀再举教年。孙公以黃兴等集中国同盟会于东京，以力山主安徽事。力山至安庆，与巡撫卫队营管带孙道毅結謀，自安庆下蕪江宁，据形便为根本，事洩，亡奔香港。复以言擢主者怒，西去，与胡汉民之仰光。而騰越张成清，自密只那来会，为序其《緬甸亡国史》。力山既遭名捕，不得返中国，业避地仰光，乃客于崖士司刁安仁所。时往来野人山，短衣負銃，为其民道汉族光复事，冀藉边裔为窟宅，因以倡义。安仁故夷种，亦本高中国自立，力山教誨之。然終知其不为己

用，时作乐府道悲愤，往往若自嘲者。久之，果为安仁所害。及武昌倡义，云南应之，而力山不逮见矣。安仁集诸土司揭旗，称兴夷灭汉，师长李根源自腾越遣使蒞间。安仁窘，诣南都自归。云南发其叛逆及杀力山状，乃錮之陆军狱，数月，传至京师，病死。根源已定干崖，求力山尸不得，为之立祠，腾越与云南死难者并祀焉。无子，以弟钧彝之子修竹为嗣。赞曰：孙公之在东国，羽翮未具，力山独先与游，自尔羣士辐凑，岁逾百人，同盟会之立，斯实为维首焉。及谋举江宁不成，窜迹蛮左，不忘奋飞，豈谓藉是可以定大业哉？亦致命遂志而已。抱奇无施，卒遭阴贼，悲夫！

传中有小节若干处，兹与匡正。一、力山籍善化，非长沙。二、力山似不可能师谭嗣同，嗣同宦游在外，来长沙仅短期。三、力山戊戌入善化县学，年已逾冠。四、游日本非遣送，湖南彼时尚无遣派之学生。五、林圭、蔡锺浩，皆时务学堂学生，力山则非，因不得云同学。毕永年行暨在先，尤非同学。六、自作《少年日报》无其事，从来留学生未尝在日本发行日报。七、力山自亡国纪念会后，即未重返日本，“自是力山或在日本”，语混。八、壬寅、癸卯、甲辰三年，力山长留上海，吾与力山交好，即此时期，传不提此，似阙文。九、自安徽与孙道毅结谋以下，皆吾与力山别后事，吾无从置可否。力山所作《緬甸亡国史序》，于《永昌府文徵》见之，其文拖曳无气力，与力山畴昔追摹龔定菴之作不类。意其頻年奔窜，况瘁不堪，力衰气短，宜有此象。该史作者为张成清，字石泉，腾越人，不久即为仰光总督所捕杀，諒其史竟未成书。死年三十，太炎为立传。兹录力山序中一段如下：

吾讀明史，其于甲申以后之事不詳焉，而其結局之一卷，則

固不得不借緬甸史以存其实录。石泉之志，殆欲以补明史之不詳，而以证明史之不实。然则此书一出，其或可以增吾人亡国之悲感乎！抑緬甸隣于印度，印度者佛教之母国也。緬甸受印度文明之征服，其感染于佛教也最深。盖自緬甸之地理言之，金沙江出印度西行，沿岸而达孟加拉，其与印通也，必早于中国。中国则万山阻之。然以印度自古偏向于宗教与哲理，其政治思想与武力，皆至微弱，故緬甸恆以中国为主国。印緬之亡，皆至易易，讀其史者，足知神权之迷信，有可以灭族者焉。

力山草此文时，其设想犹与东京起亡国纪念会时相类。庸距知五十年后，印度緬甸，皆次第复国？天演剧变，惜力山不可得見，停笔慨然。

力山此文，末署千九百五年七月三十日，此即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也，吾两人在上海握别后一年。力山死于干崖，李根源等为立墓碑，署竣于丙午年阳月，此乃千九百六年，去草亡国史序时，亦刚一年。吾赴英伦在丁未，去力山死又一年，曩謂同一岁者誤。

第三十四篇《苏报案》，分段說事，互数千言，当时吾編《苏报案紀事》，并无此文。应是《苏报》被封后，吾繼續发行《国民日日报》，追述苏报案之經過，編者从日日报上採掇而来。

文中有苏报案之波瀾一段，讀之有趣。因摘取數語如次：自本案发生，清廷逆料难得如愿，迁怒不已，无端产生沈葦之獄。葦墮庆寬之手，以陷非刑，而为《苏报》諸子之替死鬼。此非葦与章邹有幸有不幸，亦非庆寬手段，优于张之洞魏光燾，盖所处之地不同也。前有烏目曾国章等之释放，按国章为青帮头目，苏撫恩寿曾飭福山镇丁华容，鎮江都司徐宝山追緝，未获。后有南汇黃炎培等之保释，或輕罪而重决，或无故而被誣，种种余威，皆以苏报案为中心点，是章、邹为各案之

孕母，而各案不啻章、邹之产儿云。又吾閱清方苏报档案，每每涉及租界内办案棘手之往事，慨叹无已。如魏光燾电称：“昔年拏办黄遵宪，可为殷鉴”。以戊戌冬，上海道蔡钧开缺，乃緣有御史劾其纵放遵宪也。知府金鼎电称：“恐工部局迫而释放，蹈孙康龔超之轍。”孙康者，謂孙文与康有为也。端方电北京軍机处云：“如不速办，深恐康梁孙文諸逆，暗中接济，致难措手。”另又电张之洞：“工部局漢蓝德，曾放康梁，权力最大，每与各領为难。”各电异口同声，俱可参証。龔超湘人，庚子与唐才常同在汉口发难，因被名捕。又之洞电称：“上海六犯，英人独不愿交，近聞沈克誠 按即沈蕙 杖毙，各国皆不以为然。”袁树勳电称：“英薩使过沪，謂沈蕙办之太过，六犯宜在新麻审办。”越日，又电称：“各公使咸謂沈蕙严惩，各国均有违言。”端方电之洞：“此时情形，加以沈事，即指沈蕙。較前为难数倍。”凡此种种，俱說明滿員畏外人如虎，从来为戮辱本国同胞不得，不卹向任何外籍人屈膝。漢兰德一区区警察头子，压倒清廷一切达官贵人而有余。讀太炎“清政府与布衣爭汉虜曲直，清尊严轉替”之言，即防革命已足亡国，何待真革命？按上举各电，俱見《辛亥革命》第一册第四〇三頁至四八〇頁，下段电文同。于此，吾发見一种可笑插曲，不妨述及。端方致张之洞电云：“頃接汪监督书，此回学生編立义勇队，名曰拒俄，繼改为学生軍，又改为軍国民教育会，若有若无，迁延两月。其中稍知自愛者，多不到会，有名会中者約二百余人。月初，鈕 此指鈕永建 自北洋回，将以十日开会，密告日政府防范。时有劣生十余人，出意見书，专主排滿。鄂生王環芳厉声罵之，相率出会者百余人，并将意見书交来，其原印本已交日政府查办。蓝天蔚初意到会，自經劝諭，并由福島告誡，遂不复往。沪匪函招藍，藍复书拒之，《苏报》诬陷为此。”此《苏报》就东京开会情形，

痛責王藍二人，所謂汪監督 此指留學生總監督汪大燮 者，據以呈報端方，而端方轉電張之洞。按王、藍皆鄂人，藍后附和革命一番，而晚節不終。田桐言：民國九年，藍天蔚施南兵敗，竄入川境，川人囚之，死于獄中，見《太平彙志》。至環芳號小宋者，則完全為之洞派遺之間諜奴才也。《蘇報》被封后，吾別創刊《國民日日報》，所收罵王小宋之雜文小詩，几于日日有之。長沙楊篤生守仁，亦作五七言相關之古詩一篇，而未署名，且由郵遞而未嘗親送，吾乃懵然不知為何人之作。其篇首曰：“湖北學生界，跳出一舉人，舉人者誰王小宋，又勇隊里曾簽名”。時吾少年輕率，為審改若干句，當時非微無自信能力，謂一經涂改，即覺此勝于彼，而且余之韻語素養極薄，友篤生向在師友之間，如此點金成鐵，應為夢想不到之事。明日，篤生與吾見面，一語未嘗及此，人知詩為篤生所作，彼從不以輕誰審點告人。吾與篤生間之友誼，絕未受到絲毫影響。特吾服篤生謙退篤厚，而自咎年少無知，數十年不敢忘云。按王環芳曾經端方保薦，考語為效忠守正四字，因獲賞舉人名號，故詩稱跳出一舉人也，此癸卯七月事。《湖北學生界》，為湖北留學生共同組織之月刊雜誌，環芳屬雜其間，同人恨之而無如何。

吳稚暉有《上海蘇報案紀事》一文，此與吾所編之《蘇報案紀事》小冊子有別 聞在一九四三年，即民國三十二年 為乞憐于蔣介石而作。其中裝模作樣，醜形畢露。如俞恪士名明震，誰不知之，且吾敢斷定，彼知之甚稔，但彼必囁嚅而稱之曰明夷。夫明頤為明震弟之名，字又不作夷，凡此稚暉爛熟于胸。稚暉稱陶森甲劇光典諸名，都爽爽朗朗，并不誤作陶森乙與劇光謨，而獨太炎所詆辜夜“請安賜麪”者，彼則不欲明白說出，一若畏人錄作口供者然。書云：“作仿心勞日拙”，毋乃此即所謂勞而拙乎？尋俞明震江南名士，詩稱大家，號為中國文人，不可能不知其名。夫一九〇三 即癸卯年 至一九四三，整

整四十年，時間不可謂不長，而黑旋風李遠，稚暉必牢牢記住，說成是剪徑李鬼，使人深信而不疑，則所謂日拙，必須日日拙然後可也，亦無乃太勞乎？稚暉對俞明“夷”曰：“我心中知道你不敢捕”，既知官不敢捕，百姓何必逃乎？拘票有陳范、陳夢坡二名，稚暉曰：“一人而二名，此事必俞明夷所為，俞與夢坡熟人，為誤二人，表示訟事不由于他。”余請仿其意曰：名之張冠李戴，此事吳朮所故為，朮知俞名至熟，佯為不識，表示無屈膝請安理，此然乎否乎？章吳之爭，吾嘗從中調解，在滄洲別墅聚餐聯歡，願兩造互不社步而罷。此事稚暉曾有記載，知之者不少。時至一九四三年，太炎謝世已久，稚暉追記往事，何必悻悻作態，一如疇昔？今稚暉又以高年長往矣，吾尤而效之，何以為人？放筆至此，誠多少不能自禁。然文中涉及吾者，吾都不著一字，非徒息爭，亦聊志吾過云。吳文見《辛亥革命》第一冊第四〇一頁。

偶于行篋檢得舊詞一通，乃一九四三年吳稚暉以所草《蘇報案紀事》見貽，而吾譜此詞酬之。詞云：

木蘭花令

稚暉先生近撰《蘇報案紀事》，謂其實況者今已無人。

偶憶東坡次歐陽永叔西湖韻，有相關詞意，適拈此

調。自癸卯至今歲甲申，恰為四十二年，時遘難重慶。

歐蘇并世同風節，早日恩情晚難接，西湖七字系余思，四十二年如電抹。當時文網誰能說，青史應須歸白髮，與余同是識翁人，也只吳淞江上月。

詞意謂公談舊事，其中是非曲直，除我與吳淞江上月外，殆已無人知之。意帶陽秋，不問可知。按蘇報案初起時，最有關係而首當緝捕者，惟稚暉與吾兩人。章軫都不關《蘇報》事。但此兩人同一在俞

恪士先生庇護之下，未掛刊章，而其身受之之影響乃大異。蓋稚暉以此橫被叛黨賣友嫌疑，而吾乃脫身事外，與章鄒新合無間仍自若也。平心論之，太炎辱罵稚暉，有其過當處，例如請安吃麪，吃麪稚暉自道，請安誰則見之？吾料稚暉行為卑下，應猶不至如是。其最使稚暉不平者，彼初不識俞，俞名誰某，且記憶不得，乍經接觸，即招致口語，何以誼屬師生者，諸公翻置之不問？稚暉懷此一念，於是行文開口即曰：“癸卯五月一日，陳夢坡賞章行嚴之文才，圖將其女擷芬配之而未言，即招入館司主筆。即揭登章太炎之《客帝篇》，及所作鄒容《革命軍序》，余并未主持《蘇報》。”實則稚暉向以丑色登場，不嫌捏造事迹，信口亂道。蓋《客帝》原非排滿革命文字，未必《蘇報》肯登，憶當時登有《客民篇》，稚暉或偶爾誤記配女云云，絕對子虛烏有之談，有傷私德。稚暉本文主旨，不過對吾冷嘲一番，同時為己身洗刷而已。

吾編《蘇報案紀事》，有前言敘段，可以說明此案之歷史性。錄如下：

《蘇報》者向為日本人所創辦，衡山陳夢坡 冠 以江西鉛山知縣，因教案落職，移居上海。憤官場腐敗，思以清議易天下，遂承辦是報，至今將及四年。其所主張，由變法而保皇，由保皇而革命，草蛇灰線，蹤迹整然。

《蘇報》之大張旗鼓，實始於去年之冬，指一九〇二，即光緒二十八年壬寅 蓋增入學界風潮一門，閱者注目。說者以為東南學堂屢次破壞，皆《蘇報》之罪，未始無因；然即令有罪，而亦《蘇報》所不辭者也。本年之春，《蘇報》由漸進轉趨激烈，甘冒天下之不韙，在萬籟無聲之中，陡發天空大震之霹靂，聲隆隆然，迄盤旋於諸頑固之頭頂而不能去，則其驚駭狂叫，謀所以消滅

之也，又何待言？由是觀之，閏五月十三日之事，指是日《蘇報》被封不必其非常可怪也。

章鄒之獄，與《蘇報》原不相涉，偽政府所控條款，亦《蘇報》章鄒并列，且此次關涉《蘇報》之人物，且有與章鄒絕不相類者，名為六君子，若以章鄒同類并稱之，辱章鄒多矣。雖然，是案也，以《蘇報》為發端，而蘇報案三字，中西各報及士君子之口，皆同聲稱之。夫繩之絕也，必有絕處，今名曰《蘇報案紀事》，亦以《蘇報》為其絕處已耳。不然，章鄒者《蘇報》尙能表揚其宗旨，保皇黨龍積之，又當何說哉？故吾輩謚之曰癸卯大獄記也。如是而沈蕙之獄，南匯之獄，亦于此序其一斑。

此吾六十年前所為文，泥沙俱下，遺詞失律，姑予刪節，以存其真。所謂南匯之獄，本編又稱“南匯黃炎培等之保釋”，是南匯一案，不妨牒之為蘇報案尾聲。是案也，縣延于《蘇報》與《國民日報》兩報廣續時期，炎培出獄莅滬，吾且在《國民日報》上，題《南匯之風云》一評迎之。今吾與炎培俱篤老矣，同時輩流，消逝殆盡。偶談舊事，慨嘆曷任！

第三十五篇《鄭成功》，文篇幅甚長，編者跋尾一段謂：“吾友花隱生，近編《台灣恨》說部一書，累數十萬言，其初集即成功一生之譜牒。”是否此文即所謂初集之一部？花隱生是否即夫子自道？吾不敢斷。特前清末造之排滿家，其中心思想，不外民族主義，由此發軔，發展為“民族帝國主義”，彼亦並不反對。其言曰：“中國數千年来，有辟地于陸者，無辟地于海者，有之自鄭氏始。有奉一政府命令以辟地者，無舉一私人資格以辟地者，有之自鄭氏始。”此即“民族帝國”之嚆矢也。于是其結論乃大書而特書曰：

吾讀亞洲史而媿，媿其無英雄也。吾讀歐洲史而羨，羨其

有英雄焉。夫英雄果何物？質言之，亦曰：排异种与殖新地而已。今世白哲人种，所香花祝而神明奉，羣以英雄之徽号相归者，亦此二途为最多耳。华盛顿也，瑪志尼也，噶苏士也，加里波的也，加富儿也，毕士馬克也，非排异种之英雄歟？哥伦布也，立温斯敦也，俟頓曲也，麦寨郎也，克雷飞也，哈士丁斯也，非殖新地之英雄歟？吾讀其传记，歌焉舞焉，胎焉悖焉，羨焉妬焉，以为奈何我汉种而竟无是人焉？奈何我汉人而竟无合并彼二途之才，以凌欧而駕美之人焉？虽然，我汉种岂真无人耶？我汉人岂真无合并彼二途之才，以凌欧而駕美之人耶？吾草郑成功传，吾請举向之所崇拜华盛顿、瑪志尼、噶苏士、加里波的、加富儿、毕士馬克者而崇拜之，吾請举向之所崇拜哥伦布、立温斯敦、俟頓曲、麦寨郎、克雷飞、哈士丁斯者而崇拜之，英雄哉我郑成功也！英雄哉我汉种之郑成功也！

此赫然“民族帝国主义”之张本也。五十年前，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其中所潜伏之矛盾性，不易觉察。此一問題，必至五十年后之今日，始有摧陷廓清之思想途径，讀者試就史迹而熟思之。要之成功規取台湾，乃緣江南败还，赴其父芝龙屯兵故地，为退守計，与国力澎涨、好動远略异撰。迨荷兰人弃赤嵌，走保王城，按荷兰原筑二城，一曰赤嵌，二曰王城。成功使謂之曰：“土地我故有，当还我。”虽排异种，而与殖新地截然不同。文中所举欧洲諸豪，是否应須一一崇拜，还有研討余地，潛心默运，是在君子。

吾收有太炎初期亡命日本时之手稿，中有录日本野田逸书郑成功事一条，原文如下：

齐州灵淑之气，天夺之耶？何明季之无人也？曰：有之，朱成功是也。按成功初名森，入南安学，为诸生，其父芝龙引謁唐王，唐王宠

昇之，賜姓朱，為夏名。何為其然？曰：夫成功之精忠偉略，雄峙明季者，以我平戶妓產之也。抑我邦神靈之會，度越萬國，平妓雖賤，亦我神國中之一人耳。宜其所生精忠雄節，爭光日月，英謀偉略，出入鬼神，醜虜外狄，皆知其不可當也。而曲學阿世之徒，或誣其沉魯監國于海中，奚其妄也？蓋賣國奸臣，媚世儒夫，擢美官，讓顯職，甘心于辨髮羶腥之俗者，使精忠雄節如成功者蒙無實之誣耳。甚矣哉其無忌憚也！夫朱明至隆武永曆之代，其危如一髮懸九鼎，孽閹老奸內攻，粵盜闖賊外侵。加以勃然歛起之愛新覺羅氏，二京十三省，變為豺狼蛇蝎之巢穴。舉九州之大，億兆之眾，不降流賊，則歸滿隗；不歸滿隗，則為孽閹老奸之鷹犬。方是之時，提朱明就盡之殘卒，當勃然歛起之愛新覺羅氏；所持以勝之者，獨有奉魯王之赤心，以收拾崩山決河之人心而已矣。乃棄其可以收，而收其不可以收，庸人尙不為，而謂成功為之耶？康熙帝嘗曰：“朱成功明室遺臣，吾待之如田橫故事。”帝之于成功，其仇也，乃能稱之如此，而阿世之徒，嘵嘵多言，誠何心哉？嗚乎，成功稟我神國一點靈淑之氣，猶能得精忠偉略，雄峙明季，使夫愛新覺羅氏不能食下咽矣。設使當其乞援兵于我邦之時，遣如加藤、小早川二將者，提精騎數十萬，同心戮力以振其全鋒乎？則齊州之北面于我者，惡知不在朝鮮琉球藩臣之列，吾豈無癩視于是哉？

太炎錄此文訖，下簽註三。一、野田逸，字子明，世稱笛浦先生，丹后田邊人。二、成功沉監國于海事，見《三藩紀事本末》，全謝山移明史館帖子，已駁正之，而今明史猶載此語，大謬。三、末段語涉虛構，殊覺無謂，然細思亦非不厭人心語。愚按野田此文，從成功為日本平妓所產立論，因語多虛構。實則日本人于研究明季遺聞，

向称精核，吾殊不必泥视效产一点。吾友有船津辰一郎，于吾抗战胜利后遣归国，长物数种，不能携归，因以见贻，中有《朱舜水集》一部，据称以时省览之书，随身有年，即此，吾中国人视之有愧。

文不似译笔，尤不似出太炎手。大抵日本老輩，多通汉文。其文虽无杜温夫助词不中律令之病，然得太炎珍重手录，信是奇迹。时太炎正当壮岁，小楷嫵媚精絕。

太炎謂魯監國沉海，全謝山移明史館帖子已駁正。吾查《鮑琦亭集》，此类帖子五通，都未提此事。此或謝山他文有此，而太炎誤記。尋閱謝山答陸聚綸論三藩紀事帖子得之，其文云：

《三藩紀事本末》，盡屬不經之語，其中謬之大者，莫如監國魯王死于鄭氏一案。鄭氏之不奉魯王也，以隆武頒詔之隙也，故当时自丁亥至辛卯，海上原有二朔。成功在金門，援天復天祐例，仍稱隆武三年，而奉淮王為監國，其所頒曰東武四年曆。錢忠介公在長垣，則頒魯二年曆。己丑，粵中使至，成功奉朔，淮王去監國號，舟山仍奉魯。辛卯以後，魯盡失其地，壬辰，次中左所，尋次金門。癸巳，亦去監國號，通表漢中，于是海上之曆始合。已而舟山舊臣，日益消落，魯王竟依鄭氏為寄公。丁酉，次南澳。己亥，陳光祿土京卒，遣人祭之。蓋成功雖不奉王，而其致餼仍以宗藩之胤，未嘗相凌。辛丑，成功入台灣。壬寅，緬甸赴至，成功亦卒。海上遺臣，復奉王監國，然成功子亦不奉王，徒然而已。甲辰，王薨。是不特成功無背逆事，即其子亦無之，特相傳其致餼稍衰于父。而紀事謂魯王在南澳，成功沉之海中，不亦謬歟？

太炎記性絕強，而談旧事仍不免微有出入，可見考古指揮聯貫，不失步武之難。陸聚綸名奎勳，又号陸堂，康熙進士。錢忠介

名肃乐，鄞人，崇禎进士。

第三十六篇《追論張汶祥》。按張文祥一案，起于同治末年，后三十年之新聞紙發題討論，難言適時，故曰追論，此諒亦《蘇報》或其他革命報之專題文字也。時排滿思想，漸次澎漲，形為二流，主流曰革命，支流曰暗殺，而其源同起于滿族，或滿族之虐殺漢族。且以虐殺之程度過于殘酷，主流枯竭，而支流更不振，于是作者為之曾曰：“滿清竊國二百余年，前僅有莽俠夫敢于犯駕，后僅有張文祥敢于殺官。”太炎更甚其詞曰：“專諸蠶政，死二千年，刺客之傳，鬱焉勿宣。泰山有士，曰張文祥，睚眦報仇，新貽是創。”見徐錫麟陳伯平馬宗漢哀辭。噫嘻！此其太息于刺客之難能而可貴，何其悲切而深至也！尔后數年之間，革命屢起而屢敗，人心憤激，无可發洩，暗殺論于焉抬頭，以致吳樹著《暗殺時代》一書，以身作則，為天下倡。徐錫麟、溫生才之徒繼之，天下義民貞士，羣焉兴起，卒乃收功于武昌革命，而清室以亡。

張汶祥，初期官文書作張文祥，文不從水，祥又作詳，李越縵日記中写法亦如是。今《黃帝魂》仍俗稱，太炎則去水旁，祥各不作詳，吾行文從太炎。

馬案發于同治九年七月廿六日。是日，新貽赴署西偏箭道閱射，事畢，步還署，甫及東側門，文祥突出，偽若陳狀，抽刀击新貽傷肋，次日死。聞文祥蓄意殺馬已久，刀經藥物淬厉，刃薄如紙，一著腹際，以手掩之，鋒為拳曲如鉤。此必死之技，非长年专心致志，未必無成。術成之后，受者刃到必死，无法解救。試觀刺馬經程，一如所期，可見文祥恨不在小，定关軍國大計。太炎竟以睚眦報仇稱之，何其淺之乎視文祥也！

越縵有庚午書事二首云：

孤憤千秋在，狂呼一击中；夷曾方喪魄，廷議急和戎。并
敵誠非易，要盟豈有終；宋金殷鑒近，幸莫恃成功。

华夏瞻山斗，安危仗老成；出師良有待，執法太無名。竟
墮穢兒術，難全義士生；虛傳持重議，晚節付公評。

此詩，趕纔寫入庚午十月三十日日記，去馬案發生為三越月
強。或疑詩為張文祥而作，如孤憤千秋在，狂呼一击中，及竟墮穢
兒術，難全義士生等句，可能看作為文祥表同情。時值曾國藩由直
隸移督兩江，專審此案，詩因對曾多所刺責。如华夏瞻山斗，安危
仗老成，及虛傳持重議，晚節付公評等語，露骨向曾呼颺。雖然，所
謂庚午書事者，庚午一年，暴露大事兩宗，一天津教案，一南京暗殺
案，而責任都落在曾國藩肩上。至以西洋人關係而言，則天津一案
中，色彩濃厚，而馬案牽涉不上。如實論之，李此詩專為津案著筆，
似無疑義。觀于國藩奏陳民教啟衅一疏，李指“曾侯一首，可謂夙
德之衰”，其與書事第二首語氣相合。詩縱高格雅旨，一時名作，然
為馬案征及此老，恐此老當日膽氣，猶不敢認言義士，替文祥作此
俊斷，斯亦等于過屠門大嚼，聊為不得肉之快意而已。

傳聞新貽被刺之日，方由箭道步入署東門，有疏戚某，自鄉間
來，遮道乞貸，新貽止而問話。文祥自旁沖出，刺新貽倒地，吏急閉
城門捕盜，人心洶洶。布政使梅啟照出示諭民，言：“總督有家難，
無預外人事”，一若惟恐涉及政治性然。而安徽學政殷兆鏞，次日試
錄遺生，遽取孟子“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發題，居然以北宮黝比
文祥，雖士論為之大譁，然亦不可謂非代表公意，無形中為被壓迫
民眾吐一口惡氣也。兆鏞以侍郎出任學政，資歷甚高，因而老氣橫秋，視總督無
物。是年冬，病歿。

按《黃帝魂》編制時，環顧當世，無一暗殺實際例子，足資論證。

不仅恩銘、孚琦、凤山及五大臣等案，尙未孳生，即零畸不全、吾与黄藻身經目击之王之春案，亦与本編先后相逐，而未遑捉搦。由是稿者迫于掇拾三十年前之唯一老案，凭虛发論，故作波瀾，无异闖場枵腹考生之对空策，此适証实时代性之冷酷处，可胜浩叹？

本文痛罵曾國藩，至國藩胡乃值得一罵？不問而为种族問題。有自詭法時尙任齋主人者，曾致箋《新民丛報》，主人為誰，叶翰韓云：應是黃道賓。稱：國藩“視洪楊之徒，張 总 愚 陳 玉 成 之輩，猶僭窃盜賊，而忘其为赤子為吾民”。自注：引清嘉慶帝治川楚匪詔如下：“自古只聞治兵于外國，未聞用兵于吾民，蔓延日久，多所杀戮，是兵是賊，均吾赤子，故教匪不行獻俘虜，太學不立紀功碑。”意謂國藩治兵，智出异族君主之下，大是可惜，文見壬寅十月《新民丛報》。今移此以繩張文祥案。夫文祥，官文書明明宣稱洪秀全余党，粵捻兩通，而其报仇遠因，則在南田圍勦一役。蓋象山宁海有禁界地曰南田，方數百里，环海土寇邱財青等，窟宅其中。新貽時為浙撫，遣兵捕財青置之法，余党星竄，文祥為之魁。黃巖总兵剛安泰，出海捕盜，為盜所戕，文祥有力焉。新貽督兩江后，仍襲前規，捕杀无已。似此民族仇恨之深，致文祥手搥仇人之胸，以身試法而不悔，釀成案中之重大性，安有有心人覺察不到之理？乃國藩繼魁玉、張之万之后，复审本案，既不能援引日本壯士之刺星亨，本文之主張如是 微示惠于汉人，复不体察嘉慶之治川楚，稍效忠于清廷。居然奏記原讞，慘絕人寰，如摘心戮祭，斷戮其子等款 麻木昏庸，进退失据，卒之激汉人之怒，速清廷之亡，其机不妨假定由文祥一案启之。夫國藩亦何足罵？独文祥以利刃提供滿汉消长机械启閉之用，一身不啻九鼎之重，豈非人傑也哉？至文祥、新貽及吳炳燮三人，微時敵血為盟，計時当在道光二十七年新貽中進士以前，實荒遠不足備 与文祥或炳燮之妻各被姦

占等情，大抵传奇誣妄之詞，无足深論。

法时尚任斋主人續前評曾國藩又云：

此其所尽忠以报国者，在上則朝廷之命，在下則疆吏之职耳，于現在民族之強弱，将来世界之治乱，未一措意也。所学皆儒术，而善处功名之际，乃专用黄老。取已成之功，而分其名于鄂督官文，遣百战之勇，而授其权于淮軍李鴻章，是皆人所难能。生平所兢兢者，党援之祸，种族之爭，于穩騰額原注：忘其名，不甚确之參劾湘軍也，亟引为已过，于曾國藩之彈糾滿人也，即逼使告退。今后世界文明大国政党之爭，愈爭愈烈，愈益进步，为党魁者甘为退社，必无事能成矣。

据此，國藩于种族之爭，并非漫不經意，但彼出当大任，自始以黄老之术馭之，凡种族問題发生，只謀避就而不謀解决。洪楊盪平之日，史称其“功成不居，粥粥如畏”，清史稿本传可謂下真容一等之形容詞句。蓋求急流勇退而不能退，因一切得了且了是务，勢則然也。观夫处理李秀成獄，清廷本殿諭檻送京師，獻俘太庙，卒以國藩反复陈奏不便，迫使清諭改称：“此等跳梁小丑，本无所用其献俘。且恐沿途派兵递送，騷扰驛传，重累吾民。既据供認明确，著曾國藩无庸派兵解京，即于江宁省城，凌迟处死。”見《东华录》。查國藩生于嘉庆朝，又道光朝曾貳秩宗，任礼部侍郎，如曩引前朝川楚哀詔，理应彻底了解。以秀成积年“剧寇”，僇伴成俘，而敢于率請竟不解京，岂別无心証存于其間？清廷新以掌兵大权付之汉人，外重之势已成，暫只得迎机默喻。加以諭令凌迟，而疆臣径付絞絊，全其軀体，至悍然违旨而不顧。据國藩裔孙亮枚称：乃父知是被死，見前引《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簡报》。果其如此，又岂國藩顧預自为？复次，秀成大字口供，长达万言，國藩改軍之余，留原本不燬，使后人得見真迹，此

虽案牍小节，安知保存者不具深心？综消极方面而论，国藩于裁制李秀成一案，知下犯必死之罪，而上有必欲死之之心，准情依势，还算斟酌合度。至时越六年而张文祥案出，不幸仍陷入国藩掌握之中，时则湘乡将帅久成弩末，国藩暮气愈深，忧谗畏譏之负担愈重。又见文祥个人仇杀，不比合众兴师，因而掉以轻心，敷衍了事，遂尔杀人以媚人，辄自墜于民族劊子手之深渊，而无法自拔。要而言之，国藩外震清廷之余威，内憚船山之大义，《船山道书》实以国藩之提倡而开雕其晚年神明之咎，不期而与迷信运气之度成正比例云。

薛福成《庸菴笔记》，有记张文祥狱一条，兹摘录如下：

新貽被刺前数日，忽接公文一角，其封模糊，不知何署印章。拆视并无文书，但函死马一匹，盖即文祥所为也。是时事出非常，訛言四起，或谓必有指使之入，或又以帷簿事疑焉。方狱急时，余在金陵，加意访察此事，其谓有指使者，固毫无影响；谓涉及帷簿，尤大謬不然。文祥所自供之籍贯踪迹，与世所传不相应，按文祥为河南汝阳县人。且马果有隐愿，文祥儘可昌言之，不必为之隐諱也。先是漕帅张之万赴江南莅狱，既定讞矣，言路有异議，复遣刑部尚书郑敦谨赴宁，讞如前，以辛未二月十五日，鞫文祥于金陵城北之小营。按马被刺，在庚午七月二十七日，至是閱七个月弱。江宁将军魁玉曾詰問主使，文祥张目答云：我为天下除一通回匪者，盖以马先世出于回教，故誣之也。及星使至，与承审司員先后熬問，文祥終无一詞，或时为夸謾不遜語而已。或劝刑訊，星使以文祥重犯，倘未正典刑，而瘐死獄中，誰执其咎？故始終不敢用刑。定案之日，孙衣言、袁保庆 按此即袁世凱之父，时为江南候补道 皆以承审大員不肯面諾，以未刑訊故也。然当时推究文祥踪迹，并逼逮

其孀戚支党，供証確凿，所讞十得七八，无甚疑义云。

此中有数点可注意。一、文始终未提到曾国藩，似有意为彼别白于此狱然。所谓星使，当然指郑敦谨。两江总督，亦不得云星使。二、文祥对魁玉云：“我为天下除一通回匪者”，此语为狱中关键，宜加分析。吾意马攻南田，必有款敌诱捕情事，文祥以义愤报仇，方不愧一快字，若扩充至种族问题，意义更为重大。三、狱词不及阴私，事殆可信。四、刺前致死马一匹，事近传奇难信；果其如此，足见文祥谋定后动，从容不迫，何止愧煞秦舞阳一輩人。五、熬审不吐一词，且时作夸谩不逊语，俱足见文祥气概。查福成久处曾国藩幕，军略政情通解无滞，文笔亦条畅可喜。记文祥狱，颇翔实足信据。惟笔记卷四，号称述异，尽卷皆妖妄事迹，为通人所不道，不解福成何迷谬至此？即以文祥狱言，福成载：有湖州人费以耕，字余伯，以鬻画游上海，病卧客舍，马被刺日，费忽语人，一百二十余年前之案发矣，此案共数十人，吾名亦在其中，越三日而费卒。又载：丹阳某生，梦见吏役持名单一纸，所录殆数十人，第一名为张文祥，第三名马新貽，而已在数十名以外。未半月马被刺，某生以是冬十月卒，文祥名列第一，而死在明年二月。又载：张之万在清江浦，忽梦马以年愚弟名帖来拜，马故之万丁未 按此即道光二十七年 同年也，神色惨澹，久之默然，徐曰：吾事专托同年，拱手而去。诸如此类，福成皆续述无作，殊属可笑。

福成又称：“文祥始为粤匪所擄，继而逃出，并与诸海盗通。马巡抚浙江，擒斩海盗颇众，文祥时思为海盗报仇。”夫官文书所谓海盗，含义至不一。昔郑成功起兵海上，羣谓之海盗，内地有与成功暗接者，号曰通海，罪至无上。孙中山先生初起革命，清廷亦以海盗为名，大布刊章。由此推之，文祥案中之海盗，旨趣大略可想。

福成末云：“天下固有以匪皆之忿，转滔天之釁，文祥之謂也”，此与曩記太炎之加于文祥者相同。然海盜之仇，決不与匪皆之忿等值，此誼迄無人揭發，故重復言之。

第三十七篇《畢永年》，此連同下一篇《林錫珪》，編者說明是從其友民表所著《庚子漢變始末紀》中採摘而成。民表者誰？即秦力山也，躬預庚子一役，又與畢、林為友，故所陳應更切實可靠。惟所謂《庚子漢變始末紀》一書，約十萬言，吾意力山並未完成。其中零星稿件，如畢林二傳，為編者所得，納入《黃帝魂》內，表曝于世，為理想中中國近世革新史留得片羽耳。

永年字松甫，吾不識其人，而曾閱其手札。戊戌吾在長沙，見松甫與馬象雍亦當時長沙才子，善書一札，有“沉雲墨布，天與人齊，野叟曝言，頗復思憶”四語，濃墨北體，想見為散懶而愛讀小說人物，傳所謂舉拔貢生，即前一年丁酉為學使江標所拔之士也。譚嗣同死時，君方由燕京歸長沙，殆即以拔貢生入京赴朝考之日。而吾見其求《野叟曝言》一札，亦殆即燕路南返之時。傳稱康有為在京，誼同志建設共和政府，圍頤和園，殺清帝及太后，以己代帝位，事高奇難信。要之松甫為人稍急善變，難與為友，與康孫兩黨，均始合終離，卒之徘徊歧路，孤軍以死。力山曾二度使用龔定菴奇虬巨鯨大珠空青字，以贖松甫，諒力山駭服松甫甚不平凡。究之兩人性受沖勁，不修邊幅，實小同而大異云。力山第一度用定菴文，在為書序《孫逸仙》。

力山愛好龔定菴文，其行文態勢及為人風流自賞處，亦近龔一路。太炎則薄龔特甚，所作《說林》有曰：

自珍文辭側媚，自以取法晚周諸子，然佻健無骨體，視晚唐皮陸且弗逮。以較近世，猶不如唐甄《潛書》近實。後生信其

誑耀，以为巨子，誠以舒纵易效，又多淫丽之辞，中其所嗜，故少年靡然向风。自自珍之文貴，則文学墜地垂尽，将汉种灭亡之妖耶？

辞之凌厉刻骨如此。顧太炎从不向力山吐露，非傲力山，即对余亦然。犹忆太炎出獄滬东，同人以讲学相要，为設国学讲习会，而責序于余。余文引有苏子瞻智勇辯力之說，太炎閱竟，笑曰：如此說亦好。意謂革命党文能通俗即得，何况文不止通俗如尔也，竟一字未改，付《民报》第七期发表。康心之告余：尔时乃兄心孚曾将此文由东京寄回，責彼熟讀，彼年不过十二三也。太炎評文深刻，而待友长厚，往往自調剂其矛盾乃尔。康心之名室志，心孚三弟。

查定菴集，奇虬巨鯨、大珠空青字，見于《送歛吳君序》一文者凡两次。一曰：“乘孤舟滔乎大濶之中，怪鳥悲鳴，日暮冥冥，求所謂奇虬巨鯨、大珠空青，卒无有。”又一曰：“有叩吾門，賈以奇虬巨鯨、大珠空青之异者，疑十而信一。”文貌为高古，辞盛意索，謬賞龔文，信末世之敝风。力山年少不周于学，偶入奇趋，亦无足怪。顧閱南海答人問为文书有云：“近人最易师法者，莫若龔定菴。格調笔态，神色韻味，定菴最备，讀之入古最易。定菴之文，居然周汉之文也，可专讀定菴集模仿之。”見康同璧輯《万木草堂遺稿》。南海与太炎論政居两极端，惟論文亦然。

吾曾見譚祖安跋唐絨丞手札云：“毕松甫者最滑稽。尝云：絨丞有紋周頸，当死于刃。无意戮髓之言，不謂其为讖也。毕后弃家为浮屠，死于广州，去絨丞远矣。”祖安言外之意，頗軒絨丞而輕松甫，吾以其言能广异聞，录之。札系致龙黄漢者，今存中国历史博物館。

松甫在广州之死状不明，然《黄帝魂》編录此文，已盛传松甫死去。吾所撰《孙逸仙》，中說松甫曾参与兴中会，此远在庚子以前，

无可取証。近有作回忆录者，謂黃克強在长沙創立華興會，松甫在座，此殊难于取信。知松甫之死于广州，与力山之死于越南，同一秘聞，天下以說傳說也久矣。

第三十八篇《林錫珪》，文为力山之作，概略如前述。查錫珪一名圭，为时务学堂二班生。夫二班与头班异，头班收于丁酉冬，二班收于戊戌春。为时虽不远，而头班考取严格，三千名之中，取不过几十名。二班则与考者少，几于一考即获。三班更滥，考无不中，余亡弟勳士，即三班生也。而头二两班之相异处，尤在戊戌入春，梁启超在公开反对八股之旗帜外，潜踪会试，弃讲席而走，学堂精神，一落千丈。錫珪与范源廉范亦二班生 暨，在湘并未得与启超相見，力山因謂錫珪受粵人欧梁甲之教者，此之謂也。是年八月，政变。明年六月，錫珪应启超之招赴东京，踟躇于大同学校者久之。願錫珪重实行不重理想，复杂性与广东人不相习，則奋起返国，毅然为长江暴动作准备。迨抵汉上，着手计划，又与唐才常有所齟齬。力山因为錫珪訟冤曰：“林之目的与唐异，唐崇拜康，林崇拜公理。唐为帝党，林为民党。唐主立宪，林主共和。”其他唐遇事掣林肘，及唐在会中激成内訌，林起而調和之各节，复声叙历历，慷慨不胜，并謂汉变之敗，主因在此。甚且訟言：“庚子长江流域革命运动大舞台，为林氏一人所筑。”嘻！何其言之悲壮而痛切一至此也！

昨岁在南中，得叶榕甫书，謂：“庚子汉口之役，有人毀文山赴武昌告变，唐才常始敗；君知其事否？”文山者指萍乡文廷式，榕甫与廷式有連，聞此說不安，故頗欲一理此毀之所由也。余答称：彼时余未出湘，不悉其由。导檢太炎所为《汉明清党禍論》，涉笔及此。其說云：“汉口之役，康有为以其事屬唐才常，才常素不习外交，有为之徒龙泽厚为道地。其后才常权日盛，凡事不使泽厚知，又日狎妓

飲燕不已。泽厚奋发爭之不可得，乃导文廷式至武昌发其事。才常死，其軍需在上海，共事窃之以走。有为再敗，則同党始有告密于諸藩，自戕其气类者。”事經太炎郑重論列，后人或信其可能真有。吾重思之，太炎故与泽厚习，癸卯又同在獄中，当然談到此一經過，因而消息来源，了无可疑。吾見辛丑壬寅間，太炎在东京，致函先外舅吳彥复，中有如下数語：“信国近况何似？胸中热度，飲冰不能遏其焰，此路人所知也。特恐禁网渐弛，更无新出头目，供其戮力贖罪。五鹿嶙嶙，岂不能容此南山之豹？悲哉！若人大巧若拙矣。”未暑十月廿九日，吾料是辛丑阳曆十月也。信国指廷式，五鹿指张之洞，語意深致譏諷，一若廷式专以告密奕友为事。噫！奇哉奇哉。寻先外舅与芸閣契好，太炎就先外舅作寄公时，容与芸閣接晤，两賢相阨，就中言語冲突，宜或有之。加以龙泽厚一至庸之人也，天下唯庸人最易涉妄。計此类庸人，如何堪任外交职责？有为当年調配人事，茲为一大失策。彼在汉口不为才常重視，不难想象得之。夫不为人重視而生心嫉妒，甚且加害，往往庸妄人之行为如此。由此看来，芸閣在同人之层层惡感中，逐漸形成一疑獄之对象，非不可能。綜其路綫，不外以才常之頑頑，泽厚之冥頑，芸閣之鬱怒，太炎之刻駭，連环交錯而成，而才常之不善事为第一义。黄菊人編《黄帝魂》，于庚子汉口一役，吐弃才常，而重視林錫珪，良非无故。案龙泽厚吾亦与甚习，抗战时吾道难桂林，犹蒙教見之，真一至庸之人。

吾以上文示榕甫，得复如下：

以我所知，张之洞当时对武汉三鎮及长江上下游，布滿偵探。以唐龙之疏虞，及滿启鈞等之偵察，固无待他人之首告也。当西太后之查李文先生也，論中有拿获就地正法之語。事見是年《东华录》。文时在长沙，經人密告，連夜偕其九弟法和，

輾轉逃至日清輪船公司之赴滬輪船，藏于船長室內，一路均遭偵伺。及出鄂境，他與法和說：試拈一物，以卜休咎。適見一牛在田，法和因說一牛字。文先生曰：吾得生矣，蓋以牛加一厶即生字也。以上據法和手記。及到滬，即住昌壽里，我時年二十，由贛赴滬，曾屢見之。追憶一切情形，實無向張告密之可能。且文又豈是能聽龍澤厚之指揮者？文與太炎及梁唐，均不甚浹洽，不相能本在意中，至于投降張之洞，加以賣友，以其品格言之，應無其事。証之法和所記，更為顯然。

裕甫之言良信，且有一極強之反証在。如沈蕙區區一人之獄，而假借告密復官進級者，無慮四五人，如李盛鐸、蔡金臺、吳式釗、庚寬之類是。漢口起義大舉，倘真是文某舉發，張之洞豈有不抗章明保，文因得恢復原職之理？即以龍澤厚言，彼叛黨舉發，也算有功，何至時越四年，姓名猶掛刊章？願事實絕不與人之想象相符，可見事由虛構，不值譏者一笑。

湘中有詩人舒閩祥，字苦生，因與唐才常交好，曾預漢口之役。事敗返湘，冀幸得免于難。彼曾私謂吾：林錫珪絕可愛，諸義士縛赴刑場，彼猶潛踪往觀，隱示最后一別，心最難受。舒一心直口快人也，對親友坦率如此，情殊可慮。未几，鄂探在舒武昌寓所池中，發見大量武器，因而名捕到湘。舒恥于對簿，飲金自殺，時庚子逼近歲暮之一日也。自殺前數日，就余案頭寫詩八首示余，謂是感事贈人之作，并曾指說所贈何人。時吾稚齒，不留意海內人物，一時囫圇過去。由今思之，所贈定屬文道希。依詩中詞句推測，龍澤厚叛變逸去，確有其事；龍要文告密，亦確有其事。但文固拒不許，并向舒有所聲明，舒因嘉其氣誼，長言贈答。詩第二首云：太息回天力尚微，乘秋便欲破空飛；一身詎忍言功罪，萬口偏難定是非。大

泽龙蛇終启蟄，故山猿鶴莫相违；三千死士田橫島，南望中原涕泪霏。腹联明点龙泽厚。故山猿鶴者，湖南人向視江西为老家，称赣人老表，故云。第三首云：軍符一道下从容，宜有升平答九重；誰向广寒修月斧，却教洛浦应霜钟。越禽背暖孤飞去，犍犬驕人反噬凶；落日营門傲秋色，將軍独自頌时雍。头两句表明勤王。項联明指派龙办外交，用洛钟西应，暗藏西字。当时革命，以为必求外人不加干涉，方有成功希望，作者并不同意此一說法。越禽犍犬，合指龙一人。龙是广西人，故曰越禽。落日营門，指才常孤立，大事垂敗。第七首云：重見詞源三峡傾，几人联袂又蓬瀛；欲随幕燕营新垒，已与江鷗背旧盟。未死秦灰犹有焰，仅存魯壁更无声；关山直北愁金鼓，要借絃歌写太平。此首表面上嗟叹回鑿后文恬武嬉。腹联点題。秦灰就厚字积字設想，魯壁字面刻国文道希，意即謂龙虽游說，而文閉口不言也，此一联最貼切。末一首云：当年亦是凤鸞姿，雪压霜欺历几时；官味乍同鸡肋恋，壮怀应有馬蹄知。浊醪味薄愁难破，故剑情深有所思；风景不殊悲举目，买山何处采华芝？此全是向文表同情。故剑一句，牵涉惟薄，意盖指龔夫人而言，非交深亲切不肯及此。吾得此詩，当时并不深解其中意味。明年壬寅，吾游金陵，适橫滨《新民丛报》出版，吾鈔詩寄梁任公。任公大喜，將詩刊布，而襄吾說明，渴求寄书者何人。时吾自詭章邱生，得报不复，后来面見任公，亦未說到此事，盖此事已成为六十年不解之謎矣。昨因裕甫言：文先生在长沙，忽而想到詩意之可能性，故声叙如上。

舒詩有一点，与革党政略相关，十分重要。即誰向广寒修月斧一联，示党人唯恐因革命而遭干涉，遂竭力取侯帝国諸會，舒乃据理力爭，认为国际无此必要是也。須知此一錯誤思想，胶固于党人

胸中，先既錯看了义和团，复于本党拿不定主意，联綿及于辛亥，武汉諸雄乍一舉旌，即羣向小小領事低首。遂至帝國主義之惡毒影子，籠罩中華者垂數十年，迄至十二年前全國解放，而始得芟夷蕪崇，絕其本根，誠不得不證為近代史之最大關鍵所當大書深刻者也。狄平子當然不解此理，曾于《平等閣筆記》謬著其事云：

友人多詰庚子事，謂何必用富有稟名義，以至授人口實？蓋其中曲折，外人知者甚少，當時實不能不利用各會黨中人。因該黨中各以一稟為憑信，其稟中要義，即為掃清滅洋四字。佛生籌思多日，謂此滅洋二字，足亡中國而有余。一旦中國有亂，會黨蜂起，則全國均為义和團矣。如是不但國亡，種亦且滅。于是創自立會富有稟名義，乃得將舊有之稟，一概收而毀之。其掃清滅洋四字，改為救國保民四字。且布告各處，諄諄告誡，第一要義，即為不可傷害洋人，此佛生之煞費苦心也。其人雖死，其事未成，而其效乃大著。何以見之？當時北方义和團蜂擁而起，殺他國之領使參贊，全國響應矣；而長江上下游會黨中人，不下數十萬，所以安守不叛，而又不傷一外人者，皆佛生一人之力焉。蓋因各會黨之宗旨既已改易，一切听自立會之指揮故也。乃劉峴庄、張香濤二人，至今尚冒享保守東南之美名。今二人亦已死矣，地下儘遇我佛生者，能無愧汗耶？

狄平子之謬見，實則革命黨人之公憲，初出智囊，轉入葯籠，卒乃庸醫殺人，人死猶誇妙葯。嘗論辛亥革命失敗，緣于種種局限性，而茲殆為知識局限之最大一種。夫物一色也，本來軒輅呈露，人人共見。顧當時回黃轉綠，瞶眩作真，致使帝國主義頭子抓住吾國弱點，操縱有意無意自陷泥淖之大小奴奸，促國之亡，間不容髮，抑

何可叹！

舒閔祥者，溆浦名士，其世父为舒燾伯魯，曾國藩在《歐陽生文集序》中，标举为桐城末流之底柱者也。閔祥詩名重一时，而政治見解复如此卓越，所謂龔生既天，而高名并沒，洵为革命史中之一大憾事，至偶以吟詠为文芸閣一解題枉，只不过是美睡之亂，洋洋盈耳而已。

第三十九篇《书周云祥事》，文笔俊爽，說事或不免夸大。

吾不了云祥起义状，查李根源漢人，必知其詳，因馳往問之。根源云：云祥箇旧錫厂工人，在蒙自偏僻地带，凭藉厂方基础，得势殊不难。又云祥年壮有干才，一时声势确不小，时余尙未离滇，情况略知。至云挟大革命宗旨，与孙黃联合为之，則似未必如是。又彼刚猛滥杀，为漢人所不满，受害人戟指呼作土匪，往往而有，即革命党人，随声附和，亦不例外。辛亥光复成功，理应稽勳，听人提出先烈名字，用資表揚。吾曾提云祥名，当场有人反对，蔡鐔持两端，議不得通过，吾至今悔恨。

吾因問《黃帝魂》所載文从何而来？是否漢人为之？根源云：此則吾不知。惟云祥起事在癸卯，《黃帝魂》印行亦在癸卯，东京《云南杂志》成立于三年后，謂文出該杂志，显不可能。

綜根源所言，質朴无伪，应可信据。查癸卯一年，东京《国民报》已停刊，其他可登革命文学之刊物，惟上海《苏报》及香港《中国日报》而已。依势揣之，文中叙云祥誓师杀賊状，确有意夸张之处。其所以夸张，旨在标举工人徒手起义，即黃藻所謂劈破混元包也。果尔，此文或藻自草之。盖藻革命观点，独出心裁，每每与众不同，如龔优視义和团，亦与夸大周云祥共一机軸云。吾重思之，根源珍視革命史迹，节次編著之作殊不少。如《曲石文录》、《雪生

年譜》、《永昌府文征》、及《云貴辛亥革命資料》等，吾一一閱過，都无一字及周云祥。此誠史料之負面突出點，不可不記。

嘗試論之，癸卯夏四月，云祥攻陷臨安城，至閏五月中，府城始復，而云祥死之。《清史稿·本紀》二十四，記載甚明。庚子漢口之役，該史稿无一語及唐才常，那拉氏僅于次史村驛途中，諭北五省嚴捕自立會黨。實則當時北五省者，并非自立黨勢力所及之地，政府亦為臨時警蹕之便，發一紙官樣文書而已。須知云祥率領工人，杖箠而起，頑抗兩月之久，漢軍僅乃克之，可見工人徒手革命，一時聲勢不小。以視漢口兵未陳列，即遭覆敗，大通一戰，形同兒戲，官文書中竟无只字提及，兩者相衡，殆不勝大巫小巫之感。由是可見本編于漢口削去唐才常，而惟翹舉畢永年、林錫珪；于雲南重視周云祥，大事鼓吹，俱由黃藻先生独具只眼，與時賢不同。

第四十篇《記仇滿生》，此《蘇報》所登載之作，《蘇報案紀事》并錄存焉。其人身世无可考，林志鈞為其友，而林新謝世，惜无从探問。惟就吾所知，有一无形相連之事可記。蓋吾友有何梅士者，亦閩人，愛國學社學生，自言為沈愛滄甥，與吾及陳独秀契好。独秀以其求愛一女子而不如意，因戲易其字曰靡施，吾撰《双杯記》小說，即延緣以靡施為主人翁。独秀仿杜工部，作存沒口號若干首，中有以吾與梅士相綴合者。其詞云：“何郎弱冠稱神勇，章子當時有令名；白骨可曾歸閩海，文章今已動英京。”此詩流傳甚廣，近者吾晤總理周恩來，語次，偶及舊事，彼猶能朗誦不誤，以為笑樂。所謂白骨歸閩海者，即指梅士由滬乘船赴江戶求醫，適與仇滿生蹈海同時。又兩人同屬閩籍，新聞記者竟貿然以仇滿生併梅士為一談，大事宣傳。吾之《双杯記》，亦即影射其事，以訛傳訛，小說固不妨作如是觀云。仇滿生陳姓，鯤名。紀事又言：常熟殷次伊，死狀與仇滿

生略同，惟其死时《苏报》已被封，故不及载。

第四十一篇《祭沈蕙文》，此太炎獄中之笔。癸卯七月一日，开追悼会于愚园，吾在所設影堂前，宣讀此文。詞有云：“政变之局，实隕譚林，縶于天囚，厥死非凌。勤王之敗，唐傅是罹，为滿干城，剗类則宜。”将戊戌、庚子两役，一齐罵倒，想見作者著笔时，何等憤慨。譚林者、林指林旭，唐傅者，傅指湖北傅慈祥。实則勤王亦应称唐林，此林指林錫珪也。傅以留学生假归，适逢其会，与錫珪躬任其事，长江震动者异趣，作者因避两林字，迁就其詞也。吾撰《沈蕙》一书，太炎在獄为作序，即曰：“唐才常、林圭圭即錫珪。等，皆树勤王为职志”，同言一事，显称唐、林可証。序見后。

吾曩言癸卯一年，在中国革命史上，可云达到高潮。以《沈蕙》第一章吾所作緒論觀之，庶几言皆有物。論如下：

今日之中国，乃适渡于种族竞争党派鬭斗之湍流，而其酝酿之激急，风云之伟壮，必有足为紀念者存焉。故自戊戌爆烈以来，中經庚子以至今日，其間党說之退脫，方針之轉拔，著著进步，蹊径可寻，是宜乎潜势力之滿布全国也。虽然，本年事件之多端，亦既照人耳目矣，而区分之，約为四时期。一时期以一人作为代數以記之，則二三月之交者，吳敬恆 蔡民友同 时期也。四五月之交者，鈕永建 湯無同 时期也。五六月之交者，章炳麟 邹容同 时期也。六七月之交者，沈蕙时期也。然吳敬恆以丑行演說，惹起滿清注目，是为本年騷动之发端；而鈕永建复組織军队，为滿清腐鼠之吓。以故吳蔡鈕湯之名詞，扰攘于上海者数月，而卒无事。吳敬恆走西，鈕永建返东，而其毒乃大集突发于章炳麟。名捕之日，全国視綫，莫不注射于松江一角之地，以为滿汉宣战，今其嚆矢。章炳麟之被俘，即吾

四百兆同胞之被俘也。故章邹之獄，已足鼓蕩全国之輿論，而堅吾軍之壁壘，乃不逾月而沈蕙槌毙于滿廷。于是輿論愈激昂，而热血愈騰涌，几若全国一致，以奔滿洲，勢洶洶不可天闕。西人至謂“沈蕙之死，震动人心，較之日俄开战尤大”，見上海《文汇报》則可見吾沈蕙之影响于中国前途为何如也。

此論吾草創于五十九年前，当时目击而心蕩者，曾有几何人，不得而知。同时正負仇友盘旋舞台之諸般形象，大抵灰飞烟灭，一去不返。而六十年來，繼續产生各阶层民众，吾复无法提挈，使夢遊于当年四个时期、列缺辟历、相寻崩摧之逐节阶段。史程既无由倒行，知人又难在論世，吾徒見“圣沈蕙”杖劍而前行，“圣炳麟”秉笔而后隨，“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忧”。怀李白之壯思，感湘纍之孤憤，吾独奈之何哉？吾独奈之何哉？

沈蕙之死，太炎絕重視，謂在革命为进一阶，价值远駕譚嗣同、唐才常而上之。外传蕙有絕命詞，隱示乞怜清廷，力山聞之大怒，曾致函与吾，謂：“沈生平最不喜执笔为文，必好事者为之，决非沈之所为。仆与沈为总角交，为患难友，知沈最深，逆料沈断不出此。”书发表在《国民日报》上。章秦之論，必使沈代表革命最上一层，太炎行文，至以“圣沈蕙”相高，即《祭沈蕙文》中用之 微带公羊緯学意味。

或传蕙被錐死于慎刑司。朱启鈴曰：此殆誤传。慎刑司屬內廷，大抵太监宮婢、內务府包衣旗人、王府公主府服役族人或庄头人等犯罪，由慎刑司处决，外臣則否。沈蕙案交刑部审讯，密旨处死，用烧酒糊紙，封其口鼻，气立断。此刑部老法，号曰“打加官”。岑春煊在山西，監赵舒翘之死，亦仿为之。以沈赵俱体健，一时难

于气絕之故。朱君篤老康強，善記往事，輒為濡笔录之。

蘆之死狀，記者非一，几于言人人殊。本編跋曰：“君年三十一。今年六月，君為蔡金台、吳式釗、庆寬等訐發，或謂因清俄密約事。那拉氏命執下刑部，凡三日，遂置之死。君之死也，各極五刑。先以八人輪毆，至二時許，血肉狼籍。气瀕絕矣，以帛勒之，既死而復刃其頭，嗚呼，慘已。”王照有方家園紀事詩，則稱：“沈入獄，時入夜半。宮中傳出片紙，天未明而沈已碎屍。其明年，照入獄，即囚沈死之屋。粉墻有黑紫暈迹，高四五尺，沈血所濺也。獄卒為照言：夜半有官來，遵太上传諭，就獄中杖斃，令獄吏以病死報。沈体壯，羣杖交下，徧体傷折，久不死。連击三小时，气始絕。”是后汪兆銘又入獄，一獄卒為述沈事，汪告人如下：“当沈被捕時，西后即欲杀之，以所謂万寿在邇，乃命杖死。行刑官宣讀执行令，沈面色不改，但曰：‘快了事。’乱杖交下，骨折肉潰，流血滿地，气犹未絕。于是裂其衣幅，塞口鼻及谷道，再杖，气始断。”所記大同小异，終于沈蘆一死，為革命黨增重，天下激劫，清室卒亡。楊守仁吊蘆詩曰：“沈蘆之肉飛如雪，章郅之頸硬變鉄。沈蘆之血流如潮，逐胡之聲愈以囂。沈蘆血肉隨風靡，孕出多少革命鬼。大獄方兴尙未已，伪臨朝武可危矣。”此足代表当时一般呼聲。守仁別有哭蘆轉韻七言長古一篇，中數韻曰：“咄尔獄吏且罢手，絕吾一命容僵殍，儒冠慷慨國民魂，由来恆幹非吾有。杜根辨日庆更生，范睢卷簀終成名，陈尸廊廡待三日，上書負纜非人情。禍兴僞張出誰某，革員吳庆來相守，庆也旧為鷹犬材，吳也頓隨坛坵后。佛兮恩典无濫施，总管語言牢記之，末世衣冠被禽畜，借君一死光門楣。西邸納縉知不足，东林点將非无录，网尽清流赴市曹，安排博士填儒谷。”此詩諷諧严肃，兼而有之，慷當以慨，声声入破如此。最奇者，此詩送至《国民

日日报》，守仁自署蹈海生，盖彼早怀必死之志，卒自以其言以逝。物伤其类，无形而流为语讖又如此。

詩中吳也頓隨坛坵后云者，吳式釗，字楚生，云南保山人，甲午翰林，官檢討，以事誣誤去職。因沈蕙案，有舉發功，開復原官。李根源編《永昌府文征》，于此案一字不提，翻標舉保山吳氏之門族盛大，將式釗所著《彊靜齋文稿》，甄錄無遺。式釗與趙藩為友，稿由藩收存，交根源印發。藩，根源之師也。根源平生為人，忠勇奮發，忠奸義利之辨極嚴；顧于鄉邦文獻，積極方面，用力揄揚吳式釗，消極方面，抹煞周云祥起義，君子不能無讖焉。

一昨復與印泉相遇，談周云祥事。印泉云：“云祥事迹，不見于《永昌府文征》，乃云祥非永昌府人，因地域關係而致遺漏，並無他故。”印泉長者，其言理或然歟？印泉夫人從旁發言：“周大麻子起事地點，離吾家極近。時吾在家作大姑娘，親眼看見大麻子頭顱，懸掛高竿，真吓煞人。印泉不講，我還能反映一些情況。”言殊雋永可錄。周大麻子者，即云祥也。

乙未丙申之間，長沙在學使江標提振之下，文風頓盛。有十二子，詞壇跳蕩，願盼自豪。其中一人為蕙，又一為長沙舒閩祥。時余不過十餘齡童子耳，然以閩祥與余有連，余亦得于文酒遊蕙之末，窺見若輩舉動一二。彼十二子者，有唇紅齒白、跌宕風流其人，因自號十二神，人或謂之為十二金釵，獨蕙適得金釵之反。其人膚色黧黑，面如削瓜，長且在曹交九尺四寸以上。余吊蕙五言絕句四首，其一曰：“當年十二神，餘子真碌碌，老菩向天笑，山鬼慰幽獨”，指此事也。閩祥字菩生，庚子第二年，牽連漢變，成仁于長沙。詩意指十二人中，惟沈與舒為死友。凡余所知于蕙者止此。案唇紅齒白之人，指許崇熙。

西后恨沈氏刻骨，死之惟恐不速，究之原因何在，人鮮知之。或有沈爭俄約，然爭約何乃西后恨至此？吾揣其中必有滿漢生死存亡關鍵，為滿人所萬不能忍者在。太炎祭文中，有以下數句：“津方冥冥兮，歐滿交梓；單于西跳兮，蝸蟻羣沸。假太阿于哲人兮，烹千胡而啖其肺；何大功之不卒成兮，紛叢怨于羣慝？”此必沈蓄意借洋滅清，適居拳民扶清滅洋反面，與龔半倫當年聳英法聯軍焚圓明園之故智相若。倘真如此，亦太炎之所快意，哀辭中大功不卒成云云，如聞其聲。而蘆竟因此犯到敵人必不見赦之罪，而不得其死矣。

太炎獄中聞沈蘆見殺，因亦以死自期。其吊蘆詩云：“不見沈生久，江湖知隱淪，蕭蕭悲壯士，今在易京門。魑魅羞爭焰，文章總斷魂，中陰應待我，南北几新坟？”詩以坟韻為最強，殆必先定坟韻，始索其他韻腳相配，此與守仁“章鄒之頸硬變鉄”適相呼應也。太炎別有《獄中自記》一文，首稱：“鳳鳥不至，河不出圖。”雖寥寥短章，而顯然以素王自居，認定國故民紀之絕於其手。此何等氣概，天下還有第二人敢尸此責乎？太炎從此易字西狩，其為吾草《沈蘆》序文，亦自署西狩而隱其真名云。

太炎為《沈蘆》作序，佚文也，文集兩版都不載，世人見之者亦絕少，故錄之。

沈蘆之杖死於宛平也，余在獄震慟。因以思唐才常林圭等，皆樹勤王為職志，以喪要領，而蘆死獨異，蘆之進化速乎哉！當唐氏建國會時，蘆與其譏。余方以勤王光復，譏論不合，退而毀棄毛髮以自表。唐氏敗，蘆則杖馬箠，走天津，與聯軍諸將士往來，偽庄王、啟秀等，皆死其筆札間。其志將縋滿人，使無遺育，以建設支那政府，其過勤王什佰。蘆之進化速乎哉！勤王之黨，今猶未艾，不鏡於沈蘆以自鞭策，是終身淪

于幽谷。故余弟中黃，輒輯其事狀，以諫往者，而告邦人士大夫伯叔弟兄。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 西狩。

中黃者，時余以避遼察，自詭為“黃中黃”，與黃藻自號“四万万人之一个人”同趣。西狩前已說明，不更述。吾曩言西后酷恨蕙，必蕙有附洋排滿，如龔橙一类事狀。今太炎謂“蕙與聯軍諸將士往來，仿庄王、啟秀等，皆死其筆札間”，洵可為吾說証左。庄王，載瀾。啟秀，軍機大臣，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義和團事起，董福祥攻使館不下，啟秀荐五台僧禦敵，後為日本軍所拘，明年，戮于菜市。

第四十二篇《叙庚子消夏記》，此疑是連文激所為。文激號慕秦，在滬與吾輩至稔。癸卯北京所設經濟特科，文激在梁士詒榜有名，因被新黨嫌疑，遭難南下。而乃兄軍機章京連文冲，則為拳民巨魁，各國駐京公使所指目，罪狀在偽傳清諭，命清兵攻擊天津租界，并圍攻北京使館。文激處此矛盾形勢之下，極為憤慨，因以嬉笑怒罵筆調，寫成此記，以責宣洩。文激與黃藻居室密邇，幾于朝夕相見，吾亦因緣與之相習。時楊度以爭路抵滬，文激約余共訪度，度借詞事冗，拒而不見。度尋告余：此人倚小報為生涯，如《繁華報》等，何可與談正事？蓋其生事不檢，好為捕風捉影之談，頗為士林所薄云。又文中指斥義和團，黃藻大為不滿，跋尾郑重指出。藻意文激附和乃兄時，未始不存僥倖突變之想，事後以成敗論人，且迹近翻復，藻甚鄙之。

第四十三篇《觀戲記》，此必一廣東人為之。廣東人與藻相熟者有江天鐸，不知是否彼之筆墨。

第四十四篇《北曲一套少年登場》，此是黃藻在長沙辦《少年中國報》時舊作。最後鴛鴦煞云：“揮毫組織南北套，苦心演說興亡調。無意發半齣，舌兒焦，唇兒敝，願望兒杳。只要大家呵進步的

速，国民呵回头得早。有日呵义务尽了。酌酒儿看江山，才纪念着我这《少年中国报》。”画龙点睛，栩栩欲活。《少年中国报》发行未久，遇困难而停版。菊人爱酒，好骂人，缺乏干济才，此种以笔墨而兼事务之行业，当然难于在彼掌中成长，言下慨然。

第四十五篇《南北曲一套叹老》，此少年登场相反一面，为黄藻自行写照之作，抑采录他人词，殊难定。其双调新水令曰：“莽男儿意气薄云霄，好乾坤从新构造。挥戈迥落日，磨戟臥前朝，命世英雄，叹我生辜负了。”最后北江梅令曰：“你休象我梦梦天视常昏眊。你休象我摇摇国步常颠倒。你须知勉强支持的不算坚牢，你须知寄人篱下原作不得泰山靠。逝水滔滔，长路迢迢，历许多铁血关头，炼出个英雄年少。便从那二十世纪擘破混元包，打透着二百余州做个富强料。天也牢骚，人也号咷，待大千放出光明，大家欢笑。”想见作者心爱此曲，几案摩挲，浅斟低唱，不知天地间尚有何物攔头作障，是为其一生最美满最欢乐之一俄顷。今其人长往矣，后死之友，手甄遗文，长怀无已，诚不解所感为啼为笑。徒见吐出烟环，恍惚中有人兮，适如作者形貌，冉冉上腾，不断向下招手，欢若平生云。

疏《黄帝魂》四十五篇竟，论曰：编者长沙黄藻，革命党之无名英雄，而古今来一唯己独喻之伤心人也。吾观其例言曰：“近人有撮其旧著若干首，自为一书，名曰中国魂者。其中腐败駁杂，虽为之上穷碧落，下极黄泉，亦不知彼之所谓国魂安在也。且其书多主立宪，欲维持现时清政府，则直谓之满洲魂可矣，于吾中国何有？”此明明遮拨梁启超，而痛心言之。一九一七年，即民国六年，吾为黄蔡会葬返长沙，菊人攜其姪桂棻見訪，談頃刻而退。虽处革命成功之年，而其人頽放不自振如昔。桂棻已易名輝祖，入军队，充旅长，此后

吾即与彼大小阮不复相见。輝祖向严悍余，一九二三年，即民国十二年，余由欧洲再返长沙，则菊人物故，而輝祖避不肯面。或告吾：輝祖行迹失检，虑吾詰責，其实吾于輝祖所为，絕无所知。时隔六十年，昌寿里之拔来报往，小事一惟輝祖是賴，当年吾与叔姪同住新棚区昌寿里，抗战胜利后，吾赴沪重游，里街依旧 远念旧遊，慘怛何极！

甚矣回忆六十年前旧事之难于十分准确也！《黄帝魂》之編者为吾挚友，其书又吾躬自印行，大多数作者，无慮弟兄师友，一德同心，吾所自行执笔之作，且未易一二教，在今日而为此书疏証，适格宜莫吾若。願四十五篇之中，吾細勘之，仍有少数迷阳却曲，难言不誤。蓋吾草此疏时，行年八十有一，鏡函之面目全非，脑海之佹儻靡定，拾来鳞爪，敢謂真龙？此而重行訂正，不得不属望于勤攻史迹之少年同志，謹此預謝，慚惡曷任！

文学社与武昌起义紀略*

李 六 如

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全面爆发的火炬，是中国近代革命史光辉的一頁，然其实情，在过去知者甚少。解放以后，出版了不少关于武昌起义的书册，但其中所载，也有不完全一致的地方。茲就我所知道的扼要叙述，不加批判，借供研究。

大体說来，武昌起义是由一部分知識分子起领导作用，以学术团体为幌子，以新軍为主力而发动起来的。由酝酿到发展，由成功到分化，貫彻始終、一脉相連的革命团体，最初是科学补习所，日知会，以后是羣治学社(后改名为振武学社、文学社)，还有它的同盟軍共进会，这是武昌起义的两个主要团体。他們把力量直接寄托于清朝的新軍，使它逐渐变为自己的革命武力。文学社与同盟会，是在武昌革命运动酝酿成熟之际，才发生联系，受其领导。起义后，文学社員集体加入了同盟会，故后来談武昌起义者，只知有同盟会，而文学社及共进会等反被遺忘。其始末略述如下：

(一) 从科学补习所到日知会

自甲午、庚子事变后，由于清廷銳意变法，办学堂、建新軍，派

* 本文原题为《武昌革命运动史略》，是作者在一九四二年为紀念辛亥革命三十周年而作的，載同年十月十日延安《解放日报》；这次收入本书，經過作者略加补充和修改。——編者

遣学生到东西洋留学，而尤以留学日本者居多，因此西方民主革命思想传播日广。孙中山先生于一九〇五年在日本东京创办同盟会，两湖和江苏、浙江、广东等省人士加入者最多。除同盟会所办的《民报》外，其他如《湖北学生界》、《洞庭波》、《猛回头》、《浙江潮》等宣传革命的书刊，以及《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等记述清朝入关时屠杀汉人的书籍，秘密流传，风行一时，两湖人士最受影响。两湖总督张之洞又在湖北积极开办学堂，兴建工厂，编募新军，这些措施，在客观上也为武昌革命运动准备了条件。

约在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年），湖北学生吕大森、曹亚伯、刘静庵、张难先等与旅鄂湘籍学生宋教仁、胡瑛等，组织科学补习所于武昌，主张革命要从运动新军着手。因此，张难先、胡瑛先后投效第八镇工程营当兵，在军队中宣传革命；同时，宋教仁回湘，与黄兴、刘揆一诸人组织华兴会，并设东文讲习所于长沙。后被湘省劣绅王先谦侦悉，密告湖南抚台陆元鼎，陆又电告张之洞，将长沙的东文讲习所与武昌的科学补习所解散，宋教仁等被开除学籍。

约在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同盟会会员湖北人曹亚伯由日本归国，与张难先等重整旗鼓，成立日知会（借基督教圣公会附设的日知会名义）。其时，清廷派铁良检阅各省新军，认为湖北新军训练成绩冠各省，奏请嘉奖。张之洞便乘此机会，奏请扩充湖北新军为第八镇及第二十一混成协，以张彪为第八镇统制，以黎元洪为二十一混成协协统；创办陆军特别学堂，实行学兵制，即先行入伍后进特别学堂当学兵，并规定入伍新兵，须作论文一篇，以为取舍。因此，学生投军尤其投入混成协黎部者甚多。

次年，湖南党人王永求、陈亚龙等起义于浏阳、醴陵、萍乡，有众数万人。胡瑛等在鄂谋响应，被沔阳郭瑤阶侦知告密，日知会被

封，刘静庵、张难先、胡瑛等下獄。湖北革命运动从此消沉了一二年。在这期間，黎部軍中有一部分士兵，曾組織軍隊同盟会，有會員一二百人，并开过一次成立大会，后因受到压力，主持人任重远又离鄂入川，不久即无形解散。

(二) 从羣治学社到文学社

羣治学社时期：自日知会解散后，湖北革命运动趋于消沉，而广东的惠州、欽州等地举事，安徽的徐錫麟、秋瑾、熊成基等人起义，彼仆此繼，清廷的注意力因而轉移，对两湖戒备逐渐松懈。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湖北与江苏各省新軍在安徽太湖秋操时，慈禧、光绪相继死去，黎部士兵湖南人楊王鵬^①、鍾崎（均是知識分子）、章裕昆等，即趁此时局动盪机会，开始組織羣治学社这个秘密团体。为了防止被破坏，表面上以研究学术、提倡自治为宗旨。在宣言中，带有政治色彩的仅有“我中国……积弱无能，任人欺侮，台湾朝鮮相继沉淪……倘不急起直追，則危亡悬于眉睫”这几句話。它的組織相当严密，其簡章規定：須得三人以上介紹，經派人談話考察，认为与本社宗旨确实相合者方得入社。且征求社員，限于軍界及武学堂，并只限于士兵，不要官长。羣治学社初成立时，人数不多。至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各省扩充新軍，从湖北选調了許多尉級軍官和士兵去任干部。羣治学社就利用这机会，派社員鍾崎等赴江苏，邹濶猷赴安徽，邓刚赴奉天，楊王鵬赴上海，分別向各地新軍开展工作。鄂軍方面，由于在黎元洪部下当士兵的

^① 楊王鵬在一九一三年反袁时被湖南督軍湯壽銘杀害于长沙。

該社負責人楊王鵬升任第二十一混成協四十一標一營左隊司書生，得與隊官潘怡如^①契合，乃破例邀潘加入羣治學社。在潘的庇護下，該隊成為學社的大本營，故進行革命活動極為順利。不久，楊王鵬隨軍開拔，社務改由李六如負責主持，即與詹大悲^②、劉復基等創辦《商務日報》於漢口，革命運動更日益發展。未及一年，羣治學社在第八鎮及第二十一混成協的各標、營、隊，以及陸軍中學堂、陸軍特別小學堂，都建立了很嚴密的各級代表制度，如身使臂，如臂使指，運用很靈活，社員人數也陡增不少。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年）春，川粵漢鐵路風潮發生，湘省諮議局派代表赴清廷請願時，適力主借外債修鐵路的湘人楊度過漢力阻代表晉京，李六如、劉復基等便邀集旅鄂湘人數百人（其中大部分是學生），到漢口英租界既濟水電公司抓楊度來湖南會館開會抗爭。劉復基、李六如等數人被英租界當局捕入獄中，余被驅散，《商務日報》也因此被封，羣治學社的活動遂大受影響。此時，長沙發生飢民搶米暴動，焚撫署，羣治學社的李六如與共進會的黃申蓀等建立初步聯繫，準備響應未成，社名却已暴露。幸虧學社機關設在軍隊內部，不易覺察，雖然全城戒嚴，到處搜查，團體未被破壞。

振武學社時期：羣治學社因為上述影響，於宣統二年冬改名為振武學社，仍由楊王鵬、李六如負責。為了加強軍隊工作，將劉復基、蔣翊武^③先後介紹入黎部四十一標當兵，在士兵中進行活動，並吸收不少社員。劉復基是留日學生，有才智，自他入伍當兵後，軍隊中的革命運動更加發展。羣治學社與共進會建立聯盟關係，

① 潘怡如以後加入了共產黨，一九三八年病逝於新四軍解放區。

② 詹大悲在大革命失敗後，一九二八年被殺害於漢口。

③ 蔣翊武在一九一三年反袁時被廣西督軍陸榮廷殺害於桂林。

便是出于他的主张。宣统二、三年間，武昌革命势力已遍布新軍各标、营、队和各武学堂，只有防营、水师沒有打进去（其他各文学堂、各工厂沒有基础）。瑞澂任两湖总督后，特別注意防范新軍。二十一混成协司令部的施化龙偵知第四十一标一营左队是革命党人大本营，密报黎元洪加以搜查，因未获证据，只将潘怡如、楊王鵬撤差，将李六如及鍾倬寅等刑訊开革，軍中戒备更加严密。武昌革命运动，至此复形停顿者約两三月。这是辛亥年头年冬末的情形。

文学社时期：辛亥年阴曆正月，因为振武学社大受影响，才又改名为文学社，由蔣翊武負責。在这半年中，全国的革命形势突飞猛进，除轄重第八营以外，它的細胞組織已布满了湖北新軍各鎮、协、各标、营、队，在士兵中社員占了多数。至于他們的成分，因为当时新軍是招募制，絕大多数是失业农民和少数手工业工人出身的士兵，沒有官长，知識分子也少。

（三）武昌起义前后的情形

文学社与共进会訂立正式同盟：文学社的基础全在新軍，而共进会（負責人孙武）則是与同盟会有点联系的，組織虽然散漫些，但却比較广泛，它的會員有会門成員下层羣众，有知識分子，也有陸軍中学堂学生和陸軍特別学堂学兵，还有些新軍中的士兵。辛亥年阴曆三月二十九日黃花崗起义失敗之后，文学社便与共进会訂立正式联盟，共謀起义，并将《商务日报》的后身《大江日报》加以充实，同时还分派社員到湘、川、皖、苏各省新軍中为联络员；又于軍隊之外，建立机关部、通訊部等秘密組織。

与同盟会开始联系：辛亥夏，同盟会总部派譚人凤来鄂視察，

拟与湖南的焦达峯等組織中部同盟会。譚往《大江日报》晤詹大悲，始知有文学社之組織，乃邀詹約同蔣翊武等商談。这是文学社与同盟会总部联系的开端；在这以前，只有极少数同盟会會員参加文学社，而且是自发的个人活动。

成立湖北革命軍总指揮部：辛亥年阴曆七月，文学社与共进会联合决定：成立湖北革命軍总指揮部于武昌小朝街文学社总机关部內；文学社的蔣翊武、王宪章为正、副总指揮，共进会的孙武为參謀长；总指揮部下設軍事筹备处于武昌，設政治筹备处于汉口；派居正、楊玉如二人赴沪，邀請宋教仁諸人来鄂主持大計。部署既定，即賃定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为政治筹备处，制定文告、旗帜、符号、地图等，准备大举。

因鄂軍被調入川，提早起义：阴曆八月間，四川发生铁路风潮，清廷派端方率兵前往鎮压，鄂督瑞澂亦将派鄂軍第三十一和第三十二标随端方入川。文学社与共进会恐軍隊調散，影响大举；决定就在阴曆八月起义。但楊玉如到沪晤宋教仁时，宋告以各省布置未妥，須延至阴曆九月約十一省同时起义，便打算延期。詎孙武在汉口制造炸弹失慎，发生爆炸案，武汉戒备搜索甚严，故不得不仍照前議，于八月起义。

机关部被破获：阴曆八月十八日(阳曆十月九日)下午五点钟，由总指揮蔣翊武发出作战命令，計有十条。第一条是：“本軍于今夜十二时举义，兴复汉族，驅除滿奴”；第二条是：“本軍無論战守必須恪守紀律，不許扰害同胞及外人”；第三条至第九条均系作战部署，第十条是：“余十二时在机关部，十二时后在諮議局。注意：本軍均以白布系左膀为标志。”作战命令中，本規定于十八日晚十一点半鐘，由駐武昌中和門外的第八标炮队鳴炮为号发难的，但因前

往炮队送命令的邓玉麟贻误，炮队未接到命令，以致未能如期举事。与此同时，机关部被破获，所有名册全被搜去，刘复基、杨洪胜、彭楚藩等十余人被捕，仅总指挥蒋翊武越墙幸免。

工程营仓卒发难：十八日夜，督练处督办铁忠、武昌知府双寿审判上述案件时，见案内尽属现役军人，大为震惊，深恐因此酿成巨变，曾一再向瑞澂请求从宽处理，并主张当众烧毁名册，不予追究。但瑞澂坚决不允，将刘复基、杨洪胜、彭楚藩三人于当夜处死，同时按照名册，大肆搜捕。此时，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已是羣龙无首，身列名册之内者，固有被捕危险，即不在其内者，也受连累，人人自危。在羣情愤激之下，于阴曆十九日（阳曆十月十日）夜九时许，由第八镇工程营共进会会员熊秉坤等士兵仓卒发难。各标、营、队均仍按作战命令同时动作。各标管带以上军官均纷纷如鸟兽散，仅有极少数队官排长临时参加起义。鄂督瑞澂闻变，以电话向各镇、协调兵，无一应者，仅辖重第八营管带萧安国及少数防营在督署街扼守而已。故不数时，起义军便占领武昌各机关，瑞澂、张彪等文武官吏均抱头鼠窜。

拥黎元洪为湖北大都督：次日黎明，各起义部队代表和地方士绅甚至宪政派等，都纷集在諮議局一起开会，临时推出黎元洪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北都督”。黎避匿不出，被武装一再威逼，拥至諮議局，迫不得已才勉强就职。乃用黎元洪名义发出《告全国父老书》和各项布告文电，改元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设台祀黄帝。《告全国父老书》的大意是宣布清朝政府腐败，特别指出“弃城割地，抵赖卖路”，但其政治主张只说到“推翻专制，恢复汉业，建立共和政体”，没有什么其他明确纲领。

领事团守中立：当时革命军有两个重要口号：“不准侵犯汉

民”，“不准危害外人”。所有军队纪律甚好，秋毫无犯，只是杀了一些旗人。在汉口作战时，许多市民争送茶水果食慰劳，市廛不惊。当占领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后，军政府即派外交部长胡瑛向各国领事交涉，要求他们承认民国军政府，严守中立，并以都督黎元洪名义，正式照会驻各国领事，计共七条：

- 一、所有清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
- 二、赔款外债，照旧担任，仍由各省按期如数摊还；
- 三、居留军政府占领地域内之各国人民财产均一律保护；
- 四、所有各国之既得权利，亦一律保护；
- 五、清政府与各国所立条约，所许之权利，所借之国债，其事件成立于此次照会后者，军政府概不承认；
- 六、各国如有助清政府以妨害军政府者，概以敌人视之；
- 七、各国如有接济清政府以可为战事用之物品者，搜获一概没收。

此时，鄂督瑞澂、新军第八镇统制张彪、水师统领陈得龙等率残部在刘家庙顽抗，亦派员与领事团交涉，要求外舰炮击武昌。各国领事不同意，结果决定保持中立，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

清兵南下：阴曆八月终，清陆军部大臣廕昌率兵南下。这时候，武昌三镇以及驻宜、沙、汉水各地新军，均已反正。廕昌在汉口吃了好几个大败仗。清军在退却时，沿途人民持斧挥锄加以截击，夺获枪械不少。汉口商人亦派人持酒肉赴前方慰劳民军，抬送伤兵。迨九月初，清廷派馮国璋的第一军与段祺瑞的第二军沿京汉路南下，派海军萨镇冰率军舰沿江西上，夹击武汉。因黎元洪原是萨镇冰的学生，乃用黎的名义，修书派人劝萨，萨便逗留不进。刘家庙之役，馮军战败，火焚汉口，退守三道桥。不久馮军又倾巢来

犯，革命軍敗退刘家庙。

革命軍退出汉口、汉阳：这时湖南已經独立，并派王隆中率軍来援。黄兴亦自沪来鄂，被公举为战时总司令。于是軍心大振，人心亦定。清廷下詔罪己，起用袁世凱为內閣总理大臣，授以全权。袁一面与革命軍議和，一面大增援軍。馮国璋得援，于九月中旬攻下了汉口。十月初，段軍大部增援，攻下了汉阳，革命軍退守武昌。黄兴辞职赴沪，黎元洪逃避于离城六十里之王家店，改以蔣翊武为战时总司令。

和議告成：袁世凱攻下汉口、汉阳后，一面用炮击威胁武昌，一面却又按兵不进，并請汉口領事团出面調停，先行停战。这是袁世凱企图要挟清廷、从中取利、攫夺革命果实的阴谋手段。在此时期，湘、皖、贛、苏、浙和两广等各省俱已宣告独立，組織联軍，准备北伐。广西的沈秉堃、江西的黎天才各軍均已先后到鄂。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南北双方代表唐紹仪、伍廷芳在沪議和，經過一、二月時間，和議告成。

(四) 湖北革命党的分化

刚刚停战，同盟会鄂支部便已成立了，覃振任支部长。袁世凱間接派奸細孙发緒等到鄂，嗾使黎元洪乱杀党人；高間共进会与文学社之关系，使两个团体发生暗斗：推倒了蔣翊武的战时总司令职，暗杀了文学社員第二鎮統制张廷輔，明杀了祝志六、江光国、滕亚光等，于是两派水火，逐漸分化。文学社全体加入了同盟会；共进会則有的加入了同盟会，也有的加入了进步党。不久，同盟会又和其他許多党派合并为国民党。这时候，袁世凱看到武昌成为全

国政治中心,有碍于他篡夺革命的果实,就一面用种种手段进行挑拨离间(如嗾使黎元洪杀张振武等),一面用调虎离山之计,诱黎元洪、蒋翊武诸人离汉赴京,以削弱、摧毁武昌这个政治中心和湖北的革命力量。所以,在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以前,湖北革命势力,实际上早已被他这些阴谋手段摧残殆尽了。这是革命历史上值得很好吸取的一个教训。

黃花崗起義與炸斃鳳山親歷記

陳其尤

(一) 三月二十九日廣州起義之役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起義之役，七十二烈士殉難（實際不止此數，後經陸續查明補入史冊的尚有多人），合葬於黃花崗，故亦稱黃花崗之役。茲役是整個辛亥革命運動中的一個重要部分，也可以說是後來推翻清朝統治的武昌起義的前奏。此次惊天動地、英勇壯烈的起義雖然被清朝統治者殘酷鎮壓下去，但從此大大激發了人民羣眾的革命意志，促進了我國民主革命高潮的到來。起義失敗後，清廷兩廣總督張鳴岐在審訊這次起義攻打總督署被捕的革命黨人的時候，看見他們臨難不屈、敢指罵賊的革命精神，為之驚惶喪膽。故他在奏報清廷的所謂“廣州亂黨起事經過情況”的電文中，悲嘆“人心如此，天意可知”（此電在民國成立後從清廷廣州總督署檔案中發現）。由此可見，此次起義震撼了清朝的統治。

我在辛亥前一年加入同盟會，暗號為恢字輩。革命黨指派給我的任務，是與同鄉陳潮（七十二烈士之一）等住在旗下街，擔負在起義時放火焚燒旗人聚居的旗下街以擾亂敵人軍心的任務。後來因清廷駐廣州將軍孚琦被暗殺，敵人加強戒備，我們因無眷屬掩護，被巡警迫令遷出。組織上遂派我住到當時的總督署右旁、現在的

中山紀念堂左边的蓮塘街一处准备进攻总督署的据点。我和胡珮嫻、何少卿两位女同志同住那里，以姊弟关系作为掩护。三月二十九日起义前数天，組織又調我到仙湖街始平书院看管一个秘密儲藏軍械炸彈的机关。当时因革命党准备起义风声洩露，甚至“乱党准备起事”的消息报纸亦有登載，情势甚紧，仙湖街始平书院一带突然有巡警日夜巡邏。始平书院是我們儲藏軍械的重要机关，我看到这个情况，立即到司后街陈炯明公館向他报告。那天刚巧黄兴早上从香港秘密抵广州到炯明处，正在商談起义之事，他們一起听取我的报告。我說現在起义尚无确期，万一巡警闖入书院搜查，不但事机洩露，全部軍械被破获，整个起义亦将受到破坏，建議組織发給我处守卫人員（均为海陆丰的同乡，精壮的农民兄弟）利刃数柄，以便輪流在內門防守，如果巡警闖入搜查，則以利刃对付，把他們解决，不必开枪，以免惊动敌人。黄、陈二人同意我的建議。黄說他在小东营的公館藏有利刃，囑我待他回去后，隨即去取。我們在陈炯明处同进早餐。黄离开不久，我即如約前往，黄兴囑徐宗汉（当时黄兴的亲信助手，后来与黄結婚）从床底下检出利刃八柄交給我。

广州起义原来預定在三月二十五、二十八日或四月一日或更迟一些時間发难，后来临时改在三月二十九日起事，是因为当时情势突然变化，革命党准备起义的风声已传遍广州，我們的一些組織已被敌人破获；又因为当时策动省内駐軍及巡警教練所學員到时反正响应起义的事机又被洩露，水师提督李準将他亲信的巡防营急从外地調回省垣加強防御，以致原来答应到时响应起义的駐軍和巡警教練所的學員发生动摇。由于上述情势的突变，同盟会就不得不改变原定的計劃。虽然还有一些訂购的軍械及华侨捐款尚未到齐，但此时革命行动已到了如箭在弦、非发不可之势。黄兴認

为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提前起义，所以临时决定起义提前在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时三十分实行。

当时起义队伍原拟分十路发动，在这十路之中，黄兴率领的主要一路担任攻总督署；陈炯明率领的一路担任攻存儲大量枪械的巡警教练所，准备夺取枪械，并争取教练所学員反正，响应起义。我們这一路队伍多住在仙湖街始平书院。我和几个在广州讀書的同乡同志因懂广州話并熟悉路径，故被选派为陈率领的这一路的先鋒督队。起义前夕，发給我們到时纏在手臂作为标志的白毛巾一条，对時間用的鋼壳手表一只，并决定在陈公館出发时每一督队再发給手枪一枝。三月二十九日清早，我們督队的人到司后街陈公館，听取最后指示。当时陈炯明宣布当天下午四点钟再到此处集合，帶領队伍出发。我和另外两位督队的同志遂到总督署前卫边街一家飯館吃午飯，在飯館故意拖延時間。直到下午快到四点钟，才同往陈公館。岂料到达时，門戶洞开，屋內闐无一人；再进内宅，則見蚊帳被盖书报等狼籍滿地。我們初时以为机关被破获，急急走出，打算由双門底逃出城外。出門后，即听到稀疏的枪声，我們不知底細，匆匆走到双門底轉永汉路。此时城門关闭，不能出去，幸我平日熟悉路径，乃拐入广府中学宿舍青云书屋找姓卓的同乡处暫避，适卓外出，我也只得留下来。此时，旗下街已报火警（这是前面所說的我們所布置下的行动），火警钟声大作，全城行人絕迹，鋪戶都关上了門。翌日清早，一队巡警来到青云书屋搜查，才知道从昨晚起，他們即挨戶搜查革命党人。巡警把我掀起搜查和盘問。我因留有辮子，同时白毛巾我早收藏起来，他們又不懂得我所佩戴的鋼壳手表的用处，幸而得免于难。及至近午，我偷偷出外打探情况，看見永汉路城門半开，已有行人走动，守軍对出城的人搜查盘

問后可以放行。我在广州已失掉与陈炯明的联系，只得乘机出城，搭佛山夜船往香港，与同盟会领导机关联系。在船上，我遇到同盟会一位负责人姚雨平同志（现在任广东省参事室主任），他也是从广州逃出准备前往香港的。姚在我看管始平书院军械储藏所时，曾持黄兴的亲笔信向我提取军械，是我认识的人中之一^①。我和姚在船上密谈后，才得悉昨天下午起义的一些情况。

原来，事前商定的十路同时起义，有的因为对起义时间有误会，未及时发难；有的因交通问题，未能及时赶到广州。而陈炯明临时没有率领队伍参加起义的原因，是陈认为事机既然洩露，情势突变，提前起义，不但攻打教基所必然失败，即全局亦无获得成功的希望，不如改期发难，以保全实力，乃于起义前刻派马育航到黄兴处主张改期。但此时黄一切已准备就绪，并留下绝命书，正戎装待发，反对改期起义。他当时推开马育航，径自率领队伍向总督府进攻。陈炯明见改期不成，即逃出城外，躲藏于河南尾珠江水面一个同乡亚弁的盐船里。如上所说，我们在起义当天下午四点钟到陈公馆时，他已离开，原来是他临阵脱逃了。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失败之后，黄兴和胡汉民曾联名致南洋的同盟会机构报告起义经过，函中对陈炯明等在起义中表现不力的一些负责人，曾有所指责。

（二）炸清将军凤山之役

辛亥革命前夕，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剥削和帝国主义列强痼

^① 邹鲁在他撰著的《中国国民党史稿》中说：“黄兴令陈其尤偕（姚雨平）往始平书院领取（枪枝炸弹）”。实际上不是我偕同姚到始平书院，而是姚持黄兴亲笔信到始平书院向我领取枪枝炸弹。

狂的侵略，大大激发了我国人民的革命思想。到辛亥这一年头，广州方面民气沸腾，革命情绪之高涨，几乎不可遏制。此时同盟会在香港的秘密统筹机关，根据形势，采取相应策略，决定狙击清廷大员，先除障碍，并寒敌胆，以壮大革命的声势。于是辛亥三月初十日，有归国华侨温生才烈士出于义愤，自发地枪杀了清廷驻广州将军孚琦（时孚琦从燕塘参观飞机表演后，归途经东门外）。接着不久，在閏六月十九，双门底有陈敬岳、林冠慈等行刺水师提督李准之举。是役李仅受伤未死，陈烈士中弹而亡，林烈士被捕遇害。这两次壮举，加以三月二十九黄花崗之役英勇悲壮的起义，极大地鼓舞了革命士气。两广总督张鸣岐坐卧不安，徬徨无措，奏请清廷派将军来粤坐镇，企图以武力威吓革命党人和镇压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不久，清廷选派了军事上号称足智多谋的旗人凤山为驻广州将军。但发表多时，凤山慑于革命声势，踌躇不敢南下。经张鸣岐力促，凤山才配备了一班人马，于九月初三由北京经上海坐船到香港，然后转广州接任。

同盟会香港组织探悉凤山要来广州，早就决定要除掉他，遂指定我和李熙斌主持此事。其所以指定我们两人，是因李能制造炸弹，我则介绍了周惠普女士担任到时行刺。周是广州两粤医学堂的学生，长得高大强壮，富爱国热情，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清廷的腐败十分愤慨。她知道我是革命党人，颇表倾慕，一再恳请我介绍她参加同盟会。我经过一个时期的了解观察，遂为介绍。有一天，她看见报载凤山将要来穗，向我自荐说：如果得到组织的信任，她愿意担任刺杀凤山的任务。我往香港向组织报告，得到许可，给我港币二百五十元作活动费，指定李熙斌和我负责分头进行。李供应炸弹，我则和周联系并布置一切。我回到广州之后，和李熙斌密

商，头一件要办的事是择地租屋，以备行事。当时将军衙門位于惠爱中路，历来清廷将军到任，都是从长堤登岸，然后乘轿取道归德門轉惠爱路入将军署。我們估計凤山仍必循此路綫，不致变更，乃决定在归德門一带租屋，着手布置。但这一带商业薈集，租一間房子很不容易。我們找了许多时仍无着落，感到非常焦急。后来看見归德門街当冲地点有一妇科西医李仁軒医館，湊巧李仁軒又是周惠普的老师，我們情急智生，决定放弃租屋的計劃，改为利用李仁軒医館行事。我們准备到时由周用籐手籃携带炸弹到李的医館，佯称偶尔路过，順便拜訪老师，在該医館等候凤山經過，走出門口拋擲炸弹。此时一切計劃已定，只候凤山到穗。在等候的期間里，我們三人經常到郊外沙河息轍亭的地方密談，并給她拍相片，存作紀念。一日，周惠普要求我在她牺牲之前帶她到香港見見同盟会的領袖陈炯明等。我虽然知道这样做对保守机密不大适宜，但为了照顧她的情緒，还是同意了这一要求，帶她到香港。到港后，組織派一个代表接見她，对她加以鼓励安慰，囑她好好听我的指导行事。当晚我們乘船回广州，周以不得領袖們亲自接見，有些不快，我只好婉言加以說服。不數日，我接駐港組織密电，告知凤山已到港，准明早到穗。我即走訪李熙斌作最后决策。李說炸弹已准备好，爆力甚強，并約定我和周惠普第二天早上到他的寓所取用。到时我們依照計劃进行，預备下手。岂料此时凤山到广州后，为了防备革命党人袭击，突然改变向来慣例，不經归德門而取道偏僻的仓前街。狡猾的凤山虽然避开了我們这个伏击点，但当他經過仓前街的时候，被同志李沛基从一間租用的小鋪子樓上滾下的巨大炸弹所炸毙，他的随从多人同时亦被炸丧命。事后，省城各报館紛紛出版号外，并将凤山被炸得模糊一团的尸首附图刊出。这个消息

馬上轰动广东全省，爱国同胞拍掌称快。原来同盟会领导方面除了布置我們設在归德門的伏击点之外，同时还在仓前街布置了另一个伏击点，以策万全。为了保守机密，領導上事先沒有告訴我們，所以我們两方面都互不知道。炸燒凤山的李沛基是黃兴先烈的夫人徐宗汉的亲属，他的年紀比我还小，当时只有十七八岁。

九月十九日，总督張鳴岐出走，广东宣布独立，成立都督府，胡汉民、陈炯明先后任都督。当时因我們还年青，为了培养后进，政府乃以有功民国的名义派送我們出国留学。我被派往日本，李沛基和李熙斌則被派往美国。后来，听说李沛基不幸在美国病逝，李熙斌回国后在岭南大学当教授。至于周惠普竟于民国后在广州遁入空門，削髮为尼。当时我因去日本讀書，一直沒有和她見面通訊。直到解放后，一九五二年我在广州聞悉此事，曾特別去寻訪过她一次。

辛亥前后十年杂忆

李根源

甲辰(一九〇四年)七月,我由滇省考送日本留学,入振武学校习陆军。次年乙巳四月,见黄克强先生于东京。六月,偕杨秋帆(振鸿)、罗鎔先(佩金)见孙中山先生于横滨,有陈天华、匡一、刘揆一、仇亮及日人头山满、宫崎寅藏等在座。中山先生勉励我等,谓:“革命是艰苦事,要卖命。”七月,同盟会成立,我即加入,并忝列同盟会第一次开会签名单中三十七人之列。

乙巳年底,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后,孙、黄两先生为扩大宣传革命,又号召各省留日学生筹办地方刊物。丙午(一九〇六年)一月,同盟会开会。会毕,孙、黄两先生约我与杨秋帆、罗鎔先、赵直斋(伸)、吕志伊(天民)五人谈话,以筹办《云南杂志》之事相嘱,略谓:“云南最近有两个导致革命之因素:一件是官吏贪污,如丁振鐸、兴祿之贪污行为,已引起全省人民之愤慨;另一件是外侮日亟,英占缅甸,法占越南,皆以云南为其侵略之目标。滇省人民在官吏压榨与外侮凭陵之下,易于鼓劲奋起,故筹办云南地方刊物为刻不容缓之任务。”我等接受此一任务后,即着手筹备。四月间,云南杂志社成立,假东京神田区三崎町一丁目云南留学生同乡会一部分房屋为社址。我以云南留学生同乡会会长关系,与赵直斋被推为干事,负责全部工作。总编辑原推吴錕、周鍾嶽担任,嗣因

吳急須去北京，周回滇，皆未就。遂改推張鎔西（耀曾）為總編輯，席上珍、孫志曾為副編輯。經費由杂志社致函國內同鄉與緬甸、越南華僑勸募，共募得萬餘元。

是年八月二十八日（公曆十月十五日），《雲南雜誌》創刊號出版。雜誌出版以後，由於盡情揭露清朝政府之貪污腐化與帝國主義之侵略野心，受到雲南人民熱烈歡迎。最初發行份數僅為千冊，至戊申年（一九〇八年）刊行至十三期時即增至數千冊。戊申年七八月間，因受《民報》為日警查禁之影響，曾一度停刊。編輯十六期時，又因趙直齋與李英奇在寓所習制炸彈事泄，日警前來搜捕，雜誌再度停刊。幸得日人宮崎寅藏斡旋之力，得以復刊。辛亥武昌起義後，《雲南雜誌》始結束，共發行二十三期。此外，戊申年元月杂志社舉行周年慶祝會時，我與呂志伊被公推編輯紀念特刊，網羅滇中明季遺事，輯成《滇粹》一冊，於是年八月出版。

雲南光復，《雲南雜誌》宣傳革命之功實不可沒。我曾有小詩兩首，以紀其事。其一云：“實行革命有同盟，莽蕩風雲萃眾英；《民報》挺生誰拱衛，《雲南雜誌》是尖兵。”其二云：“鬥爭不懈歷有年，此中艱苦只自憐（劉九疇任杂志社總務，勞瘁而死）；那得卿雲重九現（辛亥重九彩雲現，雲南光復），留將文采照南滇。”

戊申年四月，克強先生起義於雲南河口，楊秋帆結黃毓英、杜鍾琦、何偉伯、何漢、李克鼎、段寬、王九齡等歸國為助。我與趙直齋、呂志伊倡設雲南獨立會，開大會於東京錦輝館，以為聲張，到者近萬人。暑假期中，我奉孫、黃兩先生命，在東京成立大森體育會，為革命黨人講授軍事學。同任教者有趙康時、仇式匡。參加學習者有林時瑣、焦達峯、陶成章、劉揆一、喬宜齋、趙伸、孫武、夏之時、張大義、劉九疇、李貞白、李奇英、包紹杰、吳永樞、熊瑛藩、喻培倫、

张金三、段雄、丁石僧等七八十人。

秋帆抵海防时，河口起义已失败，乃转入缅甸，在仰光与胡汉民、居正、张石泉（成清）创办《光华日报》，嗣即归国，图在滇西保山起义；事泄，十二月十一日呕血死于保山附近之蒲缥。

己酉（一九〇九年）四月，我见习士官毕业（丙午五月振武学校毕业后，即入士官学校步兵科）。护理云贵总督沈秉堃事先曾来电调我回滇。吴绶卿（祿貞）时任延吉边防督办，亦请准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约我到奉天。我应绶卿之约，取道朝鲜抵奉，寓绶卿家。我到沈之日，徐世昌已调邮传部尚书，锡良继任东督，委我以兵备处提调。我本不欲就，然以秋帆之死，痛切于心，思欲借机刺杀锡良。临行密告同学张华飞（世膺，时任陆军小学堂总办），遂赴督署，先至文案刘仲武处待见。仲武正留我早餐，绶卿忽派人持信来，促我即回。我回寓，始悉华飞已将我之密谋告知绶卿，故绶卿急召我回，并赠我三百元，派人送我入京。我既不可留，只得一走，并封还绶卿所赠金。

我到京后，为同学杨集群向寿勋、良弼告发，谓我曾在北京开云南独立大会，确为革命党。寿勋、良弼传见，问云：“在北京主持开云南独立大会者是汝否？”余不承。良弼云：“不是也好。”遂命余退，无他语。幸赖同学谭典虞、葛覲宸、马孟庄等力事解脱，得不扣留，命我在京候考，不得擅离。在安定门白衣巷被软禁月余，监视渐懈，乃潜出崇文门，过天津，见云贵总督李经羲，李催我回滇。旋经上海入广东。广西提督龙济光派人迎我至南宁。我见济光阴狠狡诈，好利而无远志，滇护督沈秉堃又迭电促归，乃经龙州取道越南回滇。时蔡松坡在桂任新军标统，我与松坡在日本时仅曾一面，至是始订交。松坡后经罗鎔先与我向滇督李经羲推荐，于辛亥年

春調滇任三十七協統領。

我于七月十四日抵昆明，次晨見沈秉堃，当晚即委我任云南陸軍講武堂監督兼步兵科教官。沈秉堃对我頗信任，呼我为“李學生”，命我尽速筹备，于中秋节开学，一切听我主办，决不牵制，并告糧餉局負責人：“以后李學生如要用錢，須尽力支持。”八月十五日，講武堂如期开学。學生分为甲乙丙三班，共四百余人。我請准沈督電桂，調羅鎔先回省，任十九鎮隨營學堂監督兼講武堂步兵科教官，并邀李烈鈞、方声涛、趙康时、韓凤樓、沈汪度等黨人來校任教，日以革命大義激勵學生，以是種族之辨、人權之說深入人心。次年，隨營學堂學生二百余名併入講武堂丙班，鎔先亦調充督練處參議官兼陸軍小學堂總辦。講武堂總辦高爾登去職，以我繼任，沈汪度、張开儒分任監督、提調。至是，滇省軍事教育全權悉握諸吾輩革命黨人之手。而講武堂乃成为云南重九革命之基礎。

己酉年初，云貴總督李經羲來滇履任，护督沈秉堃調广西巡撫。自是以后，靳云鵬、鍾麟同、王振畿等北洋軍人对我輩黨人傾陷不遺余力，幸我等團結一心，諸事謹慎，使彼等无隙可乘。李經羲与云南提學使叶尔愷等对講武堂學生思想行動偵察甚严。堂中學生因受革命思潮激蕩，爭相傳閱革命書刊，且相率剪去辮髮。事为叶尔愷所知，密報李經羲，學堂几遭解散。經我等多方应付，竭力維護，革命力量得未受摧殘。然李經羲自此对我即有戒心。庚戌（一九一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英軍進犯片馬。李委我辦理片馬防務，并會同迤西道籌辦交涉事宜，窺其用意，殆欲借机調我出省。

我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出发，躡高黎貢山后，化裝深入他夏英軍駐地偵察，并雜土人小販中露宿英軍營外者二日。旋經腊幸入騰

越，会同迤西道与英領事交涉。未一月，英兵退去，乃測勘騰屬七士司及各关隘要地，并条陈經營怒江沿岸地区办法十条。未几，广州三月二十九日起义消息传至騰越，我又接沈汪度电告，謂蔡松坡抵滇，促我速归。我一面电請旋省，一面不待复即兼程赶回，于閏六月初八日抵昆。李經羲責我不待后命即归，甚不滿。未数日，李即夺去我耕武堂总办职，調任督練处副參議官，并将堂中暗存之武器弹药尽数搜去，監視益严。

八月初十日，李經羲命我与蔡松坡、殷承獻、韓凤樓等筹备冬季大操，住宜良法明寺旬日。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我等得訊，即回省聚商于李鴻祥、唐繼堯宅，密謀响应。初拟以我率耕武堂学生居城中为内应，繼改由我率領七十三标李鴻祥、刘祖武等部占領軍械局、五华山、圓通山等处，并約定于九月初九日夜間三时起兵。

初九日晚，李經羲召見，以张文光在騰越起义，欲命我往平之。我佯諾，辞出后急馳赴北校場第七十三标第三营管帶李鴻祥营。該营于是晚八时因分发子弹准备起义，为反对起义之队官唐元良所阻，該营排长黃毓英等开枪击毙之。余至鴻祥营时已枪声隆隆，遂吹集合号，率領入城，攻打軍械局、五华山。蔡松坡等在烏家坝聞得北校場已开始发劲，遂率領罗佩金步兵七十四标、韓建鐸炮兵十九标两部，謝汝翼、雷飈、唐繼堯、韓凤樓、李凤樓、刘云峯、黃毓成、刘祖武、张开儒、叶成林、张子貞等及耕武堂、陸軍小学堂、測繪学堂全部員生，攻打督署及各机关各城門，至次日正午，全城大定。

滇省光复經過，蔡松坡著《云南光复紀略》及孙仲瑛(瑛)著《重九战記》等文所記甚翔实，一九五九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編有《云南貴州辛亥革命史料》一书所收各篇亦足資参考，茲不复贅述。是役也，同人一心，將士用命，而人心思汉，大势已成，我

等岂敢言功。且我等当时虽将清朝统治政权推翻，而于封建势力实无所触动。李經羲蓄意与革命为敌，事败逃匿，而我与松坡以旧属之故，竟囿于传统观念，将其礼送出境。叶尔愷对滇省学界迭兴大狱，与地方结怨甚深，重九之夜逃匿民间，为耕武堂学生所执，羣欲致之于死，而我则曲予维护，将其送出河口。布政使世增、兵备处总办王振畿、参謀长楊集祥被杀，我尚以不能保护，致令彼等死于非命而引为憾事。凡此种种，今日思之，我等当日革命之不彻底与妥协性可以概見。朱德委员长一九四二年所撰《辛亥回忆》一文，对我等多所称許，弥增惭愧。

张文光于九月初六日在騰越举义后，相繼光复永昌、永平、龙陵、永康、順宁、緬宁、云州、云龙等十余府县及沿边各土司地，称滇西都督，东下徇大理，与大理軍发生冲突，迤西大震。十月初十日，軍政府派我为陆軍第二师师长，兼迤西国民軍总司令，节制文武官吏，专任西事。我于十二日扶病出师，为双方排解，得以无事。西事既平，次年七月初十日始解职返省。曹之騏著有《騰越光复紀略》一文，記西事頗为翔实。

我因膺选众議院議員，于壬子（一九一二年）除夕到京。癸丑（一九一三年）元月五日，見袁世凱于铁獅子胡同。逾三日，袁送来高等顧問状，并由府庶务处通知月薪八百元。我以膺选議員不能任职，辞之。

三月二十日，宋教仁被刺于上海車站。事出次日，党中推谷鍾秀、张耀曾、李肇甫往見袁世凱。世凱形神恍惚，知其必事先知情者。少頃，沪电至，黄克強、陈英士搜获洪述祖、应夔丞密电多件，証实完全为袁世凱、赵秉鈞暗杀阴谋。于右任到京，在六国飯店报告袁杀宋真相，大哭，羣相流涕。我旋应孙、黄两先生电約赴沪。我

謂袁終必盜國，主張速致聲討。但各方牽制，畏難太多，南京、廣東尤甚。

我由滬返京不久，袁世凱免李烈鈞等四都督令下；李烈鈞、林虎等在湖口起兵討袁。袁世凱將我褫革官勳，下令通緝。我先一時得訊，倉卒遁至天津，與王芝祥、彭允彝、歐陽振聲同船繞青島南下。時克強先生在南京稱討袁軍總司令，岑西林（春煊）被舉為討袁軍大元帥。陳其美、鈕永建在上海攻製造局不下，克強先生在南京起兵亦瀕於失敗，風聲險惡。抵滬次日，孫、黃兩先生往西林處會議，約汪精衛、章行嚴、寧太一及我同往。我旋奉孫、黃兩先生命，與馬君武隨西林赴粵。至廣州日，龍濟光下肇慶，陳炯明部已露不穩之象。第二日張溥泉（繼）自上海來，云孫、黃兩先生分乘日本船來粵。陳炯明告以粵勢朝夕難保，來不可能。我主張仍請兩先生來，到粵再作計較；萬一廣州不守，退出惠、潮，許崇智已在福建獨立，可為犄角，不患無辦法。陳仍有難色，不以余言為然。張繼偕馬君武、劉彥（式南）赴港阻孫、黃。第三日，陳炯明命鄧鏗、金章來言，龍軍已入三水，仍住督署恐有不測，請迂避。我隨西林出都督府，至騰冲商人董亮亭家暫住。次日，金章復來，云觀香山兵叛變，陳炯明已逃，乞速走。我等倉皇出城，香港無船，乃登澳門船。抵澳門后，西林經香港轉船赴南洋。我因病痲，至香港入馬島醫院治療，半月始愈。龍濟光派人來港偵我踪跡，并照會港督懸賞格十萬元捕我。我變服搭運煤船赴上海。抵滬后遷居梅白克路，以偵者四集，不可少留，乃亡命日本。至東京時，孫、黃兩先生及李協和、陳英士、柏烈武、胡漢民、朱執信、廖仲愷、林隱青、方韻松、李曉垣、章行嚴、戴天仇、鄒海濱、鈕惕生、許汝為、冷御秋、章木良、趙厚生、耿鷗生、程頌云、程崧生、陳偉成、張潤农、居覺生、龔振洲、白楚香、季雨霖、詹大悲、

曹亚伯、田梓琴、謝慧生、楊滄白、王勇公、刘崑濤、黃膺白、楊伯生、袁世全、周哲謀、譚石屏、張鎔西等人均已在日京。

是年十一月二十日，我与程頌云、程崧生、陈伟成等同入早稻田大学习政治經濟，日上研堂，回复学生生活，較之在國內奔馳南北、忧患煎逼之日，另是一番境界矣。

癸丑以后，國內政局日非，干戈扰攘，迄无宁岁。我虽时切殷忧，終亦匡济乏术，无补时艰，俯仰之間，且不觉垂垂老矣。不图解放以后，得以衰暮之年，获觀共产党、毛主席領導的人民时代之盛世，平生梦想，宁能及此。值茲辛亥革命五十周年之际，緬怀往事，益增感奋。因就辛亥前后十年間事拉杂記之，并贅教語，聊志我內心不尽欢欣鼓舞之情而已，实不足以言史料也。

关于黄兴、华兴会 和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

周震麟

(一) 黄兴、华兴会和甲辰之役

“华兴会”是一九〇三年夏历九月十六日在长沙创建的，地点在保甲局巷彭渊恂住宅，当日参加结盟的除黄克强先生外，有宋教仁、陈天华、谭人凤、吴祿贞、苏曼殊、张耀、刘揆一、柳聘农、周震麟等二十余人。一九〇四年，华兴会发动武装起义，因起义计划在起义前一个月被清朝政府侦悉破获而失败了，这就是所谓“甲辰之役”。这次起义虽未成，但是它扩大了革命的影响，为以后“浏醴之役”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关于黄克强先生早期的革命活动、华兴会在湖南的活动情况和甲辰之役的始末，现就个人所知所见，略述如下：

克强先生的父亲筱村先生和我的叔父理琴先生，都在长沙教馆，常相过从，因此，我和克强先生在青少年时期就订交了。后来我们又在湖北武昌两湖书院同学五年，同住一个斋舍。克强先生原名轸，字董午，甲辰失败后改名黄兴，字克强。他是一个爱国的血性男儿，平居沉默寡言，治学行事，脚踏实地，对待同志，披肝沥胆，因而能够得到一般革命同志的衷心爱戴。

清朝政府于甲午中日战争丧权辱国以后，逐渐激起了国内维新运动的高潮。一八九五年，张之洞在湖北开办了两湖书院，陈宝箴在湖南开办了时务学堂。梁启超在时务学堂讲学，传播维新思想，成立南学会，积极宣传变法改制的政治主张，谭嗣同、沈薰、舒善生、杨篤生和秦力山等，都是其中的主要人物。一八九七年，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就任湖北巡抚，谭嗣同延揽这班南学会人士进入他父亲幕府，朝夕相与研讨变法改制的道理。我和克强先生因杨篤生、秦力山是我叔父的門人关系，也就经常和谭嗣同等来往，从此关心政治，研讨时事。但由于我们接受了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思想，认为清朝政府以异族统治中华，媚外卖国，决不能够救亡图存，因此不同意他们的保皇主张，拒绝参加他们的团体。

戊戌政变，谭嗣同等六君子在北京遭害，南学会人士痛恨清朝慈禧太后和一般顽固官吏的专横腐化，急思变革，但仍固执保皇主张。克强先生屡次以民族民主革命的道理向他们进行劝说，都没有效果。

庚子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保皇党唐才常等痛感国是日非，并想为戊戌六君子报仇，计划在武汉发动“勤王起义”，结果唐才常被捕牺牲，起义又告失败。这次失败，湘籍南学会人士在武汉、长沙两地牺牲了三十余人，几乎一网打尽，倖免于难的仅杨篤生、秦力山等少数人而已。当他们准备起义的时候，我和克强先生曾协助他们运动清军中的湘籍军人不加阻碍，事后其中有部分中下级军官被清军加以捕治不力的罪名革职。这是克强先生第一次运动军队，初步了解了当时清军的内部情况。

杨篤生、秦力山等经过这次失败，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转变，多次来到我们的宿舍商谈以后的革命行动。而克强先生看到戊戌、

庚子两次的失败,更加坚定了根本推翻清朝政府的意志,决心从事排满革命,而且深深地感到武装革命的重要性。

楊篤生和秦力山出亡日本的前夕,克強先生和我在书院盖舍秘密为他們餞行,力劝他們丢掉保皇的幻想,只有革命,才能够救亡图存,为南学会死难烈士报仇。楊、秦等痛定思痛,認識了我們主张的正确,表示完全接受。他們当即同参加餞別的人們一致决定以根本推翻滿清、光复中华、建立共和政体为以后革命的奋斗目标。至于所采取的步骤,决定首先利用滿汉不平等的积年界限,宣传鼓动民族革命,然后进一步推动民权革命。又决定从文化教育事业入手,兴学办报,制造輿論,尽情抨击清朝政府的腐朽政治,特別着重揭露它丧权辱国的媚外政策,从而喚起全国人民的爱国革命思想。而且通过兴学办报,得以培养革命青年,作为革命运动的前驅。楊、秦到了日本以后,不久就創辦了《新湖南》、《游学譯編》等刊物,积极宣传鼓动革命。

一九〇一年,克強先生毕业两湖书院,被选送留学日本,入弘文学院。我本也被选送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但因这时湖南一般比較进步的士紳向管学大臣张百熙爭取我回湖南办学,张百熙注重桑梓教育,欣然允許。克強先生就坚决要我抓住这个机会,回湘办学,打破湖南的頑固风气,培养革命青年,为革命創造条件。我当即放弃了赴日留学,毅然决然回到长沙,担負起积极办学的事业。而克強先生一抵橫滨,看到了日本維新后的新气象,回顧祖国,則是外侮頻仍,危如累卵,因此,革命情緒更加激昂,他每次給我来信,都是督促我为革命作好准备。一九〇三年春,克強先生学成归国,回到长沙,担任明德学堂博物、图画教員,积极进行秘密革命活动。

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四两年之間,湘籍留日学生紛紛回到湖南,

分布全省，开办了許多学堂。其中华兴会會員，都就地設立秘密革命机关，印刷宣传品，制造炸弹，购置枪械。一方面借学校讲坛，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另一方面联络会党，利用他們的武装力量，待时发动起义。通过以上活动，也就建立了湖南华兴会的骨干。

当时华兴会在湖南的骨干分布情况如下：朱遜初(教仁)在常德中学；刘霖生(揆一)在醴陵濠江中学；譚石屏(人凤)在新化中学；在长沙的則有章行严(士釗)、柳聘农、张溥泉、曹亚伯以及一班革命教师和学生。关于具体分工，章行严因与江南陆师学堂赵伯先(声)等有同学关系，便往来长江一带，担任联络工作；柳聘农担任各地秘密革命机关的交通联系；刘霖生侧重联络会党；我則侧重联络文武学堂的教师和学生；克強先生统筹全局。

一九〇四年初，蔡松坡(鐔)先生毕业日本士官学校，也回到了湖南担任武备学堂教习，这时他已放弃了康梁的改良主张，积极贊助排滿革命。我在岳麓山高等学堂任教务长，他經常來訪，革命情緒异常激昂，跃跃欲試。我每劝他韬晦蓄勢，目前應該加意培养革命青年，等到掌握了实力再动。但由于他鋒芒太露，不久就被反动学校当局辞退，隨即被調到广西，訓練新兵，开办干部学堂。我当时介紹了部分高等学堂中革命意志堅強的学生，投考干部学堂，随蔡去广西。从此克強先生往来于湘、桂之間，积极进行革命活动。

經過一系列的秘密活动，克強先生认为湖南的軍、学两界已經联成一气，急欲发动。我則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学生还很幼稚，新軍既未成立，旧軍也沒有完全运动妥貼，如果輕举失敗，徒然損害了軍、学两界的革命基础。但是，这时刘霖生、朱遜初、譚石屏等，已經分別联络好会党首領馬福益、游得胜，迫不及待。我只得加紧筹措經費，儲备武器，准备起义。

克強先生为了全面指揮革命战斗，早于一九〇三年冬以兴办实业作掩护，在长沙南門外开设了一个“华兴公司”，表面訂立章程，招集股本，凡属重要同志，都給以股东名义，以便参与起义机密。

刘霖生和馬福益联络了旧軍中的会党二万余人，并联络了安源煤矿的工人；其他同志也在各方面作好了准备。于是克強先生决定在夏曆十月初十日慈禧太后“万寿节”那天，乘着省城文武官員齐赴皇殿祝寿的时机，在长沙发动起义。

在起义前一个月，克強先生独自来到我的住宅密議，商定万一起义失败的退步办法，嘱我在起义中隐藏勿露，以便万一时能够設法保全革命实力，掩护同志安全撤退。这是因为张之洞、张百熙以及当时的湖南学务总办张鶴齡，对我都有好感，可能得到一些方便。这次起义失败后，华兴会的骨干分子，除了曹亚伯有教会作掩护，得以安然无事外，我果然在张鶴齡的极力维护下仍得留在湖南，执行了克強先生事先交代的任务。

起义失败的原因，是由于馬福益、游得胜等在浏、醴一带的旧軍中出入頻繁，人多口杂，以致风声透露，被反动当局偵悉底蘊。因此，华兴会的秘密机关多数被破获，儲藏的武器也被查抄，忠于清王朝的旧軍更已严加戒备，到期无法調集起义軍队。同时，馬福益部下有一人在醴陵車站被捕，供出一切机密，并說出这次起义的首領是长沙黄基午老师。于是长沙府、县衙門开始在省城搜捕革命党，并悬赏緝捕克強先生和刘霖生、宋遜初等。游得胜在驰赴长沙的中途被捕死难，馬福益当时在湘潭脱险走广西，但在翌年仍被捕牺牲了。

克強先生于夏曆九月二十五日才得到搜捕革命党的消息，当即由紫东园住宅来到龙莫溪(絨瑞)家。我和张溥泉正在龙家午餐，

克強先生態度從容地同我們一起吃了飯，才告知這一消息。我馬上回家派兄弟周震助（華興會會員，高等學堂體操教員）出外打聽，才獲悉馬福益部下被捕的情形，急返龍家報告。克強先生這時才對龍莫溪說：“有一個重要的箱子，放在西長安街長沙中學後進的一間房內，所有同志的全部名冊和革命秘密計劃都在裡面，如果被抄去了，全體同志將被一網打盡。”當時情況緊急萬分，莫溪表示願意冒險去取。莫溪事前並未參與機密，也不是華興會會員，這樣見义勇为，令人感佩。第二天清早，莫溪偽裝訪友，坐着轎子前往長沙中學，打開克強先生所指的房間，找到了那個重要箱子，另外還發現房中有幾支步槍，也一併放在轎內帶回家中，交給了克強先生。箱中除了名冊、計劃之外，還有手槍和旗幟等重要物件，另有克強先生秘密通信和發布命令用的小水晶圖章一顆，克強先生特為檢出贈給莫溪，留作紀念。其他重要文物概行燒毀，步槍、手槍則投入了龍宅池塘中。就在這天，克強先生的住宅被搜查了，但沒有查得任何証據。龍宅門外虽有府、縣衙門的捕差巡邏偵探，但因當時的神權特大，龍莫溪的父親龍鴻霖是退職的刑部侍郎，他們沒有確實証據，不敢入內搜捕。因此克強先生得在龍宅安居了三天。這三天里，曹亞伯和聖公會的黃吉亭牧師為克強先生作好了出走準備。到第四天，克強先生坐一乘轎子，放下轎帘，作為龍宅女眷出外的樣子，張溥泉扮作跟隨，在轎後步行保護，安全地到达了聖公會。克強先生在聖公會隱藏了一個多月，風聲漸平，才由黃吉亭牧師親自護送，偕同張溥泉搭乘日輪沅江丸，經漢口轉輪到上海。

克強先生早在湖北武昌劉敬安同志開辦日知書社的時候，就和我一道由曹亞伯介紹，認識了黃吉亭牧師，并由他介紹我們入教，以作掩護。黃吉亭雖然信仰宗教，充當牧師，但為一個忠于革命的

同志。为了掩护秘密革命活动，日知书社最初就设在滕脂山他的教堂中。他到湖南来传教的另一个任务，是率领十多个通洋务的学生来湖南开办邮政局，这次营救克强先生脱险，邮局人员也多尽力相助。在“华兴公司”没有设立以前，克强先生曾经假圣公会开过几次重要的秘密会议，并寄存重要文件。这是因为自从义和团运动以后，清朝政府是不敢干涉教会行动，更不敢擅入教堂搜查捕人的。黄吉亭牧师利用教会帮助革命，掩护同志，不遗余力。同盟会成立时，他也加入了同盟会。两湖的革命同志，都认为他对于辛亥革命取得胜利所作的贡献是很大的。

克强先生和张溥泉到了上海以后，卒因万福华刺王之春案牵涉被捕，但经同志多方营救，复得脱险走日本。这时中山先生经过兴中会在惠州起义的失败以后，游历欧美东归，也在日本。于是在中山先生领导下，将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三个革命团体，合并组成革命同盟会，于一九〇五年八月开成立大会于东京，提出了革命政治纲领，决定团结全国革命同志，共同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国。又经过六年时间的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

(二) 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

一九〇五年革命同盟会成立以后，黄克强先生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指挥了钦廉、镇南关（今睦南关）和黄花岗各次的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革命的声势震撼了清朝政府，也显示了革命党人的英勇气概。此后辛亥武昌首义，获得了十七省的响应，终于推翻清廷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选举了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在这一系列艰苦斗争的过程中，孙、黄两先生的关系基本上是好的。但是，辛亥革命以后，在接着进行第二次革命的过程中，他们之间却

曾一度发生过意見上的分歧。这主要表现在討袁軍事与整改党务两个問題上；尤其关于整改党务的問題，克強先生所持意見完全与中山先生相反。因此，当时外間对于孙、黃关系多滋猜議，反动派更是乘隙进行挑拨离間，大肆宣揚“孙、黃分家”。其实，在革命主张上，黃克強先生始終服膺中山先生，矢忠民国，直至后来在策划护国軍云南起义的时候，也能够中山先生领导之下精誠团结无間；在党务方面，克強先生也終能化除成見，服从中山先生的統一领导。现在就我个人記憶所及，將討袁前后的一段經過事实，談出一鱗半爪，以供了解孙、黃两先生关系的参考。

一九一二年元旦，中山先生就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于南京，克強先生任陸軍总长，統轄南方各省的革命軍。南方的革命軍在辛亥起义以后，数量上都有很大的增加。未几，南北和議达成，溥仪退位，中山先生以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約法作为让出政权的条件，向临时参議会辞职并荐袁世凱自代，想从此奠定共和民国的基础。袁世凱原无拥护共和誠意，对于南方革命势力多所畏忌。他初則借口北方重鎮，不能輕离南来，于同年三月十日在北京就任第二任临时大总统；繼又借口南方軍隊驟增，糜餉过巨，南北既已統一，国民希望和平，倡議裁兵。克強先生当以既經让出政权，为了表示和平建設，也同意裁兵倡議，当即通令南方各省革命軍严加裁汰。各省多数革命同志，起初对此举是不愿意的；但是，克強先生坚持了他的意見，說是要想訓練精兵，也必須先裁冗兵。各省同志一方面感到兵增餉絀，另方面恐怕加重人民負担，也就奉命执行了。裁兵之后，克強先生隨即撤銷南京留守府，随中山先生北上，着手筹划全国铁路建設事业。而袁世凱在各省进行裁兵的同时，急图将北洋势力伸入南方，于是进一步采取了阴谋措施，首先假軍民分治之

名，在各省設立民政長以削督軍之權，繼又增設護軍使，直接受其指揮調遣。

一九一三年三月，袁世凱在上海暗殺了宋教仁、孫、黃兩先生，電召各省重要同志到上海開會商討對策，我由湖南奉召參加。當時中山先生主張立即興師討袁。他認為宋案的发生，是袁世凱陰謀消滅國民黨革命勢力，以便帝制自為，全黨同志對此極為悲憤，必須乘機立即調集各省兵力，一致聲罪致討；並認為袁世凱就任正式大總統為時不久，對於各方面的陰謀布置還未妥貼，推翻較易，切不可延誤時機。克強先生則認為袁世凱帝制自為的逆跡尚未顯著，南方的革命軍又甫經裁汰，必須加以整備才能作戰，因而主張稍緩用兵，以觀其變。各省領兵同志多同意黃的意見。中山先生格於眾議，只好從緩發動。因此，第一次討袁會議的結果，僅議定進行全面布置的准备工作。

不久，袁世凱舉借二千五百萬鎊的五國大借款，未經經國會參議院通過，就非法成立了。參議院議員多屬國民黨，對此極為憤慨，力促孫、黃兩先生迅即討袁。於是孫、黃兩先生又召集重要同志到上海舉行第二次討袁會議，我又從北京前往參加。這時袁世凱的帝制陰謀已經完全暴露，全國輿論譁然，羣情激憤，在此形勢之下，國民黨發動第二次革命，已再不容遲疑猶豫了。於是會議當即決定派出同志，分赴各省督促興師討袁。

關於湖北和江西兩省，孫、黃決定派寧調元、熊越山兩同志前往。寧、熊二人本已買好船票，擬赴粵分別就粵漢鐵路督辦和秘書長職務，奉命後臨時將行李撤回，改搭江輪分赴贛、鄂進行討袁活動。我則奉派回湘策劃，得能調集革命軍三旅，待命發動。三省布置相定，一九一三年七月，李烈鈞就在湖口揭起了討袁義旗，湘軍

隨即北上進入鄂境，柏文蔚以淮上軍響應作戰，克強先生親赴南京督師。但是，這次長江用兵，上游方面由於湖北的黎元洪勾結袁世凱暗中作梗，雖有胡漢民、陳炳明、許崇智等在閩粵，熊克武、楊庶堪等在重慶先後響應，都因交通阻滯，應援不及。北方的陝西和山西又為北洋軍所扼，勢孤不能發動。袁世凱調集北洋重兵馮國璋、段芝貴、李純等沿長江一帶進行包圍。經過兩個月的鏖戰，革命軍不支挫敗，各省取消獨立。黎元洪奉袁旨殺害了寧調元、熊越山兩同志。可是，他並沒有達到保持地盤的目的；袁世凱立派段祺瑞率北洋重兵督鄂，迫使他只身入京，並派馮國璋率部分布閩浙。一時南方革命實力，大部趨於瓦解。

討袁軍事失敗，孫、黃兩先生和各省革命同志只得東渡日本，以圖再舉。中山先生總結失敗經驗，認為宋案發生後本應立即興師討袁，不應等到大借款成立以後方始舉事，以致袁世凱得以從容布置，使革命軍遭到失敗。因此，中山先生對於克強先生頗有責難。關於黨務方面，中山先生認為黨內精神渙散，行動極不統一，必須恢復民國以前的精神面目而加以嚴格的整肅，因而決意另行籌建中華革命黨；原來的國民黨黨員，志願參加的，也必須各具誓約，服從黨魁一人之統率，並須在誓約上用中指按上指印，以志矢忠。克強先生則認為當時亡命日本的國民黨黨員，都是參加討袁且被通緝的，不應該在這時對他們嚴加整肅，而主張就原有基礎發展反袁的其他革命分子，以便團結更多的力量共同奮鬥。因此，他不同意中山先生另組中華革命黨，並且表示他個人決不參加。當時兩人的態度都很堅決。中山先生雖然一時不能說服克強先生，但仍積極籌建中華革命黨，而將協理職務仍然虛以待黃。當中山先生成立中華革命黨的時候，各省重要同志二十餘人一方面拒絕參

加,另方面又发起成立欧事研究会,其中半数为湘籍。陈英士方面的人早就覬覦协理一席,欧事研究会的出现,更使他們振振有词了。当时还有少数叛徒已被袁世凯收买充当“袁探”,乘隙进行挑拨离间,尤其大肆宣扬“孙、黄分家”。克强先生因奔走革命多年,已染胃病,亟思易地疗养,乃向中山先生表明对革命事业始终不渝的态度,于一九一四年春离日遊美。中山先生对他仍然极表关怀,当电告美洲支部同志曹亚伯等为克强先生照料旅居方便。克强先生在美洲各地发表演说和谈话,内容也仍然是宣传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足见孙、黄两先生虽然在意见上发生了一时的分歧,而在革命的根本主张上仍然是一致的。

克强先生离日赴美后,欧事研究会同人逐渐认识到革命组织不可分裂。覃振首先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并担任湖南支部长,主张解散欧事研究会。我原先因为不同意中山先生所要求的填写入党誓词和打指印的做法,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但我是始终反对党内派别分立的,此刻在覃振同志的力促下,也就按入党手续参加了。同时,李烈钧等也陆续办理了入党手续。中山先生大为嘉慰。从此一般革命同志皆能扫除成见,又复团结在中山先生统一领导之下,继续共同进行艰苦的革命战斗。关于孙、黄两先生间的意见分歧,我曾从中尽力斡旋,为双方解释,颇得嘉纳。关于党的名称问题,在讨袁军事将告结束的时候,我以国民党在国际国内影响较大,成员较多,也曾向中山先生建议:不如今后仍改称国民党,并为了区别于日本的国民党(日本的犬养毅等所组的政党也称国民党),可以冠上“中国”二字。当时中山先生亦予默许。

当蔡松坡先生在云南揭举护国军讨袁义旗的时候,曾迭电促克强先生回国。迨克强先生由美回国,归途中在日勾留时,我即托

赴日欢迎的同志带给他一封长信，把我斡旋他和中山先生关系的情形详告。克强先生得知中山先生对他完全谅解，急回上海。他行装甫卸，就督謁中山先生。中山先生旋即回訪克强先生。两人相见，握手言欢，极为亲切快慰。这时袁贼已死，討袁軍事結束，孙、黄两先生又在上海共同召集革命同志，筹商反对北洋軍閥的策略，并命我赴北京在議會联络同志，进行分化北洋軍閥的工作。不幸克强先生病势沉重，竟于一九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溘志以逝。中山先生頓感失去革命臂助，异常悲痛。党内同志组成了以中山先生为首的治喪委员会，翌年国葬克强先生于湖南岳麓山，典礼隆重。由此也可見孙、黄关系始終是建立在革命的友爱上面的，一时意見上的分歧，庸俗的猜議固不能有所伤，而奸人的乘隙挑拨离間更难施其狡伎。我們对此应该有这种正确的認識。

戏剧界参加辛亥革命的几件事*

梅兰芳遗稿

在辛亥革命时期，我們戏剧界中曾經有許多前輩和同行以他們的英勇斗争实践和卓越的艺术創造，为这次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貢獻，其中有不少人还因此献出了他們的生命。他們的英雄業績，在近代我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上占有光輝的一頁；他們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崇高的革命品質永远值得我們后人学习。多少年来，我一直想把我所知道的关于这些前輩和同行的革命事迹写出来，用来紀念他們，同时借以鞭策自己。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愿望始終沒有能够实现。直到現在，为了紀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我才下定决心这样作，实现了这个宿愿。这里所写的，有些是我目觀的，有些是亲身經歷的人告訴我的，也有些是他們的家属供給我

* 这篇回忆录是梅兰芳同志生前应編者之請而写的。他从今年春天开始，以他自己的亲身經歷和見聞为基础，就有关戏剧界参加辛亥革命活动的史实进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掌握了許多珍貴的資料，并且經過反复核对和考証，最后写出了这篇文章。梅兰芳同志在写稿过程中，非常严肃認真。当他在今年七月三十一日发病入院治疗之前，这篇文章已經基本上脫稿，但是他在病中对这件事还念念不忘。直到他逝世之前一天，他还想起了几个需要补充和修改的問題，告訴协助他整理文稿的許姬传同志。本文中有些个别地方就是許姬传同志根据梅兰芳同志臨終前的指示所作的补充和修改。——編者

的材料。这些材料虽然经过核对，但事隔半个世纪，在时间、地点上难免有出入，希望得到读者的补充和纠正。

武昌起义后北京见闻

辛亥年阴曆八月二十一日白天，我正在煤市街南口文明茶园（现为华北戏院）演出，忽然看见台下观众手持报纸，互相传观，交头接耳，纷纷议论。卸妆时，有几位京师译学馆的朋友言简斋等到后台来告诉我：“武昌发生‘兵变’，被革命党‘占领’了。”我说：“此地不是讲话之所，回头到饭馆里再谈。”我们就约定在致美斋（在煤市街北口）见面。在吃饭时，这几位朋友把当天的政治官报的单片给我看，上面登着八月二十一日清廷关于镇压武昌起义的“上谕”。这道“上谕”，我现在查得原文是这样的：“据湖广总督瑞澂电奏，革匪创乱，十九日猛攻楚望台，省城失陷，瑞澂退登楚豫兵舰，移往汉口……奏殊深骇异。此次兵匪勾通，蓄谋已久，乃瑞澂毫无防范，竟至祸机猝发，省城失陷。湖广总督瑞澂着即行革职，带罪立功。……并着军谥府陆军部迅派陆军赴鄂剿办，海军部加派兵轮飭萨镇冰督率前进，陆军大臣蔺昌着督兵迅速前往……。”我当时看完了这道“上谕”，就说：“这件事情可不小，结果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大家表示以后有何消息，彼此要特别注意，互相转告。

以后，我就随时打听这方面的消息。我的姨夫徐兰沅曾对我讲过这样一件传闻：蔺昌请训后（按当时制度，大臣奉命离京前，要面见皇帝请训，那时宣统年幼，由监国摄政王载灃代见），大理院正卿岳柱臣、鸿臚寺正卿英傑臣等在观音寺福兴居给他饯行，席间大家祝他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蔺昌却用《战太平》里华安的词儿打着哈哈说：“……又道是，母子好比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嘻

嘻嘻，哈哈哇呀……。”

据軍諮府的朋友告訴我：“武昌兵變”的消息到京后，監國攝政王載灃馬上召集御前會議，各部大臣都列席。會議開始，載灃面色陰郁，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大家面面相覷，誰也不敢先開口。這樣僵持了許久之后，內閣總理大臣慶親王奕劻才用低沉的語調說了一句話：“還是請午樓（廡昌號）辛苦一趟吧！”載灃表示贊成，這次御前會議就這樣草草收場，那天的“上諭”就是這樣下來的。

幾天后的某晚，譚鑫培、楊小樓在寶禪寺街慶昇茶園合演《連營寨》。當譚先生唱到劉備哭靈牌的時候，電燈突然滅了，滿園漆黑，只得散戲。緊接着，以倉場侍郎而新署民政部大臣的桂春叫京師巡警總廳通知戲園停演夜戲，前門大街上每逢三六九日的夜市也勒令停止。入夜后，熱鬧街市的飯庄、鋪戶都沒有電燈，路少行人，景象蕭條。同時謠言紛起，傳說桂春從城外調來了三營旗兵準備殺漢人，人心更為恐慌。大清銀行（在西交民巷，后改中國銀行）發生擠兌，門口人聲嘈雜，車輛擁擠，都是拿鈔票來兌現洋，準備拉回家的。大老富商們更用銀元兌換赤金，金價飛漲到四十几換。

有錢有勢的還把家眷送到天津租界內，於是外國人趁機大發其財。日租界的德義樓、奧租界的春滿樓旅館的房金猛漲几倍；花旗、匯豐、道勝、正金等外商銀行以存款驟增，對新存戶採取不付利息的辦法。南方籍貫的京官，紛紛携眷離京，北京東車站的站台上行李堆積如山，兒啼母喚，失物尋人，紛亂不堪。京奉鐵路慢車停開，快車只賣頭二等票；京漢車票只賣到黃河北岸，而且開車鐘點也沒有一定。各戲園的營業情況，一般都不振，演員們人心惶惶，擔心生計要受影響。我所搭的雙慶班，白天還照常演出，因為角色多（鬚生王鳳卿、賈洪林、李鑫甫、李壽峯，武生俞振庭，小生朱素云、

德珺如,花旦王蕙芳,武旦九陣風、朱桂芳,老旦謝寶云,青衣是我,花臉金秀山、李壽山、李連仲,丑角王長林等全都在雙慶班),戲碼硬,所以上座還不壞。

這時候,譯學館的朋友又來告訴我說,他們的許多同學都感到這次“武昌事變”,民黨推黎元洪做了湖北都督,恐怕其他各省,都要起來響應。他們又在京師大學堂的宿舍里聽到許多人在談:“革命爆發,來勢凶猛,大清朝恐怕保不住了。”

桂春的鹵莽措施,不獨漢籍官員反對,即親貴中如載濤等也不贊成。御史趙熙上奏參劾桂春說:“……桂春平日杳無才識,甫任民政大臣,即乖謬失政,誤聽謠言,以赴試留學生解樹強為革命黨,捕送法庭,及經大理院訊,乃毫無證據,隨奏請釋放。該大臣以此毫無確信之事,擅行逮捕,以致上勞慰諭,失政實甚。且現當各省亂機竊發之時,京中人心亦極惶惑,該大臣決不足保護治安,維持秩序,請另簡賢員,以利民政。……”這時,袁世凱已被清廷起用,代替慶親王做了內閣總理大臣,軍政大權一把抓,就把桂春調回倉場侍郎,派趙秉鈞署民政大臣。警廳傳知各戲院開演夜戲,廣德樓、天樂園首先恢復夜戲,前門大街的夜市也照常擺攤,市面秩序才漸漸安定下來。

上海伶界參加光復之役

到了九月中旬,北京的報紙上接連幾天登載着上海“失守”的消息:高昌廟江南製造局、吳淞炮台先後被革命黨占領,上海道劉燕翼、上海縣田寶榮均避居租界;革命黨照會各國領事團,已得到領事團的承認,並出示安民,公推李平書為總理,伍廷芳辦理外交,沈縵云辦理財政,王一亭辦理商務事宜,正在力圖恢復秩序,等等。

同行中传来消息說，攻打制造局有梨园行夏月珊、夏月潤、潘月樵等在內。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同行参加革命的消息，感到很兴奋。当时，南北音訊阻隔，京津一带的报纸在袁世凱的压力下，对于革命的事实又不敢着力描写宣传，所以关于上海伶界参加革命的事，从报纸上几乎是看不到的。民国初年我去上海演戏时，略知大概；最近又訪問了当时参加的一些人，各方面也供給了一些有关資料，才了解得比較詳細。

上海光复，对辛亥革命的整个局势，有很大影响，而制造局的占領則是上海光复的關鍵。这是因为民軍当时在武汉的战事既处于不利形势，而在上海方面又械餉两缺，在这种局面下，把这个江南規模最大的軍火厂拿下来，就有很重要的作用。

攻打制造局的基本队伍是商团。商团是当地各行各业组成的，志愿参加，属于地方保甲性质。夏氏弟兄和潘月樵是伶界商团的負責人，夏月珊又是伶界救火联合会的会长。救火員大半是剧团里的武行——精壯少年，他們大部分都参加了商团。他們在夏氏弟兄和潘月樵领导之下，成为这次攻打制造局的先鋒。

夏月珊、月潤和潘月樵的身世为人

在叙述上海伶界参加攻打制造局的詳細經過以前，我想先介紹一下夏氏兄弟和潘月樵的身世和为人。

夏氏弟兄原籍安徽怀宁，他們的父亲夏奎章是与譚鑫培、俞菊笙、黄月山同时期的武老生，拿手戏是《反西涼》、《战渭南》、《冀州城》、《賺历城》，有“活馬超”之称。据說，《冀州城》由二簧改西皮，就是他的創造；楊小樓演《冀州城》，也是根据他的路子唱西皮的。夏奎章的四个儿子都是梨园行。夏月恆大排行老二，初唱老生，曾

在北京玉成班陪黃月山唱《漢皇莊》的尹亮，《扒蜡庙》的黃天霸；在《反五關》里黃月山扮黃濼，月恆扮黃飛虎，父子對打一場，極為精采。月恆後來隨父親到上海，當戲館老板，改武丑，就不常登台了。月珊行三，唱老生兼文丑，氣度從容，能戲甚多，以編演諷刺社會的新戲見長。老八月潤，唱武生兼紅生，演關戲宗王鴻壽（三麻子）一派。他是譚鑫培的女婿，譚先生到上海演戲，大半是他的關係。老九月華，是唱武淨的。

夏氏兄弟到上海是在光緒年間。當時上海租界里已經是洋奴流氓世界，他們勾串巡捕房的包探狼狽為奸，在地面上張牙舞爪，無惡不作。開戲館的必須找幾個流氓來保鏢，無論什麼權利，他們總要占先，后台同行敢怒而不敢言。有一次，幾個流氓在戲園子前台樓上賬房里吵鬧，要支用預備發包銀的錢。夏月恆抽了一把刀，擋着樓梯向流氓大罵，吓得他們不敢下樓。有一年夏氏弟兄在漢口演出，因為不許流氓看白戲，幫會的“龍頭”邀他們過江吃茶耕理來恐嚇他們，以為他們決不敢來。可是，出乎這班流氓意料之外，月珊、月潤以單刀赴會的氣魄準時過江，理直氣壯地解決了一場糾紛。

夏氏弟兄就這樣和流氓鬥了几十年，替梨園行爭過許多氣，同時他們還替社會上做了不少公益事。當年上海的消防隊，被老百姓稱為“斧頭黨”，因為有些救火員往往趁火打劫，先用斧頭劈開被災人家的箱櫃，搜括一番，然後才去救火。夏氏弟兄和新舞台的演員們非常痛恨這種趁火打劫的行為。就組織了伶界救火聯合會。有一次某新婚人家失火，新婚夫婦倉皇逃出，抽屜中的首飾都沒有來得及拿走，被夏月珊前去救火時發現，便用手絹包好，收入衣袋中。事後這對新婚夫婦到新舞台詢問首飾下落，月珊經過詳細對

証，全部交还。新舞台救火員勇敢正直、臨財不苟的行為，大大受到了上海居民的贊揚。

辛亥革命前夕，夏、潘等在十六鋪經營新舞台，由於受了王鍾聲等在上海演出白話新戲宣傳愛國思想的影响，開始排演新戲。夏月潤還親自到日本，通過歌舞伎名演員市川左團次的介紹，約請日本布景師和木匠同回上海，布置新式舞台布景。當時上海搞舞台美術的張聿光就曾向他們學習過；以後張聿光一派的舞台美術，成為主要流派，對電影事業也有貢獻。上海從茶園式的帶柱方台演變到半月形的舞台，並且採用了佈景轉台，是新舞台開其端的。

夏氏弟兄和潘月樵在新舞台積極編演了象《新茶花》、《黑籍冤魂》那樣有進步思想的新戲。《黑籍冤魂》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社會受鴉片毒害的真實情況，引起了上海中外烟土商人的仇視。這出戲上演後，新舞台收到多次恐嚇信和炸彈警告，然而他們絲毫沒有因此畏怯退縮。夏月珊登台對觀眾演說，公開答復恐嚇者說：“戲要演，毒要抗，決不退讓！”

潘月樵原籍揚州（因為他娶妻朱氏是常熟人，后台都稱她為常熟奶奶，潘又曾在常熟住家，所以有些記載上說他是常熟人，其實是不確的）。月樵的父親是木匠，死後，長兄潘恩榮帶了月樵、少棠弟兄逃荒到天津，舉目無親，生活很苦；後來恩榮入贅到陳家，才安定下來。長嫂陳氏花錢請先生教兩個弟弟學戲，以資謀生。月樵初學梆子文武老生，後改皮簧。少棠先學花臉，改唱青衣。陳氏的兒子潘桂勝、桂芳以後也跟著叔叔們一同學戲，投身梨園行。

光緒年間，月樵藝已成熟，搭上海老天仙茶園，雖然吃調高，噪微帶“左”，但文武兼長，做工念白都非常出色，周信芳同志當年就受過他的影响。我也看過他的戲，他的確是一位有本領的演員。

老天仙燬于火后，与老天仙打对台的老丹桂茶园台柱子夏氏弟兄就約他一同加入新建的十六鋪新舞台，共同排演針砭社会現象的新戏。在《黑籍冤魂》里，潘月樵扮老太爷，描写当时的富翁故意叫儿子抽鴉片烟，以为用一根烟枪拴住他，就可以保住万貫家財的守財奴心理。夏月珊扮大少爷，从翩翩少年变成鳩形鵠面的烟鬼，一直墮落到最后拉黄包車为生，并且发现坐車的妓女竟是自己亲生的女儿！他們大声疾呼地在舞台上宣传了吸鴉片的害处，对当时的社会有很大影响。潘、夏两家艺人，从艺术創造到革命活动都是志同道合的。

商团智取制造局

武昌起义时，孙中山先生还在欧洲，黄克强先生从香港赶回来，九月上旬才经过上海，到达武汉。上海光复的事，由陈其美等負責进行。陈由民党沈縵云介绍，与李平书等开明士紳发生关系。李平书在中法之战时任广东遂溪县知县，率領民团，击追法寇，保住县境，但清廷媚外，反而将他革职；他这时任南市工程局局长，江南制造局提調，兼商团会长。沈縵云是同盟会会员，任信成銀行协理，一向以振兴沪南市面与租界对抗为目的，夏、潘等办新舞台，就曾得到他的大力帮助。潘月樵是伶界商团負責人之一，他积极奔走于陈其美、李平书、沈縵云之間，出力甚多。商团攻破制造局，潘月樵的功劳是不小的。

江南制造局創設于同治初年，地址在黄浦江边，专制枪炮，供应各省。武昌起义后，制造局將軍火絡繹运往南京，供清軍对民軍作战之用。李平书劝該局总办张楚宝(士珩)停止續运，并諷示他人心思汉，早作良图。张楚宝不听，于是民党决定用武力占領。

制造局中的卫队，事先曾由陈其美派人接洽，据说办妥了，但实际上居间人并没有和卫队长接上綫。九月十三日下午三时，陈其美向商团公会借得步枪四十支，率敢死队二百余人由南市出发，乘局中启門放工时一湧而入。局内駐軍先放空枪一排，敢死队不顧，蜂拥向前进攻，投擲炸弹。駐軍实弹应战，敢死队死伤各一人，就往后退下来，陈其美在后督战，拿出两个炸弹，交与敢死队，不料被駐軍看見，就把他逮住，綁在花厅院子里桂花树上。

商团方面并不晓得攻打制造局失敗和陈其美被拘的事，仍照預定計劃占領了各公署。上海道刘燕翼、上海县田宝荣逃匿租界。各城門都挂起了白旗与革命軍旗帜，羣众鼓掌欢呼，商店照常开市，并由上海軍政分府和上海民政长官李平书貼出安民告示：

一、“上海軍政分府示：照得武昌起义，同胞万众一心。凡我义旗所指，罔不踴跃欢迎。各省各城恢复，从未妨害安宁。上海东南巨埠，通商世界著名。一經大兵云集，損害自必非輕。今奉軍政府令，但令各界輸誠。茲已紛紛归順，具見敌愾同情。惟愿亲爱同胞，仍各安分营生。洋人生命财产，切勿乘此相侵。轉瞬民国成立，人人共享太平。”

二、“上洋巨埠，保护华洋。免受兵火，独立主张。凡我同胞，切勿恐慌。照常营业，痞棍宜防。如有鬧事，軍法照行。本軍府示，各各传揚。中华民国上海民政长官李”

这时李平书到制造局去保释陈其美，张楚宝不准。上海道署的幕友密告李平书說，两江总督张人駿电告上海道，已命宁、松两路进兵，无论革党商团，擒获者一律正法。李平书赶到南市毛家弄商团公会，召开紧急會議。有人认为，商团人数虽众，但枪械不足，又从未打过仗，而制造局則武器精良，如继续进攻，恐难得手。王一等

說：“進或亦死，退則必死，與其伸頸待戮，無寧為國殉身，若事有濟，則與民國前途裨益良巨。”這時庭中商團團員羣起鼓噪，大呼“若不發動，我們願流血階前，決不散隊”。商團總司令朱少沂就請李平書簽發總攻擊令。當由王一亭起草，向大家宣讀，並將商團編為兩隊，一隊攻製造局正門，一隊攻後門，定於夜間十一時出發。

午夜，商團開始圍攻製造局，製造局用機關槍掃射，火力甚猛，無法攻入。夏月珊、月潤弟兄就沿牆根繞到製造局邊門，看見旁邊有一間木匠住的房子（這些木匠是專替製造局做裝軍火的箱子的），裡面堆着許多刨花碎木。夏氏弟兄就想用火攻，馬上派表弟薛壽齡（老藝人薛瑤卿的兒子，瑤卿是月珊的妻舅）騎馬到附近烟紙店買來兩箱火油，由夏月潤親自動手倒在刨花堆上，頃刻間燃起熊熊烈焰。為了防火勢蔓延，他們還準備了救火員，以便到適當時間救火。商團看見火光，就四面八方吶喊起來，聲震天地。這時，有一位商團總部的基本隊員范耕莘扶牆摸壁地走到製造局的鐵柵門邊，從一個小洞里鑽進去，用大石塊砸開鐵柵門的鎖，大聲嚷道：“我們得勝了！”局里的總辦、會辦等，在火光燭天、殺聲四起時，被這種聲勢吓慌了，就倉皇登舟逃往浦東，衛隊亦紛紛散去。商團一湧而入，找到綁在桂花樹上的陳其美，把他放下來。

那天，松江綠營統領帶兵到上海鎮壓革命黨，走到半路，聽說製造局失守，即停止不前，觀望風色，不久也投降了。

十四日晚間，民軍五十餘人由上海到蘇州，和楓橋新軍標營取得聯絡，次日天明整隊進城，並推派代表見江蘇巡撫程德全，推他為都督。程表示接受，就任都督，各衙門官吏原職留任，秩序很好。只有藩司左孝同（左宗棠的兒子）起先主張抵抗，後來見到人心傾向革命，勢難挽回，只得在衙門里痛哭了一場，携眷到上海租界里

做“遺老”去了。

接着，浙江、福建、安徽、江西先后响应，南方局势整个变了。只有南京方面因为提督张勋負隅頑抗，袁世凱又电令固守，并声言派第五鎮南下助战，所以战事至为激烈。潘月樵因攻克制造局有功，經陈其美給以少将名义，并参加了民軍攻打南京的战役。当时北京方面曾傳說他在十月初七日麒麟門一仗中陣亡了，后来才知他并没有死。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春天，潘月樵經沪軍都督陈其美委充調查部部长，潘即照会商团公会会长沈縵云，同时还写信向他汇报工作情况。这两个文件由沈縵云先生的儿子沈煥唐保存着，現在抄录在下面。

“中华民国沪軍調查部长潘月樵为照会事：案奉沪軍都督委任樵充沪軍調查部长，并頒发鈐記一顆，文曰‘中华民国沪軍調查部长之鈐記’。謹于二月初九日奉到后即行启用，暫就南市合兴里三号为办公处，中国電話一百〇四号。……右照会商团公会会长沈”

“縵云先生大人台鉴：樵自投入商团，深荷培植。今幸蒙都督委充調查部长，进为人民公仆。樵之得进步，实由先生大力提携，造就末才，稍知时务，樵之荣誉，皆先生所賜也。……再樵前日赴宁晉謁大总统(按即孙中山先生)，当蒙接見，痛陈一切，蒙允許为关外民軍借来大炮六尊，并同机关部諸君悬准发来現洋伍万元，爱国債票壹百万元，以充关外民軍之用。現銀及先生所捐之伍仟元均已兌至大連接济軍需。昨得来电，机关枪准予初三四日到沪。又拟倡办中华劇界共进会，前已面稟大总统允許立案，俟章程拟妥即行呈报开办。……潘月樵敬启，二月十九日”

这封信是潘月樵到南京謁見孙中山先生后回来写的，信内所

称为关外民軍借来大炮、現金、債券一事，大約是接济蓝天蔚的。《潘月樵先生碑記》上說：“……蓝天蔚者，奉天之革命健儿也，起事失机，来沪筹募餉械无着，憤欲自裁。君子报端見之，踵逆旅求見，坐談一炊黍頃，沈澁如旧相識，立斥己产，贖三万金畀之，俾图大举。迨君遭項城名捕，流离顛沛时，藍亦自新大陆歸，尽力营救。”又說：“郑汝成秉承項城意旨，以五万金生购君之头顱，时君家常熟，尽室作瓜蔓抄。君先数小时易僧服潜逃而免，然家业自此傾矣。”

从上面这些事实来看，上海光复时，夏月珊、月潤弟兄和潘月樵先生以及伶界商团参加攻打制造局諸君，都对辛亥革命运动作出了贡献，而潘先生不避艰险、不顧身家地为革命而奋斗的精神，替戏剧界树立了好榜样，更是值得我們欽佩的。

最近老友胡恨生告訴我当年他以米业商团成员参加攻打制造局的一些情景：辛亥年九月十三日早八点钟，商团在南市沪軍营操場上操时，民党代表李英石对商团講話說：“武汉虽下，北洋队伍还有一部分势力（按据黄克強从武昌給宋教仁的信說：“……敌人占汉口下之刘家庙，倚租界設立炮兵障地，昨日风起，汉鎮房屋中炮起火，全市被焚，我軍退守汉阳。……”这封信是九月十一日发的，可見当时形势很不好）。上海是中国通商口岸，如能光复，可壮武汉声势，外交方面影响也大。所以希望商团协助民党，占領制造局。”最后他宣布命令：下操后不散队，各业商团回本部听候調遣。胡恨生回到本部，下午四点后吃饭，九点钟被派往小南門看守救火会钟樓，并規定撞钟为号，如攻破制造局，即連續撞钟九下，再連續十三下，表明九月十三日。黎明前，胡恨生調防到南市毛家弄商团司令部，看見潘月樵正在向司令朱少沂、參謀高一涵等报告前方战况。他的装束很特別，黑布包头，身穿黑緞衣袴，耳边挂两条白

彩綢，外罩黑斗篷，腰佩指揮刀，就象戏台上的太平軍的裝束一樣。他口誦指划地述說攻打製造局的情況，口齒清楚，精神飽滿，很能吸引大家。他說完了，向司令等立正行軍禮，就走出大門，縱身跳上一匹白馬，又到前方督戰去了。後面許多人追着看他，他回過頭來揚鞭對大家說：“你們等着聽好消息吧！”少時，小南門鐘樓上鐘聲大作，大家拍手歡呼，上海宣告光復。

胡恨生說，那次伶界參加戰鬥的商團，除了潘月樵、夏月珊、月潤以外，還有張順來（武生，張德祿的父親）、馬飛珠（武丑，李春來的下手）、丘治云（即小寶成，早年唱銅錘花臉，後改丑）、薛壽齡、夏月華以及潘月樵的兒子小黎青、小六子和他的兄弟潘少棠等。

胡恨生參加了攻打製造局戰役後，米店老板大不滿意，勒令他寫悔過書，要他表示以後不再有軌外行動。胡不服，即被開除出店。後由王一亭介紹他到製造局所辦半工半讀的藝徒學校（製造局所辦的兩個學校之一，另一個是兵工學校）讀書，和他因受到同樣遭遇而入學的共有六個人。以後他就轉入新劇界，做了演員。

我和胡恨生談起一九一三年我第一次到上海時曾和汪允遊、陳大悲、張雙宜等照過象，還和胡恨生合照過且角時裝象。胡恨生說：“你寫的《舞台生活四十年》里談過這件事，可惜這張象片我弄丟了。有一年我的生日，錢化佛來拜壽，他拿着一個紙包說：‘這雖是秀才人情，可是你一定喜歡。’打開來看，原來就是我們二人合照的象。”

錢化佛也是攻打製造局的商團團員，他最近曾對許源來談過那次經歷。據他說，他的隊長是水果行的老板，姓江，福建人。當時各業商團並非点名出發，整隊前往，而是三三兩兩，或先或後地去的，只有少數在前面打沖鋒的商團手裡有武器，其餘大部分都是徒

手助威。他又談到,当时潘、夏等放火烧木匠的房子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可以說是“智取制造局”。以后民軍攻打南京,錢化佛任先鋒队庶务科长,筹划粮秣給养。入民国后,他退伍改业,曾做过新剧演員、电影演員,与莫悟奇等到南洋表演过魔术,并且对繪画一道也下过工夫,还曾做过图画教員。

汪优遊,初名仲賢,是新剧运动中的健将。他曾在上海組織了“文友会”,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間,先后排演了《捉拿安得海》、《江西教案》两个反映社会现实的戏。以后,他所編演的剧目,大半是針對时事,有的放矢,在当时是很有积极意义的。他的演技好,路子寬,生旦而外还能演老旦,正派反派都能演,文明新戏(最早“文明新戏”这个名詞含有进步的意思,后来走上殖民地商业化的道路,去“文明新戏”的本来意义日远了)而外,还能演京剧。有一年,我在上海排演《生死恨》,內中有一个老尼姑是串通恶少胡公子、出卖韓玉娘的反面人物,汪优遊是黄金大戏院的基本演員,剧务就派他担任这个角色。排戏时,我对他說:“您扮的老尼姑虽是坏人,但不要专用出洋相、說怪話来形容这个角色,一则是这种千篇一律的演法并不高明;二来还会引起宗教界的不满。”他笑着說:“您放心,我自理会得。”在演出中,他和扮胡公子的萧老(长华)在定計一場的对白,工力悉敌,恰到好处,使人感到这个貪財老尼的阴险恶毒是有深度的,而且是典型的。

王钟声在天津被害的經過

王钟声是日本留学生,清末回国后,在上海以禁烟委員身份进行活动。他办了一所“通鑑学校”,以包念书、包出洋为号召,科目有国文、英文、算术、历史、舞蹈、戏剧等等。开学后,他挑选了一些

有演戏条件的学生上戏剧课。有的学生说：“我们是来读书，不是来学戏的。”王钟声回答他们说：“中国要富强，必须革命；革命要靠宣传。宣传的办法，一是办报，二是改良戏剧。”有的学生怕事，同时也认为唱戏不是“高尚”的职业，和家庭商量后就退学了；有的则继续学戏，但这个学校不久就停办了。王钟声组织的春阳社演的第一出新剧是《黑奴吁天录》，接着与任天知排演了《迦茵小传》，以后又不断演出如《秋瑾》、《徐锡麟》、《官场现形记》等宣传革命、讽刺亲贵官僚的新戏。

那时北方的伶人田际云也是有进步思想的，他在上海与王钟声熟识，气味很相投。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的冬天，他邀王钟声领导的剧团到北京，在自己的玉成班演出，地点是鲜鱼口天乐茶园（后改华乐茶园，解放后改为大众剧场）。王钟声的剧团演大轴，称为“改良新戏”，不用锣鼓场面，实际上就是话剧。前面有京剧名角如杨小楼、尚和玉、冀云甫、黄润甫、孟小茹、王长林、张淇林、田雨农（田际云的儿子，唱武生）等轮流演出，阵容极其坚强，这是田际云煞费苦心地为他人组织的。王钟声所带的人不多，主要演员有木鐸（即刘艺舟）、亚方、瞿民、光华等，玉成班的京剧演员如李玉桂、纪寿臣、万铁柱、鲍吉祥、周三元、羊喜寿等也都参加在钟声的新剧内演出。我那时也在钟声演的新剧前面演过《落花园》、《彩楼配》等折子戏。我曾看过钟声主演的《禽海石》、《爱国血》、《血手印》等新戏。我以后排演时装戏就是受他们的影响，其中《宦海潮》那出戏，还是根据钟声演的新剧改编为京剧的。

王钟声也常常带了剧团到天津，在河东意租界演出。那里的几个戏园，建筑很简陋，但因为是在租界里，一些带有讽刺时事的剧目比较不受限制。玉成班的纪寿臣（老生）、万铁柱（武丑）、羊喜

寿(老生)等都跟他去过天津。钟声在那里曾结交过刘子良等一班共同研究改良新戏的朋友。

辛亥年的六月上旬,钟声还在北京演出。那时,他在北方已经活动了二年,风声也一天比一天紧,社会上都怀疑他是革命党。他是浙江人,所以住在全浙会馆里,往来的人比较复杂,会馆里有人告他在会馆聚赌打架。司法衙门把他拘传到案,审判结果,将他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他被递解到山东德州时因遇大水复车(按当时津浦路尚未通车,递解犯人仍由驛站用驛車押解),公文冲没,他被寄押在德州,由德州知州行文顺天府宛平县,重发公文,才解回浙江原籍。

上海光复时,钟声曾参预其事,并在会议席上,因拥护陈其美为都督,与伍廷芳等发生过争执。沪军都督府成立,他任参謀,不久就到天津活动。钟声到津,住在奥租界移风乐会会长刘子良家里,暗中召集戏剧界同行,酝酿起事。由于他事机不密,暴露身份过早,直隶总督陈夔龙密令南段警察总办楊以德逮捕他(当时天津的警务,分南北两段,南段管轄“三不管”及租界外围部分,北段管轄河北一带)。楊以德和各租界的領事館、警察局都是通气的,他事先疏通了奥領事,得到同意之后,便于九月十二日晚間,派探訪局人員到刘子良家里把王钟声和刘子良等六人逮捕,还搜出一顆都督印信和文件信函等等。楊以德向陈夔龙請示如何处理,陈叫他交天津鎮总兵张怀芝办理。张怀芝就把一千人犯解到西門外疙疸洼营中,由軍法官开庭审訊。王钟声承訊到津进行革命活动的事实,并且理直气壮地說:“九月初九日上諭,大开党禁,非据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我是革命党,你們把我怎么样?”軍法官看他振振有詞,无法問下去,只得把原口供交給张怀芝。张怀芝是袁世凱

一手提拔起来的心腹，陈夔龙是看风使舵的巧宦，他们密商了半天，就仰体袁世凯的“宪意”，按行营拿获奸细律将王钟声判处死刑，第二天就在疙疸洼执行了。

关于王钟声临刑时的情景，最近曾访问了老艺人李玉桂。据李玉桂说：钟声被捕后，还有不少戏剧界的同行也被捕去。下天仙的老板赵广顺和楊以德素有往来，他向楊求情说，被捕的人里面真正的革命党恐怕只有王钟声等几个人，其余的人不过是搖旗呐喊的龙套青袍而已，请求从宽处理。楊以德虽然接受了他的请求，但执行那天，却教这些京剧演员到刑场“陪绑”。李玉桂的师弟——唱彩旦的徐来福事后回到北京，曾对李玉桂述说他在“陪绑”时亲眼看见王钟声牺牲的经过：“十月十三日下午，我们就被押到疙疸洼操场上跪在地下，只见几个兵押着王钟声走进来。钟声站定后，面不改色地对大家演说，高呼‘驅逐鞑虏、光复大汉……’，还没有说完，刽子手就开了枪，头一枪打偏了，未中要害。钟声大骂陈夔龙、张怀芝、楊以德是奴才，一连打了十三枪，才倒下去。”

当时官方发布的文告和消息，对王钟声一案是閃躲其詞，有意歪曲的。順直諮議局、直隶保安会的士紳王邵廉、闕凤閣、王振堯、高俊澍、李桀曾等听说枪决了革命党人王钟声，就到总督衙門面見陈夔龙質問此事。陈夔龙说：王钟声出言狂悖，且自认是北軍大都督，供証确凿，所以用軍法判决死刑。王邵廉等表示：值此党禁初开时，誠恐外間誤会，要求总督出示曉諭，以安人心。陈夔龙不得已就出了一张告示：

“……昨据探訪局拿获匪棍七名，訊系造謠生事，意图乘机扰乱。当飭将供証确凿、罪惡昭著之王宗成即王钟声又名王熙普尽

法惩治。其刘子良、朱琦、佟尧山、吳楚湘、陆金浦、曹恩祥等六名俱系招搖撞騙，向不安分，本应严惩，姑从寬分別飭令監禁遞解，用示懲儆，此外概免深究。本大臣此舉，專為除暴安良、保卫吾民起見，決不忍稍有株連，為此出示，仰一體知悉，切勿輕听謠言，誤會疑惑。……”

這張告示是十月十四日貼出來的，可是當地輿論對這件事還是不滿，探訪局於是又給大公報館一封信，替自己辯護：

“……查敵局捕獲王鍾聲，外間頗謂對於革命黨不應如此辦法，是于敵局捕拿之原由當有所未知。查王鍾聲本以演唱新戲為業，實則為戲界中之敗類，宣統元年在天津與某君等合辦大觀新舞台，訛去二千餘元，涉訟有案。本年在北京唱文明戲時犯奸（按原判為聚賭，此信改為犯奸）有案，遞解回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不料其潛行來津，曾與下天仙戲班中人自稱系隨革命軍兵船而來，擬晉京謁見袁宮保等情^①。當經偵查得伊住劉子良家，常於深夜聚集多人，似有秘密之舉動。以遞解回籍之罪人，竟敢來津招搖聚眾秘會，必系欲乘亂煽惑，擾亂治安。故敵局接匪徒捕拿。至其是否為革命黨，並非敵局捕拿土匪之原因。祈貴報將此情節登入來函一門，以供眾覽，而免誤會。”

^① 當時有這樣一種傳說：王鍾聲到津時，汪笑依從濟南演畢，也正來到天津日租界下天仙戲園演出。他們兩人是連襟，鍾聲到汪笑依寓所探親時，外罩斗蓬，內穿軍服，佩帶手槍，當着生人就把到北方來活動的計劃說了出來，致被袁世凱的兒子袁克文聽見了，傳到陳靈龍的耳朵里，因此被禍。探訪局信中所說“曾與下天仙戲班中人”云云，似乎與此種傳說有關，但尚未發現確切的證據。我見過汪笑依，他是一位能編、能導、能演的戲劇家，他在辛亥前後所演的戲，是具有愛國主義精神的。

在这封信旁边，还登了一条王邵廉启事：“鄙人已于十月十八日辞直隶保安会副会长之职。”

接着，《大公报》又发表了华龄等“稟謝”奥国领事馆的呈文：“为拿获土匪，保全地方，而顧大局，合津人民均感事。……窃查天津为首善之区，近以各处警耗频传，全埠人心异常摇动，商业营运，滯塞不通，势有朝不保暮之危，人民涂炭，商賈咨嗟。查各省发生风潮之原因，并非尽属正当革命，皆系土匪煽惑，摇动人心，乘机搶掠，借端詐財。津埠地方，幸蒙貴領事万分保护，始終成全，現又拿获負罪匪犯优伶王钟声等七名，业經分別处治，足征除莠安良，維持地方，保护商业之苦心。刻下閭閻安謐，全体感激，惟有具頌，以表愚衷。……”

从上面这些資料和传说来看，王钟声的牺牲，是由于清朝政府为了妄图垂死挣扎，以及袁世凯为首的軍閥、官僚、偵探、买办等为了維持他們的阶级利益，与帝国主义互相勾結而构成的血腥案件。由于社会輿論表示了极大的憤慨与不平，在正义呼声的压力下，陈夔龙等就不得不一再抹煞王钟声的革命党人的身份，而誣指为“无賴匪棍”，言詞矛盾，欲盖弥彰。而华龄等一篇感恩道謝的稟文，就十分形象地显现了买办阶级的无耻媚外的丑恶面貌。王钟声先生不仅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同时对北方新剧也起了推动作用。当年专演文明新戏的后台，总掛着一张钟声的照片，可見他的影响是很不小的。

刘艺舟“打登州”

刘艺舟是湖北鄂城人，原名刘必成，后来改名“木鐸”、“艺舟”。他的儿子名“双楫”，是从包世臣的《艺舟双楫》书名取义的。

艺舟的父亲是旧水师营一条炮船上的哨官，家境比較寒素。甲午中日之战，清政府割地賠款求和，他受了刺激，就常看象《盛世危言》一类讲时务的书。十七岁那年，他給湖广总督张之洞写了一封信主张变法維新。张之洞接信后，就叫“巡捕”萧某（按当时总督衙門設有文、武巡捕，其性质如同后来的副官）找刘必成来談話。萧是刘艺舟的岳父，就帶了他去見张之洞。张之洞詳細詢問了他的家世和他的志願，刘艺舟表示对洋务新政有兴趣。談到后来，张之洞端起茶杯，戈什哈打起帘子，这本是当年官場送客的暗示，可是刘艺舟不懂得这套官場規矩，还是坐着不动。萧巡捕扯了扯他的衣襟，他才告辞出来。后来，他对那次初見“大人”的情景，从大堂的兵器仪仗架，轎厅的綠呢大轎，花厅陈設，以及一呼百諾的威风，用文字作了諷刺性的描述。他看到中国虽然展敗于外国，賠款割地，但大官对老百姓的架子，竟还是那么不可一世！

不久，刘艺舟被派往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理化专修科讀書。他起初很受玩，功課不好。有一次他在体操場上請日本教师打球，被这位教师拒絕了，还对他說：“刘生，你們同来的十七个学生中，你的功課最坏。”刘艺舟从此在上課时就专心听讲，暑假时也沒有回国，閉戶讀完了一本日本詞典。秋季开学后，他的日本語文大大进步，毕业时居然名列第二。在留学期間，他認識了黄兴、宋教仁等同盟会的领导人。他和王钟声也是在日本訂交的，以后于革命、搞新劇，所走的道路差不多。

他从小就爱听汉調、京戏，在日本看到春柳社演出的《黑奴吁天录》、《热血》等新劇，也很感兴趣，回国后就与钟声等合演新劇，鼓吹爱国思想，揭发清朝政治的腐敗。《黑奴吁天录》的老黑奴，他

演得非常动人。宣統二年間，他和鍾声同到北京在田际云的玉成班演新戏，我們曾同台演出。我記得看过他的《爱国血》、《张汝祥刺馬》（他演竇一虎）等戏。辛亥年，他和光华、燕士等組織了一个剧团到大連、安东、辽阳、威海一带演出，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剧团的成員既是演員，又是武装別动队。当他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便对同伴們說：“黄龙飲馬，光复神州，此其时矣。”他隨即于某天率領全体团员搭乘开往烟台的一只日本輪船，布景道具中有演戏用的大炮、炸弹、旗帜等等。半夜里，輪船将要駛經登州（蓬萊）海岸时，他向日本船主要求登州拋錨，船主和中国买办都坚持不允。刘艺舟对二十位带武装的团员說：“你們給他一点顏色看看。”他們就拔出盒子枪，在甲板上开了一排枪，迫使船主把船开到登州。拂晓时，船靠登州碼頭，汽笛长鳴，枪声齐作。城里的守軍从睡梦中惊醒，以为革命党开了兵艦来攻城，頓时慌作一团，有些人从陆路上逃出城去，一部分人就在城上掛起白旗。当地潜伏的民党开城欢迎。刘艺舟带了队伍整队进城，出示安民，并派人点收軍火、倉庫、錢糧。当地的民党和黃县方面駐軍取得联系，几天后，黃县也光复了。刘艺舟隨即就任“登黃都督”（登州府屬轄蓬萊、黃县、牟平、文登、福山、萊阳、海阳七县，因当时只占了府治所在地的首縣蓬萊和黃县，所以称作“登黃都督”）。

不久，蓝天蔚坐了兵艦，带着二百多名海軍陆战队到登州来拜訪刘艺舟，临行时就把队伍留在登州，充实刘部兵力（藍香山所記蓝天蔚事略称，蓝天蔚任关东都督，馳駐烟台，曾委湯蔞銘为海軍总司令，統率海圻、海容、海琛、海筹四艦。蓝天蔚这时可能是从烟台坐兵艦来看望刘艺舟的）。

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另派胡瑛（号經武，浙江绍兴

人，他的岳父曾在山东做官)为山东都督，刘艺舟改任烟济登黄司令。南北和議达成，清帝退位，袁世凱做了总统，刘艺舟就离开登州，临走时，老百姓送他一套讲究的陆軍礼服，作为紀念。刘艺舟原拟到广州投奔孙中山，路过上海时，經潘月樵和夏氏弟兄邀約，就搭入新舞台，同他們合作演戏。当时戏剧界都认为这是一件梨園盛事，“都督唱戏”这句话曾經流传一时。刘艺舟后来和朋友們談到登州的事說：“我以前爱听梆子《打登州》，还能学几句秦琼唱的唱腔，想不到那次无意中唱了出真的‘打登州’！”

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刘艺舟因为上海的黑名单中有他的名字，就流亡到日本。当时亡命海外的党人，处境是异常艰苦的。刘艺舟就想在日本演劇来維持生活，接济党人。他和“松竹株式会社”訂立合同，并写信約苏少卿（当时艺名寄生）带开明社的演員到日本合作演出。开明社是辛亥以后在上海成立的一个专演新劇的劇团，社长原是朱旭东，成立不久因經濟困难，几至停办，后得苏州举人顧錫林接济，社长也經顧指定改由苏少卿担任。一九一四年，苏少卿和朱旭东带了开明社的十几个演員到了神戶，內有史海嘯、刘天华等；天华的哥哥刘半农也是开明社的人，那次因事沒有去。

在神戶大約有三个月的时间一面休息一面排戏。刘艺舟选定的第一个戏是托尔斯泰的《复活》。刘艺舟把日文剧本翻成中文，由史海嘯飾女主角喀秋莎，苏少卿扮涅赫辽杜夫公爵，刘艺舟自己演的是監獄里的看守班长。第一次在大阪演出，日本文艺界和华侨都来看戏，輿論不錯。末一場戏描写一批囚犯被押往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去，囚犯們帶着手铐，拖着脚镣，背着行囊，女的抱着小孩，勇敢地向俄罗斯“死人之家”前进。喀秋莎随着行列，唱着一首

凄凉沉郁的短歌。以善演喀秋沙的日本女演员松井须磨子^①每次唱到这首短歌时，观众总禁不住纷纷落泪；开明社演到这里时，观众也很受感动。

另外一场戏里，原来有涅赫辽杜夫公爵到监狱探望喀秋沙时送看守班长一点钱这样一个情节。日本警察署向剧团交涉，认为不应在舞台上表演行贿，所以以后改为公爵送班长一支雪茄烟。

从大阪演毕，到东京本乡座演出时，日本戏剧家岛村抱月和松井须磨子夫妇曾来看《复活》，还到后台赠花。

继《复活》之后，又排《林冲》，刘艺舟编剧，从倒拔垂杨柳起，杨志卖刀，白虎堂，起解，一直到风雪山神庙，火烧草料场止。刘艺舟自饰林冲，苏少卿演陆谦，剧团里有一位姓刘的女演员扮林娘子张氏（当时男女合演之风未开，且角都由男演员担任，这个女演员是跟着她父亲一同到日本的）。这出戏中有些场子，是采用京剧形式，用锣鼓、胡琴起唱的，而行头、道具、乐器等等剧团都没有，只得向广东俱乐部票房借用。票房的人也参加帮助演出，但他们不会搞京剧场面，还得由开明社的人自己动手。刘艺舟搭过新舞台，苏少卿在家乡徐州时就学过京戏，都有些经验，可是没有人会打鼓；后来打听到朝鲜某大学的中国教授李先生是京戏票友，会打鼓，就

① 松井须磨子是岛村抱月一手培养起来的女演员，以善演剧中的西洋妇女著名，成为东京文艺协会、艺术座的台柱子。当时日本新剧女演员扮西洋妇女，在言语动作上往往演得比较生硬而不很自然，但是松井须磨子并未离开过本土，而她的演技却超过了曾经游历欧美的森律子、川上贞奴。她最拿手的是演《复活》的喀秋沙，上演后不到一月，喀秋沙黯然销魂的惜别歌声，流行全国。一九一八年冬岛村抱月逝世，松本须磨子痛失知己，竟以身殉。以上情形是我在一九一九年春第一次赴日演出时，日本戏剧界的朋友对我讲的。

把他請了來，這出戲才能上演。劉藝舟的林沖演得很好。他本來熟讀《水滸》，對林沖的性格深有體會；而且他流亡海外已經二年，這種現實生活更能幫助他把林沖的充軍異地的抑鬱心情充分表達出來。他還到吳服店買了一個大葫蘆，掛在槍頭上。風雪山神廟一場，林沖持槍從“花道”（按日本舞台的結構三面出入，花道在觀眾席當中）走到台上站定後，有一段獨白，劉藝舟模仿一位日本歌舞伎某名演員的神氣，念得字字有力，引起觀眾一片熱烈的掌聲。《林沖》的海報上寫着劉藝舟主演，他在日本文藝界有聲望，所以頗有號召力。但這個戲因為借人、借東西困難不少，而那位李先生也不能久呆在劇團里，所以只唱了幾次就改演別的戲了。

一九一五年，中國留日學生回北京請願，反對二十一條，劉藝舟也在其內。袁世凱一面派人去應付他們，叫他們不要“輕信謠言”，一面把他們分別派到總統府和各衙門當顧問、諮議，只拿錢不辦事，企圖以此來收買、羈縻他們。等到袁世凱籌備做皇帝，蔡鐸在小鳳仙掩護下逃出北京到雲南起義討袁時，劉藝舟就被袁逮捕關在北京，一直到袁世凱死後，黎元洪做了總統，才恢復自由。他出獄後就編寫了一出京劇《皇帝夢》（又名《新華宮》），到漢口滿春戲院演出，他自飾袁世凱。上演那天，轟動一時。第一場是高級文武官員站立兩廂，袁世凱頭戴白纓軍帽，身穿藍呢帶金綫肩章的陸海軍元帥制服，鵝行鴨步般走出來，（這套陸軍制服就是登州老百姓送給劉藝舟的）。袁世凱升座後，站立兩廂的眾文武官員一齊向他勸進，當場決定籌備大典，擇日登極。

另一場，袁世凱穿着窄袖龍袍出台。劉藝舟模仿劉鴻昇的腔調，唱了一段西皮：“孤王酒醉新華宮，楊哲子生來好玲瓏。宣統退位孤的龍心動，那怕他革命黨的炸彈凶。孫中山革命成何用，黃克

強本領也不中。天下的英雄虽然众，哪一个逃出孤的計牢籠。梁士詒理財真有用，虽然是民穷孤的庫不空……”。接着下面內侍报：“万岁爷，大事不好了，大太子聞听各省官民紛紛反对帝制，忧愁成病，发起瘋来了。”紧跟着內侍攙袁克定上。袁世凱对他說：“克定，你为何这等模样？”克定就举拳打袁世凱，同时唱：“袁世凱休把克定来喚，我是你祖宗袁甲三。”袁世凱立刻跪在地下說：“有何分付？”袁克定瘋瘋顛顛地責备他不該殘杀党人、私通外国，做了总统还要做皇帝，众叛亲离，去死不远了。袁世凱再三分辯，說是大家劝进，各人都想升官发财，因而架弄他。……

这场戏把袁世凱的奸相和丑态，形容得淋漓尽致，因此触怒了袁世凱的党羽湖北督軍王占元，密令夏口县緝捕刘艺舟。幸而有人事先通了消息，他在演戏中途听到这个警訊，来不及卸装就逃离汉口。

他还編演了《石达开》（又名《哀江南》）这出戏，意在通过太平天国的內鬨事件来諷刺民国初年革命党人的爭权夺利。刘艺舟演石达开，第一場众将站門，石达开戴“蓬头”（披发），包紅巾，戴面牌，揉紅脸，身穿对襟窄袖素紅緞长袍，紅綵袴，紅緞薄底靴，大踏步走出来，站定念詩：“聞鸡起舞壯心雄，扫尽胡儿出汉宮。”收拾中原干淨土，好栽香草遇春风。”接着香案摆上，烧香，焚表，祭旗，石达开念一段誓师文。当他走出桌子，站到台口，慷慨激昂地念出“請看今日之城中，竟是誰家之天下！”这两句戏詞的时候，气势十分沉雄磅礴，特別吸引观众的是他那威猛而凝練的眼神。这大概因为刘艺舟做过登黃都督，有亲身的生活經驗，所以很能表现一个太平軍开国大将的风度。

石达开哭楊秀清一場，他唱：“一煞时流热血乾坤遍洒。說什

么共生死再造中华。到如今才知道人心险诈，王兄呀，拿住了韦昌辉定要杀他。”后面怒责韦昌辉不该谋杀杨秀清的大段念白，嗓音微哑而沉着苍凉，非常深刻地表达出石达开的那种悲愤心情和坚持正义的性格。张难先老先生曾谈起，有一年在武昌请一位广东朋友过江看刘艺舟的《石达开》，看完了，这位朋友翘起拇指说“好！真象个石达开。”刘艺舟每次演出这出戏，观众中经常有老同盟会的人，他们看到戏中悲壮动人的情节，抚今思昔，竟至感动得流泪。

刘艺舟的表演，着重在表达人物的感情，不大拘守舞台上的成规，他说：“场面应该跟着我走。”这样，一般的戏曲乐师就感到不易配合。有一年，他碰到一位琴师，居然能够随机应变，配合他的表演，他认为是个知己，可惜不久就分手了。

一九二二年的夏天，黎元洪的秘书长饒汉祥替他母亲做寿，在江西会馆唱堂会戏，约我演《虹霓关》。我到会馆时，看见戏台上贴着一张红纸，上写：“刘艺舟《化子拾金》”，我就坐在前台听戏。昆曲的《拾金》有准词，而京剧的《化子拾金》则和《戏迷传》、《十八扯》性质相同，每个演员的唱词都不一样。刘艺舟出场后学了一段京剧老演员刘景然的《铁莲花》：“这大雪止不住纷纷落下……”，连唱带做，很象“叫街刘”（刘景然的外号）的味道，博得热烈掌声；随后走到台口，手拿一张写着刘艺舟三个大字的红纸片，对台下说：“我就是刘艺舟”，接着又唱了一段现编的讽刺军阀内战的唱词。这时候吴佩孚刚刚打败了张作霖，徐世昌被阉下台，黎元洪又做了总统。他唱道：“站在长亭泪如梭，尊声同胞听我说。实指望革命有结果，实指望重整旧山河。牺牲头顱千万颗，那知道，大盗窃国，任用私人，增加国债，捐税重重，到处泪痕多。以暴易暴百姓反遭祸，到如今依然是军阀专横的假共和。拼命夺来了地盘未必你的子孙真

能坐，人壽百年能幾何？勸你們放下屠刀，種福田結嘉果，大家同唱太平歌。”因為這段唱詞非常切合當時時事，大家都喝采鼓掌。但是賓客中就有幾位大軍閥在內，我當時暗忖，這些人听了這段唱詞，不知作何感想。

劉藝舟帶了劇團到各地演出時，每個碼頭都待不長，因為他在演戲時，喜歡見景生情，借題發揮，諷刺軍閥官僚，因而往往觸怒當道，不得不丟下行李，化裝夜奔。有一次到長沙演出，新聞記者問他：“打算在這裡唱多久？”他笑着回答說：“我自己不知道，那要看你們地方官让我待多久。”儘管不斷地受到種種歧視和威脅，过着流離困厄的生活，但他始終沒有改變他的宗旨。國民黨當權時，元老中如于右任、丁惟汾等人都是他的老朋友，有人曾勸他活動個差事。他的答复是：“我見到從前的老友，至多請他們買幾張戲票捧捧場。象我這種脾氣，做官是不合時宜的，還是唱戲可以吾行吾素。我之喜歡唱戲，就是因為能夠借舞台來說出我心里要說的話。”

劉藝舟在辛亥革命後，雖然沒有直接參加政治活動，但他的言行却並沒有脫離政治，這從他在大連組織勵羣社的一篇小啟里可以看出他的這種思想傾向：

“……吾心之向，提倡人權；吾志所趨，剷除國賊。人濺之以銖血，吾濺之以心血，同利于國，利于身。吾志未酬，吾心不死！吾國一日不強，吾舌一日不敵。有生之日，即吾奔走鼓吹之年，碎骨粉身，亦吾之所不計。豪者自豪，偉人自偉，吾行吾素而已！知我者，當在謳歌俚曲之間，而覺愛國勵羣之道，則吾道不孤矣。”

一九三七年抗戰前夕，我帶了劇團到漢口大舞台演出。漢劇演員吳天保請我吃飯，得與劉藝舟和漢劇前輩余洪元相見。我以前雖然認識劉先生，但一直沒有深談過，那次我們談得非常痛快。

刘先生看过我的《金山寺》、《断桥》，他提出对《白蛇传》这出戏的看法。他说：“这是一出涵意极深的反封建的神话戏。在戏里面，法海代表着统治阶级，许仙代表着小商人动摇分子，白蛇、青蛇代表着一般被压迫的民众。”这种论调，在二十多年前的戏剧界里是很少听到的。我对他的印象非常之深，饭后，我们还合照了一张象。分手后不久，刘先生就逝世了。

我最后一次和刘先生见面时，他由蒲伯英资助，刚从四川回到汉口，剧团已经解散，生活相当困难，幸而汉剧、楚剧办了一个训练班，请刘先生讲授戏曲理论，维持生活。但就在那种贫困的环境下，他还是谈笑风生，仍然是那么洒脱，那么豪迈不羁。

有一次他在病中，听说《文摘》月刊上登载着史沫特莱女士报道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文章，就辗转设法借来阅读，对于抗日救国的共产党，表示了崇高的敬意。刘先生晚年所写的自传里说：“我留过学，当过教员，做过都督，唱过戏，讨过饭，坐过监。就是这些经历，使我眼睛越来越亮。我决心要做一个斗士！”

刘艺舟先生虽然逝世二十多年了，但他热爱革命、热爱艺术的精神，锋利的口才，旺盛的斗志，都是令我永远难忘的。

田际云的政治活动

田际云是著名的梆子花旦，艺名想九霄，与侯俊山（老十三旦）齐名。他演技好，能编戏，性格刚强，热心社会改革运动。当时伶界有一种“私寓”制度的陋习，即一般有钱有势的人可以去演员家里设宴招待朋友。田际云积极主张废除这种坏制度，他自己首先拒绝了这种酬应。《京话日报》创始人彭翼仲创办的“济良所”（妓女受恶霸、鴇母虐待，或不愿从事实笑生涯者，可自投济良所，请求

收容,以便择人而嫁),他也曾参預其事。我于一九一三年搭田际云的翊文社时,田先生鼓励我根据《京話日报》揭发娼寮恶霸张傻子的罪行因而使他受到惩办的故事,編演京剧时装戏《孽海波瀾》。我曾在《舞台生活四十年》里具体紀述了这个戏的編演經過。据田际云的徒弟李玉桂(曾与田同在清宫当差)說:“戊戌政变时,田老师与康有为、梁启超等往来甚密,并从戏箱里夹带大批时事新书运进宮去,供光緒帝閱讀;又暗中带进去一批洋式軍服,光緒帝曾經試穿着軍服练习仪式,准备以后在閱兵大典时穿戴。这批軍服是田老师排演新戏《征南蛮》时特地到上海定制的。”(按当时戏班里有此传说。)慈禧太后重新垂帘訓政,将光緒帝軟禁瀛台^①,杀害譚嗣同等六君子,通緝康、梁时,同时有諭旨逮捕田际云。因为有人暗通消息,他連夜赴天津,乘英商輪船逃到上海,住在夏月恆弟兄家里躲避。事过境迁后才回北京,仍組織了玉成班,在宣統初年邀王钟声、刘艺舟等有进步思想的新剧团来京演出。辛亥命革后,“精忠庙”^②的旧制度无形消灭,由于田际云的号召,成立了正乐育

① 据內廷供奉余玉琴告訴我:“慈禧太后当时會派亲信太监乘着小船,在瀛台水面昼夜巡邏,严防外人私通消息。梨园行的人甚为不平,我和王楞仙等因为臥得几个接近光緒帝的老公,就把我們藏在船艙內带过瀛台,慰問光緒帝,并且清唱为他解悶。”此說确否待考。

② 精忠庙在东大市,前清时是梨园行一个說公話的地方。由內务府堂郎中(按堂郎中专管宮內宫外有关戏剧事項)委派本行有声望的四人为“首事人”,指定精忠庙为法堂,因此簡称“庙首”。庙首負責处理大小事項,輪流值年。尋常的小糾紛,就在庙首家里解决,遇有重大事件,庙首自己不能处理时,才通知其他三个庙首召集各班“言公人”开堂判断,名为“研庙”。言公人大半是管事的和打鼓佬。再有更严重的事,值年庙首就要請示堂郎中处理,名为“跪堂郎中”。

化会^①，梨园行公举譚鑫培为会长，田际云为副会长。一九一二年黄兴等来京时，正乐育化会的全体会员在贵州会馆开大会欢迎，并摄影留念，我那时才十九岁，也参加了这个欢迎会。以后，田际云还创办了崇雅社女科班，培养出一批女演员。我的爱人福芝芳就在十六岁那年（一九二〇年）搭过他的崇雅社，在城南游艺园演出。她是唱工青衣，也是我的老师吴菱仙教的，常演的戏是《探母配》、《祭塔》等，和她同时搭班的还有金少梅、于紫云、李伯涛等。田际云在后台看芝芳的戏，认为她有点出息。田先生那时已经年老多病，常常拄了拐杖到她家里去闲谈，鼓励她用功学戏，并多看我的戏。由于罗瘦公的介绍，我和芝芳在一次宴会上见了面，以后，我到城南游艺园看了她的戏，她也常看我的戏，一九二一年的冬天，她就嫁给了我。

我和田际云先生相处的日子虽不多，但觉得他是一位勇于改革社会恶习、有胆有识、不畏强御的先进人物。他曾因结交康有为、梁启超、王钟声、刘艺舟、彭翼仲等而遭到顽固腐化的清廷的借故逮捕囚禁，这并没有减弱他的斗志。田先生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辛亥革命，但他的作风是符合当时人民的利益的。

① 正乐育化会是民国初年梨园行一种新的组织，曾向京师警察厅呈准立案。北京每年荟萃各班名角举行大规模公演是正乐育化会首开其端的，北京戏剧界遇有对外活动，也多由此会出面。我还记得一九一九年到日本演出之前，京中同行曾用此会名义替我饯行。但因会内无专人负责，日常会务很少。以后由少数同行共同出资救济本界的孤寡户，又于每届农历年终以窝窝头会名义举办义演。旋即成立梨园公益会，解放后改为京剧公会。

結 束 語

从以上所述几位戏剧界前辈和同人在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事迹中，不仅看到腐朽的清朝统治崩溃的一个缩影，同时也确实反映出五十年前的辛亥革命是当时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我们戏剧界的前辈、同人与先烈志士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地投入了这个“合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羣之需要”的革命，为这次革命作出了光辉的贡献。在参加革命过程中，他们既是“宣传队”，又是“武装别动队”。他们除了用手枪炸弹同敌人作战之外，还以自身特有的艺术武器——戏剧——来武装群众的头脑。在五十多年前的这样一个文盲众多的大国，这个武器的作用就显得更大，在打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传播与灌输民主思想方面，他们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另外，在搜集资料、运用资料以及资料的组织归纳方面，我也有两点体会：

第一，由于旧中国的戏剧工作者的社会地位不被人重视，这一方面的原始材料相当贫乏。这部分材料中间有些简直可以说是“抢救”出来的，在这里我由衷地感谢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英明与适时。例如，王钟声临刑时的情况是八十五岁的老艺人李玉桂提供的；许姬传同志又以当时报刊拿来核对，考证了王钟声的被害经过，同时还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背景。许源来同志在上海替我访问了六位老人，对潘、夏等伶界商团参加革命经过，作了仔细的研究。例如潘月樵的早期历史是八十二岁的老艺人潘桂胜述说的。七十八岁的钱化佛先生和新舞台的救火员吕老人提供了许多口述材料和文字记载。还有周南陔、苏少卿等老先生

都供給过极有价值的資料。此外，我还参考了欧阳予倩同志所写的《自我演戏以来》，而吳性裁先生从香港寄来的有关夏月珊、月潤的資料，也充实和訂正了某些細节。在写作过程中，阿英同志不仅供給資料，还为这篇文章作了指正和潤色。这些資料如果不是为了紀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而进行訪問搜集，恐怕就要湮沒失传了。

第二，在运用資料方面，我在核对口述紀录与文字記載时发现几种情况：有的两相符合；有的大有出入；还有的基本符合，小有出入。第一、二种情况比較容易处理，第三种情况就要寻找旁証，慎重地分析、鑑別、判断，选出最接近事实而又比較合理的說法。例如攻打制造局的过程，一說曾相持了二三天，另一說当天就攻进去了，但二者都說陈其美关在里面。我們查考了各种資料，以为当天解决比較合理。此外刘木鐸同志（原名双楫，抗战时他参加洪深同志领导的演劇队，承袭他父亲刘艺舟早年艺名，改名“木鐸”）提供的材料，是他少年时听他父亲談起的一些事例，就要費更多的力气来引証貫串，并有所取舍。

总之，在写这篇文章过程中，由于进行了調查研究，不仅熟悉了戏剧界参加辛亥革命的情况，同时也对当时的局势作了一次很好的学习，起了温故知新的作用，因而收获是不小的。

辛亥革命前后 保定革命运动回忆录

刘 仙 洲

辛亥革命前后，我正在保定读书，并在前清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即加入中国同盟会，所以当时在保定的革命运动多曾亲身参与。现在根据确能记忆的事实追录如下。

（一）中国同盟会河北支部^①的成立

到武昌起义

中国同盟会河北支部的創始和发展

前清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秋季，蠡县陈幼云（兆翼）先生去日本留学，后来加入孙中山先生等在日本东京所組織的中国同盟会；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在弘文学院毕业后回国，担负着組織同盟会河北支部的使命。他到保定以后，先被聘为保定北关崇实中学的理化教員。崇实中学是保定高等师范学堂的教务长（那时叫教务提調）李备六（諧璜）和国文教員步梦周（以庄）等創辦

① 因当时这一支部的范围不限于直隶省，所以叫河北支部，不叫直隶省支部。

的。他們創辦这个学校,只是“为教育而教育”,并没有什么远大的目的。陈幼云先生带回来一部分宣传革命的书报,如《民报》、《天討》、《支那革命之运动》、《革命軍》等。不久,他就发展了历史兼国文教员郝仲清(濯)、英文教员郭瑞浦(凤洲)、教学兼地理教员苏少衡(莘)等加入同盟会,并经常向学生宣传革命思想。我那时正是崇实中学的学生。因为他们四位先生担任的都是主要课程,教的成绩又都很好;同学们对他们的信仰都很高,所以宣传的效果很大。我有一次到郝仲清先生住室去问功课,他拿出《民报》来让我看。我翻阅了一下,非常喜欢,问他能不能让我拿去细看一两天。他说可以。但是嘱咐我说:“这是犯禁的书,要谨慎一些,先不要让一般的同学看。”我如获至宝,象偷着看父兄不让看的小说那样,一两天就看完一册,又去换别的。他在讲历史和国文的时候,常常借题发挥,提倡民族思想和革命思想。我记得有一年年考,他出的国文题是“湯放桀武王伐紂論”。这在当时是很不平常的,对于不少同学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当时我曾问过:所有那些有关革命的书报是怎样得来的?据说:除了陈幼云先生亲身带回来的一部分以外,继续由日本购买是采取下列两种办法:一是经过保定西关耶稣堂长老会一位中国长老周亢宗先生,由日本寄来的书报都寄到他那里,由他转给陈幼云先生(因为周长老是陈先生的同乡,并且也加入了同盟会。现在北京工业学院周康之副院长是他的侄子)。一是经过保定小金线胡同一家日本人开的宫崎洋行,他们由日本买来以后,再卖给我们(后来听说这家私开的洋行是一个日本的特务机关)。总之,这样作都是有点依靠外国人的势力;但当时对此问题,大家都缺乏认识。

崇实中学的校长(那时叫监督)高某思想顽固,对于几位进步

先生的思想和行动后来也有些觉察出来，就常常直接或间接地加以干涉。有一次他宣布几十条开除学生的条例，其中有若干条是针对着学生具有革命思想而发的。陈幼云先生认为有些不对头，就在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冬首先离开了崇实中学，并联合十几位同志就着保定西关公立第一小学创办保定育德中学。大家公推陈先生担任校长，光緒三十四年春正式开学。主要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培养多数的革命青年，另一方面也作为中国同盟会在保定秘密集会的场所。就在这一年的春天，我同一位同班同学贺季高（肇城）经郝仲清、苏少衡两位先生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加入的仪式是在保定西关张公祠（当时由育德中学租作教职员宿舍）举行的，陈幼云先生是主盟人。他让我们每人亲笔写一张入盟誓词，我记得内容的大意是：“入盟人当天发誓，志愿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矢志不渝，有始有终。倘渝此盟，俾众共弃。”下边是入盟人签字，主盟人签字和介绍人签字。我们写好以后，他把同盟会的目的和情况大概向我们说了一下，并给我们讲了一些勉励的话。

我们一部分具有革命思想的同学对于崇实中学的校长高某一向很不满意。到今年秋季，他以看犯禁书籍为理由给贺肇城记了一大过。我们就发动了一次风潮，聚集好多同学拥入他的办公室，质问他，叫他收回成命，站在后边的同学甚至有骂他的。结果，我和贺肇城、张海珍、贺启芳、张赞勳、马秉鐸等被他开除。因为我是班长，所以开除名单上把我列在第一名。接着有两班同学一齐罢课，并搬到客店去住。后来，由陈幼云先生出面调解，让我们几个人转入育德中学肄业，其他同学仍回校。到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郝仲清、郭瑞浦两位先生也都到育德中学去任教。

陈幼云先生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是相当强的，我记得他当时发展同盟会会员，首先注意保定东关陆军学堂的学生。他经常用请他们到中学来兼任体操教员的名义和他们联系，并从中进行工作。后来在九江、太原、昆明、北京等地先后参加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倒袁之役和倒曹之役的军人耿鹗生(毅)、刘越西(廷森)、刘竹坡(汝贤)、刘晓嵐(云峯)、孙禹行(岳)、张玉衡(璧)、王紫斋(文山)、李晓仑(竟容)、甕巨卿(秉鈞)、周敬孚(思誠)、安溯顔(桂馨)、馬喻峯、刘耀奎、商啓予(震)等，都是当时入盟的人。教育界入盟的如李錫九、郝仲清、苏少衡、郭瑞浦、王則雍(德涵)、王濬明(秉哲)、张紀五(官云)、何德輝(凤华)、靳东閣(梅溪)、王国光(喜曾)、戴維吾(德馨)、张廉甫(清泉)、王虎臣、王劍志、刘古风、錢来苏(拯)、賈聘之(儒珍)等，人数也不少。

一九〇九年春，陈幼云先生因积劳病故。陈先生气量宏毅，做事开展，对人诚恳和蔼，凡同他接触过的人多容易受他的感化。我记得他最后由家中来人接回家去养病的那一天，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嘱咐我说：“将来的革命工作主要是你们青年的责任。我们学校的目的主要也是想培养一些‘可靠的’青年(他对人的品质经常好说‘可靠的’三个字)。现在盟里和学校的事情有我们这几个‘破人’(因为他有病，所以自称为破人)支撑着，你们应该在学问上努力，多作准备……。”他这几句话使我极为感动，终身不忘。当他病到很危急的时候，学校曾派郭瑞浦先生去探望。据郭先生回校报告说，他临终时仍谆谆以会务和校务为念。同人听了，多为之坠泪。不久育德中学的发起人公推郝仲清先生为校长，同盟会支部也推他为主盟人。

同盟会的外围組織

在同盟会支部以外，我們在青年学生里边建立了一个外围組織，担任在本校和保定其他学校发展党员的任务，用种种方法向各校学生宣传革命思想，但先不輕易介紹加入同盟会。当时宣传的方法，除了人对人直接联系以外，經常用的是油印革命书报上的好文章，由邮局寄送，但不写明是由誰或由哪个学校寄去的。寄送的对象則多是經過事先調查的各校成績优良、思想进步的学生。油印的内容采自《民报》的較多，有时也采当时在上海出版的《国粹学报》上具有民族思想的文章。我們把这些油印品寄发以后，更由各校的少数同盟会会员了解他們的反映，以便进行联系。这样，我們便把各校比較进步的学生联系在一起。少数条件成熟的就介紹加入中国同盟会，大多数則暂时不向他們說明，但共同的目标都是反抗清朝，进行革命。至于組織的名称，起初用过“实行会”，到辛亥年前一年的冬天，有保定高等农业学堂的几个学生加入，曾改用过“共和会”，并刻了一个“天赋人权”的图章。

根据我現在仍能記憶的，当时各校加入这一外围組織的，育德中学有楊笠农(育森)、赵宏模(維范)、张兆丰(献瑞)、馬秉鐸、张贊勳、张海珍、赵濯民(春江)、王蓬秋(云海)、李錫勇、李鏡清(澄寰)、常介眉(寿祺)、张晦菴(在田)、张沃田、蔣步墀(蓉圃)、于輝秋(桂林)、靳宝珍、賈佩珩(怀珍)、王晓舟(乘乾)、李穎孙(鶯)、李頤予(言)、曾广倬等。高等师范有南琴軒、刘准秋、张雨岑、张逸云、时得霖、乔嗜冰等。高等农业有胡新三(后改为鄂公)、熊得山、李尧衢、鄭康汉等。法律学堂有許潤民(文泉)、刘新如等。盲哑学堂有教員薛成华等。陸軍学堂有周季展、张文等。姚村陸軍小学有刘

斌、刘香久、馬葆珩、鄒莘田、王榮九、张雅齋、上官悟塵(光華)等。

(二) 武昌起义到一九一二年四月前后

武昌起义以后在保定及石家庄的活动

武昌起义以前一两年内，由保定陆军学堂毕业的同盟会员已有一部分分发到各省的新军，有的担任下级军官，也有少数担任管带(相当后来的营长)职务的。武昌起义后，他们对于所在地的革命运动多有相当的贡献。在保定第二镇和第六镇的下级军官中也有少数同盟会会员在待机而动。郝仲清先生经常与第六镇统制(相当后来的师长)吳祿貞和他的参谋何叙甫(遂)等联系。到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旧曆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各校停课，育德中学就变成保定一带革命的总机关。郝仲清先生居中策划，日以继夜。十月三十日(旧曆九月初九日)，山西宣布独立，即派王澐明、张纪五两位先生亲身到太原联络。十一月三日(旧曆九月十三日)，清廷命吳祿貞率第六镇的一协(相当后来的一旅)到石家庄，第二天并任命他为山西巡撫，使他由正太路西攻，目的是使革命队伍互相残杀。吳未受这种奸计的欺騙，并亲身与閻錫山在娘子关会面，声明愿共同进行革命，决不就山西巡撫之职。当时公推吳为燕晋联军大都督，閻錫山副之，并議决由石家庄回军保定即宣布独立，成立燕晋联军都督府。事前，曾有陝西同盟会支部的一位李敬之先生应邀到保定育德中学教会我和赵濯民、王蓬秋、刘准秋等装配炸弹的技术，并装成一批，放在理化仪器室内，以备应用。燕晋联军大都督的关防系同学张海珍所刻。安民布告三种也由王則雍先生预先拟就。当时大家都极为兴奋，认为数日之内国事当大有变化。

吳祿貞被刺及其对全局的影响

正当保定同人們殷切期望吳由石家庄回軍保定的时候，不幸吳于十一月六日(旧曆九月十六日)被清廷賄买的周符麟和馬蕙田等所刺死。周符麟原系第六鎮的一个协統，不久以前才被吳祿貞撤职，馬也是第六鎮的一个軍官，常以吳待他刻薄而心怀怨恨，所以他們很容易被人收买(也有人說是受袁世凱收买的)。何叙甫在混乱中逃出，并在某寺换上僧人的服装逃回保定，到育德中学才换了便衣。

这一变化的发生对当时革命的全局影响很大。因为袁世凱于十一月一日(旧曆九月十一日)才被任命为清廷的内閣总理，那时他正在信阳督师。倘吳祿貞回軍保定，宣布独立，袁世凱即无法北来。再加以灤州张紹曾等的响应(吳去石家庄之前已与张有联系)，则当时清政府必立陷于傾复，袁世凱无論如何狡詐，也无所施其伎倆，最多在武汉一带多打几仗；那末，后来为了委曲求全，把政权轉交给他的局面或不致实现，辛亥革命的全局将是另一种情况。

保定方面力持慎重，只进行阻碍北軍南下工作

当吳祿貞被刺的消息传到保定以后，有一部分同盟会會員队为原計劃虽遭失敗，但是一一定要在保定发起暴动，以振奋北方的人心。郝仲清先生考虑結果，队为不宜輕动，因为保定已沒有我們可靠的軍队，只由党人发动暴动，恐立被扑灭，对整个大局沒有多大实际意义，徒使同志們和地方人民遭受損失。这种情况被当时保定的藩司凌福彭偵悉，他曾託保定某紳士向郝先生暗通款曲，希望不要暴动，并說：“必要时可以合作，共同宣布独立。”郝先生一笑置

之。吳祿貞被刺后八天，即十一月十四日，袁世凱就回到北京，組織內閣，并令段祺瑞为湖广总督（与任命吳祿貞为山西巡撫类似）。为了阻碍段祺瑞的军队南下，曾由同盟会会员某（忘其姓名）去河南新乡破坏黄河桥。我和許潤民并带着雄县的一位武术家（也忘了他的姓名）去轰炸唐河桥。但是这两次都因炸弹的力量太小，沒有炸毁。炸唐河桥，因为是我亲身参加，記得还很清楚。事前先由我同张贊勳和一位陆军学堂的学生周季展去那里作了一次勘查，看看哪里可以安放炸弹；回来又請陆军学堂的一位教官对所用炸弹的力量作了分析和計算，认为力量够大。去以前，把两个炸弹用药捻連在一起，共綁在一根粗香上。先把香的外头燃着一下，然后灭掉，以便临时容易用另一根燃着的香点着它。我們把两枚炸弹一起放在一个大手提包里。去的那一天，我們三人坐晚車到清风店車站下車，天已昏黑。然后沿着铁道向桥走去。到达桥头以前約一里来路，我就点着一根香，到桥上第三节的地方，把着道木的一头下到桥墩上。他們两人拿着手枪在桥上保护着我。因为正在冬天，护桥工人当列車过去以后都到房里去取暖，所以一点沒有被他們发觉。我把两个大炸弹放到桥墩上几块鋼板的中間，然后用燃着的香头把炸弹上的香引着，然后爬上来，再沿着桥板走到南头。离桥以后，就不再沿着铁道綫而是向东边的一个抄道走下去。走了約半个钟头，听到轰隆一声巨响，隨着看到那里有一两点灯光。我們推断一定是护桥的工人出来察看。我們又走了一个多钟头，并且方向轉向西南一些，才到了定县車站，在一家小店里住下。当时我們还不知道轰炸的結果怎样。又过了一个多钟头，听到由南边来了一列車，停在車站。我們就說：“看这列車是不是向北开，如果不开，我們就是成功了；如果开，那一定就是无效。”待了不久，

这一列车一拉汽笛，向北开了。我们就断定是徒劳了。

我们来的时候，邀着那位武术家同来，本来是希望他为我们壮胆，万一遇到敌人，更希望他帮助我们抵挡。不想他的胆子比我们还小得多。到小店以后，许润民和我都很坦然，并且把皮包里带有炸药味儿的报纸拣出来，同烧坑的秫秸一齐烧掉。那位武术家反有些沉不住气，身上发抖。我们安慰他，并且让他第二天一早买票先搭车回保定。我们两人决定步行一站，要看看到底炸得怎样。我们经过桥上的时候，故意走得慢一些，看到放炸弹的地方只是轰了一片黑，桥下冰上有一些碎片，桥的结构一点也没有损坏。到了清风店车站，知道南来的车时候还早得很。吃了点东西，我们就又往北走。途中遇到一个小庙，里边塑着神象。看看前后左右都没有人，许润民就拿出那支手枪来，对着神象练习了一下实弹射击。走到望都车站，我们才买票回到保定。

第二次在石家庄的活动

吴禄贞在石家庄被刺后不久，清廷派张锡璽为山西巡抚。他带曹錕第三镇的一部分队伍开到石家庄，一方面想沿着正太铁路向西进攻，一方面当时已开始和谈，准备万一和谈不成就继续南调。其中炮兵一营是同盟会会员刘越西担任管带，夔巨卿担任一哨的哨官。那时我同张赞勳也在石家庄，住在一家客店里。有一天，决定由刘越西领导着再在石家庄发动一次暴动。他们在某处开会（因为他们都是些军官，我们两人没有参加），决定由炮兵领先，听到炮响后一齐响应。不料整整一夜也没有炮声！第二天夔巨卿才告诉我们说：“昨天散会以后，刘越西马上接到命令，叫他带着大炮六尊西开，他措手不及，还没向下级布置好，就接到命令，只得上

正太路的火車西行。”后来在太原时，刘越西才說，他到达娘子关东边的雪花山附近，仍令司机接着向西开，司机不肯，把車停下。他不得已，就下車步行着投入晉軍。余下的一小部分也沒有敢动。

到一九一二年初，閻錫山当了山西省都督时，委刘越西担任晉軍第二旅旅长。不久和議告成，孙中山先生把总统的位置让給袁世凱。同人們多不滿意，认为袁世凱决不可靠，一定达不到革命的目的。当时同盟会的會員們談起来，都說：“要准备倒袁！”因为刘越西知道我学会了装配炸彈，所以邀我前往。又因为当时完县的情况很紧张(詳后)，我就同完县劝学总董高贊唐(登瀛)一同到太原去帮他。他名义上委高担任書記官，委我担任軍需，实际上是为倒袁作准备。

我記得刘越西当时曾很詼諧地編过一付对联：“參謀謀去头一个，管帶帶走砲六尊！”上一联指的是吳祿貞的參謀何叙甫先生，因为他担任參謀的結果是被敌人把吳的头割去。下一联是指的他自己，因为他担任第三鎮的砲兵管帶，結果他从石家庄向西帶走大砲六尊，投奔山西。

在蠡县、完县、任邱、雄县等地的活动

武昌起义以后，保定四周各县經党人們的宣传和組織，也有一些活动。由我亲身参加的和記憶比較深刻的，有蠡县、完县及任邱和雄县。

蠡县是由李銳夫、南琴軒等先去的，在北泗、潘营(陈幼云先生的家乡)等村联络了几十位贊成革命的人，准备攻占蠡县城，宣布独立。他們让我同赵濯民帶着八个巨型炸彈的彈壳以及一些必要的原料和炸药等到那里装配。我們从保定南关僱了一輛騾車，先

到张登鎮，然后步行到蠡县城北四里的北泗村，在一位首領某人（我忘了他的姓名）的家中把八枚巨型炸弹装配好，放在他家的鏡柜里，并告訴他怎样用法。当天晚上并把一个看守城門的老头儿邀去，請他到时候給起义的人們开門。他一面抽着烟，一面滿口答应。不大的工夫，又有一个人来报告，說县官早知道了消息（当时人們搞革命工作都不够秘密。我記得当我们快到北泗村的时候，村边的小孩子們看到我們，就嚷：“革命党！革命党！”可見我們的活动早就全村都知道了），由保定請去淮軍一哨（等于后来的一連）保卫县城，并說怕要搜捕我們。我們就不敢住在北泗了。我同赵濯民、李銳夫連夜到潘营村一家烧餅鋪里去住。那里倒是很暖和。但是还没有等到睡下，又有一个人送来消息，說最好移到更僻靜的地方去，說着就領我們到一个貧农家的磨房里。外間有一台石磨，里間有一个土炕，很冷。我們正在談論和分析当时的情况，忽然南琴軒由村外派人来叫我們。我們赶快出村同他晤面。一見面，他就急着說：“你們好大胆儿！听說淮軍就要来包围我們了！”我們四个人就連夜向保定逃回。因为夜間非常黑暗，有时找不到正道，只有依靠着北极星辨别方向，大体上向北偏西走去。經過东流鎮附近，遍地都是薄冰，有一次我的左脚忽然陷入冰下，提起以后，鞋袜都湿透了，因为冰下还有浅水。走到南大冉村，天才亮。后来听說，那里为首的人也在那夜躲开，并没有暴动起来。存下的八个炸弹，乡下人誰也不敢动，甚至那間房子也无人敢住了。一直等到一九一二年春天，他們才派人到保定育德中学去問我們怎么处理。赵濯民詳細告訴他：“深深的挖一个坑，輕輕的拿去放在里边埋上就是。只要不摔它，就一定不会炸。”这才結束了那八个炸弹的問題。

完县劝学总董（后来改称教育局长）高贊唐，思想一向比較进

步,对于保定同盟会的人们也有一定的联系;武昌起义以后,总想設法响应。他借地方不靖为名,劝县知事高鐸创办完县保卫社,招募兵勇六十名,自任社长。他并联络本县警务长郭步青、警董裘季常及保卫社教員刘宝鐸(陆军学堂毕业)等作秘密准备,以便乘机由保卫社社勇联合全县警兵响应独立运动。后来南北和議告成,保定又没有发动,但是当时的革命党人对于袁世凯掌握政权都表示极不满意,所以他们仍旧繼續进行,沒有解散。因为高贊唐年少气銳,为筹划餉需等事,每与高鐸意見不合,甚至发生爭辯;又因为他性情有些驕傲自大,常得罪本县的旧紳士。这时适有頑固乡紳戚某,赵某等对于他的秘密計劃有所觉察,就和高鐸勾結起来,加以破坏。他們一面由高鐸亲赴保定向当时的藩司曹銳告密,一面更使各劣紳上公呈,誣陷高贊唐要联合保卫社社勇和全县警兵不日宣布独立。曹銳听了他們的話,就派保定府知府呂調元带兵四五百人,并携带重砲到完县剿捕。幸而我同高贊唐于三四天以前得到晋軍第二旅旅长刘越西的邀請前往太原,否則恐将遭毒手。呂調元因为没有捉住高贊唐,也得不到任何图謀独立的証据,仅令保卫社全体繳械。高鐸感到他的告密无法交代,就派人唆使新兴村某姓妇控告保卫社曾派社勇詐取她家的衣物(据说她曾在保定城内某公館当佣工,保定兵变时,她席捲了公館里一部分衣物逃回家乡,确有人恫吓过她,分去了几件),并令她指实是那几个人去的。她就随便乱指,說:“有他,有他!”高就坚請呂調元按搶犯定罪,結果把社勇刘恆瑞、刘秉銓、蔡得胜三人判处死刑。高鐸只想做实他的誣告,渲染他請兵的声势,是不是社勇搶了她的衣物,是不是确系这三个人,即使是这三个人,是不是应该判以死刑,他都不顧。高、呂把三个人杀了以后,沒有旁的方法可想,就把郭步青、裘季常、刘宝鐸三

人帶到保定。后来呂調元知道有些做得不对头了，把他們三人羈押了一个多月就准許寬保释放。但对于高贊唐則仍予以“懸賞通緝”的处分。到一九一二年三四月間，順直省議會成立，議員們联名对此事提出彈劾案，才把通緝令取消。高鐸則沒有受到任何处分(此事在《完縣新志》上有記載)。

任邱和雄縣，開始時有同蠡縣類似的情況。因為我沒有親身參加，所以知道得不够詳細。我記得許潤民曾親身去參加過。兩縣同情革命的志士們聯絡了七八十位，推靳廣隆為首領。沒有等到準備好，就被縣知事偵知，並實行追捕。他們就冒險發動起來。后来也是由保定調去淮軍若干把他們打散，結果犧牲了十多位志士。

少數同志到北京天津東北及張家口等地的活動

吳祿貞在石家莊被刺以後，保定黨人力持慎重，有少數同志則分別到其它地點進行活動。他們有的被捕入獄，有的犧牲，情形都頗為壯烈。因為我沒有親身參加，所以僅凭所聞作極簡略的追述。

王蓬秋(雲海)系育德中學學生，到北京去參加那里的組織活動，住在邵陽會館。有一次，他從天津運武器回京，剛到會館門口就被把門的軍警扣留，經盤查以後被送入監獄。因為當他去天津的時候，會館已被查抄，由軍警把守，來一個人就捉一個人，但他還不知道，所以被捕。和議告成後，才被遞解回籍，一到縣城(他是高陽縣人)，就被紳士們保出。

薛友棠(成華)系保定盲啞學堂教員，到天津去與那里幾位同志組織暗殺團。當北洋巡防大臣張懷芝由北京回天津時，他在天津新站向張懷芝連投兩個炸彈，都沒有炸中。他又拿着手槍追上去向張射擊，可惜也沒有打中，就被捕犧牲。

錢来苏(拯)系保定軍需學堂高材生。因为他父亲在东三省做官多年,他对东北有些熟悉,对一部分軍人也有些联系,所以他自告奋勇到东北去。他在那里的活动很多,最后被馮麟閣所扣,几被杀害,共和告成后才得释放。

南琴軒、李銳夫、张雨岑等到张家口和当地的一部分党人密謀起义。因派人由天津运手枪、炸弹等到张家口,被敌人查出,严刑拷問,致全盘計劃均被洩密,十余人被捕,六人被害,因而沒有发动起来。他們三个人都事先逃脫。

此外还有王虎臣由保定到包头一带进行活动,結果在那里被害。

其他零星回忆

在这一段革命活动的过程里,还有不少零星的事迹應該追述一下。

(1)試驗炸弹。有一天(忘了确实的日子),赵濯民、张贊勳、楊笠农和我带着制成的一个炸弹到保定南郊一个柏树坟里,选择了一个前边摆着石供桌的大坟头,由赵濯民担任投擲,試驗能否摔响和爆炸力的大小。我們其余三个人都躲在六七十步以外。他立在坟头半腰与石供桌正相反的一边,隔着坟頂向供桌投擲;擲出以后,馬上蹲下,让坟头上半挡住他的全身。这样他就一点不会受伤。試驗的結果,很为成功。

(2)轉移制造炸弹的地点。在育德中学制造炸弹,搞了一段时间,外間頗有风声。因为怕万一被反动当局派人来查抄,就在保定北街路西平嘉胡同賃了一所房子,由赵濯民、刘准秋和我去住,并在那里繼續装配。記得有一次,我把炸弹壳、火药、炸药原料、碎鉄

片等装在一个洋油箱中，僱了一輛洋車，由育德中學運進城去。當進西城門的時候，兩邊軍警林立，幸而沒有檢查我。事後想起倒感到危險萬分！

(3)胡新三等由天津運來手槍及雷管等。前邊曾經提過，大約在辛亥前一年的冬季，保定高等農業學堂的学生有幾位加入我們的外圍組織，並成立了“共和會”。但因為他們的作風看着總不夠踏實，所以始終沒有讓他們加入中國同盟會。其中有一個叫胡新三的(後來他當了國會議員)，當武昌起義以後，他繞道上海到達天津。他在天津買了一些手槍和雷管，也有少數的大型炸彈。有一天，他同着鄭毓秀等三幾位女同志到了保定，給我們放下了幾枝手槍、兩個大型炸彈和幾付雷管。我們去炸唐河橋所用的炸彈和許潤民、李銳夫等所用的手槍就是這樣來的。因為沒有電源，雷管始終沒有用過。

(4)滿城縣富戶同情革命。在姚村陸軍小學肄業的有一位同志叫鄭尹耕(莘田)，是滿城縣北陵山村人。他有一位本族長輩叫鄭墨池，家業富足，思想很新，曾親身到保定和我們聯系過，並表示必要時可在經濟上貢獻一定的力量。有一次，鄭尹耕陪着我去訪他。他不但自己很慷慨，並同我到龐村他的親戚家去勸說他們。他們都很同情革命，都應允必要時可以捐助一定的數目。後來因為保定不打算發動，沒有需要，也就沒有要他們捐助。

(5)加入“在理會”。保定一帶的各村人民有一種特殊組織，叫“在理會”。凡是“在理”的人都不許抽煙喝酒。他們在保定西門里箭道地方有一個總機關叫做“公所”，領導人叫做“當家的”。每村都有幾人或幾十人加入這種組織。以前曾聽人傳說，他們原來是一個反抗清朝的秘密組織。一個人初加入的時候，“當家的”都教

給“五字真言”，并且囑咐“上不傳父母，下不傳妻子”。據說這五字真言本來是“同心滅滿清”。我當時想着：如果是這樣，似乎很值得聯絡一下。所以在辛亥前一年，為了聯絡這一批羣眾，我曾在滿城縣段旺村加入“在理會”。那知道當家的傳給我的所謂五字真言竟是“南無彌陀佛”！後來又到保定他們公所里去，同所謂“當家的”談過話，也毫無所得，他們一點也沒有抗清的思想。我為了這一舉動，反受了家庭中一些指責和譏笑。

(6)所制炸彈的處理及所有實物的銷毀。和議告成以後，袁世凱與革命黨人之間的矛盾始終存在着。黨人們絕大多數對袁都不信任，時時有“倒袁”的呼聲；袁對於黨人們也是時懷戒心，一有機會，就加以誣陷和打擊。武昌起義以後，各校即行停課，只有負責革命任務的少數人留住校內。所以当和議告成以後，北軍由前綫北調時，多占用校舍為他們的軍營。我們前此裝配的那些炸彈，除蠡縣的八個前邊已經說過以外，其餘都是存在育德中學的理化儀器室內；後來怕萬一被人檢查，又搬到院中土坯堆內。當北軍有不日開到保定的消息時，才又在某天夜間慢慢移到校外，沉到西關護城河里。這一工作趙灑民作得最多。第二天北軍到校，果然用那些土坯盪鍋台煮飯。幸而先一天完全移出，不然恐怕一定會發生事故。所有對革命有關的實物，如燕晉聯軍大都督印信及何敘甫換下的僧袍等，也都於事前銷毀。這些極有意義的紀念品都沒有保存下來，真是可惜。

(7)在那時，學生參加革命活動，如向家庭公開，不但對讀書有一定的妨礙，萬一洩漏出去，被反動當局捉住，更會有生命的危險，所以我們都不敢向家里人說明。當我們去蠡縣工作以前，因為我弟弟不久就要結婚的緣故，我本來已被叫回家里去了。等決定派

我們去的時候，趙濯民亲身去叫我。我向家里說：“學校有要緊的事叫我去一下，等事完馬上回來。”到我弟弟結婚的前兩天，我仍舊沒有回去。我父親就亲身到保定叫我。我才極誠摯地向他老人家說明：我已經參加革命工作了，現在正當急于用我的時候，請求他諒解并允許我暫且不回去。我父親沉思了一下，很鄭重而慷慨地表示說：“好吧！既是這樣，你就做下去吧！暫且不必回家。”從那時起，家里才明白為什麼學校早已停課，而我總是不回家。

(8)一部分同盟會會員後來的表現。經陳幼雲先生發展的軍人會員中，後來對於幾次重大歷史事件也多有一些表現。如耿騷生先生在第二次革命時正擔任着九江鎮守使，同李烈鈞等共同討袁。劉曉嵐先生在護國之役，擔任蔡鍔的第一梯團長，在四川瀘州、叙府一帶，對張敬堯作過激烈的戰鬥。孫禹行先生在一九二四年北京政變時，對於推翻曹錕和趕走宣統，也有重要的表現。這些事迹，想別的方面一定有更詳細的材料，我就不多說了。

我個人於一九一二年春季在太原晉軍第二旅司令部住了兩個多月以後，保定育德中學重新開學，同學們紛紛給我寫信叫我回校。我自己因為受到劉越西他們“倒袁”議論的影響，當時還有些猶豫。後來郝仲清先生親筆給了我一封信，其中有“吾弟正在青年，仍以求學為急”的話，使我很受感動，才決意回校完成學業。一九一三年春，我考入北京大學預科，一九一四年暑假又考入香港大學，從此以後就專心致力於研究學問了。

× × ×

以上所寫的，都是辛亥革命前後保定革命運動的實際情形。事後我曾有幾次向郝仲清先生建議，請他把所有經過寫下一個記錄。他總說：“我們沒有做出什麼成績來，算了吧！”所以一直沒有

发表过什么文字的东西。

最近天津历史博物馆让我追述一下那时的经过。谨凭着记忆所及的,尤其是曾经亲身参加过的,忠实而严肃地加以叙述。因为事情已过了将近五十年,一定有一些遗漏的地方;但是所有记载出来的,决无丝毫夸张之处。

又因为要写这一个回忆录,最近曾向图书馆借阅了一下柴德赓等编的《辛亥革命》和尚秉和编的《辛壬春秋》等书。见《辛亥革命》一书第六册中所引胡鄂公编的《辛亥革命北方实录》若干节,其中有关保定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多失之夸大,不够忠实,有些部分甚至是“无中生有”!如叙述怎样教给我和许润民等打枪、投炸弹一段,简直是凭空捏造!由这一段叙述和胡的为人推之,其它的部分恐怕一定也有浮夸捏造之处。又在同书同册上所采入的《辛亥六镇兵变纪实》,本是李真写的。因为文里边标榜他自己的地方很多,又不是事实,他就故意写为“闕名”。当一九一二年春天我正在太原的时候,他也在太原。他曾拿着这篇文章社同人們看过,并炫耀他对于古文的造詣。因为他别号“灵蛮”;我记得当时同人們曾对他有“蛮则有之,灵则未也”的譏諷話。不料《辛壬春秋》书中“吳祿貞被刺”一段上也引用了他一段“欺人之談”,即:“蕙田来自都。月下与协統吳鴻昌密語,涉祿貞事。会軍需官李真遺桥下,微聞其語,告祿貞。……聞真語,殊不置意。”当时同人們都不信他这一套。以为他是想把个人的姓名附在吳祿貞被刺这一重大事件上,以“流芳千古”。胡鄂公和李真这等人,和郝仲清先生那样真正做了一定的工作但不肯作任何宣传的作风,恰恰是相反的。希望今后編历史和讀历史的人,能够加以鉴别才好。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二日于清华園)

辛亥前后彭泽民先生 和吉隆坡华侨的革命活动*

陈 其 瑗

中国青年益赛会的成立

彭泽民先生是一九〇二年去马来亚吉隆坡的。当时在吉隆坡华侨社会中，有两个不同的政治派别，一个是保皇党，一个是革命党。革命党为了避免英殖民政府注意，所用的公开名称是“中和讲堂”，以宣道为名，实则宣传革命主张。中和讲堂后来因听讲之人渐多，大触殖民政府之忌，加以保皇党告密，遂被下令解散。一九〇六年，孙中山先生来吉隆坡酝酿组织同盟会，彭泽老就在此时参加，积极活动。当时同盟会的会员只有十余人，由于中和讲堂的被解散，组织仍然不能公开。彭泽老与会员们根据当时实际情况研究结果，认为可以利用教会作为公开活动的场所。那时英帝国主义正在利用基督教会为开拓殖民地的先锋，它在吉隆坡设有一所

* 这篇材料是由我与彭泽老夫人翁会巧同志从彭泽老遗稿中整理出来的，其中有些内容是彭泽老生前我与他过从谈话时记录下来的。彭泽老离开我们转瞬已六阅寒暑矣，他对于祖国革命事业的百折不回、坚贞不贰的高贵品质，仍然长留在我们心坎中。此篇之作，亦聊尽我们后死者之责而已。——陈其瑗

美以美教会进行宗教活动。教会内設有一种联络羣众的組織，名为益賽会。于是彭泽老等就用中国青年益賽会的名义，把會員組織起来，附属于教会的宣道堂，以这个合法組織来宣传同盟会的宗旨。依照教会規定，益賽会設正副总理主持会务，由會員推选；正总理必須是教徒，副总理二人，教徒与非教徒各一。彭泽老初时被推选为副总理；后来會員逐渐增多，同盟会的革命主张逐渐为羣众所信仰，彭泽老又被大家推选为总理。他以非教徒身份当选为正总理，改变了教会的传统規定，这个改变說明了羣众的力量在逐渐扩大。

中国青年益賽会成立后，借用宣道堂为会址，同盟会也就有了集会和办事的地方。初期所进行的会务，是以益賽会的名义，在华侨社会中做一些慈善事业和組織戒烟会等等。由于會員們多是青年，能以革命精神努力办事，特别是能为有困难的侨胞服务，所以會員人数虽少，事情却做得很多，也做得很有成績。不久，益賽会就在华侨社会中取得很高的信誉，得到当地广大侨胞羣众的支持，入会的人数也逐渐多起来了。同时，同盟会會員也随着增加，活动也一天一天有了发展。

十二张木椅和一万元捐款

在中国青年益賽会創立时，一切都是由會員自己动手，会所的一切陈設也靠同志們捐贈。有一位做木工的会友陈良，用节余下来的工作時間，亲手制成十二张木椅，制成后亲自挑送到会所中来。这件事在有錢人为之并不稀奇，可是陈良全靠一双手維持一家教口的生活，日子过得很艰难，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他这种热爱会的行动，給會員大众以极大的鼓舞。后来这位同志因

为失业，上山砍柴为生，不幸被倒下来的大树压死了。不过他这种一心一意为革命努力的精神却永远活在全体同志的心中。他亲手制成的十二张木椅一直被同志们珍重保存着。辛亥革命成功后，同盟会在吉隆坡公开活动，会员们有了自己建筑的会所，这十二张椅子还陈列在会所客厅里，作为陈良生平革命事迹的纪念物。每遇来宾到会访问，会友们就把这十二张木椅的来历向来宾介绍一番；来宾听到这个故事，都很受感动。

当时，为同盟会总部的革命事业募集款项，也是海外各地支部重要工作之一，吉隆坡支部也以此列为自己的一项主要任务。只要总部来一个电报要钱，会员们立即踊跃自动献捐。如果数目不大，就由同志们自己分担，一般都能在数天内把款项凑足汇出。会员中有一位黄扬同志，原是工人出身，由于勤俭刻苦，有些积蓄。有一次总部要筹一笔较大的款子，他便慷慨献捐一万元。可是他没有这么多的现款，便拿着自己住的房屋契据去找当地的一个华侨大资本家某人，向他抵押一万元，并说明这笔款子是用来捐助祖国革命事业的。这个大资本家是反对革命的，当然不愿意支持黄扬同志，乃很冷酷地对他说：“如果能把房子卖给我，我可以要，抵押借款是不行的。”黄扬同志听了非常气愤，痛斥此人只爱金钱不爱祖国，不能称之为中国人。会友们知道此事后，也很愤慨。两种立场之人，两样不同的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从演习被捕口供到革命实践

自吉隆坡支部成立之日起，同志们每天晚上都聚集一起共同学习。学习的内容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研究如何刺杀清朝大员；一种是演习如何在不幸被捕时回答反动法庭的讯问，即是口供演习。

口供演习的方式，是以一人扮作法官，余人扮作被捕的同志，一問一答，輪流扮演。供詞內容必須首先表明自己是革命黨人，同時還必須宣傳革命的宗旨。這種演习對於同志們的革命鬥志的鍛煉和犧牲精神的培養，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廣州起義之役，壯烈犧牲的七十二烈士中就有吉隆坡支部盟員羅成、李晚兩同志。這兩位同志都是工人出身，他們的壯烈犧牲固然顯示出革命黨人臨危不惧、視死如歸的高貴品質，但與平時在組織生活中所受的鍛煉也是分不開的。

“李竹痴”來到了吉隆坡

有一次，支部接到總部通知說，孫中山先生要來吉隆坡，彭澤老與同志們準備招待。彭澤老和同志們商量後，一面找到當地一位有名望的陸姓紳士，請他出面歡迎孫中山先生；一面通知中山先生來時不用真姓名，以免英政府干涉。中山先生於是易名為“李竹痴”，登岸時果然並未遇到阻礙。那天同情革命的華僑知道中山先生抵埠消息，到碼頭歡迎的人數不少。同志們為了避免英殖民地政府注意，還打着龍旗去歡迎他。中山先生在吉隆坡一所新開的戲院受到盛大的歡迎，參加的僑胞人數很多。到會的同盟會會員也有百數十人，全體擔任警衛工作，彭澤老親自守衛大門，以防備反對派——保皇黨的搗亂。孫中山先生那天講話大意是：“我們要推翻帝制，建立民國。什麼樣的國家才能稱為民國呢？就是國家為人民所公有，國家之事由人民共同辦理，不能由少數人甚至一人一家所得而私。國家好比一個公司，人民都是股東，政府的官吏就象公司僱用的職員，公司的事情應該聽命於股東；國家事情亦如此，應該聽命於人民，不能由一個人、一家人專制。”孫中山先生這

次演講深得人心。这也是由于彭泽老与支部的同志们平日革命工作做得好，在侨胞群众中生了根。同时，这次大会由于事前布置周密，得到同情者的帮助，使反对派无所施其伎俩，所以开得很成功。

孙中山先生到吉隆坡后，住在威山公館，由同盟会会员担任警备。有一天，中山先生問及当地华侨大资本家陆佑其人，要想見他一面。同志们說，陆的派头很大，不肯随便見人，要見他須事前用电话与他联系，約定時間，才能見面。孙先生听了，当时沒有再作声。翌晨，同志们发现孙先生不知哪里去了，大家很担心，便四出寻訪。到了中午，中山先生方从外面回寓，对同志们說：“我已經会过陆佑了。”同志们說：“应该事前和陆約好，让我们陪你去。”孙先生說：“我对陆某并没有什么要求，只想問他爱祖国不爱祖国；既然他不爱祖国，也就不須和他談什么了。”这是一件小事，然而彭泽老的印象却非常深刻。当他数十年后对我们談起这件事的时候，仍然激动得很，充分表现出他对于这个不爱祖国的人的強烈憎恨。

青年益賽会的被封和复兴

孙中山先生到吉隆坡演講革命的道理后，影响极大。吉隆坡同盟会会员的人数由百数人发展至千余人，会务活动也一天一天地多起来，会所內附設了閱书报社、招待所。此外，还要传达各方面革命活动消息，募集革命軍餉，任务日益繁重。于是，支部成为馬来亚半島的革命总枢紐，并获得多数华侨的同情和支持，活动也成为半公开的了。这时，保皇党也在吉隆坡設宣孔教堂来与青年益賽会对抗，双方听众往往因辯論而发生糾紛。英殖民地政府本来就怕我們演講中国革命的道理，担心会影响馬来亚当地人民也起来革命，所以想利用保皇党来破坏华侨的团结。可是保皇党

愈来愈不得人心，不能发生什么作用，英殖民政府乃不能不亲自出馬了。黃花崗起义之后，有一天，华民政務司（英殖民地政府管理華僑事務的行政部門）派人到青年益賽會會堂檢查，看見會堂上懸掛着羅成、李晚兩烈士的遺象，便借口說我們是暗殺黨，把兩烈士的遺象拿走，並立即解散青年益賽會，封閉了會堂。

數月后，武昌起义，清政府被推翻，民國成立，海外僑胞民氣也隨之大張。英殖民地政府乃換了一副“親善”面目，改用軟化手段，准許益賽會閱書報社恢復，由半秘密而公開；又准許益賽會自己建立會所，但仍附屬於教會之內。殖民地政府的七州府議政局員朱嘉炳並捐助了巨額的建築經費。新會址建築堂皇，規模更大。在這個時期內，會員日增，聲譽日盛。一直到一九一三年國內二次革命失敗后，彭澤老尚憑借青年益賽會的基本會員羣眾，響應和擁護孫中山先生改組中華革命黨的號召，成立了中華革命黨馬來亞支部。

辛亥革命时期 政党活动的点滴回忆

王紹鏊

辛亥那年，我正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开始参加政治活动，以后又参加国会的选举，当选为众議院的議員。因此，对于辛亥革命时期一些政党的活动情况，略有所知。但究竟事隔五十年，加以自己当年写下的两卷大事記，在一九四一年日寇攻陷香港时，和放在九龙寓所的其他书笈一起，都已化为灰烬。所以只能把目前所能够想得起的点滴回忆，写在下面。

中华民国联合会和統一党的成立

清朝末年的知識分子，除了革命派和君宪派外，还有相当多数处于中間状态的人。在留日学生中，属于中間状态的也为数不少。他們学过一些資產阶级的法政，对于資本主义国家的議會政治和責任內閣制崇拜到了迷信的程度。他們最初虽沒有参加革命的組織，但以后看到清朝政府并无立宪的誠意，其中大部分人逐渐傾向于革命，終于轉到革命派这方面来了。

一九一一年，武昌首义之后，各省紛紛独立，清朝政权已呈土崩瓦解的局面。这时，章炳麟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以

下簡稱联合会)，以各省联合起来、建立统一的中华民国为号召。我在上海见到了章炳麟。他一见我，就要我担任联合会的交际科主任干事。

章炳麟原是光复会的首脑人物，又是当时誉满全国的文学大师。孙中山先生、黄兴等在日本把兴中会和华兴会合并成立同盟会时，曾吸收光复会参加，并推章为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的主笔。孙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我陪同章到南京谒见孙先生，一同在座的还有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子民先生。章对孙先生说：“各省虽已先后独立，但同时也形成了各自为政的局面，情况十分复杂，需要有一个联合的组织，把各地的革命力量团结起来，才能对付袁世凯。”可见章发起成立联合会，原来的意图是拥护孙先生的。不料上海的都督陈其美为了争权夺利，瞒着孙先生，暗中指使蒋介石刺死了光复会的军事领袖陶成章。这件事发生后，章对孙先生起了疑心；袁世凯挑拨离间的毒计也就有了施展的机会了。

这时，袁世凯的野心已经日益暴露，而各地的革命力量正是他篡夺革命果实的主要障碍。面对这个形势，他一方面以北洋军进攻武汉，想迫使革命军接受议和条件，从而扼杀革命；一方面采取各种阴险毒辣的手段，对革命派施展拉拢分化的伎俩，以扩大他的权势，削弱和瓦解革命的力量。在革命派方面，不仅各团体之间有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就是在同一个组织内部也是互不团结的，而其领导人对于这种情况竟听之任之，没有想尽办法去求得革命力量的团结，这就给了袁世凯以可乘之隙。正因为如此，联合会和以后的统一党，都不可避免地成为袁世凯猎取的目的物，并且确实被他所利用。这是我初出茅庐参与政治活动所遇到的最痛心的一件事情。

联合会成立于一九一一年（辛亥）冬，总部设于上海。会长章

炳麟，下設总务、文牍、交际、會計四个科。 其人选是：总务科主任干事孟森、副主任干事黄云鵬，文牍科主任干事王伯羣，交际科主任干事王紹鏊，會計科主任干事张弧。一九一二年，联合会又与一些小政团合并为统一党，总部的各科人事照旧。据我事后了解，张弧是袁世凱派进来的奸細。张是熊希齡的人，也是袁世凱的亲信，袁就是利用熊的关系介紹张混入联合会的。联合会和统一党的經濟权一直操縱在张弧手里，其經費表面上說是从各方面募捐得来，原先我对此深信不疑；以后随章先生到北京，从各方面的接触中，了解到一些政治内幕，才知道我們所花的可以說完全是袁世凱的錢。袁世凱的另一亲信王廣（即王揖唐），經常与张弧秘密来往。合并为统一党后，袁世凱又利用赵凤昌（字竹君）去拉攏张謇。赵江苏常州人，原是张之洞幕府中人，以后做了统一党的參事。张謇本与袁世凱有过一段师生关系。袁随庆軍統領吳长庆到朝鮮时，张是吳的幕僚，曾受吳之命教过袁的詩詞和八股文。但袁做了北洋大臣之后，就改称张为“仁兄”，不以师礼相待。张因此对袁很不滿。然而，张本身也有弱点。他打着“实业救国”的招牌，和历任两江总督拉得很紧，在江苏挪用公款办了許多企业。在武昌起义以前，最后一任两江总督张人駿对他非常不滿，大有威胁他繳还公款之势。他为了此事遑遑終日，寢食不安。到了清室即将全面崩潰的时候，张謇就乘机策动程德全宣布独立；此举既是为公，也是为私。以后在应德閔任江苏民政长时，有人在民政公署內放火焚毀了有关公款出入的档案，挪用公款的事情竟以不了了之。袁世凱最喜欢利用有弱点的人。究系何人放火，固然是一个疑案，但袁之所以始終不追究此事，正是拉攏张謇的一种手段。

联合会和统一党的成員，大多是处于中間状态的知識分子，除

了主要是江、浙两省的人外，以四川、云南、贵州几省的人居多；其中不少是章炳麟的学生，更多的人则是仰慕章的名望而参加的。

统一党做了袁世凯的应声虫

一九一二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但不久，孙先生又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推荐袁世凯继任。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妥协派占了上风，对北洋军阀的力量估计过高，同时对袁又抱有幻想，遂使孙中山先生陷于重重包围之中不得已而辞职。最后孙先生在辞职的咨文中提出了三个附带条件，想以此约束袁的政治野心。其中关于临时政府设于南京、新任总统必须南下就职的问题，成为孙、袁双方最后争执的焦点。老奸巨猾的袁世凯制造种种借口，不肯离开北洋派势力根深蒂固的北京。在这个问题上，统一党和其他妥协派、妥协分子一样，唱着和袁世凯同样的调子。他们害怕南北谈判破裂，于是随声附和，也叫喊定都北京，实际上是不知不觉地做了袁世凯的应声虫。

统一党的这种妥协性不是偶然的。统一党的成员，包括我在内，大多是受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念念不忘在推翻清朝政府之后成立国会，并订出一部“象样”的宪法来，以为这样就实现了民主，国家可以富强了。抱着这种想法的人，不仅认识不清袁世凯的反动本质，反而对他有种种幻想；只要袁略施花招或稍加压力，便妥协屈服了。

统一党改组为共和党时的内部分歧

参加统一党的人，正如上面所说，大多是处于中间状态的知识

分子,但其中也有偏左、偏右之分,更何況有些人本来就是反动勢力的代理人。因此,統一黨的內部鬥爭,也是不可避免的。我和章炳麟的學生四川人黃云鵬等,志趣相近,意氣相投,當時自稱為“少壯派”。在對待袁世凱的態度上,我們和張弧、孟森等人很不相同。我們始終主張限制袁的權勢,不讓他的野心得逞;但由於本身的局限性,加以社會經驗不足,把問題看得很簡單,以致幾次鬥爭都遭到了失敗。一九一二年上半年,當統一黨將要和國民協進會、民社等政團合併組成共和黨時,統一黨內部就發生了激烈的爭執。爭執的焦點在於究竟與國民協進會合併呢,還是與統一共和黨合併?當時的情況是:袁世凱為了擴張他的權勢,企圖把一些政黨抓到自己的手裡來。以籍忠寅為首的國民協進會,其後台是梁啟超;梁是完全擁護袁世凱的。籍派人來和統一黨聯繫合併的事,其動機可想而知。統一共和黨是宋教仁領導的,其成員大多是同盟會會員。宋當時是袁政府的農林總長,因為要搞議會政治,也很想加強自己的政治力量。但是,有一個時期同盟會中一部分人反對改組為政黨,所以他希望把統一共和黨和統一黨合併起來。宋為此事曾到上海和章炳麟密談過好幾次。統一黨在改組成立時,吸收了許多青年知識分子,這也是統一黨被袁世凱和宋教仁看中的一個原因。在統一黨內部,章炳麟和我們這些“少壯派”,不願意完全成為袁世凱的政治工具,主張與比較進步的統一共和黨合併,不同意與國民協進會合併;張謇、熊希齡、張弧、孟森等人的打算,恰恰和我們相反。在這一場鬥爭中,同我們“少壯派”站在一邊的是少數,加以經濟權掌握在張弧等人的手裡,章炳麟也無能為力。⁹結果還是決定與國民協進會、民社等合併,組成共和黨。共和黨成立後,推黎元洪為理事長,章炳麟、張謇、梁啟超等為理事,並在北京成立了共和

党本部。以后，宋教仁的统一共和党并入了国民党。事后我这样设想：如果统一党和统一共和党合并组成政党，使为数众多的处于中间状态的知識分子跟着革命派走，中和左的两种力量汇合在一起，则以后情况的演变，可能有所不同，或者袁世凯还不敢那样过分为所欲为。当然，这也許还是我的一种天真的想法。

因为我反对统一党和国民协进会合并，便脱离了共和党本部。那时我十分迷信議會政治，一心想当議員，就繼續待在自己的家乡——江苏，不愿意到別处去。不久，庄蘊寬任江苏都督，找我去担任都督府外交司第一科科长。不到半年，参、众两院选举，因为現任官吏不能竞选，我便辞去了这个职务。庄蘊寬为人比較开明，我和他来往密切。后来袁世凯于一九一四年召开約法會議，六十个約法議員中，五十九人主张总统制，只有庄一人主张責任內閣制。他的这个主张，也許是受了我的一些影响。

袁世凯为了进一步拉攏章炳麟，特地打电报邀請章到北京去“商談国是”，又派专人(大概是王廣)来沪迎接。我和黄云鵬等人随行。到京后章受到袁十分隆重的接待，并且給了他一个东北筹边使的名义。章不知道这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官銜，还向袁要了一万元开办費，到吉林走馬上任去了。他到东北后，无人理睬，碰了一鼻子灰又回到北京。

共和党成立后，统一党中一部分与“少壮派”关系密切的地方組織，有一段时期保持了独立，沒有和共和党发生組織关系。袁世凯把章炳麟請到北京后，王廣曾召集北京的统一党黨員，請章向他們演講。原先我們还以为北京的统一党也保持了独立，沒有并入共和党。但我們在北京住了一个月后，才弄清楚北京的统一党完全是王廣一手搞起来的，不过打着章的招牌而已，实际上和章毫

不相干。它不但沒有保持獨立，而且是替袁世凱收買國民黨黨員的機構，到國會選舉以後，又成了替袁收買國民黨議員的機構。那時，宋教仁住在北京西郊三貝子花園（即現在的動物園），我常去看他。有一次，宋先生對我說：“現在情況既已如此，你們還是併入共和黨吧！共和黨內有比較進步的民社，而統一黨還有不少青年人，雙方齊心協力，還是能夠推動共和黨為革命做一些工作的。同盟會方面，現在大家都已同意改組為國民黨。你們併入共和黨後，將來和民社在一起，可以和國民黨互相提携。”我回到南方，便把宋教仁的主張以及在北京的見聞，對蘇州的金天翻等幾個保持獨立的地方組織的負責人講了，並建議他們不必再保持獨立。後來這幾個地方組織也併入了共和黨。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宋教仁在上海車站被袁世凱派人暗殺，過了兩天因傷重去世。我和鮑初先生平時過從甚密，他給了我許多教益。他的被刺，使我感到萬分悲痛。

竟選議員的活動情況

一九一二年年底，參、眾兩院開始選舉。參議院議員由各省省議會選舉，每省十人；眾議院議員由各省分區選舉，名額按照各省各區的人口和納稅多寡比例分配。在選舉中，我發現有賄選的情況。以共和黨方面來說，因為我不贊成統一黨與國民協進會合併，就受到共和黨本部的排擠。各省提“少壯派”的名，共和黨本部總是通不過。“少壯派”幾乎都是地方上選出來的，我就是得到同鄉金天翻、金祖澤、錢崇威、費樹蔚等老先生的支持而當選為眾議院議員的。在當選的過程中，我還幾乎被共和黨本部所排擠。地方上提了我的名，而共和黨本部的特派員某人就來同我商量，要我退

訖，放弃竞选，我的朋友都不答应。接着，他们又派人到我的老家吳江县去收买我的选票。据我所知，吳江盛泽鎮就有五票被他们收买去了。共和党哪里有这許多錢来进行贿选呢？无疑是袁世凱用勾結帝国主义搞来的大借款在幕后作祟。

当时的竞选活动，除了有一些人暗中进行贿选外，一般都采取公开发表演說的方式。我在江苏都督府任职期間，曾抽暇到江苏的苏、松、太一带作过四十几次的竞选演說。竞选者作竞选演說，大多是在茶館里或者在其他公共场所里。竞选者带着一些人，一面敲着鑼，一面高声叫喊：“××党×××来发表竞选演說了，欢迎大家来听呀！”听众聚集后，就开始演說。有时，不同政党的竞选者在一个茶館里同时演說，彼此分开两处各讲各的。听讲的人大多是士紳和其他中上层人士。偶尔也有几个农民听讲；但因讲的内容在他们听来不感兴趣，所以有的听一会儿就走开了，有的坐在那里也不听。那时的选举有許多限制，例如，沒有一定数目的财产，就不能参加选举。竞选者知道劳动人民不能参加选举，也就并不把注意力放在他们身上；所注意的只是那些士紳之类的人。由此可见，当时从事政党活动的人，所爭的民权实际上只不过是“紳权”而已！这些来自士紳阶层的资产阶级知識分子，所联系依靠的也是士紳阶层，同广大劳动人民是根本隔絕的。正因为这样，他们很容易被袁世凱这样的人所利用。

进步党完全成为袁世凱的御用党

共和党組成后，在临时参議院中还不是多数党。一九一三年春，袁世凱想在国会中建立一个他能操纵的、足以压倒国民党的多数党，从而控制国会，为所欲为。因此，他又进一步策动共和党，同

以湯化龍、林長民、蒲殿俊等為中心的民主黨，還有王廣一手攜起來的統一黨，合併為進步黨。這個黨終於在五月二十九日組成，仍以黎元洪為理事長，熊希齡、張謇、湯化龍、梁啟超等為理事。這個進步黨完全是袁世凱的御用黨。

在這次改組中，共和黨內部又是意見分歧，再一次引起激烈的爭執。以前反對統一黨和國民協進會合併的“少壯派”，這次同民社的人站在一起，堅決主張與國民黨提攜，共同監督袁世凱，不贊成合併為進步黨，也就是不願意成為完全擁護袁世凱而同國民黨相對抗的御用黨。持這種意見的，共和黨中有議員八十餘人。其中以四川、江蘇、湖北三省的議員居多，計四川有黃雲鵬等近二十人，江蘇有王汝圻、徐蘭墅、胡應庚、解樹強、王紹鏊等十餘人，湖北有張伯烈、時功玖、胡鄂公、胡祖舜等二十幾人，另外還有其他各省的議員二十人左右。這八十餘人，約占參、眾兩院議員的十分之一，是一個不小的力量。其中湖北的二十幾人，大多是和武昌起義有關係的民社社員，比較進步，又擁護黎元洪，所以也不同意合併。爭執的結果，我們這一部分議員保持了獨立，沒有合併到進步黨里去，並且抓住原有的共和黨本部不放。有人稱它為“新共和黨”，其實是沒有併入進步黨的“老共和黨”。由於共和黨的分裂，袁世凱想使進步黨在國會中成為多數黨的企圖始終不能實現。在這種情況下，袁世凱只有繼續從國民黨內部去收買一些議員，另外成立一些小政團，供他使喚。例如，劉揆一成立了相友會，梁士詒成立了公民黨，孫毓筠也成立了××會（已忘其名），等等（其中劉、孫都是同盟會會員）。這些都是替袁世凱收買國民黨議員的機構。同時，這樣一來，進步黨的議席同這些小政團的議席加在一起，袁世凱才控制了多數。

民宪党活动和国民党、国会被解散

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以武力统一南方各省。但当时国民党仍合法存在，国民党议员还照常出席国会。因为这时袁还要利用他们选举自己为正式总统。“大总统选举法”是“宪法”的一部分，不能先行单独公布。但由于袁世凯利用十四省都督联名发电提出先举总统的建议书，对议员施加压力，一九一三年九月五日众议院作出了先选总统的决议，以后参议院也于九月八日议决表示同意。袁世凯的这个无理要求之所以能够在国会通过，除了被袁操纵的一批议员起了作用外，也是一部分议员妥协的结果。他们对议会政治入了迷，以为反正国会能够约束袁的所作所为，在这个问题上退让一些也无妨。事实和他们的想象的恰恰相反，袁世凯登上正式总统的“宝座”后，更加毫无顾忌，终于把国会一脚踢开。袁不久就借口宪法会议直接公布大总统选举法，与临时约法、国会组织法的规定不符，认为这样做侵犯了总统的职权，向国会提出质问。接着提出了“增修约法草案”，以图扩大总统权力；同时又派代表要求出席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会议。结果都遭到拒绝。到这个时候，袁就公开露出他的狰狞面目，通电各省都督和民政长，说“宪法起草委员会由国民党议员操纵把持”，“形成国会专制”，以制造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的舆论。袁的狐群狗党在他的授意下，大骂宪法草案“荒谬绝伦”，国民党议员是“国民公敌”，并提出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的荒谬主张。

那时我天天到天坛去参加宪法起草委员会的起草工作，搞了约有半年的时间。在这个期间，宪法起草委员会中进步党议员汪荣宝、丁世鐸，国民党议员张耀曾、谷鍾秀、湯瀚，还有共和党议员

黄云鹏、解树强等一部分人酝酿成立民宪党，其主张是拥护宪法草案，拥护民主，认为国会议员除名应由国会自行决定，不受外力干涉。但我觉得应当先把宪法搞出来，劝他们不要在这个时候有所行动；如果这样做，适足以招致袁世凯制造新的借口，攻击国会，阻挠宪法起草工作的进行。与此同时，国会选举众议院的全院委员长，国民党议员张耀曾当选。其实，这个委员长的职权不大，不过办些事务性的联络工作。但袁世凯听说国民党议员当选了此职，大惊失色，竟说：“怎么，国民党的势力还是这样大！”于是他下定决心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四日袁发出解散国民党的命令，派出大批军警包围北京国民党支部，并在深夜里到每一个国民党议员家里去搜缴议员的徽章、证书，共得三百余件，计算下来，两院议员仍够得上法定人数，还可以继续开会。接着，第二次派出军警，把以前曾参加过同盟会、国民党而后来已被袁收买为相友会、公民党等党派的议员的徽章、证书搜缴回来。然而，两次搜缴数还是没有超过两院议员的半数。于是又第三次派出军警，把二次革命以前已经声明脱离国民党的议员的徽章、证书也搜缴回来。这样才使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开会。不久，国会两院议长即宣布停止议事。民国以来第一次成立的国会就这样被袁世凯抛弃了。

× × ×

以上回忆虽系一鳞半爪，但不难看出：窃国大盗袁世凯醉心于实力政治和独裁统治，当他还需要政党、国会作为“民主政治”的点缀品，或者这些东西还可以作为他的御用工具时，他还是用尽心机，不惜工本，要把它们抓在手里；当他不需要政党、国会时，就把它们一脚踢开。同时，也不难看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

受了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潮影响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論向君主專制政府要求君主立憲，還是向封建軍閥政府要求民主立憲，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而且由於他們同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勢力既有矛盾，又有密切聯繫，就使得他們非常軟弱和動搖，有很大的妥協性，容易被反動統治者所利用，成為反動統治者的政治工具。他們本身既沒有多少力量，在當時的條件下，又必然脫離勞動人民；他們依靠的只是士紳、軍隊，特別是對外國帝國主義者抱有很大的幻想，所以不可能領導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徹底的勝利。領導中國民主革命取得徹底勝利的歷史任務，只能由中國的無產階級通過其先鋒隊——偉大的中國共產黨來承擔。這一段歷史告訴我們：中國的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參加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才能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設事業中發揮一定的作用。

記南京临时政府及其他

任 鴻 雋

(一) 記南京临时总统府秘书处

辛亥革命，以是年八月十九日（阴曆）武昌新軍起义开始，到了九月下旬約一个月之間，就有湘、陝、晉、滇、黔、皖、贛、苏、浙、閩、桂、粵、魯、川等十四省宣告独立，并在武昌召开各省代表會議，討論临时政府組織办法。革命声势虽然浩大，但軍事方面进展并不很順利，九月底十月初，汉口、汉阳相繼落入清軍手中。幸而此时苏、浙两省革命軍已将南京克复，各省代表會議乃移在南京开会。經過短時間的酝酿以后，各省代表拟定了临时政府組織大綱，着手考虑推选临时政府总统人选。这时适值孙中山先生由海外归来（十一月初六日），各省代表會議便于十一月初十日推选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定于十一月十三日（即公曆一九一二年元旦）在南京就职，成立临时总统府。

当时临时总统府的秘书长，已內定胡汉民。胡汉民邀約一些曾在东京参加同盟会及为《民报》写文章的朋友們到南京去帮忙。我和几个朋友就是这样被約，搭了十一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的专車到南京的。記得那一天早晨大約八九点鐘的时候，我到上海車站，看見車站中人行道两面排列了沪軍士兵，軍队的每一支枪上均

插上一张五色小国旗(五色国旗是当时江、浙一带所采用的旗帜),大有目迷五色之感。孙中山先生的青天白日旗,竟一面也没有看见,不免感觉意外。

我们这一列专车,因为沿途城市都有地方官吏军队迎送,所以开行得很慢,到南京时天色已黑。到了下关,又转轨到督署车站。当我们下车进入临时总统府时,大约已是晚上七点钟了。这个临时总统府,就是前清的两江总督衙门,也就是太平天国时代的天王府。那时的安排,是把正厅房屋作为我们这些办公人员的宿舍,偏西的花园洋房作为总统的住宅与办公处,而把介于正厅与西花园之间的一幢小三开间客厅作为秘书办公室,大约是取其便于与总统室联系的缘故。

我那日因乘了一天火车,感觉疲倦,到后吃了晚饭,和同来的几位朋友闲谈一阵之后,倒头便睡了。次日清早起来,才知道孙先生已在半夜里举行了就职典礼,改元改曆,本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南京临时政府初成立的时候,事无前例,一切草创,总统府秘书处也非例外。记得在我们开始办公的头几天,无非忙于一般性的通告文字,如《告前方将士文》、《告海陆军士文》、《咨参议院文》之类。几天后,各方面的人员到得多了,秘书处才有了一个分组组织。现在就我所记得的分组办法,及在各组担任职务的人员记出如下(在当时各事动荡不定的形势下,许多任职的人员也是往来不常的,现在只就任职较久的人记下来):

秘书长:胡汉民

总务组:李肇甫、熊成章(以上二人后来做参议院的四川代表去了,但仍时来总统府秘书处担任联系工作)、萧友梅、吴玉

章、任鴻隽

軍事組：李书城、耿伯釗、石瑛、張通典

外交組：馬素、張季鸞、鄧家彥（此人後來到上海去辦《中華新報》了）。

民事組：但懋辛、彭素民、廖炎

電務組：譚熙鴻、李駿、劉鞠可、黃芸芬（此組事務頗忙，還有幾個華僑回國人員參加工作，其姓名已不記得了）

官報組：馮自由、易廷憲

收發組：楊銓

此外，不屬於秘書處而與秘書處關係最多的，有法制局，局長是宋教仁；印鑄局，局長是黃復生。

南京政府的組織是總統制，在臨時總統之下設有陸軍、海軍、外交、內務、財政、實業、教育、交通、司法各部。當時的各部部長，除了陸軍黃興、外交王寵惠、教育蔡元培之外，均是當時的社會名流及舊式官僚（如實業張謇、交通湯壽潛、內務程德全、司法伍廷芳等是），這些人未來南京就職，於是部務皆以次長代理。各部次長却多半是與革命事業有密切關係的年青人，如陸軍次長蔣作賓、外交次長魏宸組、內務次長居正、財政次長王鴻猷、實業次長馬君武等是。這些人及法制局局長宋教仁，皆常來秘書處談論與他們相關的事務。

秘書處的日常工作，除了偶然草擬些通告文件外，便是批答各方面來的公文函件。大約因為當時是民主政治開始時代，一般人的政治興味很濃，因之上條陳提辦法的信件實在不少。這些，我們總擇其比較重要的與以適當的答复。其次，是各地機關的人事上或組織上的問題，人們總是要找到最高當局來求解決；如南京地方主管官方濬的辭職，吳淞軍政府李燮和軍隊的撤銷，皆要經過總

統的批准。記得在批准李燮和司令辭職文中，秘書處曾做了一篇很象樣的駢體文。（順便說一句：當時武昌方面黎元洪發表的通電，大半是用長篇駢體文字，南京方面的文牒則用簡明的古文，成了鮮明的對照。批李燮和的呈文，意在表揚他放棄軍權，故成一個例外。）自然，當時在秘書處任職的人們也可以自己提出一些有益國計民生的建議，得到秘書長及總統的同意，通令施行，如禁止種鴉片煙及解除廣東“蠶戶”的禁令等。所有這些文件，都可以在當時刊布的臨時政府公報中查出的。

順便談一下當時的生活情形。我們這班臨時秘書和許多政府人員（如外交部次長魏宸組及總統參軍陳寬沆、黃大偉等）都住在總統府宿舍里。每日三餐也就在秘書處套間內開膳，每桌大概是四碟四碗。食宿之外，每人還給了當時財政部發行的軍用券三十元。我個人拿了這三十元，一無用處，大半都送給朋友了。

南京臨時政府自一月一日成立，至四月一日孫中山先生解臨時總統職而結束，恰恰三個月。約在二月中旬，南北和議以中山先生駐位於袁世凱，并由袁世凱宣布實行共和政治而告解決。但後來因為建都問題，袁世凱南下就職問題，迂延復迂延，直到三月下旬，以唐紹儀為總理的南北統一政府才得成立。大約在三月二十八九日，唐紹儀總理帶了俞人鳳、顧維鈞、曾廣勳等，來臨時總統府接收秘書處。我們原在秘書處任職的人，要做官的，自然可以隨着唐總理北上混個一官半職，但有一部分人則提出寧愿再到外國去學一點有用的學術，為將來建設祖國服務。這個意見當時得到了孫總統的批准，後來交稽勛局辦理。這便是我們這批稽勛學生的由來，其中包括吳玉章、蕭友梅、譚熙鴻、李駿、劉鞠可、黃芸蘇、楊銓等及我，但也包括了許多既不在秘書處又與革命事業無關的人，是當時

建議的人所不曾料到的。

(二) 記为蜀軍返川与湖北軍政府

商議借道事

一九一一年八月武昌起义，我在东京将同盟会事略加结束后，即于是年十月初由东京返到上海。此时上海已經光复，苏、浙的革命軍正在进攻南京，与张勋的軍隊在南京城外作战。长江下游的革命軍虽然頗为得势，四川方面則自端方带兵入川以后，情形甚为混乱。聚集在沪上的一班四川革命党人发起組織蜀軍，返川援救，并推熊克武为首領。这便是后来十几年中在四川政局上起了极大作用的蜀軍的起源。但此时革命軍与清軍方在武昌、汉口之間对垒作战，蜀軍返川必須通过武汉，要通过武汉，就必须要求当时的革命軍政府給以便利。于是我和一位姓李的川人(名字記不得了)被推去武昌与黎元洪的軍政府办交涉。当时长江虽有战事，但外国籍的輪船仍可通行，我們搭了一只輪船西上。記得船过南京时，南京方于前一日(阴曆十月十二日)克复，我們在船中还看見城内地雷爆发，黑烟冲天，又看見下关一带革命軍士兵正在挨戶搜查。船过湖口时，被岸上炮台发炮制止通过，随有軍士上船检查后方得放行。这些都使我們感觉到革命时代的气氛。

當我們到汉口时，馮国璋的兵已經打到汉口，并且把租界以外的商場烧得精光了。在黃兴指揮下的革命軍，退保汉阳，不久(十月七日)汉阳也失守了。清軍的炮火由汉阳轰武昌，本来是最便利不过的，可是此时的袁世凱正玩其“养敌自重”的把戏，方与革命軍停战言和。所以我們到汉口时，两軍正在停战期間。我們到汉口后，住在当时武汉政府設在租界上的一个招待所。此时武汉輪渡

早已停开了，听说武昌的城門也只有一門每天开放几个小时。我們打听清楚之后，便雇了一只小船划过长江，到武昌去訪黎元洪。我記得那天长江风浪很大，坐在一叶小舟上横渡长江，比过海还要难受。进了武昌城，方知軍政府所在地的省議會曾受到清軍炮轰，黎元洪和軍政府都迁到城外洪山寺去了。我們又跟踪到洪山寺，在此才真正看見当时革命軍軍容。在洪山寺的大殿上，横七竖八睡滿了軍隊，不用說了。守卫軍府每一道門的士兵，則身穿圓領窄袖的长袍，头戴的是四脚幞头，前面还紮了一个英雄結子，手里拿着有柄的长刀或馬刀之类，使人疑惑这些人是不是刚从戏台下來的！那天晚上，我們就住在黎的副官馮忠信办公室，等候会见黎元洪。大約在三更时分，秘书处忽抄出重庆宣布独立的电报，电尾署名是“重庆都督张培爵印”（张培爵号列五，后来被袁世凱杀害）。于是大家說：重庆既已独立，蜀軍不用返川了，就留在外边作北伐軍隊吧。事实上，这也就是我們見黎元洪所得的結果。

（三）記章太炎先生

我認識太炎先生是他在日本东京主持《民報》編輯时代，而讀到他的文章則尙早。我在中学时就获讀了他的《答康长素书》（此文現收入《章氏丛书文录》中，題为《与康有为論革命书》），觉得他的議論精辟，辞語尔雅，在当时談革命的文字中可謂独树一帜。就在这个时候，又讀到他的《煇书》。此书是他讲学的著作，虽然艰深难懂，但在一个暑假中我也把它点讀一过。从此对于太炎先生的思想文笔是五体投地地佩服的了。記得《煇书》初版的封面是《革命軍》的作者川人邹容署签的，而太炎先生也正是为了替《革命軍》作

序，被清政府在帝国主义租界内逮捕，和邹容一同关进了西牢，尝过三年的铁窗风味。《扈书》是太炎先生早年的著作，他的政治思想的变化，有时也可以看得出来。记得这书正文之前，先有两篇“匡谬”文字，叫《客帝匡谬》、《分镇匡谬》。在《客帝匡谬》文章后面，他写道：“余自戊巳遭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饰苟且之心，弃本崇教，其违于形势远矣。……著之以自勗，录而删是篇。”而在《分镇匡谬》则云：“怀借权之谋，言必凌是。……鉴言之莠，而删是篇。”可见先生曾有一时期赞同保皇党的保清主张，而提出了“客帝”这个新名词，但后来把这个主张改变了。

一九〇八年我到日本东京留学，太炎先生已在前二年从上海租界出狱，由民报社邀约到东京去主持《民报》编辑了。当时有一班热心国学的留学生，趁此时机组织了一个国学讲习会，请先生开讲国学。我记得第一次讲学是在东京神田区大成中学借了一个讲堂开始的。听讲的人以浙人、川人为多，浙人中有沈士远、兼士兄弟、马裕藻、马叔平、朱希祖、钱玄同、龚味生等；川人中有曾通一、童显汉、陈嗣焯、邓胥功、鍾正楨、贺孝齐、李雨田及我与我的兄弟任鸿年等。还有晋人景耀月、景定成；陕人康宝忠。这些人大概是每讲必到的，所以还记得。此外还有偶然来去的，也不在少数。讲习的内容由先生决定，开始讲顾炎武的《音学五书》，其次讲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其次讲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其次讲王念孙的《广雅疏证》，这些都是小学的基本书籍。先生在每条有问题的地方，举出自己的意见详加解释，再由听讲的人逐条记录在原书的条文上。这样每周一次，大约继续了一二年，听讲的获益不少，后来有几个成了国内有名的历史学家和文字学家。小学讲完后，我们请先生讲诸子学，于是先生讲了《庄子》。记得讲《庄子》时，我们觉得先生

关于《庄子》文字的解释极富新义，希望先生把它写出来。次日先生就拿了一部批好的《庄子》来给学生看。他这样精勤不懈，实在令人敬佩，后来就成了他的《庄子解故》一书。讲过了这些古籍之后，先生还作了一次系统的中国文学史讲解。记得此次是在小石川区先生自己的住宅内讲的。先生手中不拿一本书、一张纸，端坐在日本的榻榻密（地蓆）上，一口气两三个钟头喋喋而谈。这样大约讲了四个上午，把一部中国文学史讲完了。若是把他的说话记录下来，可以不加修改便成一篇很好的白话文章。后来先生把这个讲演写了出来，成为他的《国故论衡》，可惜他写成古文以后，反而失掉了讲时的活泼风趣。先生同一般的中国学者一样，不大喜欢和人往来，平时总是耽于深思之中，但是对于学者们请他讲学或其他学术上的商讨，从来没有看见他推辞过。这样讲学，于先生本人的成就也有好处。据我所知，先生的著作，如《文始》、《新方言》、《岭外方音集》、《庄子解故》、《国故论衡》，都是在此时成书的。

当先生讲中国文学史时，有一天我们见先生的门首列了一个小榜，把中国古来的文人分为几类：第一是通人，如东汉的王仲任、仲长统，隋的王通，宋的司马光，属于此类。第二是学者，如明末的顾炎武、王船山，清代的全谢山，属于此类。第三是文士，如西汉的扬子云，唐的韩昌黎，宋的苏氏兄弟，属于此类。可惜当时没有把这个名单抄下来，现在已记不清楚了。我们当时窃窃私议，以为先生是属于第一类的。

先生虽主《民报》笔政，但其政治主张亦不全与同盟会相合，如在《民报》论说中有《代议然否论》一文，显然与当时革命党中的民权论大有出入。一九〇九年《民报》既被禁，陶成章自南洋来东京，与先生复兴光复会。辛亥革命后，先生返居沪上，对于临时政府的

許多設施如定都、借款等事多所獻替，同時對於党政軍人的爭權奪利，深致不滿。記得某次在南京的川軍開會追悼四川革命時期死義先烈，先生送來一付挽聯，寫道：

羣盜鼠竊狗偷，死者不瞑目；

此地龍蟠虎踞，古人之虛言。

當時看見這付聯語的均為之駭然。也許是因為陶成章被刺的刺激吧，他此時思想言論漸漸與同盟會覺人相遠，以至於與當時的官僚而兼名士的熊希齡、張謇等組織統一黨，來與同盟會對抗。一九一八年我從美國留學歸國，到上海的寓所去探訪先生，看見先生書房裏掛着黎元洪贈送的四個親筆擘窠大字“東南朴學”，可見先生對於黎的贈語是相當重視的，而這四個字先生確也當之無愧。

先生在近代文人中最佩服的，除了崑山顧亭林之外，還有他的鄉先哲青田劉基。據聞當他被袁世凱軟禁在北京時，絕食十四天，自必死，曾寫信給青田的朋友，要他們在劉基墓地附近為他造一生墳，死後即歸于此，以“申死生慕義之志”，並親書“章太炎墓”四個大字寄去，以作墓碑。一九三六年，先生歸道山了。解放後，人民政府把他卜葬於西湖張蒼水祠之後，與張蒼水墓在一起。這是因為西湖為遊人行蹤易到之處，便於凭弔，同時也因為張蒼水是明末抗清志士，代表民族正義，與先生景慕劉基的遺意是符合的。聽說現在先生的墓碑仍用他自書的“章太炎墓”四字，所以但直書其名，而沒有附加任何稱號。

武昌起义后粵軍北伐始末

姚 雨 平

(一) 北伐前的形勢

自經广东的庚戌新軍起义和辛亥三月二十九日起义，事虽未成，而革命潮流已弥漫全国。故八月十九日武汉义旗一举，全国各地次第响应，不百日南京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清朝傾复，建立民国，遂告成功。

广东原是革命势力最活跃的省份，但因連年起义失敗，两次炸李準又未成功，清吏搜捕极严，革命活动极其艰难，因此广东光复，反居其他各省之后。李準固一镇压革命活动最力之人，但因經两次被炸，已心惊胆战，迨聞武汉起义，全国景从，知清朝大势已去，为保全生命财产，拟向党人投降。当由其幕友謝廣我(字义謙)的介紹，派其八弟李次武赴港見胡汉民。胡要李準先有所表示，才能获得党人的相信和諒解，并作书晓以大义，略謂：“吾党与子为敌，非敌个人，敌助滿洲政府之有势力人耳。若能翻然改图，舍昔日之助滿政府者而助民国，則去敌而为友，党人当知此义。”李接书后，乃一面派人劝說总督张鳴岐及統制龙济光，一面决献虎門要塞，以示輸誠。张鳴岐初尙欲借伪装独立，示好党人，以观动静，至此亦只得潜逃香港了。以是广州于九月十九日兵不血刃，便告光复。諸

議局当即公推胡汉民为都督。胡未到前，以协統蒋尊簋为临时都督，并即将中华民国国旗悬于諮議局屋頂之上，人心大快，全城紳商，紛紛志庆，一时鼓掌声，欢呼声，爆竹声，响彻云天，亦可見人心之归向革命久矣。

九月二十日晨，胡汉民偕同志多人抵省，就任都督，成立广东軍政府，并委蒋尊簋为軍政部长，魏邦平副之；李郁堂为財政部长，廖仲愷副之；黎国廉为民政部长，伍藉榮副之；王宠惠为司法部长，汪祖泽副之；伍廷芳为外交部长，陈少白副之；梁如浩为交通部长（副未定）；王宠祐为实业部长，利寅副之；丘仓海为教育部长；朱执信为总參議。是月二十七日，又推举陈炯明为副都督，黄士龙为參都督。

我自黄花崗之役失敗后，即前往南洋英荷各屬；嗣得武汉起义消息，遂兼程返港，轉赴广州。广州光复后，各地民軍麇集，司令多至数十，一时秩序相当混乱。党人因过去历次起义，屢为李準所敗，对李仇恨甚深。此次光复，虽因李之輸誠而得以迅告成功，但其中經過，外間尙鮮知之者，以是李之部屬頻遭各地民軍毆打。李乃向胡汉民哭訴，胡即派我查办此事。我查詢之下，始悉掛我的名义的亦不少，当中有賴三其人。經我将李準輸誠反正經過向大众說明后，毆打之事遂漸停止。李于感激之余，亲送自用长柄駁壳枪两支給我。

（二）北伐軍的組織及其內部关系

胡汉民就广东都督职后，約我到其寓所商談。我因事遺忘，屆时胡又遣馬錦春（江苏人，为新軍中外省人領袖）来敦促。見面后，胡詢我对大局有何意見。我答云：現在各省迭电到粵，催促出兵，

武汉形势危急，待援尤亟。革命前途，尙未可乐观。我省此时应速出兵北伐，支援武汉，进而会合各省革命军，彻底消灭清军，推翻满清政权，建立民国。胡表示同意，并说：“现在约你来谈，正为此事，想请你担任总司令之职。”翌日，各同志又会商于军政部蒋尊簋处。有人主张俟广东秩序稍定，将军队训练好后，再行北伐。我即以太平天国的失败为鉴，主张立即组编军队北伐，直捣燕云，促清室瓦解。众皆赞成，并即公推我为广东北伐军总司令，随由军政府正式任命。我以事机急迫，就职后即星夜筹备。当时组织兵力，计有步兵二团（新军编制，每营五百人），防营二团，炮兵、机枪、辐重、工程、卫队各一营，学生地雷队、华侨炸弹队（后改营）、宪兵队、卫生队各一队，约共八千人。其重要官佐，有林震、张文、罗熾揚、李济深、陈铭枢、楊刚、莫庆思、张桓杰、李民雨等。军械有管退炮十八尊（当时广东全省只有五十四尊，皆系最新式德国造），步枪弹三百万发，机枪弹五十万发，炮弹一万余发，实力颇雄厚。

华侨炸弹队系由归国参加革命之南洋侨胞组成。南洋各地侨胞一向热爱祖国，对国内革命运动以及教育、慈善福利事业等，莫不尽其力之所能及，出钱出人。武昌举义后，南洋侨胞闻风兴起，不少人自动返国，参加实际行动。其陆续在香港集合的百余人，成立华侨炸弹队，拟进攻广州。旋以广州反正，乃改为北伐华侨炸弹队，公推周达为队长，编入广东北伐军建制，受我指挥。北伐军至南京后，周达以炸弹失慎殉难，全队改推其父周辉浦接充队长。“父袭子职”，军中一时传为佳话。随将队改为营，合原有员兵及以后陆续加入者，共达三百余人。副营长周辉浦因事去职，公推鍾良材接充，岑寿阶为副营长，林德謙等为连长。其官兵三分之二，均为嘉应州属及大埔客属，北伐作战时，立功甚伟。

茲將广东北伐軍總司令部編制與重要官佐姓名列后：

總司令：姚雨平 副總司令：馬錦春
參謀長：陳雄洲（至南京后，陳以丁憂去職，派張文繼任，并派楊剛為副）
高級參謀：林震（固宿戰后，調任師長）
副官長：李民雨 機要課長：丘徽五
秘書長：叶楚傖 秘書：謝星侨
經理部長：鄒魯 副部長：曾能（伯鐔） 吳倚傖
軍需部長：姚海珊 軍需：王錫民 姚雨香
管理部長：汪×× 姚右軍
軍法部長：陳耿夫
軍醫部長：陳任樞 軍醫：李奕充（李至宿州時調充衛生隊長）
交通部長：郭健霄

此外，尚有間諜、馬醫、稽核三部（負責人姓名已忘），并在上海設經理局，派鄒魯為局長，經理部事由副部長曾能負責。當時規模草創，司令部的組織與人事，均未臻健全，且時有更動。部署略定，我即派高級參謀林震先率領一團赴上海、南京籌備。大隊旋于十月十八日由廣州乘船出發。抵滬時，滬軍都督陳其美派張羣招待，全市民眾熱烈歡迎。到南京后，駐碑亭巷協統衙門。

大軍由粵出發，先后三批，聲勢甚壯，曾頒發誓師文，為秘書長叶楚傖手筆。其詞云：

維黃帝四千六百零九年十月某日，雨平、錦春奉大義北征虜巢，謹集師旅，以誓于汝有眾曰：

吁嚱武哉，粵軍人！洪軍舉旗，蔚郁風云，赤符北指，濼

蕩胡氛。衣冠文物，开十三年汉家陵闕之金陵。越五十年，广惠欽廉，海波茫淼，皇適返天。洎夫新軍倡議，春蒐繼葩，血埋碧草，魂祀黃花。此儔非吾粵英雄之陈迹，为吾諸將士烈所必繼、仇所必报者哉。今江汉炳灵，义师四举，一战而戮廢昌之尸，再战而尽张鉄之众。金陵鵬舳，重建降旂；万里长江，还于故主。三矢告庙之日，去今非遙；然北未搗幽燕之巢，南未歼汉襄之賊，吾將士岂能戢矢鏑劍，不与中原豪杰共竟斯功耶？雨平、錦春猥荷司令，传曰：“师克在和不在众。”庄子曰：“两軍相遇，哀者胜矣。”吾將士上庇黃帝之灵，下集风云之佐，愿共勉之！

北伐軍副司令兼团长馬錦春，江苏鎮江人，为人熱中权位，时存非分之想，一意培植私人势力。在出发途中，他曾要求准他率原带一团到鎮江，企图借机謀取鎮江都督，遭到林震反对，未遂所欲。到南京后，他又向我介紹五六人做团营长。他說：“我軍現在就快要开往津浦路前綫作战，作战总是副司令往前綫指揮的。我軍官佐多半未带过兵、打过仗，缺乏經驗，恐怕到火綫上站不住。我現介紹的几位，都是打过仗、有經驗的。”我反駁他說：“我們的軍隊是革命軍隊，勇敢能战，誰說我們的官佐火綫上站不住脚？”我同时还問他：“你到京后，既未来总部办公，又不往团部办公，你現在究竟愿意做副司令呢，还是愿意做团长，必須有所抉择。”随后，他就离开軍隊，一去不回，几次战役都沒有参与，但战后我仍代他补升少將。此外，參謀长陈雄洲亦发生过类似情形。他到南京后不到总部办公，另在別处自設參謀部，要把总部的公事送到他那里去办，我未予同意，过后不久，他以丁忧去职。

(三) 北伐作战部署和主要战役

广东北伐軍到南京后不久，孙中山先生便于十一月初六日从海外回到上海，我由南京赴沪欢迎。当見面时，他曾問我带兵若干，枪弹若干。我据实相告，并以枪弹缺乏，請求設法补充。中山先生即列举欧美各国革命軍以少胜多的事实，說明我軍械弹已甚充裕，不需补充，并指示我宜督率士兵勤加操練，使皆能弹无虛发，自然战无不胜。我以軍务倥傯，即辞別返南京。

北伐軍以仓卒組織，編制及人事仅粗具規模，未尽完善，全軍齐集南京后，以作战在邇，即进行調整，重新部署。南京临时政府于十一月十三日(公历一九一二年元旦)成立后，南北和議未成，武汉急告，我軍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上旬奉命循津浦铁路进兵北伐，并先派李济深到浦口筹备营房，又与皖軍柏文蔚等組联合參謀团。

在此之前，有淮軍陈幹(山东人)及柏文蔚第一軍旧部葛应龙，經邹魯介紹前来投降，并謂可招集軍队，协助北伐。我即为之代請政府予以淮軍、鎮軍等名义，发給經費，受广东北伐軍指揮。北伐作战时，此一部份部队亦頗出力。

繼后我复派高級參謀林震为前敌总指揮，設总司令部于蚌埠車站。全軍作战計劃由參謀长张文拟定，前綫和行营各設指揮部，由李济深、张文分任之，遇重大事項，始由总司令裁决。作战前，我軍約八千人，編組概况如下：总司令下設两旅、四团，未設师(战后始成立师)。旅长为张我权(新軍)、陆世儲(防营)。团长为张桓杰、吳庆恩、曾传范、张定固。另炮兵一营，营长陈佑卿，战后扩充为团，团长由炮兵指揮罗熾揚升任，陈佑卿副之。机关枪营，营长謝达文，战后扩充为团，即由謝达文升团长。我軍初未設置騎兵，仅有

战馬數匹，追战后俘获战馬八百余匹，乃成立騎兵团，以李廷良为团长。盖此时南北議和尙未成功，战士斗志昂揚，因而积极扩充軍力，准备再接再厉，繼續北伐，肃清北方清軍殘余。岂料不久之后，竟因軍費无着，不得不自請裁軍(詳后)。

北伐軍作战部署既定，为了牵制武汉敌人，完成革命大业，即率軍前进。至固鎮，便与清軍張勳、倪嗣冲所部发生遭遇战。我軍士气旺盛，大破之，追敌至宿州城外。此为北伐軍第一次战役。时宿州知州李維源(广东嘉应人)倾向革命，来見，并以徐、宿一带兵要地理相告，我軍頗得其助力。至是复与清軍大战。此役清軍炮兵、騎兵均占优势。我亲临前綫指揮，軍心益壯，冲鋒陷陣，无一以当百。当敌軍出动騎兵时，我軍以机枪扫射，敌騎兵紛紛墜馬。敌軍用野炮，利于远地战；我軍用山炮，利于近地战。以我軍士气旺盛，頻頻冲鋒前进，致使敌軍野炮失其作用。敌軍見我軍如此勇敢，頗为震懾，咸謂“民軍(敌人称革命軍为民軍)不怕死”。自拂晓接触，战至下午三时，清軍复大败，退出宿州。事后聞北洋五鎮正式陸軍曾加入此次作战，以致此役战况远較前激烈。我軍乘胜北进，追至徐州南之夹沟。此为北伐軍第二次战役，也是三次战役中的主要战役。

經此战役后，敌軍胆寒，張勳派代表乞和。我要求清軍退出徐州一百里以外，張仅允由夹沟退至曹庄，以夹、曹間为中立地带。双方代表复于二月十日会商于符离集車站，亦未能达成協議。和議破裂后，我軍复北进，一战而占徐州，追至徐州以北三十里，張勳走济南，革命軍声势大振。此为北伐軍第三次战役，亦可說是最後一次战役，从此东綫即无战事。各路北伐軍受此役鼓舞，亦同謀大举北伐，京津震动。清廷迫于大势，乃于二月十二日下詔宣布退位，

南北和議告成。

徐州攻下后，我軍升林震為師長，李濟深為該師參謀長。我軍自作戰以來，計陣亡將士二十人，傷者百餘人，即將忠骸運回，葬于南京莫愁湖畔，名曰建國粵軍烈士墓。孫中山親題“建國成仁”四字勒石。我曾作一聯曰：“渡江率子弟八千，淮上收功，破虜永除專制政；流血教健兒二十，國魂不死，雄風長在莫愁湖。”

（四）北伐軍的遣散

南北和議告成后，南京臨時政府以北伐軍名義已不適用，乃改為討虜軍，派我為總司令。旋以所部將士多為粵籍，且有不少南洋華僑子弟，頗不耐北方氣候，又以徐州駐地卑濕，將士多病，我乃請准陸軍總長黃興，由徐州班師回南京。不久，南京臨時政府復將軍隊改編，參謀部頒下命令云：“准三月三十日陸軍部咨開：粵省軍隊應編成軍，非遴選統將，不足以資整理。茲經本部申請大總統，以廣東討虜軍編為第二十二師，以鍾鼎基所統一師編為第二十四師。以二十二、二十四兩師編為第四軍；以廣東討虜軍總司令姚雨平為第四軍軍長，張文為參謀長，林震為第二十二師師長，李濟深為參謀長……。”自是年四月底，我即就任第四軍軍長，又稱軍司令。孫中山辭總統職后，我仍統軍駐南京，受南京留守黃興節制。迨南京臨時政府裁撤后，我軍即自動請求解散。

我軍請求解散，原因頗為複雜。當孫中山就任臨時總統，調胡漢民為總統府秘書長，其廣東都督一職，由副都督陳炯明代理。陳素自私，我任北伐軍總司令后，他頗為觸望，及彼繼任粵督，對北伐軍軍費與械彈的接濟，遂多方掣肘。迨我改任第四軍軍長，胡漢民復任廣東都督，陳炯明為經略。第四軍軍費由廣東與中央政府分

担。此时统一初成，国库支絀，财政部与四国银行磋商垫款，条件颇苛，輿論嘩然。南京留守黄兴发起国民捐，以資救济。全国各軍师旅团营长、留守府參謀长、各处处长及各軍事学校校长等六十九人，由第一軍軍长柏文蔚領銜，于五月九日由南京发出通电，略謂：“民国方成，万事待举，外国借款，百端要挟。財政困难，已达极点。非竭力节流，不足以救危亡。拟請中央頒布減俸章程，此間軍人当首先实行”等語。我与所部师旅长均列名其中。国务院亦通电規定，全院各部总、次长概不发薪，其余員司概給津貼六十元。当时財政既如此困难，裁兵減餉，各方咸認为当务之急。且江苏地方又歧視客軍。我乃与胡汉民往返电商，拟將軍队調回广东高州、廉州一带駐防，筹建营房，本已有成議，岂知又为陈炯明所阻撓而中輟。我迫于情势，即以全軍解散之議商之所部，各官佐多表贊成。复与南京留守黄兴商，黄亦深以为然。乃于五月十二、十三、十五、二十一日，陸續发出裁軍节餉通电，为天下倡。原电今已无存，茲将各方贊成之复电译录如下：

一九一二年五月十六日广东都督胡汉民电：

南京粵軍司令姚雨平鑒：元、删两电均悉。裁一分兵，即少担一分餉，亦可少借一分債，語語透辟精到，曷胜敬佩。旅宁軍官，当能共体斯意。粵省財力虽絀，定当悉索敝賦，以助进行。若能全师遣散，解甲归农，不特为吾粵軍人之望，且功成身退，高风所在，抑亦全国观感所关。尙望实力为之，至深翘盼。前定汇款，經催財政司陸續汇宁，断不迁延貽誤。专此敬复。胡汉民 銑

同年五月十九日江西都督李烈鈞电：

南京第四軍姚軍长諸公均鑒：文电敬悉。吾国餉累財絀，

險象环生。裁軍节餉,实为目前救亡至計。来电言之痛切,足以警醒軍界同胞,烈鈞五体投地,无任欽仰。贛省光复以来,兵数倍增,已达十七标以上。鈞蒞事后,即从此入手,除第一期遣散万余人外,近复将步炮工輜各营次第設法裁并,持以定力,务达实行。刻已通电全国,共謀裁撤,計邀洞鑒。尊电所論,实获同心。如有良謀,尙希随时賜教,不胜盼禱。贛都督李烈鈞叩 效

同年五月二十三日国务院电:

南京第四軍姚軍长:奉大总统令:“箇电悉。該軍长捍卫江淮,声助卓著;民国肇兴,論功盖伟。茲复悼怀时变,倡議撤軍,以顧国儲,而銷隐患。仁心义向,懋树风声;全国安危,系茲枢紐,嘉賴曷可胜言。惟大局方定,人心□□,正需豪雋,相与維持。部署定后,望即攬轡入京,借图良覲,以慰企怀,无任殷盼”等因,合行电达遵照。国务院 漾

同年五月二十三日陆军总长段祺瑞电:

南京第四軍姚軍长鉴:箇电祇悉。举債养兵,危殆万状。公首倡解甲之議,以身作则,敬佩无涯。时事艰虞,需賢而理,幸勿遽怀高蹈也。祺瑞 漾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我們南方革命軍人主张裁軍,目的是为了节餉,是为了減輕国库开支和人民負担;而袁世凱、段祺瑞虽然复电表示支持,措詞也很冠冕堂皇,其实他們是別有用心,不过企图借此来削弱南方的革命力量而已。

当全軍解散时,我因炮兵培訓实不容易,乃保留炮兵一营,調回广东。詎知該营回抵虎門时,即被陈炯明派兵繳械。由此可見,日后陈之排胡叛孙,此时已露端倪了。

我参加辛亥革命的经过

林 虎遺稿

在未談到我是怎样参加辛亥革命之前，須先略为談一談我是怎样到江西进武备学堂的，我跟黄兴、郭人漳等的关系以及我回两粵带兵的经过，头緒才易清理。

先父寿棠，在一八七五年以秀才在广西百色黄統領幕中办理文案，后入刘永福幕帮办文案；台湾反对日本占領的武装斗争失败后，随刘回到广州，报捐县丞，到江西候补。我就随同父亲到赣。一九〇二年，我十五岁时，江西开办武备学堂，設有官宦子弟四十个名額，我根据这一条規定去报考，被录取入堂。十七岁那年的暑假某日黄昏，我和同学李思广、余介远、夏琛、蔣羣四人到东湖沿堤散步，忽聞笑声和妇女叫罵声。大家循声前往，見一独輪車載妇女三人，正推上石拱桥的中段，被四个壮男橫阻車前，拍手嘻笑，引以为乐。我心头火起，斥其无理。彼等罵我多事。我憤极揮拳，同学们亦起而奋击。暴徒奔逃，我等乃返。

次日，監督陈伯文召集同学，問昨日下午誰在外面打架。我挺身自臥，并說明当时情形；李、余、夏、蔣等亦均自臥。監督略加申斥后散队。我以为可以无事了。不料过了两天，監督貼出一张布告，說我等不守堂規，在外滋事，将李等四人开除，因我平日功課尙优，从寬处理，記大过二次，責手心三十板 留堂察看。看了之后，我

心里万分难过。当时若不是我先动手，这回事可能不发生。这是我累了他们，他们受累被开革，我反得留堂，心何能安？我当即收拾行李和他们迁往客栈。大家商谈之下，都不愿回家，真无出路时就去当兵。李思广说，他族侄是世袭武官，和常备中军統領郭人漳熟識，可托他向郭探問能否收容我們。結果郭允收四人任营見习官（郭仅四营）；把我介紹到駐九江的常备前軍岳凤梧統領处。岳見了郭函，委我为第二营見习官。不久，第二哨官出缺，岳就派我接任。我初次帶兵，喜懼交集，勤慎自奮。一月之后，我哨軍風紀、学术科皆被評为各管之冠，我也得到嘉獎。未几，郭人漳奉調广西，路过九江，商得岳的同意，調我一同赴桂，我才由贛回到了家乡。

郭到桂后，被委为亲軍四营暨健字两营統領。郭委我任亲軍四营督操官。不久，广西藩司張鳴岐建議巡撫李經羲試練新軍一营，委郭兼营长，委我为督队官，負責訓練。六个月之后，檢閱成績，认为合格，即升我为营长。这是一九〇五年的事。

一九〇六年，李依張的建議，准备增編一标，飭由郭举荐訓練新軍人才。郭請咨調江南督練公所提調趙声为第二营长，湖南弁目学堂監督蔡鐔为标教練官，教官雷騰为第三营长。是时，黃兴早已由日本潛至桂林工作。某日，趙声酒后暢談洪楊故事，被旧軍將領告密，李經羲遂中止增練新軍；对已練之一营，亦有解散之意。黃兴見形势恶劣，即将平日物色认为同志的八人，由他主盟加入同盟会。此八人为趙声、郭人漳、胡敦生、雷騰、楊尊任、楊祖时、卢慈佛和我。那时我已十九岁了。

一九〇七年，李經羲調任云貴总督，黔撫林紹年調任桂撫。林最厌聞練新軍事，亟謀解散我已編練之一营。郭得桂藩張鳴岐的保荐，由粵督岑春煊調粵任用，同时調我營到粵檢閱。岑就将我营

留粵差遣。不久，岑調升郵傳部尙書，調兩江總督張人駿繼任粵督。時趙聲正在南京任新軍標統，由張督携同到粵任廣東新軍標統。迨至欽州三那地方發生抗捐風潮，股匪乘機出擾，欽廉的鎮、道電省告急，請兵鎮壓。張督遂命郭人漳率我一營，並派趙聲帶新軍步兵一營、山炮一連歸郭指揮，由海輪運到北海登陸，相機“剿撫”。三個月左右，當地秩序完全恢復。但防城縣的東興到十萬大山的洞中三百餘里均與越南接壤，其時孫中山、黃興、譚人鳳等革命首領，潛匿越邊。張督認為邊防重要，特任郭為欽州邊防督辦，所有原來欽州巡防的十二個營，均歸郭統率調遣；另命趙聲拔出步兵兩連、炮兵一連及我的步兵一營作郭的的機勁部隊。未几，郭因繼任欽廉兵備道，不經常駐東興，遂調我任欽州邊防前路四營督帶，督帶行營設在防城屬之那良（距東興七〇里）。

當趙聲未調返廣州之前，常駐廉州的靈山縣，我則常駐欽州城。黃興時常從越南潛到靈山趙的駐處和我的駐處，動輒流連一二月。自我改任督帶移駐那良後，黃就未曾來過，想是另到其他地方活動去了。我父親因隨郭任隨營委員，曾在我處與黃興遇見數次，察知他是革命黨人，深恐我將來會受他們的連累；但見郭同情我的行為，又未便告誡我。他後見我在邊防因勞績得保舉了一個“分省補用直隸州”，就希望我能早些改換行業，從做文官這方向去發展。所以他再三請求郭保送我到廣州，請張督（時張鳴岐已由桂撫升任粵督）發給我到京引見的咨文，並先得到了郭的同意。郭更叮囑我引見後辦指省時，應指省廣東，因廣東當局，多是舊識，容易得到照顧。諸事辦妥，我便請假到廣州，親自投文見張。張笑着說：“你年紀還輕，可以在軍隊多鍛練幾年，何必急急做官。”我說：“父親年老，他希望能見我做官，光宗耀祖。但是我受大帥和郭道

的知遇，得有今日，将来我还希望指省广东为大帅効力。欽州毗連越南，为边防要冲，原本規定常駐新軍一标，营房已經造好，現在尙无兵去駐扎；如果决定就近在欽廉招募編練时，我对当地情形熟悉，引見回省后，有用得着我的話，我愿尽我棉薄。”张点点头說：“你明天去見見龙軍門，將你的意見向他說，看看他怎样講。”龙济光那时是广东陆路提督兼新軍統制官。我見了他，說明我的意見。他答：“很好，督帅也說你訓練新軍有經驗。不过現駐广州的新軍尙不足，将来最好是你在欽廉招募一标，帶回广州訓練，加強省防。等你引見回来再商量吧。”

当时长江一带与西南各地，革命党人的活动正力，鼓舞人心的事件，时有所聞。清廷为鎮攝西南計，特派素称干練知兵的凤山为广东將軍，就在刚到广州通过街道进入將軍府的当天，在中途被炸死。革命党人的声势更大。某日，我遇見胡敦生，告知他进京引見的事。胡以現在时局紧张，頗有利于我們的活动，劝我不要进京。他說，这样做太迟緩了，倘能趁机会在广州攫取部分实力更好；不然的話，宁回欽州就原有力量求发展。当时我頗躊躇难决。回寓所后，得到督署通知，传我明晨晉見。次晨我晉見张督。张說：“現值国家多事，你們不宜久离职守，緩些时再晉京吧。目前四川關铁路风潮，朝廷派岑春煊宮保前往安撫，电我要三千卫队护送进川，已由龙軍門派黎天才率領赴武昌等候。万一事态扩大，或者需要更多的兵力。你可返回欽州告知郭督办整理部队，有必要时我会去电說明。”我說：“現时欽、防兩屬的团練办得很好，維持地方治安的力量是够的，部分巡防营可以抽調，連同机动部队可能有三千多人。但巡防营所用步枪多为九响毛瑟，这样的战斗能力是很薄弱的，虽然临时可以更換好枪，不过总不如平时就用好枪教練，

到了实际作战时，就比较容易发挥好枪的性能。如果大帅认为将来尚有用着欽州防营的时候，我希望发给新枪二千枝、轻机枪二十挺，交我带返欽州为教练防营之用。我当电知郭督办补具请领的电报。”张说：“现在各处前来请领枪械的甚多，不知够分配否，俟查明再说。”当时的局势既发生了变化，我转回欽州的决心更坚。但为了欲得一批枪械增加我们的实力，又不能不迟迟其行。我乃急函郭报告情况，促他来电请领枪械，并请他随时注意时局的发展，免贻牛后之议。过几天，龙传我晋见。他告知我，武昌新军叛变，他已请张督代奏，请准率兵平乱；并说他领存有大批枪械，张督向他暂拨六八口径新步枪一千支、弹二十万发，轻机枪二十挺，弹十万发，交由我运给郭督办，他已同意照拨，并已手令军械处遵办；嘱我速向海防司令部接洽，派定运舰，即可起运。他又说，朝廷如果准他率部平乱，他想带同我们在欽州的几千人去，嘱我告知郭督办随时整装待命。及至我到海防司令部交涉运送械弹时，才知道广庚、广玉两舰出海巡邏未回；广海舰现正在广州修理，需时较久；广金舰已满载高雷道彭言孝所领得的办地方民团用的陈旧械弹，一俟上好清水，加足煤炭，就开往水东港，大约往返与卸载总要十日左右，必须待广金舰回省后，才可以装运我所领的械弹到龙門港。计算日程，可能在两星期之后。我虽焦急万分，但事已如此，只好晋謁张督，告知情形。张要我到香港搭外国商輪先回欽州，这批枪械将来由他派员押解到龙門港，届时再行电知。我只好离广州到香港，候輪搭赴北海。这条航綫虽有英、法的商船，但无规定班期，甚至两三星期才有一次。我急于返欽州，只得作走一步算一步的办法，遂搭乘最近开赴琼州海口的法国商船先到海口。时值連日大北风，乃改僱三桅木帆船（又名大眼鸡）赴龙門港，再由陆路到欽州城。

到欽州与郭見面时，他揭掉帽子哈哈大笑，露出已剃光的头。他說：“我們已宣布独立几天了。因为接到你的信，明瞭了本省的局势，复接到黄兴在汉口与北軍作战的来电，催促我們率队援鄂。这样的明碼电报都可以通过湘、桂两省，虽然是迟緩了些，但結果未被扣留，湘、桂的情态也可以想象得到了。我們是不肯錯過这个机会的。現在我們首先要商議如何筹措軍餉，如何調編援鄂部队的問題。”我說，这些問題都須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来拟議，才可以做得通。他很同意我的意見。我們便从欽、廉方面的情形談起，由近及远地談到广州和全国，作了一个初步的拟議。

自我离开广州不到十日，广州的情形陡变。因广州原有的新軍非龙济光嫡系，不仅不可靠，反要一部可靠的力量去防范它。从前各县与革命党素有联系的民軍，亦咸据地自雄，交通为之断絕。再以水师提督李準有不少部队，战斗力亦均不弱；过去黄花崗之役，他击杀革命党人很多，而現在却显露了脚踏两头船的态度。更以革命党人現在的声势，业已震动全国，张督亦不敢恋栈，只有待机离粵。龙感到形势日逼，不能不为自己打算，既不能割据自立，又不愿尽忠清室，便只好派人到香港向广东革命首領胡汉民、陈炯明表示輸誠，談判条件。广州就在这种同床异梦的形势下独立了。但龙拥有劲旅逾万，皆滇桂籍，团结既坚，械亦精利。粤当局虽不无焚象取齿之心，終存实力难攻之慮，随后只好調龙出駐欽、廉，結果是反使龙有机会去勾結段祺瑞，得扩充更大的实力，为癸丑拥护袁世凱复据广东的张本。这是后話，这里就不多說了。

當我們正在計劃調集援鄂部队时，不料欽廉方面发生了一幕悲劇，竟把原来計劃整个打乱了。事因欽廉独立是在广州之前，其时北海鎮总兵陆建章兼統着廉州巡防的五个营，当欽、廉宣布独立

后,他当然要离开北海,来电給郭請派員前往接收。这是辛亥革命时各地清吏贊成独立、不事抵抗的一般作法。郭遂調欽州边防中路督帶楊尊任前往接統了这五个营,正拟按照计划在五营中选六百余人編成一营,帶同援鄂。此时突有廉州人苏慎初者,自称奉胡汉民命前来組織欽廉軍政分府。当地士紳告以欽、廉已經独立,他說那是假独立,不能算。他就一面向各营造謠,說陆建章交卸給楊接任时,曾筹有三个月恩餉,一并交楊轉发,現在要追取这批恩餉,証大家分享;一面又用金錢运动兵变。苏之毒計得逞,遂將楊押追恩餉。但这本来是沒有的事,楊如何拿得出来。于是苏遂急急地将楊枪杀了,其主要目的,就是斬断这五营人傾向欽州的念头。我們在欽州得到这个消息,悲憤万分。其时已将在欽防各营的外籍官兵集中了一千四百多人,成立了两个步兵营,一个山炮連。我主張即用这个部队趁廉防各营尙未集中,苏氏新来,众心未附,采取迅速行动,将它各个击破,再作計較。馮銘楷(馮子才第七子)說,他最近得到消息,苏慎初已派人到欽州来运动兵变,企图搶夺軍政权。他認为現时这支外籍部队不宜調动,留鎮欽防要紧;他已动员民团,一俟布置妥当,緩急才有所恃。我們都同意他的建議。果然有几个营擅自集中,进驻离城二、三十里的村落,夜間出劫。情勢既变,无形中我們几乎陷于被动。幸馮的民团动员迅速,到处扼要布防;复由郭严令擅自行动的营队,即時移駐指定区域。野心者見布置周密,才匿迹不敢动。

我們感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实非短時間所能理得清楚,深恐有誤我們援鄂大計。而馮又顧慮欽防力薄,将来会被苏氏吞并。我們只好縮小計劃,在防营只挑选三百余人增編輕机枪兩連,其余各营与軍政实权,均移交馮接替。馮又要求我們留欽坐鎮十日,以

便他能迅速調換一批得力的營哨官。這是他的正當要求，我們也應盡力協助。他擁有許多民團做基礎，整頓防營後，足夠維持地方治安，當不致發生什麼意外。但是我們未能为死友楊尊任報雪冤仇，使其飲恨地下，真是愧對同志。

當諸事停當後，我們即率這兩個步營、兩個輕機連、一個山炮連，共一千七百餘人，取道靈山縣之陸屋、沙坪，出廣西南鄉江口，乘船經梧州到廣州。到後，才知黃興已由漢口到南京組織臨時政府。我向副都督陳炯明（胡漢民已赴南京）接洽領取服裝補充彈藥，郭則由香港先赴上海相候。那時黃興任臨時政府的陸軍總長，他知道了這個部隊已到廣州，就派海輪到粵接運。到南京後，黃興將他由漢口帶來的一個模範營（約六百多人，是他在漢口時的衛隊），交我編足步兵三營，定名為“陸軍部警衛混成團”，委我為團長。

我率部隊到南京後，郭人漳由上海到京。黃興見到許多老友會聚一堂，甚為欣慰。郭對黃說，他離湘潭家鄉多年，家中尚有老母，須返家住些時，再出為國効力；擬隨帶去短槍二十餘支回鄉。黃許可，并由陸軍部給予通行護照。郭乃離京，我和他也就分手了。

辛亥革命前后杂忆

仇 鳌

今年十月十日是辛亥革命的五十周年紀念日。辛亥革命虽沒有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任务，但就推翻清朝統治和結束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來說，却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我今年八十一岁了，五十多年前曾以革命党和中国革命同盟会(簡称同盟会)的一分子，在日本东京和国内长沙、上海、吉林等地参与革命活动。民国成立初期，又在上海、南京、北京、湖南等地参加政府工作和社会活动，直到宋教仁被刺、二次革命失败，再度亡命日本为止。辛亥革命前后的史实，我是亲历过和知道一些的。略述所忆，以当紀念。

(一)

我原名曜元，号炳生，一九〇二年入长沙府学。早年好讀《船山遺书》，后来看到清朝一些大兴文字獄和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紀事以及黃菊人的《黃帝魂》、邹容的《革命軍》、陈天华的《猛回头》等书，憤恨清朝的专橫暴虐，起了参加革命的念头，就改名“楚遺”。一九〇四年四月，我首次到日本；一面学习师范，一面同罗杰、余焕东、赵緣、仇亮(式匡)等組織新华会。这时，黃克強、宋教仁等已在长沙創立华兴会，筹备起义。东京的新华会就是为响应

华兴会而組織的，两湖留学生参加的最多，覃振、刘道一、田桐、白逾桓、沈鴻烈、樊鍾、盛时等都是会员。这时，日本已同帝俄开战，征兵进行短期訓練。我和樊鍾、盛时、覃振等报名应征，以两个月的時間学完了步兵操典。日俄在我东三省境内开战，清廷不能保卫国土，任凭外人宰割。我們对于清廷压迫汉人，害怕洋人，憤恨达到极点，尽力鼓吹发动革命，复我河山。所以我們那时进行的革命，主要是从对于清廷压迫汉人的仇恨出发。人人都想造反，人人都要推翻清朝。以后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先生正式提出“驅除鞑虏、恢复中华、創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政治綱領。但当时也只有少数人了解国民革命的意义，大多数人还只是知道种族革命。至于平均地权的問題，一般人更是莫测高深。

一九〇四年秋，黄克強、刘揆一、馬福益、陈天华、宋教仁等在长沙运用华兴会和同仇会的組織，筹备新旧軍和会党起义，預定阴历十月十日（公历十一月十六日）清廷西太后六十生辰之日发动，省外各地五路响应。我們在东京得悉华兴会的革命組織有所发展，仇亮、赵縉和我三人就兼程回国，准备参加行动。不料到了上海，长沙起义已在事先洩密失敗，馬福益被捕就义，黄克強、刘揆一、宋教仁、陈天华等幸免于难，逃匿上海租界。我在革命秘密机构（公共租界新開路余庆里）里，初次会見黄克強，感到他气魄雄伟，态度磊落，意志坚定。他說湖南的組織未散，基础还在，仍可回去繼續进行。我們三人依照他的指示，轉道湖北回湘。

我們三人当时都只二十几岁，心粗气浮，在用錢方面也沒个打算。到了汉口，住在后花楼长春栈。各自检查行篋，三人只余一块多錢，仅够开支行李運費，以后的生活費用更是毫无着落。仇亮不管三七二十一，坐下来就写信給上海机关的黄克強求助。我和赵

繚也沒有拦阻。第二天，仇亮和我过江到武昌寻找亲友。我在一个朋友的父亲处借到五元。时已傍晚，走到汉阳門，城門忽然提前关闭，听说是要捉拿下江来的革命党。我們二人大吃一惊，提心吊胆地繞至文昌門，幸而城門尚开。出城赶到汉阳門輪渡碼頭，輪渡也已临时停止；看見岸上滿布軍隊帳棚，如临大敌。只好坐“划子”（小渡船）过江，从王家渡上岸。听得汉口的风声更紧，仇亮忽然想起他写給上海的信，可能被官方检查出来，洩露行迹，就害怕起来，走到旅栈門前也不敢进去。我把仇亮引到旅栈后面的茶館里坐着等候。我观看了一会四面的动静沒有异样，走进旅栈，赵繚安然坐在房里，这才通知仇亮进来。我們幸而未被官厅的偵探們发觉，第二天就匆匆走了。

回到长沙，原来的革命机关已被破获，一时找不到負責的同志。我便同仇道南（仇亮的父亲）、江海宗等办湘阴师范，利用学校暗地鼓吹革命，并准备进行暗杀。罗良鏞从日本带回几枚小型炸弹，江海宗取一枚到岳麓山高处試驗不灵，暗杀无从着手。一天，听说陆军大臣鉄良到长沙来视察新軍，我和一位同志大力士易希谷兴奋起来，决定持挺狙击。我們二人到小吳門等候，我任巡风，他任挺击。他带着一条坚实的粗棍，預备給鉄良当头一棒。但是鉄良那天沒有从小吳門經過，我們这种“古俠客”式的行刺便落了空。

一九〇五年，因为湘阴师范有些老先生革命性不强，我同彭枚生、赵繚另办私立第一中学作革命宣传机关，彭作校长，我作教务长負实际責任。我們开办这个学堂，得力于唯一中学校长禹之謨的帮助很大。禹之謨在湘乡、长沙亦有毛巾厂，他是当时长沙的商会会长兼教育会会长，原与黄克強有联系。

一九〇五年秋，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黄克强领导的华兴会，蔡元培、陶成章领导的光复会，合并改组为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所有三会会员均为同盟会会员。我们一度组织的新华会，原为响应华兴会，至此也并入同盟会。黄克强这时密函禹之谟，在湖南成立同盟会分会并推销《民报》。因此，禹之谟就成了我们进行秘密革命活动的首领。《民报》经我们想尽方法偷运偷销，在湖南各地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八日（阴曆十一月十二日），我早年在求实书院的同窗陈天华，在日本大森海湾蹈海自杀。次年五月六日（阴曆四月十三日），留日归国的湖南学生姚洪业又在上海投黄浦江自杀。他们不惜牺牲生命来激励国人进行革命，使革命党人深受感动。陈天华遗体由日本运沪后，湖南旅沪人士派人将陈、姚两柩送回长沙。禹之谟、彭枚生和我提议公葬于岳麓山，借以垂之永久。官厅不予同意，但也未明白禁止。我们决定在七月十一日（阴曆五月二十日）举行公葬，事先并发表宣言。届时由唯一学校和民立一中为首，发动学生及其他各界并少数外宾共约数万余人，结队护送陈、姚二柩于岳麓山顶；沿途高唱哀歌，队伍绵延十余里，学生身穿白色制服，一片缟素。公葬仪式举行时，禹之谟当众演说，万众振奋，民气大为伸张。官厅这时已无法阻止，因而对我们非常嫉视。恰巧不久发生了长沙学务处要员俞诒庆、漆且湘宿娼被民立一中学生捉住的丑事。原来俞诒庆、漆且湘素行不端，在一个星期六的夜晚走入娼家，被附近民立一中学生们看见。星期日天亮一羣学生拥入娼家把他们捉住，赤身捆绑起来。学生因彭枚生和我都不在校，请得禹之谟到来，当场照相后才予释放。禹之谟指斥俞、漆为士林败类，不能领导学界。俞诒庆等怀恨在心，向官府大

吏密告我們是革命黨，秘密推銷《民報》，準備起事。官府等到暑假，趁大部學生回家，於八月十四日（陰曆六月十一日）借故逮捕了禹之謨，後移解靖州被害。彭枚生、趙縉等聞風逃走。我在暑假回到湘陰，還不知消息。開學前返至省城，朋友們立即把我藏匿起來，並代為照料妻室，籌措旅費，我才得秘密取道武漢、上海，逃亡日本。

（二）

一九〇六年十月，我二次到東京，改名仇鯨。除代仇亮擔任同盟會湖南主盟人，從事組織活動外，並參加了《民報》的管理工作。《民報》針對着梁啟超的《新民叢報》，展開了激烈的鬥爭，把保皇主義的論點駁得體無完膚。

這年十一月四日，在東京的留日學生中的貴族子弟和保皇派集會對付《民報》，居然提出三項辦法：（一）凡是參加《民報》的官費留學生停發官費；逮捕參加《民報》的私費留學生的國內家屬，以示懲戒。（二）也辦一報與《民報》相對抗。（三）採用以漢制漢的辦法，運動梁啟超、楊度攻擊《民報》；他們說：“能戰勝《民報》固佳，否則亦足亂彼漢人之耳目。”第三項辦法，他們雖然實行了，但卻得到相反的結果。

同年十二月二日，《民報》在錦輝館舉行創刊周年紀念慶祝大會；這是同盟會本部和《民報》的最盛時期，到會的達五千多人。大會由黃克強主持，章太炎（時任《民報》總編纂）宣讀古調盎然的祝詞，中山先生發表了著名的演說，闡發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的精義。接着，章太炎、日人斷水（革命評論社社員）、外柔（社會學學者）、宮崎寅藏等均有演說，黃克強、田桐等也相繼發言，無不慷慨

激昂。有人當場發起捐助經費，共捐出七百余元。散會時各贈“天討”券一張。從上午八時直開到下午二時方告散會。會上懸有某君（忘其姓名）贈中山先生集唐人句一聯云：“豈有蛟龍愁失水，不教胡馬度陰山”。

《新民叢報》經《民報》同人集中火力痛擊，有一蹶不振之勢，在東京留學界和國內的影響大為削弱。一九〇七年，保皇黨人梁啟超、蔣智由等在東京組織政聞社，十月十七日開成立大會於錦輝館，梁啟超特由橫濱來作宣傳演講。陶成章、張繼等事先組織革命黨多人參加，我也按時前往。我們都帶有結實的手杖，準備開打。我到會較晚，會場里已有一千多人。政聞社社員只有一百多人，坐在前面，衣上帶有三角形紅色結子頗為引人注目；有的擔任招待員，四面應酬。日本名流犬養毅等十余人也應邀到會。開會時，梁啟超已坐在台上右側；主持人稍講几句，梁啟超就上前講話，下面掌聲不多。他說：“我國必須立憲，需要國會議。現在朝廷下詔立憲，諸君應當歡欣鼓舞……”話還未畢，張繼即站起來高聲大罵：“馬鹿！狗屁！打！”我們四百余人就舉起手杖，衝向講台。梁啟超急忙轉身，向台後面樓梯逃走。張繼奔到台上，政聞社主持人慌忙上前阻擋，被我們另一位同志推倒。台下已經大亂，手杖齊揮，喊打聲四起。帶着紅結子的政聞社社員，不免挨了几下，紛紛扯下紅結子，奪門逃走。張繼在台上宣布講話，大家鼓掌歡迎，重行坐定。張繼講了些革命的道理，又對來賓犬養毅提出質問，說犬養毅素來贊成革命，怎麼忽然幫助立憲。宋教仁接着上台，把同盟會的革命宗旨，詳細發揮了一番，全場掌聲雷動。犬養毅隨後也講了話，說立憲也好，革命也好，他都贊成，希望早有行動。這樣，張繼就宣告散會。本來是保皇黨人的會場，却被同盟會革命黨人利用了。這

天，蔣智由沒有到會，他回國作請願立憲的勾當去了。章太炎曾將這幕丑劇，在《民報》十七號著文宣布。

(三)

一九〇七年初，清駐日公使楊枢請求日政府驅逐中山先生。日方表面以勸說為名，送旅費五千元，請中山先生離去。日商鈴木久五郎素日表同情於中國革命黨，也贈送一萬元。中山先生召集左右會商，決定接受，於這年三月四日（陰曆正月二十日）偕同汪精衛、胡漢民往新加坡轉至河內，設立革命機關，進行粵桂滇的起義準備活動。臨行時留給《民報》維持費二千元，餘款供給軍用。當時章太炎大不滿意，要將中山先生受贈事公諸《民報》，黃克強予以阻止。隨後黃也離日，劉揆一代行總理職務。秋間，孫、黃計劃在粵南欽、廉一帶大舉，派日人萱野長知（同盟會員）在日購運槍械。章太炎聽說所買槍械陳舊，竟用《民報》名義拍發明電，告知香港《中國日報》（同盟會機關報）馮自由另行定購。中山先生得知，認為章洩露軍事機密，通知東京本部，並對章表示不滿。章也反唇相譏，並與陶成章乘著潮惠起義失敗，鼓動張繼、宋教仁、譚人鳳、白逾桓等主張召集大會，罷免中山先生的總理職務，另舉黃克強繼任。劉揆一深恐發生內鬩，更于欽、廉起義不利，力加反對。劉同張繼為此揪打起來，結果張自認理屈，風潮暫時中止。劉揆一隨即致書胡漢民，請勸中山先生向東京本部引咎。中山先生復書說，黨內糾紛須查明事實才能解決。黃克強也來函說：“孫總理德高望重，諸君如求革命能獲成功，乞勿誤會而傾心擁護。”這樣，才結束了那次的黨潮。

一九〇八年春，因章太炎腦病發作，張繼又離日，《民報》二十

号到二十三号由陶成章主編。陶成章編了三期《民报》，仍交給章太炎主持。陶化名出走南洋，进行筹款。他要求中山先生介紹向南洋各处华侨募捐，未得允許。从此陶决計恢复光复会，与同盟会分离，把徐錫麟、秋瑾起义事件編成《浙案紀略》，在英属、荷属各地进行宣传。这时，湖南李燮和（柱中）在南洋檳港設有同盟会分部，声势浩大，頗得华侨信任。陶到檳港煽动李燮和糾合江浙湘楚閩粵蜀七省在南洋的部分华侨，列举中山先生“罪状”，上书东京同盟会本部，要求罢免中山先生的总理职务，本部置之不理。他們就在南洋重振光复会，举在东京的章太炎为会长，发售江浙皖閩贛五省革命債券。李燮和把同盟会支部改为光复会支部。一九〇八年河口之役，中山先生派汪精卫到荷属文島筹款接济，大受光复会會員的排挤，未有結果。一九〇九年，陶成章又到东京，运动黄克強反对中山先生。黄不但不为所动，并致函李燮和为中山先生申辯。

中山先生一九一二年元旦就临时大总统后，当即派員迎接章太炎到南京，相見尙欢。但临时政府沒有給章相当的位置（見下节），他随即在沪組織中华民国联合会，倡言“革命軍兴，革命党消”。这年三月，同盟会在南京举行死难同志追悼大会，他送一联云：“羣盜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龙蟠虎踞，古人之虛言。”以后又与张謇等組織統一党、共和党，拥护袁世凱和黎元洪，专门与同盟会作对。

（四）

一九〇八年十月，我因奔父喪由日回国返乡。治喪完毕后本想潜在省内活动，但长沙捉拿党人的风声很紧，自己曾被通緝，匿居不易，只得于一九〇九年初东下。过南京时，进城同党人联系，

有同志告以同盟会会员刘师培变节，投靠两江总督端方，充幕府要角；他并告我说，曾在刘处见有党人名册，第一名仇楚遣，估计就是我，嘱我谨慎，不要露出形迹，免遭暗算。我本预备南往龙州，联络蔡锷，恰值吉林办理教育的友人来电相召，便改道北行，前往吉林，任自治讲习所教员。党人赵耀、江海宗等也先后到达吉林，筹划在边远地区建立革命基础。这一计划本是中山先生和黄克强所决定，东三省各地都派有党人进行活动。但今年由于熊成基（化名张建勋）谋刺载洵，被人出卖，在哈尔滨被捕（次年就义），清吏防范党人十分严密，我们的计划没有成功。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阴曆八月十九日），武昌新军起义。十一月初，我到上海时，上海新告光复，陈其美任上海军政府都督。李燮和主持吴淞军政分府，称光复军总司令。李为湖南安化人，也是我早年在求实书院的同窗。我到上海后，李以同志和同学的关系，坚邀我担任吴淞军政分府的秘书长。

十一月下旬，江浙联军共同进攻南京。十二月二日（阴曆十月十二日），联军一举而下金陵。南京的光复，以浙军和光复军第一协黎天才部^①作战最为勇猛。黎率部首克乌龙、幕府两山，被称为黎老虎。但黎部纪律很差，当黎率队先入仪凤门时，竟肆行劫掠，我随李燮和到后才加以制止。这时镇守使林述庆入驻清总督署，称江宁都督。联军总司令徐绍楨自不能居其下，而程德全自苏州光复，早已被推为江苏都督，于是三人大争帅印。后经宋教仁赶来调停，徐绍楨、林述庆才肯把都督印给程德全。

南京光复的那天，黄克强由武汉回到上海。他早已连电在海

^① 黎天才所部为粤军，原隶龙济光，又称济军，驻在吴淞。吴淞光复后，李燮和改编黎部为光复军第一协。

外的中山先生迅即归国。党人在沪所办的报纸又尽力宣传中山先生已向海外华侨筹得鉅款，购买五艘军舰及大批械弹回国，准备北伐军事的种种消息。这一宣传使气息奄奄的清廷和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大为震动。

中山先生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到达上海，受到各界人士的盛大欢迎。第二天，黄克强、汪精卫、宋教仁、居正、陈其美等国民党要人公宴中山先生于哈同花园，决定先期分别向各省代表示意，选举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并由马君武著文在《民立报》披露。夜间又在中山先生住所集会，讨论组织政府方案。宋教仁主张采内阁制，以黄克强为总理。中山先生主张暂不设总理，将来再定。黄克强支持中山先生，劝宋教仁不要坚持己见。

十二月二十八日，黄克强、宋教仁等先到南京，晚间出席各省代表会，提出成立政府、改用中华民国纪元并改用阳历、政府组织采用总统制等等，宋教仁发言仍主张内阁制。讨论结果，照黄原提案通过。二十九日下午举行总统选举会，十七省代表以十六票选举了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另一票投了黄克强。各省代表多数不是革命党员，但无一票选举黎元洪，证明了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和革命理论已经深入人心。当然，党人事先的宣传也有相当的影响。

中山先生于一九一二年元旦在南京就职，仪式庄严而朴素。一月三日，中山先生以临时总统的身分出席代表会提出部长名单，先开预备会加以审议。初提的名单如次①：

陆军总长 黄 兴 海军总长 黄鍾瑛

① 初提的名单是据当时居正所谈，后并见一九四四年出版的《梅川日记》。

外交总长	王宠惠	内务总长	宋教仁
财政总长	陈锦涛		(后改程德全)
教育总长	章炳麟	司法总长	伍廷芳
	(后改蔡元培)	实业总长	张 謇
交通总长	湯寿潜		

預备会审議結果，对宋教仁、王宠惠、章炳麟多不同意，并主张伍廷芳改任外交。經黃克強与中山先生商議，黃提議內务改为程德全，教育改为蔡元培，外交伍廷芳，司法王宠惠。中山先生說，內、教可改，但伍、王不必对調。黃又将中山先生的意見，向代表会委婉說明，代表会乃正式开会，就修改的名单投同意票，一致通过。接着举行副总统选举会，黎元洪以十七票当选。中山先生又委胡汉民任秘书长，黃克強兼參謀总长，蔣作宾为陸軍次长，湯壽銘为海軍次长，魏宸組为外交次长，居正为內务次长，王鴻猷为財政次长，呂志伊为司法次长，景耀月为教育次长，馬和(君武)为实业次长，于右任为交通次长，鈕永建为參謀次长。

各部总长只有黃克強、王宠惠、蔡元培是党人。张謇、程德全、湯寿潜本属立宪派，在江南負有聲望；尤其是张謇以清廷状元、实业界領袖的資格为社会各阶层所推重。黃克強为了籠絡各方，所以把他們拉入临时政府(本来約张謇担任財政，张不肯就，才改为实业)。至于各部次长多为党人，各部实权均操在次长之手。黃克強为組織政府是煞費了一番苦心的。

这里还要插一句，章太炎虽未当成教育总长，二月初，中山先生又聘他任临时政府枢密顧問(同时发表两人，另一人为张靜江)，但他未就。

(五)

中山先生把临时总统社于袁世凯后，一九一二年四月，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宋教仁北上就任农林总长，我也随往。宋约我担任农林部参事，我未允。我自知学识不足，决心研究政法。宋虽同意，却主张我同时办报。他说他对农林也是外行，不想久干；中国要走上政党政治的前途，须借报纸鼓吹。他筹了一笔小款，并把接收清廷农工商部的印刷机器、铅字设备等拨给我用。我在粉房琉璃街租定房屋，一面设立“共和印刷局”从事营业，一面出版《东亚新闻》。所以取这一名称，不过想扩大报道新闻的范围，没有别的用意。大约在五月上旬出版。我任社长，易象任总编辑，赵耀编杂俎，还有不少的记者。每天出版对开报纸两大张，印数不过千份左右。

《东亚新闻》除了报导中外消息外，主要是宣传政党政治。

一九一二年二月间，同盟会在南京召开大会，通过新会章，进行选举。由于章太炎等一部分党人已经分离，造成南京与武汉对立的气氛。宋教仁建议扩大招纳会员，加强组织，把黎元洪也拉入会内。中山先生接受他的意见，但政纲方面，还是以中山先生的主张为重点。大会选出中山先生任总理，黄克强、黎元洪分任协理。会章规定干事部设主任干事五人，分掌总务、交际、政事、理财、文事五部；人选由会员票选十人，呈总理选任。大会选出干事汪精卫、胡汉民、宋教仁、马君武、张继、居正、平刚、李肇甫、田桐、刘揆一等十人，但中山先生并未选任，随着南京政府的结束就搁置起来。黎元洪对此也未作表示。以后的同盟会怎么办呢？中山先生与宋教仁有不同的意见。中山先生主张退为在野党，对政府进行监督。宋却主张联络原与同盟会有关系的党派，合并改组成一个

大党，先在議會中获得优势地位，然后組成以政党为基础的责任內閣，积极前进而不是消极后退。黃克強和多教党人贊同宋的意見，汪精卫高倡“六不”，自鳴清高，胡汉民回任广东都督，中山先生只好听凭宋教仁去进行，让他实际上作了总务部的主任干事。我认为从当时的局势看，宋的意見是对的，所以我也附和他的主张。

宋教仁得孙、黃的允許，就在北京展开活动。他不仅是长于辞令的演說家，而且是下笔万言的理論家。以“桃源漁父”为笔名的长篇論著，經常見諸于《东亚新聞》，讀者莫不欽佩。这时，北京的政党林立，除同盟会外，最大的还有共和党和統一共和党。共和党是与同盟会相对抗的。統一共和党則居于中立的地位。同盟会和共和党都想爭取統一共和党到自己这一方面来，但結果宋教仁获胜，把統一共和党拉了过来。終于把同盟会、統一共和党及另三个小党派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合并改組为国民党（初拟定名民主党，后因已有同名小組織出現，未用）。他代表同盟会，同其他四党的重要人物商妥，并把規約（党章）、通告等文件以及理事、參議名单預先拟出，到上海向孙、黃报告，作了最后的决定。八月十三日对海內外发出通告和組党宣言。八月二十四日，中山先生到京，二十五日国民党就召开大会，正式宣布成立。

《东亚新聞》关于宣传組織国民党、主张責任內閣制及孙、黃来京的报道各方面，尽了很大的力量，发生了相当的作用。宋教仁要我办报的目的总算初步达到了。

此外，这个报纸还有一項特色，那就是提倡女权。

自一九〇七年四月秋瑾在紹兴密謀举义未成牺牲以后，女子参加革命的有如风起云涌。辛亥革命时，各地起义反正，几乎都有女子参加。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女子繼續奋起，力爭參政权。宋教

仁和我均主张开放女权，著文提倡。同盟会总章第三条政綱第五項即有“主张男女平权”的規定。政府北迁，唐羣英等結队向袁世凱政府多番請愿，每次呈文都是由我代笔。《东亚新聞》不仅作了女子参政的論壇，报館有时还作了她們秘密集会的場所。国民党的政綱里未将男女平权列出，而仅在政策中振兴教育項内提到女子教育、发达女权。我曾为此向宋教仁力爭，宋以合并的其他党人多数不同意，沒有办法列入。唐羣英向宋大兴問罪之师，甚至揮拳动武，宋挨了她一掌，未与計較。就提倡女权來說，《东亚新聞》只是放了一陣空炮而已。

当时巾幗英雄中，不乏卓越的人物。但如沈佩貞那样放蕩不羈，突弄风流，却給了封建士大夫們以攻击的口实。我原对沈的談吐言論，臥为非同凡响。可是她竟追求唐紹仪，多方拉攏。一天我問她：“人說你要嫁唐，难道真有这样的事嗎？”她居然笑着回答說：“我不过想利用他一下罢了。”我为之叹惜，以后就不敢領教了。

宋教仁組成国民党以后，成为当时最出色的人物。我也充任了国民党政治部干事，为之尽力。宋以为袁世凱已被說服，可以實現組織責任內閣、建設中国的雄心大志。那知不到七个月，他竟被老奸巨猾的袁賊所暗算了。

(六)

宋教仁被刺經過，已在現代史书中記載頗詳，不待贅述。这里敘述宋案发生前有关湖南选举和政局的一段重要事实，聊供补遺。

一九一二年八月十日國會組織法和參議院、众議院选举法公

布后，国民党为了争取选举的胜利，随即开始布置各省的选举工作。这时，恰恰湖南省司法司司长洪春台死了，大家以为选举是和法律有关的事，宋教仁就要我回湖南去作司法司司长，以便掌握选举，支援国民党的竞选，同时改组湖南同盟会为国民党湖南支部。当时我在北京主编《东亚新闻》，并从事于政法的研究，不愿回湘。宋教仁极力敦促，我才答应，但仍以事成回京为条件。等我回到长沙以后，才知道办理选举属于行政范围，是民政司的事，与司法司无关。那时湖南民政司司长是刘人熙，不是国民党员，湘督谭延闿便设法将刘调开，让出民政司司长给我。我即着手筹备选举事务，自兼选举总监督，并按湖南五道，派出监督五人。结果，湖南国民党在这次选举中大获胜利。宋教仁为了竞选，这时也回到湖南，到处演说，博得各界人士的称赞和同情。他以百分之百的票数当选为参议员。

宋教仁在选举胜利后，有一晚上，约了谭延闿和我在国民党支部谈话。他说：国民党在全国的选举都已胜利，已占国会的绝大多数，大局已定，政党责任内阁制一定可以成功；他即将转道沪宁回京，准备组织第一任政党的责任内阁。他约请谭延闿参加新阁，以湖南都督兼任内务总长。他认为谭延闿的父亲谭鍾麟和袁世凯的上辈袁甲三是把兄弟，谭、袁有世交的关系，容易谈得拢，可以使袁世凯同新内阁合作。谭延闿已参加国民党，那时确实想帮助宋教仁，当即表示同意。至于湖南是我们的一个基本据点，必须牢牢抓住。宋教仁预定在谭到北京后，要我护理湖南都督。因为我在湖南同各方面的联系已有基础，对各方面都还能抓得住，宋一定要我掌握这个基本据点。只是民政司司长地位不高，他提议将民政司改为民政长，同都督地位平行，谭进京后，才好护理都督。我原约定

办完选举即行离去，坚决不肯接受，但他们也不问我是否同意，就由谭延闿电达袁世凯请将湖南民政司改为民政长，并以我为民政长。袁世凯接电后，转电上海黄克强询问究竟。黄克强尚不知宋在湖南计议的详情，又电谭延闿询问。这时宋已前往上海，谭电复黄说候宋到后详谈。其实，宋教仁的这些布置，只是一方面的想法；根本没有考虑到他们和袁世凯之间的利害冲突，以为关键问题就在竞选，国民党选举既然获胜，其他都可迎刃而解。那知袁世凯早已把宋看作眼中钉，派遣暗探，随时注意宋的行动。尤其是当袁接到湖南暗探报告有关我们在湖南这一计划的消息后，就更大吃一惊，感到非立刻下手不可。宋终于在进京的那晚，在上海车站遭到了袁世凯的毒手。这位年仅三十二岁、正当英年有为的政治家竟抱着责任内阁的遗恨壮志以终了。他留下的致袁遗电，还说什么“望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确立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犹生”。回想起来，我们那时实在太天真了。

我在宋教仁被刺后，即辞去民政司长转往上海。湖南都督谭延闿后来虽也宣布独立讨袁，但还是出于被迫的。讨袁失败，湖南党人四散亡命。我也以“四凶”^①之一被袁通缉，于一九一三年底出走东京作亡命客了。

(七)

孙中山先生与黄克强自一九〇五年八月在日本东京结交，旋即共同创立同盟会，七年间心腹相托，患难与共。但是从一九一三年宋案发生至二次革命失败出亡日本，孙黄间意见相左，一度各

^① 当时袁世凯曾称湖南有所谓“四凶”，系指麟(周震麟)、凤(谭人凤)、龟(仇鸾)、龙(龙璋)。

行其是。

宋案发生后，中山先生于三月二十五日由日本赶回上海。接着案情破露，凶手竟为袁世凯、赵秉鈞所遣派，民党无不大愤。中山先生召集重要秘密会议，主张立兴问罪之师，武力解决。黄克强、陈其美等都认为民党所控制的军队正在整理训练中，不堪作战，应候法律的制裁。中山先生拟再行东渡，争取日本的支援，黄等又以中国内务不便乞外援相劝止。四月，袁世凯向五国借款二千五百万镑不经国会通过，违法签订，全国哗然，羣起反对。中山先生又召集各省民党要人会商，决定声罪致讨。他令胡汉民回广东宣布独立，而胡答谓时机尚未成熟；令上海发难，而陈其美复一筹莫展；商由黄克强促使南京独立，而南京部队间（第一师与第八师）、军官间意见也不一致。黄克强等仍主加强国民党议员的力量，利用国会进行合法斗争，以达推翻袁世凯的目的。中山先生在气愤之下，叫朱卓文赴南京，运动部队下级军官除掉其将领，以便亲去指挥独立。部队中人到沪向黄报告。黄克强恐南京局势于中山先生不利，自请赴南京主持军事，由陈其美进攻上海。适李烈鈞河口起义失败，上海又连攻七日夜不下，完全失败。黄克强认为无能为力，于七月底一走了事，过沪不停，径往日本。八月后，安徽、广东相继失败，福建、湖南亦取消独立。中山先生乃偕陈其美等大批党人先后出亡日本，我也在内。二次革命不到两月，就这样结束了。

中山先生到东京后，责备黄克强不该放弃南京，私自出走；黄脱由于孙自己运动军队造成了混乱的局势。陈其美同黄克强之间也因军事责任问题发生了争执。因此，中山先生决心重新组织“中华革命党”，把官僚政客排斥出去。他在激动的心情下，采取江湖

会党的方式，要求入党者具立严格的誓約，并須在誓約按印指模。黃克強既不贊成重新組党，更反对立誓約、按指模。他說党中整飭紀律是應該的，可是这样做法，是要大家盲目服从。他在負气的心情下，于一九一四年三月携眷同李书城、石陶鈞等前往美国。不少党人包括我在內，最初对于立誓約、按指模也感到难堪，后来渐渐認識到过去的失敗确是有負于中山先生；革命无领导，怕牺牲，不服从領袖是断难成功的；大家有了这样的認識，履行入党手續的人也一天天多起来。这年六月，党人先开大会选举中山先生为总理，七月八日，中华革命党宣告正式成立，协理一职始終虛悬，留待黃克強归来。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在东京設法政講習所培养政治人才，在大森設“浩然庐”培养軍事人才；并办《民国杂志》，由胡汉民主編，宣传反袁。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鈕永建、彭允彝、白逾桓、张孝准等有啟事研究会的組織，因为他们不肯入中华革命党，以致有孙黃分立的傳說。实际上黃克強并未过問，这个会以后也无形取消了。

我在东京期間，鉴于很多流亡軍人不懂政治，生活散漫，曾与彭允彝、殷汝驥等商同日本寺尾博士組織政法学校，招納他們入校讀書，所用讲义多由戴季陶、殷汝驥等翻譯。我們在亡命党人中造成了研究学术的气氛，同时对于接近孙、黃的同志，也作了些協調轉圜的工夫。以后这个学校就同法政講習所合并了。

一九一六年三月，袁世凱取消帝制，中山先生和我們一批党人陸續回国。黃克強于六月三日由美抵日，向日方借款购械，准备回国訓練五师精銳軍队，作为倒袁的武力，事先已由张孝准代表黃进行商妥。旋聞袁病死，因而作罢。黃克強隨即返国，住在上海。他听从周震麟和我的劝告，先到中山先生寓所会晤，中山先生也回

訪了他。兩人時相過從，和好如初。不幸黃于十月間舊病復發，延至三十一日病故，年僅四十三歲。中山先生親臨致祭，痛悼不已。

我是在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二日《民報》周年紀念會上，始見到中山先生，聽到他的演說；以後他往南洋，直到辛亥年歸國，才又見面。一九一二年上半年，在上海、南京、北京等地，聽了他多次關於民生主義、社會主義的講演。一九一三年九月到一九一六年五月這兩年半在日本的長時期內，更不斷受到中山先生的教誨。他的寓所內，四壁圖書，琳琅滿目，十三經、二十四史、中外政治經濟書籍、各種地圖，應有盡有。他經常讀書，手不釋卷；融會貫通，能得要領。中山先生心地光明，待人誠懇，接近黨員，和藹可親。只要是為了革命，他總是有求必應。因此人人感動，努力奮發。中山先生革命品格感人之深，是我終身所不能忘懷的。

辛亥革命亲历纪实

何 遂

(一)

我生于一八八八年。当我长成的时候，清王朝已经风雨飘摇，面临它的末日了。

我的童年是在动荡不安中度过的。不仅由于父亲的早死，家道中落，由小康堕入困顿，饱尝了世态炎凉；更由于社会正处在大变革的前夕，不论政治、经济和思想上的变化都异常急剧，因此，我很早就受到了风行当时的维新派思想和民族、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影响。

戊戌变法的这一年（一八九八年），我随父亲住在江西南昌。父亲是个由举人大挑的试用知县，祖父在四川泸州做县官。有一次我父亲解饷到四川去，当时余栋臣已经在大足县一带起义，反对教会和官府的压迫。泸州距大足不远，祖父曾写了一部关于这次起义的书，父亲带了回来，我在父亲的案头上看见了。书的封面上题着“余蛮子事略”，书中详述了起义的原因和经过，其中有一副对联给我的印象很深，我记得是这样写的：

什么天主教，说甚天圣天神，绝天理，灭天伦，直到天讨天
誅，天才有限；

这般地方官，尽是地匪地棍，穿地心，挖地骨，闹到地翻地复，地尽无皮。

我当时年纪还小，但总觉得余蛮子是英雄，外国人是坏蛋。甲午（一八九四年）以后，传教士深入内地，我住的那一条街，就有两处教堂，眼看着法国神父满街走，教民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在这种民族危机日甚一日的景况下，我那幼小的心灵中已激起了对于媚外的清政府和洋大人的仇恨。

一八九九年，我的祖父死了，父亲也在奔丧中哀毁死去。母亲只好带着一羣子女，到四川泸州去投靠二叔。回想当时所见，真是一个暗无天日的世界：瘟疫流行，随处可以看到倒毙道旁的饿殍。女人只要几吊钱就可买上一个。我的二婶买了许多丫头，任意地打骂摧残。我那时处在寄人篱下的地位，对于这种腐朽阴暗的封建大家庭深为痛恶。

在这个时期，社会上的变化更大：一九〇〇年，清政府与帝国主义者勾结在一起，镇压了如火如荼的义和团起义，在次年签订了空前屈辱的辛丑条约，使中国人民再也忍无可忍，使人心更倾向于革命。慈禧太后也看出风头不对，被迫作了一些让步，下诏变法，准许兴办学校。这时在泸州有两个书院。书院有一定的规矩，凡去报考的，给你一份卷子，大多是考策论，做好交去，按文章的优劣给予奖励，名曰“膏火”。我的大哥本来考上了经纬学校，后因反对先生打人，和一个名叫余切的同学一同被开除了。余切就此寄住我家。这个人带来了许多《盛世危言》、《新民丛报》之类的书刊，也给我带来了革命的启蒙思想。我常常给书院写文章，得来的膏火就拿去买书。于是开始读到了严复所译赫胥黎的《天演论》、魏源的《海国图志》、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等

书。我从此渐渐懂得了“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道理，接受了一些“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变法维新思想。但总觉得这种办法不解恨，倒是对那些古代所谓“叛逆”的故事深表同情，太平天国革命尤其使我神往。有一次在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中读到了石达开的几首诗，如获至宝，反复成诵。又读到梁启超的《意大利三杰复国传奇》中有“倚啸东门，鞭耕陇畔，国仇家恨压眉尖，侧目看朝党”等语。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很深。余切又有“汉流”（哥老会的别名）的风度。在这种影响下，我的排满民族革命思想不觉油然而生了。

一九〇三年，我们一家离四川回祖籍福建。从此，我也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二)

甲午战后，日本在中国的势力迅速地扩张，福建在当时是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杂志《外交时报》公开地说：日本要控制中国，必先打入内部。恰恰清政府又以为只有依靠列强势力来练兵、办学校，才能达到所谓的“自强”。所以在一九〇二年成立的福建武备学堂，除了总办孙道仁，从总教习到助教都是日本人。管理学生的总队长和区队长则是日本士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的学生如许崇智、王麒、馮炯光等。我因为有一个远亲在武备学堂当翻译，经过他的介绍，在一九〇四年进入了该校第二期的预科。当时社会上都认为“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母亲不愿我去。可是我想：乱世用武人，要革命还得靠武装，便坚决地去了。

福建除了武备学堂，还有一个省立高等学堂，林觉民、方声洞、林之渊等都在该校。另有一侯官小学，也是个革命的策源地，陈与

樂、陳更新就是該校的学生。我入武备学堂不久,就和这些人結識了。这时期革命书籍出版得很多,革命派和保皇党的斗争也日益尖锐。我們虽然与国外的孙中山先生沒有直接的联系,但都自以为是这一个人系統的人。我們常常交換一些革命书报,也就在这个时期,我看到了邹容的《革命軍》及由明末四部书所編成的《陆沉丛书》(包括《揚州十日記》、《嘉定三屠記》等)。当我在灯下看到《揚州十日記》的时候,不禁伏案慟哭,反滿革命的意志更坚定了。我們不仅自己看,还強迫別人看,有时把这些书放在同学的床下,公开地說:“你是不是汉人,看!不看打你。”总队长、区队长知道了也不敢管。有时他們到宿舍来检查,我就立在书柜的前面站着不动。他們虽然明知其中有問題,可是看看也就走了。

武备学堂招生沒有严格的考試,有人情就可以入学。针对这种情况,我們提出:福建武备学堂只准福建人入学,外省人要受限制;凡是入学的必先經過考試。这个主张得到了許多学校同学的支持,我們因此結識了更多的人。我們那时是很少懂得什么政治的,也不知道什么政覺,只听说俄国有什么虛无党、无政府主义等。我們当时以为,只要是反对政府的,大概都是好的。有人說我們是“革匪”,我回答說:“是革匪又怎么样!方孝孺也不过夷了十族,他死了,后来繼起的志士仁人还有的是。野蛮的慘刑酷法,能吓倒誰?”

有一次,不記得是誰发起的,各学校的革命志士聚会于望北台。望北台在离福州城七八里外的仓前山,是五代时閩王王审知的庙。那是一个夏天,飘着雨。到会的有六七十人,都是白服短裝。有十几个人演說,都讲得激昂慷慨,大多是痛陈清朝統治的腐敗卖国,昏聩无能,尤其对所謂“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宁贈

友邦，不予家奴”的殘民媚外的政策，更是万分的憤慨。大家一致認為要救國就必須排滿，排滿又必須有武裝，因此要打入軍隊去。開完會，在大雨中，我們列着隊，唱起下面這首歌：

一朝病國，人都病。妖烟鴉片進。嗚乎！吾族盡。四万
万人厄運臨。飲我鴆毒，迫以兵。還將賠款爭。寧波、上海、
閩粵、廈門，通商五口成。香港持相贈，獅旗颯颯控南溟，誰為
我首，誰始要盟，吾黨何日醒！^①

歌聲雄壯，步伐整齊，繞道東門，過旗營而散。

武備學堂除了學習軍事學科，還要學習漢文，每周由先生出題，做一篇文章。有一次，先生出了一個題目：“諸葛亮出師表書後”。我寫道：“有問于余曰：諸葛亮何如人也，為一姓之興亡而傾倒如是哉！……”因為我常在漢文課上看小說，讀禁書，漢文先生對我久已懷恨，這次抓住了把柄，告到總辦那里，不久就以“文理荒謬，行止欠謹”的罪狀宣布開除我的學籍。布告一出，全校譁然，大家對我表示同情。許多同學說：“去找他們講理去”，把我擁到了總辦室。我走進去見總辦，質問他為什麼漢文不好就開除。總辦剛剛說一句“自然有開除的道理”，外面有人嚷道：“不要和他講啦！”呼的一聲，一個花盆從窗口砸了進來，把總辦吓得面如土色。我乘此時走了出來，和大家一起擁到閩浙總督衙門和將軍衙門去申訴，結果都吃了閉門羹。這次學潮堅持了三天，當局本欲嚴辦，最後由大紳士陳寶琛出面講情，算是沒有深究，只開除了十名學生。在開除我們的布告上寫道：“除交其父兄嚴加管束外，并咨行各國公使，各省督撫，不得留學、留用。”這樣，我在福建待不下去了。

① 此歌沈心工作曲，名“何日醒”，有鴉片戰爭、中法、甲午、庚子等四首，此為關於鴉片戰爭的一首。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籠絡中国的知識阶层，对于中国的留学生給予种种方便，入境既不要护照，入学和生活起居都很便利，而且言論也比国内自由一些。因此当时一般青年留学日本几乎成了风气。我被开除后，也决心到日本去。一九〇六年二月，我带了一封同志的介紹信，离开福建，到上海的海关找到了在海关里做秘书的林森。他是上海福建学生会会长，侨南社（当时福州一个革命团体）的人。他給我写了几封介紹信，让我先到南京去找林述庆和林之夏，于是我到了南京。林述庆那时是第九鎮的三十三标第三营管带，他劝我改一个名字，留在他那个营的左队里当排长，不要到日本去，說是到日本也学不到什么东西。我无路可走，家里也要錢供給，就很高興地答应了。

当时军队的成份是很复杂的，在我那一連里共有一百二十六个士兵，其中有一个举人、六个秀才、二十七名学生，由三个排长輪流带着。冷遹（御秋）是右队的队官。統带赵声（伯先）是江南革命的老前輩，柏文蔚是第二营管带。部队里革命的气氛是較浓的。几乎所有的士兵都剪了辮子，表示对清朝統治的反抗，誰要不剪，就被罵作“豚尾奴”。我去不几天，剪下了辮子，穿上了軍装，从此在獅子山麓石头城下度过了一段艰苦的军队生活。每天破晓，我們带着队伍，在露迹未干的草場上，唱起赵声所作的軍歌：

散步散步江南道，一幅画图位置英雄好。鍾山如龙城如虎，长江匹練西北来环繞。綠楊夹道杏滿城，錦繡江山錦繡何能較。国家恩我恩无限，生此帶礪以慰我怀抱。吾儕何以报国家，愿将赤血染上青青草。

不久，我因为翻譯了几篇日本軍事杂志上的文章，得到統制徐紹楨的賞識，被調到第九鎮司令部去当了一个三等參謀。这时革

运动已渐深入，一九〇七年，光复会的徐錫麟起事于安徽，杀了巡撫恩銘。一时风声紧张，南京第九鎮也有一部分队伍調去鎮压，我曾亲自送他們上船。不几日，传来了徐錫麟、秋瑾等烈士英勇就义的消息。徐錫麟曾說：“法国革命不知流了多少热血，我国在革命初創阶段，亦当不惜流血。我到安徽就是預备流血的。”他死后，野蛮的清朝统治者曾把他的心肝挖出来。这些情形我都在第九鎮司令部的文电中看到了，烈士們为革命慷慨牺牲的精神，使我深深地受到了感动。

这年的秋天，我带着三等參謀的官銜，考入了河北保定陸軍隨營軍官學堂（第二期，在第三期以后改称陸軍大學，簡称陸大）。因为考試成績优良，段祺瑞把我找了去，勉励我說：“第一要忠君愛國，恪守三綱五常，學問倒在其次。”我听了心里又是恨又是好笑。到保定不久，結識了在北方的革命黨人孫岳、王法勤、劉汝賢、耿毅、劉建藩、劉廷森、倪德勛、錢鼎、陳樹藩、童保暄等。大家常在保定城內火神廟孫岳的住所聚會，飲酒談心，討論學問。保定除了陸大，還有一所陸軍速成學堂，革命黨人方聲濤、呂公望、林知淵等都在該校，我們是互通聲氣的。方聲濤在日本時早已入了同盟會，因此我們又和日本同盟會總部有了聯繫。有一次，方聲濤說：“連青紅幫開山堂都有個形式，我們鬧革命總也得有個形式呀！”大家都表示同意。他拿起筆來摹擬了一個志願書，寫的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我說：“這是外國的辦法，不合中國人的口味，不如改為：‘誓同生死，志共恢復，此心可表，天實鑑之’。下面是主盟人、入盟人的簽名。”大家同意了，于是由方聲濤主盟，用針刺破手指，寫了血書，燒成灰后置于酒內，痛飲一番。在保定，前后加盟的有七十二人。

一九〇九年，陸大與速成學堂兩校學生同時畢業。我考試的成績很好。軍諮府大臣載濤曾來監考，我畢業後被派到他統率的禁衛軍去當隊官。正在此時，王孝縝（勇公）受廣西巡撫張鳴岐的委託，到北方來邀集訓練新軍的人才，我、耿毅、劉建藩、呂公望、賀斌、楊明遠、楊卓等人皆在被邀之列。大家先到北京會齊。這時，各省留日學生也都集中北京等待皇帝引見。經過王孝縝的介紹，我認識了李烈鈞、尹昌衡、唐繼堯等。廣西，這個太平天國革命的故鄉，對於我們這羣年青的革命黨人，具有多么強烈的吸引力啊！大家都嚮往廣西之行，我當然不能拋開這班革命的朋友，一個人到禁衛軍中去當隊官，於是請李烈鈞執筆打了一個辭呈，交到禁衛軍辦公處辭了職，聞大家一齊到了廣西。

（三）

一九〇九年底，我們一行人在王孝縝率領下，由上海到香港，在九龍見到了趙聲。他住在一座小樓上，非常熱情地招待我們。這時恰在燕塘兵變失敗之後。趙聲訴他當時起義的計劃，侃侃而談，我們受到很大的鼓舞。一九一〇年農曆春節，我們到了山明水秀的桂林。

廣西是比較偏僻的地方。庚子年後，隨着清政府玩弄變法的騙術，廣西也先後成立了法政學堂、警察學堂、警察督練所、典獄學堂、農林學堂、優級師範、陸軍小學、幹部學堂等。諮議局也在一九〇九年成立了。廣西的巡撫張鳴岐、藩台魏景桐、臬台王芝祥都是些老奸巨猾的官僚，多少帶點維新派的味道，不過只是趕時髦而已。練新軍的機構是督練公所，下分兵備、參謀、教練三處。陸軍小學、幹部學堂和學兵營都是為培養新軍骨幹而設的。第一任兵

各处总办是庄蘊寬，帮办是鈕永建，都是当时社会上知名之士。

同去广西的，除我们几个内地学生之外，还有孔庚、雷寿荣、田稼軒、刘鴻基、覃鑑欽、鍾鼎基、赵恆惕、楊曾蔚、尹昌衡等日本士官学校第四、五、六期的毕业生。我们到广西不久，曾因分配职位的问题，留学生和内地学生之间闹了些意见，无非是名位功利思想作祟而已。

三月，軍諮府令张鳴岐調查中越边防。张委我为边防調查长，耿毅为副。四月初，我们便离开桂林向越桂边境出发了，冷遹也同行（冷时因革命嫌疑被撤职，在閑居中）。迎着初夏的艳阳天，我们翻越了十万大山。中法战后，苏元春的兵說裁就裁，不加安頓，大多成了游勇。一路上但見田野荒蕪，瘡痍滿目，几十里沒有人烟，景象非常淒涼。沿着边境有許多大小炮台，都是苏元春时修筑的，鉄炮早已鏽得不能用了。不久到了鎮南关（今名睦南关），住在对汛委員王幼拓家里，居然是洋房客厅，相当讲究。我们問他孙中山在鎮南关是怎么打的。他說：“有一天发现左輔和右輔山上插着青天白日旗，知道被革命党人占了，可是誰也不敢上去。龙济光調兵来用炮轰了好几天，不見动静，上去一看，一个人也沒有了。”我们只能以大笑答之。

我们从鎮南关又到龙州，住在右江鎮总兵陆荣廷家里。陆荣廷出身綠林，与法国侵略者有很深的仇恨，駐越南的法軍都很怕他。我们見他房簷下掛着一块匾，題曰“独立三边靜”^①。他对我們讲了馮子材抗击法軍的故事，并說：“我真不懂，为什么打了胜仗还要把安南割給法国？不过法国人是怕我的，你們不信，到安南去問

^① 唐人詩成句：“独立三边靜，輕生一剑知。”

一問，我派出去的人誰也不敢惹。什麼外交不外交？打得過就是外交。拍洋人馬屁不如打他。”我們听了深為敬佩。

龍州道台有一營人，管帶是革命黨人陳裕時（字元白，學佛後改號圓白）。隔一天，他請我們吃飯，我和冷適、耿毅去了。他開門見山地講了不少革命的知心話。他說：“我們力量還小，不要太冒失，革命不是一天可以成功的；我們不但要考慮成功，還要考慮成功之後該怎麼辦。”他又說：“我們的組織太散漫，是個大缺點。每一個地方都應組織起來，多多地聯系人，將來互通聲氣，便可連成一片了。”我們說：“我們這一次來，調查邊防是次要的，主要是想聯絡人，听取別人的經驗，為將來的起義打下基礎。”我們還告訴他說：再往北去已沒有什麼人可聯絡，所以決定由耿毅一個人繼續前進調查，搪塞官差，我和冷適決定到雲南去一趟。陳裕時替我們寫了幾封介紹信給雲南方面的熟人。於是我們先入越南境，在河內坐上火車，經河口、阿迷州到了昆明。

在昆明先會見了方聲濤，他約集了雲南的革命志士在講武堂俱樂部舉行了一次宴會，到會的有李根源、方聲濤、羅佩金、唐繼堯、葉荃、趙康時、劉曉嵐等三十多人，談的無非是彼此如何合作，進行革命。我們在昆明逗留了一個星期，又回河內與耿毅會齊，經海防到了香港，在香港同盟會總部見着了趙聲和黃興。黃興告訴我們說：南寧講武堂總辦蔡鏗（松坡）也是革命的同志。他給了我們一封介紹信；要我們多與蔡聯系。這樣，我們完成了此次出差的主要任務，才返回桂林。

我們乘着一隻小船，由梧州溯漓江而上，在距桂林三十里的地方碰上了呂公望。他說：“現在勇公他們全都走啦。你們走后，這些人發了狂，把什麼都洩露了，險些兒掉了腦袋。”原來，有一天張

鳴岐請王孝縝和几个新來的人員吃飯，酒酣耳熱之際，尹昌衡失口說道：“要想中國復興，滿清是不能存在的。”王孝縝急忙用腳踢尹，可是張鳴岐已經覺察了，笑道：“大家不用顧慮，暢所欲言好了。”他還拿出几支新購的手槍來給大家傳觀。王孝縝酒後興起，接過槍來連放數响，把天花板打了好几个洞。張鳴岐連稱：“壯士！壯士！”又對尹昌衡說：“廣西地方太小，不足以容公。將來四川有事，可以多多借重。”（尹是四川人）尹大笑道：“世事難定，將來不知是誰借重誰啦！”張鳴岐因為王等握有實權，敢怒而不敢言，只得表面敷衍一番，暗中急調前任陸軍小學監督蔣伯器（尊篋）和南寧講武堂總辦蔡鐸入桂。蔣、蔡一到，張鳴岐就變了臉，把陸小監督雷壽榮和兵備處經理科科長孔庚扣押起來，並揚言要開軍事法庭進行審訊。多虧呂公望作揖叩頭，求蔣伯器、王芝祥幫忙，說：“政府現在都不隨便殺人，公等都是漢官，何必過於認真。”蔣、王总算答应了。蔣伯器還說：“我只問撫台，這批人是誰請來的？如果殺了人，上奏折，豈不要担知人不明之罪？政府唯親貴是用，保不定反因此得罪哩！”蔣伯器也是同盟會的人，和秋瑾相熟，所以他肯幫忙。由於他和王芝祥的轉圓，一場風波算是消弭了。但王孝縝和他約來的大部分同志都被撤差，離開了廣西。

呂公望勸我們不要再回桂林。我們商量了一下，決定回去看一看。呂公望便一個人回老家浙江去了。我們回到桂林，見到大多數同伴都已走散，的確有一種蕭索之感。張鳴岐升為兩廣總督，帶着蔣伯器走了。繼任的巡撫是沈秉堃。蔡鐸一人身兼兵備處總辦和幹部學堂監督，掌握了督練新軍的大權。耿毅和我約集了劉建藩、楊明遠等几个留下的伙伴，商討今後的大計。大家都深感過去沒有組織和計劃，把事情弄糟了，所以決定組成廣西同盟會支

部。一九一〇年八月，在干部学堂、陆军小学、学兵营等几个部門的同志共約二十多人，聚在一起开了一个会。大家推举耿毅为支部长，我为參議，赵正平为秘书长，刘建藩为学兵营分部长，楊明远为干部学堂分部长，梁史为陆军小学分部长，蒙經为諮議局分部长。我們还議定了会規，开始发展組織，并且把保定的那一套歃血为盟的办法搬了过来。耿毅是支部长，往往因为一天有好几个人分別履行宣誓仪式，手上要戳好几針，不几天就紅肿了起来。我們因为这样怕被人发现，才議定改为集体宣誓。我們又作了分工，大体上是：楊明远、刘建藩和我負責新軍；耿毅負責运动巡防营和联络綠林会党，他和广西天地会首領刘古香等有密切的联系。这样，广西同盟会的組織便一天天壮大起来了。

我們本想直接拿着黃兴的介紹信去見蔡鍔，但看他表面的样子没有什么革命的味道，所以想出一个办法：在黃兴的介紹信之外另附一信，大意說：“我們路过香港，遇見你的好友黃君，带来书信一封，并有要事相商，請于某晚九时到江南会馆前門一叙”；并把两封信都放在蔡鍔办公的桌子上。可是那一天他沒有来，我們估計蔡鍔曾在长沙时务学堂学习，和梁启超有师生之誼，可能是立宪派，因此就决定設法对付他了。恰好，广西因經費不足，新軍由原定訓練一师人改为訓練一个混成旅。这样，干部学堂培养的軍官就过剩了。蔡鍔决定用測驗汉文来甄別一下，成績好的留下，坏的淘汰。結果录取的一百二十多人中，湖南籍学生占大多数，广西本地人只取了三十多人。这件事引起了广西学生的不平。我們乘机揚言蔡鍔袒护同乡，排挤本地人，并且通过同盟会的組織关系，动员干部学堂、陆军小学罢課，学兵营罢操。这个反蔡的运动很快波及到师范学堂和政法学堂。議長甘尙賢和議員蒙經等也在諮議局

彈劾蔡鐸。王芝祥和護理巡撫魏景桐怕亂子鬧大了，示意蔡鐸高桂，所以不久蔡鐸就到雲南去了。他臨走的時候請我們吃飯，席間對我們說：“你們何苦攔我，你們是革命黨，我比你們資格更老。你們太年青，渾身帶刺兒，不小心將來難免殺身之禍。我在此尚可為你們敷衍，我走后你們更須自愛，千萬不可拔苗助長。”說着在桌上取過一個炮筒子放在我的面前，說：“這個送你們作個紀念，成大事的人都要有個修養，你們唸過蘇東坡的《留侯論》嗎？所謂‘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你們能做到這一點，當成大事。”蔡鐸走時，荐方聲濤繼任兵備處幫辦（方後由幫辦改任學兵營營長）。方聲濤來後，老朋友團聚一堂，非常高興，從此革命活動更便于開展了。

同盟會支部組成不久，在福棠街二號租了一幢房子，作為活動的中心，並決定出版《南報》，開展革命宣傳，由趙正平任主筆，每半月一期，每期印兩千多份。在這個報上，我以“賤夫”的筆名寫過一篇《邊防調查紀實》。《南報》創辦以後，起了不小的影響，各學堂都有人來訂閱，也有捐錢的。不久受到巡警道王乘必的干涉，我們又改名《南風報》繼續出版。

幹部學堂第二期招生的時候，耿毅和尹昌衡主持招生工作。由於耿毅的活動，該期所招新生大多是對清朝統治不滿、懷有革命志向的人，所以幹部學堂的革命氣氛是較濃的。我當時除擔任參謀處籌略科科長的職務外，又兼任了幹部學堂的教官。幹部學堂有二十多個同盟會會員，分部長楊明遠是一個精明細致的人，每次開會他都預先通知我，並把學生集合好。我們曾在一起主持過入盟式。有一天上課時，我借口教室太悶熱，命學生隊長帶着全班跑步到郊外的操場去。到了操場，我對學生作了一次演說，大意是說：“自從

鴉片戰爭以來，滿清王朝喪權辱國，殘民以媚敵，我們做的是二層奴才。滿洲人講的是‘寧贈外邦，不予家奴’，外國人只要派一只兵艦來，就能從中國拿一塊地方去。我們要讓滿洲人統治下去，不久就會當了亡國奴，怎麼有臉立于世界，怎麼對得起自己的祖宗？廣西是洪秀全的故鄉，廣西人是對得起祖宗的。今天有了槍杆子就要誓同生死，志共恢復。孫中山、黃克強不是到處舉行起義嗎？我們就是和孫先生一伙的，孫先生的人遍于天下，只要我們中間有人起來振臂一呼，就會天下響應。”我當時情緒很激動，問大家：“你們當中有敢做陳涉、吳廣的沒有？”學生們一致高呼：“有！”又問“有不以為然的嗎？”誰也不做聲。操場中立着一座天橋，高約丈余，我便三腳两步爬到天橋上站住，又從上面奮身跳了下來，指着天橋對大家說：“敢做陳涉、吳廣的就跳此橋！”在場的七十二個學生經我這番鼓動，全部都跑上天橋，奮身跳下，以表示他們的革命決心。我興奮極了，對他們說：“你們畢業了。你們都是洪秀全！清朝一定要滅亡！”我們鬧得這樣厲害，有些人从天橋上跳下時又摔壞了腿，沈秉堃也有些覺察了。他問幹部學堂監督趙恆惕：“聽說有人拿你的學校鬧革命，是真的嗎？”趙連忙說：“沒有這個事，何遜這個人有口無心，我敢擔保。”沈秉堃才沒有深究。

一九一一年到來了。從全國範圍來說，革命已呈現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形勢；在廣西，經過一段組織和宣傳，革命也有了相當的實力。這年年初，香港同盟會總部派了一個同志來找我們詢問廣西同盟會發展情形，並通知我們四月一日將在廣州起義，希望廣西屆時響應。我們召開了一次會議，經過一番爭論，決定響應廣州的起義。

正月底，二月初，許多同志陸續從外省到桂林來了，有陳更新、

严汉民、馮超驥、刘元栋、王印蕙等。方声涛的姐姐方君瑛、弟弟方声洞、嫂子曾醒也都来了。大家团聚在福棠街二号，每天談論革命。方君瑛、曾醒是由香港經广州来的，談及起义的准备情形，并述說她們如何化装成送葬的寡妇偷运軍火。我和陈更新睡在一个床上，共同回忆着福建望北台的往事。他长得瘦弱文雅，我开玩笑說：“你这个人，风都能吹得倒，还鬧什么革命？”他很生气。我又問：“你娶过亲了沒有？”他說：“娶了。”我問：“娶多久了？”他答：“半年。”我笑道：“这一次不要去啦，你死了，老婆很苦呀！”他气得要和我打架。二月中旬以后，来的人陸續到广州去了。大家心知此去凶多吉少，但都視死如归。我們依依不舍地送走了这些同伴，頗有些“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感慨。

不幸广东方面因洩露了机密，不得已提前在三月二十九日举事。这就是震动一时的黄花崗之役。从广西去的同志，大多数在起义中光荣地牺牲了。

三月三十日，我們正紧张地筹划着起义，电报局送来一份香港拍来的电报，电文是：“何叙甫、耿鷗生、方韵松：父已死；毋庸来港。”我們一看就知道是广东事败。正在难过的时候，巡警道派人来把耿毅叫去，追問他电报是打給誰的，三个人中究竟誰的父亲死了。幸喜耿毅沉着，說是方韵松的父亲死了，电文在“耿鷗生”下面漏了一个“轉”字，因为方声涛随学兵营駐郊外李家村，不常入城，他的函电一向都是由我們轉交的。巡警道王秉必虽然怀疑，也无可奈何。不久，消息传来，果然是广东事败了。方声涛听說弟弟声洞死了，十分悲慟，狂飲大醉，把队伍集合起来，要向桂林进发。經刘建藩极力劝阻，才制止了他这个冒险行动。当时真是风声鹤唳，我們的門前布满了偵探。沈秉堃揚言要砍几个脑袋下来。我們也

暗示，只要上面动手，广西就要大乱。那个时候，清朝的统治已似风中残烛，加上亲贵当权，排斥汉官，所以一般汉官都自有打算，不肯把事情做得太绝。由于这个缘故，沈秉堃并未深究，只把握有兵权的方声涛解了职。但革命的种子已在学兵营中深深埋下，刘建藩又是骑兵队队长，所以这支力量仍然掌握在广西同盟会的手中。

七月，沈秉堃派程子楷和我到北京去参加永平秋操，行前把我叫去，郑重地对我说：“你这次到北京，是代表广西的，一举一动都要顾及影响，排满革命的话千万讲不得。”我也表面上回了他一套忠君爱国的话。就这样，在武昌起义的前夕，我离开桂林北上了。

(四)

八月十四日，我到了武昌，参观汉阳兵工厂。厂方说：“革命党将要起事，风声很紧。有一半工已经停了。”我又到南湖兵营找人，碰上戒严，进不去。于是我到了北京，会见了刘汝贤和孙岳，知道武昌已经打响了。

一天，王孝祺来訪（他当时是第六镇统制吳祿貞的副官长），见面就对我说：“綬卿（吳祿貞字）要見你，請你去一趟。”我跟着去見了吳祿貞。他的样子很英武，談吐率直而亲切。他說：“我早就听勇公談起你，你来得正好，馬上有事託你。”我問：“什么事？”他說：“武昌战事廬昌打得很不好，他大概吃不消了。涛貝勒（載涛）把我找去，告訴我山西已經宣布独立。派我的一协人到山西去镇压。你跟队伍去，担任十二协的參謀，馬上动身到保定去报到。”我說：“好吧，你拿公文給我。”他說：“这事刻不容緩，公文来不及了。”我問：“十二协統領是誰？”他答：“吳鴻昌。”我說：“那好极了，吳鴻昌是我保定陆大的同学。他带的是什么兵？”他說：“一团是第六镇的；

另一团是禁卫军，是派来监视我的。”我说：“你放心，我有办法。”其实我自己也莫明其妙，只是心里有一种必胜的愿望，根本就没有想到失败。

这时，糜昌已被调回，清廷起用了袁世凯。但武昌起义所点起的革命烽火，很快便燃遍了大半个中国。我便在这种动乱的形势下赶到保定，会见了吴鸿昌。他说：“你来得很好，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我说：“我的公文还没来哩！”他急道：“不用了，局势很紧张，你跟我走吧。”九月十二日，我们从保定向石家庄进发。一路上吴鸿昌对我大献殷勤，说什么同学了两年，今天在一起要同生死共患难。我说：“你放心，我听你的吩咐，我是有什么就干什么的。”他又说：“国家到了这步田地，我们也应该真正地拿出一点办法来。”我也故意顺着他的口气说：“当然，当然，早些把革命党打平就好啦！”

晚上，到了石家庄。我已经知道：团长曹进和三等参谋方本仁是坚决反革命的；石家庄车站司令瞿寿堤和站司令部参谋刘文锦是革命的同志。当天深夜，车站司令瞿寿堤、正太铁路总办丁某和几个法国人来了，大家商谈如何接通与山西交界处的铁路。忽然得到报告说：山西内部空虚，没有多少队伍。原来过去山西只有一个混成协，起义后跑的跑，散的散，剩下不过三千来人。所以派到娘子关来防守的队伍很有限。知道这情况以后，曹进主张急攻。他亲自跑到井陘县去视察，打电话回来，说娘子关防卫单薄，催促队伍迅速前进。禁卫军一团都是旗人，平日只知道搭架子，作威作福，这时早就吓破了胆，不敢向前。于是吴鸿昌和我率领第六镇的三营人出发了。

我心想如果真的开了火，一打就进了娘子关，可以一直打到太原，那么山西的革命就算完了。怎么才能阻止这次进攻呢？情急

智生，我想出了一条办法，就对吳鴻昌說：“我們應該親自到前面去看看。行軍切忌冒進。隊伍是你的，不能專听曹進的話。”他同意了。我們就乘一輛花車，隨第一營前進。火車過了荻鹿县，漸漸入了太行山。車身歪來斜去地顛簸得厉害。吳鴻昌很害怕，一路囁囁咕咕。到了頭天門，我說：“这个地方，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我們穩當一點好不好？”吳連說：“好，好，要穩當，要穩當。”我說：“打仗是你的責任，不能好大喜功。你看這地勢，車行于狹谷之間，萬一旁邊插出一支敵人來，我們怎么應付？還是停下來搜一搜吧。”吳鴻昌立即命令下車搜查。我又說：“頭天門是個險要的據點，如果被敵人控制，我們想回頭都回不成。”吳說：“那么應該留下一營人來守衛。”于是，第一營便留在頭天門。我們繼續前進，到二天門、三天門各留下一營。再前進到了微水，山勢更凶險了。車行于陡崖峭壁之間，昂起頭來只能看見一綫天光，前面的路軌被兩側的山岩擠得好象沒有了。吳鴻昌下車看了又看，徘徊道旁，進退失據。曹進又打電話來，催隊伍前進。吳怒罵了他一頓。曹說：“我要回來報告！”我对吳鴻昌說：“綏卿不在，你現在是獨當一方面的司令官，責任重大，應該經常和北京、漢口方面保持通訊联系。你看駐在什么地方最合适？”他說：“當然是石家莊嘍！”我說：“一點也不錯。”他說：“咱們還是回石家莊吧。”就這樣，留下了三營人，我和吳鴻昌坐着花車回來了。在路上他對我說：“這一次多虧了你，我頭一回上戰場，實在是毫無辦法。”我說：“這里的地形是如此复杂，你又帶着一團旗兵，這些兵是吃糧不管事的，你支使他們還得小心一點。現在北京、漢口都看着我們，关系太大了，我們是只許成功，不能失敗的。因此頭一條要穩，千萬不可急攻。我还有一个办法：上諭不是叫我們剿撫兼施嗎？我們是不是先撫一撫，告訴他們大兵壓境，趁

早投降。要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上策。如果不撫就打，万一打不过怎么办？北京还能派多少人给你？”他說：“誰敢去撫？革命党是要杀人的。”我說：“我和你是患难之交，我愿意去走一趟。”他很躊躇，說：“我們回石家庄再从长計議吧！”

到石家庄，一进車站司令部，聶寿堤指着我罵道：“你怎么搞的，把队伍弄得一塌糊涂！”我向他使了一个眼色，笑道：“这还不好么，你優极了。”他哦了声，恍然大悟，問我：“今后怎么办？”我說：“看风使舵吧。”他說：“你搬到我这儿住下，有事好商量。”于是我搬到他的隔壁房里住下。正在这时，吳祿貞来了，住在站长室，隔我的住处約四五間房子。我見他和吳鴻昌、旗兵統帶等談話，便找到他的副官长周維楨。周問我情况怎么样，我說：“我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至少几天打不起仗来。”他問什么事，我說：“山西是相当空虛的！”他吃了一惊，說：“那不太妙呵！”我便将如何故意把队伍分散駐札的情况說了一遍，并說最好让我到娘子关去联系一下，可以把山西的兵带出来，与第六鎮会合，一起进攻北京。周維楨說：“你做得很好，你知道不知道統制(指吳祿貞)现在危险得很。”我惊問緣故。他告訴我：駐灤州的二十鎮統制张紹曾和混成协統蓝天蔚曾向清政府提出改革政治条件。清政府大为震惊，派吳祿貞去宣撫。吳由北京出发，同行的还有軍諮府的一个厅长陈其采。吳祿貞以为陈其采是陈其美的胞兄，其美既已在上海宣布独立，其采一定也是革命党，而且又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所以在路上对陈其采談出了自己的意图，并且指着地图說：“这次去，联络张、蓝，加上我石家庄的队伍，会师北京綽有余力，光复之功，唾手可得。”火車到了灤州，张、蓝也来了，随即开了會議，全体通过吳的建議。会后用飯，飯后一看，陈其采溜了，停在灤州車站上的所有車皮全都开跑

了。吳这才知道出了問題。因为回北京太危險，所以才退到石家莊来了。周維禎講完，連稱“危險！危險！”我說：“吳鴻昌一定会提出剿撫兼施的办法，你們就表示贊成，然后派我去联系，我去，一定可以把山西的兵带出来的。”他說他轉告統制。

次日(九月十四日)晨，我正坐在車站客厅里，曹进和方本仁撞了进来，面带怒容，劈头对我吼道：“你是革命党！你把队伍搞成什么样子了？这么搞，我們不要打仗了。”我也跳起来說：“胡說八道，你們懂得什么？你們凭什么来对我講話？下回再这样，我就不客气了。”他們气极了，跑到吳祿貞那里去告状，說山西是空的，一冲就可以直搗太原，何遂把队伍搞得一塌糊涂，有助敌的嫌疑。吳祿貞笑道：“不会这样簡單吧，敌人的虛实我們不太清楚，冲进去出了事，你們負責嗎？我們現在是剿撫兼施，何參謀做得很对。”他們不敢再攻击我，便說：“山西混成协的參謀朱鼎勛来了(也是陆大第一期的)，那边的情形是他講的。”吳祿貞說：“那很好，他来了正要借重。”于是命令朱为正宣撫使，刘文錦为副使，到娘子关去宣撫。我明白吳的这样做的意思，就暗里将张、藍及我們計画要与山西会师的事对刘文錦說明，說：“朱知道的山西內情太多了，到那里請山西把他扣下。”他們到娘子关后，刘文錦打电话來說：“山西很听话，請我們队伍慢点来，有事好商量。”我問吳祿貞，是否再派我去一趟，看看宣撫得如何。他說：“好，你明天去吧！”忽然，守卫車站的兵士来报告，有一列火車进站，是运軍餉、輜重到汉口前綫去的。我急忙跑到站上，命令火車停下来，不許开。押运的軍需官气冲冲地跑來找我，嚷道：“誰許火車停下，汉口糧食快完啦！这些都是軍用物資，你們誰敢負这个責任？”我說：“我是奉命扣下的，山西已經投降了，这些东西我們都要用。”他喊道：“不行！这是鬧着玩的嗎？”我

命令左右：“扣起来！”上来几个兵就把他押下去了。于是几十万餉銀，十几車皮糧食、彈葯、棉軍裝，把倉庫塞得滿滿的。我把此事報告吳祿貞，他說：“你做得很對。”

十五日，我乘專車到了井陘，打電話和娘子關聯系好，便帶着几个隨從去了。關前乏驢嶺的一段鐵路已破壞了。關上守將姚以儼派隊在那里迎接我。我到娘子關輕鬆得象回了家一樣，便把石家莊的情形向姚以儼等和盤托出，說明吳祿貞意欲聯合張、藍和山西的隊伍，直搗北京的企圖。他們說：“北京已經發布命令，授命吳統制為山西的巡撫了。”我說：“他算什麼巡撫，他現在危險得很。”又把吳與張、藍聯合會議及陳其采忽然跑走的事說了一遍。他們說：“最好請吳統制到這邊來一趟，閻都督還是很不放心的。”我說：“這樣最好，請閻都督也到娘子關來，他們可以當面談一談。”姚以儼等打電話和閻錫山聯系，閻錫山答應了。我當晚趕回石家莊，把情況向吳祿貞作了報告。他說：“很好，明天我們就去。”

十六日午後一時，我隨吳祿貞抵達了娘子關。閻錫山親自來迎，並召集了山西重要將領，請吳祿貞訓話。吳登台演說道：“兄弟們！現在山西的成敗很要緊。山西的獨立使京畿震動。我已經和二十鎮統制張紹曾、協統藍天蔚聯系好了，山西的軍隊，張、藍的軍隊加上我們第六鎮的隊伍，會師北京是一定可以成功的。現在袁世凱派人到武漢搗鬼，他是有陰謀的，我們如果早到北京，就可以把他的計劃完全打破。因此，山西的成敗關係重大。再則，山西是我們中國民族最重要的堡壘。將來中國一旦對外有事，海疆之地是不可靠的。那時候，山西要肩負很大的責任。所以山西要好好的建設。”這一番話，講得台下鴉雀無聲，在場的人無不深受感動。吳祿貞又說道：“現在北京授命我做山西巡撫，我是革命黨，這對我真

是笑話。閻都督是你們山西的主人，我是替他帶兵的。”閻錫山在一旁舉手高呼：“我們擁護吳公祿貞做燕晉聯軍大都督。”台下歡聲雷動。會議便這樣結束了。

當晚回到石家莊，情況有了很大變化。曾被吳祿貞撤差的前第六鎮協統周符麟到石家莊來了，正暗地召集軍官們開會。我趕忙把這情形報告吳祿貞。他說：“不要緊的，騎兵營營長馬蕙田擔任警戒，他是我的心腹，靠得住。”稍晚，陳其采到了，也參加了周符麟等的會議。我又報告吳祿貞。他說：“禁衛軍一團人天天跟在身邊我还不怕，這幾個人怕什麼？”我說：“山西隊伍就快到了，是否派一營人來做你的衛隊。”他說：“不用了，你帶着馬營長去替我慰勞慰勞，說我明天接見他們。”十點多鐘，山西的隊伍來了，駐于石家莊郊外。我和馬蕙田坐着搖車去迎接。馬很年青，長得滿漂亮。他對我說：“統制專門介紹過你，今後還要請你多多指教。”我說：“吳統制很器重你，今天本來要加派衛隊的，統制說你很可靠，才沒有加派。”万万沒有想到，正是這個卑鄙的叛徒，為清廷和袁世凱所收買，出賣了他的長官，在當天晚上謀殺了吳祿貞！

我慰勞晉軍回來，已經是夜十一點多了，很疲倦，倒下便昏昏睡去。酣睡中忽然被一陣槍聲惊醒，聶存堤頓着腳喊道：“兵變！兵變！你趕快去調山西的隊伍來鎮壓。”我一摸身邊的手槍，沒有找到，隨手抓起一把短劍沖出門去。這時正是深秋的午夜，天高月朗，寒風颯颯，站台上——個衛兵也沒有。忽見一隊人從吳祿貞的住室中奔出，迎着我跑來。我大叫：“站住！站住！”這些人也不理我，愈跑愈快，一溜煙就不見了。我心里頓覺不妙，正往前走，忽听地上有人痛苦呻吟，仿佛是張世膺的聲音（他是奉天小學的總辦，是應吳祿貞之約而來的）。我叫道：“華飛，你怎麼啦？”他已不能言語。

我借着朦朧月色，低头一看，他的头已被一刀劈开了，眼珠突出，脑浆流了一地，快要断气了。我说：“华飞，我不能顾你了。我要看綬卿去。”说完便向站长室飞跑。我穿过外面的一条过道，刚到綬卿的臥室門口，被一个什么东西絆了一下，定神一看，正是吳綬卿！他穿着第一次和我見面时穿的那件軍大衣，胸前閃爍着一顆双龙宝星。我一惊，伏下身去大叫：“綬卿，綬卿！”再摸他的双手，冷冰冰的全是血污，头已經沒有了。我猛然跳起，向着倉庫跑去，我記得那里有一連守軍。我哭着喊着：“快來人呀，統制被人刺死了！赶快跟我去报仇呀！”跑到倉庫，听队伍中有几个人叫道：“这傢伙乱喊些什么，杀了他！”我見勢不妙，急忙回头，向着郊外晉軍宿地奔去。那时我方寸已乱，一路上多少次跌倒了又爬起来，哪里还感到疼痛。我一口气跑到晉軍宿营地，一看，完了！营帳虽在，但空无一兵。我找了許久，才找到三个兵。他們告訴我，晉軍因來的人少，不知我方虛實，听見槍响，怕生变故，祖營長帶着队伍回娘子关了。一个兵問我：“大人怎么这样慌张？”我哭道：“吳統制被人害死啦！”几个兵都很激动，說：“我們替他报仇。这儿有馬，請大人騎上，我們去把队伍追回来。”我騎上馬，几个兵隨在后面，飞驰向前。不多久，我追上了队伍，找到祖營長說：“吳統制被刺了，我們要馬上回去給他报仇。”我已經忘了他們是山西的队伍，而且只有一营人，石家庄却有整整一旅人。祖營長立即答应跟我回去，我便策馬先行。天微明的时候，到了石家庄。回头一看，只剩下和我去追队伍的三个士兵了。一瞬間，千百种思念涌上心头。从出发以来，多少希望，多少計劃和努力，眼看着胜利在望，如今却落得“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了。

一个兵把我扶下馬來，脱下他身上的大衣披在我的肩上。我

猛然感到难忍的饥渴与疲倦。喉嚨喊哑了，唇也咬破了，血順着嘴角流下来。士兵送过来酒和食物，又对我說：“大人請放心，我們跟着你，保护你。”我吃了一點东西，心神慢慢安定下来，对士兵說：“你們到石家莊車站上去看看动静。”一个兵說：“我一个人去就行了，你們两个保护大人吧。”他去了一会儿，跟着一个軍官回来了。那个軍官的肩章、領章都已取掉，臂上纏着白布，走到我面前說：“我們已經起义了！”我一看是齐燮元（他当时是上尉副官）。他說：“我們預备好了，請你訓話。”我蹙蹙蹙蹙地跟着他走去，見前面立着不到一連人，都纏着白布。齐燮元对他們說：“吳統制故去了，何步蟾就是我們的領袖，請他給我們講話。”我講道：“兄弟們，我們不能因眼前的失敗而灰心。要再接再厲，为吳統制报仇。我們現在并不孤單。張統制和藍協統的队伍駐在灤州附近，已經有電報來了。山西的队伍跟着就都要开来的。石家莊的形勢重要，不能輕易放棄。”正說着，吳鴻昌來了，对我說：“你太辛苦了，現在一切都好商量。大家全跟着你，你是首腦，請到站上去吧，大家等着你了。”我跟着吳鴻昌走进站長室。馬意田、夏文榮、吳云章、苗得林等（以后知道刺吳即是这四个人）都在座。我說：“山西的队伍已經开来了，吳統制不能白死，我們要繼承他的遺志。山西队伍到后，再联合張、藍的队伍直搗北京，把滿清的統治推翻，光復就在眼前。統制虽然死了，在座的各位能繼承他的志向，就都是吳統制了。”这时，有一个軍官立在我的身后，我認得是保定的閻學倪德麟。他是前两天才到石家莊的，是一个同盟会的革命志士。他喊一声“报告”，对我說：“山西队伍答应尽量开来，閻都督亲自換的電話，我命令火車全部开去迎接了。”說完立在我的身后。我问吳鴻昌：“你們知道統制是誰杀的？”他們都說不知道。突然一个兵押着另一个兵

进来，交上一把带血的刺刀。我见刀上血迹犹新，怒不可遏，立即命令把他枪毙。吴鸿昌怕事机洩露，连忙说：“先送到军法处，詳細地审問。”吴鸿昌等见害我不得手，便说：“队伍总得布置布置，以备不虞，請你下命令吧。”我拿起笔来写了命令。吴说：“你太累了，休息一下，我們照办。”我已經支持不住，眼睛一闭，便沉沉睡去。不知过了多久，睜眼一看，只有倪德勳还站在我的面前，已經时过正午了。我問：“吳統領呢？”他說：“布置队伍去了。”我們走到外面，发现人都沒有了，电话綫也被剪断。我們四处查看，又向車站上的铁路工人打听，才知道禁卫軍的一团旗兵聞說我們起义，吓得大哭，往北面潰逃，武器、輜重扔了一地；吳鴻昌的队伍則往南逃到灤城去了。这时，山西的队伍陸續开进了車站，首領是仇亮。我問他：“帶了多少人來？”他說：“很多很多，后面队伍还在運哩！現在最重要的是推出一个人來繼承吳統制的职务，便于軍事行动。”他向着帶來的士兵們說：“吳統制为革命犧牲了，大家都很哀痛。但革命还要繼續下去，我們还要有領導，何先生是吳統制的心腹，和我們联系已經很久了，是否我們就請何先生接替吳統制担任燕軍大都督？”士兵們大呼一声“是”。仇亮对我說：“請你講話吧。”我也并不推辭，向士兵們講道：“革命是一定要流血的，吳統制先走了一步。我們要踏着他的血迹前進。現在形勢對我們是有利的，我們在吳統制的桌上找到两份电报，让我唸給你們听。一份是灤州二十鎮張統制和混成協藍協統拍來的，电文說：‘本軍已鑿裝待发，請与山西軍前來会師。’另一份电报是吳統制发出的回电，电文是：‘愿率燕晉子弟一万八千人以从。’兄弟們，听明白了嗎？”全軍高呼：“明白了。”我說：“好了，大家不必担忧，滿清王朝的末日就在眼前了。”

山西兵到得并不多，我們怕吳鴻昌等反扑，把石家庄通北京和

汉口两端的路軌都破坏了一段。第二天，和仇亮一商量，觉得石家庄不易守，决定撤到山西去，首先把一切可用的物资运走。可是仓库中儲存的东西极多，怎么能在短时期中运走呢？我們找到了获鹿站长陈永庆，他說有办法，可以找工人出来，仓库米很多，只要规定每开一列車皮发两包米，工人们就会来了。我們同意这个办法，并且答应，凡是来做工的，每人都发一包米。于是人愈来愈多，車站的电灯亮了，脚行也来了。所有仓库里的物资，一列車一列車地运往娘子关，在两天中便全部运完了。再由娘子关轉运太原，太原車站上物资堆积如山，单只現銀一項就有三十多万两。

我亲自把吳祿貞和张世膺的尸体送到娘子关埋葬。副官长周維楨与吳、张同时被害，但第二天才找到他的尸体，只得就地埋了。后来山西人为了纪念吳祿貞的功勳，在石家庄为他修筑了一座坟墓。关于吳祿貞的被刺，有說是清廷的主使，也有說是袁世凱的主謀。我想，吳祿貞的存在，不仅对清廷京师是严重的威胁，对袁世凱的阴謀也是极大的障碍，因为吳在北方軍人中素負声望，是能够和袁世凱抗衡的矫矫者。过了許多年以后，当一九二四年国民軍占領北京的时候，段祺瑞又被捧了出来。有一次我和段的长子宏业閑談。他大大地称赞馬蓮田，說：“馬蓮田是英雄，够朋友，他的行动省了不少不少的事。”这話可以作为一个线索。据說，袁世凱是通过段祺瑞来策划这一阴謀的。袁世凱杀了吳祿貞，也就破坏了北方軍人統一起义的計劃，使他的野心可以更順利地实现了。

我和仇亮、倪德勳等到了太原，閻錫山亲自来接，說了一大堆恭維感謝的話。他把我們請到督署，私下对我說：“如今燕晉联軍仍然存在，我比你年长几岁，也不客气，我就担任联軍的大都督，你屈任联軍副都督吧。”我当然无所謂，只希望他到娘子关去看一看

吳祿貞、張世膺等的遺體，因此又和他回到娘子關。這時，張錫鑾同第三鎮已經進抵石家莊了。閻錫山很驚慌，說：“我們還是先回太原籌劃籌劃再來吧，千萬不可冒失。”忽然前面報稱：第三鎮有一營炮兵起義，火車向這邊開來，車頭上站着一個軍官，自稱叫劉廷森，說是找何遂的。劉廷森是我陸大同期的同學，也是七十二個盟兄弟中的一員。我趕忙去迎接他，走到前哨，只見他一個人過來了，一邊罵道：“車一停，這些兵全都散了，現在軍心動亂，誰也管不住了。”於是劉廷森隨我們一同回到了太原。

山西新軍是第二十混成協，山西起義是由這一協完成的。都督閻錫山本來是山西混成協的一個標統。光復後的軍務部部長黃國樞原來也是一個標統。起義時，由副兵楊錫甫帶隊沖入撫台衙門，打死了巡撫陸鍾琦，各縣均傳檄而定。但山西北面雁門以外的地區，尚不在閻錫山的控制之下。所以閻錫山請孔庚為朔方招討使，帶一團兵駐大同，又請我募兵。我建議募一團敢死軍，排長稱連長，營長稱團長，團長就稱司令，並請楊錫甫當司令，我自願做他的參謀長。閻錫山說：“你太客氣了，你是副都督，怎麼好委屈你當參謀官哩！”我說：“還是務實莫務名吧。”他笑道：“那就叫楊錫甫給你下命令啦。”募兵的地方在山西大學堂，楊錫甫始終未來，我就在這里訓練了一團人。閻錫山想建立他的子弟兵，招來的學員大多是他五台的同鄉。我除了講授一般教練、行軍、戰鬥等基本軍事課外，着重地進行了精神教育，內容無非是闡說清朝統治的殘暴昏庸和喪權辱國。我寫了許多軍歌，教給士兵們唱，其中一首是：

泱泱大國風，三晉中原雄，龍蛇起陸開運勁。練我體力強，壯我神明種。氣吞滿虜人人勇。東下石家莊，北定順天府，胡兒出走還我中原土。仇袍與子同，糾糾干城用。軍歌饒吹飲

黄龙。

十月中旬，张錫鑾和曹錕的队伍就从石家庄向娘子关推进了。閻錫山命刘廷森做前敌总指挥，并亲到娘子关督师。我接到增援的命令，也带着一营人（号称一团）到了娘子关。閻錫山对我说：“有一件事要拜託。”我问什么事。他说：“我们防守的是正面，侧面是芦凹口，有敌人活动。你去打退他们，然后偷袭他们的后方。从平山县到滹沱河大桥，把桥炸毁，这样，敌人的主力就不战自溃了。”我说：“请下令吧。”他发了命令，又说：“守芦凹口的就是到石家庄去过的祖营长，他的队伍由你指挥。”天微亮，我率队出发了，自己骑马走在前面，让团长殿后。队伍愈走愈长，步兵渐渐成了骑兵。原来，一路上兵士们弄了许多老百姓的牲口骑上，牲口的主人也就跟上了。不过三、四十里地，拖拖拉拉地走了一天，太阳落坡的时候才到芦凹口。祖营长接我到指挥部，和閻錫山通了电话。閻说：“前面紧得很，最好今晚去夜袭。”可是我和祖营长商量，他说：“我的队伍没有经过训练，是不能夜袭的。”我们的队伍，也只有一个月的训练，我又考虑到白天行军的情形，也很担心。最后决定组成敢死队，命令下达后，有六十多人报名。那天是十月十七日，黄澄澄的月亮又大又圆，照得山沟里亮堂堂的。我在队伍前面派了侦察，自己压住后面。十一点钟左右，到了桃林坪，侦察报道，前面有敌情。我跑到前面命令队伍：“不准放枪，跟我前进。”话犹未了，砰砰两声枪响，子弹从我耳边飞过。有人大叫：“不能打，不能打，敌人站在前面呀！”我回头喊一声：“冲呀！”六十多人一拥向前，冲到村子里，敌人已经跑了，衣服、枪支、望远镜等抛了一地。我说：“我们要继续追击。”有人在暗影里嚷道：“不行！我们要睡觉了。”营长也劝我休息。我一坐下，兵士们也都睡了。我命令营长守在桃林坪，自己骑

馬回到了芦凹口。

第二天一清早，我就被房外一陣哄鬧聲吵醒了。起身一問，才知道正面戰綫失利，娘子關可能丟了，電訊也斷了。祖營長對我說：“兩面都是敵人，軍心動亂，怎麼辦？”我命令集合，兩營的人站得非常整齊。我說：“敵人不可怕，他們有槍，我們也有槍。現在我們還摸不清前面的實在情形，應該立刻增援娘子關。”說完率軍出發。走了不多遠，一個老百姓送來了一張紙條，上面寫着：“正面已全綫撤退，娘子關不保，請自擇出路。”署名是“劉廷森”。我忙問祖營長：“這裡到後方還有什麼路可走？”祖營長說：“有一條小路，越太行山，過孟縣可到五台。我們隊伍里五台人最多，走這條路可靠。”我同意了。於是隊伍上了太行山，在崎嶇陡峭的山路上走了一天，傍晚到了孟縣。我下令宿營。半夜，忽聽外面人喊馬嘶，有人報稱敵人來了。我急忙起來集合，但是已經控制不住，士兵們大部分都散光了。我也只好追上去，一路風聲鶴唳，狼狽不堪地退到了五台。

我們在五台山下的台懷鎮落了腳。兵士們回到家鄉，多已走散。原駐在五台的一個營長楊橫緒送來一份清廷的招降電報，大意說：“革匪”已被打散了，所有地方的駐軍要好好維持秩序，通知他們來收編。我說：“我剩了一個人怎麼辦？”他說：“我也只剩幾個人了，管他的，來了就拼一場。”他走後，有兩個朋友來找我，一個叫胡亮天，一個叫張紹丰。他們說：“何先生，我們山西人對不起你，我們兩人死活都是要跟着你的。”我問他們外面有什麼消息。他們說，傳聞南北已經停火議和了。又問他們閩都督有沒有消息。胡亮天脫口罵道：“那個灰孫子不知跑到哪裡去了。”我說：“革命一定會成功，我們最好到南邊去，那裏有我許多朋友，可是我一個錢都

沒有了。”他們說：“我們有錢。”這可算得是雪中送炭，使我非常感動。我又問怎么走，胡亮天說：“路上都是旗兵。我們最好是化裝成和尚，行動就方便了。”於是三個人上了五台山，在南山寺住持僧光大的幫助下，戴上了風帽，穿上了僧衣，扮作云遊的僧人，再一次越過太行山。路過保定期遶了孫岳一路，幾個人歷盡千辛萬苦，九死一生，終於到了當時江南的革命中心地南京。

(五)

我們到南京的時候，許多老朋友都已在那裏了。我打了一個報告給陸軍部，敘述了石家莊與山西事變的經過。王孝縝聽說我來了，立刻來訪，一見面就說：“你來得太好啦，我們都當你早成了鬼了。現在這裏全是自己人。仇亮是陸軍部軍務司司長。還有元白（陳裕時）、鵬生（耿毅）、崑濤（劉建濤）都在這裏。”從王孝縝的口中，我們知道了許多南邊起義時的情形。王孝縝又說：“克敏知道你們來了，很高興。請你們去見見他。”於是我和孫岳去拜會了黃興。

黃興住在鐵湯池，見了面很親熱，慰勉了一番。他說：“南京現在軍隊散漫得很，要力求整頓統一，還得依靠你們這一批人。這裏的人都認識你們。你們來得正是時候。”他仔細地問了我關於吳謙貞被刺的情形，深表惋惜。他又問閻錫山是怎樣的人。我說：“他只知道一跑了事，險些把我害死。”他說：“閻錫山已經回到忻州了，袁世凱在談判中想把陝西、山西撤開，不算是革命的省份。閻錫山沒有什麼力量，袁世凱的兵要是真打進去就完了。經過我們和袁力爭，現在大概沒有問題了，閻錫山可以復任山西都督了。”過了幾天，王孝縝來說：“徐寶山割據揚州，蔣雁行占住江北，不知道他們

幹些什麼。想請你和禹行(孫岳)走一趟,看看他們的動靜。”於是
由陸軍部委我為揚州軍總參謀,孫岳為江北軍總參謀,分道上任去
了。

我到揚州,徐寶山的參謀總長華彥雲來接。徐寶山是江南有
名的鹽梟,人稱“徐老虎”,這時自封為揚州軍司令,霸住這一塊地
盤,收的稅不往上繳,却還伸手向南京要錢。揚州沒有經略動亂,
市面上熙熙攘攘,商業仍很繁榮,只是滿街上走着象叫花子一樣的
兵。徐寶山請我坐在大煙燈旁和他談話,把他闖蕩江湖的歷史吹了
一陣。我問他有多少隊伍,他說:“你要多少,我就有多少”,又指着
面前摸的兩把手槍說:“我是彈無虛發的,這幾年的虛名不是容易
爭來的呵。黃大元帥的威名震于四海,眾望所歸。只要他肯用我,
給我發餉,我們是拼又氣的,肯拼命的。”他請我吃酒,抽鴉片,還把
他的一支手槍送給我,表示愿意結交。晚上,我住在舊鹽運使衙門,
見一個穿得破破爛爛的人站在房門口。我問他是幹什麼的。他
說:“是大人的衛兵。”我說:“天這麼冷了,你怎麼還穿得這樣單
薄?”他說:“寒衣還沒有發哩!這裡的錢多得很,可是用在我們身
上的很少。”我問他隊伍上有多少槍,他說:“槍很少,許多兵是沒有
槍的。”在南京的時候,黃興的秘書長林長民就對我說過:“外面亂
兵爛將太多,鬧得一塌糊塗。”看看揚州,情形更壞。當時各地都拼
命委官,招上幾個人就掛起一快某某師、某某軍的招牌,向上面催
要餉,飽了私囊,結果甚至弄得官多於兵,兵多於槍。我想到這
些情形,實在忍不住心頭的煩悶。在揚州住了幾天,孫岳派人來告
訴我:江北軍隊的名目很多,有護軍、揚軍、淮軍、鎮軍等等,現在舉
他做總司令,稱淮揚聯軍總司令。他請我到南京把這事向政府通
過一下。因此我又回到南京,找到仇亮,把孫岳的事告訴他。仇亮

笑道：“这个容易，我提笔一写就是一个什么长。”我说：“你这样不行呀，外面官多于兵，将来怎么打仗？”又把见到的情形说了。他说：“知道，知道。可有啥法子呢？禹行这件事总得办吧”，说着就拿起笔来写道：“特任孙岳为淮扬联军总司令，何遂为淮扬联军总参谋兼江北兵站分局长”。他说要待一两天，因为委任状要经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签署。我又把扬州的情形向黄克强作了报告。他说：“你们要好好地联络一些人，现在外面的耳目就靠你们了。”我带着两颗官印，又到了扬州。徐宝山大为高兴，对我说：“你办兵站太好了，我放心极了。你不要到别处去，就住在扬州。我现在送你三万块钱，以后每月三万。你领了款就交给我，其余的事你不用管啦。”我听了虽然生气，也无可奈何，只得说：“我不只管你扬州一军，我要各处看看情况再说。”一面差人把官印送给了孙岳。

这一个时期，中国的政治局势是极复杂的。我得到消息说袁世凯做了大总统的消息后，打了一个电报给孙岳，就找不到他那里去了。和平既然实现，兵站应该取消，我就回到了南京。这一天，孙岳也来了。王孝祺问我们怎么突然回来了。我说：“不打仗了，还要兵站做什么？”他说：“你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现在北京兵变，袁世凯不肯南下就职，事情又复杂了。”我说：“有事情咱们就干，我是不知道什么叫做‘怕’的。”他说：“黄兴要你和禹行到北边去一趟，看看情况究竟如何，立刻报告我们。”于是我和孙岳当了“调查京、津、保兵变特派员”，坐船赶往天津，又转北京和保定。我们看到天津、北京许多地方被烧得一片瓦砾，保定的火还没有熄灭，店铺都关了门，街上冷冷落落，许多乱兵游来荡去，情况非常混乱。在北京见到刘汝贤，他说：“这几天，变兵到处抢掠，袁世凯自己也管不住了。”我们急忙密电南京，希望南方军队从山东、京汉线

与海路同时进攻，乘北京混乱的时候，一举可定大局。可是南方的妥协势力占了上风，我们许久不见回音，只得悻悻然又回到南京。

这次北行中的一个有趣的插曲，是在保定车站上碰见了汪精卫。他是到石家庄去吊唁吴禄贞的。他殷殷地问着吴禄贞死时的情况，还唏嘘地落下了几滴眼泪。刘汝贤事后对我说：“当汪精卫获释，狱卒为他开脚镣的时候，他吓得晕过去了，还以为要杀他哩！”又说：“汪精卫是袁世凯保出来的，这次南北议和，他多方为袁奔走，卖了不少力气。”汪精卫这个民族败类，早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就显露了他醜恶的嘴脸！

回南京后，立刻感到一片妥协气氛。陈裕时、黄悦元、王孝縉等许多拥有实力的人都嚷着：“让袁世凯做一做看吧！”我把北方混乱的情形告诉他们。王孝縉说：“不要讲啦，现在大家都愿意让袁世凯做一做。”我说：“怎么能让袁世凯做呢？”他说：“难道让孙先生做？袁令不出南京，甚至出不了总统府。何况三路进兵也得有力量呀！现在官多子兵，那一个肯去打仗？还是少说眼吧！”

袁世凯继任总统以后，政治局面又起了一阵混乱。宋教仁等为争取未来国会选举的胜利，在八月下旬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改组为党，简直是拿着本子乱填，谁要进党都可以登记，大批因势逐利的投机分子都混了进去。我和刘建藩等都没有参加，尽管别人怎么劝也不参加。我说：“现在还搞新八旗呀！你们懂什么？政治上有何真知灼见，能把中国治好？既然不行，咱们练兵好啦。政治腐败了，我们就再打。”当时只是对革命后的现实不满，自己也不懂政治，拿不出什么主张，只好天真地嚷着用练兵来解决问题了。

武昌起义后，许多省的军队都会师南京。江西有俞应麓的一旅；安徽有柏文蔚的一师；浙江有朱瑞的一师；广东有姚雨平的一

师；江苏有洪承点的一师、冷遹的一师、陈懋修的一师；还有广西赵恆惕的十六旅和陈裕时的十五旅及第九混成旅。另外挂块招牌的军队很多。二次革命前属留守府统率的号称十七个师，但是军令并不统一，许多军队黄兴是指挥不了的。有一次，王孝缜对我说：“浙江方面骂黄兴骂得厉害，你是否和戴之（吕公望）商量商量，不要再反对黄兴啦。”我因此问吕公望，为什么总是反对黄兴。他说：“他不公平嘛，陆军部都歧视我们。一句话，给朱瑞一个军长，就不再反对黄兴了。”我转达了这个意思，后来朱瑞果然当上了第六军军长。因为陶成章被陈其美刺杀的缘故，浙江方面的人对孙、黄是不满的。朱瑞不参加国民党，大概和这事有些关系。黄兴也感觉到留守府力量散漫，打算作一番整顿，所以想组织一支中心队伍，这就产生了第八师。所谓第八师，主要是以广西的两支人马为基干。赵恆惕原为北伐第三军总指挥，改任第八师第十六旅旅长；陈裕时原为第三军参谋长，改任第十五旅旅长兼混成第九旅旅长。二十九团团长是黄愷元，三十团团长是王孝缜，骑兵团团长是刘建藩，我任三十二团团长。师长陈之骥（同盟会员，士官学生，馮国璋女婿）不过是顶个牌子，实权主要掌握在陈裕时的手中。第八师的成立，员额虽尚待补充，然训练积极，成绩甚好，因此增强了留守府的势力，使它有了暂时的稳定，对南京及附近的治安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袁世凯登上大总统的座位后，就开始向南方伸张他的势力。他唆使心腹爪牙陈宦与陈裕时进行勾搭（他们是湖北同乡）。经过陈裕时的中间活动，黄兴也继孙中山先生之后，到北京去和袁世凯面商国事。袁世凯表面上对孙、黄推崇备至，暗中却到处派人收集孙、黄的所谓“隐私”，编成许多小册子分发各军，诬蔑黄兴“与嫖妇

耕居”，孙中山“在海外到处騙錢”等等，以破坏孙、黄的声誉。另一方面他又派人直接打入南方军队内部进行拉拢、收买和分化。留守府成立后，改孙岳的淮扬联军总司令为第十九师师长。袁世凯直接下了一纸命令，以原在江北多年的刘之絮代替孙岳的职务。孙岳是从北方来的，在江北的根底不深，因此不能立足，跑回南京来了。有人嚷着说：“袁世凯得寸进尺，挤到我们身边来啦！”妥协派说：“这是孙岳想作官，造的谣言。”孙岳一怒，便跑到江西找李烈鈞去了。胡万泰是安徽都督柏文蔚手下的一个师长，袁世凯请他到北京去，送他一柄五头狮子军刀，对他说：“烈武（柏文蔚）一有差错，你就是安徽的都督。”胡万泰后来果然就做了叛徒。袁世凯对第八师也不放松。他叫人来谈，第八师与其他师不同，所有的团长都补少将，发给三等文虎勋章。但我们没有理他。

第八师成立了，可是广西出来的队伍不多，我那一团只分到一千来人。按照新的规定，每连是二百多人，一团应该有步兵十二连，另机关枪一连，共两千六百多人。因兵额不足，黄兴派刘建藩和我到湖南去招兵。我们到了湖南，谭延闿问：“不是到处叫我兵吗？你们怎么反招兵呢？”我们说：“克强叫我们来的，第八师是基幹队伍，所以要加强。”他问要多少人，我们说要三千。他给办了。我们刚刚把三千湖南兵运回南京，又有一批从西藏遣散回来的队伍，约有一营人，我们也全部收下。这样一来，引起了其他一些军队的极大不满，纷纷向我攻击，说我擅自招兵，闹得很厉害。黄兴无法，只得下令把我撤差了。王孝祺是一个火性子人，为这件事在留守府的参谋部大闹一番。结果是我到杭州去玩了一个星期，回来当了第八师的代理参谋长，但仍兼第三十二团团长。

袁世凯摸清了南方的情况后，就进一步向第八师开刀。谭延

閩因湖南境內亂兵爛將很多，糧餉困難，愿意裁兵。于是袁命第八師派了一團人，由王芝祥、趙恆惕帶着到湖南去了。這樣，第八師既被分裂，又作了惡人。袁世凱一箭雙雕，十分得意。最後，留守府亦被迫撤銷，南方的軍隊就直接屬北京袁氏政府統轄了。

辛亥革命那年，我才二十四歲，少年氣盛，看不起人，革命形勢一旦緩和下來，不免和同伴們發生一些糾葛。再加上我對現實很為不滿，對國家前途感到渺茫，乃決定離開第八師，去日本學習政治經濟。我正在上海準備動身的時候，袁世凱主謀刺殺宋教仁的案件發生了。孫中山先生由日本趕回上海，在他的領導下，第二次革命（即癸丑討袁）開始了。

一天，黃興通知我開重要會議。我去了，見會場里擠滿了人，情緒都很激昂憤慨。孫中山先生作了演講，大意是說：袁世凱排除異己，是殺害宋教仁的主犯，非用武力討伐不可。會議討論得很熱烈，也有主張用法律解決的。最後決定，儘快宣布袁世凱的罪狀，正式號召國人和國民黨人起來倒袁。散會後，黃興對我說：“請你沿江一帶去聯絡聯絡，主要是到柏文蔚和李烈鈞處，看看他們準備得如何。”

第二天，我動身到安慶，見到了柏文蔚。他抱怨着說：“我坐在都督、民政長的位子上，一點辦法都沒有，急得渾身是汗。”我說：“你應該找一些好的幕僚，用不着凡事都自己動手的。”我又告訴他上海的情形，說明我的來意是了解他的情況，真打起來能出多少兵，地方上情況如何。柏文蔚說：“袁世凱的心思很明顯。我還能不抵抗，讓他打嗎？我在徐州附近還有些隊伍，總能出兩師人，反正有多少兵都豁着干吧。至於內部情況，那是一團糟。安徽素來不好治，到我手裡就更沒有辦法啦。”我問他部下中是否有袁世凱

的内线。他说：“可能有，袁派人来我也不得不招待。不过部下都跟我多年了，如果形势好，还不至于出什么乱子。”我问：“如果形势不好呢？”他苦笑着说：“那就难讲了。但我想对袁初步是可以一致的。你就把这些情形向上海方面谈一谈吧。”我说：“湖北黎元洪是不会反袁的，这回成败全靠你和协和(李烈钧)了。”他说：“你放心，我对你是说实话，对外面当然是说兵强将勇，不会示弱的。”我临走时又劝他找几个助手，“集策群力”好办事。据说后来他找了陈独秀和张鸿鼎。但搞了不久，倪嗣冲的军队就来了。胡万泰叛变，一个电话把柏文蔚赶走了。这是后话。

我从安庆又到九江，见到了代理镇守使耿毅。他发了许多议论，说：“辛亥之前，大家目的倒还明确，痛恨满清王朝的腐败卖国。虽说组织得不好，但总算还有个组织，而且哥老会等反满秘密结社遍于大江南北。所以武昌革命一起，居然成功了。但成功之后，原来的组织反而涣散了，大家又都不懂政治的门径，握住了权柄不知怎么运用。协和的手脚大，弄来了一堆男女老少，把个都督府搞得乌烟瘴气。可是袁世凯不糊涂，得寸进尺，如今终于点起战火来了。我这里是最前线，我这个九江镇守使怕是不好当的了。”我问他部下究竟有多少人。他说：“直属部队只有一旅人，打起来你们可得来人啊！协和是比较有手法的，可以筹出餉来。但国民党内部太涣散了，南边几省只怕乐观得有限。”我说：“总不能坐着挨打吧？”他笑道：“自己人说真话，打总是要打的。目前表面看来，长江以南还是我们的势力，长江以北尚有陕西和山西。问题是国民党已经不像过去的同盟会，投机的太多。军队也很复杂，许多将领都腐化了。上海那批人就是嘴里讲漂亮的话，讲完了逛窑子。孙先生和克强待在上海也指挥不了各省；你看，闹了这一阵，还是只

听雷响不见下雨。不信你回去看看，管保还是老样子，没有什么进展的。”他又叹息着说：“我们怎么会这样糊涂，把袁世凯捧出来做总统？黄兴居然想拉袁世凯来做国民党的党魁！我们简直把他的历史都忘干净了。话说得远些，袁世凯一个人还好对付，只怕他手下的这一批人今后才更不容易收拾哩。”今天看来，耿毅的这番话倒是颇有见地的。

归途上，我又到徐州会见了冷遹，他统率着第九师坐镇徐州。他说：“我这里是新线，敌人来了我就打。我的队伍虽不算强，对付张勋的辫子兵还是可以的。”又问我第八师是否会开来，我说：“当然会开来，养了那么久了，还能不用一用。”他带我察看了假想的前线阵地。徐州表面上很平静，火车仍旧畅通，只是市面上冷冷落落，乞丐满街走，显出一幅非常破败的景象，到处传来凄凉的声调。我问冷遹，徐州怎么弄成这种样子。他说：“淮河年年有灾，外加兵燹人祸，老百姓被逼流亡的或当土匪的很多。怎么能不破败呢？！”

我重回上海，在妓院里找到了陈裕时，告诉他安庆、九江的情况。他含糊糊地说：“这里天天开会，仍旧是那几句话。孙先生成天喊讨伐，也没个响劲，大概他想到日本去了。”我见这情形，很觉无聊。他说：“你还是回福建去看看老太太，我们有事再找你。”于是我回了福建老家。

六月中旬，袁世凯撤免了李烈钧、柏文蔚和胡汉民的江西、安徽和广东都督的职务，同时开始了军事行动。七月十二日，李烈钧在湖口发出了讨袁通电，黄兴也亲自到了南京，苏督程德全则被迫宣布独立，福建也接着宣布独立了。我接到上海方面的电报，因交通阻隔，两星期后才赶到上海，听说前面已经打响了。黄兴到南京后，把反对讨袁的第一师师长陈懋修枪毙了。又听说第八师已

有一团人开赴前线，是刘建藩带去的。头一仗就把张勋打得丢盔卸甲。我见上海混乱，海军的态度也很暧昧，便又急忙赶到南京。一去首先碰见了刘建藩。我惊问：“你不是在前面打了胜仗吗？怎么回来了？”他叹了口气说：“别提了，你听我慢慢说吧！”原来南京一独立，他就上了前线，第一仗把张勋打得大败。一直追过了山东界。全军正在兴高彩烈地庆功，士气非常旺盛的时候，江苏都督程德全偷偷地跑到上海，通电南京，要求取消独立。黄兴到南京后，一个钱也没有，前头后头又追着要餉。黄兴看看无法摆布，也甩手溜了。因此，南京又宣布取消独立，一个电报把刘建藩调了回来。目前，南京正处于混乱中。何海鸣受孙中山先生的委托，来南京坚持主张讨袁。一般下级官兵对这种妥协极为愤慨，酝酿着兵变。刘建藩说：“我们打了胜仗，本来可以继续前进，反而把我们召回，白白（陈榕时）在背后一定有鬼。馮国璋要来了，陈之曠是他的女婿，还能坚决抵抗吗？我看现在士兵们都愤愤不平，恐怕要出乱子。他们是压不下去的。”

第二天，军队闹得更厉害了。孙中山先生的委任状已经下来。当时孙先生是坚决主张讨袁，反对取消独立的，但他没有实力，因而向第八师下级军官活动。孙先生在这时是表现了他出众的革命魄力的。我去找王孝楨，他的样子很沮丧，说：“带兵是玩火，现在快要烧自己了。你是自己离开了第八师的，外面还以为你是被挤走的呢。广西的队伍和你很熟，感情很好，现在正好请你说说话。”我答应了。他又说：“情况很紧张，事不宜迟，今天晚上就请你和大家见面。讲完了，这个是非之地我们也不留你，你还是到日本去。”我问黄兴的近况，他说：“克强表现得太无能了。大家都看不上他啦。”当天晚上，他们请我吃饭，所有团长以上的军官都在座。饭

后,第八师全体連排級軍官都来了,約有二百多人,把厅堂挤得满满的。我讲了話,大意是:“我和大家相处很久了,从广西起就一直在一起拼死拼活,沒想到今天南京是如此黯淡。可是革命嘛,就要坚忍。別人做不到的时候我們要做到。我吃的苦不会比大家少。我們不應該为这一次的失利就灰心气馁。相反,我觉得今天的責任更重了。袁世凱比滿清的力量大得多,手段也更阴險毒辣。我們現在不能不忍耐,不能不團結,千万不可自己人杀自己人。一旦散了,就什么全都完了。上面有什么过错,大家要多多原諒。我从福建来是为的同你們一道好好打一仗的。昨天和刘团长談起,知道大家心里不平。我希望大家要忍耐,要冷靜。第八师是有名气的,千万不要搞散了,暫时的忍耐就是将来的成功。”我讲完这一番話,大家当时表示得还滿意。陈之騷、王孝楨、黃愷元等都来謝我,当晚送我上船。刘建藩悄悄对我說:“我也要回湖南了,本乡本土总有个出路。这一次出生入死,被他們搞成这个样子,我在这里实在待不下去了。”船到鎮江,忽然一个人慌慌张张地送給我一份电报,我一看是南京方面让我轉給陈裕时的,电文是:“元白:勿来。人心激动,集矢于兄,危險。”我到上海的第二天深夜,一陣急促的敲門声把我惊醒。开門一看,所有第八师的高級軍官都来了,神色狼狽。王孝楨連說:“完了,完了!”我急問:“怎么回事?”他說:“你走的第二天,二十九團兵变,团附李协卿去彈压,當場被刺刀刺死。第八师整个儿鬧起来了。我們听到报告,什么东西都沒带就逃上了船。船上沒有座席,一直站到上海。唉!完了,完了。”我問他們今后准备如何,他們都說:“只好同你一块到日本去啦!”

几天以后,經過日本人須藤軍医(他本是第八师軍医处长)的布置,我們一行人出发东渡了。当輪船緩緩地开出吳淞口外,我回

首遙望苦难深重的祖国，依然是风雨如晦。多少年来梦寐以求之的一次革命，就这样失败了。一刹那间，真是百感交集，心乱如麻。在这时，许多人灰心了，当然也有许多人并没有灰心。我也深感前途渺茫，一时还找不到一条救中国的道路。这种苦闷，正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所无法逃避的悲哀！

共进会从成立到武昌起义前夕的活动

李 白 貞

(一) 东京共进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东京共进会的成立

孙中山先生于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秋到日本东京創立同盟会后,各省留日学生由于爱国心切,听到倡議革命运动,莫不踊跃参加。

清廷在同盟会成立后,大为震惊,令駐日使館对中国留学生的行动严加注意;同时要求日本政府协助取締,和迅速驅逐孙中山出境。日本政府便突然办了丰盛的酒宴,为孙中山“餞行”,借以迫使他离日。孙中山处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不能再在日本居留下去,于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三月将同盟会会务交給黃兴、胡汉民等繼續进行,自己就到广州和南洋各地活动。

当时革命运动的开展,偏重在华南方面,对长江流域则未遑經營;并且是用和緩手段,希望侨胞捐納經費,維持会务,逐渐推动形势,穩步前进。因此,一般急进的覺人对于这种情况,頗有不甘忍耐下去之势。这样,在同盟会内部就无形中埋下了分立門戶的种子。自从孙中山先生离日以后,同盟会内緩进和急进两种主张的不同,很快呈現为組織上分化的趋势。士官学校中国留日学生李

书城、朱棣光、耿伯剑、张华甫、范植熙、何成濬、李烈钧、閻錫山、黄郛、张凤翼等十人組織“丈夫团”。又有同盟会庶务干事刘揆一等拟将同盟会本部改組，联合各省忠实同志先組織“联合会”，集中人力分途进行，但名称尚未决定。至一九〇七年三月，由刘揆一邀集各省同志开談話会，征求意见，当时一致贊同，公推云南呂志伊为临时主席，素有声望于会党的张伯群为副主席，約定五天后正式开会。及期，呂志伊忽躲避不到，到会的會員以呂失信，會議遂告流产，内中张伯群更是憤憤不平。在散会的归途中张与邓文暉、彭汉遺商量另行結合同志，別图进展，就于某日会于神田区四川舒祖助寓处。这天到会的有湖南焦达峯、陈作新，江西邓文暉，安徽方潜等數十人，都一致贊成采用“共进会”名义，建立革命机构，公推舒祖助、邓文暉两人起草宣言和章程。数天后，在清风亭开成立大会，凡是中国留日学生贊成这个組織的均可随时参加，参加的計有湖北刘公、居正、楊时杰、刘英、刘铁、宋鏡华、彭汉遺、袁麟閣、馮振寰、郑江灝、湯亚佛、李孟鴻、张次青、李国燾、张公道、許汉武、彭惠暉、王炳楚、向寿蔭、李寿泉、罗杰、董祖椿，四川吳永樞、吳文叔、何格垣、王正雅、张知竟、饒蓬仙、雷桂臣、熊克武、秦益生、貴晓輝、何其义、晏群五、陈宗棠、周滔寰、李香山、胡香白、刘錫华、李策安、余竟成、李肇甫、薛晉賢、唐敖、譚毅公、张治群、喻培伦、郑襄臣，湖南覃振、楊晉康、潘鼎新、鍾劍秋、黃小山，江西彭素民、黃格鷗、湯增璧、曾小岩、邹怀渊、卢式楷、文暉，浙江傅亦僧、陶成章、张恭、龔味蕓、金鼎、王軍，广东聂荆、熊越山、陈兆民、夏重民、孙光庭、黃霄九，广西譚麟黃、刘玉山、黃鎔、邓鶴華，云南王五、赵声、张大义、乔宜斋、楊鴻昌、杜恆甫，安徽孙作舟、方汉臣等共計百余人，公推张伯群为会长，其他职务，各推會員担任。

共进会的会址，先在居正、罗杰寓所，后又迁至青山区华萃学会。工作先从团结会党入手，再联合军学各界，以厚声势。会章宗旨一如同盟会，惟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

共进会的两个宣言

共进会成立时发表了两个宣言。白话宣言的原文如下：

“我们这个会，为什么叫共进会？——这共字是共同的意思。单就我们这个团体说，就是在会的人，个个都要同心合意，共做一个事业，不可一人别怀他样的异心；就本会以外说，凡是我們同样的，不论他叫什么会名，我們总要联合起来，结成一个大团体，共同去做事业。所以这共字，就是和我們全中国各种会一同去做的意思。至于这个进字，就是要增进我們会员的知識，把从前那些做偏了、做小了的事丢开，再寻一个正正大大的题目去做；我們知識，就是要认清这个题目，把题目认清了，就赶紧去做。但是要有进无退，而不許有一絲毫的懈怠心。那题目好比射箭的梁子，我們眼睛把梁子认准了，把我們的身子就当作一根箭，如飞一般，务要钉在那梁子上，若是稍有一点儿躲閃，就半路落将下来。所以我們起这个进字，前一层是进我們心中知識，后一层是进我們的身子去做那知識上认定的事，这是我們取共进二字的意思了。

“我們中国自从盘古以来，就是汉种人居住，汉种人做皇帝。到了明朝崇禎的时候，那东边的夷狄滿洲的滿种，忽然强起来，趁我們中国有难，就乘虚杀进来，把我們汉种人杀得尸骨堆山，血流成河，姦淫擄掠，无所不至，就是由那时，做了中国的皇帝，把杀不完的汉人，当作他們的奴隶，隨便虐待。——若是守我們的本会正大宗旨去驅逐滿人，世界上就称我們为革命的英雄。

“有些人說：这人虽是韃子，但他已經在中国做了二百多年的皇帝，只要相安无事，又何必定要排他呢？这句话实在大錯，怎样說呢？滿人进关的时候，杀我們的祖宗，姦淫我們的祖姑，占了我們汉族的江山，把他那些賤种当作貴种，世代封王，又派一賊种分住各省要地，叫作駐防，防着我們汉族，好象防賊一般，这就是已經可惡了。他还要吃着穿着我們的哩。又放些貪官污吏替他来收糧征税，我們辛辛苦苦賺点儿錢，白白送給了他，还是不够，或者加一个罪名，还要断送我們的性命哩。这样看来，滿人到相安，可是汉人一日也不得安呵！况且他們到如今朝綱紊乱，只有奉承洋人，跟洋人作奴隶，拿我們給洋人做第三层奴隶；又把我們的土地，今天割一块来送这个，明天割一块来送那个，若百姓和洋人鬧起来，他不但不替百姓讲一句公道話，到[倒]要对洋人杀些百姓出气。动不动就要辦賠款多少；铁路也送給洋人，矿产也送給洋人，关税也送給洋人。你看近来各項东西都越送越貴，生活一天难似一天，不是一些财产都被洋人搬穷了嗎？这滿人，他只願請洋人来保护他做皇帝，那管得汉人的死活，只可怜我們汉人，白白替別人做世界，做也做不了啊！我們若不早点把这滿人打开，再过几年，就会把我們的中国和盘送給洋人，最后落到洋人手中，那洋人的手段，又狠又辣，我們受当得住么？还能够把中国拿回么？請看现在洋人对中国人就是这样利害，将来若让滿人把中国送給他，难道不把汉人斬尽杀絕嗎？

“所以我們革命，一来是要替祖宗报仇；二来是要早点預备，免得子孙絕种，这岂不是光明正大的道理嗎？

“我所以要劝告我們同胞同党，不可分門別戶。須要曉得我們是汉人，同是軒轅黃帝子孙，全中国四百兆人，都是同胞，好象一

个大家庭——所以我們才要这共进二字，增进我們哥弟知識，共拼死力，有进无退的去杀滿人驢子，取回中国，仍旧汉人作主，才算是英雄。

“还有一句要紧的話，我們革命，切記不可打教堂，杀外国人。本来这外国人到了中国，沒有好心，但是我們只要把滿人杀尽，把中国整頓好了，那时他也就敢不敢欺凌我們了！”

“革命本是英雄事業，應該要守着大家公訂定的公法，才算是英雄的本領。

“以上所宜說的这些話——就是要大家赶快去做，再等些时候，就恐怕来不及了。”

文言宣言原文如下：

“嗚呼！吾同胞苦于祖国淪亡，呻吟于异族专制之下，垂三百年矣。以四百兆黄帝子孙神明华胄之多，而屈辱于区区五百万腥膻之驢虏，其可恥可哀，为古今天下笑，孰有过于此者？凡有血气，皆当奋起，以雪累世深仇。此共进会今日成立之原因及其宗旨意义之所在也。

“共进会者，合各派共进于革命之途，以推翻滿清政权、光复旧物为目的，其事甚光荣，其功甚伟大，其責任甚艰巨也。吾同胞甘心恭順，愿臥仇賊作父，則亦已矣；若不然者，当应撫胸自問，犹有热血，則杀我祖宗者，即在眼前，当必憤火中烧，應該揮刀直前，以圖报复。昔时有齐桓公复百世之仇，宿恨方消；伍子胥鞭平王之骨，英雄吐气，吾同胞其念之哉！今日之事，無論男女老幼，不論士农工商，以迄江湖卖技之流，軍旅荷戈之士，皆宜負弩前驅，灭此朝食。太平天国討滿檄文有云：‘忍令上国衣冠，淪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何其壯也。功虽未竟，亦其杰矣。我共进会当

繼承其志，以竟其未竟之功，然后可以上對祖宗，下垂後人，以齒于圓顧方趾之儔，皇天后土，實鑑斯言，弟兄袍澤，有如此約。”

當時還規定了革命軍旗的式樣，用大紅色為底布，由中間輻射出來九個黑色銳角，每個銳角內外兩端，各有一黃色圓星，內外各九個共十八個，以表示十八省人民團結和鐵血的革命精神。辛亥年陽曆十月十日高高地升起在武昌蛇山、黃鶴樓前的就是這面旗子。此後湖北和全國各軍隊都用它來作軍旗，到西南護法戰爭以後，這面十八星的軍旗就被廢棄不用了。

共進會的擴大組織和準備開展國內活動

共進會於一九〇七年在日本東京正式成立後，規模日見擴大，原有會址感到不敷應用，不久，就在青山麻布區賃得一屋，名華羣合作會，為共進會本部會址。對內再擴大組織，對外則加緊聯絡，會員日有增加，進展的迅速一日千里，有超過同盟會的趨勢。這時黃興同志看到共進會的發展形勢，也在牛込區租賃一屋，組織了“勤學社”，內部由朱教仁、譚人鳳、劉揆一、吳壽天諸同志負責。所有同盟會一切事務都由勤學社來主持，向共進會猛進直追，形成了同盟會和共進會兩個革命團體的並肩競進。同盟會歷史悠久，資格較老，且有聲望極高的孫中山先生為總理，号召力強，又在南洋募得雄厚的經費，支持會務，種種優越條件，為共進會所望塵莫及。但是在共進會方面，黨員們都能埋頭苦干，自力更生，艱苦工作的精神實在同盟會會員之上，所以工作的進展能事事站在同盟會前頭。

共進會會長張伯群素抱急進主義，決定先行回國，試探國情民氣的動向，領導組織機構，發展國內革命力量。留在東京的共進會積極擴大組織，經大會通過，改推鄧文聲繼任會長，加推居正任參

謀，彭素民任文牒，何庆云任交通部长，潘鼎新任党务部长，孙武任参議部长，袁麟閣任理財部长，陈兆民任調查部长，温尔烈任糾察部长。内部組織分工既定，各有专責，积极进行革命事业。

又考虑到将来全国各省革命同时发动，也必须先期計劃組織领导机关負責人員，以免各树一帜，不相統一，力量分散，被敌人乘間各个击潰。于是推定聶荆为广东都督，刘玉山为广西都督，邓文暉为江西都督，焦达峯为湖南都督，刘公为湖北都督，何其义为四川都督，孙作舟为安徽都督，傅亦僧为江苏都督，罗洁为河南都督，准备将来回国，潜归各省組織軍众，建立领导机构，負責指揮革命活动，其他各省未定的，待日后补提。

共进会在邓文暉任第二屆会长期間，做出了不少重要的革命事业，后因麻布区的本部地点窄小，不敷应用，再迁到大森体育会，以便扩大活动。

(二) 湖北共进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湖北共进会的成立及其吸收会党組織五續軍隊

一九〇八年（光緒三十四年），东京共进会会长邓文暉因事回国，通过大会決議，公推刘公繼任第三屆会长。同年冬月，孙武、焦达峯、彭汉遺亦先后回国，根据东京共进会決議的革命运动方略和多头进展的方針，各归本省秘密活动。

孙武等到达汉口后，湖北的同志如邓玉麟、查光佛、黃申瀚、刘英、朱鏡华、袁菊山、郑江瀾、鍾雨亭、李白貞、刘燮卿、吳肖韓、汪性唐、刘玉堂等，集会欢迎，詳詢东京共进会組織和经过情况及現在进行活动的方針任务，都一致热心拥护，志愿坚持到底，不达目的不止。最后决定先行成立共进会湖北分会，以便号召，共策进行，

积极准备，筹划经费。这时同志们都以革命运动已经有了基础，精神愉快万分，分头联络长江南北会党，以充实革命力量。

同时在日本东京的陆军学会会员张肇飞、吴社贞、任本昭、蒋作宾、刘一清、黎本唐、石星川、姜明经、杜锡钧、夏占奎、王占海等人皆表同情于共进会，约定先后回国，协助进行。他们本来都是同盟会会员，希望湖北共进会早日成立，共襄大举。这时焦达峯以湖北方面已有头绪，就回到长沙进行组织湖南共进会，和湖北共进会互相策应，携手并进。

湖北共进会在未经正式成立以前，先建立下列四个通讯机关：（一）汉口河街新大方棧，派刘玉堂负责；（二）汉口一码头湖北日报馆，派郑江灏负责；（三）汉口汉兴里七十三号，由刘燮卿负责；（四）武昌磨子桥，由吴肖韩、潘善伯负责。

在外埠的又有下列四处：（一）上海公学曹忠恕同志；（二）岳州高等小学彭鑫同志；（三）长沙太平街同福公棧经理××；（四）宜昌潘毅陞同志家中。

又假汉口新大方棧，召集会员刘铁、邓玉麟、彭汉遣、江树之、谢石欽、丁立中、李白贞、潘行一、潘公复、黄申藩、郭撫宸、方建霖、刘明华、牛叔、涂耀枢、姜明经、黄元皓、叶于兰、李德安、周复生、吕惠霖、李复权、汪钰等会议，决议各自负责，分途联络群众，征求会员，为湖北共进会打好基础。

又派黄申藩、刘玉堂等吸收会党组织，秘密编成五镇军队，每镇以一副都督统率之。兹将副都督及驻扎地点列下：第一镇副都督袁菊山，驻扎襄、樊一带；第二镇副都督刘英，驻扎德安、安陆一带；第三镇副都督刘玉堂，驻扎汉口；第四镇副都督黄申藩，驻扎兴国、大冶一带；第五镇副都督刘汉一，驻黄州。以上五镇军队，内

部編制，由副督統各自處理，正督統一職由孫武擔任，總部設在漢口鴻順里三十四號，不過武器暫時不能完全配備，只好待將來陸續設法補充。

初期軍事暴動的失敗與五編的停止活動

一九〇九年（宣統元年）四月，清廷令端方由南京調往北京，傳聞將轉漢口乘車北上。同盟會會員曹忠恕、喻培倫、黃復生及女會員但懋辛、陳璧君等從上海來漢口，謀在途中暗殺。孫武以為得計，予以協助，並派女同志李復權、汪鈺共襄其事，令喻、黃兩同志預埋地雷於刘家廟車站附近，陳、李、汪三人各懷炸彈，在要路口守候，布置就緒，只等狡兔入網。不料端方早有戒備，臨時變更路線，改乘兵輪出海道北上，此計竟歸落空，曹、喻諸同志只好空手返回上海。從這一點可見當時清朝官員，已成驚弓之鳥了。

同年六月中旬，焦達峯來漢，住鴻順里孫武寓處，共商進行辦法，但苦於經費支絀，束手無策。這時適有焦達峯的同鄉布商周海珊、劉肯堂從澧陽販到夏布多件，孫武因需款緊急，採用從前在奉天假買洋參故事，和焦商盡量買其布，約一個月交款，由焦作保。時天氣已交新秋，夏布成為過時之貨，極難轉售，暫時質押錢三百五十串文，解決了燃眉之急。等到交款到期，不能應付，只好向布商說明內中實在情形。萬想不到周、劉兩布商十分同意革命，自願把全部布款捐獻作革命經費，並且請求加入共進會，擔任聯繫澧陽會黨工作，就同焦達峯同返湖南。

七月中旬，焦達峯電告孫武說明湖南第二、第三兩鎮副督統潘平界等部屬焦逸仙舉行暴動，為清朝官員擒殺，且將有株連的危險，囑早為防范。

不一月，刘英亦电孙武，报告所统的第二镇有部下龙世英、刘伯奇不受约束，擅自暴动，亦为清朝官方枪杀。又第四镇黄申藩派专人来报，管带柯玉山暴动失败，全镇已经解散。

又驻汉口的第三镇副督统刘玉堂密报：汉口巡警道探得孙武回汉，倡立共进会，联络会党，大举造反，已派军警侦探密布罗网，伺机捕捉。孙武以为此事只须提高警惕，严加防范，即可保持安全；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在各镇会党弟兄意气用事，不从命令，以致相残失败，长此以往，势必全部复没，急需改弦更张，别图良法；于是毅然下令五镇军队，立即停止活动，另候处理。

争取新军，以武汉为起义基地

湖北共进会在成立后短短的几个月中，确是做了不少工作，不过限于经费，不能大胆去干，尤其是武力方面，更感艰难。依靠会党组织可称已归失败，只有从运动新军入手，利用敌人的实力，转而为革命的劲旅，这样借矛夺盾的方法，确是上策。但是运动新军，专靠少数几个军官还无济于事，因为军队的基本力量在士兵，如能深入行伍，晓以大义，激发士兵的爱国思想，使其加入我革命团体，一旦革命爆发，胜利可以操券而待。并且军官都由上级派来，一般当兵的没有升任的希望，即使升迁，也只有极少数人，并且充其量至多到排长地位，绝大多数士兵，只能终身充当士兵，这种不满的思想，都已埋藏在每个士兵的脑海中间，如能利用这一情况，进行宣传，必定容易深入，收到极大效果。于是决定采用这道门路，直向步、马、砲、工、輜各标营士兵普遍深入宣传。因为新军大都集中在武昌，就在武昌黄土坡开设同兴酒楼，由邓玉麟担任经理，为吸收新军士兵加入革命团体的地下机构，每有一人参加入

党,就在流水簿上书名記收洋一元。这个办法,果然发生了极大的效果。

同时广东聶荊来电說:广西南宁刘玉山进行成績极好,請孙武約焦达峯往助。孙武当即电焦,焦辭不去,孙武就和潘公复及汪钰于九月十五日首途,十月初到达广东,面晤聶荊,决定以广西为发难起点,以新会党人占領三水作响应,并派温德臣、刘玉山到梧州联系。不料才到达南宁时,广西已全部失败,机构瓦解。因此广东方面,当然就不敢輕易发动。

这时,吳肖韓由汉口来到广东,知道两广已归失败,还是湖北較有把握,孙武就和吳肖韓及潘、汪两同志乘輪由上海轉回汉口。这时汉口巡警道被人彈劾去职,很鬼已除,更可放胆进行革命工作。

孙武自广东回汉以后,决定以武汉为革命发动基地,号召长江上下游南北同志密切联合,互相呼应。因为經濟困难,进展上不无阻碍,拟向南洋华侨筹募,由孙武先到上海联系。适上海公学曹忠恕行将回蜀,孙武就和他切实联系,約定将来不論誰先发难,都要迅速給予有力的响应。复到南京和胡朝生、苏良斌等联系,了解双方进展状况。又到江西与邓文暉、詹中汉等討論革命进行办法和如何互相配合。邓文暉表示对于湖北方面經濟問題,愿竭力帮助,孙武因此变更計劃,不去南洋,返回武汉,积极部署会务。他看到两广新敗,宁、贛进行都很迟緩,恐在短时期內难成大事,湖北再不自振作,爭取首先发难,这屢顛不復的清朝政府,将永无被推翻的一日了。就召集全体同志會議,決議加强以下各处总部联络机关,加紧联系,慎密通訊,使会务迅速进展:(一)汉口汉昌里一百四十四号刘燮卿,(二)汉口如寿里八十八号鍾雨亭,(三)汉口歆生路榮昌照相館李白貞,(四)汉口歆生路大成印刷公司丁笏堂,

(五)武昌黄土坡××号李新愚,(六)汉口萧家巷十一号吴肖韩、
(七)汉口河街新大方棧刘玉堂。

此外,更派人到长沙焦达峯处协助湖南发展工作,作为发难时的指臂之助。一面分函外地各同志,如岳洲潘平昇,宜昌潘毅陞,襄阳刘升,京山刘英,北京吳祿貞,奉天任本昭、周斌、张华飞、陈錦章、李德安,长春徐竹平、黎本唐,四川吳香地,重庆何超义諸同志,告以本着过去經驗,对于各会党只可采取联合,不可依为心腹,必須运用現代新軍堅訂盟約,加紧秘密編制,推举代表,互通声息,以形成牽一发而动全身的形势,一气串連,互起作用。結果,各处都贊同这样办。

湖北共进会自从改向新軍进行宣传,争取各营同志以来,会务的发展很象开了一条大路,前来加盟的絡繹不絕。这种新的情势,为将来起义深深地打下了穩固的基础。茲將拟定各軍指揮开列如下:第一軍李成模,第二軍江庆林,第三軍蕭国宝,第四軍高尙志,第五軍丁景梁,第六軍陈春芬(按以上六軍本拟編为正式軍隊,后来因为仓卒起事,不及实现)。

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二月,香港同盟会譚人凤来汉,由孙武陪同往武昌府監獄会晤胡瑛,討論革命发难地点。胡瑛說:根据中国大勢,湖北不能发难,因为受制太多,敌人調兵,朝发夕至,不能作持久抵抗。譚人凤也說:湖北四面受敌,不是首义之地,主张由广州开始发难;并說:現在已經布置妥善,将于四月初一日举义,希望湖北同志立予响应。

孙武独謂革命事业有时代不同,过去是运动士官时代,結果感到他們腐化消极,不足与謀;繼而是联合会党时代,又感到思想不純,桀驁不馴,不能用命;現在是运用新軍士兵时代,武昌是新軍集

中地点，自从发动以来成效显著，已经到了成熟时期，武昌已经打下了稳固的基础，所以不能不重视武昌。以兵力而论，将来发难，当然非从武昌入手不可。并且自从张之洞督鄂以来，在武汉建立了钢铁厂、兵工厂、火药厂、造币厂等等，已经几十年，很有成绩，武汉可称精饷足之区，武器的供应不用顾虑。所以就武器供应而论，将来发难，也以武汉为上。武汉是水陆交通中心，江南有湘、赣的呼应灵通、粮秣运输的便利；江北有武胜关险要可守，足以扼抗北来敌军；东南半壁，传檄可定。就地势而论，亦以武汉发难为当。此外瑞澂当道，主张铁路收归国有，间载译表里为奸，国人恨之入骨，反满情绪十分高涨，几乎人人欲得而甘心，我们革命，全省人民都可为我帮助。所以将来一旦发难，就民情而论，又以武汉为宜。兵力、武器、地势、人情，这四个优越条件，决不是濒海的广州所可比拟的。

孙武这番议论，使胡、谭无话可说，谭临行时留银百元付孙智作经费，并表示此后缓急还可竭诚相助。

湘鄂党人定约互应，湖北共进会确定各部分工

当时，湖南饥民的抢米风潮日益扩大，湖北革命党人跃跃欲试，密电石城邓玉麟、关中钱芸生和襄阳潘公复从速回汉，讨论紧急措施，并有新军各代表蔡济民、马骥云、张振武、王季立、徐万年、高向志、彭楚藩、陈炳藩、叶于兰、姜明经参加讨论。这时，焦达蒙、杨晋康、谢介僧、谭人凤等，也从湖南来汉，参加了这次会议，都以为革命高潮已经到了发动起义的边沿，应急速充分准备，以应形势发展。孙武说：今日这会首先要加订盟约，互相誓守。以战守而论，湘鄂唇齿相关，不论谁先发难，北军南下，必向武胜关进兵，朝发可

以夕至，我們如沒有聯盟約信守，各顧自己，是自取死亡。如长沙先發難，武汉立即响应；武汉先發難，长沙也要立即响应，不是这样，革命終久不会成功的。焦达峯也大声地說：如长沙先發難，武汉迟迟不应，那么十天以后，我就引兵先攻武汉。在座的湖北同志都齐声答应。从此两湖同志各遵守諾言，团结一致。焦达峯回长沙后，也依湖北共进会的办法积极争取新軍，策划革命。

湖北方面的起义已日益迫近，这时萧麦三、张伯祥、王飞等由四川来会，意在帮助武汉倡举义旗，大有箭在弦上之势。不过经济仍旧接济不上，連每次开会的茶水，也几至不能供应。除了叶于兰捐助二十元外，其他同志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他們并未向困难低头。他們把共进会内部工作，分配开来，使各守专責，筹划进行。

总务部	正部长孙武	副部长刘公			
内务部	正部长刘公	副部长居正			
参議部	正部长蔡济民	副部长楊玉如			
軍务部	正部长蔣翊武	副部长高尚志			
外交部	正部长譚人凤	副部长刘楚濂			
财政部	正部长张振武	副部长李春萱			
調查部	正部长邓玉麟	副部长彭楚藩			
交通部	正部长丁立中	副部长王炳楚			
总参議	鍾雨亭	李白貞	刘燮鼎	李新愚	张超楠
	徐建明	杜武庫	吳醒汉	陈鎮藩	吳楚誠
	彭寿松	黃中站	刘长庚	蕭国宝	王宪章
	王文錦	刘英	刘鉄	宋鎮华	王华国

	楊贊廷	李宝良	楊王鵬	錢芸生	徐万年
	胡玉斋	张斗枢	唐牺支	陈人杰	林 晓
	陈宏誥	徐移山	蔡大輔	黃元吉	陈 磊
秘書处	謝石欽	邢伯謙			
书 記	邢伯謙	費 渠	苏成章	袁汉南	罗秉襄
	黃久斌				
軍需处	梅宝瓊	赵学詩	赵学魁		
司令处	馬驥云	李賜生			
司 刑	潘公复	汪性唐			
司 助	牟鴻勛	鍾雨亭			

自从各部通过會議推定負責人以后,各負专責,直接进行办理,如有牽涉两部或两部以上的,由會議解决之。

各标营代表則分为标代表、营代表、总代表等,共进会开会时由总代表出席,听取报告決議各案,再密向营代表轉达,营代表再向連排密告,使全体皆知。各代表名列如下:

第二十九标代表	蔡济民	杜武庫	楊造青	夏一鳴
	馬驥云			
第一营代表	张喆夫			
第二营代表	吳学斌			
第三营代表	陈人杰			
第三十标代表	楊宏胜	周楚材	张富国	张廷輔
第一营代表	王宪章	謝涌泉	萧国宝	罗良騏
第二营代表	方殿甲			
第三营代表	周清林			
第三十一标代表	李紹白	吳之誠	陈鎮藩	汪亚兰

殷占魁 李建中
 第一营代表 周世忠 曾省三
 第二营代表 丁陞阶 黄元吉
 第三营代表 田智亮 李忠义
 第三十二标代表 李成模 陈子龙
 参議 刘雄亚 向海潜
 第一营代表 洪春廷 曾尙武 单道康 李华模
 第二营代表 白汉臣 朱黄强
 第三营代表 饒世友
 第四十一标代表 (两营出差) 邱世成
 参議 刘尧激 李忠义 丁錦良 唐軻支 李抱良
 楊王鵬 蔡大輔
 砲队第八标代表 陈天寅 孟华臣
 参議 徐万年 赵楚平 蔡汉卿
 第一营代表 吳楚蕪 陈国楨 黄鶴白
 第二营代表 蔡汉卿 陈子龙 饒升甫
 第三营代表 孟华臣
 馬队第十一营代表 江炳灵 陈孝芬
 馬队第八标代表 沙金海 张钰芳 彭超衡 赵楚屏
 工程第八营代表 徐兆宾 雷振声 熊秉坤 方兴 金兆龙
 罗炳順 馬 荣 吕中秋 徐少斌 程定国
 林振邦 任正亮 舒繼武
 混成协工輜砲总代表 饒芸生
 参議 胡玉斋
 輜重营代表 张五美 李鵬昇

宪兵营代表 彭楚藩

第四十二标代表 祝制六 刘化欧 王纘承 丘文彬 黄振中
林翼支 胡玉珍

測繪学堂代表 方 兴

參議 朱次章 李翊东

陸軍中学代表 吳国梁 謝 复 雷 洪 席正銘 王天培
邓汉群

陸軍特別学堂代表 李乃武 胡干城 向行謨 胡杰三（前
期毕业学生，散在各营）

工业学堂代表 陈 磊 赵学魁

各小团体代表 陈树声 赵学魁 謝石欽 費 榮

两湖师范代表 謝石欽 牟鴻助 邢伯謙 苏成章 陈鴻誥
梅宝瓊 蔡寄鷗 姜笛生

一九一〇年，刘公因病自日本回国，在襄阳家中养病，未和各方面联系。一九一一年五月，孙武等以湖北革命运动已进入高潮，惟經費极感困难，派潘公复到襄阳去迎刘公迅速来汉，主持大計，以利进行。潘即日首途，到刘公家中，报告湖北革命运动的情况和經濟問題，并代表孙武及全体同志欢迎刘到汉口負責主持。刘公就和潘公复同到武昌，住雄楚楼十号楊玉如家中。孙武即召集同志开会欢迎。首先由孙武报告革命运动經過和同志們在經濟严重压迫下始終不因困难而灰心，奔走活动一切尙称順利的情況；并說現在已到万事都备、只少东风的时候了，从前在东京时曾推刘公为湖北都督，眼前就要实现了。

刘公以旧病新愈，只作了简单的答謝。不及半月，刘公家中汇来了白銀五千两，是刘公的父亲令他替京捐納道台用的。事为楊

玉如聞知，密告孫武，孫武暫看動靜，如果他不肯捐給組織，再設法激勸他。彭楚藩听了，就想用劉公在日任共進會會長時所印的各種秘密文件來要挾劉公。他隨即向楊玉如把這些文件要來，以備應用。

在一個星期天的晚上，楚藩全副先兵服裝，拿着這些文件來訪劉公，正色對劉公說：“現在新軍中革命組織已經作好充分準備，行將發難，只苦於經濟困難，不能及時發動，聞君匯來白銀五千兩，北上捐官，想不是君的本意，如能把此款樂助為發動革命之用，其代價何止一個虛銜道台；否則我將持此証據告發，則君將捐得的紅頂，先要戴在我的頭上了。”

劉公拂袖而起，說：“我本不想做官，曾在會議上当眾說過，老弟怎麼這樣懷疑，還說這樣話呢？”就將銀票交楚藩帶交孫武，武即借諸同志向劉公道歉，請以革命為重，楚藩魯莽，幸勿介意。於是先向道勝銀行支洋五千元作革命運動經費，余數退給劉公。是晚，彭楚藩、孫武、鄧玉麟、李春萱、楊玉如等在劉公處密商發難計劃，都以為準備工作已經相當成熟，當以先下手為強；不過和文學社間是革命團體，尚有隔閡，急應先行消除，以歸統一。

（三）共進會與文學社的聯合行動

共進會與文學社商談合作的第一次會議

這時，武漢的革命槍口瞄准着清朝政府，時時可以發射；但是共進會和文學社這兩個革命團體却缺乏密切的配合，因而急需改變這種狀況。原來文學社的發展對象專在新軍，他們以為一旦舉義，就可拔趙旗而易漢旗，因此不樂於和外界合作。雙方為了都要完

成自己的任务，彼此难免发生些不愉快的事情。如馬队同志本已加入文学社，而在共进会开会时，他們又派章裕昆、黃維汉两人参加。楊玉如出志愿书二份請二人填写，黃維汉即握笔照填，章裕昆則不填而去。章归队后，还报告大众，指摘黃維汉单独填写共进会志愿书，破坏团体行动，逼得黃維汉写信給共进会取消所填志愿书。共进会会员陈孝芬因此和章裕昆反复辯难，后經刘尧激出面調停才止。一九一一年四月初，蔡济民、查光佛、梅宝瓊、牟鴻勛、陈磊等在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革命团体中間，积极往返奔走，多方斡旋，使得两个团体同意推举代表，互相协商。双方于五月二日（旧历四月四日）在长湖堤西街八号震霞初同志家中开会，初步交換意見，文学社派王守愚、刘尧激、蔡大輔出席，共进会推楊玉如、楊时杰、李春萱出席。先就武汉革命进行方策和利害，广泛会談，彼此目的无甚悬殊。談到两党合併問題时，因为初次接洽，都带几分客气。楊、李說：我們两个团体本来是异途同归，現在正是要同归的时候，不能再异途了，只要双方在原則上同意合作，一切問題都可以从长計議。刘、王等也說：我們两个团体都是以排除滿人为革命宗旨，本来是一致的，合則两美，离則两伤，譬如风雨同舟，大家都能和衷共济，就能达到目的地，而且我們个人并不爭权利和地位，只要目标既归一致，还有什么不可以商量呢？到了紧急时候，双方提出要做的事件，应当不分彼此，尽先去办。不过双方在征求各标营会员工作中，必須避免磨擦，万不可互爭党员，只要能够接受革命主义的同志，都是革命党员，不必分某社某会的畛域。

这次初步协商，双方所提意見，都能征得对方同意，可称圓滿。共进会代表还提出两个团体合併后的組織問題，但因为會議時間过长，問題过多，一时不能解决。并且两个团体各有历史，各有組

續，必須經過雙方醞釀一個時期，才能作進一步的討論。尤其是領袖人選，更不是輕易可以解決的，不能操之過急，所以要留在日后再談。

文學社和共進會的离合，關係革命前途的成敗，這種認識逐漸明確以後，兩個團體已經進到互助合作的新階段，并有再進一步從組織上合併的趨勢。這也是瑞澂等一班清朝官吏對革命黨人使用高壓威脅從反面所促成的，這兩個革命團體被逼得只有共患難、共生死、共抵抗，才能生存，完成這個艱巨的革命任務。

共進會與文學社的合併

七月二十二日，兩個革命團體舉行第二次會議，討論合併問題。雙方重要會員全都出席，公推劉公為臨時主席，蔡大輔為記錄。孫武首先發言說：湖北革命運動已有十餘年的歷史，在最近三、四年中完全由我們文學社和共進會兩個團體擔負起這個艱巨的任務，幸賴我們全體同志共同努力，互相諒解，進行出死入生的冒險的工作，才能獲得今日的成就。現在已經做到要攤牌的時候了，我們已由被動轉為主動，向敵人進攻了。兩月以來，在軍隊的同志屢次催促我們早日發動；我們因為湖北地處全國腹地，四面都有受敵人威脅的可能，發動革命說是生路，也可以成為死路，我們必須計出萬全，一旦起義，就只許成功，不許失敗，萬不可冒險作孤注一擲之計。現在所籌備的秘密工作，已經相當成熟，決定就要動手，只有兩個團體聯成一氣，集中力量，同向敵人進攻，才能得到勝利。如果甲方進攻，乙方袖手不動，乙方進攻，甲方觀望不前，這樣就不獨不能成功，必定同歸於盡。我們今日這個大會，希望兩個團體在勝敗存亡千鈞一髮的緊要關頭，在兩個團體的离合和利害間

題上，切实討論。

刘尧激說：尧卿兄所談一切，可称老到精細，本人极表同情。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工作和命运，本来是分不开的。我們向来是合作的，不过从前的合作是消极的合作，今后要积极的合作。現在革命形势，已如箭在弦上，有不得不发之势。本人建議，我們到了与清朝政府短兵相接、你死我活的时候，應該把文学社、共进会名义暂时擱置不用，大家都以革命党人的身份，和清朝政府拼个死活，事成則辦，事敗則烹，希望全体同志羣策羣力，挺险以赴，再不要存着門戶之見，多所顧慮了。

刘公接着发言：尧卿、尧激两同志的建議，本人极表同情。現在是我們和滿洲胡虏搏斗的时候，首先要把我們的战斗陣綫统一起来。我們都是湖北的革命党人，都是以一定要推倒清朝政府为目的，有敌就无我，有我就无敌。我們革命是整个的，以前所有某社某会名义，今天是总結束的时候了，可以說已經是成为历史上的名詞了，应一律不用，正可表示革命陣綫实在完全统一了，这点极为重要。本人更有建議，不但是团体界限化除，就是从前所預拟的个人負責名义，也是过时无效的东西，都应一概废除，重新改选。如本人在东京共进会时蒙大家預推为湖北都督，刘英为副都督，今刘英不在此地，我不能代表他；本人的都督名义，今天我当众位同志面前，决定取消，我自量不才，万不能胜任起义时的领导責任。

蒋翊武也起立发言：仲文和孙、刘两同志的建議，都是切合实际、极其可貴的，本人深表同情。我是文学社的社长，現在团体界限既經化除，本人正社长名义，愿即时取消，以党人資格同大家共同努力。

王宪章也发言說：我和蔣同志的态度是一致的，我文学社副

社长名义，亦愿立即取消；两个团体合并为一，一切重要事情，都应取决于会议。

楊玉如也接着說：从今天起废除了团体名义，我們湖北革命陣营的力量，才是真正統一了；統一以后，必須推举一人負总司令或主帅的責任，以免羣龙无首，臨敌慌張。

孙武最后說：我們今天这会开得极好，真是英雄气概，有公无私，总座一席，再待日后会议推定不迟。

文学社和共进会决定实行合并以后，双方又酝酿了几天，交換意見，詳細討論，决定原則，推孙武、刘尧激两同志起稿。关于总部的各部組織的負責人員，暫行推定如下：

总理部	正总理	刘公			
軍务部	正部长	孙武	副部长	蔣翊武	
參謀部	正部长	蔡济民	副部长	徐达明	
內务部	正部长	楊时杰	副部长	楊玉如	
外交部	正部长	宋教仁	副部长	居正	
理財部	正部长	李春萱	副部长	张振武	
交通部	正部长	丁立中	副部长	楊宏胜	
	部員	陈人杰	饒芸生		
調查部	正部长	邓玉麟	副部长	彭楚藩	
	部員	陈鴻喆	赵士龙	徐移山	蔡大輔
參議	杜武庫	张廷輔	吳醒汉	吳芸城	吳炳楚
	彭寿松	黃中勉	刘长庚	肖国宝	王宪章
	林曉	徐万年	黃元吉	王文錦	宋华臣
	刘英	刘鉄	高尚志		
秘書处	謝石欽	邢伯謙	費渠	苏成寧	

會計处 梅宝璣 赵学魁 赵学詩 张汉什
庶务处 李白貞 刘燮卿 刘玉堂 鍾雨亭
軍械处 熊秉坤
司 令 馬騏云 李賜生
司 助 牟鴻勛 汪性唐
司 书 黃元斌 袁汉南 罗炳襄

按上列記載，对照他书頗有出入，因为这是临时性質，常有更調和增加所致。由此可見当时革命党人对于軍事、政治，沒有个人权利思想，随时遵令支配。及到首义以后，一般站在前面的同志，更沒有任何自私自利的野心妄想，因此黎元洪、湯化龙等旧軍官、旧政客，得以順利地一跃而登高位，篡夺革命果实，反过来殘杀革命党人，这也是当时革命党人失去警惕所造成的。

南湖炮队的失事与总部的迁往汉口

一九一一年旧曆七月間，湖北革命党人以为发难日期已經迫在眉睫，公推楊玉如、居正帶款一千元到上海，托陈英士购买手枪，备起义时应用，并具函約黃兴、宋教仁来汉协助。两同志到达上海，在民立报館晤陈英士、宋教仁，报告湖北进行革命运动情况极为順利，并托代购手枪。陈英士欣然答应即为代办。次日在陈英士寓所召开秘密會議，南京、山西、陝西、云南、四川、广东、广西的駐上海代表都来参加。他們听到居正报告湖北革命运动进行經過及长江一带形势，都精神振奋，对湖北同志的工作穩着先鞭，表示欽敬。并派呂天民同志持函赴香港向黃兴劝駕，促他早日起程到汉口，共襄大举。宋教仁也表示愿与居、楊同来。

不料此时陷在武昌獄中的同盟会負責人胡瑛因为一貫主張要

在广州发难，不愿意湖北走在他的前头，托岑禧送一信致宋教仁，极力說湖北不能起义，亦无力起义，竭力破坏。因此陈、宋对居、楊二人发生怀疑，购买手枪亦迟迟不办，使居、楊二人滞留上海，不得返汉。这时他們还不知道胡瑛对湖北革命的进展迅速而发生嫉妬、从中破坏的一段内幕。

同时，武昌地方又发生了一个不幸事件。在旧曆八月初三日（阳曆九月二十四日），南湖炮队八标三营左队正目梅青福、兵士汪錫久请假离营，孟华臣、赵梦屏等設饌饒行，由于饮酒过多，乘着醉意，狂呼怒吼；有某排长出而干涉，激动众怒，陡起冲突。孟、赵諸人拖炮裹击，想乘此机会起义，不料炮針早卸，弹庫封鎖，又因事先未經联络，毫无准备，无人附和，不能成事。管带姜明經見事态严重，电告司令部飞調馬队前来弹压。孟华臣等見事已不济，就四散脱逃。

这时孙武等正在胭脂巷和各标营代表开会决定旧曆中秋发难，聞此消息，会后即囑炮队代表徐万年、蔡汉卿回营妥为处理。幸张彪未予深究，仅归罪于肇事諸人中的霍殿臣一人，用酗酒滋事罪名，开除军籍了事。

孟华臣在暴动时手臂受伤，事败后来汉口見邓玉麟、胡玉斋，責备共进会进行迟緩，不早日定期发难，徒然迁延时日，致南湖发难遭到失败，言下忿忿不平。邓玉麟等只得用婉言劝慰，告以居、楊赴上海购枪未回，以致延期，好在現已决定在中秋起义，为日无多，希望暂时忍耐。孟华臣才快快而去。这次南湖炮队事件的失败，当然不能归罪于总部；但是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到革命党人渴望起义的热潮确已高到不可遏止的程度了。

南湖炮队暴动后，总督瑞澂知道武汉革命运动已經波及新軍，

防范更加严密，下令全城分段搜查，企图一网打尽。刘公看到情势日益紧张，而楊玉如等因购枪逗留上海，久久未回，又不能提前发难；加以南湖炮队暴动更是不可掩飾的事实，設若秘密全部洩漏，閉城搜索，革命党人将都成为釜底游魚；于是就化装携眷秘密渡江，迁入汉口歆生路柴昌照相館內，作为临时办公处，繼續筹划发难前应有的准备工作。

十三日，果然有軍警突入雄楚樓十号捕捉刘公。这时仅楊玉如的妻子吳靜玉一人在家，知道事关革命，恐难逃生命，一面勉強出来应付軍警，一面暗服硝酸水自尽。軍警虽扑了个空，毫无所得，而吳靜玉却牺牲了。

制旗印，造炸弹，筹立中华銀行

刘公在迁到汉口的次日，就召集各部負責同志开紧急會議。刘公首先发言：南湖暴动和孟华臣的責难，足以表示本会同志希望发难的迫切，我們应迎头赶上，不可久久拖延，坐失时机。近日武昌戒严，搜捕党人，局势日益紧张，迟則恐生他变。起义时应行准备事件，务須从速赶办；前經东京共进会預拟的国旗图样和大都督印鈴，更应早日制就，以备应用。会上決議以李白貞既长美术，又懂化学，一并交他办理。

李白貞接受了这两項任务，就在党人所設的机关文艺俱乐部密室把国旗图样放大画好，购买了紅黃黑三种色布，照图裁剪粘貼，交他的夫人陈氏縫就。惟刊刻印鈴工作比較复杂困难，决定采用酸性液烂銅方法刻制。当即在长堤街买得五寸見方紫銅片一块，打磨光洁，反写“中华民国鄂軍政府大都督之印”十三字，投入四十二度浓硝酸中，反复数次，使明显成文，再用刀加工刊刻修整，

裝上木柄，經過五天才告完成。但因工具不夠，李在用洋刀刨光時候用力過猛，將左手大指划破，殷紅的鮮血，染在潔白的木柄上。李就索興將木柄全部塗上紅漆，不但掩蓋了斑斑血跡，而且更覺美觀。

八月五日早上，鄧玉麟同志來見劉公，報告武昌戒嚴情況比前更是緊張，巡邏隊不斷地在街上往返梭巡，各城門都加派崗警，尤其是漢陽門搜查更嚴，行人出入，都須摸腰搜身，多所留難，才准放行。據說某日早晨有河南人手拿紙包的三個饅頭進城，不耐崗警搜查的麻煩，氣得把饅頭就地一擲，崗警疑是炸彈，一哄而散，挑水夫、人力車及來往行人也慌作一團。崗警因許久不見炸彈爆炸，才敢返回崗位。這班崗警吓得如此喪魂失魄，可發一笑。但是我們為了慎重起見，即將南湖炮隊交通改為取道漢陽轉白沙洲。

李白貞制成的大都督印鈐，經劉公、孫武等多人傳觀，都十分贊美，向李白貞多方慰勞，並全體鼓掌，預祝革命成功。

同日，各部負責同志繼續在榮昌照相館樓上開會，討論居正、楊玉如購買手槍久久不回一事。大家認為發難日期已經決定，萬不能再事拖延，手槍恐不能及時應用，必須加緊多制炸彈，以應急需。但是鑒於前次邵虎和高楚觀在配葯時曾發生危險，應改推專人負責，應用原料如何設法採購，也急應解決。

丁笏堂提議：李白貞同志忠實細心可靠，且懂得化學，和西葯房熟悉，可以負責。李白貞答稱：西葯原料雖懂得一些，葯房也並沒有禁止出售，採購無大困難，但全部原料不便在一家葯房由一人購買，須再推一可靠的同志分途採購，以免被人生疑識破；對於製造炸彈實是外行，恐難勝任。結果，加推李白貞的內弟陳叔琴同志幫同採辦原料，孫武負責幫助製造炸彈。於是李、陳兩同志就分途購

买胶水、酒精、黑铅、铁片及大量罐头、香烟空罐，儲存文艺俱乐部密室，慎重试制。先制成一个，由邓玉麟秘密带到武昌洪山背后试放，浓烟弥漫，爆炸力量极强，将地面炸成一个很大深坑，效果甚好，于是就加速如法赶制，每天可以装成二十到三十个不等，交邓玉麟、杨宏胜转运武昌，在各处分貯，以备发难时需用。

八月七日繼續开会，討論湖北金融問題，是否需要設立銀行以濟軍需，并統制金融。大家認為应預先筹划，以免臨渴掘井。但因金融問題十分复杂，以李白貞久在商业場中，就請他提出建議，以备采納。李建議設立中華銀行，以湖北官錢局为基础，以官錢局的全部資本財產作为中華銀行的固定基金。刘公等全体贊同，就推李白貞、李春萱、丁立中三人会同筹划进行。

发难的展期

总督瑞澂根据各处迭次密报，知道新軍各标营士兵多有受革命党人所运动的，就把新軍四散調开，以为这样就可以使他們失去团结机会，力量分散，难成大事，可以获得暂时苟安，然后再行設法妥为处理，使不留痕迹地来消除这场“祸害”。瑞澂将馬队八标調往襄阳，四十一标調往宜昌。临行时，馬队各营代表陈孝芬、章裕昆等向刘尧激請示办法。刘明知这是瑞澂的詭計，但这时确是无法挽救，只好叫他們先行随軍开拔，十五日如果能发劲起义，再行通知。尧激又去和四十一标一营代表唐栖支等联系，囑咐他們等待武昌起义时就在宜昌发劲响应。孙武又召集各标营代表开了一次會議，决定調往外县同志听到武昌起义，就在所駐地点发劲，不赶回武昌，免得同志們悬心，好放胆前去。一面和留在武昌的新軍加紧联系，积极准备，及期发劲。所以接連几天来，如邓玉麟的

同兴酒楼以及开一天、怒春园、招鹤楼、杏春园、江汉春等处，絡繹不絕地挤满了三五成羣的新軍士兵和学生。这种突然异样的現象，当然瞞不了督署所派出来的便衣警探們的眼睛。并且四处传说孙文派他的弟弟孙武到武汉在八月中秋日“造反”，吓得瑞澂慌张无措，立即下令新軍各标营軍官收集士兵的子弹，严密注意士兵行动。这一措施，确是給予革命党人起义以很大阻力。同时黄兴由香港来密电，极力主张武汉万不要提前发难，因为各省机关还没有打通一气，湖北一省恐难支持，必須迟至九月初旬，約同十一省同时起义，才是上策。

武汉革命党人的领导方面看到黄兴电文及当前敌人的充分戒备情况，认为即使如期发难，胜利实无把握，为了慎重保存实力起见，决定展期发动，并立即通知各标营代表囑同志们暂时忍耐，听候命令，万勿輕动，作无代价的牺牲。果然到了中秋那天，全城特别戒严，各处加派双岗，枪上插上刺刀，枪膛推上子弹，一班一班的巡邏队，不断来往巡查。城門虽然没有全部封閉，但也只开得半面，行人出入，都要受到軍警的搜查。城内百姓胆小的天还没黑，就把大門紧閉，免得受无謂的惊恐。八月十五日一年一度的月圓佳节，完全被严重的軍事恐怖侵夺去了。

宝善里总部的敗露

八月十三日夜，汉口狂风驟雨，歙生路榮昌照相館樓上有窃賊从窗口潛入，进各房間搜索。李白貞从睡梦中惊醒大呼“捉賊”，起身出追，窃賊仓皇从隔壁晒台逃去。大家亦同时起身，燃灯检查。除丁立中队房外，其他各房間都箱翻篋倒，衣物散乱滿地，而一无損失。大家怀疑这窃賊另有目的，所欲得的并不在衣物資財，当是

敌人派来的密探，不是寻常的窃贼。回忆前一日《夏报》曾载“汉口某某照相馆是革命党的巢穴”一段新闻，可称暗暗相合。丁立中、邓玉麟等都以为然。这次虽没有受祸，但都感到此处决不能再继续居住，最好迁往租界，较为安全。天亮后各人就分途出发向租界寻找房屋。

午后二时，丁立中回来說：俄租界宝善里有十四号和一号两栋空房，很是合用，租金不贵，但必须要殷实铺保，才肯出租。孙武和刘公商議，铺保一节，只有李白贞最为适宜，他开设照相馆，又是本会同志。大众一致同意，交丁立中和李白贞两人负责办理。当时李白贞明知作保是一件危险事情，然而又不容辞，就满口答应下来。八月十五日，就把总部从歆生路迁到宝善里十四号，刘公夫妇迁入一号屋内。从此各处党代表都到宝善里十四号来接洽工作或领受命令。

十八日上午，孙武在楼上后面小房内装制炸弹。他手拿一个才装上药的炸弹，对大家說：“用这个炸弹把瑞激、张彪、铁忠三个王八蛋一起炸死就好了。”說完随手向桌上一放，不料用力过重，炸弹立即爆发，楼窗玻璃都被震破，浓烟弥漫全楼。多数人夺门逃避。李春萱急奔上楼，見孙武满面流血，昏倒在地，立即脱下长衫把他头脸裹住，扶出后门，車送同仁医院徐凤梧处救治。丁立中和未走的同志急将制炸弹的各种药料运出，并将室内硝烟消灭，惟锁在柜内的旗帜、印铃、名册、文件、財物，因时间仓卒，不及携走。当时浓烟从窗戶、屋頂冒出，四邻大呼救火，俄捕四处奔集，夺门而入，即将前后門监守，向楼上下各处搜查，更用斧把大柜砍开，所有各物，搜洗一空，并将未逃出的刘夔卿带走。又因同里一号刘公住所同为丁立中承租，李白贞作保，且系同日迁来，所以刘公妻刘一

和弟刘同亦被捕去，由俄捕房轉洋务公所候审，再引渡武昌。这时俄租界即宣布戒严，不許行人往来，一般好事者都被阻在街边路口，探听消息。

丁立中从宝善里逃出，就急奔至散生路見李白貞，連喘帶說，告以宝善里敗露經過，并說：“現在俄捕正在捉拿承租人和担保人，你赶快逃避，免遭毒手。”說毕，即將他的行李衣物僱車送往中西旅館去了。

李白貞聞訊后，为了要看个究竟，便化装到宝善里总部門口探看，見有俄捕監守，禁止出入，并听說捉去十余人，內中还有一个女人，其他都无从探悉。又到洋务公所和夏口厅两处，也得不到确实消息，只好轉回家中。李料知此事总是凶多吉少，就收拾細軟，全家从后門走出，到亲戚家躲避。李自己則轉到鴻順里孙武寓处探視，知道孙武伤势虽重，尙无生命之忧，但旗帜等件还須負責赶紧重做，以各起义应用。

蔣翊武回武昌，仓卒下令起义

汉口炸弹失慎事件发生的当日，蔣翊武由岳州回到武昌，和蔡大輔同来小朝街机关部。刘尧激告訴他，現在軍隊中我們有联系的人數，已到达十分之九，都摩拳擦掌，常来催促我們，好象一天也等不得，但黃兴来电主张延迟到九月初和十一省同时起义。翊武沉吟了半晌說：“克強是从謹慎一面去做，自然百无一失，我們受清朝的茶毒，已經二百多年，这半个月的时间，就受不了嗎？”尧激认为应当把代表們找来，商量一下才好。当即派人分头通知。

代表們陸續到齐后，蔣翊武很婉轉地报告了黃兴电报的用意。各代表齐声說：“外面謠言很大，若不及早起事，怕生意外。”翊武

說：“兄弟并不是不想早日起事，就是怕外面沒有救援，岂不徒劳无功，还請各位考虑。”各代表知道負責人抱着謹慎主張，只好答道：“既是这样，只好設法延迟几天，但是外面风声不好，設有变故，又将如何对付呢？”翊武說：“如有危險，兄弟自有对待方法，請各位放心。”各代表才慢慢散去。

代表們刚刚散去，邢伯謙慌慌張張地跑来，开口就說：“不好了，宝善里的机关部失事了！”并将經過情形說了一遍。大家都很伤心，沉默了良久。刘尧激說：“事到如今，一不做，二不休，就在今夜起事吧！”这时邓玉麟来了，也說：“好得很，就是这样做，翊武！你是軍务部长，赶快发令吧！所有同志都是这样主張。”翊武就連忙发出命令，派人分送各标营，定于当晚发动。

共进会从成立到武昌起义前夕的活动，約如上述。

辛亥廣州之役前 黨人在日本購運軍火的經過

王子騫

庚戌年(一九一〇年)十月十二日,同盟會總理孫中山集黃興、趙聲、胡漢民、孫眉及南洋各埠代表開秘密會議于庇能打銅街一百二十號黨部,決定在廣州起義,並積極購運軍火。日本東京方面最初負責購運軍火者為黎仲實(廣東人)。黎以人地不熟,諸多困難,一日遇喻培棣(字華衛,四川內江人)于途,告以此情。培棣密商之四川少數同志,都認為吳玉章同志年齡較長,閱歷較多,且與日本民黨素有聯繫,由他來主持一切,一定順利。復轉詢湘、鄂、皖、蘇、閩諸省負責同志,也認為吳最適當。於是就電請吳由崗山來東京(吳在崗山第六高等學校肄業)。

當己酉年(一九〇九年)熊克武、曾省齋、黃金鯨諸同志在廣安起義失敗後,大竹同志張懋隆(簡亭)、蕭德明(靜軒)、曾寶森(子玉)相偕來日本避難。懋隆到東京不久,知道經過幾次革命失敗,黨人意志消沉,黨務極形廢弛,乃約集同志慷慨表示,願以全力整頓黨務。從此以後,懋隆就天天奔走聯絡于各省同志之間,與湘、鄂、皖、蘇、閩諸省同志聯繫尤密。在日同志莫不感其熱誠,黨中力量乃漸團結,聲勢日振。黃克強離東京後,其所任之庶務部長一職原由劉揆一(湖南衡山人)代理;其後揆一因事回國,眾即推懋隆代理。他與蕭德明、曾寶森、李功照和我共租一屋于小石川區駿河

台町，榜其門曰“竹芦”（因我等皆大竹县人），地点僻靜，极便于秘密會議，各省同志来此集会者日多，异常熱鬧。吳玉章来到东京后，諸同志即在竹芦集会，商討軍火购运工作。当时决定由玉章与日本民党接洽购买軍火，并另覓一二所房屋，以供收藏及装运軍火之用。这时清廷駐日公使偵察革命党甚严，党中敗类亦有被公使館收买充偵探的，故一切工作都决定以忠实可靠的同志担任；所租的屋子，不敢雇用日本下女，看屋烧飯皆由同志躬自担任。

由我們运送回国的軍火，据我所知，前后共有五批，其中第二、三两批是如何运送的已不能詳忆。下面是其余三批的运送经过：

第一批軍火的运送，出了大岔子，使革命受到极大的影响。香港本为无稅港口，来往旅客向不检查。一日，洪承点（醴黃，江苏揚州人）見上海金山船到时忽有检查之举，乃归报克強。克強据以电东京，令来者注意。但这一批軍火已于电到前两日交湖南周来苏、首紹南护运出发。玉章接电后，以事关重要，派我由陆路赶至长崎等候。我从东京搭火車到神戶，渡海換乘火車到长崎，候了一日，周、首两人所乘之船始到。我上船会见来苏，传达玉章指示，告以船到上海不进口，抵香港有人来接，設遇有非常情形，自有人应付，不必慌张；并交給他們二百元，作为应变之需。万沒想到周来苏胆小如鼠，船一过門司，他便沉不住气，把这批精良武器和子弹全部投入大海。及船抵港，他見平靜无事，内心感到不安，忸怩地去見克強报告。洪承点、巴泽宪听了大怒，馬上摸出手枪要打死来苏，为克強所阻。从此同志們便呼周来苏为“周丢海”。这个经过，是我到香港以后才知道的。这一批軍火的損失，打乱了統籌部的預定計劃（預定发難日期較三月二十九日为早）。

第四批軍火运送时又出了岔子。因为由东京启程回国，須在

橫濱上船，行李大都先交東京車站運往橫濱。我們這次交運的，其中裝有軍火的箱子，因箱小而量重，車站人員有些疑心，就故意將牌子掛錯。到橫濱站上我們提取行李時雖然找到我們的那只箱子并說明是東京車站掛錯了牌子，但仍然受到站上刁難。他們要我們先說明內裝何物，對驗無訛，方允提走。幸得這次護運同志方聲澗機警，答稱行李是朋友托帶的，他本人已先期回國，鑰匙已帶走，無法打開。聲澗隨即電告玉章，請速來設法。玉章即與我們趕到橫濱。我們到橫濱後，經過研究，先準備好與裝有武器的皮箱式樣相同的箱子，內實以重量相等之物；然後派陳策（勳宣）到領事館找他熟識的文案，以聲澗對車站上所說的箱子是友人托帶，無法開啟的理由為詞，請領事館寫信給車站准予提出存在領事館，同時準備好在中途“掉包”的方法。一切準備妥當後，陳策就到領事館去找着文案說明理由，請他寫信，文案表示同意照辦。可是當文案正在寫信的時候，領事出來了，問明原由，便不許他寫。我們實在無法可想了，只好冒險讓陳策跑到車站去相機行事。這時已經深夜，車站上其他旅客的行李全都提走了，只剩下我們那只箱子，由一個車站人員看着。陳策和顏悅色地同他商量了一陣，請他通融辦理。他起初堅不答應，後來意思似乎有點活動了。陳策看在眼中，就抓緊機會，邊說好話，邊提着箱子走了。

我們另外好幾個人提着那個準備“掉包”的箱子，在由車站到領事館的路上等了許久；正在着急的時候，忽見玉章等笑容滿面地提着那只箱子回來了。我們問明了經過，大家也都十分高興。這批軍火後來仍由聲澗護送，总算平安抵港，完成了護運任務。

第五批軍火由曾寶森、陳可鈞（福建人）和我三人護運。我們都改着敵領西裝，乘坐一只六千多噸的德國大海輪，繞道朝鮮，經

大連、青島、上海而抵香港。過上海，往晤淡春谷（宅陽，巴县人，負上海、東京兩地四川黨人的聯系工作）、陳其美。抵港，洪承點、黃一歌（克強之子）乘小火輪來接。可鈞由其同鄉引往林文住處，寶森和我住銅鑼灣四號樓房。我到後不久，克強至。我們向他報告一切經過後，即聲請留粵參加起義。克強說，總部初本規定，凡在日本各大學和高等專科留學的同志，護運工作完成後，仍回日本繼續深造；哪知他們來了以後，個個都不願再回日本讀書了。他同意我們參加起義的請求後，隨即取出港幣二百元送給寶森和我，並說，進入省城還有些日子，可以在港到各處玩玩。我們因為身上的錢還沒用完，沒有收這筆錢。

大約是三月二十二三日左右，寶森和我潛入廣州市城。將行之前，我們兩人都寫了遺書寄回家中。抵省城後，住蓮塘丁某號但懋辛等川籍同志的住所。除喻培倫另住一處製造炸彈甚忙、未見面外，其餘都見着，知川籍同志已編為攻打總督衙門的一隊，由熊克武統率。稍後一二日，克武偕我等往珠江沿岸及觀音山等處偵察地形，並繪略圖。登觀音閣看形勢後，克武說：“我們需要來一個‘時遷火燒翠雲樓’。”到了二十七日，標記、符號、槍械已發下，如何編隊，如何出擊，也作了演習。同志們知道起義在即，人人精神奮發，都在盼望確定的日期。

二十八日上午，懋辛忽忽自外回來，傳達統籌部命令說，消息已洩，刻已決定改期發難，省外同志立刻向港澳撤退，促寶森和我立刻動身。我們于當夜抵港，至銅鑼灣四號樓房。譚人鳳老同志在樓上納涼，看見我們回來，就大聲問：“回來做啥？”我們告以改期。他說，省城又有電來，催促已返港澳同志星夜回省。我們听完，轉身就跑，因為要趕搭夜班上省輪船，一刻不容遲緩。及登船，

看見玉章、德基也在船上。他們說，最末一批軍火已由他們兩人送到，并說趙聲、胡漢民、宋教仁等都上了這條船。這條船的大餐間頭等艙位几乎都是同志們占着。天氣熱，人人心中有事，哪能入睡。深夜，玉章尙在伏案擬寫檄文。趙聲等未出房門一步，用黑紗罩着電燈，接膝密談。

天微明，船達黃埔，我聽到遠處有槍炮聲，往告玉章等，他們都出立船舷注視。移時，又見到江面淺水兵輪往來如梭，情形大異平時。船抵碼頭，則見洋員帶着清朝官員及武弁上船。這時船上已傳開革命黨鬧事、四城緊閉的消息。初有一切客人不許上岸之說，隨又宣布大餐間頭等艙客人允許上岸（大約是清朝官吏認爲革命黨不過是江洋大盜之類，沒資格乘坐大餐間頭等艙的緣故）。我們同志就趁此時上了岸。有些人進入長堤一帶的大旅館。我和寶森、德基幾位相熟同志上岸後，曾到過兩處城門偵察，見城門緊閉，市容熱鬧如故，聽不見什麼槍炮聲。我們想到河南有機關部，應往探察，就“過海”（當地人呼過對河爲過海）到河南。德基見機關部內尙有炸彈，就要拿去攻城，經我們勸阻始罷。我們雖然非常焦急，但實在想不出好辦法，只好把炸彈及葯料等沉入井底，重要文件由本地同志撈走另藏。我們過海回到長堤，屢來屢去，挨近返港輪船快要開動時就登輪返港。

我們抵港後，頓覺銅鑼灣四號樓房呈現出一幅淒涼景象。我們這些外江佬，因語言不通，吃喝都發生不少困難。有一位歸自南洋的少年同志，看出我們的困難，常常爲我們舀開水，自己拿錢買面包點心，打着手勢讓我們吃喝。他的姓名已記憶不起來，但他對同志的熱情，至今還留在我的心中。幾天內，省城消息陸續傳來，知道同志死難的爲數甚多，四川喻培倫、秦炳、饒國梁已殉難，

克武、懋辛的情形还不清楚。李郁生(蔚如,四川涪陵县人)、陈其美等赶来起义,不及参加,在港相遇。不数日,克武脱险来港。萧德明亦自越南来。头年冬天留日学生因英军侵犯片马,在同盟会的策动下,组织了一个国民救国会,举出代表各回指定地区,运动官民反英,暗中进行革命活动,萧即是其中之一人。他原拟取道越南入滇回川,经过越南时被法国殖民当局拘留多日,释放后来港,拟取道长江回川。他初以为同志们已在广州全部殉难,不意在路上撞着我和宝森,惊喜若狂,几乎跌下马来,把马路上的行人都惊呆了。

某夜,谭人凤老同志召开秘密会议,说明这次失败完全是由于陈敬波(广东商人)卖党,洩漏消息所致;他说,不杀此贼,实难消恨。大家都表示赞成,但由谁担任行事,还未决定。有人主张抽签决定。承点起立,把胸膛一拍,说:“这事由我一人担任,我因办理秘密运购,和陈贼交往多。我设法通知他,说我们要继续干,要他帮忙,他必然肯会我。只要他肯见面,我自手下有处。”决定后,承点对我说:“死是不怕的,如万一千不了又死不了,茫茫大地,何处是我安身立命之处?”我即答云:“可到东京去,住处和用度,我完全负责。后天就有船开,我把你的船票一齐买下,船开时,你如不来,我们就认为你已死,我和宝森也不再呆等。”到开船那天,船已拔锚启碇,承点才匆匆赶到,用吊绳吊上了船。船出了海峡,他才悄悄地讲出当时杀陈贼的经过:他约陈相会于九龙乡间某同志家中,晚饭后,同往田间散步,趁陈不备,抽出匕首,把陈刺死。他因衣服沾了血迹,不敢回到原处,又另觅一同志家藏匿过夜;第二天一早换好衣裤,才赶来上船。我们抵上海后,晤谈春谷、陈其美。其美当晚约在妓院吃酒,席间尽是同志。其美说:“事情虽是失败,但卖党

的蔣敬波被黨人暗殺的消息已傳到上海，真使人快意，惟不知下手的是誰？”我把承點一指說：“就是這位洪同志。”大家皆歡呼，喝了不少的酒。

我們抵東京時，天尚未大明。我把懋隆從床上叫醒，見他兩眼紅腫異常。他說：“自從失敗消息傳來，不知存者還有幾人，得不到確訊。多少人都曾經我策動而擔任護運工作的，只見其去，不見其返，我豈能不感到悲痛。”說時淚流滿面。承點住在竹廬，經常與長江流域同志密取聯繫，有暇則專心讀書寫字。不久，玉章、克武及各省許多同志來到東京，並未因失敗而喪失鬥志，都紛紛作歸國準備。端午節日，大家想到快要分散，何如趁此佳節痛飲一場，就或當或賣，湊了些錢，在維新號買了三十餘斤重的一罈紹酒，又在四川餐館買了很多熱菜。竹廬同志也買了不少的雞鴨魚肉，大家各盡所能，動手做起來。我們把報紙鋪在草蓆上，擺下大碗大盤的各種肴饌，團團坐了二十人左右，大吃大喝，一大罈酒剩下不過三五斤。承點說：“一拳豁了定輸贏，輸了的把酒一氣喝完，多痛快。”熊越山（廣東人，後為黎元洪誘殺）說：“我們兩個對豁。”承點說：“輸了不吃怎樣？”越山說：“不吃是烏龜忘八。”他們兩人一舉之下，越山輸了，抱着罈子就喝。大家去擋，越山不聽，說：“我寧肯醉死，不能當烏龜忘八。”他咕嘟咕嘟地一氣把酒喝完，登時血脈憤張，幾乎爆裂。大家吓慌了，立刻分途跑出去購買冰塊，把他全身鎮在冰里，這才脫離了危險。越山這種舉動雖然太過分了，但也足以表現出當年黨人的豪邁氣概。

玉章回東京後，因以前所購軍火尚有余欠未清，而新敗之後，總部籌款一時又難望匯到，就向同志們說，事雖失敗，但以後還要干，仍不能不要日本民黨幫忙，我們不好失了信用，希望各省同志

量力捐助，了清余欠。各省同志在捐款中，表現好的誠然不少，但也有說出“事前既未參與，事後也無捐款義務”之類的閑話的。四川同志却有突出的表現，從無一人說過什麼閑話，拿得出錢的很快拿了出來；一時拿不出錢的，就連手錶、衣服、書籍之類，也進了質店（當舖），湊款捐獻。這件事表現了當年四川同志的團結精神，同時也是對玉章同志充分信任和敬重的表示。

癸丑討袁回忆录

耿毅遺稿

一九一二年六月，黃興卸南京留守職，勸王芝祥北上就直隸省都督職。王以第八師既歸中央直轄，其餘軍隊都已給資遣散，遂邀我同到北京，擬用我幫助直督的事務。我允同行。

離南京時，召集第八師軍官茶話。我說：“此次隨王鐵老（王芝祥字鐵珊）晉京，一為幫助直督事務，二為偵察袁世凱究竟對於共和是否忠實。我總疑袁對於共和政體及吾同盟會會員都有異心，將來還需要戰爭，你們責任極重，務望切實訓練軍隊，以備意外。”眾軍官都說：“只要支部長有命令，我們一定遵從。”隨又談及整理會內各事，並請炮營長鄧鼎封、步營長甘尙賢等負責辦理。後隨便閑談，吃點茶食，盡歡而散。翌日，隨王芝祥到上海，乘海輪赴天津。

天津警察廳廳長楊以德亂造謠言，說王芝祥帶了許多軍隊，將來要把北洋軍隊一律遣散，凡反對革命者一律殺却。他還發了許多傳單，叫天津人民反對王督直。此種舉動皆系袁所授意。但是天津知識分子多表示歡迎王督直，雙方開會，舌戰極烈。王不便多住，遂轉火車至京，寓宣武門外達智橋松筠菴。次日，我隨王謁袁，袁稱譽不絕，並請吃飯，聘王為高等顧問，月支伏馬費八百元；我為參議，月支伏馬費五百元（當時凡上將都聘為顧問，中將聘為參議，少將聘為諮議），但總不提王督直事。北方一般同盟會會員及新人

物，如刘汝賢、王震三、温世霖、郝濯等都忿极，連日催总理唐紹儀发表任命。

唐和袁商，袁說：“王系革命党人，若使督直，不啻引狼入室，将来他和南方联合，我們尚有余地么？”唐說：“前既答应，現在何能食言？”袁說：“是你答应的，我并未預聞。”唐說：“这是責任內閣职权，我要发表。”袁說：“我不蓋印，就能生效么？”二人相持数日，終不能决。后袁竟不和唐商，任命王为南方裁兵大員，并办理善后事宜，劝王南下。王亦觉为己督直一事，使他們常相爭执，恐惹起大局扰乱，遂允任裁兵事。

唐聞王允任裁兵事，大怒，并說：“王鉄珮真不够朋友，我为他的事和袁爭执，他反拆我的台，我还有啥話說。袁竟不和我商議，自行任命官吏，我这內閣还算甚么責任內閣呢？不如早走为是。”遂微服乘三等火車赴津，轉輪至沪，不問政事了。

我隨王先到上海，裁沪都督府所轄的軍隊二十五、六兩師。兩師因槍械不全，遣散甚易；惟張宗昌所部三百余人原系東北鬍匪，如遣散后流落上海，仍以搶劫为生，将会惹起外交事件。王和我商，拟將張部編入第八師內。我說：“八師皆广西、湖南人，張部皆東北人，言語不通，久住一处，恐生誤會。且一系革命軍隊，一系鬍匪，搶劫成性，犹如水火，更难相处，不如編到徐州第三師內。”王亦覺妥當，令我電徐州冷適師長，請其收編。冷亦首肯，遂將張部暫編為第三師騎兵團，張為團長。南京各師則縮編為三個師。

湖南獨立時，亂招兵士，將原來的一混成旅擴充為六師、兩旅。都督譚延闓因兵太多，無法發餉，決定裁兵，并電袁請王芝祥協助。袁極愿南方裁兵，借以消除异己，遂電促王赴湘。譚得袁允，亦電王赴湘商議裁兵事宜，并請酌帶軍隊，以資鎮懾。王令我和趙

恆惕先到湘和譚詳商办法，并言經過江西时，將第八師三十一團及機槍炮兵各一連帶至長沙。先是，馬毓寶為江西都督，亂招兵士，極為贛人所不滿。及南北和議已成，贛人請李烈鈞為都督。李回贛時，他的機槍和炮太少，恐不足鎮懾被裁部隊，遂到漢口和我商談，酌借機槍和炮若干，我遂令三十一團和機槍、炮兵各一連歸李指揮。現李已將五旅十三團十七營衆濫官兵改編兩師，均已妥貼，無用兵鎮懾之必要，故令三十一團團長率該團及機炮各連先集合到九江，隨我開至長沙。

我們到長沙和譚商裁兵事，譚說：“所有官兵都是起義有功之人，不便遣誰留誰，莫若盡數遣散，較好辦理，已跟師旅長和參謀長商妥，即或有極小部分不願意者，亦不至出特別事故，即請王速來辦理吧。”

王來湘三月，將所有軍隊遣散，平靜無事；惟第五師的官兵系擁護譚為都督者，回鄉前愿和譚督話別。譚的參謀、秘書，有勸譚出去和兵士談話者，亦有胆小的人，恐譚和兵士見面鬧出意外的事，議論紛紛，久不能決。眾兵士在都督府大門外候久了，即有性急者出言不遜，漸次激烈，有的說：“你做都督系我們所推舉，現在我們還鄉，你却不見一面，難道說我們是老虎么？你真不見，我們可到后邊見你吧。”

譚竟不能不見，遂出來說：“我并不是不見你們，适有要事要辦，遂使你們久等，甚為抱歉。”并說：“你們還鄉后，務必和一般鄉人謙和相處，鄉中有公益事，先自領頭辦理，不要因為自己為獨立有功的人而傲視鄉里。以后如有事故，仍請你們來省”云云。

眾兵士聞之，都說都督所說，銘記在心，遂告別而去。湘軍都已遣散，長沙無兵鎮懾，遂將八師的三十一團留湘，擴充為旅，仍以

赵恆惕为旅长。癸丑討袁失敗后，袁任命湯蕙銘为都督，將此軍隊遣散，我至今思之尙有余恨。

湖南裁兵完竣，王芝祥令我到京报告一切。我見袁世凱历陈經過，袁不甚注意，惟聞我說的是北方話，甚为惊异。袁問：“你是那里人？”我說：“是直隶順德府任县人。”

袁又問：“你在南方甚久，想必朋友甚多，南方情勢亦必明了。”我說：“大概明了。”袁大喜，遂說：“我在彰德府住家，你在順德府住家，相距不过二百余里，可称为近乡亲。我这里甚缺知南方各省事情的人，你以后可每日来府帮助。我手下甚缺这样的人，現在有你，我就不愁了。”我唯唯。

我以为袁真想和南方和好，用我同南方联系，当时我大喜过望；后来始知他是想用我当他的私人，要我供給情报，便于他消灭南方革命势力。

从此，我每日到总统府上班，所有袁的亲近大員，如段芝貴、陈宦、唐在礼等都和我交好。陈宦告我說：“上午非聞袁总统上去吃飯，不可下班，下午可以不来。”我問何故，他說：“上午系会客時間，南方各省代表由你領見，所以你非在此不可；并且他和代表所談各节，或有疑問，或有所遺忘，都須你为他帮忙。下午是他处理內部事务的时间，不用我們伺候了。”陈如此照顧，我只好說謝謝而已。

在总统府办公四月，每日我領南方各省代表謁見者至少一人，多則七、八人。各人向袁請示，虽有多至三、四件者，袁都当面決定，能办者就办，当时不能办者緩办，不能办者不办，处事明决，絲毫不乱。在此四个月中，袁仅有二次問我，某代表所說三件事，一二两件記得，第三件忘了，令我說明。我如实答复他。袁說：“到底你們年輕人記性好，我老了，事多就忘。”

其实所有代表凡有請求事件，必先和我詳商，某事能办，可以直陈；某事不能办，現時可以不讲；某事可以办，但是应当如何說法，他才愿听能准，如此再三研究，再作决定，所以我都能記得清楚。若使事先不研究，后来都能記得，我虽年輕，亦难做到。我見袁能如此強記和果斷，如能实心为国，国家富強，指日可待，因而我此时真想竭誠相助。

他看我忠心为他办事，他的真意渐渐露出来了。一日，閩錫山派代表送来汾酒百坛、羊皮千张，尚有許多珍品。袁大喜，对我說：“百川近来真好，听我的話了。”我說：“公为国家元首，各省大吏那有不服从的道理。”他說：“胡汉民、李烈鈞二人就不听话，我曾使人叫胡送点迦南香、肉桂等物，至今尚未送来，胡大概不愿意送吧。李烈鈞是个硬头蛮子，不懂道理，我还不愿和他打交道哩。”我和李烈鈞是极好的朋友，袁說这話，我心里非常不快，但也不好当面駁他。当时我想：他为国家元首，不能做到政治清明，使各省大吏衷心悅服，而专想使大吏送东西，听他个人的話，这和前清政府王大臣的驕橫貪污有何分別呢。

我起先尚疑他当清廷官僚甚久，驕橫貪污的惡习熏染甚深，所以他到民国仍然不能改变他的作风。又想他是梟雄之輩，不是平庸官僚，对于政权，当有野心，如曹操、王莽者流，将天下稍有能干的人尽納入掌握之中，专供己用，非其类者則鋤而去之。他的意中必有特別計劃，我以后必須故意和他亲近，察其所为，究竟有何用意。每当引見代表后，稍有时間，必和他談几句，表示殷勤，使他相信我也象他的心腹。此后他每見一人，必加批評。如条陈时局应如何办理者，他就說少年躁进，不堪大用。如专事逢迎者，他就說将来可做外省大吏。他是一个好任用私人、好攬权之人，无怪段芝貴等

都是他的重要人物。看此情况，深感从前議和是个大错，将来国家败坏，尚不知到何地步，恐怕还要比前清政府更坏。我将此情密函告中山、克強，他們只有叹息而已。

袁主张“軍民分治”，意在削弱各省都督的职权。各省都督知他的用意，都甚反对，然不便明言。唯贛督李烈鈞首先通电反对，湘督譚延闓、粵督胡汉民、皖督柏文蔚繼之。袁表面托人疏解，暗派人挑拨离間，迭出事故，各省不能抵抗。

余慕松本系李督同学，和李平素甚好，因李把他的军队（余为旅长，其实不过六七百人，且枪支不过三百余）編到別人队内，委他为省府顧問，余心不愿，遂跑至北京謁袁，辞气之間，对李頗露不滿，袁知可利用，遂給以諮議名义，月支三百元。此时袁甚恨李，遂給予重金，叫他到贛便宜处置，只要能够倒李，就任他为江西都督。余官迷心窍，到南昌竭力运动往日军队，遂有一月某夜之兵变。幸变軍仅为余之旧部，李派軍击散，至天明即平定。余知所謀不成，連夜逃京，袁尙慰劳，并說将来再說吧。

李督幕府中人深知此次兵变的原因，力劝李督暂时忍耐，并說旧軍既已遣散，新兵尙未招齐，羽毛不丰，不能高飞；且袁的异志尙未全露，不能声罪致討，不如暂时虛与委蛇，一面充实军队，一面寻覓时机，决不可冒昧从事。

李亦觉以陰忍为妥，但袁既要“軍民分治”，若听他任命省长，深为不便，不如寻一合宜之人轉荐給袁，諒袁也不好拒絕。李再三思維，始想起前当学生时，学堂总办系道台汪运闓，人极聪明，处世温和，尙能和自己契合无間，請他为省长，不至和自己不合作，但不知他是否愿就，遂派員到安徽和汪商議。汪是漂亮官僚，不甘寂寞的人物，当然愿干。汪认为李既叫他当省长，江西方面不成問題，

惟聞袁和李極不睦，專凭李荐，袁未必允，若先到北京和袁接洽妥當，豈不更好。遂進京謁袁，述李荐他為省長固然好，但甚願請大總統徑行任命，不由地方大吏推荐，這不是表示中國更統一么。他又盡力施展官僚手腕，曲意逢迎，博得袁之青睞。袁遂任命汪為江西省長。

李聞汪先到京運動求袁任命之舉，大為忿怒，以為他所以請汪為省長者，乃希望汪幫助他，不為袁用；現汪反求袁信任，不為他助，他要汪有何用呢？遂使蔡銳震、陳廷訓聯絡一批人士開會，謂汪系官僚，不配當民國官吏，通電各界各縣反對汪為江西省長。

先是，李初為都督時，鑒於江西在前清時只有一混成旅，現雖將濫雜軍隊縮編為兩師，槍支所缺尚多，遂在日本購槍兩千餘支。這批軍械恰在鬧省長問題的時候運到，袁遂使陸軍部電知九江關扣留，並令非有陸軍部命令不准任何人領去。這又是一個雙方爭執的問題。

於是謠言四起，李、袁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王芝祥深覺大局初定，又起戰爭；國家元氣必大受損傷，他表示願去江西調停。袁初尚猶豫，後王對袁說勸我同去，袁遂贊成。蓋袁表面上同意調和，實則欲利用我解決李協和矣。

一日，我領代表謁見畢，袁問我：“能早起否？如能，明日早六點來，我和你有事相商。”我唯唯。

翌早，我六點到，袁已在辦公室內等我，一見大喜，說：“年輕人都是貪睡，你能早起真好。”并問：“你是順德府任縣人，你們那邊是種高粱、麥子、豆子、小米么？”我答：“是的。”袁說：“究竟那一種多？”我說：“西方高亢，多種麥米；東方低洼，多種高粱。”袁說：“你縣十年有八年水淹，我在直隸時，很想把附近河道疏浚一下，使你

們地方免遭水災，至今未果，深為愧作。現在還是每年水淹吧？”我說：“大概是的，這几年在南方，不甚清楚。”袁說：“我又忘記你在南方了。如果水淹時，一般人打的糧食夠吃么？”我說：“水淹時糧食不夠，如果一年不淹，洼地甚肥沃，打的糧食甚多，足夠二年吃的。俗說洼地不養家，倒可發家，即是說如數年不淹，貧家也可成中等戶了。”如此漫談，牆上掛鐘已打八下了。袁說：“我們叙叙家常，把正事忘卻了。今天八點鐘，法國公使來見我，我們不能再談了。明早六點還來，再談正事吧。”第二日六點到府，袁問：“你家中有多少人，都是什麼人？”我說：“先嚴在我十歲時病故，家母健在。我兄弟三人，長兄已死，有一子二女；二兄在家務農，有一女；我無子女。一家共十人。”袁問：“老太太高壽幾何？”我說：“家母六十九歲。”袁問：“你家有多少畝地，水淹尚夠吃么？”我答：“高地有十八畝，洼地六十餘畝。若是淹了，不夠吃，只好加點糠了。”袁說：“如此，老太太太苦了，七十歲的人，那能還吃糠呀。”說着，由袖里拿出一張支票，并說：“把這個寄回家去，買幾畝地，或做點生意，老太太就可以不受罪了。”又拿出一件皮外套說：“你也拿去。穿上，在路上不至受寒。”我看支票上寫的五萬元，那外套是海龍領子，呢子面，狐狸里子。錢如此的多，衣如此的好，我如何敢受呢？我說：“家中雖不寬裕，也可以勉強吃飯，況且今后將我的薪金每月寄家一半，不但丰衣足食，數年內就可成富家了。南方天氣溫暖，這種外套也穿不着，還是留着大總統自己穿吧。”袁執意給我，我堅意辭謝，正在爭持間，牆上掛鐘又响八下了。袁哎呀一聲說：“時間這麼快呀，現在要談正事了。你同鐵老到江西，我這裡有個辦法，你照此而行就可以了。”說罷，從袖子里拿出一封信并密電一本交我。我看這封信是封好的。按官場中的規矩，信不封，可當面觀看，如有疑問，

可当面請示；如已封好，就不許拆开了。我对他既有疑心，凡他交付我办的事，我都要細心研究一番；况他和协和平时就是对头，現在又鬧省长、枪支两件事，这封信的重要不問可知，我不能不立即拆开一看，究竟是什么內容。当我拆开的时候，袁立色变，即說：“这是我的办法，你照着行就对了。”他本来觉着我已經是他的心腹，一定会按他所定办法照行，現竟拆开要看，真出他意料之外。我一看不胜惊异。他写的是：一、汪运闡到省长任；二、枪支不发；三、蔡銳霆、陈廷訓重办；四、李烈鈞下野。我看完后，說：“大总统办法既定，那就不必調和了。”他說：“你聰明，你明白。”我說：“我不聰明，不明白。这事必須先察看情形，再用調和办法，倘仍不行，就照大总统的意旨来办。”他最后說：“你既說不能先定，那就你先去察看，再来电商量办法吧。”我仓皇出門，也沒拿支票和外套。他喚我拿去，我装作不听见，逃出来了。我第二天到府，收拾我办公室自己所用的东西，陈二庵(宦)听我来了，就到我屋內閑談。他說：“主峯(指袁)說你人极忠实，惟不懂世故，此次到江西，不見得能办妥。”我說：“我太年輕，无識見，大总统教我随王鉄老到江西調和，可是他已經規定办法，叫我执行，我真不明白。”陈說：“此次叫王去調和，不过託外面好听点，实在請你主持。我看若你愿为主峯的心腹，你就按他的办法执行吧。”我說“好！”含笑而出。

我和王鉄老乘津浦火車南下。到浦口的时候，王說：“我到上海，和克強先生談談近来所作的事情，你先到江西和协和商談吧。”我渡江到南京，又召集第八师軍官密談，詳述在总统府四个月中和袁接触的經過，并說：袁野心甚大，非把民党消灭不可，此次我到江西，名为調和，恐怕难免一战。隨囑他們加紧訓練，以备万一。众軍官都說，只要支部长有命令，我們立即执行。

王命我先到江西，正合吾意，因袁氏所提四条，不能使外人知道，只可和协和密商。我乘江輪到九江，轉小輪到南昌。协和聞我到，邀我到他住的樓上暢談，我將袁的四條交他細看。李閱畢即說：“這事易辦了，只要我辭職，所有的事都不成問題。”我說：“你若辭職，那還有啥話可說？我黨共和局面，尚賴我們維持。”并將我在總統府和袁共事四個月經過詳細陳述。我對他說：“以後我們非堅持硬干不可。袁既要你去職，不如假意允他。但我得說你現在實力尚厚，不能立即就辦，必須將你的部下運動成熟，然後動手，保無他慮。至于汪本不是他的嫡系，不叫他來，也未必不行。蔡、陳是無識之輩，辦與不辦，無大關係。槍枝非拿回不可，我有方法叫他發還。你若贊成，我發一密電請袁考慮，候王鈇老來，也按此意發電，雙方進行，諒可做到。”李表示贊成。我遂擬一電，大意是：“北京袁大總統鈞鑒：鶴密，到南昌後，詳察情形，擁護李某者尚眾，現時不能照辦，請假以時日，候將李的羽翼歸為我用，再設法下手。汪本不洽輿情，似無使他到任之必要。蔡、陳無聊之輩，辦與不辦，無大關係。在清廷時，江西軍隊本只一旅，此次獨立，多經變亂，槍支損失不少，現陸軍部既定在該省編一師、一旅，即便將所扣槍支發給，所差尚多，若不發，未免表現中央狹隘。況槍支現時發給，將來必為我用，似應飭海關放行，此所謂‘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之意，不知能中我大總統之意否？請速電示。復電武穴王參議轉交為盼。”

李閱電稿後說：“姑且試之，候得復電，再行商辦。”未幾，王鈇老來，和王密談，大意相同，王亦按所商者電袁。袁復我電大意說，均如所請，惟應辦之事須速準備為要；復王電則尚表示中央威信不能不顧，惟對於大局安定，亦屬重要，汪既不洽輿情，亦應擇一本省賢明之人充任省長；槍支已飭海關放行，惟須使李督知中央維護和平

之至意，云云。袁、李爭執，至此告一段落。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着又有協和逐戈之舉。原來，九江鎮守使戈克安暗和袁通；李知后，派歐陽武等率軍由德安到九江逐戈，又電鎮守使所屬的步兵第九團和金雞坡炮台軍隊歸省府直轄，使陳廷訓安撫一切。兩處官兵亦知戈之大勢已去，表示服從李的命令，願歸陳指揮。戈知所謀敗露，倉皇逃去。

李擬派軍政司長俞應麓或師長劉世均為鎮守使。袁復電說，鎮守使應屬中央直轄，擬以李純或王占元（均系北洋師長）充任。李協和又去電說，前鎮守使是江西都督府委任的，當屬省轄。如此爭執，又是一場風波。王從中調解，並勸我為九江鎮守使。我深知南北戰和關鍵即在九江，我安能當此重任，遂堅持不干。王說：“你和協和系好友，你若充任，協和決無他說。你在公府四月，和袁相處尚洽，袁亦可勉強贊成。為大局安穩計，你不能不勉為其難。”我仍堅辭。王乃密以此事分電袁、李，雙方均無異議。我就任九江鎮守使后，從此在南北夾持，各方責備之下，無一日安靜了。

江西軍界中，如彭程萬、余維謙、俞應麓、伍統瑞、李明揚、周璧階等，知我是同盟會中人，對我均甚友好。而一般文人，則對我表示冷淡。省議會的議員們，都以我是北方人，大概和袁有關係，甚至疑我為袁的間諜，所以屢逼我走。我不便表明我的主旨，只好用开玩笑的說法說：“我是到處淪落人，請你們寬容我吧。我在此吃幾個月飯，江西出米甚多，總不至因我吃飯缺糧吧。”他們說：“我們江西不是孤兒院呀。”我不覺忿怒說：“你們把我當作甚么人呀！你們以為我在江西吃閑飯么？我在此煞費苦心，維持大局，甘受開氣。若是照你們的話，我走開了，袁氏又有借口說，前逐走戈克安，現又逐走耿某，江西目無中央，不是派李純就是派王占元來當鎮守使，

你們江西当然反对。这么一来，不是因我鬧起战争么？你們不懂現在局势，不必在此乱說，你們去向李都督說話，叫他驅逐我吧。”我将此情形函告协和。他复信說：“好人总得受气，你将来受的气还多着呢！暂时忍耐，以后自有出气的日子，只要我李协和信任你，一切你不理就是了。”

宋教仁案发生后，一时輿情沸騰，凡屬民党人士和軍隊，都主張討伐袁氏。南京第八師眾軍官更为激烈，派代表到九江詢我主張，并責我过于軟弱。我告以此系大局問題，吾輩不能決定，得看孫、黃和全党要人共同商定办法，諸君系軍官，尤当靜觀一切，如有決定，我当先知，必電諸君實行，望勿躁急。

当时一般人士，有主張宣布袁为凶首，即行討伐者；亦有主張俟七月選舉總統时，不选袁氏，而袁必恋棧，到时再行討伐者。此时国民党重要人員和參、眾兩院議員以及各省代表或政治活動中人，都四处奔走，发表主張。江西为反对袁的策源地，九江是交通要道，一般人士莫不先到九江問我的意見，再到南昌詢李的主張，兼述他們的意見。一时議論紛紛，莫衷一是。

我在總統府时，深知袁除北洋六鎮外，又招募了几个混成旅，并使段芝貴練拱卫軍二十營，倪嗣冲在皖北練二十余營。而南方各省，均系独立时乱招的軍隊后来改編者。如苏省許多队伍，編成不完全的三師；皖省杂乱軍隊尙未編好；湘省旧軍都已遺散，新編成兩混成團，加第八師的三十一團扩为一旅，仅足維持地方；粵省号称四師，人枪兩缺，訓練尤差；贛省号称兩師和兩團，其实老兵仅三團，新招四團，巡防營改編三團，其善战者仅为林虎由广东欽廉帶來的步兵第一團，附机枪兩連，炮兵一連，前为南京政府卫队，后拨归江西者，其余均无战斗力。如此兵力，若加紧訓練數月，再补充軍

实，尚可和袁軍一战。在前方的軍官深知此情形，所以皆不愿速战。我和岳州赵恆惕、徐州冷遯，皆是在广西的同事，情若弟兄，常通电討論时局，深觉我方兵力不能敌袁，与其速战失败，莫若練軍观变，袁尚不敢过于輕視。

带兵者多力主慎重，而不带兵的党人則多主速战。九江的旅館飯館，无时不满；我每日接待者不下数十人，而每月的酒飯費（西餐每人一元，中菜每桌十元）且逾千金之多。

北方的总统府、陸軍部、參謀本部和北洋各軍，都暗派間諜来潛偵察軍情。亦有明派我的同学和友好，表示亲密，請我为袁出力；更有袁最亲近的唐在礼来問我倒李的准备何时可以实现。我虽多方应付，費尽心力，但都不能使他們滿意。

武汉方面，黎元洪的态度关系至巨。黎专门求和，以保全他的位置。鄂省革命党人对他深为失望。在北京的张振武、方維等，常常对众宣传黎的卑鄙的行为，黎羞怒交加，請袁氏惩办张、方等人。袁早想离开南方，遂乘此机将张、方拿获枪毙。羣众質問理由，袁言系黎所交办者。于是鄂人既深恨袁，更仇視黎。鄂革命党人都想倒黎，謀之于黄克强，黄派宁調元、熊越山到汉察看一切。

宁、熊路过九江时，曾和我商談一切。我說：鄂人好談，多过其实，必須多方偵察，尚不至有大誤；若听一面之詞，就去实行，恐有失败之虞。彼等二人到汉两月，未通一函，不知进行若何。一日夜間，突接黎急电：“九江鎮守使耿毅、金鸡坡炮台司令陈廷訓、龙鷹舰长林某均鉴：詹大悲、蔡济民在鄂謀乱未成，現乘岳阳丸逃走，路过九江，务望捕获解鄂惩办。黎元洪。”我初接此电，甚为惊异，維思大概是宁、熊在鄂所謀失败。宁、熊情形，既亟应探明，而蔡、詹事更須急速处理。聞陈廷訓已投降袁，林又素不相識，均难与之商議，

只有自己設法通知蔡、詹二人勿在九江下輪，迅速赴滬，為最好的辦法。但是誰能去通知他們，使他們脫離虎口呢？九江大阮旅館，系日本人所開設，內有青木、佐藤、可兒、丰臣四人和我素有接洽。我當即同他們密商，叫可兒先在碼頭等候，俟輪到后，即到輪上通知蔡、詹不要下輪（他們均通日語）；并決定萬一他二人下輪，被陳、林捕獲，我只好派兵搶來放走，就是因此引起戰端，亦所不惜。

天剛明，陳、林二人來我處商談捕蔡、詹的方法，我說：“此二人皆系謀反，亟應拿獲。惟岳陽丸系日清公司的輪船，不能到輪上捕人，這是清廷和外人訂有條約的。外人有治外法權，至今尚未取消，我們不要鬧出外交上的麻煩。只好在碼頭上等候，等此二人走出租界后，才能捕獲。”陳、林唯唯稱是。

天大明時，陳、林二人和我所派的便衣隊伍，都在碼頭等候。岳陽丸一靠碼頭，可兒就上去站在艙口，見有人下輪，他就用日語問那兩位是詹、蔡先生。詹、蔡答應后，可兒就對他們說：“你們不能下輪，碼頭上有隊伍捕你們，趕快到艙里去吧。”可兒回報，我始放心。

陳、林所派的隊伍，明知詹、蔡躲在輪上，不能拿捕，遂派兩軍官見我陳說此事。我說：“上輪絕對不能，我辦一照會送領事館，叫領事派員捕來，送我衙門再辦。”我即大聲喚陳秘書來，趕快辦一照會，請日領事館抓蔡、詹二犯，送我究辦。一時日領事回文說，岳陽丸上并無蔡、詹二人（此亦是可兒所授意）。陳、林所派隊伍非上輪船檢查不可，輪上絕對不允，雙方爭執，愈來愈烈。我又使可兒到輪上和船主商量，請其速開。船主說：“在滬應卸的貨物運至上海，回運至滬，如此輾轉，所費水腳八百元，由誰賠償？”可兒告我，我立付八百元，輪即離碼頭而去。三方所派便衣軍隊都來報命，我只好口头上安慰一番。

誰知蔡、詹到沪晤諸同志及中山、克強重要人員說：“耿某为袁世凱所收买，我們过九江，他还派人捉我們，若非日人告知，几遭捕获。”（討袁失敗后，大家都到日本东京，詹大悲在日黑李协和寓中遇見我，尚有余忿，我亦不愿辯白。后由可儿将交涉經過詳細告他，他才恍然大悟，和我和好如初。）

他人听說我为袁收买，都将我痛罵。黃克強听到后，深为痛心，遂写一密函，由日人青木交我。我因当时不便多說，仅复“将来自知”四字。

未几，宁調元、熊越山二人由汉口派专人送来一函云：“刻在德領事館被押，急需用款五百元，請交來人，并再給來人路費一百元”等語。我向來人詢問宁、熊二人為何在領事館被押，彼答不知。我說：“你若告我詳情，再給你一百元。”他才說：“宁、熊在汉和湖北亂黨連絡，勾結軍隊，意图造反。事洩后，黎副總統行文拿捕，遂由德領事在德國飯店拿到，暫在館內扣押，将来或交湖北都督府”云云。我当即交來人二百元，并請轉交宁、熊五百元。

越三日，宁、熊又來函說：“吾輩交誼，尙不抵五百元么？請速交來人五百元，再交來人路費一百元。”我細思前所交五百元大概为來人吞沒，即仅給來人路費一百元，另派陈參謀帶款千元，同來人到汉口德領事館面晤宁、熊二人，如該館人員勒索，即可照給；但如不能見面，此款即不必再交。陈參謀到汉，德領事館果然不准与二人見面，前送之款，皆被領館中人吞沒了。但宁、熊不知此种情况，定罵我无朋友义气。

当时南北情况更形恶劣，一般民党中人逼我起义，袁暗使陈宦連电催我在贛行劫，并說在汉口中国銀行已准备二百万元备用，惟須行劫有效，方准动用此款；并速电复准备情况及发劫日期。

我得此电，知事迫切，即赴南昌和李商議說：“时局万分紧急，宜速决定，不然袁先下手，吾輩恐来不及。”李說：“沪、粵、湘、皖往返电商，尙未定議，現再电决定办法，請你速回九江，先設法应付，两日之内，决定办法，必有电话复你。”

我回九江后，那知唐在礼在溥已候我一日，問我进行若何。我答以“亲到南昌与各方接洽，尙須稍緩数日，望轉稟主峯勿性急”。唐唯唯。

唐回汉后，已知我所說都是假話，电袁发劲。越二日，袁即免贛、皖、湘、粵四都督职矣。

贛事袁本派我专办，后知我靠不住，遂派贛人游說贛众議員欧阳成功其弟欧阳武投降，得其默許，遂罢李烈鈞职，特任黎元洪兼江西都督，欧阳武为护軍使。

因南方尙未决議，李不能不卸职，遂乘小輪到湖口，邀我和李明揚、周璧阶、卓仁执等談話。我們一見都說，現在可討袁吧，再拖延时日，袁定派大兵压境，欧阳武为了清理内部，也会收拾我們。大家議論极为激烈。李說：“外面局势实在弄不清楚，到上海后再和孙、黄諸要人商議，并詢各省意見，再行发劲。”众說，若是一班要人不愿发劲，我們也不愿在此受人的气，只好辞职，走远方隱居了。李說：“如現時不发劲，我定电知你們，大家到外国观察一时，将来总有事做。”大家总是憤恨填胸，不能平息。翌日，李乘輪赴安庆晤皖督柏文蔚，我們返回九江。

先是，宋案发生后，袁知南方人心憤激异常，将来总有一战，遂派二、六两鎮由京汉路南下，二鎮駐汉口（此时黎已降袁，竟人逐黎虽未成功，而黎心惊胆寒，請袁派軍鎮慑地方，兼保护自己，所以二鎮駐汉），六鎮进驻鄂、贛交界的兴国县，監視江西；并派四、五两鎮

由馮國璋指揮，沿津浦路南下，協助在兗州的張勳所部；又令倪嗣冲編好皖軍二十營，駐紮阜陽，以備進攻淮上。

此時四督解職，人心更為忿怒，各處均思發動，潯、湖尤為激烈。袁知非戰不可，而首難必在九江，遂令李純進駐距九江五里余的官排甲，直逼九江。我看勢已至此，無可游移，非戰不可，即使戰敗，亦所不辭。當即一面急電李協和速回主持戰事，一面召集三、六、九團的三個團長開會，商榷夜間襲擊北軍計劃。那知六團團長李定國別有用心，力說日間未曾籌備，夜間不易戰鬥。三、九兩團長因此亦不積極，所以夜間襲擊計劃未能施行。加以陳廷訓亦駐九江城內，屢次和三、六、九團下級官兵連絡。我深恐各團被陳引誘，遂下令各團移駐九江城外的八里坡，聲言防北軍襲擊，城內不好作戰，用意實為防陳。

這時李協和已到湖口，用電話通知我，我將軍情告訴他。他說：“你趕快來湖口商議大事，軍隊可歸方聲濤指揮，他當六、九兩團的旅長；或者能聽他的命令。”

適第八師騎兵團長劉建藩由湘回寧，路過九江，到鎮署會我。他尚不知大局變化至此，我將現勢詳述，并說：“李純軍隊已進逼九江附近，李協和已回湖口，非戰不可。聞陳叔良（名之驥，八師師長）尚主慎重，不過戰端一開，我和御秋（冷遯宇）皆在局中，八師官兵怎能坐視？若中下級官兵欲戰，上級制止，恐鬧成火并王倫的局面。你和陳等交情尚洽，八師中下級官長皆是廣西同盟會會員，隨我等由桂林援鄂的同志，必能聽你老分部長的命令。你要苦勸陳等和中下級官兵合作才好。不然的話，我或御秋隨便派一人去說。我們都加入戰鬥，你們迅速響應，必皆聞聲而起，那時你處在兩方相持的局面，稍有不當，恐怕你的一生名受到損失，不如事先商妥，臨

时不至张皇，你以为何如？”刘团长沈吟少許，遂說：“你說得很对，我就回去准备，我就不坐了，上輪走吧。”說毕就要出門。我說：“我也要到湖口，协和叫我去，大概商議发动事，不过一二日就要动作。”于是我們二人同出門至碼頭，送他上輪，我僱民船前往湖口。

我至湖口，协和說：“你和各省人士有私交者甚多，先分別发电，說明我們討袁大义，請他們响应，然后我們再发通电，請各省討袁，似易响应。”于是我分电各省友人，說明討袁的大义，請他們响应。

各省复电情形如下：长沙譚祖菴和岳州赵恆惕复电大意相同：长沙軍械局被奸人放火，把軍械子弹尽行焚毀，不能作战，心有余而力不足，实在慚愧。徐州冷御秋复电：刻下各团正在各地剿匪，实难集中备战；万一开战，亦只有拼之而已。寿州张梦杰复电：械弹两缺，不得已拼之而已。南京陈叔良复电：本师仍持稳健主义。杭州呂公望复电：現势险恶，总望調和，不要固执己見，以大局为重。广州陈炯明复电：現已准备妥当，兄处发动，弟即繼起。（以上各电，均系大意，原文不能記憶。）其余各省均无复电，大概已被袁收买，或者受袁威胁，心虽惧袁而不敢发，只得暫作旁观，看形势如何再作决定。

事已至此，只有前进之一法。李在上海时，和各方代表商妥，推他为长江上游討袁軍总司令，請我为长江上游討袁軍司令部參謀长；任林虎为左翼司令，指揮一、二、七团攻击在十里鋪的北軍；任方声涛为右翼司令，指揮三、九、十团攻击在九江城南的北軍；任何子奇为湖口守备司令，指揮十团的一营和水师各部。

一九一三年七月十二日为起义日，左翼軍林虎司令早已由德安进驻沙河，距北軍只有九里，是日拂晓发起攻击，战到十点左右，敌被击潰，退至賽湖附近，我軍占領瓜子岭。右翼方声涛即在八里

坡附近和敌相遇，战斗极烈，九团团长周璧阶阵亡，兵士惊慌，幸赖十团团长李明扬维持战线。日暮，敌军拟退却时，用炮连放十数响，声音颇大。赣军兵士素未听过这样大的炮声，不知所以，忽然乱退。官长喝令不许退却，亦不能制止，竟退至沾塘。

江西战端已开，黄克强、蔡子民等由沪到南京，拉着陈之骥到都督府，要求程德全独立。程初不允，经再三软劝硬逼，才发通电宣布讨袁。程本多病，言语不能发声，全赖秘书看其嘴角动作而猜其意旨。程又坚请回沪调养，遂推黄兴为总司令。

袁知南京独立，遂令张勋所部和第五镇联合进攻徐州。黄电冷师长迎战，惟冷部仓卒未能集中，只好一面应战，一面召集零星队伍加入，战况甚为不利。黄令第八师出援，由骑兵团长刘建藩率步兵二十九团、三十团一营、机枪两连、炮兵一营增援，酣战半日，将张勋所部和第五镇击溃，退至兖州。后因扬州徐宝山之弟有不稳消息，又将刘部调回蚌埠，监视徐军。

徐宝山本为盐梟，占据扬州，扰乱盐政，极为地方之害。他乘独立的时机，乱招土匪，有万余人，编为二师，自称军长，后又投降袁氏，与民党作对。愈谓此人不除，为害不浅。闻徐最爱古董，遂使福建陈某（忘其名）造一伪装古董的炸弹，准备派人送去，将他炸死；并开秘密会议，问谁愿去。广西柳州人罗方侯（此是号，名亦忘记，系在桂林入同盟会者，后改叫秦明，一九二一年我到柳州，曾相遇，并劝其出来做事，他表示甘愿为农夫）表示愿往。他到扬州后，直到徐宅。他本拟当面将炸弹打开，和徐同死。适徐正睡，号房说：“暂放此处，候军长醒后再呈。”罗说：“此物极贵重，你们不能开视，非我自开不可。”他告号房住何旅馆何号，军长醒后，通知他再来。不一时，突闻一声巨响，房屋震动。他猜想必系徐开视古

蓋，触发炸弹爆炸，急跑至徐寓附近視察，房屋已尽焚毀。罗見目的已达，急覓輪到鎮江轉至九江，向我备述詳情，同居月余，适广东有友函邀，遂分袂矣。徐宝山被炸斃后，袁遂委其弟(忘其名)代为軍长，接統其部队。

右翼軍退至沽塘，第九团官兵在夜間乘民船偷过湖口，向九江敵軍投降，只剩三团和十团的一部，連夜挖筑工事，以备防御。余維謙旅长带四团来援，但該团皆系新兵，不能作战。翌日，敵派大队和大炮来攻，我方仅能保持战綫，不能出击。

湖口方面，敵派七只兵艦和陸軍一旅，联合进攻甚急，終被攻陷。何子奇司令率所部由鄱阳湖东岸繞道乘民船退至吳城；沽塘后路临鄱阳湖，受敵艦威胁，只得退至吳城。右翼軍既退，敵軍集中全力，十倍于我，压迫左翼軍。左翼軍以右方空虛，亦不能不退至建昌。右翼軍由吳城开至山下渡，拟和左翼軍联络，而鄱阳湖又有警報，不能不将右翼軍撤至樵舍巩固湖防。又聞林率第一团和机枪、炮兵向乐化退却，使七团防御乐化，右翼軍又退至王家渡。总司令部移至南昌北門外輪船上。

李协和向我說：“我們自湖口失守后，两月以来，各省战况毫无消息，請你赶拟一电与譚祖菴，請他速告各省战况，以便再作計劃。”我立即拟一电发出。譚复电大意謂：“湘省自軍械局焚毀以后，不能作战，专听各省捷音。惟皖省淮上，仅有接触，即告失败。現仅龔振鵬在蕪湖，亦将失败。苏省初战甚利，后因主张不同，无形停止。現第八师不甘罢战，又举义旗，由何海鳴领导，与张勋所部酣战于南京附近，但成弩末，亦难持久。粵省龙济光由梧州率軍直下广州，粵軍望风而逃，早已平靜。大局如此，兄等可早抽身，弟所以在此赧然暫留者，实为兄等留一条路耳，望速来湘，再俟良机，把唔

非遙，余容面罄”云云。

我得电后，正和李商議办法，忽报乐化七团已潰退，王家渡被敌親占領，牛行岸上放炮数声，細看有軍隊数百，紅旗两面，正是敌人的旗帜。又見河中船只都往上游开走，岸上的軍隊亦向南昌城南奔跑，总司令部的小輪只好随众船而行，至滕王閣前，秩序紛乱，不能停輪，只好再向上游行駛，到漳树鎮，始能停泊。但見兵士散乱，如丧家狗，仍是不便在此久停，遂令开至临江，始見平靜情况。

休息片时，我見李在观看地图，我問他何意，他說：“我們的兵真不成为軍隊了，一聞炮声，就是乱跑，不听命令，現在一哄而散了，只剩下我們这些人，还能討袁么？依我看，我們上山当土匪吧，如此下場，真是慚愧。”我說：“你看地图，大概是想当土匪。我觉得現在袁氏气候正盛，我們干什么也不行，不如找个安全地方，等待时机。再过二三年，袁氏觉天下平定，就要发野心做皇帝了。那时普天之下，都要反对他了。到那时候，我們乘机而起，召集旧部，与各省联合，再喚起民众一致声討，定可成功。况且譚祖菴在长沙滯留，专為我們准备一条路，我們不能辜負他的好意。”李說：“如此了局，实在慚愧。”我說：“勢已至此，現时尚有何法？俗說‘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何况决到不了十年，不过二三年間，再看勝負吧。”

休息一夜，次早順着大路而行，三日到袁州。此处尙有銀行一所，据該行长說，行內尙存現洋两万余元，票子十余万元，不如提去，暫以維持在外生活。李說：“此次討袁失敗，使江西父老受战禍的痛苦，已經慚愧万分，如更將江西的金錢拿去，不是更添罪孽，受人唾罵么？不如仍存銀行，为江西留一点元气。”行长說：“你們不拿，还不是叫敌人拿去么？”我說：“这是个人天良，不能顧及他人。”

本晚即宿在行里，李說：“我們行动，总得光明磊落。从前討袁

會通電各省，申明討袁大義，現在失敗，也不能銷聲匿迹，應該再通電表明態度，方是政治家本色，你就擬一電吧。”我隨擬一電，請李修正後發出。通電的大意，先述討袁大義，次敘作戰經過，終敘失敗後將殘破軍隊遣散，不使擾亂地方。最後幾句，尙能記憶，是“贛軍散矣，嗣後共和與否，一凭袁氏天良，銜血共和，誰負維持之責，區區之忱，尙祈亮察”。

翌日，至安源乘火車至長沙，晤譚組卷，暢談數月情況，深愧我軍訓練未精，民氣未伸。

越三日，乘武陵丸赴漢口。船靠漢口碼頭時，本想下輪訪晤前年共抗北軍的好友。日人日野突來說：“碼頭上黎派許多偵探，正想捕拿你們，尙能下輪么？暫在輪上休息，將來下輪，尙須另想辦法呢。”我總覺黎宋卿和我們尙有交誼，諒不至如此無情。當初漢陽失守，黎逃至葛店，我和協和帶兵援鄂，他才敢回武昌，所以後來他每次晤談，總是說感激的話，並請吃西菜。現在我們戰敗，他真就反臉無情么？後來據鄂省的友人說，我們才到長沙，黎就電譚捕拿我們；我們乘武陵丸到漢時，黎早派數十人在碼頭等候。黎的參謀長金永炎曾勸黎說：“李、耿援鄂，都有大功于鄂，且和你有不平常的交誼，何必這樣認真呢？況且政治問題是無定的，將來的勝敗誰能決定呢？加以日人竭力保護，你能不願治外法權，上輪抓他們么？”黎說：“此等亂黨不除，中國沒有安靜之日。湖北起義，各省響應，都是此輩所造，若不歼滅淨盡，中國還有安靜的日子么？”金永炎听黎說出這樣無情的話，只好嘆息而已。晚十時許，忽有日本小火輪靠在武陵丸船邊上，青木、可兒等將我們當病人，把頭蒙住，扶着下船上了小輪，开到劉家廟，又把我們請上野村軍艦，艦長佐藤極表歡迎，并言擁護共和，虽至戰敗，也是光榮。我們只有說慚愧

而已。翌日，野村軍艦送我們至大冶，請我們上岸到大冶鐵廠辦公處暫住。處長是日人西澤，亦表歡迎。該廠和漢陽兵工廠、萍鄉煤礦，系前清兩湖總督張之洞所創辦，號稱漢冶萍公司，後清廷因借日款，押給日本，即由日人西澤經理，廠內任何事情，清廷不能干預，所以我們在此勾留，袁、黎即使聞知，亦不能捕拿我們。住五日，即乘運鐵往日本的輪船往日本避難。

輪至南京時，兩岸寂然無聲，想第八師的同志們亦完全失敗矣。回思數年來大家費無數的心血，造成此一支革命軍隊，現在一旦喪失無餘，所有官兵不知流離何所。悲忿交加，不覺淚下。次日，出吳淞口，過黃海至日本門司上岸到東京，作起亡命客來了。

我等起先默察列強對我革命黨的態度，認為德、英極端仇視，法、美純取旁觀。惟有日本獨持“友好”態度，我們的函電肯代為交遞；袁的軍情，也肯告知；作戰計劃，又加幫助；失敗後，仍竭力“保護”，處處便利我們，大家都是感佩不已。後來方知袁氏對我們的計劃，日人固通知我們，而我們所有的計劃，他們也通知袁氏，使雙方勢成水火，愈鬧愈凶，以便從中坐享漁人之利，其用心陰狠可見。

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

馬 湘

(一) 中山先生到美国巴索

我第一次得見孙中山先生，是在美国的巴索。我是广东省新宁县(今台山县)人，少年失学，十五岁即离开家乡，到美洲墨西哥謀生，在一間外国人開設的餐館傭工，后又轉到美国巴索的一个农場做工。一九〇九年，中山先生来巴索从事革命活动，受到当地大部分华侨尤其是致公堂的热烈欢迎。中山先生在由当地华侨領袖和致公堂首領召集的华侨大会上发表演說，把清朝入关压迫殘害汉人的史实以及种种昏庸腐敗的情况对到会羣众作了詳尽的叙述，并指出我們中国眼見就要被列強瓜分共管，全体同胞必須立刻起来推翻清朝，才能挽救危亡。这次演說足足說了三个多鐘头，言下义憤填膺，慷慨激昂。听說的人个个都非常感动，我也激动得流下泪来，恨不得立即回国去和清政府拼个死活。

当天晚上，华侨团体公議中山先生，我也参加了。入席时，各华侨領袖和致公堂首領紛紛簇拥着中山先生，推他坐首席。我看見中山先生就座后，立即跑到他跟前，很恭敬地叩了一个头說：“我要跟随先生革命，替先生挽皮包。”中山先生說：“革命？革命是会杀头的，你有这个胆量？”我答道：“杀头？杀就杀，我不怕。我們同

胞兄弟三个，杀了我，还有两个兄弟侍奉父母；我又还未娶妻，没有子女，怕什么？”中山先生说：“好，好！你有这样决心参加革命，很好。但你替我挽皮包，我却沒有錢給你工資啊！”接着又說：“我可以写信介紹你到日本找陈少白、廖仲愷和朱执信等人，跟他們做革命工作。”我得先生允許我参加革命，高兴异常，就准备搭船往日本。有一天，我往見先生。他告訴我，将要往加拿大联络华侨，鼓吹革命。这时我的父亲馬厚庶在加拿大温哥华經營商业，是加拿大洪門（即致公堂）首領，也是当地华侨領袖，可以助中山先生一臂之力。因此，我把父亲在加拿大的情形告訴先生，并写了一封介紹信，請他到加拿大时找我父亲。

（二）中山先生号召美洲华侨回国討袁

我在美国巴索拿到先生的介紹信，正欲到日本去見廖仲愷、朱执信和陈少白等参加革命时，不料美国政府在巴索大捕沒有出生証的华侨，有三百多人被捕驅逐出境，用船送回上海，我也是其中之一。船过日本时，因被驅逐出境的一律不准上岸，我既不能登岸，只得到上海后轉回家乡。我在家乡住了两年以后，又到加拿大的爱孟頓，在一个农場里僱工，每日不是耕田就是打猎。我乘机苦练射击，不到两年工夫，发枪就沒有不中的了。

一九一五年冬間，一天早上，卖报纸的人特別喊得起劲，买报纸的人也特別踊跃。原来报上发表消息說，袁世凱要做皇帝，中山先生号召华侨回国参加討伐袁世凱。我便决意回国，实现我跟随中山先生革命的志愿。随后又得知中山先生派夏重民和胡汉賢組織华侨敢死先鋒队，在域多利埠的新民国报館設立机关，并由胡汉賢和蔡鶴朋在爱孟頓成立一个軍事社，进行訓練。我便和黄惠龙

一齐报名参加，总计参加的共有五百人。我恐被父亲知道，受到拦阻，报名时化名为黄升。

討袁敢死先鋒队成立了不久，奉中山先生电召开往日本横浜訓練；过了五个月，又从日本横浜調到山东濰县周村。各队员都没有枪枝，只配备四个炸弹，在对襟衫上标着“华侨敢死先鋒队”几个大字。当时中华革命軍东北軍总司令是居正，副司令是許崇智，华侨义勇团团长是夏重民。我們在濰县訓練，正要出发进攻山东省会济南的时候，袁世凱突然死了。华侨討袁敢死先鋒队奉中山先生电召，开往上海集中。我們几百个队员到了上海后，都住在徐园招待所。中山先生亲来慰問，并对全体队员演說，一連講了四小时，散会后又到张园款待全体队员。后来他又派廖仲愷到徐园慰問各队员，并发給每人大洋三百元。当时我用不着这么多的錢，因此就没有要。

廖仲愷来慰問时，問起我的姓名。我說：“我原名馬湘，在加拿大受孟頓参加敢死队时，是用化名黄升报名的。”廖仲愷答道：“中山先生叫我来找你。他还說：‘演說时看見一个人身材不高，好象是在美国巴索会过的馬湘，如果是他，带他来見我。’現在請你随我去見中山先生吧！”我听說之后，十分高兴，便随着廖仲愷到环龙路六十三号中山先生的寓所去。

中山先生一見面就指着我說：“你是馬湘吧？我在美国巴索見过你。你昨天很用心听我演說，我估計一定是你了。我和你父亲馬厚庶是旧好，你是我的世侄，你来了很好，就住在这里吧。以后見我可不用通传。”我很愉快地答应了，便退出来。

我奉命之后，馬上从招待所搬来中山先生的住宅里。从这天起，我就跟随着先生，先后担任卫士、卫士队长和副官等职务，一直

到先生在北京逝世为止。先生在上海居住时，原来担任卫士职务的只有馬伯麟一人，自我到来后，便有两个人了。

(三) 中山先生在上海的生活

孙中山先生住环龙路六十三号，馬伯麟、朱执信、廖仲愷和我都一起住在这里。对門四十四号是办公的处所，也是陈少白和秘书連声海的寓所。经过两个月后，有四位旅美华侨来見先生，出門时拉着我談話，問我姓名，接着便說：“孙中山先生住的房子太不象样了，是他自己的么？”我答道：“不是他自己的，他哪里有房子？这房子每月要付出租金六十五元。”他們齐說：“世界上只有孙中山是好人，那里有做过惊天动地大事业的人連住的房子也沒有呢？我們一定要替他想办法。”他們說完之后就走了。

原来这四位归国华侨，集合了許多股本，准备在上海开化妆品工厂。他們自从見過先生后，知道先生还是租房子住，便开了一个股东會議，提議拿出一笔錢购置一所象样的住宅送給先生。各股东都一致贊成，就买了莫利爱路二十九号一所住宅，一切家具陈設以及花园里的花木和网球场等都布置得很整齐美观。于是他們再来拜訪先生，并說明来意。中山先生說：“送房子給我么？不可！不可！我怎能接受你們这样重的礼？”经过他們十分恳切的劝說后，先生觉得不好推辞，便从环龙路迁到这所新房子来。

先生每天的生活很有規律。清晨起床后常常和夫人在花园打网球。早餐后就开始办公。他常常和朱执信、廖仲愷、陈少白等聚談，又喜欢与章太炎等研究学术。晚上多是閱书、讀报，或是写作，每每至夜深十二时才就寝。

那四位归国华侨創办的上海化妆品工厂开幕时，他們請先生

蒞臨指導。先生到廠參觀後，對各創辦人能夠回國興辦實業極為嘉許。他還對職員工人作了演講，大意是說：“中國實業極為落后，即如此種化妝品工廠，本來不需很多資本，機器亦不複雜，但經營此種工業者仍不多見。”他勉勵各股東和工人爭取更多的海外同胞回國興辦實業。全體員工听了都非常興奮，鼓掌之聲常常把先生的演說打斷了。後來全廠員工都加入了國民黨。

那時在北四川路有一家廣東館子叫趣樂居，生意十分發達。經理孫陸洪與先生同族，他曾介紹過五十餘人來見先生。後來這五十多人都加入了國民黨。我和孫陸洪相熟以後，便勸他把趣樂居的贏利撥出一部分來組織一個工界協進會，並開辦工人子弟學校、醫務所，使工人子弟有書讀，患病能治療。我隨將這個意見告知先生，他認為很對。後來孫陸洪請先生到趣樂居吃飯，並把我勸他組織工界協進會的事告訴了先生，並對先生說，他本人也很願意這樣作。先生對他極為嘉許，並請他從速進行。不久，這個工界協進會便成立了。

上海廣肇公所，產業極多，由溫宗堯、劉維熾和陳興漢三人為公所總理。他們入息甚豐，不特個人生活豪奢，而且往往巧立名目，將公款隨意開支，議會頻繁。先生為了糾正他們的錯誤，特把他們請來談話，指出他們各人都有很多收入，在社會上很有地位，不應濫用公款；要他們將公所的公款辦幾所中小學和醫院，不特使在上海的廣東人的子弟都有讀書的機會，其他外省學生亦可一併招收；有了公醫院，貧苦病人就可以得到治療。先生並進一步對他們說：“趣樂居一家商店就能組織工人協進會，創辦一些社會服務事業，你們應該很好仿效。”不久他們就遵照先生的指示，把中小學和醫院辦了起來。

先生的生活非常俭朴。他家里平日有好几个人用膳，但每天菜金不超过二元。有一次唐紹仪来訪，暢談之下不觉已至中午。先生留他午飯，吩咐我去趣乐居买了一只卤水肥鸡来待客。唐紹仪很快就把鸡吃完，还以为尚有其他餽饌。中山先生見他还在等待上菜，便說：“簡慢得很，没有什么好的菜款待。”又問我說：“馬湘，还有什么菜？”我答道：“厨房里只有咸魚。”先生便命拿上来。唐紹仪一边用咸魚下飯，一边說：“我太吃慣了。一只肥燒鵝，我一餐可以食完，因此家里虽只有几个人，每餐菜錢便要十元啊！”

有一次，伍廷芳、伍梯云和唐紹仪几个人一起来，先生留他們吃晚飯。伍廷芳說：“我每日喜食花生、甘薯、鸡蛋和一些鮮魚，不慣食肉，还是让我回家吃飯吧！”先生也不加以強留。

林煥庭某次来見先生，报告华侨汇款来的事情。先生說：“好！款存在你处吧！”有一天，先生、夫人和我到林煥庭处取了百多元，緩步走到棋盘街，走进一間旧书店里，选购了一大堆綫装书。我将带来的大包袱把书包好，但是太重了，不容易拿回去。我便对先生說：“可否雇一部馬車搬回去呢？”先生說：“好，这样重的书籍背着是不好走的。”說着把手向衣袋一摸，又說：“錢已經买书用完了。”夫人也說身上沒有錢。先生問我身上有沒有錢，我說有四角錢，遂雇了一部馬車回去。先生隨即命林煥庭购置书櫥，并和夫人把书籍分門別类地放在櫥內。

先生有一次还帶着我雇了馬車到北四川路购了一大批外文书籍和制图仪器等物。他常常繪制地图，哪里應該筑铁路，哪里應該筑公路，哪条河流應該怎样改良和怎样利用，哪里有什么矿藏，哪里應該修建什么商港和軍港等等，他都陸續詳細地繪出图来。原有繪图仪器很粗劣而且多有損坏，因此又购了一批仪器回来。

上海有一位裁縫師名叫王亨利，先生到他店里定制一套西服和一件大衣，并留下了地址，吩咐他制好了送来。不到三天，王亨利便把衣服送来。他看見先生，必恭必敬，露出十分榮幸的樣子。夫人把价款給他，他不肯收受，一定要把衣服送給先生，表示一点敬意。先生自然不肯随便要这几件衣服。王亨利又誠懇地說：“些少敬意，請賞臉收了吧！这些衣服是我十分用心制成的。”先生覺得他如此誠懇，便点一点头，表示接受。王亨利又說：“可否亲笔写‘王亨利’三个字給我印名片？”先生便写了“王克利”三个适合印名片用的字給他。王亨利万分欢喜，拜謝而去。

上海永安公司大部分都是澳洲华侨股本，經理郭彪时常来拜候先生。有一次郭彪叫人送一件上好的毛皮大衣来，我轉报先生。先生驚訝地說：“上海不算十分冷，回广东更不冷，我又不到北方去，我不受他的，你拿回去还給他吧！”我便拿了这件皮大衣，找着了郭彪，对他說：“中山先生多謝你，但皮衣先生不需要用，命我送还給你。”郭彪只得收下。隔两天，郭彪又来訪。中山先生对他說：“永安公司生意十分好，获利甚巨，希望能够将賺得的資金拿来办工厂、办实业，并希望你們也能号召各地华侨拿出更多的資本，回国开办工厂、农場和兴办各种实业。你送給我的皮大衣，我不应收領。如果是永安公司送的，永安公司是股份生意，也不可拿股东的錢来送禮。如果是你送的，更不應該。你把这大衣卖给外国人，可以获得厚利。我的衣服足够御寒，更不需穿这样华貴的大衣。我对你的誠意十分感謝。”

上海先施公司經理馬应彪、大新公司經理蔡昌同为香山县(即中山县)人，郭彪对他們說：“孙中山先生为中国唯一的伟人，又是我們的同乡，你們为何不去見見他呢？”馬、蔡两人都十分希望能見

到中山先生，只是沒有机会。后郭彪用电话找我，說馬应彪、蔡昌希望能来拜見先生，請先生給他一个日期。我接电话后便轉报先生。先生說：“我每日都开会，有暇时再通知他們吧。”

某天，一位美国中将請先生到他住所晚餐。先生雇了一部馬車，着我跟随，按时前往。将近到达时，忽然坏了一个車輪，天又下起大雨来，車中只有一柄雨伞，便由我撑着雨伞遮着先生，冒着大雨前去，虽然路途不远，但衣履都湿透了。我跑到門前把电鈴一按，沒有人开門。停了一会，再按一下，有人来开門了，但只开了一道縫，向門外张了一张，便又把門关了。我从短墙上望見一个外国人才站在台阶上向外面张望，遂用英語对他說：“孙博士来了。”这个外国人才跑下台阶，开門让先生进去，并和先生热烈握手，表示欢迎。进門后，門房問我孙博士是什么人，我說：“孙博士你也不知道么？他就是孙文。”这人惊奇地說道：“原来就是报纸上常常登載的孙文，他为什么不坐汽車来呢？到这里訪問的人沒有不坐汽車的，刚才門鈴响，因沒有听到汽車响声，我还以为是頑童作弄，所以沒有开門。”我騙他道：“原来是坐汽車来的，但到了街口汽車坏了。”餐饭后，美国中将送先生出門，并准备用汽車送先生回寓。先生說：“謝謝你，不用汽車了，我还要到离此不远的地方找一位朋友。”这位主人十分恭敬地送先生出門，握手告別。这时雨也止了，先生便步行回寓。

有一次我跟随先生步行至愚园路，他忽然指着路旁一幢幢的洋房对我說：“你看！愚园路这一带地方，以前都是坟墓，現在都是华丽的洋房了。这些洋房都是我国軍閥建筑的。他們割据地方，橫征暴斂，开烟开賭，无恶不作，吸尽民脂民膏，来到这里盖起洋房，娶小老婆，打麻雀牌，飲洋酒和吃大菜，弄得工人农民都吃不飽，穿

不暖。这样，中国还能不亡国？所以我们非打倒军阀不可。”

有一次，先生偕同夫人、陈少白、李謀之和黃大伟夫妇从上海乘火車到杭州西湖游玩，我和黃惠龙跟随护卫。先生戴白通草帽，穿白夏布长衫，携手杖，还戴上深色墨晶眼鏡，以免惹人注意。到了杭州下車时，忽有警士三人时前时后地跟着走。先生带同各人来到李謀之的別墅“李庄”，两个警察又跟踪而来。我問他們有什么事情，他們說：“我們是来保护貴人的，我們已有一个警士返区署报告了。”我便入內对先生說：“有两个警察从車站跟着我們来到这里，說是要来保护貴人的。”先生說：“蠢仔！有什么‘貴人’？”說毕便跑到門前对警士說：“警察职务是維持地方治安，我是一个平民，为何要跟来保护？快回去执行你們的任务吧！”正說話間，杭州警察厅长率同警士十人前来保护。先生吩咐他不要告知別人，并叫他們从速回去。先生在杭州游玩了三天，才回上海。

每逢端午、中秋、国庆和新年，总有一百几十个人先先后后地来拜候先生。这些人多数都口口声声說，他們从前追随过先生革命，把私人的财产弄光了，現在不特沒有得到好处，而且生活十分困难，請求先生資助。先生識透这些人生活实际上并不困难，不过是假冒对革命有功，企图騙取資助而已。有一次有五个这类人来，装起愁眉苦脸对先生訴苦說，几天沒有飯吃了，請求帮助些生活費。先生說：“你們肌肤丰满，面色紅潤，而且衣履齐整，那里象几天沒有吃飯的人？我每天虽然吃三餐，气色还不及你們丰满哩。”他們知道先生不可欺，便告退了。以后我因为每逢年节，都有这班无賴来囉嗦，便約同黃惠龙对先生說：“我們打算以后不許这些人进来，把他們驅逐出去，好不好？”先生答道：“其中也有真的为革命出过力，而且生活确是困难的。不可这样做，我不会感到麻煩的。”

(四) 中山先生南下护法

一九一七年北洋軍閥段祺瑞破坏約法，先生号召国会議員及北洋海軍往广州組織护法政府。国会議員及北洋親队均紛紛表示响应，相率集中上海，待机而动。惟当时財政支絀，且一时尚不能解决。这种情况被哈同(犹太人，上海大富翁)得悉，他遂向其好友曹亚伯說：“中国已經大乱，非孙中山先生莫能为力，若中国衰亡，我在上海亦不能立足。現孙山中先生財政有困难，我极愿助一臂之力。”曹亚伯将哈同的話轉告先生(曹亚伯为归国华侨，原籍湖北，亦为老革命黨員)。翌日，哈同請先生，先生偕同夫人前往，我隨行护卫。同席者还有曹亚伯。席間哈同表示极愿帮助先生南下护法經費，先生极为嘉許，但表示拟作为借款。哈同表示捐助此款，出于他的誠意，不必作为借款。中山先生以哈同如此誠懇，便允了。翌日曹亚伯來訪，并带来五大麻袋鈔票。先生命曹亚伯用电话向哈同致謝，并告知明日即离开上海。

先生命吳景濂、林森二人管理財務，率領參众兩院議員和北洋親队南下，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一日抵达广州。五月十九日，程璧光发表海軍护法宣言。八月十一日，国会在广州开会，制定护法軍政府組織大綱，选举先生为海陸軍大元帅，設大元帅府于广州河南士敏土厂。

桂系軍閥莫榮新当时任广东督軍，手握广东軍政大权，开烟开賭，濫收捐稅，弄得民不聊生，土匪遍地。广东人对他非常怨憤，广东总商会、慈善团体、各界团体及社会知名人士曾召开秘密會議，选出代表十五人向先生請愿，要求撤換莫榮新。各代表入見先生时，均肃立不敢就坐。先生很客气地請他們坐下，并吩咐勤务端茶敬

烟。各代表向先生陈詞，請求大元帅懲办莫荣新，挽救广东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先生接受了他們的請求，表示一定想办法挽救广东同胞。

一九一八年一月三日，先生派北洋親永丰、楚豫和永翔三艘从黄埔駛入省河大元帅府門前。先生率同參軍和卫士登永丰親，向二沙头进发。此处岸上原駐有桂軍炮兵一營，乃向之作試探射击，岸上并无反应。先生即命參軍郝耿寰帶領少数士兵登陸。郝耿寰登陸后，只发觉有徒手桂軍十余人，或坐或臥，各堡垒中之山炮均繳去撞針，亦无炮弹。先生續命各親再进至大沙头。大沙头原有桂軍一團駐守，此时亦无举动，而且隱蔽甚周，不能发现目标。先生遂命各親向督軍署、越秀山及各桂軍駐地发炮轰击，連續五十余发，均未見还击。先生于是說：“黃惠龙！馬湘！你們到大沙头搜索！”我答：“我們二人只能夠带手枪。”參軍郝耿寰也連忙向先生說：“万不能，万不能。桂軍在大沙头必有准备，而且現在潮水已退，虽舢板亦不能靠岸，沿岸泥濘沒膝，又不能涉水前进，牺牲二人，实在无益。”先生用望远鏡細察，果然发现有机枪障地隱蔽于丛莽之中。郝耿寰續向先生獻議，謂时將入暮，而且下雨，請回大元帅府从长計議。先生遂率同各親长及參軍、卫士返回大元帅府。是晚开会，至十时散。

翌日，莫荣新身穿白夏布长衫，手执长烟杆，来見先生。我引莫至副官室，并說明自己有拱卫大元帅的任务，所以對於来見的人都十分注意。我一边說，一边拿起莫之烟杆烟袋留心細看，又問他还有什么东西带来。他明白了我的意思，便站起来双手把自己身体由上向下扫了一下，并說：“沒有其他东西，請你搜查好么？”我笑着說：“莫督軍，那里需搜查啊！”我觉得他所穿衣服甚少，白夏布长

衫又是半透明的，實在不能暗藏什麼武器，遂請他入見。先生與莫榮新相對而坐，郝耿寰坐先生右側，蔡公時等四五人站在先生背後，我在門口站崗。先生對莫榮新說：“我為什麼要用大炮轟你？因你執掌廣東軍政大權，弄得民不聊生。國家的主人就是人民，你將主人如此虐待，實在違法亂紀已極。你知道麼？現在廣東同胞有代表來見我，要求將你從嚴處罰。”莫榮新很恭敬地回答：“是我的錯，我辦得不好。我來時沒有坐汽車，沿途步行觀察市面，覺得甚為蕭條，烟賭林立。我回去必定要大加整頓，不負粵人之托。”先生望着郝耿寰說：“郝參軍，你可和莫督軍談談。”郝耿寰遂將大元帥府經費支細、各職員每天每人只發伙食費四角等等困難情形向莫說明，請他將廣東財政收入撥出一部分作為大元帥府經費。莫榮新立即應允，並說：“大元帥有命，我一定服從。”郝耿寰又問：“既然應允支援大元帥府經費，可否立即派員跟隨莫督軍回署提取？”莫榮新又立即應允，連說：“好極，好極。”郝耿寰即請參軍蔡公時、庶務陸華軒隨莫到督署提取。

副軍司令李福林派了胡新率領步兵一連，為大元帥府衛兵。莫榮新用港幣五百元及以團長任用為餌，引誘胡新，使其行刺先生。胡新竟為所誘，遂於某日深夜十二時，身穿便服，攜帶駁殼手槍二支，來至先生寢室樓下，見有衛士守衛，遂退去，如是者幾次。有一次胡新又來，竟欲登樓。我發覺後，立即上前制止，並說：“大元帥吩咐就寢後無論何人都不准上樓。”胡新詭飾是來護衛大元帥的。我說：“大元帥府的警戒是你的任務，應在府門外四周執行。大元帥辦公和睡覺的地方，有衛士負責，你不能隨便深夜穿便衣攜帶槍械來到這裡。”胡新不敢再辯，只得退去。翌晨，先生問：“馬湘，你深夜與何人爭論？為着什麼事？”我便把胡新深夜進來和與他爭

論的經過說了一遍，并說：“胡新这人是李福林派来的，李福林是贼头出身，难保胡新不是坏人，我极为怀疑这个人。”先生遂命我打电话請李福林来。李福林接电话，問大元帅找他有什么事。我答：“大元帅没事，就不找你了”。不久，李福林乘小电輪到大元帅府門前，刚上岸，望一望卫兵室說：“刁那媽！胡新那个契弟去了哪里？”这时先生正在开会，我遂領李福林到副官室稍坐，請他候一候，并对他說：“我不識字，你也不識字，什么礼法我們都不知，但是見大元帅时就應該恭恭敬敬的啊。”李福林很高兴地回答：“刁那媽，好在你講明白，你唔講，我就乜嘢都唔識。”中山先生會議完毕，我报知李司令已到。先生命請他进来，并吩咐我站在身旁。李福林进来坐下，挺起腰，双手放在膝上，状貌十分恭敬，随說：“大元帅有什么吩咐？”中山先生說：“你今天精神十分好。”李答：“都和平时一样，不过今天刚剪了发。”接着先生便問他：“你的部队有沒有訓練？”李答：“极少，极少。”先生又說：“你派来守卫的士兵，我很少看見他們出操。我的卫士天天都由队长卢展柳率領操練。胡新連长近来的举动行为，你知道么？你要問一問馬湘才好！”李福林請我告訴他。我就把胡新如何深夜便衣携械欲登大元帅寢室的情形，詳細地說了一遍。李福林听罢，勃然大怒說：“我几乎被胡新害死。”我問李福林有沒有发給胡新两支駁壳手枪，李福林只說发过大号左輪一支。先生說：“登同（李福林字），你好好地查明胡新这个人。”李福林出来，我劝李对胡新不可动火，可一面請胡新飲酒，灌醉他；一面派得力人員搜查他的住宅，这样就容易把这事查明。李福林連說：“使得，使得。”后来我接到李福林电话說，他依照我的办法去做，一面請胡新晚膳，一面派人搜查他的住宅，果然查获莫荣新收买胡新的确凿証据，当即将胡新扣留枪毙。

桂系軍閥盤踞廣東，勾結北洋軍閥，收買南下護法的國會議員和北洋艦隊，於一九一八年七月五日改組軍政府，取消大元帥制，改為總裁制。孫中山先生洞悉其陰謀，認爲護法目的暫時難於實現，遂於軍政府改組之前一日離開廣州，回到上海。

(五) 中山先生回粵任大總統

先生離開廣州到上海後，護法軍政府被桂系軍閥把持。他們表面上掛着護法招牌，實則暗中與北洋軍閥勾結，並大開煙賭，弄得烏煙瘴氣。先生命駐閩南粵軍回粵驅逐桂系，李福林、魏邦平等在境內策應。駐閩粵軍第二軍軍長許崇智派袁德輝爲代表來滬謁見先生，請派得力人員到福建策劃軍事。先生命袁稍待數天，並用電話叫張靜江轉電奉化蔣介石來見。翌日，張靜江來，他說蔣介石因母喪，堅要在家守滿三年孝，才肯擔任職務。先生當即寫了一封信，命張靜江親身帶往奉化交給蔣介石。張臂纏黑紗，趕往奉化，表示愿替蔣守孝，要他立即赴滬。蔣只得隨張靜江來滬。當先生與袁德輝、蔣介石商談時，適有越南歸國華僑譚光漢來訪（譚在滬經營汽車業，常常來見先生）。先生介紹他與蔣、袁相見。談到粵軍回粵軍費問題時，譚表示愿盡力幫助，並贈蔣介石旅費一萬元。蔣乘船至汕頭，協助陳炯明、許崇智策劃作戰。不久，粵軍回師進至增城，李福林、魏邦平乘機響應。莫榮新戰敗，率桂軍殘部退回廣西。

同年十一月，先生偕同夫人乘永翔軍艦回粵，馬伯麟、黃惠龍和我跟隨侍衛。經過福州時，先生曾訪問福建督軍李厚基，約一小時余回艦。當永翔軍艦開出閩江，先生站在甲板上瀏覽閩江景色時，忽然對艦長說：“現潮落數尺，若仍照進口航路開出，必致擱

浅。”言时又以手杖指示方向，把从某处至某处应该靠近某山某岸航行，向舰长指点得清清楚楚。舰长不甚置信，虽然连声说“是，是”，但没有实际照着做。不久，军舰果然不能前进，舰长才不得不表示敬服。他说：“我生长福建，而且出身水师学堂，现在还担任舰长职务，乘船经过闽江也不知有多少次，可是对闽江水势，反不如先生了如指掌。”先生说：“中国各河流及海港，我都有过细心研究。”舰长设法驶离浅沙后，遂依着先生的指示，开出闽江口。

永翔军舰将达汕头，先生说：“这里海鲜甚佳，大家可以一齐上岸用晚餐，尝尝滋味。”舰长听了异常高兴，坚要作东道。于是各人就随着先生登岸，找了一间馆子，共用了十块钱，由那舰长掏腰包。饭后回到军舰，继续向广州航行。

一九二一年四月，国会议员在广东省府财政厅大楼举行非常会议，讨论护法政府组织及选举大总统等重要问题，全国各地都有议员出席。有一位议员在会上反对选举先生为大总统，被议员周震麟用墨盒掷击。及投票结果，先生被选为大总统。

一九二一年五月五日，先生就大总统职，总统府设在德宣路。这一天，全市悬旗结綵，热烈庆祝，农工商学各界团体也都到总统府庆贺，真是旗帜如林，锣鼓喧天，十分热闹。各工会、会馆和武术馆纷纷表演舞狮艺术，各武术馆还表演双人对拆、单人拳棒等国术。先生看得高兴，叫我和黄惠龙也上台耍耍拳棒给大家看。我们都换上精武体育会的练武服装，登上演武台。黄惠龙手握竹节铜鞭，向观众拱手行礼，一连表演了百多节鞭法。接着我也耍了一套八卦剑。各武术馆拳师和观众都纷纷鼓掌助兴。我们表演完毕之后，先生说：“你二人的国术都练得不错，革命军人应该学习这些技术。”

一天，旅美归国华侨陈仪禧^①来见先生。他一见面就说：“大总统，你就是孙文，在美国谋生的唐人没有一个不知道你的。你做大总统，名义还不够好，大元帅名义更不好。最好还是登上皇帝座位，做个真命天子啊！”先生听了，就耐心地把致力革命的目的和封建社会的皇帝是什么东西，向他解释一番。陈仪禧又说：“我的家乡原叫新宁县，现在改叫台山，山怎能够抬得劲呢？还是叫新宁吧！”中山先生又把新宁改名台山的原因和取义告诉了他，并说要代他制订一个发展宁阳铁路计划书，使这条铁路可达大洪古海湾，同时要发展大洪古、广海和闸坡一带渔业。陈仪禧看见先生这样关怀他，十分高兴，要请吃晚饭，先生因事情太忙，没有接受他的邀请。

先生为了贯彻护法主张，决定先行肃清桂系残余势力，然后出师北伐，乃命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率师援桂。粤军所向皆捷，很快就平定了广西全省，陆荣廷等桂系军阀取道越南出走。先生派马君武为广西省长，并决定由桂林入湖南，出师北伐。先生道经梧州稍作勾留。某一天早晨，先生乘山兜（即滑杆）登梧州附近望夫山，视察梧州形势。未及半途，山兜杆子折断。先生率领三十名卫士披荆履险，徒步而登，我佩水壶跟随，历一小时半始达山顶。略为休息，先生使用望远镜四处观看，随看随说：某山应该有煤矿，某山应该是铁矿，某处一带没有树木的是石灰岩，是制造水泥的原料，某处河流如加改良，灌溉附近的荒地，就可成为最好的农田等等。至下午二时，视察完毕，各人四处寻觅比较容易下山的道路。

^① 陈仪禧，台山人，从小在美国某火车站当清洁工人，未读过书，惟对于铁路经营及行车管理极为留心，曾帮助中山先生革命经费，后来募集华侨资金回国投资，创办宁阳铁路。

先生用望遠鏡向山下察看，發現有一處自山頂至山麓都沒有岩石，茅草非常茂密，高可蔽人，但山勢十分險峻，不能步行而下。他遂令四名衛士分作兩批，先由二人臂扣臂地坐在茅草上，象幼兒園學生溜滑梯一般，向山腳直溜下去。約半小時，他們四人都溜到山腳下，站起來用手勢表示沒有損傷。先生遂命黃惠龍在他左邊，我在他右邊，三個人臂扣臂坐在茅草上向下直溜，毫不費力便溜到山腳，不特沒有受傷，而且衣服也沒有破損。其餘各衛士也跟著陸續溜了下來。山腳下是一大片荒地，方圓足有十多里。先生把手一指說：“這塊土地很大，附近又有河流，可惜沒有開墾。”說完之後，率同衛士步行回來，到達行轅，已將入暮。晚上，先生決定明日召集梧州各界人士開大會，討論開發那塊荒地的問題。我勸他說：“先生從早到晚都是爬山和跑路，太疲勞了，可否休息三天，然後再開會呢？”中山先生只答應休息一天，隨即通知梧州市市長戴恩賽於第三天召集梧州各界舉行開發近郊荒地大會。先生還利用休息這天寫了一個開荒計劃。到了第三天，各界齊集開會，先生到會講話，把開墾這塊荒地的重要意義和計劃都說得很詳細，在場的人無不贊成。散會後，先生又命衛士引導戴市長和各界人士到荒地勘察，並把他擬好的計劃交給他們。

一九二一年十月，先生到南寧視察，廣西省長馬君武召集工商學各界開大會歡迎。先生在會上演說，歷時三小時餘。演說還沒有完，先生忽然說：“請大家到外面操場上集合，然後再講。”當時到會的許多人都是破衣爛鞋，甚至還有赤着腳的。先生就說：“看看吧！各位穿的衣服都這樣破爛，多數還沒有鞋着，原因是什麼呢？這就是陸榮廷、譚浩明一班軍閥剝削你們，弄得你們生活這樣困難。革命就是要使工人、農民以及各界人士都過好生活，現在廣

西的軍閥已經打倒，馬君武做廣西省長，必定要負起這個責任，使人人都豐衣足食。你們是主人，省長是僕人。僕人必定要做到使主人滿意，才是一個好省長、一個好僕人。馬省長現在首先要將陸榮廷、譚浩明等存在上海外國銀行的現款設法取回，連同他們在省內的產業一齊拿出來分給大家，使大家有衣穿、有鞋着。”各人听了，都非常興奮，不斷高呼“大總統萬歲”。先生又說：“南寧附近有很多荒地，各位主人可以馬上去開發，入息必定很快就能增加。”

先生在南寧視察完畢，回梧州後，命我到廣州去接夫人。先生在梧州每天開會，十分忙碌，約一個多月才出發到桂林。夫人因事回廣州，在越秀樓只住了四天，便由我和張發奎護送赴桂林。先生自桂林到陽朔迎接，沿途飽覽陽朔山水，始返桂林。

先生駐節桂林，湖南督軍趙恆惕派代表來見，表示他絕對服從先生。蘇俄亦派馬林由廖仲愷、陳友仁和李祿超三人自廣州陪同前來。先生和夫人、廖仲愷、陳友仁同馬林密談了五天，其他的人沒有參加。

（六）陳炯明叛變進攻總統府

先生在桂林指揮北伐，十分忙碌。當時軍事部署已逐步完成，第一步計劃是先克長沙。正在準備向湖南進發時，不料陳炯明蓄謀叛變，違抗命令，停止接濟軍需。先生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遂於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一日由桂林回到廣州，首先免去陳炯明粵軍總司令、廣東省長各職，並把桂林一帶的軍隊開回廣州，又從廣州開向韶關。北伐各軍在韶關集合後，先生便由廣州到韶關，在那裡設大本營，準備取道江西北伐。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一日，先生又由韶關回廣州。當火車到達新街站時，自廣州前來迎接的人，都登車來

見先生。其中一位华侨邓三伯向先生說：“陈炯明在惠召集他的爪牙頻頻开会，显有謀乱企图，請由其他車站下車，不可直到黃沙，免受陈炯明的暗算。”其他的人也以为然。桓先生却不以为意，說：“不要紧，不要紧，我以至誠待人，陈炯明是不会害我的。”火車到黃沙站，先生登上陈策派来的兵艦开到天字碼頭，再坐汽車回到总统府。第二天，先生带着黃惠龙、楊仙逸和我从越秀樓往震武樓、文瀾閣各处巡視，看見文瀾閣后面的越秀茶室駐滿軍隊，牆上还凿了許多对着越秀樓的枪眼。有許多士兵在这一带来来往往，好象是新开到的。先生向这些士兵問道：“你們的官长是誰？”士兵回答：“是洪兆麟司令。”先生又問：“洪司令駐在这里么？”士兵回答：“是李旅长率領我們駐在这里。”先生又問：“你們是从那里开来的，李旅长有什么任务給你們？”士兵回說：“我們是从江西开来的，不知道有什么任务。”先生和他們談話后，便回到越秀樓。翌日，先生命偵緝队长李天德調查总统府附近駐軍的人数、番号和軍官姓名。十四日那天，从早到夜都有人接二連三地来报告陈炯明造反的消息。先生向黃惠龙和我說：“今晚有什么举动，要立即报告。”不久，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来报告說，陈炯明的确要叛乱了，請先生好好准备对付。第二天早晨，陈策又向先生报告陈炯明謀反的事情，談了一小时余才退出。到了下午，陈少白来見，先生說：“刚才得陈竞存电报說，只要我交出一个人，任由他把这个人杀掉，無論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但他並沒有指出这个人是誰，我也想不出来，竞存为什么要杀这个人？”說完便把陈炯明的来电給陈少白看。陈看过电报之后想了一想，便說：“我聞得陈炯明部下說：‘一定要杀胡汉民，杀了胡汉民就一切事情都可以服从。’陈炯明提出要杀的人，大概是指胡汉民吧。”先生說：“展堂是一个好人，决不能使他受冤屈。請

你把我的意見轉達竟存部下，叫他們不要妄動。”陳少白退出之後，接着海軍陸戰隊司令孫祥夫、總統府秘書長謝持先後到來，報告陳炯明準備叛變的事情。下午六時許，陳策用電話向先生報告。先生答道：“這是外間的謠言，可以不必置信。”先生把電話筒放下後命副官陳煊于第二天早晨往寶璧艦把存在該艦的面額二角的鈔票數十萬元提回總統府，準備運往韶關大本營作北伐軍軍費。至夜十一時，陳策、魏邦平連續從電話報告陳炯明謀叛，並說情況已十分危急。先生說：“無論如何，我不離開，我只知為國家為民族，從來不為個人謀利祿，是人所共知的，陳炯明何至要謀反？”這時又有各方面的電話來，都是報告陳炯明已布置軍隊，快要開始向總統府攻擊的消息。這些電話都是由我接听了以後轉報先生的。他每次听了我的轉報後，都沒有什麼表示。不久，又有某處來電話，先生接听以後對我說：“馬湘，你率領衛士小心守衛越季樓。”說完之後，態度和平常一般，非常沉着。我找到衛士大隊長姚觀順，把先生的命令轉告他，並和他商議守衛計劃，隨即下令各班長率領全部士兵嚴密戒備。至十二時，林直勉、林樹巍和陸志雲十分匆忙地來向先生報告。陸志雲說：他有个在熊略部下當連長的同鄉，把陳軍在今晚深夜一時開始攻擊、口號是“食飽飯，殺民賊”的消息告訴給他，这个消息十分确实，情形很险惡，因此請大總統速往別處，暫時避開。先生說：“竟存果然恶劣，料不至如此。即使竟存有不軌之謀，但他的部下有不少是明理正直的人，他們很多和我久共患難，豈肯尽听竟存之命？請各位無須過慮。”林樹巍說：“粵軍素來野蛮，不能不防備。”先生說：“我已將警衛調往韶關，即是表明我对他信任。他对我虽有不利之陰謀，亦何須用兵？如果竟存胆敢稱兵作亂，甘為叛徒，則人人可以殺他。我身為大總統，負全体國民之

託，有平叛責任。如果力量不足，被叛逆所害，正是我為國犧牲的機會，豈能臨難苟免，貽笑中外，玷辱國家？”林樹巍各人苦勸了多次，先生总是不從，他們只得退去。

十五日晚深夜一時，越秀樓上已聽到遠處有集合號音；不久，連部队的嘈雜聲都能聽到了。先生從臥室出來，命衛士準備防範。林樹巍、林直勉和陸志雲三人又急速跑來，力勸先生離開越秀樓。先生說：“竟存胆敢作亂，我便要負平亂之責。如力不足，惟有一死，以謝我四万万同胞。”林直勉等見事態危急，又知先生決不肯躲避，遂由幾個人用力挽著先生離開越秀樓。我和黃惠龍請求跟隨保衛。先生說：“你們不必跟隨，什麼危險我都不怕。你們要堅守越秀樓。明天我若不回來，馬湘帶夫人到家中暫避。”說畢，他就被林樹巍、林直勉、陸志雲擁著離開了越秀樓。後來我護衛夫人到黃埔，才知道先生脫險的經過是這樣的：先生離開越秀樓後，由小路到達德宜路，即見有許多陳炯明部隊向總統府進發。當走到惠愛路，正欲橫過馬路入桂香街時，被陳軍的哨兵攔阻，不准通過。林直勉指著先生對他們說：“我的母親患了重病，所以不得不深夜請來這位醫生到家里診治。”但他們仍不許通過。林直勉又說：“我們住在高第街，你們如不信，就請一齊和我們到家里看看。”哨兵看見先生穿了一件白夏布長衫，戴一付墨晶眼鏡，十足象個醫生，就証他們通過了。及到靖海路，又遇陳部叛軍，先生態度非常從容鎮定，叛軍沒有懷疑，便又安然通過了。從此一直沿長堤走到海珠海軍總司令部，再乘小電船到了黃埔。

(七) 越秀樓奮戰殺賊

衛士大隊長姚觀順、第一隊長黃惠龍和我(第二隊長)率先生

之命，坚守越秀楼。当时武器有一百发手提机关枪三十支（这批手提机枪是楊仙逸从檀香山新购回来的），其余就是駁壳手枪、五响步枪。我請夫人把厨房里的白米、鱈魚和咸魚給大家飽餐一頓（这些鱈魚是梅光培送来的，因先生患胃病，需要吃鱈魚，所以他挑选了上等的九龙吊片鱈魚送来）。各人飽食之后，就佩好武器，准备迎敌。我請姚观順大队长下令所有卫士不准离开，并命一个排长把守門口。大約在十六日上午二时，叛軍开始向我們进攻，并从鎮武樓上用机枪向我們扫射。姚大队长指揮作战，我則負責护卫夫人。我請姚观順大队长下令各卫士只准打敌人的軍官，不准打敌人的士兵。敌人用电筒照着向我們射击，我們則对准电光还击。敌人一連冲锋三十多次，都被我們击退，死伤惨重。将近天亮时，姚观順腿部一連被击中两弹，不能指揮作战，我就請准了夫人，由我繼續指揮。姚观順負伤后，斗志动摇，竟命亲信士兵把白被布拿来，以备竖白旗之用。我发觉了，就問他取白被布何用。姚答：“現在敌人过千，而且不断增援，我們子弹已将用尽，又无外援，眼見就要打败，不投降便沒有办法，白被布是准备竖白旗的。”我立即將姚的話报告夫人，并請夫人授权給我，无论何人投降，都予以枪决。这样，姚观順就不敢乱动了。战至天明，李云复叛軍死伤三百余人，尸骸滿山；我們只有四个人受伤。我看到子弹快要用光，立即从天桥跑到总统府找到叶挺，把作战的經過简单地告訴他，并向他要子弹。叶挺大声道：“打得好，打得好！子弹随便拿去。”我左手一箱，右手一箱，提着从天桥赶回来。將到越秀楼大門，敌人用机关枪向我扫射，一弹从头擦过，把头发烧了一大块；一弹从腋下穿过，一弹从大腿掠过，衫褲登时冒起烟来，但我一点沒有受伤。我急令士兵取一百发手提机关枪来，对准鎮武樓上的敌人机枪陣地扫射，一連伤毙敌人

數十，敵人的槍聲就沉寂下來了。下午二時，我再到總統府，請警衛團團長陳可鈺派兵增援越秀樓。陳說：他的兵員守衛總統府還不夠，實在無兵可以增援越秀樓，最好還是請夫人到總統府來，以便護衛。這時叛軍總指揮從白雲山用電話找陳可鈺，責陳打死他們官兵幾百人。陳答：“不是警衛團打的，是馬湘和總統衛士打的。”葉舉高叫：“如有拿獲馬湘，領賞一千元，把馬湘立刻斬頭。”我見陳可鈺不能分兵相救，只好跑回越秀樓，把這些情況告訴了夫人，並請從速逃避。夫人亦認為不能再留，遂由黃惠龍先行，夫人居中，我殿後，從天橋向總統府跑步前進。我們剛剛過天橋，天橋即被叛軍炮彈擊中，登時焚毀。到了總統府，陳可鈺向夫人報告說：兵力太薄弱，實在不能分兵增援，現在夫人來到，正好商量。我乘機請黃惠龍護衛夫人，自己跑到電燈機房找着電工頭，和他一齊跑到林直勉臥室，弄開保險櫃，把先生與蘇俄的來往文件燒毀，並取出大總統印帶回來交給夫人。這時廣州衛戍司令魏邦平派副官馬毓藩來調停。陳可鈺與他商議，提出三個條件：1. 保護夫人安全退出，沿途陳軍不得侵犯；2. 保障總統府全體官兵生命及家屬安全；3. 駐在總統府的警衛團全體官兵開往燕塘集中，然後將槍械搭架點交，並發餉一個月解散。不料正在商議中，叛軍已從後門攻入。我們見事態危急，遂與黃惠龍合力保護夫人，由前門衝出。跟隨夫人的女工懷着那顆大總統印接着衝出，但她慢了一步，被叛軍截回了。

（八）保衛孫夫人脫險

我和黃惠龍二人以身軀掩護夫人由總統府前門衝出後，埋伏在附近的叛軍看見有人出來，即蜂擁上前。我身上懷有面額二角

銀幣五十元，立即拿出來分向左右兩邊擲去。叛軍紛紛俯拾，我們乘機搶過馬路，進入斜對面的小巷里。這條巷是死巷子，沒有通路，巷內有十來家住戶，其中有一家門戶虛掩，我們便推門入內。恰好門里前面一座房子沒有人，黃惠龍和我急把軍服手槍投入井里。這時夫人十分疲勞，我把她送入一間臥室休息，然後和黃惠龍坐在廳里。忽然一位老婦人從後面走出來，看看我們，又看看房間里面，接着便怒氣沖沖地大罵：“你們是什麼人？擅自進入人家屋裏，連我新媳婦的房也進去了。你們馬上滾出去！我兒子當排長，他回來你們就不得好死了。”夫人在房間聽見了，立即跑出來。我看見這種情形，只得捏造一些事實，指着夫人向老婦人求情說：“她是我的姑母，在汕頭當教師，因放假來探望我們。剛才打算到市上買些蔬菜魚肉，誰知馬路上遇到很多軍隊，害怕起來，又不熟悉路途，因此躲到府上，請你原諒！”老婦人聽了還是堅持要我們離開。正當這時，忽聞扣門聲甚急，我和黃惠龍便準備搏鬥。老婦人開了門，一個穿便服的少年走進來。老婦人指着我們，說我們闖進他家里，要那少年立刻驅逐我們出去。我料定這少年是老婦人的兒子，便把剛才對老婦人說的話再向他說了一遍。幸而這少年沒有責怪我們，也沒有要我們走，便直到房內去了。我們認為非跑不可，就由黃惠龍先行，我跟着到門外探視。誰知黃惠龍剛跑到巷口，即被叛軍抓去了。我只得退回屋裏，找些泥土把內衣褲略為弄污，然後去請那少年出來和他攀談。原來他姓朱，當消防警察，新婚不久，新婦剛歸寧。我見他很和善，就懇求他帶路。我說：“我們住在賣故衣的四牌樓，因剛從鄉下搬來，路途不熟，煩勞你帶帶路好么？”少年答應了，我便和夫人跟着他出了巷口，轉入內街，很快就到了四牌樓。我便對這位少年說：“來到這裡，我們認得路了，不敢再勞，

請你回去吧！將來我們一定要買些禮物到府上答謝。”這少年向我們道別，便回去了。夫人袋里還有些錢，我就拿來買了些魚菜辣椒醬之類放在竹筐子里，裝作廚夫的樣子，向高第街前進。剛轉到維新路時，又見許多叛軍把守着。我跑上前說：“弟兄！加菜么？”跟着把筐子給他們看。他們拿了一瓶辣椒醬說：“謝謝！”我和夫人急急橫過維新路，轉入高第街，一直來到同福里馬伯麟寓所門前。馬此時任長洲要塞司令，只有一個名叫九妹的妹妹在家。當我敲門時，她竟不認識我。我低聲告訴她：“我是二叔。我常常到你家來，你怎么忘記了？”她很驚訝，急忙把門開了。我們立即閃進去，關上門。跟着又有一个人叩門，原來這人是馬伯麟的親信勤務，是奉馬之命回家燒毀文件的。我焦急地問他有沒有看見中山先生到他們那里。他連聲說：“看見，看見。”夫人听了很高兴，立即寫了一封信交他帶給先生。這時我忽然想起夫人已兩天沒有吃東西，便請馬九妹叫仆人弄些飯菜來。夫人大概因疲勞過度，不願吃。我安慰了她一番，并說：“如果夫人不吃，我也不吃了。”夫人才勉強吃了半碗。吃過飯後，我請馬九妹把床舖讓給夫人休息。晚上十時，馬伯麟的勤務兵回來報告說，各處已經戒嚴，車船都沒有開行，因此把信交還夫人。第二天一早，我請馬九妹吩咐仆人到仰忠街找馬超俊來。不久，馬超俊和他的妻子沈蕙蓮都來了。他們看見夫人已脫險，并知道先生亦已到了黃埔，十分欣慰。相談之下，各人都以為這里不能再留，遂決定冒險到沙面自來水廠工頭李國斌處暫避。各人都換了普通人穿的衣服，步行前往，馬九妹和馬伯麟的弟婦也跟着去。當走到沙面西橋時，大家都已進入橋上的鐵閘，我因走在最後，被四個叛軍發覺，跟着追來。我急跑入閘里，對守閘的沙面工部局華差說：“這幾個匪徒要搶我的東西，不要讓他進來。”華差

果然上前制止他們進鬧。我赶上夫人等一同到自来水厂找着李国斌，向他說明來意，一面由馬超俊打電話給嶺南大學校長鍾榮光，請他派電船來接。但这天電船沒有來，我們就在廠里過了一夜。翌日上午八時，電船來了，我們遂乘電船到嶺南大學。是日適為星期，鍾校長信基督教，赴禮拜堂尚未回。這時忽見一建築工人偕中山先生外籍顧問那文同來。我一看，這個工人原來就是黃惠龍。我看見他的藍色衣服上沾滿了白灰黃土，便問他是怎麼脫險的。黃惠龍說：他被叛軍拘至一小巷掠去他的手錶，就放了他；後來他到東山那文家，見鄰近有一建築工人，就把這個工人所穿的衣服買來，化裝為建築工人，與那文同來。不久，伍廷芳、伍梯云、魏邦平也自黃埔乘小電船到來。我急問伍廷芳見過先生沒有，伍說：“中山先生在黃埔，很平安。”各人一起來見夫人。鍾榮光校長禮拜完畢後也回來了，請夫人午飯。這時夫人和大家都急欲往見先生，遂急不及待，乘魏邦平的電船駛向黃埔，黃惠龍、那文和我隨行。到黃埔後，在長洲要塞司令部見到先生。我急上前報告：“越秀樓沒有守住，樓里的東西都燒了，我只保衛了夫人脫險，沒有完成固守越秀樓的任務，請按軍法辦罪。”先生說：“蠢仔！你打得好，是個英雄好漢。你能够保衛夫人脫險，將來陞你為團長。”此時虎門要塞司令何振來見，報告虎門要塞已失守。先生沒有理會他，與夫人入要塞司令室密談後，夫人即偕那文復返嶺南大學。翌日，便由那文送夫人至香港轉往上海。

那文送夫人到港後，旋即返黃埔轉往廣州。以後那文每隔一天，即由廣州來黃埔一次。

(九) 中山先生駐节黃埔

先生駐永丰觀，由我和黃惠龍跟隨侍衛。有一天，來見的人較少，我趁着这个机会对先生說：“現在只有我和黃惠龍两个衛士，力量十分薄弱，須要增加些人。各軍觀的給養，恐怕也有問題。”先生說：“現在沒有办法。長洲要塞的軍費也是馬伯麟自己筹划。李安邦司令只有士兵五六十人^①，还需要协助長洲要塞的防禦，不能調充衛士。”先生說到这里，恰好馬伯麟帶了一个身穿黑胶綢便服的人來見。這人叫徐樹榮，住在隔河的村子里。他糾合了弟兄一百八十人前來替先生効力，并拿出各弟兄簽名的名單給先生看，同时举起右手宣誓：“徐樹榮帶同弟兄一百八十人立誓服从中山先生，護衛中山先生，如有違背，壓海而死。”先生甚為嘉許，立即委他為訓練隊長。翌日，徐樹榮帶同一百八十人來見先生。他們皆穿短衣便服，十分威武，有些携駁壳手槍，有些背五响步槍，也有长短槍俱備的。先生命他們在長洲要塞司令門前集合，對他們訓話，一連講了兩小時余。他們听了先生的訓話，个个欢欣鼓舞，高呼“大總統萬歲”。先生吩咐徐樹榮率部在長洲要塞一帶布防，与海軍互為犄角，然后返回永丰觀。这时我又对先生說：“現在增加了徐樹榮一百八十人，李安邦五六十人，再加上李天德的衛隊，防守力量已足，可否写信給我到香港找伍學規筹集軍費、糧食、煤炭，以充實軍備？”先生說：“很好，很好”，便写了一封信，命我往港面交伍學規。我奉命后，就搭省港輪船到香港找到伍學規，把先生的信交給他。伍

^① 李安邦本來有士兵百余人，大多數是華僑子弟，他們都忠勇非常，槍法準確，从前曾援了五十六人充總統衛士，越秀樓失守后，尚未歸隊，故現在只有五六十人。

学焜看了后，立刻請伍子養、楊西岩和林护等來商議。我等他們到齊了，把陳炯明造反和中山先生在軍艦指揮討陳的事扼要地說了一遍。伍學焜說：“陳炯明造反的事情，我們已知道了。大總統有命令，我們一定遵辦。現在有一艘比利時貨輪可以租來運載軍需品至黃埔。三日之內必定有錢、有糧食和煤炭運到。我們不寫回信了，請你回去代我們告知大總統，請大總統快些掃平陳賊。”伍學焜又另送五百元作大總統膳費，托我轉呈。我完成了這個任務，又跑到永安公司見經理孫智興，把陳炯明叛變的事簡單地告訴他，並說：“中山先生倉卒退出越秀樓后，一切應用衣服和物品都沒有，你這里各種貨物俱備，我想順便帶些回去，以應中山先生急需。”孫智興說：“這些小事我們應該効力，你要什麼就取什麼吧。”我便把需要的東西如襪衫、內衣、皮鞋、襪、毛巾、牙刷、香皂、咖啡、可可、煉乳、麥片和其他罐頭食品等都揀了一些，用大皮箱裝起來。各事辦妥后，距省港輪船開行尚有數小時，便又跑到海外聯義社，看見有幾十位社員在那裡休息。我急上前告以陳炯明造反，中山先生現在黃埔準備平亂，希望他們到黃埔効力。各人听了都憤激起來，登時有二十四人和我一同起程。二十日抵達黃埔，我即向先生報告辦理經過。先生說：“你復周到，我沒有吩咐你辦衣服和應用什物，你居然都想到了，又帶了几十個聯義社海員參加討賊，實在難得。”說畢又吩咐我請各海員來見。他們進來都很恭敬地向先生行禮。先生問明了各人的專長和所願擔任的職務，便一一分派工作。翌日，忽聞有輪船鳴笛進口，我心里猜測可能是比利時的貨船，細細一看，果然看見這船掛着比利時國旗，從遠處駛來。我馬上去告訴先生，先生步出甲板，用望遠鏡一看說：“馬湘，你帶李安邦的士兵六人，到船上去看看。”我帶同士兵登上船板，等船駛近，就登上船

去，在甲板上會見了船主，向他說明來意。船主知道我是中山先生派來的人，便把伍學焯的信件托我轉交先生。我把士兵留下看守輪船，自己回永豐親復命。先生看了信後，立即吩咐打旗召集各親親長前來，叫他們把應領的伙食、煤炭、軍餉等都開列清冊，并具備領據到比利時貨輪提取，同時命令全體官兵除值班勤務外，一律到永豐親聽候訓話。不久，各親的官佐士兵紛紛駕着舢板前來，各親的人數，多者有五六十人，少者有二三十人。他們听了先生講話後，都衷心表示服從和願意加入國民黨，并高呼：“服從大總統”，“大總統萬歲”。

有一天，陳樹人自香港來，表示願在先生身邊任秘書。先生不同意，要他馬上往上海，從速對各地華僑宣布陳炯明的叛逆罪狀。後李祿超也自香港來，傳達謝持在香港所得北伐軍回軍討逆的消息。

黃騷來親向先生報告外交總長兼廣東省長伍廷芳逝世的消息。先生听了流下淚來，在座的同志和海軍將士也都很傷心。先生對各人說：“陳逆叛亂，禍國殃民，伍總長憂勞過度，遂至不起，我們後死者自應同心戮力，戡平叛亂，然後可以慰伍總長之英靈，完成革命大業。”

有一西報訪員來見，先生對他發表談話，內容大概是說：“總統為國會選出，責任重大，無論任何困難，絕對不能放棄職守。陳炯明稱兵叛國，我身為總統，自應負起平亂討賊之責，才對得起全國同胞。”談了些時，西報訪員才退出。

七月七日，洪兆麟派代表陳家鼎來，要見先生。我一見他，非常氣憤，向他大喝道：“洪兆麟是個什麼東西？除非你拿了洪兆麟的頭來，才有話說。”先生在房裡聽見我高聲大罵，便問：“馬湘，你

和什么人吵咀？”我說：“洪兆麟这个东西派代表来要見先生，我不觉愠怒起来，把他大罵了一頓。”先生說：“不要这样，让他进来吧！”我遂喝叫陈家鼎登艦，把他周身严密检查了一遍，就擱了一些時間。先生問：“为什么还不見陈家鼎进来？”我于是急急带了陈家鼎入見。陈家鼎把洪兆麟的信恭恭敬敬地呈上，并說：“洪司令原意是想偕同陈炯明一齐前来向大总统請罪的，陈炯明已經做錯了，請大总统不必計較，現在洪司令希望大总统回省城，再任陈炯明为总司令。”先生沒有答他，只命人写了一封信命他轉交洪兆麟。

海軍司令温树德接受了陈炯明的巨款，甘心附逆，把海圻、海琛、肇和三艘大艦駛离了原来的位置。这么一来，永丰座艦便頓時失去了掩护。先生接到情报后，立刻命令这三艘大艦发炮轰击魚珠炮台，以試探他們是否附逆。結果，三艦竟违抗命令，把灯火全部熄灭，在夜深十一时駛离黄埔。这时先生所統率的軍艦火力，已不能与魚珠炮台的火力对抗，而黄埔背后的那条河道亦已久无輪船航行，大家都认为无法通过，已处于被封鎖的恶劣形势。先生忽然下令各艦駛入那条小河，再出三河口至新造附近停留，以避开魚珠炮台的火力，免被叛軍封鎖。这时各兵艦都认为那条小河从比較大的輪船通过，但又不敢抗令，只好在三大艦离开黄埔时駛入小河，果然沒有一些困难，順利通过了。这条小河可以航行永丰艦等这样大小的兵艦，当时除了中山先生外，是沒有人知道的。

中山先生率領各艦到达新造附近后，魚珠炮台的叛軍向长洲炮台密集射击，掩护叛軍渡河，长洲要塞司令部和魚雷局均被击中。馬伯麟、李安邦、李天德、徐树荣率部与渡河叛軍作殊死战，已将敌势遏止。不料海軍陆战队司令孙祥夫忽率部叛变，响应叛軍，致令馬伯麟各軍不能再战，只得各率所部退出长洲。于是广州附

新的陆上据点，遂全入叛軍手中。

(十) 中山先生进驻白鵝潭

在长洲失守这一天晚上，先生下令各艦从新造出发，进攻車歪炮台，事先曾召集各艦官佐商議攻击計劃。当时各艦官佐皆认为車歪炮台附近，叛軍炮兵密布，地形险要，因而畏縮不前。有人还主张全部开入西江，再图进展。先生认为开往西江必須經過魚珠、牛山各炮台，那里又有海圻等三艦監視，火力悬殊，势难冲过；现在只有冲过車歪炮台，进入省河，以待西江、北江各軍回师，并囑大家努力作战，使叛軍不敢輕視。各人听了后，均奋勇接受命令。先生遂命永丰座艦先行，率領豫章、楚豫、广玉、宝璧各艦从新造溯流而进。翌日天微亮时，先生見車歪炮台已入射程之内，便下令各艦作試探射击。此时叛軍在两岸及在河中心的車歪炮台均布置重兵，各艦官兵皆覺胆怯，面現难色。先生急召集各艦官佐訓話，勉勵大家鼓起斗志。至上午九时，先生亲率永丰艦先行，各艦紧密相隨，一齐发炮向魚珠炮台轰击。两岸及車歪炮台叛軍的大炮也集中射击永丰艦，登时炮声隆隆，烟焰冲天。由于先生亲自指揮作战，各艦官兵均斗志昂揚，勇气百倍。我与黃惠龙各持手提机关枪不离先生左右，每发一炮，即高声喊杀助威。战了十余分钟，各艦都冲过了叛軍大炮的射程范围。永丰艦被击中六弹，官兵略有损伤，惟主炮的弹药已用尽，旁炮亦仅存七弹。其余各艦中弹較少。至于叛軍則受創极重，我亲見他們的炮兵陣地有四五处被击毀，仅发了几炮便寂然无声了。我們陆上部队，因人教太少，只占領了东盟一带几处乡村。

艦队进入白鵝潭后，原在这里的北洋艦永翔、同安两艦均表示

服从，一致討賊。同时广东江防艦广亨、广贞两艘亦从珠江下游来附，但因艦身太小，火力太弱，不能冲过車歪炮台，駛至东盟附近即不能再进，遂会合陆上部队向江門方面退去。

英国領事来親对先生說：“白鵝潭虽然接近沙面，但外国人不能保护你們，而且战事发生，万一損及沙面，更会引起外交問題，还是請你离开白鵝潭吧！”先生严詞駁斥他說：“这里所有的地方都是中国的領土，沙面也是中国的領土。我們是主，你們是客，只有我們保护你們，沒有你們保护我們之理。”英領事无言可答而去。

一連四五天接到各方面传来消息，都說北伐軍回师討賊，节节胜利。有的說已克服翁源；有的說已迫近韶关，韶关指日可下。各人听得这消息，都十分欣慰。先生还发了电报慰劳許崇智、朱培德各將領。

一天，先生正在午膳，忽然一声巨响，全艦震动得十分厉害。后来查悉是叛軍企图用魚雷爆炸永丰艦，因魚雷在距离永丰艦数丈处爆炸，故親身沒有受伤。事隔五天后，在芳村的河面拿获了一个名叫徐直的叛軍，审讯时他直認曾用魚雷爆炸永丰艦，并供出叛軍派陈永善到江門装备了几十只小火輪，准备用来分途向各兵艦袭击，同时在芳村、花地、河南各地布置炮队，以掩护各小火輪进袭。审讯毕，立将徐直枪毙。

到了八月，接到各方面的消息，都說北伐軍敗退，南雄已失守。有的消息則說北伐軍正在反攻，叛軍將領翁式亮已被击毙，并有不少叛軍反正，宣布独立。先生对各同志說：“現在从各方面传来的消息，我們都不能輕信，仍要照原定計劃，严密防御敌人的偷袭，等到接获前方确实报告后，再作其他部署，以免打乱步驟。”

程潜自沙面到永丰艦，劝先生离粵，另謀进取。先生认为在未

得前方败退的确实报告之前，决不忍抛弃患难相随的海军官兵而自己先行离开广州。

(十一) 中山先生离粤赴沪

有一位从越南归国的老华侨(已忘记他的姓名)亲身跑到韶关探听北伐军回师讨贼的消息以后，在八月九日到永丰舰见先生，报告北伐军已从韶关、翁源一带败退，南雄已于六日失守，现在退守龙南。先生素来知道这位华侨十分诚实，因此认为他此次自动冒险跑到前方探得的消息，一定是确实的，遂马上召集各舰长会议。各舰长一致认为：南雄已失守，北伐军已被截为数段，失去联络，欲收集败军，保存实力，既有困难，更无力量再回师讨贼，即使大总统仍然驻节省河，也于事无补，究不若暂时离开广州，徐图截平叛乱。先生略为沉思一下，认为各舰长所提意见可取，即命人通知各国驻沙面的领事，说因北伐军回师讨贼未能成功，决定离开广州。各领事接到通知后，英国领事、日本领事都请用自己的兵舰送先生到香港。英国领事还托人向先生说：“十日适有俄国皇后号邮船由香港往上海，孙总统如果决定赴沪，请于今日下午乘英国炮舰到香港，由英领事先以电报通知港方代为预定房间，以备孙总统乘坐。”先生遂于这一天下午三时，率蒋介石、陈策、陈肇、陈焯乘英国炮舰摩轩号离开广州；临行前派林直勉、李章达和我留下办理一切未完的手续。

先生离开永丰舰后，有几十位海军官佐向我索餉，说我是管理军餉的，要我负责发餉。我对他们说：“我不过是一个副官，那里能够管理军餉？管理军餉的人在沙面，你们可以派代表和我一起往沙面领取。”他们同意了，遂派一位代表和我同到沙面。我本来想

借此为脱身之計，誰料到沙面找到居正，他竟然拿出了面額二角的广东毫券，发給他們一个月的餉。原来这笔款就是中山先生派副官陈煊从宝璧親上取来的，原定六月十六日解往韶关大本营充北伐軍費，后因陈炯明叛变，未能提去，遂由居正接管。我因留在沙面没有什么作用，遂秘密搭省港輪船至香港，再赴上海，到莫利受路二十九号先生住宅，依旧担任侍卫的职务。

(十二) 中山先生返粵任大元帅

一九二二年八月十四日，先生回到上海。过了好几天，林伯渠和李大釗来見。又隔几天，林伯渠、李大釗介紹苏俄特使越飞来訪先生。先生与越飞相見之下，极为喜悅，当即与越飞在樓上客厅开始会談，孙夫人、林伯渠和李大釗亦参加，一連整整談了六天。在这期間，先生吩咐我，無論何人都不予通传和不許登樓。过了几天之后，林伯渠来，我問他前几天会談的是什麼問題，关防为什么要这样严密。他告訴我說，这次談的是关于革命党应以苏俄为师、苏俄帮助中国革命、打倒軍閥的問題，要我保守秘密。

我跟随先生回到上海后，仍旧住在莫利受路，薪水十分少，每天只領取零用二角，因此生活要特別节俭，衣服也是自己动手洗濯。有一天，夫人在樓上看見我在下面洗衣服，叫我上樓对我說：“朱卓文之女密報說，你受了陳炯明港币二万元，准备暗害先生；并說你已把此款在港买了洋房。起初我已不大相信，后来我見你常常自己洗衣服，不象是一个受了人家一大笔錢的人，就越发使我不相信。現在我把这事告知你，你不要怀疑，好好地干！”我說：“我不知这事，莫說二万元，再多到算不出，我也不会受人家唆使的，請夫人放心。”夫人說：“不用你說，我一向知你誠实可靠。”

伍学焜、伍于簪、楊西岩和孙科自香港来見先生，报告陈炯明在广东搞得十分坏，广东同胞无不恨之刺骨。他們认为趁此时机下令討伐，必可成功。他們又表示愿尽力筹划經費。先生遂分別派員向駐福建的許崇智、李福林各部，駐兩广边境的楊希閔、刘震寰各部、駐湘粵桂边境的譚延闓、朱培德、沈鴻英各部和西江一带的粵軍传达命令，叫他們各率所部头向陈炯明攻击。他們奉到命令，都切实执行，不到两个月的時間，便把陈炯明驅出广州和西江、北江一带地区。陈炯明率殘部分別退回东江惠州、潮梅、汕头一带和南路琼崖各地，負隅頑抗。

先生以广州已收复，遂和夫人自上海乘郵船取道香港返粵，黃惠龙和我跟随侍衛。郵船到了香港，港中各行商、知名人士和香港大学都紛紛开大会欢迎。先生忙个不了，每次大会都演說數小时。在香港大学欢迎会演說的时候，各欢迎者热烈鼓掌，頻頻高呼“孙博士万岁！”我还大略記得先生說：“……我从前在香港讀書，康德黎老师很喜欢我，我也十分敬重他，师生感情极为亲切。后来我轉到檀香山讀書，适他也到該地遊历，道上相逢，遂我同車四处遊覽。这时我头上还拖着辮子。而今已隔數十年，回忆起来，当时情景还一一如在目前。……当我在香港讀書之时，中国人不懂得西医，更可以說中国沒有西医。我学医不是謀个人的利益，而是志在救世，更借行医以暗中进行革命，推翻滿清帝制，恢复中华。在我开业行医时，診金多少不論，貧者更贈医贈药。此时广东省城和澳門都沒有西药房，因此要常常到香港采买西药。……各位无论研究何种科学，学成之后，首先要以济世为目的，为国家为民族効力。……”在散会时，“孙博士万岁”之声震耳欲聋，各欢迎者还一齐拥上来，把先生团团围住，高高抬起，从大礼堂直抬至休息室，又紛紛环請先

生題写紀念册，以留紀念。

先生于一九二三年二月回到廣州就任大元帥職，設大元帥府于廣州河南士敏土廠。有一天，李烈鈞、楊希閔、劉震寰、朱培德和許多高級將領都在座，先生對幾位參軍、副官、衛士隊長說：“你們試試槍法給大家看看！”言畢即率各人到網球場，在短牆上排列五只瓦鉢作靶子，命各參軍、副官等用手槍作短距離射擊，每人以五發為限。馬伯麟首先發射。他手持駁壳手槍，一連三發，擊碎了三個瓦鉢，但後二發沒有擊中。參軍祁耿寰用駁壳手槍一連擊中了五個瓦鉢。外籍副官馬均也中了三槍。我用大號左輪手槍，從左邊第一個瓦鉢依次向右射擊，把五個瓦鉢都打得粉碎。黃惠龍中了二發。姚觀順中了三發。最後是盧展柳，五發也都中了。射擊完後，先生向大家說：“各人的射擊技術都很好，雖然有些不能完全命中，但如果靶子大一些，就可以槍無虛發了。革命軍要有一個打一百個的精神和技術，我希望全體革命軍人都能夠達到這樣的程度，這樣，革命就會很快成功。”夫人說：“從前在越秀樓抵禦陳軍和保衛我脫險，衛士們都是有這樣技術的。”先生又問楊希閔、劉震寰等各高級將領，有沒有認真訓練部下實彈射擊。他們都說子彈補給困難，要求大元帥今後多撥給一些。先生當時曾命黃昌谷把此次實彈射擊的情形筆記下來。

先生在大元帥府把越秀樓殺賊獎章頒發給衛士，所有各總司令、軍長、司令如朱培德、譚延闓、楊希閔、劉震寰、李烈鈞、魏邦平等許多高級將領以及大元帥府各級官佐全部都參加。越秀樓殺賊的衛士自大隊長姚觀順以下六十五人首先列隊到場，全場所有武職人員一律穿著整齊軍裝，儀式十分隆重。先生即席訓話說：“我自致力革命以來，經過了不知多少次的大小戰役，但從來沒有頒發

过奖章，这次算是第一次。这次卫士队能以六十五人抵抗賊軍千余人，血战一昼夜，歼灭賊軍数百人，而且还能安全撤退，没有一个陣亡，实为战争史上所未有。你們都是革命軍的好模范。現在陈炯明負隅頑抗，必須加以討伐，凡我革命軍人都應該仿效各卫士趙秀樓杀賊的精神，迅速扫平叛逆。”訓話毕，夫人亲自把奖章掛在各卫士的襟上，全体卫士均十分兴奋，认为这是无上的光荣。

有一天，伍学煊、伍子簪、楊西岩、楊仙逸偕华侨十余人来見先生，魏邦平夫妇亦在座。先生与各人略談了几句，便招呼大家到門前碼頭，登上大南洋电船，吩咐开往鼎湖山。原来他們都是事先約好的。船开行后，先生和各人一面浏览沿途景物，一面暢談。約五六小时即到达高要县属罗隱滯，登岸步行約十分鐘至庆云下院。僧人各山橋，先生不用，步行而往。各人因先生步行，也只得徒步相隨。至半山亭休息約半小时，繼續登山至庆云寺。寺僧合十出迎，竭誠款待，晚齋后，开精舍留客。先生与各人暢談建國方略和北伐大計，至十一时始就寢。翌日早齋后約十时，先生偕各人至鼎湖寺遊覽后，循着原路回到庆云寺。第三天早齋完毕后，即向寺僧告辭，僧众送出山門外。先生偕同各人步行下山，轉向飞水潭。这里有瀑布从山上直瀉而下，分上下两级，上級淺而狹，下級深而广。先生独自一人跑到上級大瀑布之下洗澡。我見他身子浸在水里澆洗內衣，便上前說：“先生，把衣服給我洗吧！”先生說：“不用，不用！我自己来，你以为我洗得不够干淨嗎？”他把衣服洗完，才叫我到夫人那边把內衣褲拿来穿好，加上外衣，然后下来与各人一同下山，至下午九时三十分，始返抵广州二沙头頤养园。

先生亲自督师討伐陈炯明时，有一次率同各卫士，偕顧問鮑廷到最前线——惠州城外之飞鵝岭，指揮炮兵使用刚从虎門运到

的要塞炮向惠州城賊軍襲擊。一連發了十炮，逆軍既沒有還擊，也不敢對飛鵝嶺作爭奪戰。後來楊仙逸在東江河面用四艘大民船臨時裝配炸彈炸葯，準備轟炸惠州城。先生偕顧問鮑羅廷下船視察，看見炸彈炸葯製造成功，十分快慰。視察完畢，即偕各官佐武士上陸。詎料離船不到二十丈遠，忽然轟隆一聲，只見烟焰沖天，波濤洶涌，四艘大民船已被爆炸得無影無蹤。先生流下眼淚說：“楊仙逸遇難了！”及回到大元帥府，夫人得知此事，也流起淚來。黃埔造船廠廠長蘇從仙，也在那次遇難。其爆炸原因，據說是拋棄烟頭不慎，引起炸葯爆炸所致。

先生督師東征陳炯明，前後三次。但因楊希閔、劉震寰等不肯認真作戰，不僅遲遲不能殲滅陳賊，甚至還有許多次遇到危險。有一次逆軍楊坤如率部大舉來襲，我軍紛紛潰退。適樊鍾秀率豫軍約一旅趕至增援。先生問樊有何需要，樊說：“一概都不要”，說罷一氣吃了四五只饅頭。時叶恭綽在座，對樊說：“我願獻一萬元以備樊將軍犒軍。”樊連說：“不用，不用，不敢領受。”言畢即忽忽上陣率部直沖陳軍。陳軍原以為勝利在握，忽被樊軍縱橫沖殺，遂自相踐踏，四處奔潰。此一戰役，雙方都受重大損失，造成以後相持狀態。先生以此役樊鍾秀功最大，特任樊為豫軍總司令。

有一天，先生稍有余暇，命我跟隨僱小艇渡河，乘汽車至東山戴恩賽家找盧夫人。我在門外等候，約一小時余，先生的女公子（盧夫人所生，戴恩賽之妻）送先生出來。先生登上汽車，命開至黃花園，在烈士墓前凭吊。有一個年約三十歲的癡癡病人來到先生跟前跪下求乞。我見他太接近先生的身子，急忙喝他跑開一些。先生說：“不要吆喝他，你是人，他也是人，他患了癡癡病，無法謀生，十分憐慘。”說畢又問這人的家庭狀況，父母親是不是也患癡

瘋。這人說：他的父母都在東莞耕田，還有弟妹，去年他獨自來廣州謀生，結識了一個少婦，不料同居了幾個月，他的癲瘋就發作了，被她驅逐出來。說到這里，這個人便頻呼肚子痛，拉開破爛的褲子癩瀉起來。先生伸手打算替他診脈。我急說：“他脈血逼休，萬不能接觸。”先生把手收回後，問我有沒有錢帶來。我回說只有二角子。先生命我將錢給他，又問他住在那裡。這人說住在伍廷芳的墓門。翌日，先生命李祿超辦函把這癲瘋病人送往石龍癲瘋病院。

先生偕同夫人和朱培德、馬超俊、李祿超、黃大偉等許多人到白雲山巡視，我和黃惠龍跟隨侍衛。汽車至沙河圩，被農民發覺了，各山兜紛紛來接。先生一向是不坐轎的，婉謝了他們，率領着各人緩步前進。約一小時餘，至白雲寺，寺僧出迎，請留午齋。先生婉謝，轉至寺旁九龍泉休息，囑衛士們取出牛奶、餅干、蘋果，與各人共作野餐。先生與李祿超等談，白雲山土質甚佳，傾斜角度亦不甚大，較為平坦之處適宜旱作，可以種植雜糧，斜度較大的地方可以造林。餐畢與各人直登最高峯，虎門、長洲各要塞，廣三、粵漢、廣九各鐵路，石井兵工廠，廣州附近的河流、田野和鄉村，均歷歷在目。先生用望遠鏡四處觀看，向馬超俊詢問石井兵工廠的狀況甚詳（此時馬任兵工廠廠長）。忽有幾十個農民跟蹤而至，衣服破舊，一望而知他們生計困難。先生對他們說：“我剛才所見山下附近的鄉村，不是茅棚便是坭墻小屋，可以料定你們的生計是不充裕的。這原因都是地權制度不好，耕田的人每年要付出很大的田租，這個問題我一定要把它解決。白雲山各處的土質都甚佳，可以大加開墾，多種旱作物，高粱、包粟、落花生、大豆都可以種。同時也可以造林，多種松、杉、苦楝之類。請各位回去宣傳鼓吹，切實進行，不過數年，生活必定可以得到丰裕。”各農民听了之後都說：“大

元帅的指导，我們一定要照着去做。”接着高呼：“大元帅万岁！”

有一个时期，陈炯明部在惠州石龙一带进扰，来势猖獗，大有威胁广州之势。沈鴻英看风驶帆，把駐在北江和韶关一带的部队秘密向广州移动，准备响应陈炯明。先生事先接到情报，命滇軍范石生率部防守北郊和大北門、越秀山、小北門一带战线。当沈鴻英实行叛变、率領集中在广州北郊石井圩一带的部队向广州急进时，先生立刻率領黃惠龙、我和几十名卫士渡过珠江，乘汽車直上越秀山五层楼。沿途看見小北門、越秀山一带的滇軍并没有作战准备，連守卫和崗哨都没有布置。先生进入五层楼，望見范石生躺在床上吸食鴉片，三个勤务兵一齐动手烧烟装斗，还是供应不上。先生登时震怒非常，指着范石生說：“范軍长，我已命你警戒这一带地区，現在敌人已迫近了，你不特全无准备，并且絕无察觉，如此将置軍法于何地？”范石生正在吞云吐雾，忽聞有人向他大罵，抬头一望，才知道原来是孙中山先生，登时手足失措，慌慌张张地爬起来，作立正姿势，行一鞠躬礼，但身子仍然不住地顛动。先生高声說：“馬湘，你立即率領各卫士拿这里的机枪去布置障地，听我指揮。”我大喊：“奉大元帅命令，取机关枪杀敌。”隨即取了范軍的輕机枪三挺、重机枪二挺，至五层楼西边至大北門一带城墙上，选择了地形和射界，布置好了障地，等候先生命令。先生步出五层楼，在城墙上用望远鏡探視，黃惠龙和几个卫士持手机枪随着，范石生也跟隨在后面。此时范石生的部队已知道了大元帅和范軍长亲自督陣，都佩好武器，紛紛赶到，坐下的坐下，臥倒的臥倒，准备作战。沈鴻英軍先头部队大約有二三百人，快步前进，进到距离大北門約七八百米突，便紛紛蹲下，放了一輪步枪。先生見敌人蹲下，也把身子臥倒。这时敌人的子弹紛紛从上空掠过，呼呼作响。先生十分謹慎地用

望遠鏡注視敵人的動作。敵人放了一輪槍之後，又紛紛起來向大北門急進。及至敵軍進到距離四五百米突時，先生忽然站起來，大叫“快放！”登時五挺輕重機關槍、二十幾挺手提機關槍一齊劈劈拍拍響了起來，滇軍的步槍、機槍也接着開了火。各衛士個個都是一等射手，槍無虛發，一輪猛烈的火力立刻把敵人壓倒了。幾百個敵人死的死，傷的傷，逃跑的跑不到幾十步也倒了。敵人的後續部隊也紛紛潰退，行伍大亂。先生看清楚了這些情況，遂高叫：“范石生，你立即率部追擊，不許敵人有喘息機會，一定要把敵人消滅。”范石生振起精神說：“我盡力去干，不敢再負委任。”言畢，對他的部屬說了一些話，便帶同衛弁和千多名官佐士兵，從大北門向三元里急進。先生態度安詳，在城牆上時時用望遠鏡細心觀看。不及兩小時，敵人已敗退二十餘里。不久范石生以軍用電話來報：石井圩已克復，俘獲敵兵敵械不計其數，現正向殘敵窮追。先生遂率領衛士們返回大元帥府。

滇軍第一師師長趙成樑在第一公園行結婚禮，事前來見先生，請先生作証婚人，得到先生應允。到了那一天，趙把中央公園的結婚禮堂布置得異常富麗堂皇，所用一切器物無不極盡豪華。先生進入客廳坐下，接着楊希閔、劉震寰等高級將領都進來了，紛紛向先生敬禮。先生有些不耐煩，催促趙成樑舉行婚禮。婚禮完畢後，先生即起身告辭說：“我因公事極忙，不能參與盛筵了。”趙成樑懇求稍待，一面吩咐開席。先生說：“不能，不能，公事急需處理。”趙成樑不敢再說，只得送先生登車。翌日，趙成樑派員送一百元席金來，先生放在辦公桌上，沒有理會。過了一個月後，我對先生說：“趙成樑送來的席金還在台上呢。”先生說：“你拿去，我不要。”我又說：“先生用來加菜好么？”先生很不耐煩，甚至帶着一些

怒氣說：“你拿去，你拿去！”

先生在一九二四年，每星期都到廣東大學講演三民主義。有一次剛到北岸步出碼頭時，見一婦人坐在堤邊哭得很苦，大家都沒有理會她。先生走上前去，看到這個婦人抱著一個面黃肌瘦、大約有四五歲的小孩，衣服也破爛得很。先生問她為什麼哭得這樣淒苦。婦人說：“孩子病了十多二十天，沒有錢醫治，看看將近要死了，叫我怎不傷心？”說完又痛哭起來。先生伸手替她的病孩診了診脈，對婦人說：“你不要哭！小孩的病雖然重了一些，但脈搏、呼吸都還好，不會死的。”說完命我用電話告知廣東大學醫科附屬第一醫院，請他們派十字車把這婦人和病孩載往留醫。他吩咐完畢，才到廣東大學去講演。

先生每次到廣東大學講演三民主義，都是從河南士敏土廠大元帥府乘坐電船渡江，然後再乘汽車前往。同行的人有秘書黃昌谷和副官衛士等十多人，需用汽車三部。有一次先生回到大元帥府，吩咐副官把庶務請來，問他每次到廣東大學講演，往返的汽車費多少。庶務回說：“每往返一次，三部汽車共計要一十五元。”先生說：“往返路程不到五華里，便付出車費十五元，花費太多了，以後不必用汽車。”從此以後，先生每次到廣東大學講演三民主義，都是率領着副官、衛士等步行前往。

廣州人有很多都認識先生，原因是先生每星期到廣東大學講演三民主義時都是步行，而且時間和所經過的道路都有一定。因此，知道這種情形而又希望瞻仰先生儀容的人也就越來越多，先生所經過的街道，常常兩旁都站着許多人。有一次，有一個約八九歲的孩子，滿身骯髒，在馬路上跑來跑去。一個衛士見這個小孩阻礙着先生前進，便跑上前把小孩推開。先生面上馬上露出不愉快的顏

色，回到大元帅府后，叫这位卫士进来对他說：“刚才回来时，你把路上的小孩推开，这是极不應該的。我自然会耻开这小孩，小孩怎能阻碍我走路？他年幼无知，倘若把他推倒，更要使我难过，以后不要这样做了。你可把我的話报告队长，叫他命令全体卫士注意。”

有一次，先生在广东大学讲民族主义，因为礼堂不大，听众又多，加上天气又热，因而有許多听讲的人十分疲倦，有的还睡着了。先生为了提起听众的精神，便串出一个故事說：“我少年的时候在香港讀書，看見了很多苦力工人聚在一起，談得十分起劲，有的哈哈大笑，有的搖頭叹息，还有些不管旁人談話，聚精汇神地賭博。我觉得奇怪：大笑的是笑什么？既然有人大笑，为什么同时又有人叹息呢？便上前問个明白。有一个苦力說：‘后生哥！你讀書好了，知道我們的事于你无益。’又有一个說：‘我告訴你吧！我們有一个行家，辛辛苦苦地积蓄了五块钱，买了一条馬票。我們都是沒有房子住的，住在騎樓底下。他便把馬票藏在日常用来挑东西的竹槓里，用烂布塞住槓头，人不知鬼不觉，既不怕被人偷窃，更不会遺失。他把馬票的号碼牢牢記着，安心等候开奖。后来馬票开奖了，中头奖的正是他，便喜欢到万分，以为領奖之后可以买洋房，做生意，这一生再也不用这根挑东西的槓子討生活了，便把这根槓子狠狠地向大海里一丢，跑到售馬票的商店探問領奖的手續。店員告訴了他，并叫他拿馬票到指定的銀行提取奖金和开戶存款。这时苦力才猛然想起馬票放在竹槓里，便拚命跑到海边去，希望把竹槓尋回。可是哪里还有什么影子呢？我們笑的是笑他錢还未到手就把竹槓丢了，还带有幸災乐祸的思想。叹息的是可惜他一个現成的富翁做不成，是带有同情的思想。現在我們这位行家因刺激过甚，

神經十分錯亂，到現在還沒有上工呢。”先生說完了這個故事便接着說：“民族主義就是這根棍子。”听講的人听到中山先生所講的故事后，果然都大笑起來，再沒有人打瞌睡了。

一九二四年六月中旬，黃埔軍校舉行開學典禮，先生蒞臨主持，主席台上有廖仲愷、李濟深、周恩來、鄧演達、蘇聯顧問鮑羅廷、加倫等人。几百個學生穿着蘇聯式的軍裝，個個精神煥發。先生在開學典禮講話中說：“在几十年的革命事業中，既取得了成功的經驗，也取得了失敗的教訓。中國革命所以遲遲不能成功的原因，就是沒有自己的革命武裝，沒有廣大人民為基礎。現在無論那一支軍隊都是假借革命之名，實行割據之實；只知爭奪地盤，截留稅款，開烟開賭，以擴充實力，並沒有真正為革命效力的思想。現在為了完成我們革命的使命，所以我才下定決心改組國民黨，建立自己的革命軍隊，誓把革命進行到底，這就是創辦黃埔軍校的宗旨。我們應該感謝蘇聯給我們的幫助，希望大家發奮圖強，好好學習。”

（十三）中山先生北伐和北上

一九二四年春，陳炯明勢窮力蹙，退據廣東的東江，不敢再作進窺廣州之想。先生乃派出得力部隊東征。同年秋，先生督率湘、滇、粵、桂、贛、豫、川、陝各路大軍，出師北伐，設大本營于韶關南華寺。豫軍總司令樊鍾秀請增撥彈械，愿率所部作前驅。先生尤其所請，樊遂率部奮勇直前，入江西，過湖北，經河南進至陝西。

顧問馬蘇（東莞人，以販賣中國舊畫至外國為業）至大本營，听到副官馬均（加拿大籍，猶太人）說：“大本營參軍處由我指揮，副官處由我指揮，秘書處也是由我指揮。”馬蘇很惊異，找我談這事。我說：“哪里有這一回事？馬均不過是一個少尉副官，每個

月支薪水三十元。他这样吹牛，定有其他企图，在外招搖撞騙更是意中事了。請你有便把这事向大元帅說明。”不久馬苏对先生談起这事。先生听了之后没有什么表示，第二天軍需处把馬均叫了去，給了他三百元，并对他說：“大元帅叫你另寻职业，不必再来工作了。”从此以后，馬均就一直沒有再見到先生。

北洋軍閥張作霖派代表徐光汉，段祺瑞派代表許世英，先后到南華寺大本營來見先生，邀請先生到北京共商國是。先生遂決定北上。

先生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离开广州，十七日到达上海。这时有某軍閥派凶徒多人，准备在碼頭上行刺，被民智书局职工所探悉，向我密报。我遂与黃惠龙等多人，在先生步出輪船时持枪左右前后护卫，登車后又持枪分向前后左右警戒，同时淞沪护軍使卢永祥亦派有大队軍警在碼頭一带布防拱卫，因此并没有发生意外的事情。

先生到上海后，招待新聞記者和老革命党人开会演說，发表談話，整天忙个不了。先生在上海停留約两星期，然后乘船經過日本，前往天津。夫人、戴季陶、黃昌谷随行，我与黃惠龙跟随侍卫。輪船抵日本神戶时，日本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百多人前來欢迎，一致表示願輟學归国听先生驅策。先生勉勵了他們一番，并囑他們用功研究軍事学科，将来回国为国家出力。他們还打算公宴中山先生，先生叫他們不要浪費時間和金錢，辭謝了他們。第三天，日本各界人士和学生共千余人，在神戶大学礼堂开欢迎大会（日本皇族沒有参加）。先生演說达四小时余，听众頻頻鼓掌，情形十分热烈。翌日，日本知名人士头山滿、山田、萱野长知等以及先生在日本时認識的七八位友人先后来見，稍作叙談即告辭退出，只头山滿一人

留下，由下午九时起一直談至天明。头山滿还用電話請了一位日本大財閥(忘其名字)到来，介紹与先生相見。这位財閥对先生执礼甚恭，头山滿表示这位財閥能帮助中国建設，建議先生回国被选为大总统时聘他为顧問，中国建設事业就不患无資本，又表示他誠心希望中国富强，中日互相帮助。隔了一天，先生帶領副官、秘書等搭长崎丸回国。

十二月四日，长崎丸到达大沽口时，赵超、刘維熾、李仙根、孙科、孔祥熙、朱子文等十多人来接。到天津时，学生界搭大牌樓欢迎，先生当即对学生們演說。先生和一班随从人員都住在张园。到天津后第三天，张作霖派員來說，在天津行轅举行欢迎大会，請先生蒞臨。先生帶同我和黃惠龙前往，和张作霖會談了四小时。翌日，张作霖到张园來見先生，一連來了二十輛汽車，卫士足有百多人，戒备十分森严。张作霖向先生表示，他决心追随先生，并說他愿作先生的卫士队长。我和黃惠龙、邓彥华、赵超各人都站在客厅阶前，张作霖的卫队也有十多个人，和我們站在一起。其中有一位戴着上校肩章的軍官問我說：“孙中山先生的随从卫士有多少人？”我回說：“六人。”他听錯是“六营”，觉得很惊奇，伸出指头問我說：“一、二、三、四、五、六？是六营？駐在哪里？”我觉得他这个样子实在可笑，便再說明是六个人，不是六个营。他又很诧异，觉得人数太少了。他看見我佩着一枝銀色的新式手枪，便請我給他看。我說：“大元帅有命：‘武器不能給人家看’，对不起了。”他又問这种新式手枪能抵敌多少人。我說：“一发可以击毙十人。”他沒有露出怀疑的样子，好象很相信我的話。

(十四) 中山先生臨終以前

先生从广州到上海,由上海經過神戶,由神戶到天津,每到一处,不是招待記者,便是出席欢迎大会,或与各地知名人士会談,尤其是与头山滿、张作霖的談話,所費時間更多。先生稍有余暇也不休息,还要讀報紙,由于忙碌过度,在张作霖來訪之后,便生起病来。那时請了一位德国医生替先生診病,每天服藥,注射,一連八九天都不見效。到了年底,先生为了急于与段祺瑞、张作霖等各人会商召开国民會議問題,不顧身体健康,扶病到北京,住在北京飯店。先生到北京之后,病勢加重。当时大家商議,拟送先生到俄国医院就医。先生以俄国医院設在东交民巷,不愿进去,因此仍在北京飯店,每天都請德国医生来看病。过了十多天,先生病勢有增无減,轉到协和医院就医,孙夫人同往,又請中医施今墨診治,也沒有見效。过了半个月,进行割治。在施手术时,只限四人进入手术室,这四人是鮑罗廷、孙科、孔祥熙、宋子文。我在門外听到先生說:“不怕痛,开刀吧!”开刀后發現肝脏滿布白点,鮑罗廷主张把白点割去,医生不同意,仍把伤口縫合。經過开刀之后,夫人看到先生的病勢实在危險了,不住地流泪,問医生先生需要經過几小时才醒。医生說要二十五小时。我在手术室外用小凳坐着,等候先生回醒过来。医院的看护不允許,只得站在門外守候了一天一夜。先生醒了以后,刚好馬超俊到来,我請他暂时守卫,自己回去吃飯、洗澡,稍事休息。天剛亮,我又急急到来,和馬超俊等輪流站着守卫。李石曾煎了几次人参湯給先生喝。过了十天,先生問医生:“我究竟患了什么病?几时才可以痊愈?我也懂得医学的。”医生答:“請孙博士写遺囑吧!”各人听了医生的話,觉得先生的病已危在且

夕，于是用电话通知孔祥熙、孙科等速来医院，又请俄国医生再来诊断。各人到了之后，决定用十字车送先生至行轅，由孙夫人、俄国医生、协和医院护士和我四人护送。下車时，因先生伤口未愈，不能过于震动，遂由我用双手把先生托起，慢慢地从车上送至床上。护士整理床上洁具，交我洗滌。我见先生排出的粪便其色甚黑。张静江看见了问我，先生每日吃的是什么？我告知他先生每日只吃牛肉汁，都是由我到协和医院取回来的。有一次，先生要吃葡萄，但这时葡萄甚少，我乘着汽车几乎找遍了北京城，才买了一些回来，先生只吃了二三枚，就不愿再吃了。何香凝每天都来慰问孙夫人。过了三天，夫人对我说：“先生命你进去。”我遂到先生床前站立。先生说：“我双足麻痺得很，抱我起来坐坐！”我说：“先生伤口未愈，不可起来啊！”说着就傍着床沿跪下，把先生的左足放在肩上，慢慢地按摩。按摩了一些时，先生睡着了，我又替先生按摩右足。天将亮了，先生醒来，对夫人说：“我一定要死了，马湘一生跟随我，必须养他过世，教育他的子女到大学毕业。”再过了三天，到了三月十一日的晚上，我又进到先生卧室，这时先生、夫人和护士都睡着了。到夜深三时，先生醒来，呻吟不絕，并且不断地喊着：“同志啊！继续我的主义！以俄为师！”我看见先生这样痛苦，于是叫醒了夫人，又把人参湯給先生喝。到翌日早上六时，汪精卫来看視先生的病，握着先生的手说：“先生！我是精卫。”接着何香凝、宋子文和俄国医生都进来了。宋子文请俄国医生用安眠药給先生吃，让先生好快些死。我听说大怒道：“你要用安眠药药死先生，我先打死你！”宋子文就不敢再说了。这时客厅里徐紹楨、李石曾、馬超俊、张静江等很多人在座，段祺瑞也派許世英代表前来問病。許世英来至先生卧室門外，行最敬礼后恭敬地说：“大总统！段执政即要来

見。”先生就在这時死了！孫夫人見先生已死，痛不欲生，何香凝等一直不離左右，扶持勸慰。先生在病中已幾十天沒有理髮，我遂札理髮匠林耀光請來，替先生遺體理髮。林畏縮不前，我向他解釋說：“你跟隨先生擔任理髮，時間已不少了，接觸也慣了，又不是陌生的人，為什麼生時不怕，死了就怕起來呢？待我用棉被靠著他的背部，用手扶著他的頭部，你來動手吧！”他起初還是很勉強地操作，但後來也就不怕了。夫人將剪下的頭髮用玻璃盒保存起來留作紀念。

回忆先君克强先生

黄 一 欧

先君克强先生逝世，忽忽已四十五年。忆自一九〇四年春，随先君就读长沙明德学堂，后来东渡日本，奔走海外，十余年中，聚少离多，回思往事，百感交集。现就我所知道的关于先君生活的片断材料，随笔述之。但因事隔多年，记忆模糊，错漏在所难免，希望前辈先生不吝指正。

应 县 考

先君曾对我谈过他青年时代的一些故事，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应县考。

先君十八岁那年，和姑父胡雨田以及同村的刘石介，一道往应县考。三个人进了考棚，凑巧都被分配在同一个字号。当时应试要做八股文，规定黎明前进场，即日交卷，不许熬油。这天，先君最先打完草稿，但是看了又看，很不满意，想另写一篇。而胡、刘两人正在搜索枯肠，还没有定稿。先君这篇文稿便被刘石介要去誊正，作为他的试卷。先君随后写好了第二篇，仍然觉得没有写好，结果又被胡雨田要去顶替了。最后先君聚精会神，写好第三篇，自己才感到非常满意。不料发榜时，胡、刘两人都是榜上有名，唯独先君名落孙山。先君落第回家，担心先祖父不高兴，他不好意思地

将三份文稿都拿给先祖父看。祖父看过之后，也认为第三篇胜过前两篇。这时，先君才解脱了心头的疙瘩。

到了次年春天，先君又往应考。动身的前夕，亲友置酒预祝，先君不以为然，表示读书要求真学问，赴试仅仅是母命不可违而已。他写过一首《别母应试感怀诗》，结句有云：“一第岂能酬我志，此行聊慰白头亲”。在应试期间，先祖父病故，继祖母特意瞒着先君，不使他知道，以便让他安心应考。这次，先君入县学为诸生，没有辜负老人家的期望。

华 兴 会

一九〇三年夏秋之间，先君由日本回到了长沙，在明德学堂教书，暗中联络同志，酝酿组织一个反抗清朝统治的革命团体。

这年十一月四日（阴曆九月十六日），是先君三十初度。一些具有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聚集在长沙西区保甲局巷彭渊恂（号希明，长沙人）家里，借为先君做生日酒的名义，办了两桌酒菜，举行秘密会议。到会的有彭渊恂、周震麟、张继、柳聘农、陈方度、徐佛苏、谭人凤、苏玄瑛、吴祿贞、陈天华、宋教仁、黄牧、柳继忠等二十多人。会上，决定设立华兴会，公举先君为会长。但为避免清政府的注意，对外采用“华兴公司”的名义，以半公开的形式出现，并规定公司的任务是“兴办矿业”，集股一百万元，作为“开矿资本”。实际上是以“矿业”二字代“革命”，“入股”代“入会”，股票即是会员证。当时还提出了两句口号：“同心扑满，当面算清”。这两句口号，骤然听起来，象是谈的生意经，实则含有“扑灭满清”的意思。这次集会，可以说是华兴会的一次筹备会。到了次年二月十五日，才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正式召开成立大会。

华兴会成立后，先君又另外創立了两个小团体：一是同仇会，专为联络哥老会、策动会党参加起义的机构；一是黄汉会，专为运动军队参加起义的机构，陈天华、姚宏业、陈方度、黄牧等人都做过这方面的工作。

一九〇四年的出走

一九〇四年秋，先君謀于西太后“万寿”节在长沙起义，事洩失敗，化裝改名逃走。关于这一段史实，言人人殊，其說不一。那次出事，我是在場目击者之一，印象最深，虽然隔了五十多年，记忆犹新。

那年，我随先君在明德学堂小学乙班讀書，陈果夫时名祖廉，与我同班。当时明德学堂师范班設在湘春街左文襄祠，中、小学設在西园周氏花园。我家則賃居紫东园，离左文襄祠仅二三百步。阴历九月十六日，为先君三十周岁。这天，他亲自下寒茵面招待三位进城的姑媽。大約是早上七点鐘，西园龙宅差人持帖子来請先君去，先君正准备下面，沒有去。过了半个多鐘头，龙研仙先生第二次差人持帖子来催，先君說，面还没有下好，吃了面就去。先君祖母非常机警，她看到龙宅一連来了两次帖子，催得这么急，一定是有紧要的事，因此，催先君馬上就去，回来再吃面不迟。

先君刚刚坐轎出門，在門口就和来捕捉他的差役对面碰头了。差役見了他，便問：“你是黃軫嗎？”（先君原名軫，字廬午，后改字克強。）先君情急智生，鎮定地回答說：“我是来会黃軫的，他家里人說他到明德学堂去了，我要再到那里去找他。”于是差役跟着先君的轎子向西往左文襄祠走。先君到了明德学堂下轎，佯称进去喊黃某出来，叫差役們在門口等候。他进校后，就由靠西边的金华祝

老师住室旁的小侧門溜出，躲进了西园龙宅。差役在学堂門口久候不見有人出来，才知道上当了，只得将三个轿夫带走，把他們打得皮破血流。記得在一九一二年，曾有其中一个罗姓轿夫的家屬来过我家，先繼祖母还送过他一笔錢。

我原来是在学堂里住宿的，那天因是先君生日，头一天晚上就回家了。我看到先君出門就碰到差役来捉他，心里惊慌万分，便飞跑到学堂里，告訴平日最接近的沈迪民老师。沈老师叫我待在他房里不要出去，他自己急忙走了出去，找人設法让先君脱險。

先君先由明德学堂躲到西园龙宅內室，以后又轉移到吉祥巷圣公会黃吉亭处。十二月二十六日深夜，先君化装海关人員，由黃吉亭、曹亚伯护送，乘一小船至靖港，搭輪船赴汉口轉往上海。从圣公会臨走前，黃吉亭囑先君到达上海后来一电报，俾使此間友好知道他已經平安到达目的地，并为了保密起見，約定电报只署一“兴”字。先君到上海后，如約打了一个“兴”字电报給黃吉亭。从此以后，他就改名“黃兴”了。

习 射 击

先君于一九〇四年起义失敗出走后，有株連全家的危險。因此，一九〇五年秋天，我便同湘潭黃积成(后在士官学校习測量)一道去日本。到日本时，正是同盟会成立后不久，先君已往南洋去了。次年秋天，先君自南洋回到东京，住在牛込区东五軒町林館。記得初到林館的时候，先君就要我到相距不远的麴町区靖国神社去參觀(那里陈列着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所存得的战利品)。先君說：“你去看一看，就晓得我們国家成了个什么样子！”

每逢星期日，如无特殊事故，先君必定抽空前往麴町区神乐

坂“武术会”参加射击比赛，有好几次是带着我一道去的。当时参与比赛的，除了各阶层的日本人之外，中国人去的也不少，辛亥革命后担任过国会议员的湘阴陈嘉会，就是经常和先君同去的一个。

“武术会”的竞赛，每次先分小组初赛，再由各小组优胜者进行决赛。先君的射击技术很好，每射必中，弹无虚发，因此，名次总是很高，得的奖章不少。在他的书桌抽屉里，各式各样的奖章堆得满满的，有银质、铜质的，也有一种象景泰蓝一样的质料的。我有时趁先君外出未归，打开抽屉，拣出几枚佩在胸前，自鸣得意。有一次还瞒着先君，佩着奖章到附近的一家照相馆照了一张相片。

剪 辮

一九〇三年先君由日本回国，就剪掉了辮子。其时剪辮子的人并不多；有的人虽然剪了辮子，可是回国之后，又在头上装了一条假辮子，如柳聘农就是这样。

一九〇六年秋天，周震麟先生从国内来到东京，住在先君寓所。第二天，先君有事外出，临走时嘱我陪周先生往浴室洗澡。我因想到日本人素来看不起留辮子的中国人，尤其是小孩们见了就嘲骂，呼作“辮辮波子”，于是便怂恿周先生剪掉辮子再去洗澡，并且说做就做，拿了一把快剪，兴奋地给他把辮子剪掉了。先君回寓之后，看到周先生剪了辮子，非常惊诧，问明原委，才知道是我的恶作剧。先君把我叫到他的住室，厉声呵斥道：“你晓得吗，辮子要留都留不起，怎么可以随便剪掉？以后再不许胡闹！”

不久之后，谭人凤先生到日，也拖着一条辮子。我因吸取前次的教训，就不敢轻举妄动了。谭老先生是为了奔走革命便于掩护而留着辮子的，一直到辛亥革命时才剪掉。

刘道一

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刘道一在长沙就义。他是同盟会会员中为革命牺牲的第一个人。噩耗传到东京，先君悲痛万状，经久不能自己。

先君在长沙创立华兴会，刘道一是最先加入的一个。一九〇五年七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开筹备大会，他和先君一道宣誓加盟。刘道一每到一个地方，住上几个月，便学会了当地的方言；到日本后，日语、英语都说得很流利。同盟会的对外交涉，他曾尽了很大的力量。他生性好动，火气很大，容易和人家发生争论，有的人称他为“暴徒”。

一九〇六年，刘道一和蔡绍南、彭邦栋、成邦傑等被派回湖南，运动军队，重振会党。这年十二月，浏阳、醴陵起义，他是领导人之一，后来在衡山被岑春煊派人逮捕，严刑拷打，以所佩印章“锄非”二字罗织成罪。

刘道一被捕的消息，最先是刘揆一告诉先君的。当时他们曾从各方面设法营救，终归无效。先君听刘道一被害的消息后，曾经不止一次地怀着无限沉痛的心情对别人谈过：“炳生（刘道一别号）平日锋芒太露，不稳重，人才难得，真是死得可惜！”

先君曾写过一首七律，哀悼刘道一的惨遭牺牲：

英雄无命哭刘郎，惨澹中原侠骨香。

我未吞胡兴汉业，君先悬首看吴荒。

啾啾赤子天何意，猎猎黄旌日有光。

眼底人才思国士，万方多难立苍茫。

在小石川区

一九一〇年，我随先君住在东京小石川区，同住在一起的，有林时瑛、林觉民、何天炯、方汉成、李文甫以及方声洞之弟等十余人。当时大家的生活很艰苦，有一次连伙食费也筹不出来了，眼看就要断炊。先君拿出他的一件大礼服，要我去当了三十日元。我们十多个人就靠着这笔钱吃了一个星期的红薯，才勉强度过难关。

典当的期限到了，我把大礼服贖了来。在翻晒这件衣服的时候，出乎意料之外，从衣袋里发现一张一百日元的大钞。这张钞票是什么时候放在口袋里的，先君已经记不起了；我在送当时以及当铺中人收检时，都没有搜出来。忽然添了一笔意外之财，大家都很高兴。

先君对于衣着素来不大讲究，但求其整洁而已。即如这件大礼服，原是一九〇五年到东京后为了会见外宾之用而做的，到了辛亥革命以后，他的身体虽然发胖了，仍然穿着这件已经不合身的礼服去接待外宾。

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

一九一一年一月，先君由南洋到了香港，在跑马地三十五号设立统筹部，准备在广州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我于先君到香港后，也由日本来到香港。这次，我冒宫崎龙介之名，穿和服，讲日语，将由宫崎寅藏介绍向日本人仓地购买的驳壳枪五十支、勃郎宁二十支和子弹一万余发，分装四口皮箱，运到香港交给了统筹部。

这年二月，党人龔敬夫从其亲戚张通典(湘乡人，时为广东巡警道衙門文案师爷)处，打听到巡警教練所有几名缺額可补。先君认为这是一个不可错过的好机会，因为教練所有學員四百余人，枪支二百支，如能掌握在我們手里，对起义会发生很大的作用。同时，派人进去，既可以联络同志，熟悉广州的街道和当地方言，又可以借巡警學員的合法身分作掩护，参与起义活动。于是，决定派我和陈方度、柳聘农、胡国樑四人同往应考。我們都是湖南人，陈方度的年龄最大，我最小。在香港动身时，先君嘱咐我两桩事：一是要戒骄戒躁，謙虛待人，好好联络同志；二是要听从陈方度的調度，不要各搞一套。我們到达广州后，立即报名应考，結果都考取了。但一时找不到保人，到三月初才由张通典、周达夫(同盟会會員，湘阴人，时任广州西关警察署长)分別担保，入所受訓。我們一面积极联络同志，一面等待发难的命令。当时全所學員四百多人，每支步枪有子弹五发。自温生才炸孚琦后，外間风声很紧，巡警道衙門怕學員出問題，把子弹都收去了。

阴历三月二十五日(阳历四月二十三日)，先君由港到省，确定三月二十九日发难，并将原来决定的十路进攻計劃，临时改为四路。其中陈炯明一路进攻巡警教練所，由我們作內应。二十九日午后二时許，我們四个人一起去見該所所长夏寿华(益阳人)。陈方度对夏談了一番革命道理，并出示手枪(統筹部发給我們每人手枪一支)对夏寿华說：“我們就是革命党，今天下午五点半鐘就要发难了。”夏寿华對我們說了一些同情革命的話，并堅留我們喝一杯酒。我們在夏寿华的签押房里吃了酒菜，就飞奔到小东营五号机关里。先君正在发号施令，整裝待发，沒有和我們多講什么話，只交代陈方度赶快回去，待机行事。于是我們又匆忙跑回巡警教練所，等待

陈炯明来攻，以便里应外合。不料陈炯明不按计划行事，初以全力守大南門，后则并大南門而不守，因而坐失良机，对整个起义影响很大。先君后来还几次对我谈到陈炯明这次的誤事，感到十分愤恨。

八字家书

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首义，中外震惊。先君由香港打电报到东京，要我急速去港。我赶到香港时，先君已經动身去上海，胡汉民坚留我和其他一部分同志在香港，等待广州发难。后因陈其美从上海連来两次急电，說需要人力支援。于是胡汉民叫我和赵光（赵声之弟）、洪承点等七八人速往上海。到上海后，才知道先君刚赴武汉督师。十一月四日，上海方面攻下了制造局，洪承点等即着手組織军队，以原第九鎮一部分官兵、上海参与起义的警察以及巡防营士兵为基础，組成沪軍，并推洪承点和我担任沪軍正、副司令。

这时，武汉战事正在剧烈进行中。先君托张竹君（女，上海南市医院院长，武昌起义后組織紅十字会救护队去汉阳前綫，这时回上海采购药品）带信給我，要我赶快到武汉去。我因沪軍刚刚組成，又須往鎮江、杭州等地联络，不能抽身前往。随后不久，先君从汉阳前綫寄了一封信給我。拆开一看，仅仅八个大字：“一歌爱儿，努力杀賊”。这是先君因为我不能到他身边去，在軍书旁午之际，特地写来勉励我的。

就在接到这封信之后不久，汉阳战事危急。为了策应汉阳战事，牵制清軍兵力，我就率領沪軍，会同浙、苏、吳各处民軍，陸續开到鎮江，会合当地民軍，推第九鎮統制徐紹楨为联軍总司令，协力围攻南京。十二月二日，南京光复。

“南北一家”

一九一二年六月十四日，南京留守府撤銷，先君解職，退居上海。這年秋天，袁世凱邀請中山先生和先君入京會談。先君本來是不準備去的，中山先生到了北京以後，來電極力敦勸，先君才於九月十一日入京，待了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即行返滬。

據隨先君入京的秘書陳鳳光（湘陰人，後任國會議員）告我：先君至京時，袁世凱表面上殷勤接待，禮遇甚優，並請中山先生和先君提出租界人選，而暗地則密派心腹隨時偵察先君的行動。當時京中人士到處開會歡迎，先君蒞會演說，宣傳三民主義。有一次，湖北旅京同鄉在湖北會館開歡迎會，先君演說之後，會館負責人請他題字。先君不假思索，立即寫了“南北一家”四個大字。斯時斯地，題這四個字，是十分發人深省的。

拒絕袁世凱的籠絡

一九一二年九月七日，袁世凱授先君為陸軍上將；同時授為陸軍上將的，還有黎元洪和段祺瑞。這年雙十節，又授先君勳一位。

授勳令公布後不久，袁世凱派專使到上海同孚路先君寓所，送來陸軍上將特任狀、授勳令和勳章，另外還有幾件禮物和兩匹英國種寒驢玉點馬，先君當時勉強收下了。來人去後，我因為好奇，將勳章佩在胸前，左右顧盼。正在這個時候，先君上樓來了，我感到非常尷尬。先君嚴肅地對我說：“這有什麼用！你知道嗎，這是袁世凱的籠絡手段，可是我不會上當的。”接着又說：“這些東西都要退回去，把馬留下來。”我問先君：“為什麼要留馬？”他說：“因為將來還要我打仗的。”他隨即將特任狀、授勳令、勳章以及所

有礼物都退回去了，只留下两匹马。每天清晨，先君要我骑着马到寓所对面的打铁浜骑马道去调教，他自己则站在阳台上观看。

一九一六年双十节，北京政府又授先君以勋一位，先君也坚决拒绝了。

“卅九年知四十非”

先君向来不喜欢人家做寿送礼，作无谓的应酬。他自己的生日，总是随随便便地度过的。一九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为先君三十九岁初度，也未宴请任何宾客。他于由沪返湘途中，在楚有号兵舰上曾作了一首生日感怀诗：

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风歌罢不如归。

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

入夜鱼龙都寂寂，故山猿鹤正依依。

苍茫独立无端感，时有清风振我衣。

这首诗的原稿，连同先君使用过的一支猎枪和其他几件遗墨、遗物，我已于一九五三年捐献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忆 声 洞

王 穎

声洞在一九一一年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为革命牺牲，到现在已经整整五十年了。五十年来，声洞一直活在我的心里。我和声洞只在一起度过二年多的共同生活，就生离死别，永隔人天；然而他那种献身革命的耿耿忠诚和对我的真挚的伉俪之情，却使我毕生难忘。我现在年逾七十，鬓发已霜，每当回忆往事，犹觉仿佛置身五十年前，内心激动，久久不能平静。

我是二十岁那年(一九〇八年)和声洞结婚的。声洞比我长三岁，那时正在日本千叶医学专门学校学医，他的父亲在汉口经营转运公司，家居汉口。我家因我的大哥景岐在京汉铁路供职，原住在郑州。先一年暑假，声洞回汉省亲，在亲戚家中看到我和家人合摄的照片，非常中意，就托人说媒。恰巧我大哥因公到汉，在亲友撮合之下，他就应允了这门亲事。次年，我家因大哥调汉口工作，也迁居汉口。暑假期中，声洞回国，我们就在汉口举行婚礼，婚后十天相偕东渡。声洞继续在千叶学医。我起先和声洞的七姊君英、四嫂曾醒同住东京。第二年暑假，我因怀孕，身体有病，声洞把我接到千叶居住，以便就近照料。我小产后，也入千叶学校学习产科。

声洞襟怀磊落，肝胆照人，处世接物，极富热情。他一面在千叶学医，用功甚勤，对病理学钻研尤精；一面从事秘密革命活动，并

且屢屢託詞向學校請假，回國聯絡黨人，秘密運送軍火，往返奔波，非常辛勞。我到日不久，他為了便於進行革命工作，便介紹我加入同盟會，這時我才知道他十七歲東渡日本後，同盟會一成立他就參加了。他常常把國內政局和世界形勢以及革命救國的道理講給我聽，並且說，我們的小家庭雖然很圓滿，但是有國才能有家，我們不起來救國，中國就有亡國的危險。我從小因為父母非常鍾愛，嬌生慣養，根本不懂得世事的艱難，對國家大事更是茫無所知。結婚後，在聲澗朝夕熏陶之下，我才明白了許多事情和一些革命道理，舊有的闊闊習氣也逐漸改掉了。

我們的小家庭生活，的確過得十分圓滿。聲澗待我真是體貼入微，愛護備至，即使一些日常生活瑣事，也替我照料得很周到。當我們的兒子賢旭出生的時候，他守在我的身邊整整三天三夜，寸步不離，好像是要替我分担一份分娩的痛苦似的。賢旭出世以後，聲澗非常珍愛。有了孩子，我們的小家庭生活更溫暖、更幸福了。可是，儘管如此，聲澗却總是對我流露出一种歉然的心情，往往無緣無故地說出“真對不起你”這樣的話來。我當時不明白他為什麼如此，後來才懂得，這是因為他已經抱定獻身革命的決心，隨時有丟下我和孩子、犧牲性命的危險，但是又不便對我明說，所以才有這種心情流露出來。但是，我當時陶醉在我們的溫暖、歡樂的小家庭生活之中，充滿了幸福之感，怎麼能夠覺察到他內心深處的這種隱衷呢！

一九一一年年初，我听聲澗說，革命黨人原定八月間在廣州起義，因事機不密，被清朝政府偵知，不得不提前舉行。陰曆正月間，留日同志陸續回國準備發難，留聲澗一人在東京主持一切。二月中旬某天（約十六、七），聲澗接到國內黨人來電，即去東京，次日回

来，告訴我說，起义即将发动，因軍火不足，須立即密运一批回国接济。我听说，非常难过，便对他說：“你上有父母，下有妻子，現在我又有孕在身，你走后我在日举目无亲，如果你有个什么万一，叫我怎么办呢？”声洞以十分乐观的口吻安慰我說：“中山先生奔走革命十多年了，还不是安然无恙，难道我一去就会牺牲性命？”他还很有信心地告訴我，两周以內一定回来。尽管他如此安慰我，我还是放心不下，但又格于革命大义，不便拦阻，只得同意他去。声洞临行前夜，預先写好了十几封家信，叫我在他走后陸續填上日期寄回，以使家中安心，免生疑慮。他走的那天是二月十八日，恰逢賢旭滿周岁，我們还到照相館里照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我們二年多的美滿幸福生活的一件最珍貴的紀念物，我一直保存到現在。

声洞走后，我只身留在千叶，处境孤寂，心头悬悬，寢食不安。夜深时听得街头醉汉狂嘯，声音凄厉，更使我胆战心惊。三月二十九日以后，日本报載广州起义失敗消息，并說死难者多数是华侨和留日学生。我見报，既疑心声洞殉难，又觉得他如此活力充盈，不敢相信他会死去，内心焦虑，徬徨无主。几天后，君英姊来日接我回国。我問她，声洞現在何处。她說，起义失敗后，声洞已去南洋暫避，一时不能回来，說时神色泰然，一如平日。我旋又接到广州四月一日寄来一信，宛然声洞笔迹，內容大体如君英所說。我虽不敢遽断以为假，但未見到声洞，疑慮終难消釋。在无可奈何之中，我只得携着賢旭隨君英回国。

我于端午节到汉。方、王两家家人見我回来，都強作欢顏相迎，但神情之間总觉异于往昔。我因晚期将临，住母家待产。家人对我守护甚严，既不許我看报，三妹芝青且日夜同我作伴，以防我探知声洞死耗，致生短見。我日日夜夜盼声洞消息，往往在睡梦中仿

佛听得打門声，便猛然惊醒，厥起探看，以为是他回来了。以声洞和我情感之篤，即使他在天涯海角，也絕不会不設法給我片言只字。我料想声洞十有八九已經不在人世，日夜苦苦思念，竟至昏厥。医生警告我說，长此下去，腹中胎儿将难保全。我轉念声洞如果已牺牲，則应替他多留下一块血肉。因此，我乃竭力克制，強作鎮定，靜待分娩。

七月間，我产一女。产期中我回想当初賢旭出世时声洞伴我三昼夜的种种情景，更觉伤心万分，我母亲也不知陪我流了多少眼泪。八月十二日滿月，我把两家长輩都請来，恳求他們說，現在我已替声洞多留了一个后代，声洞是生是死，請明白告訴我；如果他确已殉难，我不論如何艰难困苦，一定要活下去，把子女撫养成人。我刚說完，滿屋子的两家男女老少都一齐放声痛哭，我也頓时昏了过去。

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后，某晚，革命同志通知我說，今晚危險，令我立即离家暫避。我携抱两孩匆匆离家，到日租界堂姊家避難。入夜，全市大火，我家房屋全部被焚，我手头所存声洞信函遺物都成灰烬，所幸声洞遺囑因我珍重保存，刻不离身，得免浩劫。三四日后，大哥景岐来汉，将我送往上海，与哥嫂合住。

民国元年，黄花崗烈士墓修竣，三月二十九日举行周年悼祭，我携賢旭由上海赶往广州参加。是日，我乘轎前往，到达声洞墓旁，只見黄土一坯，鮮花环绕，頓觉心如刀割，悲慟万分。我被人搀扶下轎，即仆倒墓旁，昏厥不省人事。賢旭时方两岁，倚在我身边哀哀号哭。在場来宾見我母子如此情状，也都落泪不止。

声洞殉难以后，几十年来我以全副精力撫育儿女，茹苦含辛，受尽折磨。一九一四年，我来北京入慈惠产科学学校繼續学完产科，

在首善医院担任产科主任。声洞生前，常对我说起，我国贫苦妇女死于生育的很多，将来学成回国，可自办医院，专为贫苦产妇服务。一九二八年，我因弱弟病故，老母乏人照料，即在家自行开业。为了实现声洞遗志，我一面施医施药，悉心为贫苦产妇接生；一面以行医所得，积资筹建医院，以纪念声洞。房屋建成后，无力购置器械设备，曾要求国民党当局补助，岂知竟被置之不理。国民党对待革命先烈，如此淡漠无情，真使我心冷。国民党政府南京博物馆曾屡次向我索取声洞遗嘱，我因对国民党已失去信任，始终未交出。

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对我关怀备至，照顾甚周，使我的晚年生活十分愉快幸福。我时常想到，倘声洞在世，亲眼看见祖国今天的繁荣强盛，他定会觉得已经远远超过了他当初所抱的革命理想，至于共产主义社会无限美好的前途，则更是他原来梦想所不及的了。

光复会見聞杂忆

· 周亚卫

(一) 关于光复会在杭州的一些情况

我在光复会的经历很少，在会中担负的责任既不大，接触面也不广，所以关于全局的事情知道不多。本文所记的只是一些片断的回忆。

求是书院和武备学堂

现今浙江大学的前身是浙江高等学堂，高等学堂的前身是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门前的大学路，原先叫做蒲场巷。求是书院和武备学堂都在蒲场巷的路东，院舍毗连，书院在北，学堂在南。书院的东南和学堂的东面，同临着一个大水塘，塘内绿波荡漾，景色悦人。武备学堂的大操场，在蒲场巷的路西，正对着求是书院。这个大操场现今已经盖满了住宅。

这一片地方，求是书院和武备学堂的所在地，是辛亥革命时期杭州的革命发源地。清末浙江的有名的文字狱——“罪辨文”案，就出在求是书院。武备学堂培养了許多新军干部，同时也出了不少革命人才。在杭州的同盟会会员和光复会会员主要是武备学生。武备学堂的革命气氛，还显露在大堂上的一副楹联上。联词是：“十年教训，君子成军，溯数千载祖雨宗风，再造英雄于越地；九

世复讎，春秋之义，愿尔多士修鳞养爪，毋忘寇盗满中原。”这副楹联用春秋九世复讎之义宣传排满革命思想（从顺治到光緒恰是九世）。从伍元芝总办开办武备学堂起，这副楹联就悬在大堂的前楹，地位很显著，字很大，人们一进武备学堂仪门（二门）就必然会看见。继任总办三多也没有把这副楹联换掉。后来武备学堂结束，在这里改办陆军小学堂，这副楹联照旧在起着号召作用。陆军小学堂第三期举行开学典礼，浙江巡撫增韞临场，在大堂上设案点名。点到“蔡宗勿”，这个学生听点，站到案前，增韞向他看了一眼，随手用红朱笔在“勿”字上加“竹”头，变成了“蔡宗笏”。但是，他正坐在两楹之间，却似乎没有理会到这一副“九世复讎”的楹联所含的深意。

一九〇六年的浙江新军

清朝编练新军之初，在浙江先练一个混成协（旅），以步队两标（团）为骨干。步队第一标在一九〇六年之前就已经成立了，驻在杭州城北的笕桥。标统（团长）李益智是旧派人物，标内各级干部有武备学堂毕业生，也有其他出身的。

一九〇六年夏天，开始编练步队第二标，电调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蒋尊簋回国，任第二标标统，先组织标本部和第一营的干部，人员如下：执事官（团副官）朱瑞，嘉兴人，南京陆师学堂毕业（那时标本部没有教练官）；第一营管带萧星垣，湖南湘乡人，浙江武备学堂学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督队官（营副官）徐则恂，青田人，南京陆师学堂毕业。四个队官（连长）：叶頌清，南京陆师学堂毕业；其余三人和排长十二人，都是武备学堂毕业生。司务长四人，也都是武备速成科毕业生。为了培养第一营的头目（正

目、副目，即班长、副班长），开办了一个弁目学堂，由标统直接领导。标本部、第一营营本部和弁目学堂在一起，都驻在杭州望江门外海潮寺。弁目学堂共招生二百人。学生年龄一般在二十岁上下，最小的十六岁，最大的有三十岁，文化程度一般相当于高小毕业和中学一二年級，其中有廩生一人，秀才三人。我那年十八岁，原在杭州府中学堂一年級讀書，夏間又考进了弁目学堂。全体学生分編为两个中队、八个区队。第一营全营干部都担任弁目学堂的工作——中队长二人，区队长八人，司务长二人，其余分教各課学术。七月开学，预定一九〇七年上半年內毕业，然后征新兵入伍。

一九〇六年秋天，清政府发表浙江混成协的司令部組織，北洋將領楊善德当首任协統。在这以前，两个标统直轄于巡撫和督練公所。督練公所是省級的軍事机关，为巡撫督練本省新軍的办公之所。靳云鵬曾經当过浙江督練公所总參議（巡撫的軍事幕僚长）。

秋瑾到杭州发展光复会

一九〇六年冬天，秋瑾来到杭州，在新軍界中发展光复会會員。她所吸收的會員，主要有以下一些人：督練公所有許耀，南京陸师学堂毕业；夏超，浙江武备学堂毕业；虞震，举人，浙江武备学堂速成科毕业。武备学堂有黃凤之、张敬忱、呂公望（呂是廩生，在武备学堂小队里当兵）。第二标有朱瑞；叶頌清，队官，南京陸师学堂毕业；周凤岐，廩生，浙江武备学堂毕业；俞焯，浙江武备学堂毕业。上列这些人中，朱瑞起的领导作用較大；夏超政治活动較強；俞焯最年长，在同志中和在社会上联系面較广。

秋瑾在弁目学堂的学生中，起初吸收的人数較多。后来有些

人发生了动摇，到最后巩固下来的有徐光国、吴斌、吕和音、徐雄、柯制明、潘知来、裘绍、周亚卫、邢复等。

秋瑾这次在杭州，住在撫台衙門前过軍桥南首路西一家小客栈荣庆堂里。走进客栈門，过一个約两公尺寬的狭小天井，踏上簷阶，有一条小弄，左首的房間就是秋瑾的住室，窗戶临天井，室内明亮，来人晤談，就在这里。斜对过，小弄的右首，比較隱蔽的一間，是新會員填写志愿书、秋瑾和新會員談話的地方（解放后，一九五六年，曾經看見这所房子还在，形式沒有改变）。

秋瑾当时身穿一件玄青色湖縐长袍（和男人一样的长袍），头梳辮子，加上玄青辮穗，放脚，穿黑緞靴。那年她三十二岁。光复会的青年會員們都称呼她为“秋先生”。

光复会丁未起义

光复会丁未年（一九〇七年）起义，原定的計劃是：以安庆为重点，以绍兴为中樞，金华、处州等各地同时发动，分路攻取南京，占领江苏、安徽和浙江各省要地；安庆方面由徐錫麟主持，绍兴方面由秋瑾主持（这是我事后才知道的）。这年五月，秋瑾在绍兴光复会总机关——大通学堂（在绍兴城内××桥豫仓，有一小部分在附近的仓桥諸暨册局，秋瑾任学堂督办，教职員有王介卿、孙德卿、姚勇忱、张敢忱、竺紹康等）积极准备起义，全校学生加紧进行軍事訓練。就在这个月，我从杭州到绍兴去，参加大通学堂工作，住仓桥諸暨册局，担任油印餅义事务。每日三餐，全体师生都到豫仓飯厅会餐，秋先生每餐都在。

在大通学堂工作了約一个星期，朱瑞打电报給秋瑾，叫我回弁目学堂参加毕业考試。我回杭州考完之后，学堂发表第一营正副

目名单,准备出发到金华、衢州、严州三府征兵,我是正目之一。正在准备中,中队长叶頌清(光复会干部)同我说:浙江陆军小学堂现在正开办,预定调我去担任职务。因此,我未去征兵,又回到绍兴大通学堂,与我同去的有程毅(号翹軒,河南省怀庆府修武县秀才,一九〇七年在上海师范学堂肄业)。六月二日下午,我们在江干趁义渡船渡过了钱塘江,步行到萧山县西兴镇,晚间乘船,六月三日上午到绍兴大通学堂,一同见了秋瑾。程毅就在大通学堂当教员。我在当天下午被派到嵊县去叫竺绍康发动同志,组织队伍,携带武器,赴安庆参加起义。关于队伍的密行和武器的秘密搬运方法以及我帮助竺绍康率领队伍的任务等等,秋瑾都给了指示。

六月四日,程毅和秋瑾一同被捕。六日,秋瑾在軒亭口被害。程毅被关在绍兴府牢狱里,审问了十七次,虽经酷刑严讯,他除了提到秋瑾之外,没有供出光复会的一件事、一个人;第二年秋间病死狱中。

我在六月三日下午接受任务后,当天晚上乘船离绍兴,四日在蒿坝转船,五日上午到嵊县,见了竺绍康。竺绍康那时住在嵊县城南门外的恆源兴过塘行(代客雇船和转运货物的店行)里。这个行在剡溪北岸大路旁边的高台阶上。他住的房间朝着剡溪,与他同住的有十岁上下的两个儿子(竺鸣涛、竺筱鸣)和一个中年的马夫。他还有一匹马。

我传达了秋瑾的指示,竺绍康让我到南乡乌岩镇找俞稚春发动同志。五日当天下午,我到了俞稚春家里。稚春说,同志们大部分集中在新昌县梅渚村一带;他同我商定,次晨一早赴梅渚。傍晚,两人出门在溪边散步,向大树荫望北走,迎面来了一个从嵊县城里来的人,说:“徐锡麟刺死了安徽抚台,他本人被斩首剜心了。”

紹興方面，秋瑾被捕，大通學堂被查抄。嵗縣城里，在捉拿竺紹康，竺已逃走。”我們兩人听了这个消息，就匆匆分手了。

我从烏岩到了西乡，在邻村姊家住了一宿，第二天(六日)早晨到家里看一看母亲，就向嵗縣城里走去。一路上行人的談話中，也有昨天所听到的情况。恆源兴过塘行門前的馬不在了，竺紹康父子住的房間敞着門，空无一人。这些所聞所見，証實了上述消息是确实的。我便直回杭州，到營里(海潮寺)当了几天新兵正目；等到我的陸軍小學堂副學長(副排長)的職務正式发表了，就离开海潮寺，到了蒲場巷。

秋瑾被杀，杭州方面人心很憤激；不知道秋瑾的人都因此知道了秋瑾，不懂得革命的人也因此受到了革命的教育。《杭州白話報》登載了一幅插畫，畫面是波濤滾滾的浪潮，当中有一只鼓足了風帆的航船，上頭題詩兩句：“秋雨秋風天欲黑，張帆暗送浙江潮”。“秋雨秋風”是秋瑾供詞中語；“張帆”是指當時浙江巡撫張曾敫(張号筱帆)。新軍第一標標統李益智因為从杭州帶兵到紹興，參與了包圍大通學堂、逮捕秋瑾的事，他从此在浙江就很不得人心。

秋瑾案發生后，新軍第二標受到省官方特別注意。據說海潮寺周圍曾經布置密探，幸而后来無事，沒有受到株連。

杭州知識界为了秋瑾案很不滿意湯壽潛。因為紹興知府貴福逮捕秋瑾之后，因湯負有聲望，曾經征詢过湯的意見，而湯的表示却是不利于秋瑾的。

光復会和同盟会在杭州的密切合作

杭州的同盟會會員，在新軍方面有顧乃斌、葛敬恩、黃夙之(同時又是光復會會員)、陳國傑、馮熾中、徐士鑑、傅孟等。他們都是浙

江武备学堂毕业生。还有吴思豫，是从武备学堂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去留学的。

在杭州，光复会和同盟会，开会和办事有时在一起，不分界限，协力合作。新军第二标标统蒋尊簋是同盟会会员，而他的部下就有光复会的同志。

光复会的领导人是陶成章、徐锡麟、秋瑾三人。丁未起义失败，徐、秋牺牲了。陶成章和杭州新军界同志接触的机会较少。杭州方面的领导人，丁未之后，也有变化：朱瑞离浙江到安徽去了，周凤岐进陆军大学去了，叶頌清遭受地方同乡的打击，也暂时离了军职。因此，有几年，杭州光复会的活动比较少。光复会创始人章炳麟、蔡元培，同杭州新军界方面没有直接关系。一九〇八年到一九一〇年间，从各地到杭州来联系过的同盟会会员，先后有由南京来的冷遒、伍崇仁（綬卿，南京人，浙江武备学堂毕业，在南京第九镇任职）和由上海来的黄郛。同盟会和光复会同志都在一起开会，地点在湖墅黄凤之的家里。

杭州的光复

光复杭州的革命队伍主要是浙江新军。一九一一年，浙江新军已经成镇，主力驻杭州。其中步兵第一标驻笕桥，第二标驻南星桥，协司令部和工程营驻梅东高桥，马队、炮队及辎重营驻螺蛳山。

同盟会会员和光复会会员在新军干部中占主要地位，并且一般都受到全军上下的信任。非会员的干部也大多数同情革命。光复会会员朱瑞已经从安徽回浙江，任第一标（笕桥）第一营管带，代理标统。俞焯调到第一标，叶頌清又回到新军里，周凤岐、吕公望、蔡

紹等也分別由陸軍大學和保定陸軍速成學堂回到了杭州。

浙江陸軍小學堂也是參與光復的一支力量。陸軍小學堂的第一期畢業學生，先升學到南京陸軍中學，一九一一年秋間，已升入武昌陸軍預備學校。他們參加了武昌起義，王卓、詹蒙兩人陣亡。這時在學堂的有第二期（三年級）和第三期（一年級新生）。為了準備參加起義，這兩期學生都加緊訓練，並給第三期提前發了槍。陸軍小學堂的两个隊長，一个是同盟會會員葛敬恩，一个是光復會會員周亞卫。排長呂煥光、葛琦、商文蔚、陳純、邵武、王春琴都同情革命。教員如韓澄、羅嗣宗、何公旦、張晉、劉公劉、陳仲甫等，都是進步分子。

武昌首義以後，杭州方面開始積極醞釀。陸軍小學堂為通訊聯絡機關之一，並進行宣傳鼓動工作，對杭州各機關學校等散發傳單。有一次地理歷史教員陳仲甫起草了一篇檄文，由我用一張大紙寫好，同排長商文蔚兩人深夜裏去貼在鼓樓的門旁。第二天，這張檄文不見了，原位置上改貼了撫台衙門的嚴厲鎮壓的告示。

當時在杭州的反革命武裝力量情況如下：一、撫台衙門有巡撫增韜的衛隊一營，新軍裝備，有訓練，有機關槍（當時只有這個衛隊營有機關槍，別的队伍里沒有）。二、駐防將軍衙門所轄旗下營（今新市區），人數多，但沒有戰鬥力。三、巡防隊，有幾個營，分哨（排）散駐在各城門附近和幾個寺廟里，是舊式軍隊，只有舊式槍，也少訓練。四、巡警，是新辦的警察，力量小。

一九一一年八九月間，杭州的同盟會和光復會舉行了幾次幹部會議，進行了一系列的準備，於九月十四日的夜里發動武裝起義。起義的概況如下：

步隊第一標占領下城的城內外各地。工程營協助第一標進長

山門并担任其他占领任务。步队第二标占领上城的城内外各地，主力一部占领撫台衙門。撫台衙門卫队营管带孔昭道，事先由某同志联系妥当，表示归附革命。炮队在城隍山占领阵地，准备射击將軍衙門。

陸軍小学堂的学生队由队长葛敬恩率领，任务是占领杭州城站（火車站），并担任太平門、清泰門一带的巡逻警戒。

光复会敢死队，由张伯岐、尹維俊率领，九月十四日下午从上海到杭州，带来的炸弹、武器卸存陸軍小学堂，夜间会同第一标攻击撫台衙門。

十四日夜，各部队按照上述部署分头行动。其中较重要的是第二标和光复会敢死队围攻撫台衙門。光复会的十七岁女会员尹維俊站在敢死队前头投掷烧夷炸弹，烧毁了撫台衙門的一部。革命軍逮捕了浙江巡撫增韜，交陸軍小学堂学生队押往清泰門八旗会馆看守（后经会议讨论，送上海释放）。駐防將軍和旗下营没有抵抗。巡防营都缴了械。警察表示反正。

九月十五日，杭州光复。

在起义的全部过程中，只有管带陈国杰在报国寺受伤（由于误会），没有发生其他流血事件。

当时我的任务是支援第一标。十四日下午到笕桥，在俞焯（丹屏）先生家里晚餐后，天黑了，和他的亲戚竺某一同去剪断通向各处的电话线。以后随俞先生进营房。有排长滕瑞祺身发高烧，不能进城，我便临时代理他的职务。我领着这个排随着大队伍，几阵快步，几阵跑步，进了艮山門。以后我排分进到茅廊巷，缴了巡防队的械。任务完后，我回陸軍小学堂休息。十五日上午，上城隍

山，炮队还没有撤出阵地。据说有一发炮弹命中将军衙门的廊柱，柱脚被震得向后移动了半寸。

我是光复会的普通会员，事前的干部会议没有参加，所以全面的布置我知道得不详细，以上所写的情况，只是零星的回忆。

浙江光复时一些人事安排如下：

临时都督董葆暄（伯吹），原第二标的督队官（营副官）之一，由干部会议推选。

首任正式都督汤寿潜，沪杭甬铁路督办，是从上海迎接来的，在职不久。

第二任都督蒋尊簋，一九〇六年任第二标标统，一九〇九年调任广西，后再调广东，到浙江光复后回浙。

都督府军务厅厅长顾乃斌，同盟会杭州领导人之一。继任陈仪系从北京回浙。

民政厅厅长褚辅成，财政厅厅长高尔登，都是从上海回来的。

浙军总司令周承夔，原第二标标统；参谋长周凤岐，由陆军大学回浙；参谋有盛开第等；副官有陆鍾麟（玉书）、馮熾中、徐士鑑、傅孟、周亚卫。

会师南京的浙军支队司令部：支队长朱瑞，参谋长吕公望，参谋葛敬恩等。

（二）尹锐志、尹维俊姊妹的革命活动

光复会前期，由章炳麟、蔡元培、龔宝铨主持，总机关在上海。中期，由徐錫麟、秋瑾主持，总机关在绍兴。后期，由陶成章主持，总机关仍设在上海。陶成章经常在南洋和国内各地奔走，上海方

面由一个女会员尹锐志负责。我和尹锐志在辛亥革命以前，因同乡同志关系，曾闻其名；一九一三年春，才在北京相见；一九一六年结婚。她在一九四八年病故于重庆。相处三十多年中，有时她谈到光复会的旧事，以下所记即是她所谈的一些情况。

尹锐志参加光复会

光复会在嵊县(属绍兴府)的机关设在北乡某村王金发家里，在城里某弄设有办事处。尹锐志当时在爱华女学堂读书，思想倾向革命。她每天上学下学，经过光复会办事处门前，知道这里是个秘密革命机关。一九〇三年，有一天，她发觉有从省里(杭州)来的人要破坏光复会的机关，并且已经约好办事处里面的某人做内应，她就立即密告办事处。光复会的同志们调查属实，消灭了内奸，作好准备。省里来人不敢下手，就走了。因此，光复会吸收了尹锐志入会，当时她才十三岁。

一九〇四年，尹锐志来到绍兴，在秋瑾办的明道女学堂里半工半读。这年，她的妹妹尹维俊(时九岁)也入了这个学堂。后来锐志被派到上海工作，姊妹二人就一同住在上海。尹维俊身材高大，当她一九一〇年在体育学堂毕业、任体操教习时，才十五岁，但看起来同成年人一样。

尹氏姊妹在上海光复会总机关

一九〇七年，光复会准备发动武装起义。这年五月，尹锐志(十七岁)和尹维俊(十二岁)由上海回嵊县参加起义。结果因为安庆先期发动，起义未成，各处大索革命党人，她们两人便从嵊县又回到上海。

自从丁未起义之后，光复会在上海的同志集会和通信联络都很不便，生活也很困难，挨饿挨冻是常事。尹锐志、尹维俊两人就以贩卖书报杂志来掩护通信联络和侦查工作，并且借此维持自己的生活，有时还帮助困难的同志；她们有时也受到王金发母亲的接济。

一九〇八年，光复会会员姚勇忱找到了一个会制造炸弹的人，她们姊妹两人就从之学会了制造炸弹的技术。一九〇九年，姊妹两人曾到过北京，想炸毙清廷的权贵要人。住了将近一年，因人地生疏，清政府又防范很严，不易下手，就回到上海。

一九一〇年，陶成章在上海法租界平济利路设立了一个固定机关，叫尹锐志、尹维俊住在里面担任日常工作，并且用她们姊妹两人的名字，把这机关定名为“锐俊学社”。这个学社，表面是一个小型的阅览书报的民间文化机构，实际是光复会后期的总机关。后来又发起组织了一个女子国民会，会所也在这里。

上海光复前后的活动

一九一一年，四川、湖北、湖南、广东等各省发生反对清廷铁路借款的大风潮，光复会准备响应。八月武昌首义后，尹锐志联络沪军营陈管带、吴淞海军朱庭燎、陆军黄汉湘参加光复会，共同策划革命，组织了光复军。九月，李燮和由南洋爪哇回到上海，担任光复军总司令，司令部就设在锐俊学社。

这里要说一下上海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关系。同盟会在上海，陈其美是主干，他很不喜欢光复会。陈其美曾经几次劝尹锐志到南洋去，目的是要尹离开上海，使光复会在上海没有人办事。尹不听，未中其计。有一次南洋汇给光复会的一笔款子竟被陈其美冒

領去了。这一类事是不少的。上海光复的时候，陈其美向光复会要求占有制造局所存枪械的大部，要求平分制造局的現款，要求由他当沪軍都督，在制造局設沪軍都督府，要求光复軍总司令部移駐吳淞。尹銳志都答应了。

江浙联軍攻下南京之后，江苏省松江府还没有光复。松江代表平智初到南京軍中請求尹銳志制发炸彈。尹銳志认为江南大部都已光复，松江一隅可以在周围形势影响之下和平光复，用不着炸彈。但因为平智初坚請不已，尹銳志只好和他同回上海制造炸彈。

光复会制造炸彈的秘密机关設在法租界霞飞路某号三楼，尹銳志在里面工作了一夜，时近天明，身体疲乏。助手楊哲商和平智初再三劝尹休息，由他們两人代为操作。尹刚入睡，楊操作失手，炸药爆炸，把整个屋頂轰掉了。楊本人全身粉碎，只剩下了一个胃。平头面手脚都負伤。尹头顶炸伤，惊慌中从三楼窗戶跳下馬路，乘洋車到附近自新医院治疗；法国巡捕追踪而来，把她送入广慈医院。她神志恢复、伤势稍愈后，又被带去关在巡捕房里。陈其美派王一亭送款五千元，由工部局发給房主，作为賠償費。因为已經光复，所以尹銳志能够释出养伤，沒有再追究此事。

当光复会會員朱瑞、夏超、周凤岐、叶頌清、俞燠等組織杭州的武装起义时，上海光复会派出一支敢死队，攜帶炸彈，由尹維俊和张伯岐帶領，到杭州参加了起义，其經過已見前节。